陕西党史资料丛书

（二十六）

#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

（回忆资料卷 1923—193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陕西人民出版社

◀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将军。

▶第十军政治处处长、中共第十军特别委员会委员魏野畴。

►第十军政治处中共支部书记曹力如。

中共第十军特别委员会书记、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

◀陕西省政府高级参议、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杜斌丞。

▶中共党员王炳南。

▶十七路军警三旅旅长、中共第四军支书记张汉民。

◀十七路军骑兵团团长、著名中共党员王泰吉。

◀十七路军特务第二团第七连中共支部书记崔廷儒。

▶十七路军警卫团中共党员、著名烈士张含辉。

▶中共西北特支书记谢华。

◀杨虎城夫人、中共党员谢葆真。

# 陕西党史资料丛书编辑凡例

一、为了立好、立准确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地区进行革命斗争的资料，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编辑出版《陕西党史资料丛书》。

二、本《丛书》系“内部发行”的资料丛书的序列编号，以文稿的发排时间先后为序。

三、收入本《丛书》的历史资料，原文中之繁体字、异体字，均改为简化字、通用字；竖排之标点符号，均改为横排标点符号；数字用法按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使用；当时不便于明书以“〇”、“X”等符号代替之隐文，统以“〇”代替；多余之字句，加“< >”保留；辨认不清和因纸张破损漏缺之文字，均以“□”代替；明显之遗漏、错别字句，在“[ ]”内补漏、正误。

# 目　录

西安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概述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
关于两当兵变和王泰吉起义……习仲勋（30）
在杨虎城部工作的几件事……汪　锋（36）
杨虎城部在太和与二次入陕……南汉宸（57）
党派我到杨部做争取工作……王炳南（69）
九间房事件……阎揆要（74）
初识魏野畴……孔从洲（78）
回忆在西安政治队的学习和太和军校中党的工作……吴岱峰（80）
回忆靖远兵变中的谢子长和耀县起义中的王泰吉……张秀山（84）
回忆两当兵变……吕剑人（92）
关于西安綏靖公署步训班的一些情况的记述……常黎夫（102）
从南阳教导队到西安事变……孙作宾（129）
在十七路军中工作……童陆生（149）
我在十七路军工作的片断回忆……刘威诚（155）
张汉民在三原和警卫团中的革命活动……雷展如（164）
西安事变前我在十七路军的主要工作经历……陈云樵（171）
西安事变前我在十七路军中的主要活动……阎维良（182）
我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孙蔚如（190）
从山东剿匪到入陕主政……陈子坚（195）
回忆中国共产党在杨虎城部的早期活动
……屈　武　耿炳光　宋树藩　赵葆华　吴化之（207）
策动杨虎城南下驱逐刘镇华……王森然（210）
与野畴一起做地下工作……王圣域（212）

回忆魏野畴与杨虎城的二、三事……赛荫三（214）
驱逐吴新田筹办三民军官学校……田伯萌　卫志毅　张仲实（215）
共产党人在围城斗争中……李定乓　仲兴哉（217）

附：
屈董二委员到河北后之动作……（219）
杨虎城派代表赴粤……（219）
耀县三民军官学校对时局之宣言……（219）
三民军官学校近讯……（220）
回忆张汉民在三原……李培文（225）
忆皖北革命……谢祥萌（227）
杨部在皖北太和……高敏夫（229）
我和杨虎城的一些交往……冯润章（234）
我在历史上的一段经历……张归仁（236）
在杨虎城部当参议……赵鹏九（239）
我在杨虎城部的一段经历……杜理程（240）
从1927年到杨虎城军内至红九军失败……董林哲（242）
张焕民在十七师发动兵变……石仲伟（247）
舞阳下澧河暴动记……姚丹村（251）
杨虎城部南阳教导队情况……蔡子伟（259）
在南阳教导队做党的工作……注平（261）
回忆在南阳教导队和张汉民警卫团的工作情况……王建三（264）
囡忆汉宸和绮云在十七路军的几件事……米暂沉（267）
杨虎城部参加中原大战前后……连瑞琦（272）
杨虎城十七师随营军官训练班建党概述……吕剑人　孙作宾　卢松轩（278）
整顿十七师中共地下组织及成立师军委的情况……李慕愚（282）
成立新兵一连党小组……李濂（285）

崔廷儒与三十八军早期地下党的工作……蒙定军（286）
三十八军在汉中时军部中共支部的活动情况……李扶汉（289）
我任补充团党支部书记……胡振家（295）
一段经历……杨嘉瑞（297）
十七师补充二团地下党组织活动情况……贺修之（298）
回忆巉口起义……卢济民　卢松轩（301）
三十八军教导队学生队党的活动……金良栋（306）
三十八军地下党同敌人的斗争……毛云鹏（307）
三十八军地下党的一些情况……成子慎（313）
关于组建宪兵营党组织的情晃……王　杰（315）
我在宪兵营的情况……上官克勤（318）
点滴回忆……王亦哲（320）
三到西安……谢　华（321）
西北特支的建立……徐彬如（326）
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辛　文（331）
我在宪兵营的工作情况……王　力（333）
廷儒领导我搞兵运……刘　庚（336）
关于宪兵营党组织的有关情况……李锦峰（339）

附：
十七路军宪兵营组织成立……（341）
杨虎城对宪兵营官兵训词……（341）
宪兵营经济委员会昨开成立大会……（342）
杜衡供词摘录……（343）
高绥夫交待材料……（343）
王德修营地下党的情况……李秉荣（345）
回忆两当兵变……李特生（347）

忆两当兵变……许天洁（352）
誓三旅二团一营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与活动……刘书林（354）
在王德修营搞地下工作……张克勤（361）
我入党的经过及两当兵变的情况……左文辉（365）
王德修营中共地下组织情况及两当兵变的经过……张子敬（368）
两当兵变及之后情况……吴彦俊（371）
参加两当兵变……张茂修（374）
回忆靖远兵运……王儒林（376）
王泰吉骑兵团的起义……赵伯平（380）
关于王泰吉骑兵团起义……何寓础（383）
耀县起义回忆……刘映胜（385）
耀县起义经过……谈国帆（389）
耀县起义……王　英（392）
耀县起义和耀县游击队……张邦英（402）
骑兵团一连支部及终南山起义……赵启民（406）
回忆骑兵团党组织……刘静波（409）

附：
绥署段振纲接充骑兵团团长……（411）
蒋介石杀害王泰吉之密令……（411）
国民党杀害王泰吉布告……（411）
在十七路军四十二师的一段经历……高克林（413）
一次兵变的失败……李豫幸（415）
我在马青苑部的经历……杨松青（417）
我在中共陕西省委军委的工作……朱　军（419）
点滴回忆……杜勉之（421）
我的回忆……朱　军（423）

中共陕南特委与安康起义的情况……刘顺元（423）
在安康的工作……梁布鲁（425）
在安康搞兵运……黎民觉（430）
从陕南游击纵队到陕南抗日第一军……何振亚（435）
营盘起义前后……王　展（446）
回忆警一旅三团中共党支部工作……崔一民（450）
回忆警一旅党组织……王晓时（454）
寻找红二十五军……解华亭（455）
我党在陕西省警卫团的组织与活动……汪　锋　阎揆要　雷展如（457）
回忆张汉民同志……王超北（464）
苗家祥在警卫团……牛锡群等（466）
我所知道的十七路军警卫团中党的活动情况……余洪远（468）
我任陕南特委军委时与张汉民等人的来往……刘明达（470）
陕南工作见闻……陈子敬（472）
我在警卫团的工作……侯书铭（473）
张汉民营救交通员……尹芳垣（477）
警卫团支援游击队……杜耀亭等（464）
忆在警卫团的几件事……石　林（480）
我所知道的警卫团中党团组织情况……张毅生（482）
办墙报、开民主会、杀恶霸……王　涛（484）
回忆黎坪垦荒游击队……曾继全（486）
红卫团中的“红军之友社”……王维之　余晴初（487）
谈九间房事件……程子华（489）
关于九间房事件……戴季英（490）
张汉民同志是被误杀的……郭述申（493）
回忆张汉民同志……王超北（464）
沉痛的教训……郑位三（495）

忆九间房事件……彭　辉（497）

附：

国民党蓝田县长郝兆先给邵力子的报告……（473）
回忆周恩来的一次重要谈话……江　锋　阎揆要（503）
往事略忆……张一平（507）
特二团中共地下组织的建立和活动……王　国（511）
特二团党委主要工作……王写剑（518）
特二团党的活动……周益三（528）
党派我到十七路军特二团建立秘密电台……刘克糸（530）
回忆在特务营营党的工作……韩学理（532）
五十年前搞兵运工作的回忆……刘天才（535）
西安事变前的一些经历……谢晋生（537）
我在特务营的情况……姜树德（540）
扣押国民党大员……宋文梅（542）
我在十七路军教导营做党的工作……杨永昶（546）
加入教导营地下党组织……王芝田（549）
回忆在步训班做党的工作……李启明（550）
在步训班三个月……张文舟（551）
从步训班到教导队……张　涛（553）
回忆绥署步训班骑兵队党支部活动情况……刘侠僧（559）
回忆西安绥署步训班……何永安（567）
西安绥署步训班教育情况……于景琪（572）
绮云在西北新闻战线……曹绶社（572）
宋绮云与《西北文化日报》……曹冷泉（580）
回忆在十七路军总部无线电台做党的秘密工作……程卓民等（595）
回忆在川陕地区的统战工作……武志平（601）

党派我与杨虎城谈判……王世英（628）
南汉宸派我与杨虎城联系……申伯純（630）
西安事变前后我在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的工作情况……庞志杰（631）
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王菊人（638）
中国共产党在十七路军中的已知地下组织（1927—1936）……（657）

# 本辑编辑说明

一、本辑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二卷。共收录回忆文章139篇，其他佐证资料18篇。这些资料，从不同的角度，比较系统、全面地反映了1923年春至1936年西安事变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建立组织和开展活动的史实，为进一步研究和总结中国共产党与十七路军建立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二、本辑基本上是回忆录的汇编卷。为了便于读者阅读，也为了有利于理清中国共产党在十七路军中先后建立的组织及其活动的脉络，凡述及的史料较广泛、时限较长的回忆录，以时为序集中排在前面；其他的回忆录，以所述及的党组织为单元，分别集中续排其后；有关的佐证资料，则分附在各个单元之后。

三、本辑的编辑工作，是在有关的老同志关怀指导下进行的。习仲勋、汪锋、阎揆要、吕剑人、常黎夫、孙作宾、范明、杨拯民等老同志审了本辑的目录、概述及部分重要资料。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四、由于编者的水平和经验所限，在编辑工作中，疏漏和舛错在所难免，敬请原十七路军中的各位老同志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3年4月

# 西安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概述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毛泽东曾说过：“杨虎城部队和我党的关系前前后后不断，时间是比较久的，前有魏野畴，后有李子洲、南汉宸”。[①]从1923年春魏野畴向杨虎城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始，到1946年9月杨部起义部队成立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中国共产党在该部队进行活动并与之合作，长达23年之久。

本卷所反映的，是西安事变以前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在杨虎城部队中的活动和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对其上层进行统战工作的情况；西安事变以后党在该部队的活动资料，将作为第三卷编辑出版。

杨虎城部队曾经多次整编、改编，番号多次变更。但因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是其鼎盛时期的番号，又因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共同发动过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所以人们常以十七路军统称该部。本文亦以此行文纪事。

## 一、十七路军的沿革

十七路军是国民党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创建的一支地方部队，渊源于二十世纪初杨虎城在家乡陕西蒲城县组织的一支农民抗暴武装。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杨虎城率领蒲城农民武装积极参加，同新成立的秦陇复汉军一起与清军作战。1914年编为蒲城县东乡民团。1915年参加讨袁战争。1916年编为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第一营，杨任营长。

1917年12月陕西爆发了反对北洋政府在陕西新的代理人陈树藩的战争，并成立陕西靖国军。杨虎城即率部参加，编为第三路第一支队，杨任司令。1922年1月设在三原的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被迫解体，杨虎城迎总司令于

右任到其驻地武功重建靖国军总司令部，其部升编为第三路，杨受命任司令。5 月，于右任密赴上海向孙中山复命，杨虎城率部转进陕北，编为陕北镇守使井岳秀所属的步兵团。1924 年 10 月北京政变发生，同情广东革命政府的国民军成立。井岳秀部改称陕北国民军。杨虎城遂以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的名义率军南下，立脚渭北，支持“驱吴运动”。1925 年 8 月，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孙岳率部入陕，杨虎城部受编为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杨任师长。

1926 年春，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改称陕军第三师，杨虎城仍任师长，参加坚守西安策应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的斗争。11 月，已宣布参加国民革命的国民军联军解除西安之围。1927 年 2 月，陕军第三师受编为国民军联军第十路，旋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东出潼关参加北伐。1928 年秋改编为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二十一师。杨虎城先后任总司令、军长、师长。

1929 年 4 月，杨虎城接受蒋介石的指挥，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四师。1930 年 3 月后，相继编为第十七师、第七军、第十七路军，杨虎城先后任师长、军长、总指挥。11 月，杨率部回陕，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从 1931 年至 1936 年 12 月，是十七路军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下辖的部队有：第七军，第三十八军，陕西警备师，陕西警备第一旅、第二旅、第三旅，甘肃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直属警卫团，特务第一团、第二团，骑兵第一团、第二团，特务营，教导营等部，总兵力发展到 6 万多人。

## 二、中国共产党在十七路军的地下组织

中国共产党在十七路军中的地下组织，始建于 1927 年初。在此之前，共产党员魏野畴、赵葆华、吕佑夢、刘含初等在其中进行过活动。陈云樵、卫志毅、张振河、李维翰、白怀德、李德兴等，是该部士兵、学生中参加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

1927 年成立的中共组织是：

（一）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政治处的中共支部。年初成立，书记曹力如，党员 10 多名。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十七路军中建立的第一个组织。（二）第十军三原留守部队中的中共第四军支。10 月成立，张汉民（炮兵营营附）任干事会书记。下属 2 个支分部，张汉民兼炮兵营支分部书记，刘威诚（骑兵排长）任补充团支分部书记。隶属中共陕西省委。（三）第十军的中共特别委员会。是年 11 月成立，书记南汉宸，魏野畴和蒋听松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南汉宸走后，书记先后由魏野畴、宋树勋担任。隶属中共河南省委。下属第十军军政干部学校的中共总支委员会，南汉宸、王汉秋、吴岱峰先后任书记；第十军第一师中的中共总支委员会，胡英初任书记，王世英、张庆孚为委员；第十军直属机关部队中的中共支部，陈云樵任书记，曹力如、杜宗美为委员。1928 年 4 月，阜阳暴动失败后，中共在第十军中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员人数由原来的 200 多名锐减到二三十名。

1929 年成立的中共组织是：

（一）秋，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四师中的中共军事委员会成立（一说是 1930 年初成立）。杜理程任书记，董林哲、田静沉为委员（后增加的委员有孙永康、冯异僧、张焕民）。隶属中共中央。（二）秋末，新编第十四师第三旅中的中共支部成立，曾楚川任书记。

1930 年成立的中共组织是：

（一）年初，新编第+四师南阳教导队中的中共军事委员会成立。赵莘仁任书记，孙永康、董林哲、曾楚川、王明为委员。在各中队成立了党支部。第一中队支委会由曾楚川（书记）、杜俊杰、孙作宾、岳玉彩组成；第二中队支委会由孙永康（书记）、阎维良、张海慧组成（三、四中队支委会成员不详）。教导队共有党员百余名。（二）7 月，第十七师中的中共兵变前敌委员会在河南舞阳成立。孙永康任书记，张焕民、王老汉、刘煊、姚丹村为委员。上述党组织隶属十四师中共军委。

1930年11月十七路军入陕后，中国共产党在其中的组织有了较大发展。从1931年至1936年12月，先后建立中共师的军委3个，团委3个，营委3个，特别支部2个，总支委员会1个，支部50多个。

1931年成立的中共组织有：

（一）陕西省政府卫士营千训队中的中共支部。书记汪锋，委员冯世光、李光明。（二）十七路军总部宪兵营中的中共营委员会。书记魏志坚（后为王杰、杜俊杰），委员王杰、杜俊杰、李炳文、李世英、上官克勤。下属3个连的支部。（三）第十七师中的中共军委会。书记孙作宾，委员李慕愚、胡振家。不久，十七师分驻汉中与凤翔两地，师的军委分组为前方、后方军委。在汉中的前方军委（同时为中共陕南特委军委），由李慕愚（书记）；李濂、王宝灵组成；在凤翔的后方军委，由孙作宾（书记）、胡振家、吕剑人组成。（四）第十七师随营军官训练班中的中共支部。书记吕剑人，委员刘敬业、张毓秀。（五）陕西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中的中共营委员会。李秉荣、李特生、习仲勋先后任书记，下属一、二、三连和机枪连支部。（六）陕西警备师中的中共支部。书记阎维良，委员张廷奎、王志远。上述党组织分别隶属中共陕西省委或省委军委。

1932年成立的中共组织有：

（一）年初成立的甘肃省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中的3个中共支部。一个是校官支部，书记李罕言，委员孙作宾；一个是士兵（含尉官）支部，书记石子健；一个是旅教导队中的特别支部，书记是张东皎副书记苏醒民。（二）随后，该旅第二团中的中共团委员会成立，书记张东皎，副书记牛化东。4月，团党委改组，书记焦维炽，委员张秀山、石子健、苏醒民、高尊德。上述党组织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三）第十七师五十旅补充二团中的中共支部，书记贺修之。（四）十七路军总部第一骑兵团一连中的中共支部。魏志坚（连长）、赵启民（排长）等为支部委员。

1933年成立的中共组织有：

（一）5月，中共安康军事特别支部成立。书记梁布鲁，委员王辛德、

袁作舟、王泰诚。后王辛德接任书记。（二）夏，陕西省政府警卫团中的军官支部和士兵支部成立。军官支部书记雷展如，委员翟松生、李明轩；士兵支部负责人马学文。上述党组织分别归中共陕南特委领导。（三）秋，十七路军总部宪兵营中的中共支部成立。书记谢华，委员金闽生、童陆生。谢华返上海后，支部工作交金闽生负责。隶属中共上海中央局。（四）年底，第十七师补充团中的中共支部成立。书记胡振家，委员杨嘉瑞、贺修之。隶属中共陕西临时省委。

1934 年成立的中共组织有：

（一）陕西省政府警卫团中的中共士兵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崔廷儒，下属团直和各连党支部。到年底时党员增至 200 多名。（二）第三十八军军部中的中共支部。书记崔尽善。（三）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第四期骑兵队中的中共支部。书记王志仁，委员刘侠僧、陈涛。以上党组织是上半年成立的。（四）是年秋，步兵训练班第四期学生队中的中共临时支部成立。负责人李启明，委员张涛、张文舟（另有一支部，书记程天鹏。何单位不详）。（五）冬，第三十八军教导大队中的中共支部成立。书记李锐，委员常清平、张涛。上述党组织分别隶属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和中共陕南特委。

1935 年冬，十七路军总部宪兵营第三连中的中共支部成立。书记刘湘卿（王力），委员吕建勋、刘振雅。隶属中共陕西临时省委。

1936 年成立的中共组织有：

（一）1 月，十七路军总部宪兵营新兵训练排中的中共支部成立。书记刘子义，委员李卡兰（夏飞）、苏育涵。（二）3 月，西安绥靖公署教导营中的中共营委员会成立。书记杨正人（杨永昶），委员翟程九、巩克中。下属 2 个连支部。隶属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三）5 月，在十七路军总部宪兵营中共支部基础上组建的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立。书记谢华，委员徐彬如、李木庵。金闽生、童陆生、王根僧、宋绮云也参加了特支的实际领导工作。隶属中共上海中央局。（四）9 月，西安绥靖公署特务第二团中的中

共团委员会成立。王建基（王国）任书记，张一平、高兴中（王写剑）、刘家驹（杨信）、秋含章（秋宏）为成员。下属军官支部、团直和各连中的士兵支部。党员多时发展到200多名。（五）秋，十七路军总部宪兵营改编为特务营，遂根据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的指示，在第三连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特务营的中共总支委员会，书记刘湘卿，委员吕建勋。下属3个连的支部。12月西安事变后，营总支委员会进行了调整。书记韩学礼，委员刘湘卿、吕建勋。下属4个连的支部。各连支部书记均为总支委员会委员。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该营正副营长和4个连长都是共产党员。

这期间，还有一些单位，如陕西警备第二旅、《西北文化日报》社，都有一些共产党员，但没有成立党的组织。还有一些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如张汉民（陕西警备第三旅旅长）、许权中（独立旅旅长）、武勉之（四十二师旅长）、唐哲民（十七路军总部军械处处长）、阎揆要（特二团团长）、刘威诚（陕西警备第一旅团长）、王泰吉（骑兵团团长）、宋文梅（特务营营长）等，大都没有或在大部分时间内没有编入党的基层组织，其组织关系或在中共中央，或在中共陕西省委。

中国共产党在十七路军中的地下组织，实际是1927年7月宁汉合流、国民党彻底与共产党决裂后相继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所以能如此，这是与杨虎城的联共政治态度分不开的。1927年下半年，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和奉系军阀在全国实行白色恐怖，到处疯狂追捕屠杀革命者。陕西等地的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去时在皖北驻防的第十军“避难”。杨虎城外抵政治压力，内排非议，对于前来的共产党人不但予以收留而且委以重任。如委任蒋听松为军司令部秘书长，魏野畴为军司令部政治处处长，南汉宸为军政干校校长.寇子严为第一师司令部参谋长，胡英初为第一师司令部政治处处长，曹力如为第二师司令部政治处处长。不仅如此，就在这时，杨虎城同共产党员谢葆真结了婚，而且郑重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表示要做“第二个贺龙”6在驻防河南和入陕后，杨虎城仍如以往，继续在其所部任用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朋友。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在十七路军中进行活

动和建立组织，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条件。

## 三、十七路军中的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主要活动

中国共产党在十七路军中的地下组织，在风云变幻的漫长岁月里，对该部的工作，基本上坚持了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为这支部队的不断进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对广大官兵进行民主、爱国和革命的思想教育。

中国共产党在十七路军中的宣传鼓动工作，是从对其创建人杨虎城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始的。1923 年春，经进步人士、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介绍，时在榆中任教的共产党员魏野畴与杨虎城相识。魏野畴敬重杨虎城勇于坚持靖国军旗帜富于革命的精神，杨虎城敬佩魏野畴人格高尚、见远识卓。魏给杨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救国主张，并帮助杨分析国际国内的形势及其所部的发展前途等问题，使杨虎城在困难与苦闷中受到巨大启迪与鼓舞。从此，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杨把魏视为“最可信赖的知己”。魏野畴这段富有成效的工作，一方面对杨虎城的一生发生了重大影响，为他后来长期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良好的关系奠定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也为中共继续做杨部上层的工作开辟了蹊径。

党在十七路军中的地下组织的宣传鼓动工作，重点是根据中共中央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对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工作。在大革命时期，主要是宣传反对列强、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揭露制造四一二反革命事变背叛国民革命的蒋介石的罪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是宣传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宣传土地革命的政策，宣传中国工农红军的性质、任务，揭露蒋介石实行独裁残酷镇压人民的罪行。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主费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和政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宣传不断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大造抗日救国

舆论，启发广大官兵反对内战，联共抗日。

党在十七路军中的宣传鼓动工作，主要方式是秘密地个别地口头宣传，有条件时也重视通过报纸等公开、合法的方式进行宣传。主要有这样几种：1、在广交朋友中，由浅入深地进行口头宣传，这是最方便最常用的方法；2、结合讲授政治课与文化课宣传联共反蒋、抗日救国思想；3、教唱爱国歌曲，演出抗日救亡节目，书写抗日标语口号；4、召开群众大会，进行革命演讲；5、通过发展党员进行阶级教育和党的路线教育，在党员和党的同情者中间传阅革命书刊以至党内文件；6、秘密散发革命传单和标语等。这些方法都收到了很好的宣传鼓动效果。

（二）帮助杨虎城举办干部学校。

中国共产党和杨虎城的合作，是从帮助其举办干部学校开始的。先后办的干部学校有：

三民军官学校。1925 年 8 月创办于陕西耀县。下设 5 个中队，400 多人。杨虎城任校长，魏野畴为政治部主任，吕佑乾（共产党员）等任政治教官。主要讲授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华史，社会进化简史，不平等条约等。1926 年 11 月西安城围解除后结束。为杨部培养了一批青年革命军官。同时在进步学生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

第十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1927 年冬创办于皖北。杨虎城委任南汉宸为校长。学员 400 多人，编了 4 个大队，共产党员昌绍先、谢祥荫、王汉秋、高敬轩分任大队长。在政治课教育中公开讲授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的决议精神，讲授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历史，抨击背叛革命的蒋介石、汪精卫之流。为十军培养了干部，也为中共地下组织输送了新的力量。1928 年 4 月阜阳暴动后解体。

南阳教导队。1929 年秋创办于河雨南阳。杨虎城自兼队长，孙蔚如任队附。下设 4 个中队，500 多人。共产党员张汉民、赵莘仁、王明任中队长。中共地下组织十分重视教导队工作，通过合法渠道有计划地选派共产党员入队学习。1931 年 1 月，教导队在西安举行毕业典礼后结束。

第十七师随营军官训练班。师长孙蔚如根据杨虎城的扩军计划，为培养大批下级军官，于1931年3月在陕西凤翔县城创办了十七师随营军官训练班。孙自兼班主任，编了两个中队，每个中队3个分队。共产党员孙作宾、胡振家任分队长。学员200多人，大部分是由部队选送的军士。中共陕西省委为了通过训练班抓部队的带兵权，在其组建期间即指派一批共产党员打入该班，并成立了支部（书记吕剑人）。支部根据省委关于在学员中发展党员，广交知心朋友，学习军事知识，掌握军事技术，借机宣传革命的指示，积极开展了各种革命活动，发展了一批新党员，使党员人数达到20多名。他们毕业后分配到十七师各单位，大都担任了排连长职务，掌握了部分带兵权。

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1932年春创办，1935年冬结束。共办了5期，毕业学员1784名。共产党员金闽生、邹桂五、陈云樵、纪子中、贾振中、宋文梅、张希钦、张希文、薛蔚等先后在训练班担任各级干部，常黎夫、李启明、张文舟、蒙定军、李慕愚、王汝昭、王警中、上官克勤、李醒吾、崔治堂、杜瑜华、张涛等先后入校学习。在校的共产党员基本上未进行大的政治活动和斗争，在客观上配合了杨虎城兴办学校培养干部的工作。

（三）帮助杨虎城创办报纸。

在杨虎城的倡导下，十七路军很重视运用报纸这一舆论工具对广大官兵和民众进行团结、民主和反军阀、反列强的爱国主义教育，并任用了许多共产党员进行这一工作。参加报纸工作的共产党员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积极帮助杨虎城掌握舆论工具，并适时地得体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这些报纸是：

《青天白日报》。1925年创刊于陕西宝鸡县虢镇。以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政治处的名义出版发行，实际是三师的机关报。编务工作由共产党员赵葆华、宋树藩等主持。主要是宣传国民军的政治主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北洋军阀吴佩孚的黑暗统治，同情声援广东革命政府。1926年春

随杨虎城迁入西安继续出版，热情宣传守城军民的英雄事迹，鼓舞守城军民的士气。城围解除之前停刊。

《宛南日报》。1929 年冬创刊于河南南阳。实际先后是新编第十四师、第十七师、第七军的机关报。开始杨虎城委任陈子坚（原系共产党员，后脱党）负责，后委任宋绮云主办。不久，又委任冯异僧（共产党员）为社长，宋绮云为主编。共产党员王尚德、孙作宾、曹鸣九等为编辑、记者。报纸的宣传方针是：拥护孙中山，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反对封建，反对压迫；爱护农工大众；加强军民合作。经常揭露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惨景痛况，抨击地主豪绅、贪官污吏欺压人民大众的黑暗统治，为受压迫剥削的劳动人民喊冤叫屈。有时也登一些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活动消息。报社的共产党员还经常刻印一些党内文件和革命传单，同《宛南日报》一起邮寄出去扩大宣传。1930 年十七路军入陕前停刊。

《西北文化日报》。1931 年 7 月创刊于西安。实际是十七路军和西安乡 妥靖公署的机关报。杨虎城委任陈子坚为社长（实际未到职），宋绮云为副社长兼主编，共产党员曹冷泉、曹绶祉、张益斋等担任编辑、记者。他们运用合法的手段抨击蒋介石独裁反共的反动政策。1936 年纪念九一八事变 5 周年时，宋绮云撰写社论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号召国人大觉大悟，坚持抗战。10 月下旬，蒋介石到西安威逼杨虎城、张学良“剿共”，大肆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谬论。《西北文化日报》即连续发表文章进行批驳，呼吁 4 万万同胞起来反对内战，枪口一致对外。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的当天，《西北文化日报》连出两期号外，及时报道了蒋介石被扣的特大新闻。13 日发表了《昨日张杨兵谏与八项爱国主张》的社论和宋绮云的《何处是中国的生路？》的署名评论，高度评价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和巨大影响。张学良在南京被蒋介石扣留后，宋绮云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报上连续发表了《剿共工作之停止与抗日联军之成立》、《民众与张杨的救国斗争》、《还想挑动内战吗？》等重要文章，揭露汉奸卖国贼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阴谋。在此期间，仅宋绮云撰写发表的文章就达 50 多篇。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该报于 1937 年 4 月停刊。

（四）支持杨虎城率部坚守西安。

1926 年初，广东革命政府准备北伐，北洋军阀十分恐慌。东山再起的直系头领吴佩孚为了巩固其侧背，命令早被陕西人民赶下台的刘镇华率镇嵩军 10 万之众，由河南侵入关中，再次祸陕。杨虎城顺应陕西人民的反刘要求，策应广东革命政府北伐，于 4 月率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 5000 余人进入西安，联合国民军第二军第十师李云龙和陕西第四师卫定一部（合计 1 万余人）坚守西安。

在杨虎城等坚守西安期间，西安城内的共产党员和党团组织给予了热情的积极的支持。在西安城被围之前，魏野畴参加了国民军二、三军在三原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帮助杨虎城做出了坚守西安、策应北伐的正确决策。西安城被围后，魏野畴冒着生命危险潜出西安，到陕东刘镇华的统治区，指示中共党、团组织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武装，打击刘镇华部。8 月，魏野畴转到三原，发动群众帮助国民军田玉洁、李子高部打垮了镇嵩军对三原的围困。中共西安地委负责人黄平万、雷晋笙，共青团西安地委负责人吴化之，主持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刘含初、张性初、赵葆华、张含辉、王授金等，均坚守在西安城内，同守城军民同甘苦共奋斗。他们以国民党和青年社、学生会的名义广泛开展活动。在五卅纪念日召开群众大会，号召群众帮助守城驻军反对刘镇华，揭露与打击了欢迎刘镇华的“和平期成会”；举办青年暑期学校，进行国民革命教育和坚守西安的政治动员；组织西安市民自救会，协调军民关系，军民团结守城。中国共产党积极地配合和支持了杨虎城等部的守城斗争。

（五）利用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合法职位，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1930 年 11 月，以杨虎城为主席的陕西省政府成立。杨虎城委任南汉宸为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为省政府高级参议、省清乡总局副局长，还任命其他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政府机关供职。杜斌丞是中国共产党最忠实的朋友。南汉宸等共产党人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和重要地位，一方面协

助杨虎城治理陕政，一方面积极开展革命工作。

南汉宸和杜斌丞等协助杨虎城制订和推行了一系列进步开明的治陕措施，如提倡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提倡科学民主，促进教育、新闻事业的发展；大力剿办土匪，整顿社会秩序。南汉宸得到杨虎城的信任和器重，省政府的一般公务都交其全权处理，这就为南汉宸等开展党的工作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释放政治犯：杨虎城主陕伊始，南汉宸即以合法身份整顿狱治，释放政治犯，使一大批长期系狱的共产党员获得自由。对于十七路军入陕、冯玉祥系的刘郁芬部溃败混乱之际破狱而出的共产党重要干部，南汉宸表面上张扬要“搜捕入狱”，以应付南京政府蒋介石，实则通过杨虎城资助出国留学等办法予以保护。1930 年 9 月，刘澜涛、张德生在绥德被捕，经杜斌丞给新任绥德县县长做工作，使刘、张于 1931 年 2 月出狱。1931 年春，刘志丹在甘肃地方军阀苏雨生部搞兵运工作时被捕，也是经南汉宸和杜斌丞相商以陕西省政府名义出函获释的。刘出狱后，杜还赠手枪 1 支，银币 200 元。

打击反动势力。南汉宸等通过合法方式发动学生捣毁了反共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逮捕了学生中的一些职业特务分子，驱逐了亲蒋的省教育厅长李范一。有条件的扶植李寿亭出任厅长，其条件就是南汉宸保证学生拥护李寿亭出任厅长，李在用人行政方面则要听从南的意见。事实上当时新安排的一大批学校的校长、教务主任的名单，全是由南汉宸提出的（并获中共陕西省委同意），而且取得了杨虎城的允许。这样就把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特务分子掌握的学校的行政权又夺了过来。国民党陕西省肃反委员会、陕西省政府和西安绥靖公署 3 方联合成立了西安邮政局邮件检查所，南汉宸派人参加邮检工作，同庞志杰（共产党员，时任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法官）一起，抵制国民党省党部派来的特务徐玉柱，在一定范围保护了革命利益。

推动十七路军和红四方面军订立互不侵犯、联合反蒋的秘密协定。1932

年 12 月，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到川陕边，蒋介石电令十七路军进攻川陕苏区围剿红军。在此严峻关头，杜斌丞根据共产党的全面抗日政策及十七路军对蒋介石排斥异己的愤慨心理和要求抗日救国的情绪，提出了联共、反蒋、抗日的主张，博得杨虎城、孙蔚如的赞同，也得到杨部不少高级将领和幕僚的同情。杜并向杨、孙推荐，由孙部参谋武志平（共产党员）赴川陕边与红四方面军联系。1933 年 3 月，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王右民、宋绮云向武志平传达了中共上海中央局给他的指示：1、利用在十七路军的公开职务，积极搜集情报；2、通过可靠的关系，建议杨虎城不要和红军正面冲突，并设法秘密建立川陕苏区对外交通线，及时将军事情报直送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3、利用国民党军队内部矛盾，争取杂牌部队中立。武志平同杜斌丞密切配合，机警而积极地执行党的指示和杨虎城、孙蔚如交给的联络任务。是年 5 月 21 日，武志平抵达川陕苏区，向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转交了孙蔚如的信件。红四方面军总部对此事非常重视，委派川陕军委会参谋主任徐以新为红四方面军代表，同武志平一起赴汉中同孙蔚如进行谈判。6 月 24 日，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共同反蒋”的秘密协定。这对红四方面军集中兵力打击四川主要敌人，开辟川陕的地下交通线，克服经济物质困难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十七路军的内部团结，加强了同蒋介石斗争的力量。

南汉宸、杜斌丞等人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他们攻击陕西是“秘书长专政”，“红白不分”。国民党南京政府先后派陈立夫、胡逸民来陕西拉拢、威吓南汉宸。在遭南拒绝后，蒋介石恼羞成怒，电令杨虎城务必将南汉宸押送南京查处。杨虎城为南的安全和今后合作计，遂赠以重金，送南汉宸夫妇到日本暂避。

（六）支援配合红军和地方党组织的斗争，组织士兵实行武装暴动。

中国共产党在十七路军中的地下组织和党员，还利用自己在军队中从事秘密工作的特殊地位和合法身份，在支援配合红军和地方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概括起来是：1、为红军和游击队提供军事政治

情报，支援武器弹药，或代购通讯设备、医疗器材、药品，或赠送军用地图以及其他生活物资。2、在不得已同红军或游击队作战时，或以佯攻而实退，或以追击之名而行掩护之实，或伪称战斗失利而将械弹物品遗弃战场，留给红军或游击队。3、设法释放被俘被捕的红军和游击队的人员。4、在宪兵营、特二团等单位建立秘密交通站，为过往西安的共产党员和有关人员提供安全方面的保障。5、帮助地方党组织开展群众运动，如处决农村反动头目，打击反动势力，以维护秩序为名保护举行革命集会游行的爱国学生的安全。6、收留在地方已经暴露了政治身份的人员，用军队名义“提审”地方当局关押的共产党员，并安排在十七路军中工作。7、利用十七路军印刷所、《西北文化日报》印刷厂等单位秘密印刷革命书刊。

十七路军中的中共地下组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是三十年代初，也开展了兵运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对共产党人实行残酷的屠杀政策，再加中共中央也出现了“左”倾冒险主义，因此十七路军中的地下党组织也先后多次发动士兵举行暴动和兵变。简要情况是：

1、阜阳暴动。1928 年 4 月 9 日，中共皖北特委组织第十军军政干部学校、高桂滋的教导团和部分农民武装举行阜阳暴动。当天召开两万多人参加的工农兵起义誓师大会，成立了皖北苏维埃政府和皖北工农红军。暴动失败，魏野畴、昌绍先等领导人壮烈牺牲。

2、舞阳暴动。1930 年 7 月 19 日，中共十七师兵变前敌委员会以十七师一旅手枪队（一说特务连，一说手枪连）为骨干在舞阳举行暴动，拉出 800 多人，成立了工农红军第九军，张焕民为司令员，孙永康为政治委员，姚丹村、刘煊为副司令员，王老汉为政治部主任。下属 3 个支队。在向鄂豫皖苏区挺进途中被打散，张焕民被俘遇害。

3、两当兵变。1932 年 4 月 1 日，陕西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的中共营委员会，当时书记为习仲勋，在中共陕西省委派去的刘林圃领导下，在甘肃两当县城发动兵变，拉出官兵 200 多人，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许天洁任支队长兼三连连长，刘林圃为政治委员，吕剑人任一连

连长，高祥生任二连连长。北进到麟游岳御寺（今属永寿县）一带，被当地大土匪头子王结子的部队打散。

4、靖远兵变。1932 年 5 月 5 日，甘肃省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的 200 多人在靖远举行兵变，有枪 100 多支。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四支队，谢子长为总指挥，焦维炽为政治委员。下属 2 个大队。因谢、焦与起义部队失掉联系，暂由吕振华代理指挥，不久被敌打散。

5、嶲口起义。1932 年 7 月，第十七师五十旅补充二团一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影响下于甘肃口起义。先整编为团，马济人（共产党的同情者）任团长，卢济民任团附。下属 4 个营，石德庆、赵丕烈（共产党员）分任一、二营营长。后改编为人民革命军，在转战去陕北与红军陕甘游击队会合的途中被地方反动武装打散。

6、蒿店起义。1932 年 10 月，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李艮，在甘肃平凉蒿店，发动护送枪械弹药回兰州的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干部补习队举行兵变。拉出 34 人，有手枪 11 支，步枪 3 支。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十支队，选举李华锋为队长，李艮为政治委员。在转移途中被敌打散。

7、耀县起义。1933 年 7 月 21 口，十七路军骑兵团团长王泰吉（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在耀县率部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下属 5 个大队，共 1000 多人。不久，在三原辘轳把遭敌袭击，王泰吉等率 300 多人先后进入照金苏区。

8、安康起义。1934 年 2 月 22 日，中共安康军特支组织安康绥靖司令部直属队的部分官兵在安康起义。拉出 69 人，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第一纵队，沿汉江西进。28 日进至紫阳县营盘大梁被当地反动武装包围，全军覆没。军特支军事委员、纵队长袁作舟下落不明，特支宣传委员、纵队游击指挥王泰诚在突围中牺牲。军特支书记、政治委员王辛德等 40 多人被俘后遇难。

上述这些兵变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革命斗争。对于鼓舞人民的革命斗志，锻炼教育干部，积累武装斗争的经验

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那些英勇悲壮牺牲的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 四、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开展对十七路军上层的统战工作

1935 年 10 月 19 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即开始直接对十七路军的杨虎城等上层人士做工作。中国共产党对十七路军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一）毛泽东第一次致书杨虎城。

1935 年 12 月 5 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第一次致书杨虎城。书云：“则今日者，乃亡国灭种之日也”。“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冰霜匝地，勉致片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同时毛泽东又给杜斌丞、邓宝珊写了信，并派汪锋到西安同杨虎城谈判。临行前，毛泽东对汪锋还说：十七路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受蒋介石排斥打击的，十七路军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此争取杨虎城共同反蒋抗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并指示汪锋此次谈判一定不要决裂，要谈和。汪锋到西安后，向杨虎城转交了毛泽东、彭德怀的联名信，谈了 3 次。汪还拜访了杜斌丞，杜表示今后当极力促成十七路军和红军合作抗日。

在毛泽东派茫锋同杨虎城谈判之前，时在天津的南汉宸派申伯纯赴南京，向出席国民党“五大”的杨虎城介绍了中共八一宣言，及南汉宸关于十七路军应和红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关系的建议。杨表示可以接受南的建议，并令申返回天津向南索要具体办法。1935 年 12 月，申携南提出之六条具体办法到西安。就在此时，王世英也衔中共中央北方局之命从天津到西安，通过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同杨见面商谈了两次。杨虎城表示：希望红军不要进攻十七路军，同时十七路军也不会打红军。1936 年 2

月，汪锋、王世英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谈判的情况。中共中央决定王世英速返西安继续同杨虎城谈判。王世英即南下，在韩城同杨虎城进行了谈判，杨虎城同意中共关于双方派人秘密取得联系的建议，关系就这样打通了。

王世英离开杨部不久，与杨虎城有世交关系的王炳南，奉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团的指示，回国到西安。驻国际代表团给王的指示是：1、争取杨虎城与红军达成谅解，签订互不侵犯协定。2、万一杨因与中共方面联系遭到蒋介石迫害时，中国共产党一定要保证杨的出路。杨虎城在三原县东里堡别墅接见王炳南，深谈了两天。杨表示接受中共的主张和建议，说：“我与中共某些人士已有接触，但因素不相识，说话难免有些顾虑和保留。现在你回来了，可以无话不谈了。”并安排王住在他的西安公馆止园，随时商谈重要问题。

1936 年 2 月，在中共上海中央局工作的谢华到西安，通过王菊人向杨虎城转达了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5 月，谢华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工作报告，由秘密交通带回陕北。不久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以谢华为书记的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立，通过王菊人、米暂沉、金闽生等继续同十七路军的上层进行联系。

（二）毛泽东第二次致书杨虎城。

1936 年 8 月 13 日，毛泽东再次致书杨虎城。书云：“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9 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工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都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同日，毛泽东也致书杜斌丞：“虎臣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

力干。”为便于开展工作，杨虎城委张文彬为十七路军总部政治处主任秘书，并安排其一行住在宪兵营副营长谢晋生（共产党员）家中，令谢严加保护。9 月 6 日，张文彬同杨虎城会谈。杨虎城对中共所提各项建议均表示接受，顺利达成联合抗日之协定。主要内容是：1、互不侵犯，双方各驻防地，在实际上取消敌对行动。2、取消经济封锁，在十七路军的掩护下苏区设专门贸易站进行贸易流通，苏方不禁止群众供给十七路军食料等必需品。3、建立军事联络，双方军事行动事先通报，杨方并向红军供给南京等各方的情报，有关双方纠纷均经双方磋商解决。9 月 7 日，张文彬又同王菊人、崔孟博（共产党员、省政府科长）商定了一些执行协定的具体办法。从此之后，双方合作的统战关系日益密切。为了确保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杨虎城还密令在西安和陕北前方设立了 6 处地下交通站。

与此同时，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的负责人之一孙作宾去陕北苏区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工作。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得知后，即托孙作宾代他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表示：“三十八军愿同红军互不侵犯，建立联系，互助合作，共同抗日。”孙到达陕北后，向毛泽东、周恩来详细汇报了十七路军的情况和杨虎城、孙蔚如的政治态度。毛泽东称赞杨虎城、孙蔚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政治态度。9 月 3 日，毛泽东给孙蔚如写了一信。信中写道：“知先生抗日情殷，愿赋同仇，甚感甚佩。”“今则西北大局益急，舍联合抗日无以自救救国。尤以贵部移驻肤洛，双方益加接近，团结一致，更所必需。孙君转达各节，弟等极表欢迎。自即日起，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此信由孙作宾带回西安交孙蔚如。

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派汪锋再返十七路军开展统战工作。行前，周恩来同汪谈话时着重强调了以下几点：1、必须按照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办事，要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包括高级将领，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重点要放在上层，做好长官的工作。2、要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一有党员就搞兵变的错误做法，还要改变对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不信任、动辄就鼓动

士兵起来斗争的错误做法。3、对杨虎城的部队，只能搞团结，不能搞分裂，绝不背着杨虎城把他的部队拉出来扩大红军。4、要广泛发展。要以阎揆要团为中心，派党员到友邻部队当兵、当长官，开展工作，把党组织建立起来。周恩来并于 9 月 23 日给阎揆要写了一信，交由汪锋带去面交阎揆要。信中指出：“你的工作，关系极重。应善用现在地位，将特二团造成十七路军中的抗日中心力量。为达到此任务应首先在部队中进行政治思想上的统一战线。但不要悬格过高，要以同情抗日为标准。一切过于脱离十七路军环境的行动，应加以排除。你尤其不要采取过于受人注意的行动。在部队也要严嘱知道你的政治立场的人，坚守部属的关系，以防外泄。”还给阎团派去了 1 名报务员。

（三）毛泽东第三次致书杨虎城。

1936 年 12 月 5 日，毛泽东第三次致书杨虎城。书云：“数月来乞尊处对于敝方多所协助，感动莫名。从此双方日臻密切，统一战线之基础益固，远大之图基于此矣。”并提出 4 个问题同杨虎城商榷。其一，“联合救国之大计，以长安为中心之五六省区已有一种具体合作计划”，望杨虎城为此“大力出面斡旋”。其二，苏区“部队甚大，给养困难，弹药亦待补竟”，拟向杨暂借一部分经费。其三，“尔后敝军行动方向，目前虽尚难确定，然不论东西南北，均与贵军唇齿相关，患难与共”，“兄高明有何见教，密为示及，无任感幸”。其四，“空间通信再不可缓。”“某君另有任务，兹重选 1 人，携带密码呼号随李君来尊处。从 12 月 15 日起，重要机密均经电报交谈”。

1936 年 12 月 12 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12 月 14 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文日举义，元凶就逮，抗日救亡，举国同情，弟等率领全部红军与全苏区人民坚决赞助二将军领导之革命事业。”表示坚决支持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对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进行疯狂地打击迫害。1937 年 5 月，西安绥靖公署及十七路军总部被撤销，杨

虎城被迫辞去公职出国考察，十七路军被缩编为三十八军。杨虎城在出国离陕之前，曾致书中共中央领导人。书云：“虎城日内虽离陕远游，重洋万里，深感依依。但在抗日战线上，愿做永远之朋友。诸先生爱护国家之忠诚，实所钦佩。尚希益加努力，促进抗日实施。虎城异日海外归来，重履故国，抗敌力量，当必有更进于今日者。斯则临别赠言之微意，所盼于诸先生者矣。”

西安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对十七路军继续实行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帮助它前进。

（执笔：王宇明）

**注：**①见《孔从洲回忆录》第 484 页。

②1925 年春，新任陕西军务督办吴新田之第七师官兵与陕西省立一中学生发生冲突，军人冲入学校，开枪打伤学生多人，引起学生以致全省人民公愤。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通过学联等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在全省掀起了反对军阀统治的“驱吴运动”。

③也有当事人回忆，张一平为特务二团的中共团委书记。

④关于两当兵变的时间，记述不一。中共甘肃天水地委党史办公室和两当县委党史办公室进行过调查考证.认为是 1932 年 4 月 1 日至 2 日。本文暂采此说。

⑤文，韵目代日指 12 日。

# 关于两当兵变和王泰吉起义*

习仲勋

## （一）关于两当兵变

1932 年春，我们在两当县城曾举行过一个营的兵变。这次兵变是在营委领导下进行的。那时，我们是陕西警备第三旅唐嗣桐部，我在第二团（团长曹润华）第一营（营长王德修）工作。起初有共产党员李秉荣、李特生和我，李秉荣原是副团长，我们在长武县药王洞开会决定都下各连队开展工作，而且互不联系。后来建立了营委，建立了 4 个连的支部，每个支部都有二三十个党员，我当时担任党的营委书记。我们这个营原驻在陕西凤县双石铺、杨家店子一带。1932 年春，奉命移防甘肃徽县（团部在徽县）。原计划到徽县后起义，行至两当，因为士兵革命情绪十分高涨，遂于当晚 12 时举行兵变。

打死 3 个反动连长，营长王德修越墙逃跑。除机枪连一部分士兵和武器未及带走外，其余都掌握在我们手中。兵变后我任队委书记兼第二大队副，陕西省委派刘林圃同志任政治委员，推举原第三连一排长许天洁为指挥，连夜行军三岔，第二天早上过渭河至通洞峪，与驻在赤沙、香泉、城隍庙等地的 3 个强力民团激战，将敌人击退，突围前进。辗转 10 余日，后从朝阳岗、八渡镇出山，经千、陇前进。将高崖民团缴枪后至崔木，又与孙蔚如部在蔡家河打了一仗，撤至乾州。原准备在旬邑与陕甘红军刘志舟部会合，因与乾州土匪王结子打了一仗，部队溃散（士兵大部分为乾、礼人），计划没有实现。这就是 1932 年两当兵变的大概情形。那时，兵运工作是艰苦的，兵变后游击运动也是艰苦的，既无经验，又是星星之火，很容易失败。

## （二）关于王泰吉起义

1934 年 3 月 3 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同志在西安英勇就义，至今已经 50 年了。

据我所知，王泰吉同志在学生时期就追求进步，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4 年，他受马列主义宣传家、西北党组织的创建者魏野畴同志的熏陶，立志革命，进入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毕业后，他在陕军甄寿山部任教导团一营营长。1928 年春，他率部发动了麟游起义，打算在陕甘边界建立游击根据地，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因遭敌阻击而失败。同年 5 月，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他与唐澍、刘志丹、许权中等同志一起，参加和领导了渭华起义，被任命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参谋长。渭华起义失败后，他只身到河南省南召县，给富户打长工，秘密从事革命活动，被敌人逮捕，押解到南京监狱，和党失去了联系。经杨虎城将军具保营救出狱，暂时栖身于杨的部下，后任骑兵团长。在这段时间里，他孤身求索，一度离开了革命洪流。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我国东北，又向华北进犯，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全国掀起了抗日的高潮。1933 年 1 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红色区域、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武装人民等条件下，和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同年 5 月，冯玉祥、方振武和共产党员吉鸿昌等合作，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早年与王泰吉熟悉的许权中、谢子长等同志，先后奔赴察绥前线，参加了抗日同盟军，守土保国，对王泰吉影响很大。他想奔上抗日前线，为国家、民族效力。但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许抗战。1933 年初夏，王泰吉的骑兵团由三原县移防到耀县。党曾多次指示杨虎城部队的地下党员秘密进行组织起义的工作。王泰吉也主动派人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等同志联系，表示要发动骑兵团起义，参加抗日斗争。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1933 年 7 月 21 日，

王泰吉率领骑兵团近 2000 人，在耀县宣布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随即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起义部队迅速解除了全城的反动武装；打开监狱，释放了关押的全部犯人；组织宣传队，张贴抗日标语，召开群众大会；打开伪县政府和城里几家大地主的粮仓，发动贫苦农民进行分粮斗争并开展游击运动；又处决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民团头子和恶霸地主，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

耀县起义，意义很大，影响深广。当时，我陕甘边主力部队红二十六军在政委杜衡的“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南下渭华在蓝田失败，几乎全军覆没。敌人调动大批武装，妄图一举荡平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继之，杜衡又在西安被捕叛变，使陕西党组织遭到严重损失和破坏。在这种革命暂时受挫的形势下，王泰吉毅然决然率骑兵团起义，犹如石破天惊，在奄奄一息的革命火堆上加了一把干柴。它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的嚣张气焰，激励了处于困难境地的西北革命活动，鼓舞了西北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对于后来加强壮大西北红军、巩固发展陕甘边苏区都起了重大作用。

王泰吉率起义部队在耀县停留几天后，即向三原进攻，想把那里驻防的杨竹荪团也拉过来参加起义，但行至辘轳把村时，突遭敌孙友仁团袭击，战斗失利，起义部队大部分溃散了。面对挫折，王泰吉毫不动摇，收集了余部 300 余人，向照金革命根据地撤退。

当时，照金是中共陕甘边特委所在地。红二十六军南下后，我和张秀山、李妙斋等同志一起，领着红军游击队在这一地区活动。得知王泰吉率领起义部队在辘轳把作战失利的消息后，我们带领游击队前去迎接。途中，碰到一些溃散的士兵，才知道王泰吉率领一部分义勇军已从西边奔向照金。于是，我们又率领部队急向回赶。傍晚时候，我们在秀房沟见到了王泰吉和他带的部队，双方都很激动。我拉着泰吉的手说：“泰吉同志，欢迎你！党和同志们都欢迎你和抗日义勇军！”王泰吉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是啊，不容易！今天，我们总算回到党和革命的怀抱里了！”我说：“在目前这

样艰苦的形势下，你率部起义，难能可贵，意义很大。”王泰吉却以自责的心情指着正在休息的义勇军战士说：“你们看看，我才带来这么一点人!”我笑着宽慰他说：“兵不在多而在精。比起起义时，人数虽然少了，质量却高了。想跑的跑了，嗒决革命的都跟来了。有了这个力量，咱们以后就好大发展了。”当时，照金根据地的总部设在薛家寨，秀房沟就在薛家寨的山脚下。我们让义勇军和游击队在下边安营休息、整顿，我和张秀山、李妙斋、王泰吉以及义勇军的党代表刘映胜同志一起上了寨子。

王泰吉对于辘轳把的失败很痛心。他说他原想带出来两三千人，可是，手下有些人，过去都是好朋友，到紧要关头就叛变了。我对泰吉说，你们过去的关系都建立在私人感情上，没有革命的政治思想基础。你起义为的是抗日救国，干革命，那些人跟着你起义是想发财。他们搞到了一笔钱，银元、元宝、大烟土，腰里装得满满的，哪有心思跟你为革命去拼命？！王泰吉听后，长长地“唉”了一声，说：“我现在才明白了！”随后，我们一起仔细探讨起义失败的原因，研究以后的战斗方案。

*本文第（一）部分系《丹心素裹》所载习仲勋《关于两当兵变》一文；第（二）部分摘自《革命英烈》I984 年第 3 期所载习仲勋《深切怀念王泰吉》一文。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杨虎城部工作的几件事

汪　锋

## （一）安康起义

我未到汉中之前，安康就有一个党的军特支，归中共陕南特委领导。

现在具体时间说不准了，记得安康军特支给中共陕南特委写来一个报告，说他们准备在安康绥靖军中搞兵变。并说搞兵变的条件已经成熟了。特委研究了安康军特支的报告，分析了陕南特别是安康的形势，认为在安康搞兵变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充分，时机还不成熟，决定由我去安康，通知军特支暂时不要行动，待条件成熟后再说。那时陕南的交通很不方便，待我赶到石泉县时，听到韩子芳团（石泉驻军）的同志说，王泰诚已起义了，向四川方向去了，情况不明。当我赶到安康时，王泰诚、袁作舟、王建英等同志已带领几个连的部分人从张飞生的安康绥靖军中起义。

这次起义时间不长就失败了，起义的领导人王泰诚同志光荣牺牲，王建英同志被俘后英勇就义，袁作舟同志下落不明。

安康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中共陕西省委 1933 年 7 月遭到大破坏，陕西地区的革命斗争遇到严重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党发动的一次武装起义，是很有影响的。

## （二）上海中央局派我与红二十五军联络

1933 年秋，中共陕西省委杜衡叛变，陕西党遭到破坏。我在西安见到贾拓夫，他叫我快去找刘映胜、魏新发、李从霄 3 人。这时，我先找到李从霄，李说他很快就要离开西安，叫我去找刘映胜。我见到刘映胜，他叫我留省委工作。我不同意留下，因为许多每徒都认识我，我也劝刘不要留下。他同意我先走。我要去汉中，找张汉民的警卫团，阎揆要在该团任三营营长。刘映胜等决定我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到汉中巡视党的工作，既管军

队党，也管地方党。与我同往汉中的有张汉民团的党员李明轩等十几个军官。到汉中后，先在勉县诸葛庙找到张汉民（警卫团团长），然后到三十八军找到梁布鲁、成子慎。这样，警卫团和三十八军的党都找着了。这时，也找到地方党的刘秀贞，知道杨珊在春天就去红四方面军联络，还没有回汉中。不久，傅剑寒告诉我，张德生要来*张从兰州经天水到汉中后，经傅剑寒介绍，我以陕西省委特派员身份给张恢复了组织关系。经过一段时间，我和张分工，我着重抓军队党。以后，我兼任陕南特委书记。1933 年底，中共上海中央局派刘顺元来汉中，担任陕南特委书记，我负责军队党的工作，张德生负责地方党的工作。1934 年六七月间，刘顺元派张德生去上海中央局联系，中央局又派张去红四方面军，张回汉中后，向特委作了传达，并说中央局决定我去上海，一是治伤，二是治愈后可能留在上海工作。我去上海前，把军队党的工作交给张明远，警卫团党的工作交给程天鹏，程归张明远领导。

1935 年春节（2 月 4 日）后，中央局和张汉民失去了联系。中央局决定派我去陕西，李宇超向我交代的任务：一是恢复张汉民部党组织和中央局的联系，二是恢复红二十五军（就是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部）和中央局的联系。因为红二十五军和中央局也失去了联系，同时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意见转告红二十五军，即：在肃清反革命时，对地主富农不要消灭肉体，对富农不要扫地出门，在生活上要给出路。此外，还想找一下红二十六军，因为中央局和他们也失去了联系，我没有和陕西党联系的任务，因为陕西省委已被破坏数次了。我从上海到西安县 1935 年 3 月，在西安见到了秋宏，他告诉我，从陕南派回来一个同志在西安工作，原来是在张汉民部工作的，问我见不见，这个人就是姜旭初。他原来是警卫团的一个党员，是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回来的 20 多个党员之一，是我接收的。我在西安营房和姜旭初见的面，他向我谈了西安的情况，我简要地谈了回来的任务，言明他们的党的关系在我这里。接着，秋宏告诉我，张汉民的营长孙立功不是党员。我要秋宏照顾我，秋宏说，你常去部队，孙认识你，

你说去找阎揆要团长的（警卫团扩编为警三旅，张汉民为旅长，阎揆要为团长），他会同意你一起去的。于是，我就和他们一起去商县、柞水一带找张汉民。行前，我通过秋宏给张汉民发了一个电报，说我已从上海回来，即去见他。走了两三天，到了蔡玉窑。晚间，街上很乱，把我吵醒了，我找秋宏，没有找到，有个地下党的同志告诉我，前方失败，雷展如回来了。雷见到我说，张汉民可能被俘了，阎揆要的情况他不清楚，他回来时，部队大部分垮了。我说，不要紧，我回来的任务是找张汉民，也找红二十五军，明天就去。说罢，他们吃饭，我找到秋宏，对他说：上海中央局决定你们这个部队不起义，等以后能起更大作用时中央局再决定。这就是要告诉张汉民部队的党，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中央局的指示不能起义，要留待将来红军进攻大城市时再行动。那时，搞里应外合，能起更大的作用。说罢，我感到形势紧迫，当夜就起程去找红二十五军了。

从蔡玉窑到九间房，中间有个雪花街。我到雪花街碰到了阎揆要，他对我说，坏了，汉民被俘了，我说不要紧，我去后就解决了。我急于去九间房，接要问我回来还有什么任务，我说都给秋宏说了，我去营救汉民，不说了。下午到了九间房，碰到红军一个营长，他盘问我，我叫他不要盘问，快派人把我送到军部。营长说，军部长还有几十里哩。我说有急事，要找军队领导谈。他派人把我送到军部驻地葛牌镇。到军部后，下面的同志又盘问我，我说要见军部负责同志谈中央局的指示，于是红二十五军的副军长律海东、参谋长戴季英先后来到。我说上海中央局派我给你们联系，叫你们派人去上海中央局联络；同时转告你们，据说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在肃清反革命时，要注意对地主富农不要在肉体上消灭，对富农不要扫地出门，要给生活出路。我来另一件事黾营救张汉民同志。我讲了这两条以后，徐海东和戴季英先后出去了。过了一会，戴季英带了 4 个战士进来，把我绑了起来，说我是反革命。接着搜查我随身带的东西，把表、笔、金戒指都拿走了。绑我的原因可能是：他们认为中央局对地主富农不会有这个指示；我营救张汉民，张是反革命，显我也是反革命。我被捕后，被

送到红二十五军政训科，科长叫朱仰兴，安徽六安人。朱下面有个特务连，我被押在这个连，同时在押的还有张汉民、魏书林、张明远和其他被俘人员。在押的初期，我的心情还是轻松的，因为我不知道会杀人。我到葛牌镇的第二天晚上，魏书林被杀了。听说要杀人，才有点怕了。在葛牌镇住了两天，部队向商县西区出发，我和警三旅被俘人员每人戴了一顶蓝布做的筒帽，戴上后蒙住了脸，只露出两只眼睛，我一看，张汉民在我前面，张明远也在我前面。部队游击了近一个月。有一天走到丹凤县（那时叫龙驹寨），晚上还有张汉民，第二天就不见了。我问押我们的战士，开始一个战士告诉我，放他走了，后来一个和我特别好的战士告诉我，活埋了。我之所以没有被杀，是因为我被押期间，有三件事取得了红二十五军领导的信任：1、我有机会跑而未跑。有一天过了丹江，部队打起仗来，晚上部队都走了，而押我的战士睡着了，我喊醒他，他问我，你怎么不跑？我说，红军是我的家，我回到咱们部队里啦，为什么要跑呢？他说，你是犯人呐！我说，我这犯人将来会弄清楚的，我不是反革命，是革命的。这个战士回去报告了。2、陕西党派来的人要求见我。一次，陕西党派秋宏把中央红军的一批文件送到红二十五军。秋宏化装成农民，在杨家斜找到红二十五军。秋向他们打听我，并要求见我，他们同意秋宏见我，秋和我见面谈了话。这时，红二十五军还搞不清楚我究竟是不是反革命。3、河南信阳道委的联络人员证明我是上海中央局派来的，这是关键。有一天，几个陌生人和政治部一起走，我问一个战士，这是什么人？战士说，是信阳道委来的。信阳道委是红二十五军离开河南时留下的一个党的领导组织。信阳道委和上海中央局有联系，他们去上海时，红二十五军可能给他们一个任务，就是了解上海中央局是否派过我去红二十五军进行联络。结果，中央局证明我是中央局派出来的。不久，他们对我就放宽了，我头上的筒帽取掉了，身上也不背几十斤大米了，这说明信阳道委的联络人员是起了作用的。张汉民被杀后，我找戴季英或者是朱仰兴谈了一次，我说，杀张汉民是不对的。我还说，张明远是警三旅党的负责人，我走时把党的关系交给他了。我有

问题，他也有问题。我既然没有问题，他也不应该有问题。过了一段时间，红二十五军到了杨家斜，决定去陕北。有一天，吴焕先政委把我找去，问我去陕北如何走，我说了自己的意见。在杨家斜，他们通知我多打几双草鞋。这时，我可以和张明远说话了。我和张明远各打了一双草鞋，次日晨，一个战士把张明远打的草鞋给了我。我说，这不是那卜“犯人”打的吗？他说，那个人放了，他走了，给你穿吧。我知道坏了，张明远在杨家斜被杀了。

1935 年农历八月十五日（9 月 12 日），红二十五军进到陕北苏区，到下湾寺和刘志丹部队会合了。以后，把我送到瓦窑堡，聂洪钧又把我审讯了一下，说我是 AB 团，要我好好检查，把我第二次送进了监狱。不久，开始肃反，习仲勋、高岗都被关进来了，陕北的干部和我被押在一起。不到一个月，中央红军到了陕北，中央保卫局局长王首道把我放了。

在党的七大期间，关于张汉民，我曾经向党中央写过报告，中央追认他为烈士。

### （三）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

1935 年 10 月初，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的中央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到达了陕甘苏区根据地。当时蒋介石为了进攻红军和陕甘苏区，在西安成立了所谓“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动东北军、十七路军和一部分蒋家嫡系部队对陕甘地区发动了第三次大“围剿”，以东北军为主力，由南向北疯狂进攻。中央红军一到陕甘苏区，就同红十五军团一起，参加了反“围剿”的斗争。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了这次反“围剿”斗争。有名的直罗镇战役，便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下，取得胜利的。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伟大胜利，给面心亡国惨祸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给全国人民争取抗日与民主的群众运动以巨大鼓舞和有力推动，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像烈火一样熊熊燃烧起来。我党的巨大影响，不仅在人民群众中深入人心，也影响了统治阶级的中上层；不但在统治阶级政界发生

影响，对那些具有爱国思想的国民党军人也有很大的震动。特别是在西北地区，对于被蒋介石驱赶到陕甘前线进攻红军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对于两军的统帅张学良将军与杨虎城将军，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时候，我党中央分析了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处境和现状，认为争取两军共同抗日是完全可能的。从此，党对张、杨以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官兵开始了耐心细致地争取工作。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前，我曾长期负责十七路军地下党的工作。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由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把刘志丹等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抓了起来，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我们还被关押在瓦窑堡。直罗镇战役刚刚结束，党中央就派王首道同志把我释放出来。

11 月间的一天，贾拓夫同志通知我，要我赶到前总驻地富县西边的套通塬东村谈工作。我由瓦窑堡星夜赶到前总，其时，直罗镇战役刚结束，全歼了东北军牛元峰的一〇九师，大量物资和俘虏需要处理，前方异常忙碌。前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同志招呼我住下，告知我来这里是毛主席调的，工作将由毛主席当面指示。

在我到达前总的第二天晚上，毛主席约我谈话，我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去见毛主席。毛主席住在一个群众住的土窑里。毛主席见到我，先问了陕北许多同志的情况，然后谈到了将要分配我去做的工作。毛主席要我前往西安，代表红军同十七路军谈判，争取他们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

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我所了解的杨虎城将军和十七路军的情况。我说十七路军参加过北伐战争，受过大革命的洗礼。从大革命以来，有不少知名的共产党员如魏野畴同志等在这个部队中做过工作，还有不少党员至今在十七路军中做秘密工作，在杨虎城将军周围还有一些同情我党的进步朋友（如杜斌丞先生等），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长期在陕西省委的军事委员会工作，对这个部队的历史和人物情况比较熟悉，我愿意尽力做好这项工作。

在那几次谈话中，毛主席反复分析了全国的政治形势，阐述了我党的政策。毛主席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妄想独霸中国，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当前，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了。在此民族危亡关头，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敌人阵营也会发生变化甚至分裂。在这种形势下，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我们不能实行那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政策，我们的国内政策要作适当的调整：要改变消灭富农的政策；要团结一切爱国的开明绅士；要争取中产阶级和地方势力；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对军阀，我们要向前看，对他们过去反人民的坏事，不要耿耿于怀，更不要只看他们生活怎么腐化，只要$在有一点民族气节就好，要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他们。我们要体谅他们的难处，打共产党是蒋介石胁迫让打的，不打，他们就完了。为了争取他们，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暂时让出一些地方。

接着，毛主席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情况作了精辟的分析。毛主席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都是地方势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受蒋介石排斥打击的。蒋介石让他们打红军，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由于蒋介石排斥和削弱杂牌军，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东北军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很强烈。十七路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他们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对抗“中央”，同“中央军”胡宗南部的矛盾必然日益突出。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都有反蒋抗日思想。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十七路军，在抗日的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在他们不觉悟的时候，还是要打他们一下，直罗镇战役就是这样。但打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促使他们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毛主席说，目前政治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搞好关系，然后才有全国的大联合。

最后，毛主席谈到派我去西安的任务。毛主席说：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大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谈判一定不要决裂，要谈和。我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指示。这次出去，当力争谈判成功。如果谈不好，有危险，

也不惧怕。主席说，你说得很对，现在的时机是好的，我们连续打胜仗，他们一定很动摇，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困难和危险是有的，我们把各方面都想到，有了精神准备，事情就好办了。主席还具体指示：对杨虎城部队要有个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

听了毛主席对形势的分析和对我党政策的深刻阐述，我感到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思想大解放。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实行狭隘的关门主义策略，四处树敌，“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自己搞得很孤立，路子越走越窄，工作被动，损失很大。现在，毛主席来了，端正了党的政策和策略，革命道路开阔了，工作好开展了。我将信心百倍地去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艰巨任务。

毛主席同我谈话结束后，我在前总住了几天，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又给我不少指示和办法。等毛主席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 3 人的亲笔信交给我以后，我就从前总出发，经过张村驿赶到关中特委所在地九头塬蓝衣村。

关中特委许多同志是我很久不见了的老战友，为了保密，没有一一见面，我积极地进行准备，找化装衣物、证件，研究选择外出路线。关中特委特从边境调了一些地方干部提供情况，参加研究。有的同志主张经赤水（苏区新建县，在今旬邑县西部）出苏区，有的主张经正宁县由庆阳出苏区。这些主张都有缺点。后来，我同彬县北后区工作的地方干部赵洪同志谈话之后，决定从彬县与长武县之间出苏区。这个地区没有正规部队驻守，虽有民团，但晚上不敢出来骚扰。只是我路不熟，需要找个带路的问题。路线决定以后，便起身，当晚到达赵洪家中。由赵洪找到了一个在乡苏维埃政府工作的人为我带路。我们研究了边界情况，便和带路的同志向长武出发。天明前已出了苏区，到达泾河东岸。

离开关中苏区后，一气走了大约 150 华里，虽然有些疲倦，却是一帆风顺的。在距长武县 25 华里的地方，碰到了两个便衣特务，对我进行了仔

细地盘问和搜查，缝在我的皮衣里边的毛主席写给杨虎城等先生的信，也被搜了出来。幸好这两人是“土特务”，当看到信是写给绥靖公署主任的，便有些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发落。我就装出一副国民党大官的神气，大声问他们是谁派出来的，并吓唬他们说：你们这样乱搞，杨主任知道了，对你们和你们的上司都是不利的。这两个家伙更慌了，说他们是长武县政府派出来的。我知道长武县县长是党伯弧，乃十七路军中的老人，是忠于杨虎城的。这样，我比较放心了，对两个便衣说：我是十七路军的高级特情人员，是杨先生派到苏区边界做工作的，现在回西安去报告工作，同你们的党县长也是老朋友了。他们相信了，请我们到附近村子休息、吃饭，并把被他们搜出的信件还给我。

当时我考虑，把这些信秘密地从长武带到西安，是很不容易的。同时，这两个便衣也难免不走漏消息，但估计党伯弧还不至于破坏我们的事，因为这件事暴露出去，对十七路军是很不利的。于是，我决定设法和党伯弧见面，争取他的同情，以免泄漏秘密，顺利到达西安。长武县的城门是由“中央军”守卫的，这一关如何通过，就是一个问题。为了避开进城的检查，我给党伯弧写了封信，诈说奉杨先生之命，有要事商量，要他到城外相会。此信由一个便衣先送去。大约下午 6 时，我们到达长武县北门外，党伯弧果然在路边等我。党命令便衣离开以后，我对党从实说明了来意，简略地讲了红军主力到达西北后的形势，蒋介石不信任并削弱十七路军的事实和杨先生同我们已有多次来往，此事关系国家大局，也关系到十七路军的前途，要他加以协助。我谈完以后，党伯弧表现犹豫。我说，党先生如果能照顾国家利益和十七路军的利益，请即设法送我去见杨先生，否则就可以把我另作处理，请选择。党伯弧听我这样一说，当即表示他并非势利小人，只是如何才能平安地送我到达西安，甚是为难。党所顾虑的是两个便衣知道了，不好保密，长武到西安 300 多里，万一出了岔，不好办。我告诉党可以按我告诉便衣的说法，对付便衣。至于护送方法，可以选择可靠人员用押解的办法，可以保证安全，万一出了事，也可以避免连累他。

他同意了，便同我一块进城。第二天清早，党伯弧选派他的亲信——保安队队长带了 4 个兵，用大卡车“押送”我往西安，汽车一直开到西安新城绥靖公署。杨虎城先生见到了毛主席的信以后，让十七路军军法处长张依中接待我。此人曾参加过革命，渭华暴动时，我们曾经认识。后来，他消极了，但还认识我，表现特别亲热。他们把我安置在西华门军法处看守所住。张依中向所长吴怀仁介绍，我系十七路军的特情人员，是被红军俘虏后逃回来的，需要审查以后才能复职。看守所长是一个年近 60 的老狱吏，习惯于奉迎，他看到我同他的长官平出平入，便尽量向我献殷勤，安置我住在一个较好的房间里，每天单独开饭，极表关怀。我名义上虽然是“犯人”，实际上却是比较自由的，可以到张依中、吴怀仁的办公室里去闲谈，了解情况。谈话中，张依中一再表明他所以脱离革命，只是同某些人有不同意见，没有做过坏事，如有需要他的地方，他一定尽量帮忙。一次，谈起渭华暴动，张说他对刘景桂（刘志丹）印象极深，详细问了刘的情况。

大约一周后的一天晚上，张依中说，杨先生约我谈话。并开来一辆小车，送我到新城。杨虎城先生在新城大楼门口等候，接我入西客厅谈话。没有别人参加。首先由我代表毛主席向杨先生问好，说明了来意，谈了形势和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没有等我说完，杨先生就提出了 3 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十七路军许多人认为红军不讲信用。他说：我部孙蔚如驻防汉中一度和红四方面军有过来往。何是红四方面军无故地攻击汉中地区，我部许多人至今还有不满情绪。

第二个问题：十七路军警三旅旅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中央（指国民党）一再指责我，陈立夫对我也亲自谈过。我认为张有魄力、能干，没有理他们的指责。但是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在九间房设伏袭击，并把张汉民杀害了，这是我们很不满的。

第三个问题：你们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主张联合一切抗日部队，这个主张很好，但是如何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呢？

我对这些问题作了详细的回答。我说，贵部孙蔚如先生同我红四方面

军有来往，我们是知道的。贵部派的张含辉，到过通、南、巴苏区，我红四方面军，保证了安全，取得了谅解，因而贵我两军在两年中，没有大的摩擦，孙部得以安驻汉中，兵员有了很大的发展，说明红四方面军是信守了协议的。后来中央军第一师胡宗南部，依靠天水地区，积极向南扩展，势力伸张到四川西部，不仅我军侧面受到威胁，同时孙部也受到威胁，而孙部对胡宗南部不加抗拒，任其发展。特别是当中央红军到达川西时，胡部已伸入到嘉陵江西岸一带，阻碍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为了顺利地同中央红军在川西会师，必须安全地渡过嘉陵江，要安全渡江，必须设法调离沿江驻守的胡宗南军队。所以才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明攻汉中，威胁天水（胡军后方），调动胡军返回天水。胡部果然以为我军攻打汉中、天水，撤回了川西部队，集中天水，防我进攻，给了我红四方面军回师西进的良好机会，安全地暗渡嘉陵江，完成了和中央红军会师的任务。这种军事行动，说清楚了，先生是会谅解的。杨先生知道，汉中是个盆地，红四方面军如果决心消灭孙部，就可以依靠川北苏区，三路出击，东路依万源、城固进攻镇巴、西乡；中路依通、南、巴翻越巴山进攻南郑；西路依广元进攻宁强、勉县。东、南、西合围南郑，汉中地区腹背受攻，不是更容易得手吗？何必单从西线一路进攻呢？这点也正充分说明了我军攻击汉中地区，只是调动胡军之手段，并不是以歼灭孙部为目的的。

红二十五军，从鄂皖苏区突围后，长期行动，得不到补充和休整，有困难。该部到达陕豫边地区后，是准备休整的，可是贵部柳彦彪旅，天天尾追，逼得红二十五军不得不自卫。山阳一战，该旅溃败，而贵部警三旅张汉民部又接踵而至，并且张部尾随比柳旅更为接近。红二十五军误认该部要再寻机攻击，遂于之九间房接火战斗，在战斗中，张旅长被俘，由于红二十五军自从突围后，和上级失掉联络，不了解张汉民同志的情况，所以误杀了他。这首先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沉痛损失，对于十七路军说来，当然也是一个沉痛的损失，但可以用来作为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有力材料，

以张汉民同志被杀来反击国民党的指责，说明十七路军并没有什么共产党，打掉蒋介石削弱十. 七路军的借口。

至于红军的态度，我党在《八一宣言》中，有明确说明，毛主席给杨先生也写了信，想必杨先生是清楚的。今后贵我双方如果不相互攻击，就会互不伤亡，这对十七路军之发展壮大和对抗日救国事业都是极为有利的。我们认为十七路军和东北军都是要求抗日的，这些军队的扩大，就是抗日救国力量之发展，也就是反动卖国势力的削弱。所以我们只有帮助成长，防止损失，这就是我们对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明确态度。

杨虎城先生在谈话中多次暗示十七路军上下官兵都是齐心的，能够听他的话，但对谈判的具体内容没有表示明确态度。从语气和神态看来，他对联合抗日、互不进攻是赞成的，对这次谈话也是满意的。杨先生最后对我说，他今后不能多和我谈，指定王菊人先生（时任杨的机要秘书）和张依中先生继续同我接谈。并说如果事情完了，有一位老朋友要我带往苏区。

同杨谈话以后的第三天，王菊人先生约我到他中柳巷家里谈话。王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革命组织，我们是相互知道的，但这次见面，王却表示很疏远。他一开口就说红军经过长期行动，到达陕北可能很疲倦了吧？分明是暗示红军联合他们是出于不得已。我说：红军主力已顺利到达目的地陕甘边区了，初进苏区便打了几个胜仗，吴旗一战歼灭了马步芳的野骡子旅大部分；直罗镇战役，东北军牛元峰一〇九师全部歼灭，王先生大概听到了吧！因我这样回答，王就转换话题说：贵部到西北后，对马家军如何对待？马家军以强悍著称，搞不好，很麻烦。我说：马家部队也不是蒋的嫡系，如果他不积极骚扰，我军亦愿意互不攻击。同时，马家部队也和红军较量了一下，并未占到便宜，看起来也不像传说的那样勇猛。接着王菊人先生表示同意同红军建立关系，但极力宣称十七路军是有革命传统的。这次和红军建立关系，是为了革命，望双方都能抱定互相谅解、互相尊重的原则。我说：我们都是西北人，十七路军的情况，我还知道若干。为了国家的利益，两军的利益，为了西北人民的利益，我们都应当为两军的联

合尽一份力量，促成两军的合作。

从王菊人家里出来，回到军法处，张依中早在他的办公室等我。他一见面，就对我说，王菊人不够朋友，爱弄小聪明，要我多加注意。张说这话的用意何在，我一时弄不清楚，只好随口应答几句。从张后来的谈话中我才了解到他是在极力表示要重新参加革命工作。由于张依中的帮助，我能够自由外出访朋探友了。于是我就设法会见杜斌丞先生，从朋友那里知道杜斌丞先生住在大湘子庙街。在一个晚上，张依中先生约我到他家中谈话，张住在正家巷。由张依中家出来，我就去杜先生家，杜先生亲自出门迎接。我告诉杜先生，毛主席有信给他，都在杨先生那里，不知收到否？杜说没有接到。他估计可能是被杨先生扣了。杜先生表现很热情，问了陕北许多熟人的情况，继而分析了杨先生的态度。他说杨敢干、直爽，对蒋介石统治不满，也有一些进步思想。但有些简单，易于动摇，抱有统治陕、甘的“雄心”。杨先生对红军有些害怕，宜多作解释，以打消他的顾虑。随后杜先生也提到张汉民的问题，并说朋友们都很关心这件事的真相。我便老老实实地告诉了张遇害的经过，说明这个误会是大家的不幸。对于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问题，杜先生说，他是不准备离开十七路军的，今后当极力促

成两军合作抗日。我辞出时，请求杜先生代我约邓宝珊军长，他慨然答应了。从同杜先生谈完话回到住处，天已很晚了，张依中派人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张对我说，你近来活动得太多了，已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杨先生也知道了，不知什么人出的主意，杨先生已令我处庞志杰队长监视你的行动，怕你出岔子。如果在外边被中央发觉，立即设法把你抢回来，假如不可能，要先开枪伤害你，千万不能让国民党把你活捉了去。我很担心，所以才秘密告诉你。杨先生这样布置，是为了十七路军的利益。张这样告诉我，是真是假，不太清楚，但是说明了我的行动是被十七路军方面大为注意了，必须小心些。过了几天，王菊人又约我到他家里谈话，这次王的态度比较客气。他说你可以返回苏区了，杨先生认为红军和十七路军都是

抗日部队，双方力量都不应削弱，要互相谅解，双方都应当避免冲突，行动尽量告诉对方；如果遭遇，双方都不要采取包围追击。你需要什么东西，可以买点，前次杨先生告诉的〇〇先生和你一块去，请多加照应。

在西安住了约一个月，到此告一段落。临行前到杜斌丞先生家里辞别，传达说杜先生去了三原，他代我约会的邓宝珊先生也没有可能见到了。

过了一天，张依中通知我行期和路线，他说，明天就走，同行人在北门外会齐，坐马车经三原去淳化，淳化驻军是特务二团，团长阎揆要。我听后内心确实高兴，因为我和揆要同志可以见面了，我们分别已有一年多了。

张还说，杨有电话给阎团长，说你们是中央派去陕北谈判的大员，要阎亲自接待，要我不可露出马脚。送我们的又是庞志杰。真凑巧，送的和接的都是共产党和与共产党有关系的人，哪有不放心的呢。

早 7 时在北关集合了。杨先生要我带往苏区的那位先生在三原，我俩住在一间屋子内，才知道这位“代表”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名字叫王世英。

次日下午 4 点左右到达淳化县，阎揆要团长在城_门外等候。庞和阎是老同事，先由庞介绍了王世英同忐是杨部高参；介绍我是“中央大员”赵仲远先生。阎团长摸不清头脑，只是点头。回到团部后，阎说，原来“中央大员”就是你。在阎揆要同志的团部住了一夜，由雷展如同志送我们到苏区。雷当时任连长，也是共产党员。

我们进入苏区走不到 2 里路，就被一支武装包围了。他们是当地的游击队，看我们穿着长袍，戴着礼帽，不由分说，硬要捆我们到队部去，我们怎样解释也不听，队员们叫我们“反对派”（陕北苏区群众把国民党叫反对派）。到了队部，见到队长，他笑着说：“我的政委，几乎把你当反对派了。”队长姓杜，是红二十六军的班长，他是认得我的。休息吃饭后，由杜队长派人送我们去关中特委所在地蓝衣村。

附记：这份材料是 1942 年在马栏镇写成的，1958 年 6 月又在文字上略作了修改。

# 杨虎城部在太和与二次入陕*

南 汉 宸

## （一）

1927 年 3 月间，我们从苏联参观回到西安。后来蒋介石拉拢冯玉祥开始反共“清党”，把已公开的党员押送出武胜关。我只好随鹿钟麟到开封。鹿任河南省代理主席时，我当他的秘书，除处理日常事务外，还要在敌人的耳目下千方百计地安排、掩护和营救党内的同志，并侦察收集，向省委汇报冯玉祥等情况。那时鹿钟麟是冯部下，冯知道我和杨虎城关系不错，所以这次派我到皖北做杨的工作。

我回去后，除向冯讲明杨军在太和休整外，并把杨的想法报告给河南省委。1927 年冬，省委派我到皖北组织特委①，指定我任书记，十军政治部主任魏野畴负责组织，秘书长蒋听松负责宣传，归河南省委领导。我接到命令后，即装病请假，次日秘密启程，并把武勉之、刘子华、高敬轩及东路军总司令部参谋昌绍先、谢祥荫都带到皖北太和。

我们到太和，杨虎城很欢迎。因为他要和冯脱离关系，又不想归蒋，正在苦闷之际，我们来了，他当然高兴。他叫我们从全军中抽选四五百名无嗜好、思想进步的、有希望的连、排干部和地方上招收的一批青年，集中起来训练，办起军事学校。我任校长，武勉之、刘子华当教官。这 500 人相当一个营的兵力，共编 4 个大队，第一大队长昌绍先（“四九”起义后，任皖北工农红军指挥），第二大队长谢祥荫，第三大队长先是王汉秋，后是吴岱峰，第四大队长是高敬轩。是年年关，我们找一个当铺，把墙拆了做教室，开始上课。课程设置分两个方面，一是军事训练；二是政治教育。我们打破过去军人不问政治的状况。讲八七会议精神，讲革命知识、

社会知识讲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等。没有课本，自编教材，计划每期训练6个月。杨部内旧派虽反对，但杨很支持我们。

当时杨虎城愿意革命，主要是受我们党的启发和谢葆真同志的影响。谢葆真十五六岁时被刘伯坚收留在部队，在前线工作团时入了党，后到杨虎城军政治部做宣传工作，她工作泼辣，革命热情高，特别是口才利，讲演有声有色，深得杨虎城赞赏，爱上了她。1928年1月，经党组织批准，在太和他们俩结了婚。我们喝了喜酒。在宴席上有个同志问：杨将军为什么爱上小谢？他坦率回答：我知道她思想进步，为了革命我需要她；结了婚，她可以直接帮助我。谢葆真说：俺不要你海誓山盟，只要你革命就行了。杨虎城高兴地举杯说：好！为革命到底，白头到老，大家共同干杯！以后我们每次去他家找谢葆真商议党的工作，杨总是借故避开。杨虎城本人也曾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把这件事汇报到河南省委，因种种原因没有批准。

我在太和时，高桂滋的十九军驻在皖北阜阳。军队中有我们的一部分同志和党组织。军政治部主任曾晓渊，党内是特支书记，干事张学静、蒋听松。当时党组织代号“石久亭”。一团政治部主任刘贯一，二团政治部主任李力果，他们都是党员，积极开展党的活动。

我们在太和刚搞二三个月的训练班，蒋介石就派韩振声来皖北，以“慰劳”为名，拉拢杨虎城。我得知韩要来太和，就把教室墙上的标语收起来。韩来太和不久，就叫杨虎城“清党”，并说我很“危险”，要杨把我和魏野畴、蒋听松逮起来。杨说：我不能这样做。拒绝了。这时杨部内旧派孙蔚如等主张接近南京，加之粮饷困难，改编军队不成，入党不接收，韩又逼他去南京，因此，杨将军不得不离开部队，到了南京，杨未见蒋介石就到日本去了。

杨走后，十军交孙蔚如负责。我们已公开的党员不得不离开军队，转到地方搞地下工作。我到亳县、鹿邑、拓城联系和我们有关系的红枪会，发动领导农民准备暴动。魏野畴、李力果等同志转到太和、阜阳等地方负

责特委工作。他们依靠高桂滋部的教导团部分力量和干校部分学生，在 1928 年 4 月，发动了“阜阳四九暴动”，在行流集一带成立皖北苏维埃政府，建立了皖北工农红军，打土豪，分财产。因遭到反动军队围攻，敌众我寡，激战了几个小时，不幸失败。昌绍先、魏野畴等同志壮烈牺牲。皖北暴动前夕，我在鹿邑一带组织的力量，也被新开到亳县的方振武部击溃，无法立足。于是我就离开皖北返回开封。当时的河南省委也被破坏。

（二）

1928 年初，在皖北太和，当时我们准备暴动，杨虎城说：现在的军队要暴动指挥不动，要暴动就得成立学校，专门训练一批骨干，我就任了干校校长。当时蒋介石派了韩振声来工作，杨虎城为了这个计划，不愿叫他来，而亲去亳州迎接，谁知韩拿到我给寇子严同志的电报，他非要见我不可，所以就来太和了。

以后杨虎城同韩振声一同去了南京，杨对我说：我不能在这里待了。所以我和杨同一天走了，杨去南京，我去了河南。我走时孙蔚如还送我十来里，并为我走表示难过，说我们还是朋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法合作。

魏野畴同志是我走后的党的领导人，任皖北特委书记，并非和我一道走的，后来因他是公开的党的领导人，他在太和待不住了，当时右派力量抬头，孙蔚如说我们不能相处，你们另找地方去革命吧！所以魏后来也走了。阜阳起义失败后，魏带部分同志向河南逃，途中被地主武装杀害了。

（三）

1930 年，蒋、冯、阎战争起，韩不愿和国民军作战，请求他调。鹿为国民军总司令，出潼关东下，韩调山东，韩知道我和鹿的关系很深，留我在汴代理民政厅长。及鹿到开封月余，他派我到南阳，拉拢杨虎城。据我们判断，冯、阎必失败，但我们并不拥护任何一方面，我到南阳和杨虎城计划，对蒋、冯两方面都不表示积极态度，不积极参加战争，与驻许昌之邓宝珊取得密切联合，等到冯失败的时候，杨、邓即率部到西北另创造一

个新局面。于 7 月间回到开封。到冯、阎在津浦、陇海两线都已败，战争胜负大致决定的时候，杨部才取小路直趋洛阳，进攻潼关，邓宝珊带领的部队全是樊钟秀的旧部，都是土匪，临时不听命令，他的卫队旅都叛变了，并把他当作礼物，向蒋方解送。途中幸遇岳维峻的帮助才免于难，邓只身逃往上海。杨部单独入关，准备实行大西北主义。是年冬，杨虎城邀我随十七路军入陕，委我为省政府秘书长。

1930 年冬，杨虎城邀我随十七路军入陕，委我为省政府秘书长。

蒋介石对十七路军的入关，虽不得不承认，然他并不放心。顾祝同紧跟十七路军入关之后，被任命为潼关行营主任，以监视十七路军。但因蒋在战争中实力的损失及各地红军的发展，使他不得不暂时放弃控制西北的企图，而给十七路军以发展的机会。所以，我们入关后，很快肃清了盘踞各地的土匪，改变了混乱的局面，收编了很多武装部队，统一了陕西。1931 年冬，又派孙蔚如为甘肃宣慰使进兵兰州，驱逐了吴佩孚、雷中田，而取得甘省政权。派马青苑师消灭了马廷贤部，驱逐了川军黄逸民等部，收编了鲁大昌，甘肃省大致统一了。改编了马步芳、马步青部。青海与十七路军建立起比较亲密的关系。改编马仲英部为师，作为进攻新疆的准备。当时曾决定使马青苑以追击马廷贤残部为名直趋宁夏，因孙蔚如反对，没有实行。在半年的时间内，大体上统一并安定了西北。直属部队从入关时的万余人已扩大到近 5 万人。武器的补充有潼关、华阴、西安 3 个兵工厂及汉中的修械所。兰州有规模不小的造币厂，制造银、铜各种新币，财政收入可以自给。十七路军在西北的发展，更引起南京政府的嫉视，十七路军与南京政府的矛盾更加尖锐。

孙蔚如入甘，南京政府不承认，且予责备。我们从上海秘密地把邓宝珊接回，由杨给以甘省行署主任名义送其回甘，准备造成既成事实，请蒋承认。蒋对此更加不满，事成僵局。不得已才由杨电请以邵力子主甘。因邵与杨有关系，而且是文人，不致发生军事矛盾。这是邵能主甘的原因。

我们既然要控制西北，就不愿中央势力侵入。因此，用各种方法排斥

国民党的活动。逮捕 CC 的学生，用学生的力量捣毁省党部，打戴季陶，驱逐 CC 的教育厅长李范一。有条件地扶植李寿亭为教育厅长。其条件是我保证学生拥护李寿事，但用人行政我可以参加意见。事实上委用各学校校长、教务主任等，是由我开名单，要把所有学校完全抓到我们手中。这一教育计划和各学校的校长名单是商得省委同意，而且取得杨虎城的允许。杨对此事不大放心，但我坚持要做，而且保证不会出问题。从 1927 年国共分裂后，陕西教育完全落到反动派进化系手中。此时，我们用县长交换校长，或用金钱收买拉拢进化系有力分子如侯良弼等，这样把学校都夺过来。但这一计划在执行中几乎完全失败，其原因是叛徒杜正亭的破坏。当暑期快要结束的时候，由中山中学校召开一次各校暑期联欢会。会上公开散发共产党传单，满校贴着“打倒国民党”、“拥护共产党”、“加入红军”等标语。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王一山（右派领袖）派公安局去弹压，可是公安局长不得到我的命令（当时杨虎城在三原养病），不敢前往。王又派宪兵弹压，宪兵营长是我党同志，他只把兵派到北大街，不进学校。在这紧张情况下，我告校长杨美园要他停止开会。杨答：“此事为另一朋友所决定，我不能自主，请先告别人转我停止。”此事闹得满城风雨。“南某赤化教育”的传单，也是进化系与旧派联合之下秘密散出的。团更得到攻击我的资本和证据。以后，从杜叛党的供词中，说明我的教育计划及红二十六军骑兵的失败，都是他有计划地破坏。

1931、1932 这两年在西北问题上，是蒋与杨的斗争。蒋利用中央名义限制杨的活动，吹毛求疵，使杨“动辄得咎”。同时收买旧派如李志刚、王一山、陈子坚等，利用杨的内部矛盾，拉拢不稳分子，如马青苑师的叛变，是邵力子到西北的第一次工作。送马鸿逵回宁夏是拉拢回军制杨。打击新势力，如提出以我为首的 27 名共产党名单，当然更是杨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些人都是杨比较重要的干部（有好些并不是党员）。以后蒋又变换方针，专打击我一人。

在十七路军内部，有旧派与新派的矛盾。旧派是以孙蔚如作后台以王

一山出面团结的力量；新派是以我作中心的力量。最初旧派只是他们自己的力量，以后与南京的外援联合起来，并吸引教育界被排斥的进化系分子及地方的豪绅，力量日渐扩大，新派孤立无援，省委和我们工作上的配合不好，甚至有意破坏，因此我们的成绩就受到影响。

1932 年夏，陈立夫等到三原看生病的杨虎城，经过冯钦哉（因冯和我中学同学，友谊很深）拉拢我到南京，我坚决拒绝。拉出不得，继以打击。行政院电杨，说我是共党有据。杨托病不复。最后胡逸民携蒋函当面向杨

提出，如我能到南京，则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由我选，否则，行政院即下令通缉。胡亦面劝我到南京，我严词拒绝。于是，我提出辞职，杨电保杜斌丞接替。蒋不允，杨又保耿寿伯。行政院会议通过后，我于 10 月间交代清楚。行政院通缉令到陕后，杨未发表。

11 月，红四方面军入陕。黄杰部开至潼关，其参谋长到西安，要求杨逮捕我，杨托词推诿。当晚，杨即派人送我出潼关到天津。杨坚决主张我到日本，他恐怕我被逮捕后牵连到他，并且我知道他有的秘密，于是我就由津赴日。

到日本后，警视厅对我非常注意，因为我既不是商人，又不是学生带着女人，生活相当阔绰。那时正是日本进攻山海关、热河的时候，所以我的行动很不方便。我终日埋头读书、学日文，与中国学生都不来往，精神上非常苦闷地住了半年多。

1933 年夏，张家口抗日军起，吉鸿昌和冯钦哉都电邀我返国。他们两人不是同一目的，吉是要我参加抗日，冯是开到北平后，想脱离杨虎城，要我作最后决定（我以后劝他又开回陕西）。及我返国，张家口抗日军已失败，就暂住天津租界。我离西安时，没有带组织关系，回国后才经过葛季云同志找到了关系。

1933 年冬，孙殿英要率部到西北，派李锡九先生到天津找我，要我帮他到西北。杨虎城也主张我去。福建人民政府也给我送一军事委员会委员兼西北特派员委状。我不能自决，以后组织决定叫我去。于是就到包头，

孙聘我为高等顾问，随军出发，进攻宁夏，围宁夏两月未下，孙既不肯分兵直趋甘肃，又不肯过河到陕北，直到粮食吃尽，无法支持，退回绥远，四五万人完全被阎锡山缴械。孙赴太原，我又逃回天津，时为1934年四五月间，我又被国民党军委会通缉。

到天津后，我和吉鸿昌同志等组织反法西斯大同盟，参加的人很多，大部分是失意的军人。中央委员会委员为冯玉祥、李济深、方振武、方本仁、吉鸿昌、任应岐、张砺生、邓哲熙、徐维烈、宣侠父及我。秘书长也由我兼。我和吉、宣组成党团，领导党团的是周同志（不知其名）。发行一种刊物名《民族战旗》，由陈伯达负责编辑，发行是王幼兰和王再兴。同时，在各省发动人民武装自卫军的组织。国民党用暗杀方式，指定刺杀我和吉、任、张（砺生）、宣、徐6人。我和侠父先后被调至上海。

吉、任案发生后，我不能再回天津，即留在上海工作。和刘子华、王世英在一起，我管理一部分红队，并编辑情报。工作了约10个月，到华北事变后，华北换成冯系军人统治。我和冯系上层分子的关系很多，因此，党又派我回华北工作。

1935年7月底，我到天津，首先联系过去有关系的人.同时又恢复了刊物。《八一宣言》发表后，我们根据党的决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那时王世英同志也到天津，又在一起工作。我用我在华北的关系，所以工作开展很快，尤其是华北事变后《八一宣言》的正确主张，使统一战线工作更顺利。到“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我们在学校中已有很大力量。这一工作的开展，逐渐扩大到各实力派的内部。如宋哲元、韩复榘、阎锡山、东北军、西北军各部分内部都有了我们的关系，拥护我们统一战线的主张，愿意和我们合作抗日。尤其是东北军、西北军及东北义勇军失败后来到关内的干部，更容易接受我们的主张。如马占山把他的干部都集中到天津，交我训练，并组织抗日同志会，完全由我们主持等。这样的工作我做了1年多，直到西安事变后，才离开天津。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我们立即派人到山东、山西及冯玉祥处，

要求他们反对内战，主张和平。韩、宋所发通电，是我派何松亭同志和韩商谈的决定。23 日接到中央电，叫我回西安。我于 25 日离开天津，秘密通过山西，于 1937 年 1 月 2 日到西安。当时和平与战争的争论非常激烈，我在周恩来、叶剑英、博古诸同志直接领导下，利用我在西北的关系，帮助西安问题的和平解决。

2 月 4 日，我们退出西安。5 日，中央军进西安。我到三原准备组织合作委员会，即红军、西北军、东北军三方派代表组织，由我主持。以后因东北军内部分化，要求出关，杨虎城对西安问题的解决，不大满意（他是主张打仗的，至少把中央军打出潼关以外再谈和平），所以合作委员会没有组织。我由三原移住云阳，替前总训练了 10 余个作秘密工作的干部。4 月间到延安。杨虎城出国临走的时候，电周恩来同志和我到西安一面，于是 4 月底我又到西安。杨走后，周恩来派我到华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注：①指的是组织中共第十军特别委员会，中共河南省委指定于基（即南汉宸）为书记。
②韩，指韩复栗。
③鹿，指鹿钟麟。

*本文第（一）、（三）两部分摘自南汉宸 1940 年 11 月 28 日所写的自传；第（二）部分摘自南汉宸 1959 年谈话记录，原件存安徽省太和县民政局。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党派我到杨部做争取工作*

王柄南

我的父亲王宝珊同杨虎城将军是很好的朋友。1928 年，我在陕西淳化作党的工作。以后因为叛徒告密，党的机关被破获。我跑出来到了三原，经张秉仁（那时是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介绍，又到了西安，由省委分配工作。同年春天，杨虎城将军到日本去了，部队给我父亲打来电报，叫他到前方去。那时部队在安徽。我在西安听候省委分配工作。有一天王云同志通知我，说李子洲同志要找我谈话。当时，在西安王家巷有个秘密联络机关，李子洲就在那里同我谈话。分析了形势之后，他说：你父亲要到杨的部队前方去，你可利用你父亲同杨虎城的关系，到十军去工作，首先争取杨先生从日本来。

1928 年春，我和父亲从西安出发，到了徐州，在孙蔚如的总部待了几天。孙对父亲说：你来的好。后来我父亲到了上海。那时，马青苑是杨虎城第十军的参谋长，正在上海联络左派。我父亲就由马给办了出国手续，赴日本。我就留在上海。不久，张秉仁也到了上海，随后许权中、马子敬也到了上海，在上海形成了陕西同志的一个小组。在小组中还有何廷杰、彭淑珍、王观政等同志。我们也同上海党组织建立了联系。

1928 年 11 月，我父亲同杨先生从日本回来。我想，省委要我做杨先生的工作，这时我是跟杨先生到山东去呢？还是留在上海工作呢？我同上海的同志商量后就决定留在上海工作。在上海开了一个长风书店，我在里头当店员。

1929 年初，我接到一个电报，是杨虎城先生打来的。说我父亲病重，要我赶快回到山东莒县。我向党组织报告后，就到山东去了。当时山东还没有建立省委，所以中央决定建立新的省委。我同新省委的同志一起，坐

船北上。新省委中，我熟悉的一位叫党维蓉，还有一位女同志，听说刚从苏联回来。走时，上海同志交代我，要我跟山东省委一起去山东做杨虎城部队的工作。到青岛后，我们住在一个旅馆里，我和山东省委开了个会，一起研究了山东的工作以及我到杨部队的工作。然后，新的省委到了济南，留下一个同志在青岛作联络。我到莒县后，才知道我父亲病重是假的。因为他接到于右任的一个电报，说我在上海处境很危险，让赶快把我叫回来。开始，我还是准备在杨的部队工作。当时，那里党的同志很多，如张汉民、王泰吉、阎培林等这一批。在我住的地方，这些同志每天川流不息。当然，杨先生也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有一次我们正在商量事情，杨先生跑来了，一看我们坐了一大堆，他笑嘻嘻地说：“从你们这些人脸上的表情看，商量的是好事情。”当时，张汉民给我讲：十军总部政治处主任郭乐三是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我就是同他积极联系的。他还给我讲：我搞来一个叫陈子坚的，过去参加党的工作，现在消极了，在十军经常读《圣经》，以掩盖他过去的红，我们要积极做陈子坚的工作。我给他讲，在这里工作，最好同组织建立联系。一天，陈子坚到青岛去，我给他写了介绍信，让他同省委把关系建立起来。结果，他没有去找，转了个弯子就回来了。看来他根本没想去找省委重新建立关系。以后，杨先生决定让我到日本学习。他说：你们干革命，都是年轻人，国内学习条件不好。他说他在日本见到马列著作翻译得很完整，所以决定让我到日本去。当时，我的政治身份也公开暴露了，不宜再做十军的工作。于是我向山东省委作了请示。省委同意我去日本，并让我走前把十军部队的情况、干部的情况给省委写一个报告。我写好后，经青岛联络站转给省委，我即赴日本去了。据说以后山东省委被破坏，我的那份关于十军情况的报告也被敌人抄走，给了当时的山东主席陈调元。

我从日本又到德国柏林攻读政治，在柏林 5 年。1936 年 2 月，我携夫人王安娜取道苏联回国。这时，自九一八事变以后，国难日深。国民党政府却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杨虎城将军虽曾面谒蒋介石请求

率部参加抗战，但为蒋所拒绝。面对着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杨虎城将军义愤填膺，心情极其苦闷。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中共中央驻第三国际代表团了解到我与杨虎城将军有世家关系，便委派我回国到杨虎城部队做争取工作：（一）争取杨虎城与红军达成谅解，签一互不侵犯协定；（二）万一杨虎城因与中共关系遭到蒋介石迫害时，保证扬的出路。如杨同意我党建议，要我密电当时驻巴黎的吴玉章同志，暗语是：“我订的杂志请寄来。”中央代表团便将派潘汉年同志回国，协助我完成争取杨的工作。如杨不同意，密电暗语是“杂志不必寄了。”我带着党的上述指示回西安后，即与杨虎城联系。他特地把我接到三原县东里堡别墅，同我密谈两天。我向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介绍了中共的政策，也探讨了十七路军的前途，并向他指出反共是没有电路的，唯一出路是与共产党合作抗战。杨虎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我的观点和建议。他愉快地对我说，他与中共某些人士已有接触，但素不相识，说话难免有些顾虑和保留；现在我回来了，这很好，可以无话不谈了；并要我搬到他的私人公馆止园去住，以便随时商谈。

我同杨虎城的接触中，有两点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一是他相信共产党，把自己和部队的命运完全和我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他曾委托我去上海物色进步人士帮他办军官训练班，改造他的部队。他对党的希望和要求，也常先同我商量后才提出。二是他的求知欲很强。他虽未受过正规教育，谈话时却有条不紊，颇有见解。他虚心好学，曾一再要求我给他讲一点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他白天忙于军务，常在深夜邀我谈话，向我提出一些政治理论问题要我解答。那时，他与张学良将军已有政治联系；而我经杜重远同志介绍，也与张学良见了面，因此，在西安事变之前，我曾在张、杨之间，充任沟通意见、传递信息的中间人。

在我归国之前，汪锋同志携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王世英同志代表中共北方局，曾先后与杨虎城谈判，并于 1935 年底达成反蒋抗日的秘密协定。杨虎城将军从而成为第一个接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国民党高级

将领。

*本文根据王炳南 1983 年 11 月在原十七路军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工作座谈会发言录音及《丹心素裹》所载王炳南《党派我到杨部做争取工作》一文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 九 间 房 事 件

阎揆要

1931 年秋，枣子红的时候，张汉民同志派我和马子敬去陕甘边谢子长部——西北反帝同盟军，一方面送鸣子弹，一方面劝说不要接受杨虎城部队的收编，杨要价太高，说要收编就要缴械投降。

1932 年春，打旬邑阳坡头是张汉民派李明轩向谢子长通的消息。我们事先研究好的，李连党员很多。

1933 年初，我从西安医院出来去汉中。在西安时，杜斌丞先生告诉我，杨虎城将军叫我到警卫团当营长，去汉中，我所任职的警卫团第三营住在勉县菜园子。7 月，王泰吉带领西安绥靖公署骑兵团在耀县起义，陕西即有这样一种舆论，说起义的不光是骑兵团，以后还会有警卫团，一时空气相当紧张。我营驻菜园子，孙蔚如的三十八军特务团，经常向菜园子方向进行演习，实际是警诫我们的。因此，我每天晚上也要放哨警戒，以防意外。在这之前，张汉民曾派张含辉（中共党员）去四川红四方面军联系，一是给红四方面军送地图，二是研究如何把警卫团拉出去同红四方面军一起干革命。张含辉此行把警卫团拉出去的行军路线都侦察好了。但是，红四方面军认为，警卫团留在杨虎城部队里，从事秘密斗争对革命更有利，等以后实在站不住脚时再过去。于是，张汉民同三十八军等方面的关系又搞得缓和了一些。那时，警卫团发生一些情况，一是打了反动民团，一是暗杀了当地的反动头子，帮助了地方上的工农游击队。据说，孙蔚如就给杨虎城写报告，说张汉民在汉中不好领导；孙提出，一是把张汉民调回西安，二是把警卫团的枪缴了。杨虎城不同意孙蔚如的意见。后来，杨虎城给张汉民写了一封信，说你的处境和我的处境一样，要注意搞好关系，待将来有机会将你的部队扩大，调回西安。

1934 年，杨虎城到陕南视察。在由城固向东巡视时，警卫团随行护送。1935 年春节（2 月 4 日）到了牧护关。此时红二十五军由河南进入陕西，杨令警卫团堵击。张汉民避免正面接触，只是率警卫团“尾随”红二十五军到杨家斜（在庐县西约 50 里）。在杨家斜，红军驻扎在河南，警卫团驻在河北，双方没有交火。张汉民派 2 人去红二十五军联系，并订了互不侵犯协议。联系人回到警卫团后，张汉民派他 2 人（我记得好像是岳子涛等）给我送来一封信，信上说，他们（红二十五军）需要地图，要我准备一份地图，由岳等送到红二十五军去。并说，岳等已经去过红二十五军了。我看信后，就抽了一份地图给岳。后来，张汉民告诉我，红二十五军要跟中央联系，因没电台，不能联系，药品也困难，他们提出要电台，要药品。汉民说，药品已派人去西安购买，电台已叫王超北（中共党员，警卫团军需主任）去上海购买。（过了 10 天，红二十五军向湖北方向转移，我们一直“尾随”到陕、鄂边界上的漫川关。相行数日，彼此相隔一日行程，并未交火。）以后，警卫团由漫川关返回镇安，奉命扩编为陕西警备第三旅，辖七、八、九团，张汉民为旅长，原警卫团改编为第九团，我任团长。扩编 1 个多月，红二十五军再次入陕，并神速地到了汉中的华阳、茅坪地区，歼灭了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张飞生），随后向东运动。此时，西安绥靖公署发出“堵剿”红二十五军的部署命令，并令张汉民旅参加堵击。汉民接令后，即派马振远和一个姓刘的给我送来一封信。我根据张在信中的指示，把西安绥靖公署发来的堵剿红二十五军的作战部署电报亲自抄了 1 份，并说明联络暗号仍然是“瞄不准不打”，然后，交给马、刘送往红二十五军。据张的来信说，他们两人已去红二十五军几次了，比较熟悉。接着，张汉民即率七、九两个团出发，“尾随”红二十五军。4 月 7 日，到了蔡玉窑，我发现送情报的两个同志没有回来，有些疑心。就在这一天，我们收到了汪锋由西安发来的电报，说他已由上海回到西安，即动身来会我们，我向汉民建议，等汪锋到后再行动，但汉民认为，我们同红二十五军已来往数次了，订立了互不侵犯协议，相随也非一日，并未违约开火，绝对不

会有问题，仍决定按计划继续“尾随”前进。8 日到了曹家坪，这时，送情报的两个人还没有回来。我看了当地的地形，两面是森林高山，中间是一条沟。我考虑部队在沟里行军不利，于是向汉民建议，要继续前进，可以走北山，不要在沟里走，汉民非常相信红军不会违约，同时感到部队有很多牲口，在山上不好走仍决定在沟里行军。9 日，向目的地九间房前进。我团是前卫。离九间房还有十几里路时，尖兵连（七连）报告村里没有人了。我根据红军作战常常坚壁清野的战法，提请汉民注意，但他认为不会发生问题，要求部队继续前进。部队到了九间房正准备宿营，忽然山上枪声、手榴弹声骤起。我当即与汉民商议，红军有埋伏，赶快往后撤。在撤退中，跟随我的 4 个人都负了伤，由于红二十五军三面包围，警三旅很快被打散，一部分伤亡，一部分被俘，张汉民旅长也被俘了，只有少数官兵沿来路撤回。当天晚上，我们撤回曹家坪，我收集了七、九团退下来的官兵。10 日带回到蔡玉窑。此时，汪锋也来到了，我把在九间房发生的情况向他汇报后，随即派兵送他去九间房，向红二十五军传达上海中央局的指示，并营救张汉民和其他被俘人员。不料，汪锋去到红二十五军后，不但没有营救出张汉民和其他被俘人员，自己也被红二十五军扣押起来，辗转带到陕北，直到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才被释放出来。张汉民和其他被俘人员被红二十五军错杀了，这是我党历史上一个沉痛教训。

党的七大追认张汉民同志为烈士。

# 初 识 魏 野 畴

孔从洲

我第一次见到魏野畴同志，是在1925年5月。当时魏率领驱逐吴新田的请愿团，来到耀县杨虎城将军的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部，住在一间小会客室里。同来的有请愿团团员赵葆华、宋树藩等。有天晚上，马维藩、韩树屏和韩志远约我去看魏。他们3人都是魏送到杨部奂边教导队的学生，马和魏有亲戚关系。一进门，见一个人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中等个，蓄短髯，年约30左右，给人以严肃精明的感觉。他就是魏野畴同志。见面后，他和蔼地招呼我们坐下，问我们学习什么课程，教员教得怎样。他是陕西兴平人，操着浓重的关中口音。我们回答学习课程有操练、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令、战术和工程等。又问政治上学什么？答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谈话中，他从政治上对我们进行启发教育。他说：杨先生办教导队就是为了改造他的部队，你们要好好学习军事和政治知识，好好锻炼身体。中国地大物博，但至今贫穷落后，民不聊生，就是因为外有列强的侵略，内有军阀的压迫、地主的剥削。孙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就是要自由平等嘛，你们都学了吧？吴新田是北洋军阀的走狗，原来是陕南镇守使，现在又成了陕西督办，他盘剥百姓，镇压学生，激起了西安市民的公愤，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农民交农（具）。我这次来，就是请杨先生出兵，和三秦父老一起驱逐军阀。

1925年7月，魏野畴同志曾任三民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1927年初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部副部长，创办政治队开展党的工作，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如张汉民等同志。

---

*本文原载《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8年第6期。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回忆在西安政治队的学习和太和军校中党的工作

吴岱峰

我1924年在陕北安边杨虎城办的教导队学军事，后又在杨部任下级军官。1927年初，陕西党组织在西安以国民联军总部的名义办了一个政治队，我和在杨部工作的张汉民（共产党员）、李作梁、贾中瑜、曹力如从三原到西安参加政治队学习。政治队由魏野畴主持，目的为了培养军事和政治人才，学员有100多人。张汉民任队长，曹力如任秘书，我、李作梁、贾中瑜任区队长。我在政治队由张汉民、李作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学习不到两个月。政治课讲马克思主义浅说。党内有党课，讲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做什么事，还讲帝国主义的形成和特征。魏野畴常给我们讲政治课和党课。政治队经常派人带队出外宣传，常去南院门、钟楼、鼓楼等地方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有时还下乡组织农民协会。学员毕业后，一部分到中山学院工作，不少人在杨虎城部作兵运工作。

1927年四一二后，我和白怀林、栾佩雄3人由西安动身到了河南郑州国民军第十军（杨虎城部）办事处。办事处处长段象武留我任副官。白怀林到马牧集（今河南虞城县）前线参加了部队工作。栾佩雄到冯玉祥部军官学校去了。我在办事处时，经常送信到马牧集，有时到开封、兰封（今兰考县）与地下党接头，给地方党转送文件。这些文件有些是地方党转来的，有些是上级党给地下党的。因为我是军人，在铁路沿线不受检查，行动也很方便。

1927年冬，郑州十军办事处派我送信到太和。当时杨虎城军部驻在太和的天主堂。我到太和见了魏野畴，他在杨虎城的政治部担任主任。魏叫我到十军办的军事学校（又叫军事训练营）去工作，没有介绍信，叫我自

己想办法。因此，我直接找杨军长，要求到军校去学习。在我的迫切要求下，杨同意了，又叫参谋写了封信给我。我拿着信到军校办公室，有个秘书叫我到第三大队任中队长。我刚到第三队时，学员不多，只有 30 多人。过了 10 多天增加到五六十人。随后又逐渐扩大到 100 多名学员。这些学员一部分是由各营连调来的正、副班长，一部分是由陕西关中来的学生。这些学生与十军官兵之间有亲朋关系。当时，王汉秋也在第三大队任中队长，并兼任营的党总支部书记。王经常到第一、二大队去联系党的工作，有时到军政治部魏野畴那里去。

王汉秋离开部队前约 20 天，曾对我说，军委要调一批可靠的党员到阜阳去加强农运工作。后来，王带 40 多名党员去阜阳农村，全营还剩下 30 多名党员，要我继任营党总支书记。我任总支书记后，王汉秋告诉我有个通讯员叫张庆华，此人可靠，有重要党内信件可由他转送。王汉秋走后不久，通讯员小张对我说，军委（指魏野畴）要党员名单。因此，我即把 30 多个党员的代用名写给了小张转魏野畴。随后又听到一些同志说，军委要党员名单是准备暴动。我们在学校里就积极收拾枪弹服装，进行准备工作。

过了几天，孙蔚如派护兵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到后，孙问我是不是共产党？我说我不是共产党。孙讲：“听说中山军事政治学校、中山学院都是共产党，你在中山学院当什么？”我说是当队长。孙又讲：“你当队长怎么不是共产党呢？”我回答说：“我是当兵的，只管上操！”孙问有没有国民党，我说冯玉祥的部队有时来几个人到学院，有几个学生常和那些军人谈话，说些什么我不知道。

又过了一天，孙又派护兵叫我。孙问我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我说我不是，什么党都不是，我只管给学生上操，孙发了脾气，拿出一张名单，放在桌子上，说这个名单是谁写的？我说我没写过名单。孙见我态度强硬，便转换了语气说：“将来的天下是共产党的，现在不行，在皖北这个平原上站不住脚，南方江西红军是在山地，你们这些娃胡搞。”我当时仍没有承认，孙拿出一封信命令我说：“给郑州办事处送信去，快走！”当我走

出了大门，只见街上各巷口都站上岗哨，没有行人。我把信展开一看，信上写着“吴振东（我的原名）从军多年，念其旧好，发给路费，着回原籍。”我看后方知出事了。我回到营部时，门口已站上哨兵。我见到司务长，他说军部叫你快走。这时，又有一个青年参谋拿了张护照给我。此时天已黄昏，我到街上雇了辆洋车，便出城了。第二天到漯河，换乘火车回到了郑州十军办事处。处长段象武一见我就训斥说：“你们这些娃娃干的啥事，你不能在这里待了，快走，你回家去吧。”并叫办事员给我开了护照。于是我便离开了郑州。

*本文据吴岱峰 1959 年、1979 年 4 月两次谈话记录和《丹心累裹》所载吴岱峰《忆太和军校中党的工作》一文整理。标题为丰书编者所加。

# 回忆靖远兵变中的谢子长和耀县起义中的王泰吉*

张秀山

## （一）

大约 1932 年旧历二月上旬，我带着陕西省委的指示，由西安搭坐杜斌丞的汽车经平凉在会宁下车，沿着祖厉河川又走了 3 天，到达靖远，第二次再入王子元部，组织策动兵变工作。

我到王部以后，先找到党的负责人张东皎、石子健，向他们传达了省委“组织革命兵变”的指示，打算先做一段兵变的准备工作。1931 年冬，王子元已被陕军孙蔚如任命为甘肃警备第三旅旅长，王大肆扩充势力。这时部队党的秘密组织是由陕西省领导的，陕北特委对组织兵变也很关心。一到靖远，我就见到了陕北特委军委书记王兆卿同志。他是陕北特委派来专门了解这支队伍情况的。我和他讨论过准备发起兵变的问题。4 月 28 日，子长、焦唯炽同志受陕西省委派遣，也来到靖远。他们计划把王子元的全旅大部分拉走，派王兆卿先去海原发动炮兵营的兵变，以便和靖远同时起义。但因炮兵营长沈毅民（党员）蜕变，兵变未成功，兆卿即回陕北去了。

为了能够掌握带兵的实权，我利用第一次在王子元部时，在定西县宁远镇救过王的命这层关系，当了一营一连的排长，在连内开始积极进行党内的政治和思想教育，加紧军事训练，秘密开展兵变的各项准备工作。

子长、焦唯炽两同志来靖远后，我和石子健在城里找了一间老百姓的房子，安顿他们 2 人秘密住下。因为很多军官认识谢子长，谢不能公开活动，而焦唯炽没人认识，就由焦唯炽出面到教导队和各连了解情况，分析形势，召集党的会议。首先，子长和焦唯炽改组了党的团委（1931 年春王

子元和石子俊在定西分裂，王部开到兰州，石部开到静宁，地下党的组织也分成两部分活动，王子元部的党组织改为团委，直接受陕西省委领导。）由焦唯炽任书记，教导队长苏醒民和学员高尊德、执法队长石子健、五连的一个士兵和我组成新团委。这时王子元旅的情况是：司令部是我党的势力，执法队由我党掌握，王子元住在公馆里几乎从不到司令部。公馆的对面是警卫连，由王子元的侄儿一营营长王治邦兼连长，是王子元的主要势力。第三团是收编地方杨梓才的反动队伍，实际上没多大势力。

团委在开会时，谢、焦传达了省委马上发动兵变的指示。张东皎同志在会上发言时，检讨了自己是机会主义，没有马上发动兵变的思想准备，总以为条件还不成熟，想等到将来力量大了再打红旗，没有估计到现在发动兵变的重要性。子长同志立即向东皎同志解释说，这不能说是机会主义，是省委过去没有指示。接着子长同志向大家解释了这次组织兵变的重要性，指出：现在在靖远、海原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不仅能在甘肃造成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大影响，也是配合红军陕甘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扩大红军，建立根据地的一个有力步骤。在会上还详细讨论了兵变计划。当时有过几个方案：有同志提出利用开毕业典礼时扣留王子元，缴警卫连的枪。有的说，如果王子元不来教导队，就打王子元公馆（王的护兵多）和警卫连，把警三旅大部分带走。但这种行动计划都没有定下来，具体的行动时间也没有确定。参加这几次会议的有：谢子长、焦唯炽、张东皎、石子健、苏醒民、张秀山。高尊德也参加了最后一次会议。

正当谢子长、焦唯炽同志周密组织大家积极准备起义的时候，不知什么人走漏了消息。5 月 5 日晚上，王子元突然扣押了张东皎、王儒林，缴了执法队的枪，兵变只好仓促提前进行。6 日晚，谢子长、焦唯炽由石子健领着先出东门外等候，吕振华、曹炳垄（五连连长）带着五连驻守在东门。天黑了，我到城里集合起一连赶到东门时，五连已经走了。追了半夜，在打拉池川里和五连会合，才知道谢、焦 2 人失了联系，没有跟上部队。

队伍到打拉池时，天已大亮。吃过早饭，集合起队伍，我代表党委宣

布：一支新的红军队伍诞生了，编为陕甘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总指挥谢子长，政委焦唯炽。因失联络，谢、焦暂时不在，由吕振华代理总指挥，五连改为第一大队，曹炳奎为大队长；一连改为第二大队，张秀山任大队长，教导队改为指挥部的直属队。然后，队伍向海原方向出发。

由打拉池出发，部队走到郎山村休息，正准备做午饭，敌人的骑兵就追上来了。我们打退了敌人骑兵进攻，敌人下马步战，又围了上来，我们边打边退上了崛乡 吴山，到了最高处时，太阳已经落山。因为我在后边断后，又照顾一名党员战士申健如，落在最后头。吕振华、曹炳奎带着队伍，分成两路。一路顺沟。一路沿山梁走了。我们顺沟里赶了一晚上也没追上。第二天被敌骑兵包围捉住。敌人一部分押送我们回靖远，大部分继续追吕振华的队伍。后来听说，吕振华同志带着这部分队伍去定西一带打游古（战士多是定西人），坚持了一个来月，后来失败了。常焕章（负伤）等人向静宁方向走了，枪也被民团缴了。

这次兵变开始得之所以很仓促，事后了解，王子元已经知道谢子长同志秘密来靖远，引起了王的怀疑。因为子长同志和王子元很熟悉。王子元对他手下人说，谢子长是他的老朋友，这次来靖远为什么不见他的面，只见张东皎。据牛化东同志 1979 年在银川说，兵变那晚王子元把他找去，不让他离开，并说缴到石子健的笔记本，上边记有兵变计划。也可能是头天晚上收执法队的枪时，把石子健的笔记本搜去了，但石未向党委说这事。

1932 年 7 月初，我在西安去看杜鸿范，他在第二次靖远兵变水泉战斗时手上受了伤。鸿范说老谢也回来了，他领我去见了谢子长同志。当时子长住在西安大湘子庙街杜斌丞公馆的楼上。这里成了我们同志避难的临时住处。整个楼上就一大间，没有隔断，空空荡荡的。老谢就睡在地板上，几件简单的被褥，还是杜鸿范的。杜老先生住楼下，没有我党同志引路，谁也不许上楼。见到子长同志后，真是感慨万千，我们简短地谈了一会儿，因为楼上谈话不方便。

不久省委把子长同志安排在一个秘密机关住下。这时省委正准备派我

去上海受训。汪锋同志领我去见子长同志，这次谈话时间较长。子长同志说：“靖远兵变那天晚上，因为石子健带错了路和你们失掉联络，我和焦唯炽、石子健出了东关，走不远看到南山方向有火光，以为是手电，就往那里追，到跟前才知道是老乡抽烟点火，又返回大路。因为原计划是先去收缴东湾子那个连的枪，所以我们就向那个方向追。到了东湾子附近，发觉毫无动静，这才估计你们是朝打拉池方向走了，又转向打拉池。当时，恐怕打拉池川里有追兵来，我们走的是山路。你们在崛蜈山打仗时，我们还听到枪响，但已经追不上了。寻了几天找不到你们，我们就回兰州了。”

我也把那天的情况和我被抓后又脱险的经过谈了谈。子长同志接着又谈了他们到兰州以后的事情。他说：“张东皎在靖远被释放以后，也到了兰州。这之前，王子元派机枪连长杜鸿范带兵来兰州领枪，领子弹，领军衣及现款。虽然杜不是党员，但愿意参加红军和我们一起干。我们就带人坐上船和羊皮筏子，把领到的枪、子弹及军装都装上，由兰州顺黄河而下，到河口上岸，宣布起义，改编为陕甘红军游击队第八支队。我和张东皎、杜鸿范带队伍到了水泉。王子元派队伍到水泉打我们。这次战斗给你们出了气，打死了周维邦（三团的反动营长），打伤了骑兵营的副营长梁占胜（王子元亲信）。可惜，战斗中东皎同志壮烈牺牲，杜鸿范同志手上负伤。”

停了停，子长同志气愤地说：“这次战斗，骑兵营营长汪兴民（党员，已蜕化）也参加打我们。战斗后，我们一个被俘后又跑回来的同志说，有一个扁嘴营长（汪兴民的嘴扁）骑在马上骂梁营副（梁占胜）：这次他（梁）受了伤，活该！我说不要打，他要骚情（陕北土话即惹事），打死张东皎，回去怎么交代（按：汪兴民所说“不好交代”，不是指对王子元不好交代，而是无脸见党内同志。）

这就是第二次兵变的情况。以后，孙作宾、王儒林等同志又组织了第三次兵变。经过全次兵变，王子元部队基本瓦解了。靖远发生的这三次兵变虽然都失败了，但它是我党在陕甘领导的风起云涌地创造红军的英勇起义的一部分。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汇成了我党威武雄壮的革命

武装斗争的洪流。

子长同志于1932年8月间又回到陕甘游击队任总指挥。1934年任陕北游击队总指挥。8月阎家洼子会议后兼任红四十二师政委。10月在河口战斗受伤，1935年2月不幸病逝，这是我党和陕甘红军的一大损失。子长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陕北人民爱戴的领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子长同志在红军时期的革命斗争中，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革命浩然之气永存人间！

## （二）

1933年春，国民党部署“围剿”我陕甘边苏区，动员了4个团的兵力，妄图一举消灭我们红二十六军和攻占照金革命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委给红二十六军发了“粉碎敌人四团兵力围剿”的指示信。这时王泰吉同志正在十七路军中担任骑兵团团长，驻防三原县。杨虎城任命他为“剿匪”总指挥。泰吉率领骑兵团为追击部队，将其余的3个团部署在陕西、甘肃一带担任堵击任务。但泰吉带着部队跟在红军后面相隔不远，只是虚张声势。有一次在淳化县境内，我们红军驻在小茨[池]村，十七路军骑兵团驻在铁王村，两军的哨兵虽互相看得见，但互不开火。泰吉起义后，在照金根据地时，我曾问他：“离得那么近，你们为何不开火？”泰吉幽默地说：“那是客气嘛！”红军北上了，泰吉又率部向北跟进了两天就返回照金，经薛家寨山下的秀房沟到了柳林镇，又驻防耀县，开始秘密实施他的起义计划。由于王泰吉骑兵团跟在红军后面不打，也未给那些堵击的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国民党这次“围剿”破产了。泰吉参加红军后，有一次他和我谈，他回到西安向杨虎城交差时说：“这次把刘志丹的部队打败了，都跑到山里找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一个薛家寨（当时是我们的后方营地），形势险要，没有炮兵打不下来。”杨虎城说：“算了吧，打人家寨子干啥！”就这样，国民党纠集的声势浩大的4个团“围剿”红军，在泰吉的巧妙安排下，使红军不战自胜。

王泰吉在敌人营垒里积极宣传革命主张，开展革命活动，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进步青年，为武装起义做了准备。他那个团内聚集的党员也不少。先后有赵启民、高觉天（高尊德）、刘清和、魏志坚、袁鸿[宏]化、王英、秦重民等同志。1932 年中共西安市委领导该团内党的工作，1933 年转为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

1933 年 7 月 21 日，王泰吉同志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率领骑兵团在陕西耀县举行了震撼西北的武装起义，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泰吉任总司令，省委派杨声（刘映胜）任党代表。

**注**：①靖远兵变时间应为 5 月 5 日晚。

*本文第（一）部分节自《甘肃党史资料》第 3 辑所载张秀山《回忆谢子长同志领导靖远兵变》一文；第（二）部分摘自《革命英烈》1984 年第 3 期所载张秀山《丰功伟绩　水垂肯史》一文。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回忆两当兵变

吕 剑 人

1932 年春的两当兵变，是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发动的兵暴起义之一。我参加了这次兵变，现就追忆所及，并征求了李特生、左文辉、许天洁等几位同志的意见，记述下来，供研究这段历史的同志参考。

## 杨虎城主陕，两当兵变前的西北形势

1930 年，杨虎城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进行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参加蒋军一方作战，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讨逆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同年 10 月，杨打下洛阳就乘胜率部向西北进军，赶走了西北军的省主席刘郁菜，掌握了陕西军政大权，并且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多年来，陕西一直在外来军阀势力的统治下，战争连年，土匪遍地，特别是 1929 年的大旱，赤地千里，疮痍满目，民不聊生。因此，陕西不论是士绅阶层还是一般群众，都希望有一个本地人出来治理陕西，企苏民困。杨虎城返陕正适应了人们的这一心愿。杨虎城既是陕西人，又有拥护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等一系列功勋经历，是一个较有众望的人物。

杨虎城在政治上比较开明，在西北地方人士的支持下，以“大西北主义”相号召，不仅接纳士绅，而且重用年青人，甚至对思想进步的人，也敢任用。他还采纳地方人士的建议，以工代赈，兴修泾惠、渭惠等渠，颇得民心。在军事上，他大量收编地方各种武力，凡不愿归顺者则坚决消灭。这样，就很快把陕西大大小小的地方武装统统归到第十七路军的统率下，总兵力达到 6 万余人。在两年多时间内，杨基本上统一了陕甘两省，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军事势力。杨虎城的崛起，这是西北的新形势。

## 两当兵变前，党的地下兵运工作

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的发展壮大，给我党在杨虎城部队开展兵运工作，提供了一个极好机会。当时陕西省委曾作了关于开展兵运工作的决议，指示各地党组织派出秘密党员去十七路军中工作，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因此，地下党员在杨部做秘密工作的很多，如十七师、四十二师、五十八师和几个警备旅、骑兵团、炮兵团等部队，大都有我党的秘密兵运工作者。

1931 年 3 月，我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到凤翔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随营步兵训练班当学兵。杨虎城开办这个训练班的目的，是为部队培训基层干部。学习期限 1 年，结业后由总部统一调配所属各部队。步训班先随十七师师部驻凤翔，后移驻西安的西营房，在这个步训班里，我党建立了地下组织，我任地下党支部书记。到这年冬，我还未结业，第十七路军总部从步训班中提前调出几十个学兵，我是其中之一，派往新编的部队中去了。我们一起去驻彬县警三旅的有 12 个人。该旅旅长唐嗣桐，下辖两个团，一团团长刘子潜，二团团长曹润华。

我同几个人被分配到二团一营，营长是王德修。王原是“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司令，后编入苏雨生骑兵旅第二团二营任营长。这个营当时就有党的地下组织。当苏雨生背叛杨虎城时，党为了保存自己的力量，避免无谓牺牲，就鼓动王德修不跟苏行动，苏部很快垮台。王德修部即改编为警三旅二团一营，王德修仍任营长。曹润华是杨虎城的亲信，他对王德修及其原有军官并不信任，采取掺沙子的办法，予以逐渐更换。我们这些从随营步兵训练班调去的学兵，就当作沙子掺到各连去，都当上了带兵的排长。我在一营一连当排长。一连连长原是营长王德修的亲信，后被曹润华排挤走了，曹派他自己的朋友韩生信充当连长。三连连长也予以调换了，只有二连连长唐福亭未动。王德修这个营，党的地下组织成立得比较早也比较强，在营部、排长、司务长、班长和士兵中都有党员，我所在的

一连就有党的小组。可以说，当时这个营的 3 个连都在我地下党组织的控制之下。先期成立的营党支部，李秉荣、李特生同志先后任过支部书记。后来成立了营党委，领导全营地下党的活动。营党委书记是习仲勋同志，营党委委员有李秉荣、李特生，现在能记得当时的党员还有刘书林、许天洁、左文辉、高祥生、张子敬、吴彦俊、魏明山、张茂修、张彦芳、张克勤、郭立山、吴进才等人。当时在敌军中党的工作就是要求党员按照组织决定的方针，进行极其秘密的革命活动，主要是在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广交朋友，通过个别谈心，宣传革命道理，秘密发展党的组织，了解国民党军队中的情况，在情况许可下也进行一些社会调查和社会活动等。总之，那时在敌军中工作的总的目的，是为了在条件具备、时机成熟时进行武装起义，把部队逐步改造为公开的红军武装，壮大红军力量。

警备三旅是杨虎城刚刚收编的杂牌部队，所以有三差：一是器械装备差；二是物资服装差；三是生活待遇差。一营所用的枪，都是杂七杂八的破枪，大多是陕西造的。还有一些是土造的，只有连长有一个盒子枪，排长扛的是老套筒长枪。子弹很少，衣服常常不按时发，有的士兵没鞋穿，赤着脚上操。不按月发饷，就连伙食费所用的几个钱也不按时给。在国民党军队中，吃空名字，克扣军饷，是很普遍的现象，士兵生活十分困苦。因此，我们做士兵工作，总是先从关心士兵生活入手，联络感情。或利用同乡同里的关系，以至结拜兄弟建立私人间更密切的关系，再进一步讲些国民党统治如何黑暗之类的事情，逐步提高士兵的觉悟，经过若干事情的考验，才个别发展秘密党员。

1931 年冬，川军邓锡侯、黄隐师由甘南进占陇南几个县，杨虎城派陕西警备第一师师长马青苑率全师到天水攻打川军，警三旅二团也奉命进驻凤县，在两当、成县一带打川军。战后，一营就驻防凤县和两当县整训。

## 两当兵变的经过及失败

1932 年春，营党委派刘书林同志向陕西省委汇报工作。省委决定警三

旅二团一营举行兵变，起义后要把部队拉到陕甘边去与刘志丹同志的陕甘游击队会合。营党委决定伺机而动。时隔几天，二团团部突然下了命令，要一营和二营换防，把一营调到徽县去。一营的战士大都是山外头的人，不愿到那边去，嫌生活苦离家乡远，抵触情绪很大。这时，陕西省委派刘林圃同志到一营来领导发动兵变，这时正是一营要换防的那几天。刘林圃同志和营党委决定，部队开到两当县宿营后召开营党委扩大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当晚的营党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省委关于兵暴的决定以及兵暴后将部队拉到陕北参加红军的决定。到会同志一致同意，决定当晚就举行兵暴。并对兵暴如何进行也作了具体部署：由各连负责收拾本连的连长，排长不是党员的下枪带上走，以后苒作处理。并决定由一连收缴机枪连的枪，三连负责收缴营部的枪。兵暴就是这样开始了。各连收拾本连反动连长的枪声，震惊了机枪连和营部。他们即有了戒备，结果未能解除机枪连和营部的武装。这时已到了鸡叫时分，就把 3 个连的部队集合起来，由刘林圃讲话，宣布起义，遂把部队拉出两当县城，向北进发。第二天上午，行军至太阳寺地方，部队吃饭休息，营党委开会研究决定了干部任职和部队编制等事宜，并决定由刘林圃同志代表党讲话。刘林圃除讲了革命形势外，并明确向全体官兵宣称：我们哗变是革命行动，我们哗变出来是为了干革命，我们已经是革命军队了。我们要把部队拉到陕北去当红军，和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会合，只要渡过泾河就到了苏区。还讲到我们是革命军队就要守纪律等问题。最后宣布我们的部队编为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第五支队，并宣布了支队和各连负责人。由许天洁同志任支队长。一连连长吕康若，二连连长高祥生，三连连长许天洁兼，副连长为左文辉。营党委会议上各连还提拔了几个班长当排长，一连就提拔了班长张永胜当排长；提拔的人有的并不是党员，但能打仗，表现好。

秦岭里的山路，叫大路的其实都是小道，山大林深，人烟稀少。沿途很多村镇驻扎有民团，不消灭或打垮他们，就不能通过。记得沿途大小战斗有五六次，如在通洞峪、赤沙、香泉、高崖（属千阳县）等地都打了仗，

尤其是在麟游县西北方向的一个地方，同从北边甘肃灵台方向来的杨于恒军队遭遇，敌军在我们要通过的山梁上堵住了去路，打了半天，没有攻上山岭，无法从此路通过，只得于晚间靠南边绕道前进，上了麟游县以北的页梁（是东西行的唯一道路），经过阁头寺、崔木等地向东北方向前进至预定的目的地岳御寺。由于初始就宣布过行军中要注意事项，因此一路上纪律还是好的。

从两当兵变到把部队带出来到达麟游北部，我们已经走了千把里路程了。沿途多次战斗，部队十分疲劳，只要说一声休息，马上躺倒就睡着了；在行军时，有的战士走着路就睡着了。甚至有个别战士夜间行军过桥时由于打盹而掉到桥下去了。这支部队是刚从敌军中哗变出来的，大多数人对革命并没有认识，加之当时的地下党员也不懂得如何在行军中去搞政治思想工作，途中也发生了几起逃跑事件。在一、三连都跑掉了几个人。那时候，国民党军队的编制，说是一个连，实际上并不够一个连，连长为了吃空名字以少报多，所以我们拉出来的 3 个连总共约有 200 来人，枪不论好坏，一人总有一条。一路上接连不断的打仗，子弹也差不多打完了，到了麟游山里，据说冲过西兰公路、渡过泾河，就到了陕甘苏区。后因在麟游西部山中，同甘肃灵台来的杨子恒部队遭遇，未打过去。当晚营党委研究决定：部队已相当疲劳，弹药剩下不多，战斗力严重削弱，对周围情况全不了解，我们必须在麟游山区休整，一面了解周围情况，一面进行过河准备。为此，派习仲勋、左文辉去亭口，通过旧日社会关系作渡泾河准备事宜；为了争取休整时间，派刘林画、吕康若去乾县通过社会关系同刘文伯谈判假收编以拖延时间；部队由许天洁和李特生负责带至岳御寺休整。当时我们并不了解王结子的土匪在什么地方活动。当部队一开到岳御寺，就突然被盘踞在这一带的大土匪头子王结子的土匪部队包围，经过激烈战斗，终因敌我兵力悬殊而被打垮，除少数逃跑外，余部被俘，兵变遂告失败。

## 两当兵变的经验教训

这次起义，虽然和清涧、旬邑、渭华等几次起义一样，也失败了，但意义很大。这是当时在陕西地下党领导下的一次国民党部队的起义。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连续不断的起义，振奋着人’心，鼓舞着广大人民的坚持革命斗争的精神，说明我们党在任何困难条件下，始终坚持着革命斗争。兵变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有客观上的，也有主观上的，总结起来，有三条：

1、这次起义是党内盲动主义遗毒的产物。1932 年，我们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想残余还继续起着影响。左倾思想的错误，首先是对形势的分析不正确，它否认有政治上的中间营垒和第三派力量的存在，而且把第三派势力看作是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错误的主张“打倒一切”。其次，在策略上搞关门主义，“要兵不要官”。在军事上搞盲动主义，急于求成，不审时度势，这次兵暴的失败，就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影响的必然结果。当时省委关于发动两当兵变的决定，实际上就是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作出的。

2、判断和准备工作上存在着严重的失误。在当时情况下，应该不应该发动这次兵变，我们对主客观情况缺乏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就盲目作出了兵变可能成功的判断，没有考虑到时间和地点都不相宜。起义地点距离要去的目的地——陕甘苏区那么远，一支刚刚从敌人营垒中拉出来的部队，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革命军队的配合，千里迢迢行军，要越过渭、泾两个大河，必然会受到各种敌军前后左右的攻击，加上沿途多次战斗，不停步地行军，部队疲乏不堪，弹药殆尽，怎么可能把部队拉到根据地去！准备工作不说别的，就连一张较详细的行军地图也没有，只凭着东南西北的大方向瞎撞，沿途情况完全不了解，而且组织哗变是在行军宿营时仓促决定的，绝大多数党员事先并无思想准备，结果瞎扑到了大土匪的老巢中去了。

3、部队里虽然有党的组织，但它是活动在敌军中的地下党，就战斗经验来说，懂得的很少，只认为干起来就行了，只凭一股勇气、一股子热劲

干革命，经验少，办法不多。例如对思想政治工作，就不知道怎么去做。加之部队拉出来以后，一直得不到休整机会，思想涣散，沿途遇到敌人，因情况不明，只知盲目冲打。有的民团被打退了，遇到敌正规部队，就未能打垮取胜，被迫改变计划，以致盲目走进大土匪巢穴而失败。

现在，当我们拿起笔来写下这段历史情况的时候，谨以崇敬的心情向在那次兵暴中和以后的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的刘林圃等战友表示深切的怀念。正是由于无数先烈和同志们的奋斗，中国革命才有了今天，活着的人们应该永远缅怀他们，并要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目标奋斗到底。

# 关于西安绥靖公署
# 步训班的一些情况的记述

常黎夫

1934 年五六月间，我投入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骑兵队，受军事训练一个多月。学完了步兵班排教练，刚刚领到一匹马，未及上鞍，步训班新设入伍队（后称学生队）招考，我即考入该队。学期为 1 年，约于 1935 年九十月间，同第五期各队学员一起进行统考后毕业。合计在步训班先后住了一年又三四个月，跨越了四、五两期（其他军官队受训期为 6 个月）。这一年多期间，是步训班的鼎盛时期，也是它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对步训班前 3 期的情况知之甚少，仅就四、五期和学生队的一些情况，简略记述如下。

## （一）我所了解的步训班

杨虎城为《步训周刊》（1934 年冬至 1935 年夏期间的校刊，不久停刊）题词称：“为使本军永远追随着时代的车轮，使光荣的历史更发扬光大之。”当时杨虎城处在蒋介石的控制和监视之下，他用这种含蓄的语言表达办学的目的和任务，是可以理解的杨虎城在另一些场合解释，步训班要继承三边教导队、耀县三民军官学校和皖北干部学校“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要效仿黄埔军校创建时期提出的“贪生怕死莫进此门，升官发财请走别路”的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下边再略举杨虎城在步训班的两次“精神讲话”的内容要旨，补充说明他当时的政治态度和办学的指导思想方针。

一次是杨虎城陪同张学良向步训班全体学员的讲话，时间大约是 1935 年八、九月间。张学良的讲话简略介绍了国际形势，着重揭露分析了日本

帝国主义侵华野心和阴谋罪行，接着提出东北军的任务是“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张学良说东北军迟早要“向后转，枪口对外，东出潼关，抗日救亡。”最后呼口号：“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杨虎城接着讲话，号召全体学员和十七路军拥护张副司令的训词，说西北军和东北军的任务是一致的，“西北军的血和东北军的血要流在一起。”呼口号：“东出潼关抗日救国”。张、杨的讲话激昂慷慨，声泪俱下，全体学员深受感动，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杨虎城的另一次的讲话，在张、杨的这次讲话之前，时间大约是 1934 年冬或 1935 年春，题目是《用运之妙，存乎一心》。他引用这一古语向学员解释学习的目的和方痃，达到“用运之妙，存乎一心。”他告诫学员要好学苦练，要善思善用。杨虎城特意举了他的老友、陕西知名武术家杨瑞轩的故事（杨瑞轩讲：一次他偶遇恶犬，无意中施展武功，一足踢死恶犬，从实践中领悟到学而致用和灵机应变的道理），说明在课堂上学，在操场上练，为的是在战场上用，灵机应变，才能克敌制胜，千万不可在课堂上做书呆子，在操场上学“花架子”。杨虎城的这次讲话，寓意深刻，解说道理通俗易懂，在学员中留下深刻印象。

因为我是被指定的精神讲话记录员，所以虽然时隔年久，对他们的讲话要点尚能记得清楚。

杨虎城还为步训班题词：“好学近乎智，知耻近乎勇，力行近乎仁。”（见步训班五期同学录）。杨对此是否在精神讲话中解释过，已记不清。不过他的这几句话在部队传播较广，有的连队还作为标语张贴。记得我毕业后去警备一旅三团三营营部做见习 3 个月，营长任耕三就要我负责把营部大门外墙壁粉刷一新，用艺术字体把杨虎城的这个题词描画在墙上。用任耕三当时的话说：“他们（指蒋介石）不让抗日，我们先从说抗日做起”。

追忆以上事例，大致说明当时步训班的宗旨是比较明确的，十七路军的抗日救国情绪是相当强烈的。

步训班的几个主要官员。副主任金闽生，是学员较为注目的神秘人物。

他平常很少露面，在公众场合出现时讲究衣着仪容。凡杨虎城来课堂（做精神讲话）和操场时，他必亲自检点队伍，发出“立正”口令，向杨虎城敬礼报告。毕恭毕敬，表现严肃认真。金闽生为第四期毕业学员赠词写道：“谨录亚圣孟珂语以为诸生克己反省之助——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见步训班五也同学录）。他没有在另外的场合做过解释，当时对他的思想一直捉摸不定。曾听到他的一些历史事迹的传说，也了解到他在宪兵营工作搞得比较活跃，以及他对学生队的工作很重视等（推介了 10 多名宪兵营的战士考入学生队，选派了 10 名班长充任学生队入伍初期的班长），这些因素，使他在学兵中产生了较好的印象。在此期间，我同金闽生有过两次接触，他的简短问答，对我慰勉有加，他对我的注视，反而引起我的不安和对他的戒心。西安事变后，在南汉宸处（住止园）又见过一次面，当时在座的有六七人，大家都很高兴，但事务纷繁，未及多谈。此后，再无往来，至于他早年系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是在“文革”之后才听说的。

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韩威西，在步训班后期的活动较多，主要是做“精神讲话”的次数较多，也到操场察看过几次。韩威西的“精神讲话”内容，总是离不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封建伦理说教和旧军事学上的一些成语典故，学员听得厌烦，我做记录更感困难。他对我整理的记录不满意，特意指定窦副官（即兵器教官窦明暄）做他讲话的记录员，我借机脱手。因此，现在对他的讲话具体内容一概想不起来。韩威西善于理财，能搞经济事务。在政治方面看风使舵，趋势应变，但对杨虎城还是忠实效力的；学兵中对他的一些责备或有过分之处，也在情理之中。

总队长孟庆鹏（后调任骑兵团团长，离开较早），教育主任申及智（到得晚些），皆系黄埔学生出身，俩人的共同特点是为人诚恳，作风朴实，工作严肃认真。几乎每天总要到操场看看，不讲空话，不摆架子，他们以维护十七路军的团体利益出发，秉承杨虎城的旨意，勤恳负责，克己奉公，在旧社会能够给学员留下好的形象也是可贵的。孟庆鹏同我的一次谈话至

今记忆犹新。大概在 1934 年冬，我向《步训周刊》写了一篇时事评论的稿子，内容是根据政治教官苏资琛、郭则沉和战术教官刘磊的报告写的。特别是刘磊一次抛开课文，揭露日本侵华阴谋罪行，抨击国民党当局外而屈膝投降，内而独裁腐败现象。他讲得激昂慷慨，有时声泪俱下。我写的稿子归纳了他们所讲的事实材料，篇幅较长，措辞激烈。孟庆鹏看了稿子后，特意找我谈话，我以为要受处分了！出乎预料，见面后，他态度和蔼，长谈半小时，恳切地讲了十七路军的历史传统和杨虎城的爱国精神，说明十七路军是要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的。还说“现在必须体谅杨主任的处境，为十七路军这个团体的利益着想，如果急于发表过激的言论和主张，会给杨主任增添麻烦，会给我们这个团体带来困难。而对抗日救闽得不到什么实际好处。”等等，语重心长，很有感染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申及智教育主任，在毕业前后和我有过几次谈话，他着重讲改造和提高部队的要求和希望，强调部队要提倡识字扫盲，注重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并重。19 从年夏申及智听到我在警一旅特务连政治处境困难，自行离开部队的消息，即派人找我，再三留我在他的团里工作，并按我的要求，仍到连队，先任连附（警备一旅一团二营四连），4 个月后即任代理连长（连长冯铭安去洛阳军分校学习）。不久，“西安事变”发生，我匆匆离开部队，从此以后就同他们失掉联系。追忆及此，思念联翩，特别思念我所在连队的官兵！连长冯铭安，排长叶有才，赵纯德和全连战士于 1938 年同日本侵略军在山西永济展开血战，全体壮烈牺牲。当时西安易俗社特意编演了秦腔《血战永济》，以表彰他们英勇杀敌，为国捐躯事迹。

## （二）我在步训班的始末

1934 年初，我去宁夏李岗堡和南汉宸取得联系（经过另有材料），3 月底返回西安。不久孙殿英西进受挫，全军瓦解。4 月间杜斌丞提议要我商派张光远去川北与红四方面军联系（经杜斌丞介绍孙蔚如给张国焘写了信；经我介绍由张德生写了中共汉中特委的组织证明信），争取恢复杨虎城与

红四方面军的合作关系，不料张光远持信见到张国焘后，住了两天即被礼送出境，双方联系中断。此时，国内形势逆转，白色恐怖加剧，而杨虎城部主管联络事务的负责人竟一反常态，对我冷遇，我即和他断绝关系。同时，国民党肃反会主任宋子先的保镖冯子奇（米脂同乡、同学），不断到杜斌丞家中窥探我的行动；肃反会管押政治犯的看守所负责人鱼得明（绥师同学，改名鱼舫池），同我在街上两次相遇，背地议论我是“被通缉的人”；特别是兰州新华洗染店的朱经理，出狱到西安要我赔偿损失（上年中共甘宁青特委机关被破坏，洗染店被封闭.朱受株连，坐牢 10 个月），否则将向法院起诉。多种威胁，使我在杜斌丞家不能藏身了。杜鸿范（杜斌丞的长子）和苗剑平、张利辰等商议组建中共临时西安市委，一再邀我参加市委工作，我未同意。原因是：

（一）汉中特委指示要我协助杜斌丞进行工作，隐蔽政治身份，不参加地下党组织活动。（二）我对苗剑平等人不大信任（后苗果然自首叛变）。南汉宸约我同去天津和他一起干，我也未去。自己觉得不能再寄身于“上层活动”，下决心投笔从戎，以便日后相机行事。杜斌丞老人想找个机会让我出国留学，但一下又办不到。此时杨虎城已有创办学生队的计划，想招收培训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一为逐步改变旧部队的成分，二为各专区、县的保安队培养骨干，逐步改造地方团队武装，扩充部队实力（以后学生队毕业的大部分学员分任各县保安队训练员）。我投考学生队的计划，杜斌丞、张德生都同意。在招考时间公布之前，适逢三边地方武装势力张廷祥受杨虎城收编为骑兵团率部开到西安。我为尽快摆脱当时的环境威胁，借机结合杜陕山（即杜宇波）、常翔峰、高渤（即高波）、常立山、常祝三等（除高渤外，其他人都加入过中共组织），联络骑兵团裁减的官员崔翼、高如华、王文厚、刘向明、杜嘉堂、赵令、郝旨征等（多数人加入过中共组织或游击队），托杜宏范和周梦雄（榆林中学的早期中共党员，参加了张廷祥部的改编联络事务，被委任为西安绥靖公署参谋处少校参谋），为我们办理了投入步训班骑兵队的手续（骑兵团办了保送公函），通过考

试形式被录取。大约住了 1 个多月，入伍生队开始招生，我们十几人，又联络党子俭、李亚雄、王德轩等一起报名考入学生队。

## （三）学生队的军官与兵

宋文梅、张天礼先后任学生队队长。宋文梅 1933 年参加绥远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回陕投奔杨虎城，先任步训班兵器教官，学生队开学后被任命为少校队长。他顺应时势潮流和学生的思想动向，采取较为开明的态度和教学方式，注重军事训练与政治理论相结合，队部订阅报刊，选购少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书籍和俄国进步翻译小说（由我和郭士毅负责选购，我通过中华书局李兰亭可以找到进步书籍），设置阅览室，供学生借阅，允许以班或由区叭分别组织进行学习讨论。还办过若干次壁报，选贴学生的学习心得笔记或撰写的稿件，有几期壁报名“石鼓”，我和郭士毅任主笔，由文书常增业缮写油印。伙食由学生代表参加管理，值星班长协同炊事.员一起上街采购肉菜食品，饭食搞得不错。文娱生活也比较注意，除经常的篮球运动外，春节期间排练节目，自行演出。记得我同张文舟主排的话剧因张中途离开，未能上演。高渤、郭鼎臣等主演的《滚水烙碗计》等秦腔节目，颇有水平，很受观众欢迎。综观宋文梅在担任队长半年多时间里，工作很努力，学生队在各方面的表现较为活跃。我和杜陕山等人对宋文梅的历史情况（入党参加革命活动）大概了解一些，宋对我们的来历也知道大概，彼此在学生队的工作方面配合得还好，但在政治思想方面，保持一定距离。除了旧部队官兵之间界限森严外，还有我对宋文梅的政治关系（他同张慕陶、赵和民等人的来往）搞不清，宋的生活表现（买新房、结新婚等）在学生中私下也引起议论和反感，所以我同他的关系只是“公事公办”，从未谈心，平时接触表现彼此似有好感罢了。后来一些日子，突然不见宋文梅的面，背地流传一说被杨虎城禁闭，一说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不久宋又在操场上出现，做了另一个队的队长，大家才放心了。学生们对他还是关心、同情的。以后，在举行毕业的前几天，为

修改我写的讲话稿子（我代表学生在会上致辞，大概是他妥命负责市定讲话稿的），两人会商谈过一次，彼此态度仍然是“公事公办”。离开步训班后，我们再没有见过面。宋文梅在西安事变中出力，负责看管蒋介石出了名，但以后他的遭遇据说颇为坎坷。

新中国建立后，1950 年宋文梅出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际处副处长，他办事精明干练，认真负责，在工作上是称职的，除工作外，他很少谈起政治方面的问题，回避提及往事，我也不便提问，彼此相敬如宾，基本还是保持“公事公办”的关系。1954 年大区撤销，宋文梅同我一起到北京，他任国务院机关事业管理局联络处副处长，工作做得也不错。周恩来总理也曾问过他的情况。可是不久在开会中间他突然患脑溢血，经抢救无效去世。我参与了他的葬礼，安排了他家里的后事。30 多年过去，人世沧桑，风云变幻，死者安息，生者感伤，追忆及此，略表怀念。

张天礼接任队长后，学生队的情况起了变化。张天礼沿袭国民党中央军校的一套办法（他从中央军校毕业不久），害怕学生的进步思想和抗日爱国热忱，认为学生中有共产党，疑神疑鬼，企图用威吓压制的办法加以约束，他以效忠蒋介石的形象，早晚讲话中吹捧蒋委员长的口号总不离口；凡他讲到“蒋委员长”4 字，学生就须自动立正，以示忠心，“立正”稍不整齐，就罚跑步，有时收操后继续跑步半小时，不能按时用餐。如此种种倒行逆施，渐渐和学生的矛盾加深、激化，我们串连一起，故意同他捣蛋，要他“滚蛋”。学生们说：“我们流汗，要他流泪”（张天礼在一些场合流过泪）。软磨硬顶，终于迫使张天礼离开学生队。不久，在操场上见到他做了另一个队的队长。

第一区队队长先后 3 人，都是上尉衔。杨健（当时名叫杨志新，在队时间很短，后任孔从洲师的团长，解放初曾任陕西省军区副参谋长）、张子正（从他的口里听到似乎干过革命，实际精神不振）、李云章（常喝酒，工作有点马虎，学兵毕业期将到，不伤感情，彼此随和），张、李 2 人以后下落不明。第二区队中尉区队长白宗璧，第三区队少尉区队长尤继贤，

两人从建队开始直至毕业，他们的思想较单纯。白宗璧同学兵间矛盾少，被认为是“老好人”，以后下落不明。尤继贤年轻能干，随着队长的态度影响，同学兵闹过一些小矛盾，无伤大体。尤继贤在抗美援朝中任志愿军某军参谋长，1954 年曾来西安见过我，1983 年我去北京参加十七路军党史资料会议时又遇见了他，那时他已调任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教育长。

## （四）学生队员中的一些情况

学生队建队之初，共录取学兵 100 人，一年后毕业时保留 80 多名（同学录摄照者 80 人）。据我当时了解，学兵中大约近半数曾加入过中共组织（包括共青团员）或者参加过党所领导的革命活动。1933 年 7 月中共陕西省委被敌人破坏，杜衡、笑章（即袁岳栋）等领导人叛变后，陕西（涉及甘宁等省）白区各地组织相当普遍遭到严重破坏，造成不少党、团员逃亡流散。其中有些同志三五结伴，改名易姓，找寻栖身立足之地，在黑暗中继续苦斗，探索前进的道路。他们保持着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怀抱着抗日救亡的热忱，投笔从戎，武装自己。投考学生队一时失掉组织关系的同志，多数是这一类型的青年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各个人的出身、经历和具体思想情况是相当复杂的。要接受 1 年多旧军队严酷训练，对他们说来是一次相当严峻的考验。

据我当时的了解和现在所知道的情况看，当时步训班和学生队中都没有统一的正式的党组织，至于个人（或几个人）同某地党组织或经党组织负责人交待的同志保持单线联系的则不少。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虽然时断时续，总是彼伏此起，彼断此续，“心有灵犀一点通”。历史的实际说明，革命的火种是熄灭不了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也说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星星之火能够燎原。仅就我了解，学兵中的一些有关政治和组织关系方面的活动情况分别追记一下。

金闽生由宪兵营选派的班长 10 人，大多数沿袭旧军队的管教办法，态度粗鲁，方式简单，自张文舟、李启明、张涛等哄打该班班长史俊的事件

后，各班学兵都对班长不满，提出许多意见，不久，大多数班长都调回宪兵营，班长由学兵中选任，我和常翔峰、杜陕山都做了班长。原来的班长留下的有陈加谟，表现好，1983 年见到他，在海军后勤部任参谋长，才知道他是 1938 年加入党组织。另一个班长是刘俊德，表现平常，以后的情况和下落不明（偶尔从他的言谈中流露似乎也参加过革命活动）。从宪兵营来的 10 多名学兵大多文化较低，在队中的活动和影响小，其中没有共产党员。另据徐彬如、李木庵在延安时告诉我，他们在宪兵营只做上层统战工作，谢华在宪兵营讲过“猴子变人”（即社会发展史），只是很短时间（见徐写的回忆录），说明中共西安特支在宪兵营士兵中没有发展党员。

李启明、张文舟、张涛 3 人，是在学生队开学后插队进来的，他们同宋文梅队长有往来，当时以为他们是从抗日同盟军下来的。张文舟和我排练过话剧，接触多，谈心也多，政治观点，思想认识都谈，就是不谈有关党组织关系方面的问题，他去陕北苏区前，曾向我流露过。

秦力生、胡一亭、曹瀛洲等人（另 2 人名字记不起）也是学生队开学后，从山西跑来插队的，他们先后都去了陕北苏区。行前，曹、胡 2 人都将他们的去向告诉了常翔峰（常是胡的班长）。据说胡一亭在抗日战争中负伤后牺牲了。其他人下落不明。

郭士毅同姜旭保持单线联系。郭还介绍我同姜谈过一次话，交谈了在学生队不急于建立和发展组织以及我们不在队里散发党的宣言传单等问题。郭士毅书生气重，联系面窄，我们之间，保持一致行动。“文革”期间，赵守一对我讲过，他去陕北苏区是郭士毅通过姜旭介绍去的。姜旭后来被康生整死了，郭士毅的下落不明。

还有刘伯桢、杨春荣等一批家在关中地区的学兵，他们表现很好，刘、杨对我和常翔峰都流露过他们的一些历史情况，他们同本县的个别同志保持联系。他们以后的下落也不清楚。

我结合杜陕山、常翔峰、常祝三、常立山、高渤 6 人，加上通过崔翼联系的骑兵队来的学兵近 20 人。因历史关系，自然在学生队形成一股较有

影响的力量。我联系这些人感到最棘手的有两个问题。

第一是如何稳定大家的情绪，坚持完成一年学业。搞好这项工作颇不容易。常翔峰是我的堂兄，1928 年我介绍他加入共青团组织，当年秋初党组织派他去神木高志清手枪连当兵，1931 年春他和高学孔等发动神木兵暴，掌握了一个连的大部分武器马匹，可惜缺少经验，不久失败。1933 年他在红二十六军，耀县作战失败后下来，我动员他一起进入学生队。他已是从军 5 年之久的老兵，学习半年多后，提出实在忍受不了当时生活环境，要离开。我们之间情如手足说服不了他，只得同意他出走。抗战爆发，常翔峰、杜陕山等十几人都去杜聿明部任下级军官（当时党的政策指示，尽可能到国民党部队去，扩大抗日影响，增强抗战实力，对他们不恢复党的关系），不久被国民党特务发现，除常祝三、常立山在杜鸿范掩护下保留外，常翔峰和杜陕山等 10 多人都被“清洗”出来。常翔峰饱受流浪之苦，直至抗战后期，才进陕甘宁边区，重归党和革命队伍，后离休于 1989 年去世。还有王文厚，系张德生 1930 年在中共府谷县委工作时发展的共青团员（张任高小教师，王系学生），后在骑兵团做文书，被裁减下来，同我一起进学生队，住了半年多后，他同李作栋（山西来的）2 人再三要求，经我介绍他们去了陕北苏区。后来我从张德生那里了解到，王文厚大概在“肃反”中被错杀了（张德生随中央红军到陕北之前）。李作栋的下落不明。这些对革命赤诚的战士，永远值得怀念。

第二个问题是在学生队是否建立和发展党组织。我根据中共汉中特委和张德生临行前的吩咐，以及和我对当时学生队的具体环境分析（我们的言行一直被人注视），不主张正式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当时我同党组织的联系人主要是张德生交代的崔廷儒，虽然有时候我们彼此联系较困难，但一直保持至 1936 年 3 月，崔廷儒由陕北带来张德生、贾拓夫 2 人给我写的信。我还和南汉宸保持通信关系（由崔孟博转递），当时南汉宸称为“同志关系”，直到 1942 年在延安南汉宸才告诉我，他那个时期是同“中央特科”保持组织关系的。在西安我先后同杜鸿范、马豫章保持（彼此也称“同

志关系”）联系。我在学生队时出入不便，以后到部队驻地流动，我同杜斌丞之间需要商量办理的事情，多半经马豫章转达。大约在 1935 年春夏之间，陈云樵（步训班教育处少校副官）向我提出，王超北已从上海回到西安，征求我是否和他发生关系？我对他讲：“陕西省委组织被敌人破坏了，但陕北、汉中尚有组织活动，那里相知的熟人不少，按我此时处境不宜同王超北发生关系，因为我不能帮他做多少实际事情。我以上的一些联系情况，杜陕山、常翔峰 2 人大体知道，有时候星期日我们 3 人和高渤一起出去，找马豫章谈谈时局形势或下小饭馆就餐（高渤同马豫章也熟）。我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建立党的组织生活，而高渤误解我们之间是党组织关系，为不吸收他入党向我发牢骚。高渤说他自己是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不要他入党没有道理（他家确实贫穷，无立锥之地）！”经我反复解释，当时的环境和学生队的情况，我们应该采取“互济会”方式进行活动的道理，才取得他的谅解。高渤少年随杜斌丞侍从服务，生活较散漫，喜爱戏曲音乐，二胡、三弦，京剧、秦腔，样样都能（步训班演秦腔《滚水烙碗计》他主演老生，在延安同马健翎合演《空城计》都有好评）。进入学生队后，生活艰苦，国难临头，他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忧时愤世，产生迫切加入共产党的要求。“西安事变”后不久，1937 年 1 月我去延安时，特意约他同去，介绍他住了抗日军政大学，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渴望和追求的心愿（我同高渤路经洛川时动员陈才沅脱离县保安队也去抗大学习，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是学生队年龄最小的学兵。离休前任湖南大学党委书记，现住长沙）。我到延安后将崔翼在步训班的情况向曹力如作了介绍汇报。当时崔翼在肤施县保安队任队长或教练员（离休后住志丹县干休所）。高渤在解放战争初任团政委时，因新收编起义军的一个团长叛变出卖了他，不幸被俘，他在宁夏、兰州狱中进行了机智、顽强的斗争，敌人对他威胁利诱，非刑折磨，坚贞不屈。敌特无计可施，将他押解南京，壮烈就义于雨花台，为党和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写在这里，情不自禁，顺笔把和我一起进住学生队 5 个兄弟伙伴中的其他 3 人

也交代一笔。抗战期间，常祝三、常立山两人都在杜聿明部任连长，常祝三在赴缅甸对日作战中牺牲，常立山 50 年代初病逝。杜陕山在世，他长我 1 岁，上学晚我一级，1928 年加入共产党，1929 年至 1933 年先后在高桂滋、石子俊部当学兵和排长，步训班学生队毕业后任十七路军教导营连长。抗战开始去杜聿明部，不久被“清洗”出来到西安，我即介绍他回陕甘宁边区进抗大学习，毕业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的参谋，不久到部队，在对日作战中受重伤，打瞎了一只眼，断了一只臂。建国后在空军担任教育工作，离休时为军级待遇，现住西安，前些日子我去看他，他当着我的面对他的 82 岁老伴说：“记住啊！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个家！”身残志坚，言出肺腑，深情悠悠，使人感奋。

## （五）我在学生队活动的方式和方法

一年期间，我一直采用“互济会”名义和活动方式，同近 20 个学兵保持联系（我们 6 个人，通过崔翼联系骑兵队来的一些人），这些人都懂得“互济会”是党的外围活动形式。再经过他们分别联系同他们较好的学兵，时间久了，我们的影响和作用是很不小的。对于增强学兵间的相互团结，推动组织学习，活跃文艺生活，改善伙食供应等各方面都起了积极影响，特别对抵抗队长张天礼的反动言行，限制有的区队长或班长的体罚现象，起着有力作用。我还同 10 多人联合成立“俭蓄社”，刻有印章，每人每月集资 5 角（有时有人无钱交的，由我垫付），储蓄邮政局。相近一年，积蓄不过几十元，还是解决了一些紧迫的问题，如常翔峰、王文厚中途离队的路费和杜陕山毕业后回家看望父亲疾病所需车费等。

几年前我就答应为步训班这一专题写点回忆录，但有关资料缺乏，故人逝者十之八九，幸存者亦多老病衰残，个人记忆有限得很，搜索枯肠，困难殊多。亏得“文革”期间被迫反复作过交代，底稿散失，印象颇深，拼凑此稿。撰写中时而感情激动，事由琐细拉得太长，显得有杂乱之短，至于差错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希编辑和审委同志费神审改，尤望知情

者加以指正。谨此交卷，不落食言之讥。

末了，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前几年我还写过《我与杜斌丞汉中之行》和《杨虎城和孙殿英联合“经营西北”协议的由来——我与南汉宸在宁夏李岗堡之会晤》两篇短文。我去汉中、去宁夏那个时候不在十七路军，两篇短文所述及的事情也同我们党在十七路军中的组织没有直接关系，但可以看出我们党对十七路军的某些关系和影响，而且同我谈的步训班的一些事由前后有所照应，并请编委参考审正。

## 我与杜斌丞汉中之行

1933 年 7 月下旬，中共甘宁青特委在兰州被破坏，军委梁干丞等被捕。张德生去静宁石子俊部躲避（该部有党的组织，有几十个党员）。我隐蔽在同盟会员马重光家中，在敌人围捕中错抓了张逸民（当做张德生）、常雄卿（误认为我），我乘隙逃出兰州，到了清水县。先在清水县善后局局长杜鸿文（杜斌丞的堂侄）处住了 10 多天，又到张家川善后分局、阎家店子善后分卡住了 10 多天„当我再回到清水时，听说清水县公安局已接到了甘肃省政府对我的通缉令。我在清水呆不住了，便和杜鸿文商量一道回西安，找杜斌丞先生。我们从清水出发，经陇县到了凤翔。出乎意料，在这里和杜先生巧遇。他是到汉中去的，孙蔚如的参谋长张绍亭还特意来西安迎接。他的随员有马豫章、杜理程、刘作霖 3 人。

杜先生见我安全归来很高兴，深夜同我谈了他对形势的看法和去汉中的意图。他说：“民族危急，国事日非，在新的形势下，杨虎城、孙蔚如受蒋介石步步紧逼，不得不走联共反蒋抗日的道路，像王宗山这样的人也接受了这个主张。我这次去汉中，主要有两件事：一是杨、孙先曾派张含辉去四川和红四方面军联系，但一去无音讯，又派武志平去。不知蒋介石怎样搞到了这个情报，引起杨虎城对武志平也生了疑心。我这次去，要打听张含辉的下落和了解杜润滋牺牲的情况。杜润滋为此事也曾做过一些联络工作。二是孙蔚如的姨太太张玉娥不知为什么自杀了，孙的情绪很不好，

想去宽慰宽慰他。

这样，我就和杜先生一起从凤翔去汉中。大概是阴历中秋节（阳历 10 月 4 日）到的凤县。那时汉中是个“空隙”。孙蔚如受蒋介石的欺压，由兰州贬到天水，再贬汉中，对蒋愤恨，满腹牢骚，在留坝县张良庙的石崖上书写大字：“借君之椎，以椎暴日”。是借椎“日”之名而椎蒋泄愤。到了汉中之后，杜和孙同住，十分亲热。我和马豫章等住在招待所。

我到汉中的第二天，傅剑寒就来找我，谈了地方党的一些情况。傅是四川人，曾在甘肃武都县政府做过事，跑到兰州去找我们接过党的关系。那时我们因不清楚他的经历和社会关系，由我只同他保持个人联系，没有和他发生组织关系。他积极得很，为了找红军，就先跑到汉中来了。他又引我找到了陈浅伦（陈潜）的老伴和两个农民同志，但他们对陈浅伦和杜润滋等的牺牲情况，也说不清楚。

武志平当时是孙部参谋，我们常见面。但在张德生来汉中之前，我们没有谈过同红四方面军往来的事。当时孙蔚如周围的主要人物是总参议王宗山，此人曾留过美，做过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在黄埔军校也做过蒋介石的英文秘书，以后投靠了蒋介石，解放前夕是陕西省的议长。

住了几天，杜先生提出一定要找个合适的人和党组织联系，以便沟通孙部同红四方面军的关系。我和傅剑寒商量，并得到杜先生同意，写信给张德生，要他来汉中。张德生到后，我引他见了杜先生和孙蔚如。隔了几天，杜先生和王宗山约张德生商谈建立联络的问题（我没有参加）。由武志平负责安排张德生的住房和生活，并保持与王宗山之间的联系。

张德生到汉中后，和中共陕南持委取得了联系，并决定他参加特委工作。特委同意我跟杜先生回西安，隐蔽杜家，帮助他搞抗日反蒋活动。我在汉中住了两个多月，回到西安已是 1933 年的年底了。

1934 年四五月间，杜先生同我商量要张光远去红四方面军走一趟，最好能留在那里，搭个桥，保持经常联系。杜先生给孙蔚如写了信，由孙给张国焘写了信；我给张德生写信，张给张光远写了汉中党组织的证明信，

由武志平负责把他送入川北苏区。张光远从苏区归来后说，他同张国焘等见了面，只留两日，亦未深谈，即被礼送出境。至此，杜先生对在孙蔚如和张国焘之间“搭桥”的打算失望了，我们更难以为力。那时候孙蔚如傲慢得很，自命儒将，声称张国焘只配读他写的文章；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更是顽固僵化。“搭桥”很困难，但断断续续的往来还是有的。1934 年底，张德生去川北苏区，双方联络中断。这时我已进了步兵训练班。

**附二：**

杨虎城和孙殿英联合“经营西北”协议的由来我与南汉宸在宁夏李岗堡之会晤

1933 年 3 月孙殿英因在热河阻击日寇，一时博得抗日美名。同时，他吞并了汤玉麟和义勇军李纯华的部队，保持有相当的实力。5 月间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积极争取孙殿英合作抗日；同时蒋介石为了阻挠破坏抗日运动，指使何应钦尽力拉孙反冯。孙殿英看风使舵，利用冯蒋之间的矛盾，向蒋捞得青海西部屯垦督办头衔，企图插手西北借“屯垦”之名，开辟新的地盘。而蒋介石早有阴谋，已密令宁夏军阀马鸿逵中途截击。孙殿英为便于军队行进和尔后在西北的立足和发展计，遂经李锡九邀请南汉宸到包头任该部高级顾问，并通过南汉宸与杨虎城取得联系，提出杨、孙联合共同“经营西北”的协议。南汉宸以杨虎城代表随孙军西进。我是在孙殿英部围攻宁夏受阻，形势恶化的情况下，接受杨虎城的派遣去和南汉宸取得联络的。现将我在宁夏李岗堡和南汉宸会晤的经过记略如下：

1933 年期间，杨虎城对联共反蒋抗日活动的兴致颇高。他与红四方面军建立了联系，支持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同情“福建事变”，并对孙殿英部开赴西北也很注目。1933 年 12 月杨虎城电催高级参议杜斌丞由汉中赶回西安，共商大计。

我按照中共陕南特委的指示，随杜斌丞到西安，隐蔽在杜家，帮助工作。当我在汉中的时候，就知道了福建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也听到了孙

殿英开赴西北，南汉宸敝为杨虎城的代表在孙部活动的传闻。杜斌丞回西安之初，杨虎城和杜斌丞的活动频繁，如派李龙门（李述膺，同盟会员，1919 年曾为南北议和的陕西代表）去山西、广西，分别和阎锡山、李宗仁取得联系；派崔孟博（原任陕西省政府秘书科长）去孙殿英部做南汉宸助手，派杜立亭（1932 年任甘肃酒泉专员时为马仲英部的参议）、刘天鸣去孙部准备分赴甘肃马仲英部和陕北等地进行活动。

时隔不久，形势突变，“福建事变”失败，孙殿英进军宁夏阻滞不前，西安先后派给南汉宸的人杳无音讯（以后才知崔在平津逗留，杜病倒三圣宫，刘回神木老家），杨虎城和南汉宸间的联络中断。杨唯恐南在孙部活动的消息泄露出去与己不利，心里焦急。乃与杜斌丞商量决定尽快派一可靠的人去宁夏，务必见到南汉宸建立联系。杨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向杜斌丞建议派我前去，杜未答应，也没有告诉我这回事。不料，王菊人又向杨虎城建议，由杨直接向杜提出，说派我去为合适，杜不好拒绝，才征求我的意见。

杜斌丞对我说：从当前形势来看，此去没有实际意义,,蒋介石给孙殿英青海西部屯垦督办，别有用心；而孙殿英反复无常，打个人的小算盘，他能否进入西北，能否站得住脚，毫无把握。杨虎城实力单薄，不起主导作用。所谓“孙杨联合”，没有现实条件和可靠基础。不过，你去了能和南汉宸、葛霁云会面结识，以后参加社会活动的路子会宽广一点，同时，借此机会和杨建立关系。去与不去，你自己慎重考虑决定。我认为有机会同南、葛会见是值得去的（我和南、葛都有过一面之缘），当即表示愿去。

次日，王菊人约我见面，说他将立即报告杨虎城主任，并约定第二天晚上再见详谈，当天下午，王菊人就将杨虎城写给南汉宸的信亲送杜斌丞手中。杜将密写在一块白绫于上的信，交给他的夫人朱佩英亲手缝在棉褥里边，200 元路费由杜的公务员杜良明取回交我。晚间，我去王菊人家，他殷勤接待，谈了许多好听的话，说杨、杜上午见过面，一切都谈好了，杨主任就不再约我面谈了，争取时间立即起程，归来再见。他最后的一句话

是：“希望应黎（我的原名）兄以布尔什维克精神完成任务！”

第三天，我扮作大学生（穿了杜先生的高档皮袍，佩戴一枚在北平找来的“北大”校章），由西安动身，于 1934 年古历除夕晚抵达北平，住延安会馆马豫章处。初一铁路停车，初二搭上火车去包头。在包头住两天乘汽车到临河，住入范家客店。范掌柜接待十分热情，对我讲了“陕北读书人”霍世杰（我党老同志）在临河病故的情形，并带我去看了翟的坟墓。他用 18 元钱代我买了一头小毛驴，雇了一位向导。两三天后，我由临河动身向宁夏方向前进，借口是去孙殿英部找我患重病的叔父，行至磴口，被孙部哨兵阻拦，引见副官处长王胜（上校衔，据说是留苏学生），我说明来意要找南汉宸。王处长亲自陪同我到李岗堡“顾问处”见到南汉宸。“顾问处”在李岗堡一家停业商号的四合院里。这里住着总顾问李锡九，高级顾问南汉宸，还有葛霁云和“道道”秘书（姓名忘记了，“道道”是绰号，中等身材，小胖子，留八字胡）4 个人。正房 5 大间，正中 3 间，会客、议事、用餐都在这里。左右分隔两间为卧室，李和南、葛和“道道”分别合住一间，我就住在葛和“道道”一间的土炕上，每日两餐大饼，稀饭居多，肉食极少。宣侠父随孙殿英在前线，没有来过。李锡九老人和蔼可亲，用餐前后，说笑自若，但很少议论时事、战事，常独步大庭内外，心情显得有些沉重。葛霁云快人快语，爱发牢骚。我们两人喜欢到田间散步，他总是讲述孙殿英的为人故事。他的结论是“与匪与贼不可相谋，更不可为伍！”

在“顾问处”我呆了约 20 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南汉宸的冷静沉着，深谋远虑,,他的诚挚态度和许多远见卓识，使我深为感动，深受教益。从他同我多次的谈话中，对杨虎城和孙殿英之间联合行事以及对孙殿英其人其事的分析与见解，大概归纳是这样的：

首先，南汉宸对杨虎城最关心、最担心的事作了解说。他说关于杨、孙合作，共同“经营西北”，以及在一定时候发表“通电”之事，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东西.他说与孙殿英谈判此事，是经过李锡九反复考虑，接受了孙殿英的意见，采取封建形式，歃血为盟。只是宰鸡、焚香、宣讲誓言，

没有字据，没有什么“通电”文稿留在孙的手里，外人不会拿到什么把柄，孙也不可能利用它搞什么名堂。这方面杨主任和十七路军可以放心，不会惹出麻烦。

其次，南汉宸对孙殿英部作了全面介绍和分析。他说孙部号称 5 万之众，不一定准确，但他手里掌握 3 万支好枪是实在的。孙本人出身不正，名誉不好，但他确实是个“怪才”，此刻他急于找寻出路，求得.立足生存之地。去冬孙为了去西北站得住脚，和杨虎城力求合作的心意可以理解 t 现在国内形势变化，“联合反蒋”没有条件。而蒋介石却授意马鸿逵阻击孙殿英，孙对宁马估计不足，采取大兵密集，攻打宁夏城，倘攻城不利，旷日持久，师老兵疲，粮糈不继；加之蒋介石、阎锡山在孙的内部进行分化瓦解，前途很难设想。

谈到孙殿英的“怪才”，南汉宸多次给我讲了孙在官场、商场、赌场投机取巧的故事，和孙亲自给他表演鬼混赌场施展的种种“绝招”的情形。

再次，南汉宸分 ff 了形势不利的后果问题。他说，孙殿英为争取宁夏城，不顾后果，别人的话听不进去。杨虎城实力单薄（他对杨部团长以上军官逐个点名作了分析），不能起主导作用。孙殿英部队中，我们能够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只有阎红彦掌握的两个连，宣侠父还可以影响带动三几个连。到了不得已时，拉出去同陕北红军会合。他还说他和宣侠父、葛霁云几个人在孙部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孙殿英与李锡九的关系深，孙以师礼相待；南汉宸他们几个人又是经李介绍聚集在一起的。

对我们之间的关系，南汉宸坦诚地对我说：我们之间是同志式的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理想和政治目标基础之上的，不仅仅是杨的代表和联络员的关系。我们和杨虎城之间的关系，也不仅仅是建立在与八路军的共事和与杨令人友谊方面的中纯关系于我们和杜斌丞之间的政治主张则是完全一致的（我向他谈了我随杜斌丞去汉中沟通杨部与红四方面军联系的情况）。

孙殿英攻城失利，兵心涣散，内部分裂日趋明显，而孙仍执迷不悟，孤注一掷，组织总攻（在我离开前的几天，传来前线消息，孙部亲信旅长

刘月亭准备赤膊上阵亲率敢死队攻城）。南认为败局已定，我必须立即赶回西安报信。南汉宸给杨虎城写在白受子上的密信，仍然缝在我的棉褥子里边，雇用了一个熟悉黄河绕过“冰桥”和内蒙沙漠地段道路情况的人，牵着我在临河买的小毛驴驮上行李，于古历二月初一日清晨从黄河冰上过了河。

我当天进入“三段地”被伊盟巡逻队扣留，幸于次晨脱身。第三天走出蒙古地，晚抵大水坑，持南汉宸信住郑思诚处（郑是陕西定边人，与高桂滋同时从军，曾任国民军骑兵旅长，后寓居天津，1932 年郑到兰州，我曾相识）。郑当时回陕西与杨猴小及三边、盐池地方一带的团匪串联，与孙殿英相互策应，招兵买马，伺机而动，企图东山再起。不料冤家路窄，深夜安边地方团匪头子张廷芝来郑处发现了我，向郑提出要扣留我。多亏郑思诚解劝，并于次日下午派赵思忠（即后来扰害陕甘宁边区的股匪头于赵老五），率骑兵 5 名护送我经环县等地入西峰镇境内。在西峰住两日，后乘汽车回到西安，杨虎城看过南汉宸的复信，表示很满意。说汉宸办事老成练达。

历史证明，南汉宸的分析和论点是符合当时实际演变的。孙殿英久围宁夏两月未下，直到粮尽兵疲，进退维谷，被阎锡山全部缴械。阎红彦拉出来的几个连，因黄河解冻不能去陕北，开进沙漠地区也告失败。1934 年 5 月南汉宸在天津和吉鸿昌一起搞地下活动，曾经多次来信邀我去他那里帮助工作，因我决心要从“当兵”做起，皆婉辞谢绝。以后组织上派王再兴去帮助他工作但是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师益友的关系，即他所说的“同志式的关系”。在延安时期，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一起工作了 5 年。

“爱则兄事，敬则师事”，此心此情，铭记常青。

**注：**①一说为段象武所题写。君，指张良。这里借张良椎秦皇之典故以抒作者激奋之情。

# 从南阳教导队到西安事变

孙 作 宾

## （一）参加南阳教导队

我于 1927 年初在西安省立一中上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 年 9 月，我在杨虎城部新编十四师三旅八团团部当副官，经团部政训员、该团地下党负责人董林哲介绍，在湖北安陆加入中国共产党。嗣后，部队进驻南阳，董林哲又介绍我到《宛南日报》社当记者，并和社长冯异僧（陕西渭南人）、编辑王璋峰（又名王尚德，陕西渭南人）、记者曹鸣九等一起，开展党的秘密工作。

《宛南日报》是杨虎城在南阳办的八开小报。由于这张报纸控制在我党地下组织手里，所以除主要报道部队和地方的一般情况外，也揭露一些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黑暗情形，刊登我党的消息。在报社里，我和曹鸣九住一间房子，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有工作做，如刻印党的文件、传单，与《宛南日报》卷到一起，交邮差寄发。在报社干了两三个月。此时，上海党中央派孙永康来杨部开展兵运工作，他给我们传达了中央对兵运的指示，我们听了都很高兴。孙永康到《宛南日报》社后，与我住在一间房子里。有一次，当我们谈到杨虎城要开办教导队培训干部时，他说：“这是个很有利的机会，我们应该打进去，建立党的组织，借他人炉灶，为自己做饭。”他还一再说服我去孙蔚如身边工作。他说“你是党员，又和孙蔚如有这样好的‘近门’关系，对我们开展工作很有利，为什么不利用来为党工作呢？”当时董林哲也对我说了同样意思的话，还说这是党组织的决定，必须服从。在他们的启示引导下，我打消了到孙蔚如那里去工作会引起人们误会和不

信任的犹豫心情，接受了党组织的分配。

为了打进南阳教导队，我到城西卧龙岗求见孙蔚如，要求去教导队学习。他立即答应，给教导队的教育长李文卿（陕西三原人）写了一个“手谕”，交给我说：“你到教导队学习，不要站在这山看着那山高，不要再胡跑了，要安分守己，世事你还不太懂呢？!”这样，我未经考试，就进了教导队。

南阳教导队的大队长是杨虎城兼任，副大队长是孙蔚如，教官有王亮伯（保定军校毕业）、江伯愚、纪子中、李振西等 10 多人。共有 5 个中队，每个中队有 3 个分队，第一中队长陈志贤（河北人，保定军校毕业），第二中队长赵莘任（党员，山西人），第三中队长王明（党员，河北人），第四中队长张汉民（党员，山西稷山人），第五中队，印象中好像是个宪兵连，队长是谁记不清了。

我被编入第一中队，全队 120 多人，其中有地下党员十三四人，设有秘密支部。书记是曾楚川（又名曾楚云，湖北人）、委员是杜俊杰（陕西米脂人）、岳玉彩（山西人）和我。我还兼党的小组长。党员有席富堂（山西人）、李春藩（陕西宜君人）、常光山（河北人）、汪平（安徽人）、张毓秀、杨国栋（陕西渭南人）等。其他几个中队的党员，我记得的有二中队分队长孙永康，三中队事务长封建，四中队分队长乔启惠（陕西长安人），学员蔡子伟、王统（又名王建三）、王柏栋、王允端、赵成璧等。一中队的党员最少，全大队的党员总数约在百人以上。

教导队中党的活动，开始是通过士兵委员会反对贪污和打骂士兵，进行经济斗争和保护人权斗争，然后逐步向政治斗争和武装兵变引导。在组织发动兵变问题上，当时党内存在着搞与不搞的分歧，发生了争论，遂被大队部发觉，将蔡子伟、赵成璧、孟慎言等开除离队。

为了适应秘密工作需要，党组织要求每个党员广交朋友，建立活动据点。我们把党的同情者李焕卿（西安三桥南何村人）任局长的南阳税务局，变成了“同乡会”，在这里接头联系，掩护党的秘密活动。

1930 年 11 月，杨虎城率部返陕，教导队移驻西安新城。翌年 1 月，学习结业，学员被陆续分配到各部队任职。

## （二）组建十七师军委

1931 年初，我在教导队结业前夕，中共陕西省委派张文华向我传达省委指示，要我在结业后利用同孙蔚如（时任十七师师长）的关系，再回孙部工作，以便在该部尽快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兵运工作。

2 月间，我到三原县城十七师师部报到后，被分配到宣传队。宣传队长是徐梦周，副队长是姚绍芳、张西林（兼组织科长），宣传科长是程士诚、余海丰，总务科长是翁益斋，我和李慕愚、魏斌辉、刘敬业、薛毓英（以上均党员）、陈仁山等是宣传员。

不久，部队开往凤翔。一天，陈仁山告诉我说：“我观察这里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活动，李濂和王宝灵来往密切，约好在王宝灵家开会，酝酿成立个党组织，我也想参加共产党。”陈仁山约我和李慕愚一起去参加，看看他们究竟成立的是什么组织。这次会是在凤翔县城王宝灵家里开的，屋内墙上贴了一张 16 开的列宁像，参加的人有李慕愚、陈仁山、李濂、王宝灵、张鸿绪和我，李濂说：“我们今天开会，是和大家商量成立个共产党的组织，看如何办？”我说：“成立个党的组织很好，没有组织是不行的。”我就有意地问李濂上级组织在哪里？如何与上级取得联系？李濂说：“朱德、毛泽东怎么开展武装斗争，组织队伍搞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当年怎么建立党组织搞革命的，今天我们也就怎么建立党组织搞革命嘛！最要紧的是我们先组织起来，用实际行动去找党组织，相信组织也会找我们的，那就和组织联系上了。”大家听了李濂的话，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有见地，颇感耳目一新。后来才知道李濂是黄埔四期学生，在井冈山根据地参加过武装斗争，曾在王佐那个营里当过连长，还是毛泽东亲自任命的。会后，我和李慕愚商议，认为这次会对我们在十七师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兵运工作至关重要，就尽快向省委作了汇报，请示如何处理。

不久，省委派白耀庭通知我们，同意把这几位同志吸收入党。我们就向李濂、王宝灵、陈仁山、张鸿绪分别作了传达，吸收他们为中共党员。

为了便于同省委联系，并使十七师中党的工作有个统一的领导，我们按照张文华、白耀庭传达的省委指示精神，于 2 月底前后：组成了十七师军委，成员是我和李慕愚、胡振家 3 人，我任书记。

1931 年 6 月，杨虎城命十七师的赵寿山五一旅由凤翔开往汉中驻防。宣传队亦随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归赵旅建制，南赴汉中，一部分仍随师部驻在凤翔。为了适应这一情况，我们经白耀庭请示省委同意，在原军委的基础上分别组建了十七师前方军委和后方军委。前方军委由李慕愚、王宝灵、李濂 3 人组成，李慕愚任书记，随五十一旅行动。后方军委仍由我任书记，成员有胡振家和吕剑人，仍随师部驻在凤翔。

十七师军委和以后的后方军委，除在部队开展兵运工作外，经省委沟通，还同凤翔县地方上的党员、县盐务局长史唯然、县公安局长陈云樵有联系。他们所在的机关是地下党的活动据点，我们和省委之间的联系，都是在这里秘密接头的。

## （三）随营军官训练班

在五十一旅南开前约两个月，十七师在凤翔成立了随营军官训练班，培养连、排干部，全班约 200 人，学习期限 1 年，党在训练班建立了支部，省委确定由吕剑人（当时是学兵）任书记，党员有刘敬业、张毓秀、周铭德、薛毓英、李建新、刘大森、卢松轩、王恩荣、毛云鹏、刘益民等 20 多人。

随营军官训练班由孙蔚如任监督，王伯梁（后为任兰园）任教育长，梁青田任教育主任。班下分两个中队，一中队长武天章，二中队长石冠群。中队之下有 3 个分队，胡振家和我以及党的同情者贾文运、马忠峰、翁益斋等任分队长。

1931 年七八月，随营军官训练班随部队由凤翔开回西安，驻在西营盘

（今机场）。不久，日寇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群情激愤。这时省委派高维汉来和我们联系，要求我们采取各种方式方法着力宣传抗日，在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启蒙工作，发展组织，逐步掌握枪杆子，相机发动兵变，创建苏区。根据省委指示，我们着重做了以下工作：

1、把省委送来的传单，利用出操和打野外的机会，撒到营区周围，或乘夜贴到墙上。士兵看到这些传单，纷纷议论，认为传单上讲的有道理。

2、利用我们担任分队长给士兵上课的机会，宣传党的政策主张，说明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近期目标是一致的，是好朋友，对士兵进行革命启蒙教育。

3、在军队内部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反对打骂和侮辱士兵，反对克扣粮饷，成立士兵伙食委员会，逐步取得士兵对我们的好感和信任，建立深厚友谊，孤立反动军官。

这一阶段我们的活动较为频繁，士兵的抗日爱国意识不断增强，这就引起了个别反动军官对我们的注意。有一天，我正在院子里走着，口袋里还装着一些未撒完的传单，孙蔚如的副官突然把我叫定说：“师长叫你马上去一趟，有要事和你谈。”我想走开，先把身上的传单处理掉再去，但副官紧紧把我拦住，实在无法脱身，只好走进孙的办公室。一见面他就很严肃地说：“有人报告你近来对学兵讲话很左，军队中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在进行活动，你也参加了，不要误入歧途。”我随即反驳说：九一八事变后，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抗日，在士兵中引起了共鸣，认为军人更应该参加抗日。我不是共产党，军队里有没有共产党我不知道！

孙蔚如找我谈话以后，我们军委成员立即作了研究，尽快向省委高维汉作了汇报，请示对策。高指示我们要提高警觉，注意斗争策略、艺术，严防党组织受到破坏。于是我们就要求党员都要严守党的机密，更主动地和士兵、下级军官交朋友，建立私人之间更为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结拜兄弟”。我当时就先后与张西林、马忠峰、贾文运等党的同情者、甚至姚绍芳结拜了“兄弟”。随后不久，我就被调离了军官训练班，到十七师

参谋处任参谋。

## （四）靖远兵变

1931 年 11 月底前后，杨虎城将军派孙蔚如任甘肃省宣慰使，带领十七师由西安开往甘肃，讨伐在政治上倾向吴佩孚的雷中田、高振邦等地方军阀。进驻兰州时，已届年关。孙蔚如即在兰州成立了“甘肃省宣慰使署”，杜斌丞先生担任参议、秘书长。

我随十七师到兰州不久，大约在 1932 年的 1 月底，中共陕西省委派李玉清（山东人，李大个，此时在三十八军军部担任电台台长）同志与我联系，并介绍了常黎夫、马豫章的组织关系。接着我又认识了马济川、邬逸民、吴景鳌等党员同志和党的同情者杜里亭等。

这时，孙蔚如以宣慰使署的名义，任命靖任秋（党员）为组长以及姚绍芳和我 3 人组成点验小组，到靖远县去点验王子元部（王系陕西省靖边县人，原为冯玉祥第七师之残部）。经点验确定该部为旅的建制，改编为“甘肃省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辖一、二、三团，每团下属 3 个营。旅长王子元，副旅长张东皎（党员，陕西省横山县人）。紧接着，孙蔚如又任命姚绍芳为该旅参谋长，任命我为中校参谋主任，李罕言（党员，湖南长沙人）为副官长，王儒林（党员，甘肃省靖远县人）为军法主任兼第二团第一营营长，苏士杰（又名苏醒民，党员，陕西渭南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曾参加过渭华暴动）为教导队长。

不久，陕西省委派王兆卿（陕西神木人）同志来到靖远县找我，在介绍王子元旅中张东皎、李罕言、石子健等同志党的组织关系时说：“这里党的力量是雄厚的。省委要你们以王部为目标，在该旅筹划发动兵变”。王在布置任务的同时，曾多次给我们讲：现在国际上是两个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苏联）世界的尖锐对立；国内是两个政权——蒋介石政权和我们党建立的苏区（中华苏维埃）政权对峙的局面，斗争是很激烈的；加之，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蒋介石实行不抵抗的卖国政策，我

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党在旧军队中的兵运工作要以秘密策划、组织发动兵暴为主要方式，以建立工农红军或工农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迎接革命高潮，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为主要目标。当时根据这种“左”的指导思想，党组织曾作过几次研究，并按照省委指示精神，决定在全旅组织发动兵暴。如王子元不同意举行全旅兵暴，就把他捆起来，由我们带领全旅，北上占领宁夏。

在王子元旅的内部有我党 3 个秘密支部。一个是校官以上的军官支部，李罕言同志担任支部书记，组织上指派我担任支部领导成员，主要负责兵变的策划组织和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军官支部的党员有张东皎、牛化东（团长，陕西省靖边县人）、王儒林、苏士杰、吕善东（又名吕振华，第一团第一营营长，陕北人）等同志。一个是士兵（包括尉官）支部，石子健（排长，陕西省佳县人）同志担任支部书记，党员现在还能记得的有连长杨林（又名杨培育）、杜鸿范（陕西米脂人，机枪连连长，杜斌丞先生的儿子〉，张国威（甘肃靖远人，连长），张秀山（排长，陕西佳县人），教导队分队长常焕章等同志。一个是教导队的特别支部，支部书记是张东皎，副书记是苏醒民。

3 月某日，李罕言同志突然急促地告诉我：张东皎争取王子元发动兵变未成，再加上又派吕振华带领一营部队背着王子元开往定西，王子元即刻翻脸，立即扣押了张东皎，扣押、软禁了王儒林同志。我们得知此事后，经多方面说情、营救，王子元始答应张东皎马上离开靖远县为条件，释放了张东皎；王儒林被软禁在一家商号里，我以旅部参谋主任的身份到商号里和王谈了话，了解到一些具体情况，以叫“王儒林到旅部去一趟”为名，将王儒林送出靖远县城。

王子元解除了张东皎、王儒林同志的武装，不仅使原来确定好的兵变计划落空，而且党组织随时都有遭到破坏的危险。于是，我们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拟把王子元的部队拉出去一部分，单独组建工农红军游击队。同时，按照党组织的决定，我仍以警备第三旅中校参谋主任的合法职务为

掩护，继续留在旅部，侦察动向，收集掌握情报，与组织联系，以配合建立我党的工农红军游击队武装。

据王儒林同志后来多次给我讲：他和张东皎同志被王子元解除武装后，先后到了兰州，联络了杜润滋、谢子长、邬逸民.吴景鳌等许多同志，共同策划在靖远如何插起革命红旗，并很快地行动起来，组织建立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问题。他还说：此时，正值王子元旅机枪连连长杜鸿范同志到兰州接领军装、枪支弹药、军费等。计有军装两千多套，步枪 100 多支，步枪子弹两千多发。这批装备、经费一到手，张东皎、谢子长、杜鸿范、王儒林等同志，雇用皮筏子由黄河水运抵川口上岸，再用驮骡转运到皋兰北山后的同时，召集所属部下近百人，由杜润滋、王儒林同志出面讲话，宣布了起事，脱离王子元要革命，当工农红军，并绕山路渡黄河开到靖远县境内的水泉堡，插起了有镰刀斧头徽号的“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旗帜。

## （五）在陕南与警卫团党的关系

张汉民部党的工作，虽然我未管，但也知道一些情况：当时负责的大约是张明远（在前可能是姜旭初）同志。

1934 年五六月，崔廷儒来汉中，经我和张德生研究决定，派崔到十七路军张汉民团负责地下党组织的士兵工作。

张汉民团有党员、团员 200 多人，而且，从团长张汉民到营、连、排、班的各级干部中，不少都是共产党员。尤其是在革命遭到挫折，白色恐怖严重的时期，不少党员同志因躲避敌特追捕，都来这里隐蔽一个时期，然后再依据斗争形式和党的工作需要派出去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团被誉为“党的干部仓库”是不为过的。因此，崔廷儒被派到张汉民团负责地下党组织的士兵工作后，心情十分愉快。他后来对我说，到张汉民团和那么多党员在一起，还有党组织掌握着装备精良的这支武装力量，干起工作来，实为得力。

## （六）赴陕北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工作并给孙蔚如转交信件的经过

1933 年 10 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成立后，至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爆发前的两年里，为了更有效地开展白区地下党工作，曾先后 4 次派员（第一、三次是渭北工委委员谈国帆，第二次是临时省委秘书长崔廷儒，第四次是临时省委书记高克林、组织部长孙作宾）赴陕北苏区保安（今志丹县）、瓦窑堡，向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罗迈（李维汉）以及李克农、张浩等汇报请示如何开展白区工作（尤其是如何做好争取杨虎城十七路军的工作）问题。现仅将我和高克林同志于 1936 年六七月间赴陕北苏区保安，向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罗迈（李维汉）汇报请示白区工作的情况，与给孙蔚如转交毛泽东信件的经过，简述如下：

1936 年四五月间，在我党组织的发动下，西安地区抗日救亡呼声日益高涨，学生中的两名党员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负责西安地下党组织工作，并与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以下简称临时省委）高克林同志直接发生联系的姚权（又名姚仁夫，韩城人）也被捕自首，致使各学校学生党员和进步学生多人也相继被捕。计有：西安师范的张尚志、常其亚、李进宽、申道达、靳恒洲等，西安二中的柳星明、杨思义等，以及从合阳来西安找姚权的学生党员何邦奎等。这些被捕者被关押在西安五味什字军警联合督察处，后被解往江苏反省院关押；与此同时，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肃反”会，又以共产党嫌疑分子为名，传讯西安师范的陈元方（党员）、雒云舫、毕于仁（陈煦）、蔺克义和西安二中的孟庆珍等多人。致使西安学生中的党组织又遭敌特破坏。临时省委认为，在此危急、险恶时刻，党组织有暴露的危险，并当即决定，高克林同志和我应迅速设法离开西安，赴陕北苏区保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临时省委工作由崔廷儒负责，并要注意隐蔽。

我和高克林同志在赴陕北苏区保安之前，将此行告诉了杜斌丞先生，杜斌丞又很快地将此行转告给孙蔚如。孙当即要杜斌丞转告我说：“孙有

事要和你面谈”。不日，杜斌丞见我，谈了孙蔚如要约我面谈的意图，并高兴地说：“杨虎城先生找共产党，孙蔚如也找共产党，他两人都找共产党，这是好事。”所以，我就去见了孙蔚如。孙蔚如对我说：“……你去陕北苏区，希望能给共产党中央毛泽东先生捎个话，我们十七路军三十八军愿同红军互不侵犯，建立联系，相互合作，共同抗日”。我就向孙蔚如提出：“这很好，希望你能够给毛泽东写一封亲笔信，不然空口无凭”。但孙蔚如一再表示不愿意写信，并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我军驻防汉中时，曾给张国焘写过各驻原防，互不侵犯的信，结果被张国焘在小报上透露了出来，被蒋介石知道了，把我没整死！你是共产党，你给你们的人去汇报，他还能不相信？信我是不能写的，还是口头捎话好！……”我当即向孙蔚如表示：这次我到陕北苏区后，一定要把你所提出的十七路军三十八军与红军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救国主张，向我们党中央汇报。

此时，东北军和红军在陕北前线处于停战状态，并互有代表来往。我和高克林同志在十七路军军法处换上了军装，并通过东北军一〇五师刘多荃师长的关系，由红军代表刘向三同志作向导，从西安坐汽车经富县、延安到安塞。我俩在安塞见到了叶剑英，就向叶剑英说明了赴保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的任务后，便离开安塞到达保安。

我和高克林同志到保安党中央驻地后，首先，我俩向中央组织部长罗迈（李维汉）较为详细地汇报了陕西地下党组织几次遭敌特破坏的情况，以及我们几次组建临时省委，西安中心市委开展斗争的情况。接着，我又单独向中央外交部（即社会调查部长）李克农作了汇报。经李克农安排后对我说：“有关十七路军杨虎城、孙蔚如的政治态度问题，向毛主席汇报；有关兵运工作问题，向周副主席汇报。”李克农还对我说：“中央领导同志的工作很繁忙，你在汇报时，注意不要过多地占用时间。”

大约在 1936 年 7 月底或 8 月初,毛主席在保安的一孔窑洞里接见了我。毛主席亲切地说：“同志们在西安搞党的地下工作，辛苦了！”并让我抽前门牌香烟。首先，我向毛主席汇报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苏

区后，在各地产生的巨大影响与在群众中流传的各种消息；其次，我以临时省委掌握的具体事实，向毛主席汇报了杨虎城十七路军中的高级军官、中级军官、下级军官和士兵中不愿与红军作战，要求抗日的思想情绪时有表现，与杨虎城、孙蔚如等都找我们地下党提出了愿同共产党建立联系，愿同红军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爱国主张与要求，以及十七路军有争取过来的可能性等问题。此时，毛主席高度赞扬了杨虎城、孙蔚如等深明大义的爱国热忱。诚如毛主席于 1936 年 8 月 13 日、9 月 3 日在分别致杨虎城、孙蔚如的信中所说的：“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知先生抗日情殷，愿赋同仇，甚感甚佩。”

当我向毛主席汇报到孙蔚如一再表示不愿意写亲笔信，仅让我向党中央捎口信的原因时，毛主席说：“张国焘的那种做法是不正确的，我们共产党人做事是最讲信用的！”并表示他一定要给孙蔚如先生写回信。接着毛主席询问杨虎城的财产情况，我回答不清楚；毛主席又问我说：“你与孙蔚如是同村，又是本家于，孙蔚如的财产状况你知道吗？”我回答说：“……只知道孙蔚如在农村有 100 多亩地和在西安购置了一些房产，其它财产情况不甚了解。”这时，毛主席很亲切地对我说：“这怎么行？你们搞地下工作的同志，要十分注意做好材料的收集和调查研究工作，以弄清楚他们的财产占有情况，这是分析研究他们政治态度的一个重要依据。”

翌日，在保安的另一座房子里，我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了十七路军特务二团的兵运工作情况。当我汇报到阎揆要同志担任团长的特务二团有同志要组织发动兵变，请求中央指示时，周副主席指示说：“搞兵变，抓几条枪，多几个人好呢？还是不要搞兵变，搭个桥好呢？我看还是搭个桥好！”周副主席这几句话，使我豁然开朗，解开了我多年来搞兵变的思想疙瘩。当我汇报到特务二团有位地下党员连长反映阎揆要同志胆子小，不让部队唱革命歌曲和办宣传墙报时，周副主席当即站了起来，并很严肃地说：“阎揆要同志做得对，我们不能把白军当成红军搞，要那么搞，阎揆要同志的特务二团的团长还当不当了呢？”接着，周副主席又询问了特务二团的情

况。我汇报说：“在特务二团的军官和士兵中，党员人数较多，党的组织比较健全，有相当好的工作基础。”周副主席又询问说：“特务二团的电台掌握在什么人的手中？”我回答：“在我们地下党员手中”。周副主席当即说：“中央将要尽快地派人与阎揆要同志取得联系，并选派机要人员到特务二团负责电台通信工作”。

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对临时省委的这次白区工作情况汇报，非常重视，并采取了相应的确当措施，进行了及时处理。毛主席即于 1936 年 8 月 13 日，分别给杨虎城、杜斌丞写了信，并派张文彬专程赴西安送达外，又于是年 9 月 3 日，给孙蔚如先生写了回信，由李克农交给我在返回西安执行交通员任务时面递。与此同时，中央从红军中选派了机要人员刘克东同志赴西安到阎揆要特务二团搞电台通讯工作。是年 9 月 23 日，周副主席在给阎揆要同志写的信中说：“作宾兄来，道及你的努力，我们无限敬佩。……你的工作，关系极重，应善用现在地位，将〇〇〇（指特务二团）造成〇〇〇（指十七路军）军中的抗日中心力量。为达此任务，应首先在部队中进行政治思想上的统一战线，但不要悬格过高，要以同情抗日为标准。……你尤其不要采取过于受人注意的行动。……余事于电信通后再告。”（见《统一战线要以同情抗日为标准——致阎揆要》《周恩来书信集》第 112 页），中央派汪锋同志专程给阎揆要同志送交了这封信。临行前，周副主席还特地约汪锋同志谈了话，对特务二团党组织在新形势下如何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做了重要指示。

1936 年 10 月，汪锋同志到特务二团驻地白水县后，立即给阎揆要同志转交了周副主席的信。不日，汪锋同志又与临时省委崔廷儒主持召开党员会议，传达了周副主席对特务二团党的工作的重要指示，并建立了由张一平、王国、秋宏、王写剑、杨信等同志组成的特务二团党委会，以开展党的工作活动。

我和高克林同志向中央汇报工作之后，高克林被中央留在陕北苏区，派我担任中央交通员工作。不多天，中央派我返回西安执行任务时，李克

农将毛主席给孙蔚如写的回信交给我，并嘱咐：要将这封信带回西安面交孙蔚如先生。不日，我带着这封信和党中央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等返回西安后，随即与崔廷儒取得联系，在互通情况之后，由崔廷儒负责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分送或散发出去，以广泛宣传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不日，我又返回三十八军军部驻地三原县城，因孙蔚如去西安未回，我就在三原县等候。为了安全稳妥地执行任务起见，就将毛主席致孙蔚如的信，交给九十九团副官毛云鹏（与临时省委有联系的地下党员）同志妥藏，同时，我又将这件事情向军部中校参谋成子慎（地下党员）作了通报。过了两三天，孙蔚如仍未返回军部，我只好从毛云鹏同志处取回信件，返回西安，专程到红阜街孙公馆向孙面交了毛主席给他的回信和《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等，并向孙蔚如转告了毛泽东主席对他提出的“十七路军三十八军愿同红军互不侵犯，建立联系，相互合作，共同抗日”的爱国主张十分称赞。对此，孙蔚如十分高兴。

历史进程表明：毛主席、周副主席于 56 年前所写的上述信件，与我党中央当时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相互映辉，都是党的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它对于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 g 的形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以及全面抗战的掀起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 （七）我所知道的步训班党组织

步训班至少有 3 个党支部。1 个支部的书记是王好勤（即王志仁），他以后到陕北红军工作，在肃反中被杀害了。1 个支部书记叫程天鹏，是由阎揆要特二团调去步训班学习的，以后任过省委交通，在抗战中牺牲了。1 个支部的负责人是李启明。

在步训班，同我联系的共产党员有：纪子中、金闽生、陈云樵、李慕愚、杜俊杰、王志仁、程天鹏、张涛、王思信。

张文舟，中共党员，也在步训班学习过。

*本文第（一）、（二)、（三)、（四）部分系《丹心素裹》所载孙作宾《从参加南阳教导队到西北抗日义勇军》一文；第（五）部分据 I959 年 6 月 9 日孙作宾写给陕西省洋县党史办公室的信和 1991 年 10 月 16 日孙作宾的谈话记录整理；第（六）部分系《陕西地方志通讯》1990 年第 1 期所载孙作宾《我赴陕北苏区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工作与给孙蔚如转交信件的经过》一文第（七）部分为访问记录。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在十七路军中工作*

童陆生

## （一）

1930 年冬，杨虎城部由河南洛阳进驻西安后，把原来宪兵连扩充为宪兵营，为执行对所属部队维持军风纪，任命纪子中为上校副营长，是直接实行职权的人。纪子中是黄埔生，是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来陕潜伏起来，与王世英有单线组织关系，这是我在 1943 年延安时，王世英谈起西安地下党活动时的一段话。纪子中任职日久，身患肺病，对宪兵营执行任务，杨察觉不适合，在 1931 年调金闽生任宪兵营上校副营长。

杨虎城所部十七路部属，基本上是陕西士兵，军官是行伍出身最多，他计划把他部队军官培训成有才能的军官，因此想到准备开办讲武堂。这一想法无疑是为扩大势力之用，在教学方面，就要找教官来任教，1932 年 3 月，我就这样被邀到西安。到达以后安排住在新城南门外交际处，从优招待。但杨干一番事业的想法，由于当时陕西年荒，加之外购军火在上海被扣，内部不愿招徕客人，以免日后成为喧宾夺主之势，遂使杨不得不打消办讲武堂的念头，但他想培养军官的一番希望，仍在继续。因此提出计划办宪兵团。王菊人和金闽生来看望我，提出杨总指挥要办宪兵团一事，请我起草宪兵团编制草案。我接受了这一委托，又问他俩，杨总指挥要办宪兵团是什么作用，有什么具体意见？他俩回答：是为了缩小范围、节约开支，训练部队军官。我按杨的意图，起草了宪兵团编制，杨看后认为符合他的意图。当时因客观环境有些困难，未能见诸实行，但杨有留我之意，这是起草编制的影响。

1932 年秋天，杨不兼任宪兵营长，委任金闽生为营长，我为副营长。

我到宪兵营与金闽生商量几次，定下来先进行制式训练，其后进行了一些战斗射击教练，这是准备兵运暴动之用。

大约过了 1 年时间，训练计划即完成，取得了杨的信任与赞赏，同时也比较熟悉陕西杨部队情况及军政人物关系来龙去脉，遂开始一点文化知识设计，设立图书阅览，订购了一些报刊和军事教练图片，供士兵阅读。

摸清了杨的性格和要求，我才与金闽生提出邀谢华同志来宪兵营工作。谢华由上海来西安是 1932 年初秋，我们决定以书记名义安置，专门教文化课，讲中国历史，“猴子变人”。这就有条件随时接近士兵，不引人注意。谢华来西安，宪兵营从此有上海党中央的直接关系。

为了兵暴设想，我们把射击打把列入训练课程，有理由上报请领子弹并掌握武器威力。经过实弹射击，全部了解了所配步枪射击能力太差，真正应战，是无战斗力的。我们希望能换一批步枪，这问题如何写公文理由上报，深费踌躇，经过一段时间苦想，未能实现。

1935 年党中央向全国发出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我们停止兵运活动，转入抗日救国活动。后来杨调我为十七路军总部参议，成为总部人员，更便于接近杨，宪兵营营副职务，另委谢晋生担任，谢是黄埔学生，是反蒋同情革命的。

## （二）

1933 年 11 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与李济深将军，共同发动福建事变后，杨虎城将军打算在西北和他们配合一同反蒋抗日。他听说我和蔡廷锴的师长邓志才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蔡廷锴的副官长谢东山也是我的朋友，便让我作为他的代表去福建进行联系。当时，杨虎城是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的总指挥，掌握陕西、甘肃两省的军政大权。

1934 年 1 月，福建事变不幸失败后，我经香港取道上海回西安。在上海停留是为的找先我到上海的谢华同志，通过他向党中央汇报，并请示今

后西北革命工作怎样继续开展。党指示我们，抗日救国活动，已成为目前西北地下工作的主要任务。要团结抗日力量，兵运活动相应停止。谢华交给我《全国抗日救国总会宣言》一份，作为和杨虎城将军谈话内容之一。

我到西安后，先和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见面，请他向杨转报我已返陕，并约一汇报赴闽工作的时间。3 天后，王菊人通知我于第二天上午去西安新城见杨面谈。我按时前往，首先报告了十九路军内部被蒋介石以金钱、地位分化瓦解，是福建事变失败的主要原因。接着，我谈了东南抗日救国的浪潮仍是高涨的，并未因福建事变失败而受到影响。现在上海成立了抗日救国总会，并向全国发出宣言。他问到《宣言》的内容，问我是否看到过，表示大为关注。我把带回的那份《宣言》请他看，并说，各地已经响应，纷纷成立抗日救国组织。我还说，西安也在筹备西北抗日救国总会。他问，组织的情况如何。我回答说，正在进行中。我从他的问话表情看，是表示赞许的，是表示默认的。半月之后，杨虎城调委我为十七路军总指挥部上校参议，还在西安《西北文化日报》上报道了这一官方消息。从此，我便按照党的指示，以此公开身份，专心一意地从事西北抗日救国总会的活动。我也意识到，这是杨虎城将军对西安抗日救亡工作的支持。

我这次回西安后，杨虎城将军的少将参谋处长王根僧，接我到他家里去住，他家里有电话，环境、条件都有利于我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我曾电话约请西安《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宋绮云到我处面谈。宋绮云思想进步，有强烈的抗日救国意愿。王根僧是我和金闽生介绍到杨虎城部工作的。我们 3 人的政治见解相同。我便向他们谈了抗日救国在西北的方针、任务，是党中央通过谢华在上海交给我的，谢华和徐彬如两位同志不久也将来西安参加这一活动。我并说，已将这一问题向杨虎城谈过，得到他的默许。我们 3 人商量，先进行一些社交活动。了解各界人士对抗日救国总会的态度和意见，然后再分别作进一步的联系。根据当时的情况，有些抗日救国的公开宣传还不宜公开进行，只能进行地下活动。我提出上海全国抗日救国总会的宣言，应该广为印发扩大影响。他们两人同意这个意见，先请宋

绮云负责在报社油印 300 份，由我和李永林同志利用邮局寄出。第一批先寄给陕甘两省的社会团体、各阶层知名人士和文教机关、学校。虽然当时陕甘是杨虎城的势力范围，邮局内还无国民党特务检查邮件，但为防范未然，我们还是用了多种式样的信封，用了不同笔迹、字体寄发的。这是西北第一次散发全国抗日救国总会的宣言。这一《宣言》，使西北各阶层人民看到了真实的抗日救国的信息，认巧到一个中国人应尽的 k 日救亡的责任。

当时，盛传西安将建为陪都，上海迁来一些商店和餐馆、理发、浴池等服务行业。我们为了开展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地下活动，卑借此机会，把热心爱国救亡、拥护共产党抗日主张的蒋自明从徐州请到西安，请他把他

在徐州开设的西餐馆迁来西安，名为莲湖食堂。此事经宋绮云奔走和集资，还得到杨虎城的支持，很快就在西安莲湖公园里开张了。蒋自明不但善于中西名菜的烹调，而且善于经营，善于设计，他把莲湖公园内的几间平房加以修缮，布置得雅致大方。开张那天，请来西安名流、各界人士，一时嘉宾云集，高朋满座，形成盛会。从此都称蒋自明为“蒋老板”，西安市上赞赏不已，成为古都当时的唯一西餐食堂，不但西安上层军政人员前往定席宴会，外国人也去品尝美味佳肴，这个食堂办得雅俗共赏，就连一些青年学生和一般市民，假日游园后，也在那里休息吃饭。后来，我们党在西安成立办事处，林伯渠同志也常到这里招待客人。

从 1934 年夏到 1935 年春，随着陇海铁路由潼关通到西安，西安市面日渐繁荣，社会上更加复杂，国民党也加紧渗透。西北抗日救国总会为了揭发闰民党反动派与日本帝国主义所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由宋绮云印发了传单，使陕甘各界明白了事态的真相，也更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

不久，徐彬如、李木庵、谢华等同志先后陆续到西安。徐彬如夫妇和李木庵一起住西大街。我为了工作方便，也从东大街的王根僧家搬到西大街。因为房子宽大富余，杨虎城的宪兵营副营长谢晋生，也搬到这里住，

作为对我们的掩护。1936 年春，党中央派张文彬同志来西安，和我们同住一处，就是由谢晋生负责他的安全的。

*本文第（一）部分摘自童陆生《西安兵运》一文；第（二）部分摘自童陆生《杨虎城和西北抗日救国总会》一文。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我在十七路军工作的片断回忆

刘威诚

1924 年，杨虎城部从北山下来驻耀县。1925 年又移驻三原县北城。我当时在杨部李子高旅的骑兵连担任排长。1926 年暑假期间，魏野畴来三原办了一个暑假讲习班，参加的多是学生，炮兵营营副张汉民也常到学习班听讲。

1927 年秋，我骑兵连随李子高副军长驻三原西潭巷，接近二郎庙炮兵营驻地，因之经常和张汉民等见面。8 月，在炮兵营营部由张汉民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上级党的领导是三原县委书记张秉仁（张性初），部队党的负责人是张汉民。张汉民给我的任务之一是发展共产党员。经我秘密发展的党员有张益三（骑兵营营副）、李生林（骑兵营营长）、张志仁（辎重连排长）、范岐山（炮兵营二连连长）等七八人。我被张汉民指派为支部书记，张兼另一支部的书记，党员有谷俊德（炮兵营连长）、李作梁（炮兵营连长）刘宗汉（炮兵营排长）、张奎耀（炮兵营营部军需）、李金铎（炮兵营二连司务长）、贾中瑜（炮兵营排长）、张世泽（炮兵营排长）、刘英三（补充团连长）、刘俊甫（在留守司令部）等。

为了支.援武字区的农民斗争，一天深夜，我和炮二连的党员排长李作梁、谷俊德等七八个人，由炮兵营营部携带了 10 余支枪和部分弹药，经西潭巷上了西城墙，与事前约好的接枪人按口令联络后，把枪支、弹药用绳吊到城墙外，只听到轻微的脚步声，接枪人把东西背走了。

1928 年春，陕西省主席宋哲元下令让副军长李子高把张汉民扣押起来。三原县委书记张秉仁找我，要我和李作梁、谷俊德 3 人组成“军事行动委员会”，举行暴动，首先以武力收缴副军长手枪队和第二师师长姬汇伯卫

队的枪械，营救张汉民，然后将部队拉向三水、淳化山区，与渭华相呼应。经我与张秉仁再三研究，认为当时只能组织两个连的兵力，寡不敌众，且政治保证不足，暴动很难进行。正在此时，通过杨虎城的高参蒙浚僧、韦协度及补充团团长赵寿山，在李子高面前为张汉民说情，使张汉民获释，但受到撤职处分，暴动计划随之停止。

1928 年 4 月，部队移防大荔，我离开了三原，张汉民由雷展如护送回山西原籍。李作梁脱离炮兵营，仍留三原地方 1 工作，不幸于七八月间被反动军队杀害于三原南关，他临刑时，骂不绝口，高呼“共产主义万岁！”“共产党万岁！”至此，第四军支也随之消失。

1328 年冬，部队移防山东。此时中共陕西省委发生变化，组织涣散。一部分党员自寻方便，随留守部队东行或他往，以保安全。如张性初赴上海，雷展如欲行未遂。共产党员董林哲在博山任我团训练员，同孙作宾、王季衡、乔启惠、宋仰山等往来频繁。魏志坚、岳仲人等在我营工作或暂住，王菊人先在我营作客，后到七团工作。

当部队集中临沂地区时，杨虎城由日本回国，米暂沉随行。他们途经上海时和张秉仁（张性初）见面，略谈了我的情况。这是米暂沉对我说的。后来我托米转告杨虎城，说明张汉民被迫归故里的情况，建议他把张叫回部队。杨慨允后，我即函邀张回到部队。杨任命他为第九团一连连长，继又调为杨的随从副官。

部队在山东曾奉命剿办沂蒙山区流动吃大户的贫民队伍。第三旅到莱芜，随孙蔚如旅长的王泰吉参谋初次和我谈过话。在淄博时，董林哲和我朝夕接触；魏志坚、宋仰山、王季衡、乔启惠、孙作宾在我营任排长或司务长。为了保证党的活动，我察知魏志坚与其连长不睦，恐发生事端，遂和王菊人商谈，将魏调走（部队入陕后，魏任骑兵团连长。1932 年红四方面军入陕，魏率一个连起义去迎接红军，中途失败身亡）。

1929 年秋，部队奉蒋介石命调驻河南南阳。此时，蒋、冯军事冲突日趋明朗化。蒋任杨为十四师师长兼南阳守备司令。

杨虎城在南阳重视培养后备干部，成立了教导大队，下设 4 个中队，杨兼大队长，调张汉民等为中队长。在教导队，我们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如吴柏畅、崔启敬、白景琦、李明轩、翟松生、孟浩、祁友珍、刘光智等。这时蒋听松、南汉宸等又重回部队，以参议身份秘密地协助杨工作。

冯钦哉第一旅有一批共产党员。1930 年第一旅手枪连连长张焕民在舞阳率手枪连起义，高举红九军旗帜，打死旅军需主任，打伤参谋主任。行军数日后，被冯钦哉派部队歼灭，张焕民壮烈牺牲。这时我营归姚丹峰旅长指挥，对此一壮举，事前无联系，事后只听到些传闻。当时称为“舞阳兵变”。

在镇平，补充旅有个营长王茂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当过民夫，政治觉悟较高。我有意地和他相识和接近。以后又认识了党员张茂轩、王子勤。该部后期有党员牛子明、呼品一（抗日战争中牺牲）等。

当时南阳地区的政治情况比较复杂，劣绅恶霸当权，地方人民备受压迫，股匪蜂起，我部随时有剿匪任务。但我的做法是有时将其包围，又将其放走。有一股千余人，在北山边盘踞，我只身冒险前去访问，给他们讲些道理。我不愿杀害这些没饭吃的群众，对剿匪任务坚持应付态度。

1935 年 5 月，我由三十八军十七师五十旅九九团三营营长调任陕西警备第一旅第三团团长，至 1 犯 9 年 1 月，在警一旅三团工作了 3 年又 8 个月。

离开三十八军（驻汉中）时，军长孙蔚如给杨虎城写了一封亲笔信，嘱我面呈。我到西安见了杨虎概付军，他看信后很高兴。同我谈话时说：“好吧，你去找韩威西参谋长。”他还问了我们在陕南同红军作战的情况。他说：“汉中战役让王劲哉指挥是错误的，没有全军覆没就是万幸。”他还批评孙蔚如、冯钦哉的部队落后，说今后“一定要学习红军的战斗精神，否则就不能完成当前的任务，更不能在将来去打我们更大的敌人”（指日寇）。5 月 20 日，韩参谋长带我到西安西营房，向三团官兵宣布了我的任职命令。三团是一个新单位，新环境，人事关系复杂，如何才能站稳脚跟、

掌握住部队呢？如何才能开展党的工作呢？这是摆在我面前的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必须兢兢业业，谨慎从事。

警一旅是以刘文伯的独一旅和其它部队为基础，于 1935 年初组建的。旅长唐嗣桐，辖 3 个团，一团团长王俊，二团团长毋润生，三团原来的团长是赵雨晴（我到职后调走）。我到一旅时，唐嗣桐旅长正带着一、二团在陕南山阳一带同红二十五军作战。结果，一、二团损失惨重，唐嗣桐被红军俘虏，二团团长毋润生下落不明。是年 7 月，红二十五军由商洛地区经黑龙口出山，沿秦岭西进，经子午镇时，杀了唐嗣桐，将其头悬在西城门上，使西安受到震惊。不久，一团团长王俊升任旅长，由申及智任一团团长；王子伟任副旅长，后又兼二团团长。

我初到警一旅时，对该部中共地下党的情况也不了解，有哪些党员也不知道。后来知道，我团三营营长任耕三是党员。他比我大几岁，参加过渭华暴动，是位老资格，为人王派，所以我很尊重他，信任俾。但当时并不知他是党员。他也不了解我的政治身份，还生怕我撤掉他的营长职务。后来我们通过张秉仁（张性初，原三原县委书记）才沟通了情况，消除了疑虑。以后我就把许多事情交给他去干。三团团部中尉书记王晓时也是党员。他性格爽直，有文化知识，我提他当了上尉副官，他帮我做了不少工作。后来我又提他当了营附。在西安事变以前的党员还有唐建章（原是营附，后是三团团附）、王警钟（三团二营营附）、沙成轩（高陵人，三团通信排长）、陈省珊（三团通信排副排长）、安子玉（三团排长，后六连连长）等。他们帮我作了许多联共抗日的宣传教育工作。

1935 年 8 月 1 日，我党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正确主张，对杨虎城和西北军、东北军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在杨虎城同我谈话时.也多次指示我对部队要进行抗日救国教育，为抗日作思想准备。杨虎城还通过他的机要秘书米暂沉和王菊人转告我，让我做王俊旅长、孔从周（孔从洲）团长的工作，到十七师作团长们的工作，秘密地进行抗日的准备。1936 年

八九月间，米暂沉打电话，说有重要事情，要我马上到他家里去。我赶到西安莲花池街他家，他从柜子里拿出一本小册子《活路》（这是我地下党员高崇民、刘澜波等同志为了对东北军和西北军进行抗日教育而编印的一种秘密的不定期的刊物）给了我。他说：这是杨主任叫你看的。我马上翻着看了起来，内容都是主张联共抗日，停止内战，批评蒋介石阻挠红军抗日的文章，觉得很好，我就对米暂沉说：这书很好，让我拿回去再好好看看吧。米说：你不能拿走。现在只能让你看。在东北军师以上干部才能看到。你看了也要有个明确的态度。我当即表示，坚决拥护联共抗日，积极搞好部队的抗日救亡宣传，坚决和东北军一起，团结抗日。米暂沉听了很满意，说他一定报告杨主任。

杨虎城将军非常精明，办事十分周密。他不仅交给我对部队进行抗日救亡教育的任务，而且告诉我完成任务的办法。他说/不能事事由你团长出面，我叫暂沉派一个人来帮助你开展工作。这样，万一出了事，我们承担一个“用人不当”的责任就行了，不会引起大的麻烦。西安事变后，十七路军总部果然给我团派来一个少校指导员，就是周至仁，蒲城人，我的同乡同学，是一位老党员，他同党员任耕三、芏晓时、唐建章等互相配合，作了许多抗日宣传工作。例如，给广大官兵教新文字时结合着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还四处张贴抗日标语，给连队教唱抗日爱国歌曲，都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最难办的事情就是同自己的红军作战。我是共产党员，当然不能打红军。但我又是国民党军队的团长，对上司的命令也不能公开抗拒。我的办法是避而不战，追而不击，名为打仗，实为应付。1936 年春，红军七十四师陈先瑞部由涝略出山，沿秦岭西进。十七路军总部令我团和两个骑兵连追击。我以避战为原则，尾追不击，远送红军进入辛口子。1936 年 2 月，毛主席、彭德怀率红军东征抗日。胡宗南、黄杰等部随即东渡山西，进行阻挠，潼关空虚。是时，十七路军总部令我团赴潼关填防。旋又令我团维护西（安）汉（中）公路安全，驻防宝

鸡、凤县、留坝等地。是年八九月间，贺龙、任弼时率我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陕甘边界，占领徽县、两当和凤县等地。杨虎城将“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的命令转发给我：“该团迅即进驻凤县，攻歼凤县、凤岭、双十铺之匪”。我迫不得已，率部队越秦岭，经东河桥、黄牛铺向凤县推进。我在电话上和城内红军守城营长通话，说明我军进军情况，故意虚张声势，泄漏军情。翌晨，守城的红军部队即全部撤至双石铺。我率部进城后即给总部发电，虚报战绩，张学良还复电予以嘉奖。这是我巧妙应付的结果。在此之前，我收到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的来信，说明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我复信说：“我们同为抗日部队，何必自相煎迫，我准备将凤县、宝鸡腾出，让你部接防”等，使红军放心北上。

杨虎城为了用联共抗日的思想教育部队军官，决定筹备十七路军军官训练大队，轮训各级军官。杨虎城兼大队长，赵寿山为大队附，调我和阎揆要等 5 人为中队长。1936 年 12 月初，我接到电令后即动身赴西安，行至周至县时，西安事变爆发了，这一计划也即中止。

**注**：①据张性初回忆：“1927 年春，党派我去三原作县委书记，并指导泾阳、高陵、富平等县的工作。当时三原驻军中有张汉民同志的炮兵营和刘威诚同志的一个连[刘威诚时任骑兵排长]，他们成立了军队支部，归三原县委领导。”

②据李金铎回忆：“1925 年 9 月，杨虎城部教导营第一中队改编为炮兵营张汉民任营副（营长刘光甫），我任二述司务长。1927 年 4 月 1 日经张汉民和谷俊德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汉民令我和谷俊德、李作梁组成 3 人小组在部队党组织领导下发放传单，搞宣传活动。1928 年 3 月，李子高以共产党嫌疑将张汉民撤职，张离开部队返乡以教学为职业。我们受汉民指示继续活动，后李作梁一时不慎，被李子高发觉，6 月 24 日惨遭杀害。”

③今陕西旬邑县。

④据李金铎回忆，杀害时间为 6 月 24 日。

*本文据刘威诚《中国共产党员在十七路军活动情况简述》原稿和刘威诚多次谈话记录整理而成。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张汉民在三原和警卫团中的革命活动*

雷展如

## （一）

张汉民是在1926年杨虎城南下到三原北城时任炮兵营副的。我记得魏野畴在三原讲“马克思主义浅说”和熊文涛讲“社会主义浅说”时，张汉民和刘威诚均到三职学校听讲。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在三职教体育。

1927年10月5日晚，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张秉仁和张汉民到我宿舍，为我入党宣誓举行了仪式。当时张汉民和李作梁负责军委工作，彭淑贞住机关。我任7个县（三原、泾阳、淳化、高陵、富平、耀县、宜君）交通。现将张汉民在三原的革命活动概述于下：

（1）营救县委农运同志。乔国桢同志在三原武字区搞农运，被当地豪绅洛彦福密告给国民党三原驻军田润初，不久乔被田部捕关。汉民受县委指示，以十军军事干部名义，持十军总指挥部公函到田部将乔国桢放出。

（2）汉民在县委军委组织了一个武装组织，有李金元[堉]、李培文、雷展如3人，由炮兵营借了几支枪去武字区捕捉劣绅洛彦福，拟在村边枪决，结果未打死，打伤了。

（3）汉民令寇俊为组长，率李金元[垣]、李培文、雷展如等人去泾阳处决劣绅王普僧，结果只把王的小老婆打死。

（4）为给县委筹措经费，征得黄子文同意，知道自己母亲手头有些钱，故意让汉民派寇俊、李金元[垣]、李培文、雷展如4人组成小组，化装成国民党二十四师（时二十四师一个旅驻三原）的部队去黄子文家中，以黄家“私藏枪支、抵抗筹款”为名，将黄子文捆起来，黄母只好拿出一包现洋和烟土还有1支手枪、100多发子弹。我们走到村外把黄子文放了，将大

烟土和钱交汉民转给党组织。

（5）汉民派卫志毅、刘树谋、田玉国 3 人于 1928 年 1 月 7 日在泾阳塔附近，将田玉洁部政治部主任兼三职校长尹聘三这个反动家伙打死。

（6）尹聘三被打死后，杨鹤庆担任三职校长，我被解聘，组织决定我暂住炮营，名为炮营军事体育教员。不料，十军留守司令李子高接到三原反动派函密控张汉民有共党嫌疑，李子高即将张汉民叫到留守司令部软禁，并撤销了他炮营营副之职。此时，该留守部队奉命全部移防大荔县（即同州），李遂将张汉民释放，令他返回山西老家。因此，我受县委指示陪护汉民。我们抄小路与军队并行，到了大荔。汉民着我见范岐山（炮二连连长），让范去见赵寿山，希望赵能见他。范见了赵寿山，赵同意会见张汉民。赵在会见张汉民时说：“你应立即离开此地，否则对你不利。”张汉民说：“你给我开一个出城路证，好使我通行方便。”赵即开了一个有特殊任务的便衣证明。汉民和我即由大荔东南门出去向朝邑县方向前进，回山西去了。

（7）仅我所知，汉民在杨虎城的部队留守司令部发展了刘俊甫、炮营书记张奎耀、查马长李金铎、排长谷俊德、文书〇〇〇（忘了姓名）、士兵张世泽、刘宗汉等人为共产党员。并在赵寿山补充团发展了刘英三、杨致中、赵硕龄、骑兵连排长刘威诚、中山军事学校学员吴岱峰等人为共产党员。

## （二）

1930 年杨虎城率部入陕，我的入党监誓人张汉民同志亦随杨入陕，任杨部教导队的大队长。我进城去找张汉民同志，经介绍在警训班学习，结业后分到周至县公安局当局员。我因奉命剿匪时就地处决匪首而被扣押在县监狱里。

不久，汉民的教导队改编为卫士营，以四大队学员为骨干，并由一大队调来孟慎言、刘广机、岳仲仁、陈怀章。共编了 10 个大连。当时王超北

当军需主任，姜述平当军需，袁符谦当军医主任。史唯然也到了卫士营，不久，卫士营扩编为省政府警卫团。

1932 年 11 月，红四方面军入陕，由张汉民任团长的陕西省政府警卫团奉命追击红四方面军。警卫团经周至县时，张汉民获悉我押在该县监狱里。便亲自派白景琦到县政府将我营救出狱，并先任命为副官，1933 年在勉县整编时，又改任通讯排长。当部队行至眉县时，张性初同志带来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立即派人去和红四方面军联系。请示今后陕西省委的工作，是与上海中央取得联系，还是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性初向汉民询问，汉民即说我已出狱，遂派我去联系。到上元观住在红四方面军总部的特务营，几位领导接见我说，目前红军要入川，待有了根据地再确定联系。现在要求给红军一份五万分之一的四川地图。当时红军给我 20 块现大洋和 1 块大烟土。1932 年 12 月 18 日我回到部队，向张汉民同志作了汇报。不久，汉民派张含辉同志前去川北将地图送给红四方面军。

1932 年 12 月，在汉中张汉民与陕南特委书记老侯（孟芳洲）接上关系，同时恢复了我的组织关系。继之汉民又与梁五峰、陈潜伦、李艮、王燮等同志以及南中、五师、五中的进步师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还同徐梦周（孙蔚如的秘书主任）、李金元（电台主任）、孙作宾、张世俊（一〇五团）、刘威诚（补充旅三团、营长）等同志也有密切来往。

汉民在汉中与胡宗南的部队进行了斗争。警卫团驻防二郎坝时，处决了策划马儿岩事变的城固鼓楼坝区区长，为被杀害的陕南特委和红二十九军负责人报了仇。

1933 年夏，陕南特委派老吕[吕雪影]传达特委指示：着即在部队开展组织建设。于是警卫团立即成立了支部，支部书记由雷展如担任。翟松生（特务连连长）为组织委员，李明轩（连长）为宣传委员。支部设党小组：团部和直属队小组组长刘子义（在特务连），一营小组组长先由刘珍如（任一营三连排长），后，刘回河南，继由石玉杰任组长，二营小组组长姜汉儒（时任二营四连排长），三营小组组长李明轩兼，初步建立了支部。人

事调整由张汉民、张含辉、雷展如商定；阎揆要同志在西安治病，其副团长职务由西安调来的魏节林接任；第一营营长董耀先调为少校团副，由第一连连长崔启敬接任一营长；二营营长保持原来孙建功的职务；三营营长樊亮臣经申报批准调出警卫团，先由李明轩代理营长职务，后阎揆要同志回部接任。

不久，部队调驻勉县，驻地分散。警卫团改为十七师补充团。支部和小组有所变动，石玉杰（时任二连连长）接任刘珍的党小组长，翟松生（连长）接任李明轩的党小组长。

在此期间组织有所发展。团部党小组发展了何秦州（医务所军医）、侯书铭（卫生员）、魏含英（卫生员），特务连发展了袁致亮（排长）、秋含章（班长）、冯志云（班长）。另外发展了郭明馨（二营四连排长）、阎杰（三营七连排长）、阎叶东（八连排长）、祁友珍（九连）、赵瑶峰（机三连长）、贾存信（机一连排长）。

部队移防勉县后，游击队第三大队和十大队合并，拟到川陕交界的黎坪建立革命根据地，经元墩子时遭该地反动民团的暗算，负责人和几十名队员被杀害，剩下 10 多名队员被扣押。汉民得到消息后，派特务连一个排，以奉十七师命令来押解游击队负责人的名义把游击队员和民团头子带回团部。将民团头子处决，把游击队员释放，并把民团解散。

1933 年底党支部改组，我仍任支书，史唯然任组织委员，李明轩任宣传委员，翟松生任保卫委员。不几天，汉民派史唯然和我处决游击队第三大队中的一个叛徒（姓魏）。不久又护送特委派来的李金元[垣]和军委负责人老吕去红四方面军，后处决了叛徒杨庚。

1935 年初警三旅成立，汉民升任旅长。党支部工作由张明远负责。阎揆要任团长，魏书林仍为副团长，崔启敬、白景琦、李明轩分任一、二、三营营长。

1935 年 4 月在九间房警三旅与红二十五军发生战斗，原因之一是对红军逼得太紧，这与张汉民同志急欲邀功有关，同时也与他的主观决定、欠

缺采纳别人可取的意见有关系。

另外，还有一件事。1933 年夏，警卫团移防十八里铺，陕南特委派川刘（刘明达）同志来，给北山游击队要枪枝弹药。警卫团遂派部队开赴洋县，命令进行军事演习。遂派一个排在演习后休息，下河洗浴，将服装脱掉，枪弹都放在原地未动。其时正是入暮之后，即有事先隐蔽好的游击队便衣，将 30 支步枪和 3000 发子弹等全部带入树林而去。这样，为游击队安全地送了军火。

**注：**①孟滇言，即孟浩。

*本文第（一）部分据雷展如 1979 年 8 月 17 日写的《张汉民同志生前革命事迹回忆》一文整理；第（二）部分据雷展如 1984 年 7 月所写的《关于我党在西北军十七路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和我党在这个军队中建立组织和发展革命力量的点滴回忆》、《关于陕南地下党有关情况回忆》、《张汉民同志生前革命事迹回忆》等文整理。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西安事变前我在十七路军的主要工作经历

陈云樵

1925 年 8 月下旬，我和同学张遇时、田守信带着媿野畴给中共地下党员吕佑乾的一封信到了耀县，成了三民军官学校的学生。在学校里，吕佑乾经常找我谈话，给我革命书刊，给我分配任务，向我了解同学的思想动态。

1926 年 4 月，直系军阀派镇嵩军刘镇华围攻西安。杨虎城将军率部驰援，令三民军官学校选组一中叭学生，赶赴西安守城。吕佑乾同志抽调我参加，并让我负责沿途宣传工作。这年 6 月 27 日，吕教官将我叫到他的住处，以十分庄重的语气对我说：“经过长时间对你的培养考验，党组织研究由魏先生和我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万分激动，原来魏先生和吕教官都是共产党人。

就我所知，三民军官学校同学当时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有：陈云樵（兴平人）、魏[卫]志毅（泾阳人）、张振河（三原人）、李维翰（武功人）、白怀德（扶风人）、李德兴（渭南人）。

西安反围城斗争旷日持久，艰苦异常。魏先生一面协助杨虎城将军团结友军李虎臣、卫定一两部奋勇守城；一面领导党员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发动各界人士坚持斗争，为了解救危城，组织决定魏先生出城求援。

1926 年 12 月，于右任的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移住西安，魏先生被任命为政治部副部长、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省党部宣传部长等职，参加党政军各项领导工作。1927 年 1、2 月间，为了适应大革命的需要，为党培养一批军事政治干部，先生又在南教场（现报恩寺街小学）外主办了政治队。学员是由各地推荐的党团员和进步青年近百人。调杨虎城部炮兵营营副张汉民

为队长。与张汉民同来的有进步军官吴岱峰、李作梁、贾中瑜、曹力如等，他们学习不久，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我也参加了政治队学习，和吴岱峰、贾中瑜分任区队长。

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冯蒋合流，陕西形势恶化，党的工作重点马上转向军运、农运方面来，省委书记耿剑白（耿炳光）分配我到渭北地区搞农民武装。当时杨虎城部为了对抗冯玉祥并吞，转移河南马牧集、砀山一带，魏野畴同志任该政治部主任。10 月的一天，省委通知我速回西安。到了西安，耿烦光同志对我说：“党在部队中要加强工作，杨虎城部急需要人，省委决定派你去豫东杨部找特委书记魏野畴同志分配工作。”我听了十分高兴，因为魏野畴是我的老师，又是我入党介绍人。我与吴岱峰同志带上陕西省委给河南省委和魏野畴同志的信，以及冯玉祥发行的流通券和一部分现洋作路费就出发了^路上先用现洋，到河南境内时，流通券作废了，我们断了盘费，靠卖衣物才到郑州。吴岱峰遇见朋友便留在郑州工作，我只身于 11 月份到了开封，见到了当时河南省委的雷晋笙和交通员安子翰（安子文）。我和省委接头后，得知杨部已撤至皖北太和。我把文件放入箱子夹底里，绕道漯河、周口、界首，于年底到达太和。

到达太和后，我把文件及信交给了魏野畴同志。他担任杨部政治处长，在党内是特委书记兼组织委员，蒋听松任秘书长，南汉宸任宣传委员。南是受鹿钟麟的派遣，来说服杨部不要脱离冯玉祥而被留下的，担任军事干部学校校长，郭乐三是组织科长，高锦亮（高敏夫）任宣传科长，我担任社会科长，在党内我任特委组织干事兼直属支部书记，成员有曹力如、高锦亮、杜宗美等同志。支部开过 3 次会，有一次会议是在一个磨刀人家开的。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组织交给的任务是进行士兵运动，分配具体任务，反复考虑，发展党的组织。在太和城里有 7 个炮兵连、一个手枪连，是我们工作的对象。

1928 年 1 月，党中央送来一批文件，需向豫陕省委转送，因无合适人员，特委书记魏野畴同志找我谈话，亲切地说：“送中央文件很重要，完

成这一艰巨任务是党组织对你的考验，要勇敢机智。特委任命你为中央和豫陕交通员，你要克服一切困难，完成这一光荣任务！”我当即表示坚决完成。于是就将这批文件和另一批须通过河南省委转送中央的重要文件交给了我。我提了一只木箱，坐一辆木轮车，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河南省委驻地开封。我将分送给河南省委的八七会议文件和皖北特委转送中央的重要文件，交给了省委交通主任安子文同志。又赶赴陕西将文件交给潘自力同志。约在 3 月底，完成任务后，我返回皖北，途经河南省委时，又接到中央经河南省委转送给皖北特委的重要文件。

这段时间里，皖北形势突变，杨虎城将军被迫出国，参谋长孙蔚如代理军务。由于叛徒告密，杨部实行“清党”，皖北特委决定迁至阜阳。南汉宸去开封工作，蒋听松去亳县领导党的地下活动。我到太和找不到特委机关，在我同乡程清舟（特务营副营长）处住了一晚。第二天见到申明甫、胡怀西两同志，他们是受魏野畴的指派，专程来接我的。我们当天到了阜阳，把这一重要文件交给了魏野畴同志。

来阜阳后，我和魏野畴同志住在一间屋里，同睡一张床，经常听到魏野畴同志对阜阳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和他所作的社会调查。他根据行流、王官、插花等地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的形势，和中央的指示，决定发起皖北农民大暴动。我跟随魏野畴同志夜以继日地做暴动前的准备工作。这年 4 月初，正当暴动即将发动时，中央又送来一大批文件。皖北特委仍派我负责转送。我思想不通，坚决要求留下参加暴动，并强调我是学军事的，暴动需要我。当时针对我的思想，魏野畴同志严肃地指出：

“暴动需要你，但各地党组织更需要中央指示，这是大局，暴动是局部，局部要服从全局。”服从组织是党的原则，我接受了任务，就带着文件离开阜阳去亳县。蒋听松是亳县县委书记，文件送到白布大街一家商店再转交给蒋听松同志。到河南把文件送给安子文后，见到南汉宸。那时他任河南民政厅秘书主任代理厅长，他交给我 500 本鹿钟麟署名的《苏联考察记》，叫我带往陕西沿途散发。我赴西安将文件交给陕西省委书记潘自

力同志，但他不放我走，要我住在省委交通站待命。我因急待赶回皖化参加暴动，再三推辞，潘自力拿着省委连夜翻印的文件对我说，西安城防很严，实在派不出合适的人。我无奈接受了任务，先后赴临潼、渭南、蒲城、富平、三原等县，约半月，将文件都送完毕。我赶回西安，见到潘自力同志，他沉痛地告诉我说：皖北暴动失败了，魏野畴遇难。我听了如晴天霹雳，放声大哭。皖北不能去，省委决定我担任陕西省委交通主任。我带着深沉的悲痛和悼念，又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去。

1928 年 7 月初，省委任命我为西路巡视员兼兴平县委书记，我即在周至、兴平、武功、扶风一带搞农运。1930 年 3 月省委又派我到渭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渭北游击队，9 月间失败后，省委又派我到上海向中央请示汇报工作。1931 年 3 月，我遵照省委吉国桢等人指示，通过南汉宸进入十七路军工作，先任凤翔县公安局长，后任政治巡视员，于 1932 年 3 月到王德修营视察工作，改选营党委，任习仲勋为营委书记。1932 年 5 月，南汉宸又派我到甘肃邓宝珊的军官大队，后搞蒿店兵变失败被捕。1933 年 3 月与孙作宾一起到靖远整顿组织被捕，后回到西安。南又派我到千阳、陇县组织千陇民团，7 月组织中共西府临时特委，不久，又遭逮捕。直到 1934 年夏，我经营救，从西安绥署军法处看守所出来，杨虎城将军派我到他兼主任的绥署步兵训练班，任少校教育副官。先后与王超北、孙作宾同志建立中共地下组织关系。因杨将军对我的政治身份知道得很清楚，我到职后，杨第一次召我谈话，他说：步兵训练班的人事很复杂，你知道我把你派去的用意吗？我说：报告主任，我知道！杨又问我：你和威西（韩威西当时是绥署参谋长）熟不熟？我说：不认识。杨说：他是你乡党，你怎么还不认识，以后要常接触，有好处。继又问我：你乡党张廷锺你熟不熟？我说：报告主任，他是个特务！杨用手拍着桌子说：“胡说！”但又说：“你知道就是了，以后不要再胡说。”我初到步训班时，杨将军兼任班主任，金闽生为教育主任，孟庆鹏为总队长，我们教育处还有袁鉴吾、陈璧如、强鹏举、窦明海、田克勤、刘俊佩、张正伸、关志超等。除袁外，其他均系

黄埔九期学生。教育处主要任务是搞每期教育规划，每周军事政治教育进度表并筹办保管教育器材，监察教育实施情况和与军事政治教官联系教育进度情况，也管教官请假及总结报告等事宜。班部以下设军官 3 个中队：一中队长赵国珍，二中队长谢济民，三中队长黄宗佑；军事教导队 4 个中队，中队长分别由殷义盛、焦义秋、张希文和一个姓宁的担任。还有迫击炮队队长张希钦，通讯队长李子健，骑兵队长孚日新。当时还成立了学生队，队长宋文梅，副队长张希钦。军士队结业后，大部分干部编入教导营。

当时步训班没有党组织。和我经常配合工作的有：学生队学员常黎夫，他过去和我在兰州搞地下党工作时相识。王超北恢复我的组织关系后，我问常是否找到组织关系。常说：已和陕北来省委的朱侠父取得联系。军官队区队长李慕愚，我们长期在一起搞地下工作。1935 年的一天，杨虎城将军召我去他的办公室，见面就问我：步训班有个李慕愚你知道吗？我说：知道，他是军官队的区队长。杨又突然问我：他是不是共产党？我即说：他过去是共产党，但我相信他是绝对拥护主任的。杨随说：你去！我出门后，内心非常震惊，久久不能安眠。总想：如果慕愚被捕甚或杀害，那我不就成了出卖同志的叛徒吗！罪在不赦！又想，杨将军明知我是共产党，为什么又录用我呢？我狐疑不定。几日后，忽然见慕愚同志被调为杨将军的侍从副官，我才放下了心，但一直不敢向人谈这一件事情。当时杨永昶在汉中工作，被敌追捕逃至西安，孙作宾同志让我设法安置。我先令在军官补习大队当文书，后派教导营去搞军运工作。

步训班虽然没有建立党的组织，但也和过去知道是党员的同志往来密切，无话不谈，交流情报，传达党的政策。配合工作的有军官队区队长张子正、杜俊杰、王汝昭、何永安、李醒吾、张希文等同志。学生队长宋文梅、张希钦，党员杜陕山、刘侠僧、上官克勤等，职工有许慨然。教官贾振中、中队长赵国珍也曾参加过党的组织，我们虽有来往，但关系平淡。

1936 年西安事变时，我在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任少校教育副官兼总部军官补习大队大队长。该大队有学员 100 多名，临时编了 3 个区队，

区队长是孙子杰、张子芳、侯树敏，大队部文书杨永昶，他和我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在西安事变中，我经历了这样几件事情：

（一）1936 年 12 月 12 日 1 时许，西安绥署参谋长李兴中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当时绥署教导营长李振西在座），命令我带着军官补习大队配合教导营攻打蒋系公秉藩的“剿匪别动支队”（住七贤庄）。我和李振西研究，由教导营主攻，我们在新城北门外集中作为预备队。教导营战斗力强，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把敌人全部解决了，我们大队没有投入战斗。

（二）I2 月 12 日上午 6 时左右，指挥部又令我率军官补习大队 80 多人，攻占东大街公安局第一分局。我率队赶到时敌人已逃跑一空，扔下了十几支步枪。当时赵寿山旅长担任新的西安公安局局长，他令我兼任公安第一分局局长，负责维持钟楼至东城门一带的社会秩序，我即把部队编了几个班轮流站岗和巡逻，维持秩序。

（三）12 月 12 日上午 7 时许，杨虎城将军派人通知我捧去他的新城公馆。我去后看到杨虎城和张学良将军都 k 那里，还有东北军一个大个子上校军官。我向张、杨敬礼后，杨虎城将军对我说：听说在北城门上咱们的部队同东北军弟兄发生了误会，现派你代表我去北门向咱们的部队说明，东北军是我们自己人，绝对不能发生误会；派他（指东北军大个子上校军官）代表张副司令去向东北军说明，千万不要发生误会。张学良将军说，就是这个任务，你们赶快去办。我 2 人马上乘车到了北门。一看，果然城门紧闭，城墙上十七路军的部队戒备森严，把轻重机枪都架起来了，如临大敌。我即向守城的营长陈应宝了解情况。他说：“我们没有接到有部队进城的命令，东北军硬要进城，我们不让进，他们彭指挥部队象要开火的样子。”我就给营长传达了杨主任的指示，并让东北军大个子军官在城墙上向东北军喊话，传达了张副司令的指示，这场误会就顺利解决了。

（四）蒋介石被抓起来之后，杨虎城即兼任了陕西省保安司令，由绥署高参韩威西代理工作，并派我兼任保安司令部第一科科长。为了整顿各县保安大队，增强抗日力量，我利用司令部科长这一合法身份，推荐中共

党员康泰担任了礼泉县保安大队长，推荐进步青年董鸿璋、孙文祥为咸阳县和紫阳县保安大队投。还根据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孙作宾同志的意见，安排中共党员冯幼青为视察员，到乾县一带视察，完成了党交给他的特殊任务，增强了抗日力量，推动了党的工作。

（五）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中，以山西阎锡山代表名义来到西安的张慕陶，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极力主张杀蒋，企图挑起战争，同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相对抗。释放蒋介石回南京后，某天我到杨虎城机要秘书周梵伯办公室办事，进门后见南汉宸、许权中、宋文梅等七八个人在座，张慕陶见我进来还主动同我握手问好。然后大发谬论，极力主张同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作战，企图重新燃起战火，反对我党中央和平方针。我坐在一边也未言语。我们从周的办公室出来后，南汉宸同志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云樵，我们要坚持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以达到停止内战，团结一致抗日的目的。张慕陶的谬论是反对党中央主张的，你要提高警惕，而且还要给同志们作解释，不要上当。南汉宸同志的指点，使我更认清了张慕陶的极“左”面目及其危害性。

（六）1937 年 5 月间，在杨虎城被蒋介石逼迫出国考察前，在他的新城公馆分别召见西安绥署的主要军官。某日上午令我晋见。我见了杨主任，行了军礼，情不自禁地眼泪夺眶而出。我说：“杨主任，蒋介石是个流氓，翻脸不认人，你还是不要离开部队，不要出国好。”杨主任严肃而激愤地说；“云樵，你不要难过，我们这次举行兵谏，是为了转变国策，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挽救民族危机。只要能实现全国统一抗战，挽救了国家民族，就是把我个人牺牲了，我认为都是值得的，是有意义的。”

杨主任的慷慨愤言，充分地表现了他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而不惜牺牲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使我永远难忘。

# 西安事变前我在十七路军中的主要活动

阎维良

我于1928年在南阳经刘福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南阳城内省立第五中学做学运工作。当时五中组织有党小组，受南阳特委直接领导。主要活动是在同学中宣传共产主义和革命道理，争取和团结群众，扩大革命组织，联合进步同学向校内国民党改组派进行斗争。

1930年1月，五中放寒假，校方无理开除张音韶、阎受本（均党员）等名学生。经向特委汇报，特委指示趁机发动学潮。在这次斗争中，校长党子尚勾结驻军新十四师军法处执法队，逮捕了我和郭竹迎、吴玉田、阎受宽、时玉玲5名党员，送押南阳县监狱。后经组织营救，由南阳县长陈子坚出面，以学生互相攻击为由将我们释放。

1929年秋，疡虎城部新编+四师为培养军事骨干，在南阳城内城隍庙筹办南阳教导队。我们被释放后，南阳特委派我和郭竹迎、吴玉田、刘玉堂等人考入南阳教导队当学兵，做军运工作。

我考入教导队后，被编到第二中队当学生。1930年初，继新编十四师建立特委后，南阳教导队也在南阳盐店街女中对面赵莘任家的大院里，召开党员大会，建立了南阳教导队军委会。赵莘任任书记，委员有王明、孙永康（当时还是师特委委员）、董林哲（师特委宣委）、曾楚川（又名曾楚云，第一中队学员）。当时军委会人员是分工开展工作，各联系各的，各发展各的对象，不发生横的关系。主要任务是发展士兵党员，帮助地方党工作。

在军委会领导下，南阳教导队的4个中队建立了4个党支部。第二中队党支部书记是孙永康，张海慧任宣委，我是组织委员。孙永康和中央派来的白玉文去叶县组织兵变后，支部书记改由张海慧担任。党员有赵莘任

（二中队长）、孙永康（二中队区队长）、拜侠（二中队司务长）、张海慧、王允端（王璋峰的儿子，渭南赤水人）、王志远（赤水人，参加过渭华暴动）、高冠武（米脂人）、李慕汉、阎嗣宏（南阳人）、李天祥（大荔人）、张振峰（南阳人）、吉治民（山西人）、侯孝荣（咸阳人）和我。后来发展的党员有王柏栋（商县龙驹寨人）、罗喜成（南阳人）、周景辉、周玉庆、翟万春（华县人）、雷积山（山西人）。

为了开展革命活动，适应当时环境，南阳特委为提高地下党员斗争能力，举办了技术训练班。由南阳特委书记郝久亭亲自主持，并亲自任教和示范。南阳教导队军委会派往受训的有第二中队党支部的王志远、阎嗣宏和我，第三中队党支部的张鸿绪、郭竹迎和刘玉堂。学习内容主要是：工作方法、接头联系、通讯联络、传递文件、粘贴标语、散发传单、对敌侦察、摆脱跟踪、遇险自救等。采取各个教育。

1930 年夏，中央两次派曹鸣九和白玉文来南阳策动兵变。部队特委研究决定，由董林哲和孙永康负责组织。7 月兵变失败，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特委冯异僧、董林哲、石仲伟等被南阳守备司令部派车送往登封前方；赵莘任、王明被扣押到方城，最后被迫离去；教导队党员蔡子伟、郭竹迎、吴玉田等 12 人被开除。

南阳教导队党组织遭到破坏后，曾楚川主动负起领导重担。

1930 年冬，杨虎城十七路军入陕，南阳教导队在西安举行毕业典礼，我和共产党员王志远、李金山、王允端、雷积山、吉治民、侯孝荣、翟万春、高冠武、周玉庆、李天祥、周锦辉等，由教导队分配到陕西警备师任职，由阎维良负责与这些党员分别联系，受曾楚川直接领导，任务是宣传共产主义，以士兵为主发展组织。后来因驻地面大，党员分散，上级指示由阎维良、王志远、李金山 3 人组成小组，分工联系党员，对上请示汇报，对下指导工作。小组定期开会研究工作。

1932 年初杨虎城为了绥靖陇南，命警备师进军陇南，赶走了占据陇南的马锡武部，然后进驻天水，师部和直属部队特务连、骑兵连、辎重营、

工兵营以及韩寅生旅部、周公甫四团均驻天水城内，陈养虚旅驻成县，毕梅轩补充团驻泰安。

1932 年 3 月，上级又把师部参谋张天辉（又名张廷奎，湖北人）和焦金凯 2 人的党组织关系转交我们。我们根据省委指示，成立了中共陕西警备师支部，选我为支部书记，王志远为宣传委员，张天辉为组织委员。由于张天辉在参谋处，经常去西安绥署，决定由他兼任交通，与省委军委直接联系。我们的任务是以反对打骂找育，提倡经济公开来提高士兵觉悟，在士兵中发展组织，准备兵变。

1932 年五六月间，我们决定以党员为骨干，以第四团周锦辉连以及骑兵连李金山排、辎重营翟万春排为主，以演习为名，到西关大操场集中，把队伍拉到两当一带建立根据地。行动时，因驻地分散，队伍没有按时集合起来，临时决定翟万春一个排先行动，第二天为营长法宝增发觉，立即带兵追击，起义队伍被打散。

9 月，马青苑师长发动“天水事变”，叛杨投蒋。我当时因支持陈养虚而被捕，押天水监狱，后经南阳教导队同学杨健、司海安、张叔铭等一再向马求情，在马撤离天水时才将我释放。天水事变平定后，杨虎城派韩世本在天水办理善后，并接任警备师师长，他送我去南京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第一期学习。

1932 年冬我到步训班第二期第二中队充当区队长，在第三期开学后被调到绥署教导营当连长。在步训班期间通过各方关系，我知道第二期时党员有：班部的陈云樵，在一中队有区队长杜俊杰（他是我南阳教导队的同学，在南阳时有过关系），机枪队区队长王诗讯（建国后没有交待过他参加过组织）。在学员里：第一中队学员有张子正、卢松轩（卢劲节）、刘侠僧；二中队学员有王汝昭、李醒吾、何永安，机枪队学员有李慕愚（在三期时留队任区队长）。学员里的党员，大部分来自在滑华暴动后流散在安康张鸿远部警备二旅所保送。由于我在“天水事变”后还没有接上关系，先一段班里的组织活动情况我不了解，后来由于杜衡的叛变，军委曾楚川

的牺牲，据说有些人当时也失掉联系。据检俊杰对我说：在步训班二期时党的组织活动多是单线联系，曾楚川牺牲后他也没有找到组织。

在教导队的组织活动，由于当时军官、士兵组织领导是分开的，我只知道在教导队的学生里也有很多党员：薛蔚、白頊、阎启民、王清萤、赵怀璧等。

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自 1932 年春创办，共办 5 期。杨虎城将军在班部兼班主任。第一期的副主任是姚国俊；第二期副主任是邹桂五；到三、四期换为金闽生。孟庆鹏是步训班教育主任，陈云樵在班部担任教育副官。宋绮云、陈子坚、米暂沉、郭则沉、苏资琛先后都在步训班担任过政治教官。

步训班分为军官队和教导队（学生队），军官队有 3 个中队，第一中队中队长赵国珍；第二中队中队长谢济民；机枪队队长黄宗佑。在第四期时增设一个学生队、一个步炮队，一个通讯队。所属教导队有 3 个连，第一连连长殷义盛；第三连连长刘卓云；机枪连连长宁安滋。军官队的学员系由部队分期分批抽调的下级军官轮训；教导队的学生大多来自从社会上招收的中小学学生，也有一些是私人所介绍，他们没有毕业期限，按部队需要随时调拨充实基层。

1934 年，我调到了十七路军教导营。

十七路军教导营是由跟随杨虎城将军多年的警卫队——手枪营改编而成，时在 1934 年夏初。调西安绥靖公署参谋处中校参谋李振西为营长、少校参谋杨维新为营附，共有 4 个连、一个装甲车队。教导营的任务，是担任十七路军总指挥部和西安绥靖公署的安全警卫，培训军事骨干，为基层部队输送新生力量，同时担任迎来送往的仪仗队。第一、二连为手枪连，第三、四连为步兵连，各连各班均配捷克式轻机枪一挺，装甲车队有装甲车 1 辆，各固定重机枪 1 挺。教导营全营驻新城。

由于教导营是杨虎城将军的近卫部队，杨将军经常集合全营官兵讲话，亲自点名，通过点名问话，熟悉官佐士兵，建立感情。教导营有专职政治

教员，杨有时还让他的秘书亲自给二兵上课，加强军事政治教育。

1931 年，我调到教导营后，和政治文化教员王岳清（又名王一东）接上党组织关系。他和南汉宸、成于慎、董林哲都是山西人，经常有联系，他原在张北抗日同盟军，同盟军失败后回到西安，受宋绮云领导王岳清给我的任务是：一、为党搜集情报；二、掩护共产党员安全（他向我介绍了当时教导营的党员情况，一再叮咛我不要暴露身份）。这样我在教导营期间，虽了解营里党员情况，但互相之间除一般交谈外，没有过组织上的联系。当时党在西安组织的反蒋抗日游行、请愿等活动，王岳清总事前通知我时间、地点及路线，指示我暗中保护群众。有一次学联组织的学生在南院门请愿，王岳清和我都是提前赶到南院门在等待。记得当正学街三联书店被国民党查封前，我接到王岳清指示，立即雇车到正学街把书店所存的党的内部书刊全部抢运出来，先藏在大皮院一号王岳清家，后来又转移到柏树林成子慎家，使一批重要书刊保存下来。

那时教导营的共产党员有王岳清、阎启民、张希文、薛蔚、白琨、赵怀璧、王清莹等。以后省委派杨正人（又名杨永昶）到教导营工作，党组织不断壮大。

“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特派绥署参谋处处长、中共西北特支成员王根僧到教导营代行指挥。

1936 年 12 月 11 日晚，王根僧集合教导营全体官兵，阐明兵谏大义，动员官兵积极参加战斗，并亲自检查各连武器装备，及时补充了弹药，给各连分配了任务：

第一连担任绥署大门、杨公馆外围、新城大楼及绥署内部警卫。

第二连担任新城南门、西门和西南城墙的警戒。

第三连担任东门、北门和东西城墙的警戒。

第四连为预备队。

装甲车队担任巡逻任务。

12 月 12 日晨，一连奉命肃清了驻七贤庄之公秉藩别动队，第三、四连

夹击革命公园内两队警察，俘 49 人，缴获轻机枪 6 挺、步枪 124 支、子弹袋 87 条。

13 日上午，我们又奉命迫使尚住大余台旅社的残敌——万耀煌带进西安的二十五军警卫连全部缴械。

**注：**①焦金凯即焦启铠.又名焦介人，陕西临潼人，1924 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8 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黄埔军校第三届特别党部执行委员、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第三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陕西警备师少校参谋，1932 年遇害。

②“天水事变”发生在 10 月，系陕西警备师师长马育苑叛杨附蒋，不久即被杨部平定。

# 我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我和国民党的关系，是由形神俱合到形合神离。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怎样呢？一句话也可说明白，是由形神俱异到形远神追。说和党有关系还不很恰当，和党人的关系却很久很多。1920 年在史可轩处看见《共产主义与中国》，常与讨论。1924 年冬[①]，魏野畴、邹均、屈武、董汝诚到耀县防地，盘桓数日，我请为教导队学生讲话。次年，魏野畴送许多共产主义书籍到虢镇防地，我都细心看过。通过这些朋友的说服，树立了我不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的态度。但是我执拗地以为共产主义不合中国社会情形，不能适行于中国。经说不服，这是我的落后。不待说，中国照苏联路走，我也不赞成。但对苏联朋友却有好感。因为，1926 年随冯玉祥来华之苏联顾问们，诚恳沉着的精神使我感动。尤其赛福林顾问随孙.良诚军进击围攻西安之敌 20 余日，战事惨烈，孙势不支，已拟定退却命令，赛坚决反对，孙始继续苦撑，两日后援军到达，城围乃解。这事予我印象极深。

1927 年在皖北，魏野畴任军部政治处长，南汉宸任干部学校校长，蒋听松任秘书长，时相过从。读南汉宸著《苏联游记》，感觉苏联并非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何以共产革命获得成功，建设又非常进步呢？这使我认识上起了相当转变。但当时中共的暴动政策，我仍极端反对。与诸友常作辩论，焦点在此。因一时偏差的政策，而怀疑到真理的主义，这又是我的落后处。

本军有两次“清党”。第一次是 1928 年春间事。因南汉宸给寇子岩[严]的信为蒋介石代表韩振声所发现，情势所迫，杨虎城赴宁见蒋，由我礼送南汉宸、魏野畴、杨更武、曹力如、吴岱峰等数十人先后离去。魏野畴数月后在阜阳遇害。第二次是 1930 年事。本军驻南阳，成立南阳教导队，杨虎城任大队长，我任大叭附。教育长刘祥麟，中队长赵莘任、王明、张汉

民以及教官数人，均为共产党员。后来发觉有暴动情事，因送他们离去。同时，驻北舞渡冯钦哉部两连发生暴动，全部死难。这便是以上所说“形远神追”的矛盾所不可免的表现。

杨虎城归主陕政，南汉宸任省府秘书长，蒋听松办《西安日报》。宋哲元囚禁之徐梦周任本师主任秘书，刘味冬办本师《军声报》，靖任秋、武志平任参谋。此外，宋树藩、杨法震、杜鸿范、孙作宾诸人均服务师部。

1933 年至 1934 年，本部驻防汉中，与川北红军张国焘部毗接，我派武志平与取联络，往返汉南川北者 11 次，约不相犯，张亦派徐以新（现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往汉中联系。1933 年春季曾派张含辉前往，不幸遇害。汪锋同志时在张汉民团，能知其详。后来张背约进攻南郑、褒城，予我突然袭击，使我认识上起了一度波动。这也证明了我对革命理论的研究不够。靖任秋、武志平均经蒋介石电要，我皆托词送走。周彬如、易厚庵等 10 余人羁押南郑狱中，我到皆予开释。

1936 年春，本部转富县、宜川、洛川等地。时日本侵华日急，而蒋介石不谋攘外，反假“安内”之名，疯狂地进行内战。中共于 1935 年发表八一宣言，1936 年又发表五五通电，我在思想上接受中共抗日统一战线之号召。虎城原恨蒋不抗日，因与张学良谋，发动双十二兵谏，揭橥八大主张，迫蒋抗日。释蒋后，我对和议条件，多所争执，单为西北军着想，未顾及革命全局，今日思之，则是错误。

双十二期间，共产党员多来西安，与我接触多者为周恩来同志。因当时有一联合办公机构，周代表中共，何柱国代表东北军，我代表西北军。

七七抗日战起，本军赵寿山师，许权中旅，李振西团，先后参加井陉、忻口、旧关诸战役，皆著成绩。当太原沦陷，敌骑临河时，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仓皇失措，拟放弃关中，已遣送其眷属及高级人员，分乘火车飞机，逃往宝鸡、成都等地，人心惶惑，不可终日。我在各界扩大纪念周上，以《西北国防与抗战》为题，力主坚守黄河，阻敌西犯，并引南宋刘锜守顺昌（今安徽阜阳）史事，以示我为本省主席，绝不生离西安。蒋鼎文惭

沮、缄默，人心始定。数日，援兵至，关中保尤恙。

抗日期间，蒋介石对四集团军中较负责之共产党员，电要不止一次，我皆复为解释，从未送去一人。尤对姚警尘数电往返，后调总部秘书。此类电稿，多由李百川、陈子坚、陈式玉各同志撰拟。

我主陕时，与林伯渠先生，在武汉六战区时与董必武先生，均保持朋友往来。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叶剑英、左权各位高级将领，先后过陕者，都曾晤谈。在晋南作战初期，本部赵寿山师曾归朱总司令指挥。赴六战区过重庆时，与中共负责人徐冰（邢西萍）曾商谈协同作战事宜。至恩施，曾派连仲玉[即连瑞琦]照护叶挺同志，并予经济帮助。朋友关系，较进一步。

总之，我与中共朋友关系，时远时近，并无隔阂，绝不敌对。相反，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则压迫、羁绊、分化、中伤，无所不用其极。我对他们也是非常愤恨的。

1945 年日本投降，我完全趋向于消极思想。原因不外两点：蒋介石营私独裁，祸国殃民，我积愤已久，神离的形合，不愿再敷衍下去。苦懑之余，是以消极。此其一。我幼受儒家学说，崇尚道义。杨虎城是我生死患难之交，被囚多年，情救不能，硬救不可，只有不揽权力，去蒋之忌，恢复虎城自由或有万一之望。此其二。今加回忆，这种灰颓和侥幸的想法都错了。

注：①应为 1925 年 2 月。

# 从山东剿匪到入陕主政*

陈子坚

我是徐州人，1923 年在徐州十中上学时，由吴亚鲁（徐州党、团的创始人）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在南京上东南大学时，由宛希俨、王觉新（均湖北人，东大学生，宛是党的负责人，王是团的负责人）介绍加入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在广东军事失败后，1928 年春我回到徐州。正值国民党清党反共，我在徐州待不住，遂由郭慕平（共青团员）写信给他在安徽太和杨虎城第十军任政治处长的叔叔郭乐三，介绍我参加了杨军，任军政治处宣传科长。时在 1928 年 5 月。郭乐三对我说，他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他也反对蒋介石、冯玉祥的清竞反共行为，但他从未同我谈过有关党组织的事。我按上海党组织的通讯处写信报告我的情况，也没接到回信。从此，我就失掉了同党的组织联系。

我原名陈兴霖，到杨军后改名陈子坚。当时杨军的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第十军，下属两个师，一师师长冯钦哉，二师师长姬汇百，在北京治病，由副师长孙蔚如代理。1928 年冬，冯玉祥命十军开往鲁西单县，并命缩编为暂编第二十一师。下属 3 个旅 9 个团，一旅旅长冯钦哉，二旅旅长马青苑，三旅旅长孙蔚如。军政治处改成了师政治处。12 月缩编完毕，奉冯玉祥命开赴鲁东临沂，准备清剿胶济铁路以南在日军掩护下（当时日陆军第三师团占驻青岛、济南及铁路沿线）的顾震（自称一军）和刘桂堂（自称一师）等匪军。

1929 年 1 月，暂二十一师开到临沂。杨虎城亦同时由日本经上海、南京回到临沂师部。这时我才第一次见到杨虎城将军。他很重视军队的政治工作，又听了孙蔚如告诉他我的工作能力情况，他叫我办一个小型石印的《临沂日报》，刊载简要新闻和有关军民合作的文稿以及他对部队的讲话。

他还叫我为他起草给部队讲话的纲要。因此我有较多的机会同他见面。有一天他对我说：我好意问你一句话，希望你实在地回答，你是共产党员吗？我因对他的思想情况已有所了解，就如实回答说：是的，但到你的部队后就与党失掉了联系。他听了立即同我握手，很高兴地说：我看得不错，你以后安心在这里工作吧，我的部队过去有不少共产党朋友。以后，他常找我谈话，问我过去的经历，有时谈时局的变化，有时分析国内的政治形势。总之，从此以后他特别信任我。这个时期他在政治上的认识是：（1）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2）蒋、冯、阎（锡山）、李（宗仁）已变成了新军阀；（3）国民党已成为新军阀政客争权夺利互相利用的政治大杂烩。在消灭了顾震、刘桂堂匪军以后，我在一次谈话中问他：你是否可用现有军事力量，在华北创出一个明显的革命局面，就象朱德、毛泽东在江西那样？他说：不行，我的部队的重要干部都是过去用义气来结合的，是封建的底子。朱、毛的武装是有党的领导，又由党员骨干组成的。我们目前还不能搞独立的革命局面，连明显的革命口号也不能公开的喊，现在只能在他们相互争夺的夹缝中图生存，然后再相机发展。

杨到山东后，纪子中（山西人，黄埔学生）、陈三俊（山西人，黄埔学生）、董林哲（山西人）、王泰吉（陕西人，黄埔学生）先后来到部队。杨将军委纪子中为一旅一团（团长武士敏）中校团附，委陈三俊为一旅旅部少校参谋，委董林哲为政治处科员，派王泰吉到三旅随孙蔚如旅长工作。杨将军告诉我，他们过去都是共产党员。杨的机要秘书米暂沉过去也是党员。以后又来了王菊人，也是党员，杨委他为三旅七团（团长赵寿山）中尉连指导员。我和以上诸人都认识并很接近。那时正是革命低潮时期，他们都是从各处不得已跑来杨军的。打顾震胜利后驻军诸城时，部分经费归山东省政府拨发，王炳南曾代表部队同山东省政府办理过经费交涉。1929年9月.部队奉蒋介石之命由山东开到鄂北老河口，遂转至河南南阳。

1929年9月，蒋介石命杨部由山东开赴鄂北老河口，并命杨去南京见蒋。杨去南京途经济南时，我当面向杨请长假离开。他问我为什么，我说：

“因为闹革命，我大学也没毕业，现在党的关系也失掉了，我想去日本上大学或学军事，找找党的关系。”他不准我离开。他说：“要上学将来我资送你去，现在部队开老河口，是个新环境，你随孙蔚如的部队先去。”于是，我随孙旅长乘火车至湖北花园下车，经安陆、随县、枣阳到了老河口。随后又接杨从南京来电，部队改开河南南阳。

刚到南阳时，地方秩序很乱。据报镇平县长被土匪杀了，孙蔚如临时派我带一营人前去代理镇平县长。我到镇平，土匪已跑了，我代理县政 20 多天，河南省政府派来了新县长，我回南阳，向杨、孙报告经过。当时，杨奉蒋命兼任南阳守备司令，任务是防御冯玉祥军从武关、商南东出截断平汉铁路。南阳县长是省政府派来的，杨为了南阳防务的军政统一，把原县长撤职，委派我担任南阳县长。南阳县民团指挥徐聘三是个土豪劣绅，南阳省立五中学生反对徐聘三，贴标语要打倒他，又游行示威。我同情学生，向杨将军说明并得到同意，将徐聘三撤职，关押查办。我当县长期间，杨还叫我办了一份《宛南日报》，内容和《临沂日报》一样，因此很忙。

又一个徐州萧县（今属安徽省）的中共党员朱大同，也因国民党清竞来到南阳，我把他安排在县政府办收发工作。我问他们徐州党组织的情况，他们都说被国民党破坏了。他俩到后，我们没有组织关系。

1929 年冬，杨将军派孙蔚如指挥部队在西峡口（今西峡县）击败了东进的冯军刘汝明部，又在驻马店亲自指挥打垮了唐生智的“护党救国军”。蒋介石甚为嘉许，除发奖金 10 万元外，还升杨为第七军军长，并把新十四师改为十七师，由杨兼任师长。杨在驻马店，缴获唐部两个炮兵团的火炮和机枪、通讯器材甚多，除将火炮因蒋严电索要上缴外，其余全都用来补充了自己的部队。杨又在南阳地方上收编了 4 个补充旅。1930 年 1 月，杨调我任南阳守备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我的南阳县长职务由机要秘书米暂沉接替。这时主菊人已调为杨的随从副官。杨为补充下级干部，还办了南阳教导队，李文卿为教育长，张汉民、赵莘任、王明（均中共党员）都是队长。

1930 年 3 月，蒋介石派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到襄阳，用飞机接杨去襄阳相见。何对杨说：“委员长派我来密告兄，对冯、阎的战事已箭在弦上，预备让兄担任平汉路以西地区对西面防守、对北面进攻的任务，问兄有何意见？有无困难？”杨说：“完全服从委员长的攻防指挥计划，惟地区太大，既要防又要攻，我只一个师，深感兵力不足，请主任转陈委座，给我多编两个师的番号，使兵力稍大，当定能完成任务。”何答应转陈。不久，蒋介石即密电杨，升任十七路军总指挥。杨仔细分析当时局势，认为他的部队位置，很难避免参加此次内战。于是组织了总指挥部，调我任总部宣传处长。他分析战争前途，从兵力上看双方差不多势均力敌，难估谁胜谁畋。从其他因素看，冯、阎方面缺点较多：一是财力不够，不能持久；二是冯、阎互相猜忌，不能真正合作到底；三是与关外张学良的关系不如蒋与张的关系好，张是第三大实力派，举足轻重。杨将军认识他自己的力量小，不能左右战局，因此决定尽量避免参加决战，以保存实力为主，俟机而行，以求发展。他令孙蔚如旅留驻南阳，担任防守，自率冯钦哉、马青苑两旅和其他几个补充旅北进，作进攻姿态。以后在漯河东西之线，与冯、阎的第八方面军樊钟秀[②]部（邓宝珊是副司令）对峙了几个月。双方本是旧识好友，没有真正的作战。在此期间，蒋介石为鼓励杨积极作战，发表增编四十二师和五十八师的番号。杨升任孙蔚如为十七师师长，冯钦哉为四十二师师长，马青苑为五十八师师长，并将各补充旅分拨各师整编为正规部队。

当杨的指挥部驻在叶县旧县镇时，南汉宸秘密来到旧县。他是冯方鹿钟麟派来劝说杨反蒋归冯的。杨把南密留驻地。也在此时，南阳教导队教育长李文卿报告，队长张汉民、赵莘任、王明是共产党员，准备进行暴动，已查明扣押，请示处理，杨令送至方城县政府寄押。次年，杨任陕西省主席时，方城县长请示处理办法，杨批复释放。赵莘任、王明由方城到别处去了，张汉民因随杨较久，又到西安见杨，杨派他为省府卫士营营长，以后升任团长、旅长。

入秋后，冯、阎在津浦、陇海主战场方面连续失败。9 月，张学良率军入关，支持蒋介石。蒋电令杨部挺进洛阳，截断冯军后方。杨认为胜负之局已定，乃集中几乎全部兵力经鲁山、临汝镇、伊川直趋洛阳。在龙门山一战把冯军击败，冯军退入洛阳城中。经赵守愚（山西人，当时任洛阳警备司令）劝说，守军葛云龙师投降。然后，杨率军沿陇海路向西急进，以破竹之势攻占潼关，直捣冯军多年的根据地。这时，蒋介石电杨准备接管陕政。至此，杨与蒋相互利用的关系达到了最高点。

冯玉祥的后方总司令兼陕西主席刘郁芬见潼关失守，急率军政要员和军队过渭河去大荔，计划过黄河去山西。杨在潼关派孙蔚如师去朝邑截击，将刘郁芬全部截获。但孙只将其武装部队留编，其余军政人员、行李、财物都放过了黄河。此事以后被蒋查知，对孙很不满，杨自己复电承担了责任。

1930 年 10 月，十七路军打到潼关，杨虎城将军一面部署入陕军事，一面派南汉宸计划筹备组织陕西省政府，他电南京政府保举李志刚（原驻南京办事处长）、李协（水利专家）、李百龄（陕西教育家，政治上接近于右任）、王一山（十七路军参谋长）、胡逸民（浙江人，原驻南京代表，接近蒋方）为陕西省政府委员，自兼民政厅长，李志刚兼财政厅长，李协兼建设厅长，李百龄兼教育厅长，保举南汉宸为省政府秘书长。

到达西安后，杨将军命令马青苑师除担任西安警备外，并分派部队担任渭南、临潼、咸阳、凤翔等县治安，命令冯钦哉师担任大荔和渭河以北区治安，命孙蔚如准备进驻汉中担任陕南治安。政治方面派南汉宸接收省府秘书处并释放监狱在押的政治犯（政治犯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南京蒋政府对杨复电除另派李范一（陈立夫荐举）为委员兼教育厅长外，其余照准。杨主席因兼职多，调米暂沉任民政厅秘书主任，委我任长安县长（西安不设市）仍兼十七路军宣传处长。不久，国民党中央党部又委派杨为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

这时，共产党员蒋听松和在南阳办《宛南日报》的宋绮云都来到西安。

这次，杨主席为了发展陕西新闻事业，开办《西安日报》作为陕西省府的机关报。派蒋听松为社长、宋绮云为编辑。徐州睢宁县共产党员张介廉（张默夫）、萧县共产党员刘亚民和共青团员郭慕平都因受国民党迫害来到西安，我介绍他们见了杨将军，杨分别安置张介廉为印刷局长、刘亚民为宣传处科长、郭慕平为长安县公安局长。

在省政方面，杨主席对南汉宸秘书长深为信任，一切行政方针计划，多出南手。陕西省党部的工作，杨委托委员出毅安（陕西人，黄埔一期学生，接近杨）主持，但后来中央党部又派 CC 分子刘清源为书记长，CC 分子宋志先等为委员，增加了 CC 在省党部的作用。杨为了笼络他们，每月对他们都给予津贴。

自杨将军率部入陕并兼领党政工作 5 蒋介石即开始对杨部进行控制和削弱，1931 年春蒋命令杨裁减一个师的番号并即停发一个师的经费。杨不得已把马青苑的第十八师改为陕西警备师：由陕西省承担经费。从此，马青苑对杨心怀怨意。到 1932 年调驻天水时，受蒋介石方面挑拨，叛杨投蒋。

1931 年秋，杨将军接任潼关行营主任，为办事便利，请准蒋介石把行营移驻西安，他只编组了一个办公厅、一个参谋处和一个副官处，办理行营公务，其它业务则由第十七路军总部主管处兼理。他调我代理办公厅主任，此时免去我兼任的第十七路军宣传处长和长安县长的职务，调民政厅秘书主任米暂沉接任长安县长，米的民政厅职务派申伯纯接任。委张呈祥（广东人）为行营参谋处长、郭叔蕃（山东人，原河南督办胡笠僧的副官长）为副官处长、王菊人为办公厅机要科长。

这日汤将耳的老友杜斌丞、邓宝珊、续范亭等先荐来到西安。杖差杜斌丞为省政府参议，邓、续剿为杨将军的座上宾客，与杨将军谈论古今和时局以及西北问题，我和汉宸有时也参加。

孙蔚如部被调到汉中防共后，杨将军为了不和红军打仗，乃密派参谋武志平与红军在川北部队订立互不侵犯协议，并帮红军购买药品和其它物资。以后红军徐海东二十五军由河南进入安康地区，蒋介石严令杨将军派

兵堵击。杨将军在形式上不能不派兵应付，乃派警一旅唐子封（嗣桐）部和警三旅张汉民部进入秦岭。张汉民是共产党员，杨将军面嘱张汉民要尽可能找到红军指挥员，商订互不侵犯协议或打假仗，以达到不与红军作战之目的。但张汉民在作战中被红军俘虏而处死。杨将军对此思想上感到非常苦闷，他是一向拥护三大政策并在他部队中使用和信任共产党员的，至此他不知共产党近来是什么政策而困扰不安。

以上是杨将军在西北与蒋介石在军事方面的斗争概况。在政治方面，他和蒋介石也进行一连串斗争。对教育，他主张学术自由，学生可以看任何书刊，并允许学生组织爱国活动。但是蒋介石派的教育厅长李范一却推行的是党化教育，除了三民主义和宣传蒋介石言论的书以外，不准学生看其它的书，并不准学生组织抗日宣传活动，还调查教职员中谁是共产党，准备撤换。因而引起教育界和学生驱逐李范一运动。杨对逐李是暗中同意的，所以学生逐李各种活动和游行，杨听之任之.李范一面请杨干涉学生并说里边有共产党领导。杨对李说，教育是你办的，我如何干涉？你说有共产党领导，有何事实凭据？李看杨不帮他干涉学生，才跑回南京了。这是对蒋的政治斗争之一。蒋的理论家考试院长戴季陶来西安游历考古，又要对学生训话以正陕西学风。杨以西安都是中小学生，听不懂戴院长的高深理论为理由，请戴不要讲。戴坚持要训话，结果在民乐园训话时，被学生

质问为何不抗日等问题，戴回答不上来，被学生群起喊打并把戴的汽车烧了。戴一怒回南京，对蒋说陕西简直是化外之民，学风坏透了，主张把“陕”字加犬旁。这是杨与蒋政治斗争之二。蒋介石认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是共产党员，电杨要叫南去南京见面。杨认为南汉宸去南京可能被扣，就给他一笔旅费去了日本。他复电蒋说，南汉宸已因病离职，并保耿寿伯为省府秘书长。这是杨对蒋政治斗争之三。蒋的中央派邱元武在西安开办一份《西京日报》，完全替蒋之中央宣传，对杨的经略西北不利。杨派人把邱元武打死了。这是杨与蒋的政治斗争之四。李范一被驱逐后，蒋介石又派 CC 分子周学昌任陕西教育厅长。周学昌见杨说，立夫先生让我

到陕一切都听杨主席的。杨回答说，立夫先生的话完全对，你以后听我的话好了。杨对周态度极为冷淡。连一顿便饭也没请周吃过。因此周学昌只做教育官而不敢有所更改。这是杨对蒋政治斗争之五。1933 年春，杨将军抓住了几个国际间谍，证据确凿。杨将军考虑，如果把间谍解交蒋介石，蒋一向害怕帝国主义，一定会释放讨好外人。杨将军爱国情殷，就授意部属把间谍处死。不料蒋介石竟借此案对杨肆行压力，除派军委会和外交部的人到陕督催查办外，并严令杨迅速就地解决，否则将对杨严办。杨将军虽然费了不少事，但最后还是就地了解此案，使蒋介石借此对杨严办的阴谋未能实现。这是杨对蒋介石的政治斗争之六。为了维持军队的军风纪和保护合法的群众运动，杨将军设立了西安绥署宪兵营，委姬子锺[纪子中]（共产党员，黄埔学生）为营长，下属的连排长也多数是共产党员。对上街游行的抗日群众运动，宪兵营总是派兵保护，抵制了陕西省党部的 CC 分子对群众运动的破坏。CC 分子对蒋介石打小报告，说杨的宪兵营里有共产党活动。这是杨对蒋政治斗争之七。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入热察，杨将军力主抗日，他除派第四十二师开到河北省准备与入侵之敌作战外，为了培植抗日干部开办了一个步兵训练班，招收高初中学生受训。有些中队长和班长就是从宪兵营中选用，因而步兵训练班中有了共产党组织。杨将军对此情况是完全了解的，他说，共产党无毘无私，个个精明能干。我们的部队是封建的老底子，干部太落后，我们需要共产党员的血液。别人害怕共产党人，我是欢迎的。步兵班除了训练步兵战斗动作和技能外，特别注重抗日的政治教育。杨将军每周都抽时间到步训班进行抗日精神的讲话。步训班的学生以后有不少成了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干部。

**注**：①1930 年 7 月，樊钟秀被蒋机炸死于许昌，邓宝珊继任冯、阎第八方面军总司令。

---

*本文据《丹心素裹》所载陈子坚《我所知道的十七路军地下党及其活动》一文。《忆宋绮云烈士》一书所载陈子坚《我所知道的宋绮云》一文，《回忆杨虎城将军》一书所载陈子坚《对杨虎城将军的历史回忆》一文摘编而成。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回忆中国共产党
# 在杨虎城部的早期活动*

## （一）屈武回忆

1924 年 11 月，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离开广州，抱病北上，于 12 月 4 日抵达天津。中山先生在京期间，我和董汝诚[①]曾去见他，他委派我和董汝诚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前去陕西，宣传他召开国民会议以和平解决南北统一问题的政治主张。根据北京党团地委的安排，同我 2 人一起回陕宣传国民会议的还有邹均同志和他的夫人张秀逸。我们在陕西奔波了两个月左右。1925 年初，我和董汝诚到耀县杨虎城部给军官讲召开国民会议的必要性，希望杨将军支持国民会议运动，杨将军欣然应允。

## （二）耿炳光回忆

1924 年，经北大湖南同学何资深介绍我以 CY 团员而加入共产党。同年冬，由组织决定加入北京国民党。

1925 年春至夏，党北方区[②]派我代表于右任，先后分赴陕北榆林和关中耀县、雨金等处，向井岳秀、杨虎城、甄寿珊等，宣传三民主义，希望他们能受于[③]领导，参加革命，准备实力，响应北伐。当时杨正在耀县练兵，他很乐意听我谈当时的革命形势，并表示要设立一个“三民军官学校”，那时已有一个党员魏野畴在杨处不断地影响他，所以我去时他表示很好。

## （三）宋树藩回忆

1924 年夏，我在西安圣公会上学，由武止戈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大学转为党员。

1925 年暑假回到西安，不久，组织上派我去虢镇工作，当时杨虎城在虢镇，属于国民军三军孙岳部，杨任师长，师部设政治宣传处，处长魏野畴，魏未到差，他派我和赵葆华去，我任宣传科长，赵任组织科长。我们在杨部主要是和杨虎城接触，出《青天白日报》，给士兵讲话，内容主要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杨虎城的讲话也是我们给拟稿子。我在政治处近 1 年时间。

## （四）赵葆华回忆

1925 年，我由魏野畴、黄平万介绍加入共产党，派赴三原渭中、女中、工业等校教书，用 CY 刊物《中国青年》作国文教本，领导各校学生运动，暑期开办夏令讲习会，西安学生会移三原开会.同年冬季，由党派至杨虎城军中作政治工作。

1926 年，随杨军到西安，在围城 8 月中，办《青天白日报》，社论先送黄平万书记看过才发表。

## （五）吴化之回忆

1926 年春至冬，军阀刘镇华围西安城时，党团地委的中心工作是动员和组织军民守城，守城司令李虎臣动摇，副苛令杨虎城坚定，魏野畴、刘含初、赵葆华、雷晋笙、王授金、吕佑乾、吴化之、黄平万等党的干部对杨虎城作了很多工作，支持他守城，帮他教育官兵，筹备粮食，组织学生搞宣传，慰劳官兵。

注：①时系中共党员，北大学生。
②应为北京地委。
③于，指于右任。

*本文系《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8 年第 6 期所载《屈武回忆》、《耿炳光回忆》、《宋树藩回忆》、《赵葆华回忆》、《吴化之回忆》合编而成。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策动杨虎城南下驱逐刘镇华*

王森然

1922 年，杨虎城率靖国军与直军作战失利，为保存实力，拒绝北洋军阀收编，暂避陕北井岳秀处。井岳秀改杨虎城的部队为“陕北镇守使署暂编步兵团”，任命了新团长，杨虎城本人脱离部队，在榆林城里闲居休养。但他当时对革命形势、中国革命的概况、方针了解不多，通过与杜斌丞、魏野畴、李子洲等人的频繁接触，才逐渐对中国前途有了粗浅的认识，并总结了失败的教训，也开始考虑如何安排自己的前途。这段时期，对杨虎城以后的思想倾向，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24 年 9 月①，北洋军阀政府内变，冯玉祥发动驱逐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变”，整个革命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在陕西也面临一场驱逐刘镇华的斗争。李子洲这时从绥德专程来到榆林，找我和杜斌丞谈了配合全国革命，驱刘出陕的意义。我们分别与杨虎城谈了南下占领西安的重大意义，杨虎城同意担任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

注：①应为 1924 年 10 月。

*本文原载《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8 年第 5 期。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与野畴一起做地下工作*

王圣域

1922 年夏末，野畴辞去陕西华县咸林中学教务，来北京修改他的《中国近世史》。我当时在北京高师撰写关于改革旧学制的毕业论文，两人常在北京图书馆遇面。……1923 年初的一天，我俩又一同在图书馆看书，休息时，他轻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消息：我已经由李大剑、刘天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声音虽然不高，但表情却极为兴奋……

1925 年春，我们俩又在西安的省专第一中学相聚……这一年的 5 月 4 日那天，我们一中的学生为踢足球事，同北洋军阀、陕西督办吴新田的士兵发生冲突。吴带兵一贯横行霸道，这次竟用铁锹、砖块乱抡乱砸，使 40 多名学生受伤，其中有 4 名被打成重伤。这一事件激起全校学生极大愤怒。野畴找我和另一教员程东川商议对策，我们都感到非发动群众力量难以取胜，决定立即发函开教职员工联合会。教职员工联合会上，又决定立即促使各校学生成立学生联合会。野畴在西安学生中声望很高，经他到处奔波联系，只有一两天功夫，学生联合会便成立了。学生联合会一成立，便同教职员工联合会一起，在团组织的领导下，全市总罢课，组织学生走上街头，采用各种方式，揭露军阀吴新田纵兵行凶、祸国殃民的罪行，并号召西安工人、农民、商人等各界人民共同起来与吴新田及其走狗作斗争。凶残暴戾的吴新田，对学生的呼声置若罔闻，反而派兵镇压，扬言“打死人不偿命”。为了把这一斗争发展成为全省性的驱吴运动，野畴亲自带领西安团组织和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高克林、张含辉、张秉仁等到了渭北三原，让我带一中的部分学生到陕北延安、绥德、榆林，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野畴在三原还召开了全省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到耀县请求杨虎城的部队参加驱吴斗争。一时间驱吴浪潮遍及全陕，声势之大，前所未有。作恶

多端的吴新田匪军，终于被人民群众赶出了西安，窜回了汉中。

# 回忆魏野畴与杨虎城的二、三事*

窦萌三

1923年杨虎城在榆林养病，军队只有一个团，由李子高带领。这时杨很苦闷，感到没有出路。适在这时，经过杜斌丞的介绍，结识了正在榆林中学任教的魏野畴，魏是大学生，懂得马克思主义，魏给杨讲形势和前途，对杨有很大影响。杨虎城对魏很敬佩，也很信任，常请魏出主意想办法。

1925年夏，杨虎城在耀县创办三民军官学校，聘请魏野畴任政治部主任。在此之前，魏曾到耀县请杨虎城率部参加驱吴运动，杨欣然应允，在虢镇打败吴军，获得武器不少。1925年秋，杨任国民三军三师师长，住在虢镇时，成立了政治宣传处，魏野畴任政治处长，魏未到差，但常寄些书报刊物等宣传品供官兵学习。还派赵葆华任组织科长、宋树藩任宣传科长。师部办有报纸，什么名字我忘记了。报纸进行反帝反军阀（吴新田、刘镇华）的宣传。在反围城斗争中，共产党人对杨虎城及其部队帮助很大。

*本文原载《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8年第6期。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驱逐吴新田筹办三民军官学校*

（一）田伯荫回忆

1925 年初，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杨虎城由榆林带兵南下，参加驱逐军阀刘镇华、吴新田的斗争，路过绥德时，党团组织和李于洲发动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师生及城内群众在东门外热烈欢迎。杨虎城住在四师学校内，并对学生作过一次生动的讲演，勉励大家。他到耀县后创办了三民军官学校，四师学生不少人前往参加学习。

（二）卫志毅回忆

我离开陕西三原渭北中学，开始步入社会是在 1925 年到陕西耀县杨虎城部三民军官学校当学生，经政治教官吕佑乾介绍在 1925 年 11 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张仲实回忆

为了进一步壮大驱吴运动的声势，野畴同志除动员渭北地区的驻军甄寿山部队参加驱吴外，还亲赴耀县会见老朋友——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杨虎城将军。在野畴同志的动员下，杨将军率部投入驱吴斗争，并为学生进行驱吴斗争提供经费。杨将军还邀请野畴同志帮助筹办三民军官学校培养干部。野畴同志又推荐宋树藩、赵葆华去杨部任政治部宣传、组织科长，帮助改造部队，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使部队战斗力大大提高，在驱吴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共产党人在围城斗争中*

李定五　仲兴哉

1926 年春，刘镇华率领镇嵩军八师人马，由潼入陕。4 月 11 日，前锋已至临潼、灞桥，西安的一些大绅组成了“和平期成会”，准备迎接刘镇华。

大敌当前，在魏野畴的参与下，杨虎城在三原东里堡召集各将领会议，主张迅速将部队移驻西安。会后，杨虎城除留李子高旅防守三原外，立即下令其余各部 5000 人驰奔西安。

李虎臣在开始守城时态度就不是积极的。后来，在守城面临严重危机时，他又表现动摇，曾主张和谈。在此情况下，中共党组织领导城内的工人、学生、妇女等进步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宣传打倒军阀、帮助守军，坚持了反围城斗争，大力支持了杨虎城，并通过杨虎城反对和谈，反对李虎臣的动摇，以打击投降分子。杨虎城在魏野畴、吕佑乾的真诚帮助和大力支持下，表示绝不与刘言和，在对民众演说时慷慨激昂地表示：西安革命城如果存在，我亦与城存；如果城失，亦与城俱亡。

特别是守城后期粮食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中共党组织负责同志黄平万、刘含初以及共产党员吕治乾等同志，积极帮助守城军民筹集军需民食，动员军民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并采用代食品，派人出城筹集粮食，使军民艰苦奋战而不溃散。

## 屈董二委员到河北后之动作

屈、董二君[①]又去耀县宣传，到耀县后，除在各小学讲演外，又召集露天国民大会讲演……

（原载 1925 年 2 月 18 日《新秦日报》）

## 杨虎城派代表赴粤

虢镇通讯云：国民三军三师师长杨虎城氏，派该师咨议魏野畴为代表赴广东，出席国民党会议②并携款 3000 元在泸购买电影机及影片等，以便宣传该党事业云。

（原载 1926 年 1 月 21 日《新秦日报》）

## 耀县三民军官学校对时局之宣言

本社顷接耀县三民军官学校对时局之宣言云：英、日帝国主义走狗媚外军阀张作霖已经被民众国民军及直系把他仃下去了，国民军首领冯玉祥已经长驱入京了凶恶的卖国贼张作霖虽受大创，而奉系余孽李景林、张宗昌仍盘踞在直鲁，英、日的走狗吴佩孚、孙传芳仍在长江虎视眈眈。我们由 14 年的经验知道，解决中国的时局及解除我们自己苦痛，惟有我们被压迫的民众工农学商兵联合起来，武装起来，工人组织工团军，农人组织农团军，学生组织学生军，商人组织商团军，努力革命，并召集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所主张之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产生委员制的国民革命政府，对内给予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对外停止关税会议，宣布关税自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才能有效。若再妄想军阀、官僚、恶绅给我们自由，那真是愚蒙了。同胞们呀，时机到了，省城及各处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了，我们耀县的老百姓还沉睡不醒吗？工人们，农人们，学生们，商人们，士兵们，赶快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吧。我们主张召集真正的国民会议，建设真正的国民革命政府。

（摘自 1926 年 1 月 26 日至 27 日《民生日报》。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三民军官学校近讯

三民军官学校自省垣战事发生后，为参加战士来省，到省数日，该校学生即在街上分队讲演、散发传单、粘贴标语，冀唤醒一般民众，实行三

民主义，后因时局关系，暂时停止宣传工作。

（原载 1926 年 8 月 12 日《新秦日报》）

**注：**①屈、童二君，屈指屈武，童指董汝成。

②国民党会议，指 1926 年 1 月 1 日至 19 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 十军政治处的中共活动

## （一）曹力如回忆

我入党在1926年大革命时代。我在入党前，即作非基运动，并作反军阀宣传。到政治队，由同学薛汉濯、何维祯介绍，是1926年11月。在党内担任小组长。入党后受党的委派（名义上是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派的），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路旅[①]政治处组织科长暂代政治处长、宣传大队宣传科长、第二师政治处长兼组织科长。在党内担任军队中的支书（共十几人）。国民党叛变后，我们这个支部除了几个被调受训（政治人员会议）者外，有七八个随军到豫东，5个月没有上级竞领导。蒋，冯郑州会议后，杨虎城因与冯关系决裂，与蒋尚未拉手之际，打直鲁军失败，苦闷无出路，对我党还好，对魏野畴同志更好，魏被杨虎城打电[报]叫来后（在河南归德），军政治处处长遂改为魏，我到了第二师。不久到安徽太和，成立特委。

## （二）王文培回忆

刘镇华镇嵩军退却，于右任主陕政，我因为是他的学生，他介绍我投考西安中山学院军事政治班，幸被录取。在学习当中，由贺云中、张振河介绍我加入共产党。杨虎城将军突然临校讲话，讲话后要求校长提拔15个学员分发他的第十军里作政治工作。当时其他各部队要求提拔的很多，校长感到学员的名额很少，只允许提拔9名，其中有我的同学杨实初（澄县人）、白怀林（陕北人）、胡怀西（渭南人）、李泽（渭南人）。当时部队在渭南，我们参加了第十军政治部。当时政治部原有政治工作人员曹力如、申明甫、吴岱峰。杨实初和我是中山学院的同学，他入党是由我的介

绍，当时他约 24 岁，不但学识超越，而且军事学识长人。

### （三）申明甫回忆

民[国]十五年（1926 年）师范毕业后，即考入西安政治队，受政治和军事训练，该队系由魏野畴、李子洲先生所主持。12 月由魏野畴、蒲子政介绍入中国共产党。民[国]十六年（1927 年）派赴杨虎城部第十路指挥部政治处任政治员。4 月②出发赴豫参加北伐战争。

### （四）方仲如、张仲实、王孝慈回忆

大革命时期党在国民军中只注意做政治工作，而不去掌握枪杆子，不准共产党员当军官，不注意吸收军官加入中国共产党。杨虎城部（十路军）中共党员李泽愿当连长，党支部（支书曹力如）却不批准。党员武勉之③当了团长，党员们都看不起他。

注：①第十路旅改为第十军。
②此处当指农历四月。
③武勉之即武士敏。

*本文摘自《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8 年第 7 期所载《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的中井支部情况》一文。标题为本节编者所加。

# 回忆张汉民在三原

## （一）崔贯一回忆

1927 年 10 月间，云阳农民协会奉三原县委指示，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去了解决枪支问题，决定收缴国民党杂牌军枪支，共收了两次。第一次，国民党杂牌军一个招兵连在镇上招兵，我们先选派了两名有经验的自卫团人员，以报名当兵为名，打探消息，里应外合。然后由农民协会集合 200 人，由县委派来的县委委员张汉民（杨虎城部炮兵营副）带领指挥，于一个晚上偷袭招兵连，缴获长枪 10 余支、子弹两箱、大刀 10 余把，还有手榴弹。

## （二）李培文回忆

1927 年五六月，我们 30 余人被派往国民联军司令部工作，后因冯玉祥倒向蒋介石，我们于七八月间借看病为由回到三原。

我回三原后，以教学谋生。张汉民在三原任杨虎城部炮兵营副，1927 年冬，张汉民、李金垣介绍我加入了共产党。

1928 年阴历二三月间，记得麦子不太高，李金垣带个纸条给我，说张汉民叫我们晚上到城里取枪。我即带了李欲文、李培成等七八个人，由龙桥西面爬上北河坡，进了二郎庙张汉民的营部。深夜，张汉民派人引我们到三职学生宿舍（由军队占住）外边翻墙过去，墙内站岗的是自己人，枪也是事前准备好的。我们取走了枪，连夜送到东里堡东边的原下，交给黄子文等武字区来的人。

---

*《崔贯一回忆》《李培文回忆》原载《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7 年第 5 期。现合并成文。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忆皖北革命*

谢祥萌

1927 年 11 月，我奉河南省委的指派到皖北太和。我到了太和，先见到魏野畴同志，野畴同志派我到军校工作。

这所军校是杨虎城部办的，由南汉宸任校长。军校里有 300 多名学员，都是杨虎城部队的下级军官和招收的进步青年。教育长瓮巨卿，是个老军人。学员分 3 个队，第一队队长昌绍先，第二队队长是我，第三队队长是王汉秋。

杨虎城军里有党的组织。魏野畴是军部政治处处长，党的组织主要也是魏野畴负责。暴动前成立有十军特委。我没有参加特委的工作。地方上也有党的组织，但我不知道叫什么名称。我们进行了许多党的活动，但主要的是贯彻八七会议决议。当时在那里工作的还有几位女同志，她们都很能干。我记得有一个叫周志玑，是河南信阳人。另一个叫陈慕真，后来脱党了，现在在美国，常有信寄来。还有一个叫门止一，病死了。再一个叫李性涵，现在北京。在周志玑领导下有个谢葆真，是个小姑娘，我到太和时，她和杨虎城刚刚结婚。她们都是搞宣传工作的。

那时，北伐战争因蒋介石的破坏而失败，人们都闷了一肚子气。我到太和不久，就看到了八七会议文件，是印刷的，后面还印着：“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以党治国放屁胡说。三民主义糊涂到底，五权宪法夹七夹八。军政时期军阀运气，训政时期官僚得意，宪政时期遥遥无期。忠实党员只要洋钱，总理遗嘱阿弥陀佛。”人们当歌唱咒骂国民党反动派。在太和时，我还看到鹿钟麟的《赴苏考察报告》。书是高敬轩写的，封面是鹿钟麟题的字，内容是介绍俄国的革命经验，对我们和军校学员影响很大。

十军的党组织被蒋介石的“清党”所破坏。据我所知，十军党组织是寇子严无意中暴露的。他这个人的思想太陈旧了，蒋介石派韩振声来“清党”，他竟把全部党员名单放在抽屉里，被韩振声发现了，于是立逼着杨虎城“清党”。杨虎城去南京了，他的第二把手（第一把手是冯钦哉）孙蔚如找我谈话。说：“你们走吧！否则出了问题不好办。”春节前我就离开了。

*本文摘自 1982 年 9 月 24 日谢祥荫口述，乔同兴、王襄天的记录。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杨部在皖北太和

高敏夫

1927 年 7 月间，冯玉祥在西安反共，魏野畴同志无法立足，东出因敌人戒备森严，很易遇到危险，即北上经绥德、吴堡宋家川过黄河，赴河南转入第十军杨虎城部，因与杨在西安熟识，即被委为军政治处处长，由魏推介曹力如同志任第二师孙蔚如部政治处处长。杨虎城当时对魏野畴十分尊重，杨周围的一些参谋、秘书亦对魏表示友好，米暂沉、宋建勋（又名宋一鸣、宋益民，后叛变）当时均为杨的亲信秘书（宋系杨部军需处书记，即文书），后均被吸收入党。

杨系杂牌军队，受蒋介石歧视，从西安出关开赴河南后，于归德马牧集战役受损失很大，名为第十军，当时仅余 3000 多人，无驻防地点。时四十七军高桂滋部驻防安徽省太和县，高亦为陕西人，杨部开到太和后，高即让防移驻阜阳。不久高、杨商定解除地方部队秦庆林的枪支，因分配不均，彼此又曾发生矛盾。后来武装冲突罢了。高建白的教导团能迅速成立，就是收缴秦庆林的枪支武装起来的。

当时在高桂滋部工作的有曾晓渊、蒋听松、张学静（友清）等人，因高部已归蒋介石管辖，这些同志已在高部无法立足，即由高部就近转入杨部，由魏野畴同志负责做了安排：蒋听松做了杨的秘书主任，张学静到军部参谋处工作。不久皖北第二区特委便宣布成立。我当时受陕西省政府、省党部通缉，在米脂无法立足，即逃命安徽高部，遇到魏野畴同志，他是我榆林中学的教员，即由高部转入杨部任军部政治处秘书，不久由魏介绍入党。当时皖北特委通过陕西省委和中央联系，经常和魏野畴同志联系的

有陈文秀同志（又名陈冠英、陈云樵）。

杨虎城驻防太和不久，南汉宸同志率昌绍先、谢祥荫同志以第二集团军东路军鹿钟麟代表的名义，从开封来太和慰问杨部，并带来大批第二集团军赴苏联的参观考察报告，是南汉宸同志持笔起草的，当时很受杨的重视、欢迎。南应时在河南省政府民政厅工作，公开的名义大约系秘书或秘书主任。不久南汉宸又来太和，替杨主办军事干部学校，准备为杨彻底改造部队，打下乘机回西北、壮大力量，和苏联取得联系的良好条件。南汉宸曾把这些计划用极有说服力的文字，以通信的形式告诉杨部第一师师长冯钦哉的参谋长寇子严，寇看到后如获至宝，保存起来。国民党中央派韩振声来杨部了解情况，这封信便落入韩手。当韩问杨："共产党在你部有何活动？"杨表示支晤时，韩便拿出南给寇的信作为证件，并说："共产党在你部有这样周密巨大计划，你怎能事先一无所知？"经过韩的严词逼迫，杨便发生动摇，大概是 1928 年 1 月下旬或 2 月初，杨跟韩去了南京，以后去日本考察。第二师副师长兼军部参谋长孙蔚如于 2 月初便开始在杨部清党，分别给一些同志发了旅费，让他们迅速离开杨部。就在孙决定清党前夕，皖北特委在太和城内某民宅由魏野畴同志主持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我这个新党员也参加了。会议主要研究了当前的紧急情况，检讨了过去单纯依靠杨虎城发展革命力量的单纯军事观念和机会主义，我们千方百计地包围杨，却把杨包围到南方去了。也就在这次会后，将特委以后的工作方针、力量配备，作了具体的布置，魏野畴、曹力如、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即由太和转到阜阳，组织特委的秘密工作机关，由阜阳乔锦卿同志的帮助，即在高建白团部的后边不远的地方，弄到一处民房，曹力如同志任特委秘书长。我在高建白团第三营姜少裕（纯清）营弄到一个少尉军医的名义，营副就是杜聿德同志。我曾出去到老集一带替高募集新兵，经过挑选，在入伍时大多数新兵已经成为候补党员，对于以后的武装暴动

打下较好的基础。当时因为搞得太左太红，不能再在高部立足了，我便被派到亳州，协助张学静、蒋听松、王尚文（王世英）等同志开展地方工作。当时在亳州工作的还有张励吾同志曾在杨虎城部政治处工作。张后来被方振武部鲍刚逮捕，在亳州英勇就义。励吾同志大约是湖北沔阳人，牺牲时20多岁。王尚文原名王敞，黄埔军校学生，曾在高部工作过，亳州机关被破坏后逃往别处，后改名王世英。张学静又名张友清，陕北神木县人，抗战时期曾任北方局统战部长兼彭德怀同志的秘书长，于山西麻日事变时英勇殉国。

孙蔚如执行坚决的反共政策后，汉宸同志即回河南，不久做了信阳县的县长，后来杨虎城曾在豫南联合唐生智等杂牌军进行倒蒋活动，不久杨解除了唐部的武装，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于1930年回陕西做了省政府主席，南汉宸同志又由河南到了西安做了省政府的秘书长，曾先后向杨虎城、肖振瀛说，营救了我们的一些负责同志，又被蒋介石发觉，勒令杨解除南汉宸的秘书长职务，南被迫经天津出走日本。

叛徒宋建勋，陕西长安县人，当时在杨虎城部军需处任书记，由魏野畴、蒋听松同志介绍其入党。魏由太和转到阜阳后，命宋即在太和城内设立秘密接头处所，和皖北特委联系，当时我们在杨虎城部已可掌握1000多人的武装力量。皖北特委决定举行革命暴动时，魏野畴同志由阜阳派他以前的勤务员张文华（注：吴岱峰回忆叫张庆华）到太和与宋建勋联系，时宋已十分动摇，即把张和他所带的工作计划一齐送给孙蔚如，做了可耻的叛徒。我们当时在亳州看到官方所宣布的平定阜阳暴动的消息，但已和皖北特委失去联系，情况不明，张友清同志派我到太和找宋建勋联系，了解情况。到太和后，宋已叛变，认为我重回太和是设法收拾他，便立即报告孙蔚如，深夜派手枪队把马号包围，立即将我逮捕，随即铐上脚镣手铐，关在县政府看守所。皖北特委原先布置的以高、杨两部分兵力为基础的暴

动计划，由于宋之告密，未能按计划实现，这也是后来暴动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情况，我当时还不了解，5 月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杨部奉命移防山东，太和国民党中央军方鼎英部移防，离太和前夕，杨部县长杜寅生始派人把我找去，说明来时的情况，大意说再怎么我们也不能把你交给中央军。即随时把我释放，随他们到达砀山，遇到一些同志，纪子中（原名纪秀山）等，始了解宋建勋叛变的前后情况。

*本文摘自离敏尖 1949 年 8 月所写历史材料。标题为丰书编者所加。

# 我和杨虎城的一些交往

冯润章

杨虎城在军事失利以后，于1928年4月下旬偕同他的夫人谢葆真和秘书米暂沉去日本。到了东京，先住大冈山，后移居东中野。我是1928年6月去日本的，也住在大冈山地区，因为那里有许多中国留学生。我到东京参加了中共留东支部。这个支部的人，只记得有李味五、崔仲远、杨玉珊，还有一二位朝鲜人……参加这个支部的人主要是自学。

我和杨虎城原来不认识，到了外国，凡是中国人都感到亲密，尤其杨虎城是陕西人，就感到特别亲密，所以经常到他家去谈天，吃陕西饭。

当我由上海去东京时，党中央通过张金印后改名张慕陶，叫我到东京后，多同杨虎城接近，影响杨虎城。我因负有这样一个任务，所以到杨虎城家去的次数就较多，主要去谈些国际形势、国内革命发展情况。杨当时也表示同情革命，杨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大约在那年七八月间，还给了我3万元，叫我转交给共产党。我通过张金印转告中央，后叫我把这笔钱交中国济难会负责人浦化人了。

杨虎城在东京这一段时间，接触面很广，中国留学生他都接待。当时中国各军阀如北方的张作霖，南方的孙传芳等等差不多都往日本送的有留学生，学生都各有后台，有一年“双十节”开庆祝会，北方派的留学生和南方派的学生在会场打了起来。第二天，东京报纸以《日本国都内的中国南北大战》为题，描述了这场斗争。

1928年九十月间，我由东京回到上海，不久，杨虎城也回到南京，住鼓楼饭店，党中央知道我和杨虎城的关系，又通过张金印让我去南京说服杨虎城，意思是说蒋介石是个流氓，用你时把你拉一把，不用你时，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不要上蒋介石的当，既然回来了，可以把队伍整编一下，

向苏区边境移动。我到南京见杨虎城，陈述了党中央的意见，杨虎城很长时间默无一语。最后他说：“你回去对他们讲，我向右转了。”我只好回上海复命。

注：①即中华民国国庆节。

# 我在历史上的一段经历

张归仁

1928 年 7 月，渭华暴动失败之后，我化装掩护负伤的共产党员张汗泉同志到西安广仁医院住院治疗。一时生活无着，后经韩威西、上官树德等人介绍，我就到了杨虎城在陕西的留守部队赵寿山团，在团医务所当了军医。不久，部队奉命东开，大约是年 10 月间到达鲁西单县，与杨部前方的部队会合。部队集中于金乡、单县、鱼台地区，被冯玉祥缩编为陆军暂编二十一师，下属 3 个旅 9 个团。这时，杨虎城已由日本回国，任师长。1929 年春节后，韩威西由七团调到师部法军需处长，同时把我也由团医务所调到三旅旅部，负责 3 个团的医疗救护。不久，部队开始执行剿灭土匪任务。在诸城时，通过看病我认识了共产党员魏志坚，经他介绍，我又认识了王泰吉同志。那时，陈子坚是师政治处处长，魏志坚也在政治处工作。部队到博山后，魏志坚又被调到八团三营任排长。这时，我们驻地相距不远，他常来看眼病，逐渐混熟了。我当时情绪苦闷，魏志坚耐心开导，时间久了，越谈越深，才知我们都参加过渭华暴动，都认识王泰吉，我就对他讲了找不到组织的苦闷，请他向组或汇报，接上组织关系。不多日，在一个下午，魏志坚约我到一个小食堂去，正好同一个头戴鸭舌帽，身穿灰制服的人相遇，志坚把我介绍给这个同志，并把我的经历代我汇报了一下。这个同志说，今天是接关系的，准予接上，为了方便，以后要我同魏志坚保持单线联系。这个同志是谁我也没敢问，以后也再未见过这个同志。1929 年秋季，部队就奉命开抵河南南阳了。这时，部队几经整编，中共党的组织也进行了调整，我仍在三旅医务所工作，我们的党小组长是董林哲（在师部工作），党员有魏志坚（在八团工作），封建（在三旅旅部工作）。有一次我们在南阳城墙上开党小组会，外表看象是野游的，实际是一边走

一边开会哩。以后党员多了，经封建同志介绍，我又认识了曾楚川同志，经报准让曾任旅部医务所少尉军医，曾在党内，经上级党批准任我们党支部书记，分工我保管党的文件。在这个支部过生活的还有魏志坚、封建等。这个时期，党的工作活跃，活动频繁。《宛南日报》掌握在党的手里，时逢红色 5 月，每遇节日即组织学生开会，上街游行，轰轰烈烈。师部成立了南阳教导队，编了 4 个中队，一中队队长是申及智，二中队队长王明（中共党员），三中队队长赵莘仁（中共党员），四中队队长张汉民（中共党员）。约在六七月间，党组织计划组织部队起义，拉到桐柏山区进行活动。我根据曾楚川同志的指示，准备了两小箱药品藏在一个照相馆中，待命行动。不幸被坏人向孙蔚如告密，起义未果，王明、赵莘仁同志被送进方城监狱管押，曾楚川仍回医务所工作，党的活动又呈低潮。1930 年秋，我随十七师第三旅回到陕西渭北一带。

# 在杨虎城部当参议

赵鹏九

1929 年春，中共河北省委派我到杨虎城部工作，建立关系，发展组织。我到了山东莒县见了杨虎城，颇为投机，谈起中国的革命，也恨蒋介石、冯玉祥的背叛。

我这时又充了杨虎城的参议，充了他的代表联络方振武、高桂滋、邓宝珊等。

同年夏季蒋介石到了北平，是准备对冯玉祥的西北军开刀作军事部署，杨虎城为自己的存在，也到了北平。杨告蒋的“威逼分化”4 个字，使蒋介石惊异而吃惊，连云虎城不是粗人，虎城不是粗人（因蒋问杨如何解决西北军之问题）。从此，杨部更为蒋目中之钉。

*本文摘自赵鹏九《我的自述》。标题为本节编者所加。

# 我在杨虎城部的一段经历*

杜理程

1929 年夏我到山东莒县杨虎城部时，师部和各旅都有党员同志，但没有组织起来。秋间才成立党的组织，当时我是军委书记，董林哲是组织委员，田静沉是宣传委员。

在组织成立不久，杨虎城的部队就由山东开到南阳。我们到南阳后，同地方党组织是有联系的，但对开封省委始终没有联系过。1930 年夏秋之间，开封省委派白自立同志（陕西清涧人）带来命令，叫由杨虎城部派一部分同志举行暴动，支援地方组织。当时我认为地方没有力量，暴动一部分，是站不住脚的，不如全部暴动，力量还大些。上海党中央派来师的联络员孙永康同志，不同意我的意见，党组织也没有开会，白自立同志是我的同乡同学，也没有和我见面，孙永康就决运驻在舞阳县冯钦哉旅的特务营长张焕民同志，带全队举行暴动。暴动失败后，张焕民、白自立等同志都在泌阳县牺牲。这次暴动是决定一个营举行的，其他师部和旅部的同志都没有参加。

在南阳县宣传委员改变为冯毅生[异僧]同志（已死），组织委员始终是董林哲。在暴动后不久，我就脱离党的组织，以后组织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1930 年南阳县伪警察局在乡间欺压农民，由南阳地方竞组织发动农民进城向杨虎城控告（因为当时伪县长、伪警察局长都是杨虎城委任的），并在杨虎城的军法处门外，围坐了几天，以后杨虎城不得已将该警察局长枪毙。这件事是地方党组织发动的，军队党组织是协助支持。在军队内宣传伪警察局长的罪恶和农民的声势与决心等，对农民声明军队里有人支持你们，不要害怕，一直干到底。

在沩警察局长枪毙后，杨虎城又委他的参议赵鹏九接替。

*本文系杜理程 1970 年 6 月 2 日为董林哲写的历史证明材料，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从1927年到杨虎城军内至红九军失败*

董林哲

1927年到江苏砀山县（今属安徽省）第二集团军第十军政治处工作。军长杨虎城，政治处长郭乐三。

这个军队是安徽阜阳暴动后调来的，军长杨虎城去了日本。阜阳暴动时，我地下共产党员牺牲的和走掉的为数不少。没有暴露的留下不敢活动。如张焕民等同志。从各地来的同志，如纪子中、李连城、陈均、原少文等。从山西逃来的如梁卜五、韦思恭、朱文蔚、张亚楠等。在砀山时中共中央（在上海）曾派人来联系，李连城等推诿而去，想苟安于此，暂不活动。我和张焕民、韦思恭等同志商量作士兵运动，连长以上不发展。先从张焕民同志连做起，训练进步士兵，吸收党员，打发开小差，到其他部队当兵活动（张焕民当时是第一师特务连长，师长冯钦哉）。在砀山不久，全军开到山东单县，年终开拔到山东临沂县。

1929年1月杨虎城自日本归来，整顿军队，进剿土匪刘黑七、顾震。进驻莒县。大约六七月杜理程自上海来，带有介绍信，和党中央取得联系。不久党中央派欧阳〇同志来视察工作。指定杜理程和党中央E：接联系，工作照前进行。当时已经发展士兵同志数十名，连排长多人。政治处成立党组：董俊（董必武之弟）、刘佛吾（刘子谷，现在国务院参事室）、胥子均（1935年去陕北，没有消息）都是党组成员。军队改编后胥他往。

1929年8月被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匪帮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十四师，政治处改为政训处，派来国民党处长田毅安。我被分拨到第八团当训练员（团长段象武）。在第八团发现共产党员魏志坚等，有的是参加渭华暴动的，也发展新的对象。

1929年9月间从山东开拔到河南南阳县。在军队休整期间，我和杜理

程、冯异僧研究党的工作，初步分工，分头进行工作，发展党员。休息不久，军队出发内乡县打刘汝明，进军荆紫关。某夜半，魏志坚同志忽从前线跑来，向我说：他准备好要把军队拉出来到陕西商县打游击。我和他分析了当时形势，打消了来意，安然回防，未的举动。从荆紫关回南阳未停，又进军驻马店，打垮唐生智，杨虎城升了第七军军长。政训处结束，全部人员调南京受训，扣饷两月。我不到南京，回南阳来搞地下党的工作。

1930 年初回到南阳，杨虎城又升为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兼南阳守备司令。南阳县长陈子坚卸职，米暂沉继任。陈子坚交代期间，请我代理县政府收发主任。当时杨虎城扩充实力，招兵买马，社会名流，都来投奔。我党同志如赵莘任、王民[明]、王璋峰等也来想借机会做工作，发展我党势力。还有蒋听松也来给杨虎城当参议。

在这个时期，冯异僧同志工作很努力，借军队力量，把宛南中学校长、南阳女师校长，均换成党员同志，只要是力量所能及的学校，和南阳中共地下党都研究安置了自己同志。就因为这样，引起杜理程对冯异僧同志的怀疑，说冯是第三党。这种无谓的怀疑，使杜受了批评，杜很不满意，甚至闹对立。适此时党中央派来孙永康同志指导工作，研究的结果，成立了军委会，仍以杜理程为书记，冯异僧为组织，我担任宣传，增添委员孙永康、张焕民同志（从此由孙永康同志和中央直接联系，取消杜理程和中央联系，免出意外）。这是 2 月间的事情。以后有些重要事情就不让杜理程知道了（当时组织上一个人和中央组织联系）。

创办《宛南日报》，冯异僧负责，编辑王璋峰等，作为党的宣传机器，揭露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恶霸活动。

成立学生联合会，帮助地方党发动群众运动，成万农民进城进行游行示威，要求杨虎城枪毙公安局长耿纯和分局长某。杨虎城在群众压力之下，不得不枪毙那个公安局长，以平民愤。从此南阳群众起来了，学生砸毁国民党县党部，农村斗霸分粮之事也发生了。我又清理了监狱犯人，将多年无头绪之犯人和来往军队寄押的犯人共清出一百四五十人，全部释放。这

都是在米暂沉县长任内发生的事情，是不得已而为之，非米之本意也。

十七路在南阳成立了教导队，第二队长赵莘任（党员）、第三队长王民[明]（党员）、第四队长张汉民（脱党未恢复），在教导队成立党支部，由赵莘任、孙永康等负责，吸收党员。

4 月我到十七路宣传处（处长陈子坚，脱党）工作（宣传员）出发方城，军队准备打冯阎军阀。

就在这个时期，曹鸣九传达了中共中央命令：指示把军队拉出去，到桐柏山区集中打游击，名义红九军。我当时不同意，理由：军队分散各地，不易集中我们的同志，和地方党组织没有联系。地方反动势力、民团、红枪会密布，不容易突破他们的势力范围，应待机行事，孙永康坚持中央命令。最后研究，重新改组军委，我不参加。遂把我能联系的同志名单，交给孙永康联系。冯异僧也没参加，孙永康、曹鸣九和张焕民去准备，进行工作。

最后和张焕民见了一面，他从前方来方城找我，在郊外详谈半天，谓军队目前情况，同志联系很多，空手易行，带武装难行，驻防地方，周围都是军队，很难举动。孙水康限于中央命令，急不可待，言时泪下（有力的军队，完全靠张焕民连作骨干）。孙永康初来不久，不明实际情况，坚持中央命令是对的，孤军拉出，危险实大。我只有安慰他，听中央命令，我设法支援你们。我和冯异僧从方城回南阳，找中共豫西特委，研究如何支援红九军问题。尚未得到结果，遇见王菊人（王当时是杨虎城的秘书，住杨虎城家，杨在前方北舞渡，南阳是孙蔚如坐镇），向我和冯说：前方冯部特务连叛变（大意如此），你们回来干什么？孙蔚如很注意你们，还不快走，我和冯异僧商量结果，他去南阳以东赊旗镇一带迎接红九军，我仍回前方看情况，组织未走的同志。我到前方北舞渡后，有的同志开玩笑说，听说你们被杀了，后来听说张焕民被俘，为冯钦哉所杀，以后调查了解，红九军起义后，未走 60 里（舞阳县某镇）就被军队民团包围，战斗猛烈，大部牺牲。这是六七月的事情。失败原因：第一. 起义后不急行军先到

目的地再宣传，遂出师就展开宣传，高喊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口号；第二，战争打响，带的银元太多，每人发1〇〇元，丧失士兵斗志；第三，没有接应军队，孤军独战。这一次大部分同志牺牲，孙永康没有下落。1932年柴梅五同志自汉口来西安，送第四方面军工作（柴梅五改名张青参加起义军，说的很详细），至今没有消息。参加起义的还有个姚洗心，闻在郑州以北中学校工作。

这次失败是执行李立三错误路线而失败的。孙永康初来，不明军队实际情况，同志们仓促集中，又无训练，糊涂起义；指挥不一，也是失败原因之一。

注：①即姚丹村。

*本文摘自董林哲1969年2月28日所写历史材料。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张焕民在十七师发动兵变*

石仲伟

1930年春初，我在汉口参加地下党武汉军委工作时，接到党中央指示，派我到河南南阳杨虎城部十七师做兵运工作，主要是策动革命兵变。中央指出，有以下三个条件之一即可发动兵变。（1）正参加军阀混战；（2）党组织的机密被敌发觉；（3）当地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并预定从杨部兵变出来以后的番号为工农红军第九军。

我由汉口去南阳途中到了驻马店，此时杨部的冯钦哉旅正驻防该地。我找到了在该旅当手枪连连长的我党同志张焕民，将中央的指示和意图告诉了他。他表示完全接受。为了准备起义，我们商谈安排了一些新的措施，如与当地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由张设法把该连不少手榴弹、步枪子弹送给了当地组织，作为尔后配合起义之用。

我在驻马店，住在谈国帆开设的一个旅馆里（解放后，谈曾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住了月余时间。3月间，我由驻马店到了南阳（十七师师部驻地），同我党鄂豫边区特委书记郝久亭（郝腿部有毛病，一些人叫他郝跛子）商量确定，为了在杨部积极开展兵运工作，扩大兵变力量和影响，在杨部主办的教导队官兵中展开发展组织的工作，在地方的几个中等学校（宛南中学、女子师范）师生中，亦开展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5月间，蒋、冯、阎中原混战，杨部向陇海路以南登封一带集结，准备参加作战。驻在驻马店的冯旅亦北开至叶县一带。

7月间，正当陇海路沿线蒋与冯、阎军激战之时，张焕民同志在驻地叶县属的旧县镇发动革命兵变，打起工农红军第九军的旗帜，张任司令员。兵变后，张率领部队向南挺进。消息传至南阳，负责南阳岩方责任的杨部旅长孙蔚如，采取了不少所谓治安措施。其中之一，是将认为政治上有问

题的人送到登封杨部前方。被送往的有冯异僧、董林哲、和非玄和我（我们留在南阳，他们不放心）。一天，车到了南阳赊旗店（今社旗县）以北休息时，我同冯异僧借机乘车离开，向东北方向走去找张焕民部。后来得知张率领的部队进到泌阳西北某地时被冯钦哉派来追剿的一个团（团长王明钦，解放后在甘肃省兰州文艺界工作）击溃，张被俘，被押在泌阳县政府。听到此讯后，我俩即直往泌阳。

到了泌阳，我们同泌阳地下党县委负责人某（姓名忘记，我俩住在他的家里，家在城内南街的一个小巷内）商定，采取劫狱的办法，把张焕民营救出来。我们动员了农村五六十名带有手枪的同志，还派人到驻马店把原先交给地方组织的手榴弹运回一部，并对张在押的监狱周围环境作了调查了解。城内警察局有四五个警察是我们的同志，约定行动时由他们控制西城门，劫狱成功，由西门出城。动员布置时，我们在城西野外西瓜地里开过一次会，劫狱时间定在深夜进行。但在那天早晨，我们发现那位县委负责人把此事告诉了他父亲（据那位县委负责人说他父亲不是党员，还信仰基督教），因而泄漏了秘密。午后，在西关一个木匠同志家里开会，确定晚间行动的具体部署时，警察局的一个同志即来报告说，县长杜葆田带领警察多人，将县委负责人的家包围了，将他父亲拘捕了，正在搜查他的家。接着，又看见四方民团陆续开进城内，此时我们动员的农村同志五六十人集结在城南野外，仍准备相机行动。到了晚间，城内到的民团很多，并在城墙上挂起灯火。敌人戒备防范极严，以致未能劫狱。

第二天，我同冯异僧到了驻马店，遇见兵变后被南阳杨部教导队革除的蔡子伟等人。遂一道到了信阳，参加了党的京汉军委工作。自泌阳到信阳期间，先后听说张焕民率领的部队在泌阳西北某地被敌军击溃后，有几个同志带着部分士兵转入豫鄂边区，在桐柏一带打游击。后来党派赵莘任负责，在那里创建了革命根据地。以后，赵在同敌军作战中英勇牺牲了。张焕民在泌阳狱中，后被冯钦哉派人枪杀。张在被押期间，曾给杨虎城写过一封长信，讲国民党必然要失败，共产党一定要成功的许多道理，表明

自己是一个马列主义的忠实信仰者。临牺牲时，张高呼“共产党万岁”口号。牺牲地点，当时我听说是在泌阳[②]。

**注：**①据姚丹村回忆，冯旅原驻旧县镇，兵变时已移驻舞阳之下澧河。

②据中井社旗县委党史办 1984 年 11 月调查结果，张焕民等同志于 1930 年 7 月 24 日被杀害于泌阳县城南门外。

# 舞阳下澧河暴动记*

姚丹村

这是我 1930 年 7 月参加下澧河暴动的始末。

## （一）随杨虎城部队到达南阳

1929 年夏我随杨虎城部队由胶东开赴南阳。我是和陈子坚、徐兰谷两位参谋先头到达的。抵南阳后，我就急切地找南阳的党组织接头。通过接头处李三哥的传达，很快地和中共鄂豫边特委书记郝久亭见了面。我告诉他，我已经通过陕西中山学院同学齐中正的介绍和杨军党组织建立了关系。他告诉我说，由于南阳地区近年来光景不好，党的经费十分困难，眼下党组织在城内还没有设立机关。他向我提出，是否可以把我母亲搬到南阳来，在城内安个家，作为特委机关。我欣然同意，并立即派人把母亲和弟弟志超从镇平接来，在城内北大街安了家。从此，边区特委书记郝久亭和特委秘书杨连荣，就以我表兄和表弟的名义庄在我的家里，进行工作。

部队陆续到达南阳，师部驻在城内，各旅分住附近各县。这时我将我已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的情况，向军队党组织负责人董林哲作了汇报。后来军队党组织负责人冯异僧、董林哲提议，要我介绍他们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双方有了联系之后；地方党组织向部队输送了大批新生力量。同时，地方党组织也得到军队方面的帮助，使地方工作得到了蓬勃发展。

## （二）到前方去

1930 年，党在南阳城内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鄂豫边区特委书记郝久亭、第七军（此时杨部已改为第七军，杨任军长兼十七师师长）军委负责人冯异僧、中共中央华中局特派员白玉文，以及其他有

关的同志。会上，首先由白玉文报告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接着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当时国内形势的特点是：蒋、阎、冯各军阀间都在勾心斗角，进行拉拢，以加强自己的阵容。特别是大军阀蒋介石，以江浙财阀为靠山，以美帝国主义为后盾，抛出大量金钱，对冯玉祥的嫡系军队韩复榘、石友三等进行收买，使冯玉祥忍无可忍，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我们正可利用这一大好形势，进行革命工作，以搞垮敌人，扩大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变军阀间的战争为革命战争。

当时，我党在杨虎城部队中早有组织活动，尤其在第一旅冯钦哉部，党的力量更为雄厚。南阳城内杨虎城的教导队中，有 3 个中队在我党的掌握之下，张汉民、赵莘任、王明等同志是这三个中队的队长。他们已经有了半年多的训练，在队里发展了组织，培养了骨干，随时可以响应党的召唤。至于地方党组织力量方面，在南阳、邓县、新野、唐河诸县，群众基础也都很好。成立有农民协会，掌握有一定数量的武装，有过军事训练，随时可以发动起来。同志们在分析了当时的主客观形势之后，制订了一个行动计划。首先重视在前方的冯钦哉旅的兵运工作，在那里首先发动，然后由南阳城内的教导队作出响应，占领南阳。同时地方党组织也在各县发动群众，予以配合。这样就可以割据豫鄂边区，成为我们的根据地。因为当时在鄂北已经有工农红军二十六师，占据着襄阳、枣阳、宜城、钟祥 4 县的边区了。

这次会议我因事没有参加，会议情况是后来由郝久亭给我传达的。这个会议开过后，第七军军委即派孙永康陪同特派员白玉文到前方冯钦哉旅进行工作。适在这时，军部也让我以教官名义带五六十名侦察员协助前方部队做侦察工作，因之我也到了前方，随旅部住在叶县的旧县镇。

### （三）成立暴动的领导机关——前委会

我到前方后，经孙永康介绍，第一个认识的是张焕民同志，他中等身材，很结实，二十五六岁，说话陕北腔，性情开朗，对同志热情。当时他

是杨军第一旅冯钦哉的手枪队长。这个队约有 200 人，武器很好，每个士兵都是 1 支长枪，1 支短枪。听说他的排长都是党员。这些武器和全队官兵，都在他的掌握之中，随时可以听从党的召唤。

在工作中认识的第二个人是王老汉。他其实并不老，不过 30 岁的年纪，只是相貌有些苍老，又有点驼背，所以都喊他王老汉。叫的人多了，就习以为常，因而他的真实名字反而难为人了。他是旅部的书记官，为人忠厚，说话诙谐，能深入浅出地讲解马列主义道理，他说的话人都爱听，也都信服。他是陕北米脂县人。

后来在一次会议上，见到了旅部卫士营的营附刘煊。他是陕西关中人，二十六七岁，为人忠诚，不多说话。

由于当时客观形势很好，大家认为军阀战争要打一个时期，这正是我们发展革命力量的好时机。所以大家的革命热情很高，信心很强。经常为了多搞到一些武装，拼命工作，彻夜不眠。

有一天，特派员白玉文同志提议说：“我们搞暴动须成立一个暴动的领导机关，成立一个前委会，来具体负责领导工作。”我和张焕民都同意这个意见，认为有成立的必要。于是就选择成立前委会开会的地点，后来确定在我们密查队的队部，这一天，我把靠不住的人员派出去工作，把可靠的人留在队部，外面放上岗哨，屋里桌上放着麻将牌，作出正在打牌的样子。在会上提出并讨论了暴动计划，选出孙水康任前委书记。他是军委派来的代表，二十四五岁，陕西关中人，衣冠整齐，文质彬彬，能言善辩，有小诸葛之称。张焕民任组织委员，王老汉任宣传委员，刘营附任军事委员，我任交通委员。

## （四）暴动之夜

不久，我们奉命移驻舞阳北的下澧河。这时同志们都在紧张地工作：派人到各营连去串连，宣传暴动计划。因为工作进行的过急，走漏了消息。暴动的风声吹到了军部，杨虎城军长半信半疑，就派密查处长张依中来了

解情况。那时我正在患病吃药，我保持镇静，泰然自若地和他随便谈了些前方的情况，使他不疑，他就走了。他走后，我们意识到张依中这次来前方，目的是了解我们的动静。想来我们在前方的活动，已为军部所知。因此我们决定提前暴动。适在这时，旅长冯钦哉因事到南阳去了，这给了我们一个发动暴动的有利机会。

7 月中旬，举行暴动的这一夜晚，我们前委的成员开了半夜的会，安排暴动的行动。决定由我带领两名卫士，帮助刘堉营附解决卫队营营长的问题。手枪队的张焕民队长，负责解决门副旅长和军需处长。其余的工作任务也作了交代与布置。散会后，我就挑选了两名得力的战士，跟着刘营附到了卫队营营长的住室。那个营长正在熟睡，刘营附朝他头部打了两枪，将他击毙。随后，跟我去的人栋出了他和卫士的枪支。接着，听到另外的地方也响了几枪。我想门副旅长和军需处长大概也完了。很快别的部队也都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我们砸了军需处，把银元抛在街上让穷苦百姓去拾。我们缴了很多枪，密查处原来没有枪的战士，现在都有了武器。到了四更时，暴动胜利的部队，雄赳赳地向南阳方向进发了。当时我虽在病中，但很兴奋，骑在一匹马上，前头跑跑，后头跑跑，对战士作宣传鼓动，招呼队伍前进。

## （五）成立红九军

我们紧张地走了一天，到达叶县境内宿营。次晨饭后，在一个山坡上举行了一个全体官兵的誓师大会。会上由孙永康和白玉文讲了全国的革命形势和这次暴动的意义，最后通过选举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的领导机构。张焕民为司令员，孙永康为政治委员，我和刘煊为副司令员，王老汉为政治部主任。为了不打乱建制，以原手枪队约 200 人为第一支队，仍以张焕民兼任支队长；以原卫队营约 400 人为第二支队，仍以刘煊兼任支队长；以原密查队数十人和旅部暴动出来的其他零星部队共约 200 人为第三支队，由我兼支队长。开会之后，按照新的建制排好队形，唱着军歌，

继续向南阳大路上前进。

## （六）严重的挫折

一天之后，我军到了餘旗镇（今社旗县，当时属南阳县）东 20 里的郝寨。我们在那里隐蔽了一夜，准备次日拂晓突袭赊旗镇。因据密报赊旗镇只驻 1 连兵力，我们拿下没问题。第二天约四更时，我们吃过早饭，组织了便衣队，怀着手枪，担着柴草，装作赶集，企图混进城去。不料敌人已有警惕，紧闭城门，并在城墙上呐喊。我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遂组织强攻。但赊旗城高壕深，而且已有准备，虽只 1 连守敌，因在白天，很难取胜。这时司令部命令部队退出战斗，向东南方向转移，中午到达唐河县北的王六庄。

午饭后，我们正在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突然听到寨外高粱#里有了枪声，接着迫击炮也开了火。我们估计这是冯哉派兵追到了，于是予以迎击，自午至晚打了半天，互有伤亡。就在这时，政治部主任王老汉对我说，司令部决定让我带领第三支队守住王六庄，一、二两支队出寨去抄敌人后路。我认为他的话有理，就接受了守寨的任务。一、二支队刚出寨时，枪声炮声密密麻麻响成一片，但尔后枪声却越响越远，移向东南方向，逐渐趋于沉寂，根本不象是抄敌人后路的样子。这就引起了我的怀疑。到了半夜的时候，敌人向王六庄发起猛攻。而我第三支队，是刚拼凑起来的部队，官兵尚互不相识，无力迎战，王六庄遂为敌人攻陷。由于暴动军与追击军原是一个部队，穿的是一样的服装，不好分清楚，我才得在混乱中身带一支驳壳枪混出寨来。我凭着天上的河星南行，临天明，到了唐河南的仝庄仝中玉同志家。我把枪放在仝家，问明特委的所在地，就去向特委汇报这次暴动及失败的经过。

事后得知，当前方部队暴动后，特委曾派秘书杨连荣前往赊旗和暴动军取得联系。但在路上为国民党部队盘查逮捕，并搜出了党的文件。杨在无法遮掩的情况下，高喊“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另外知道，所

谓一、二支队出寨抄敌人后路的话，也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们是打算撤向鄂豫皖边区，找徐向前部队会师。但走到泌阳，却为当地民团王友梅部截缶，被包围缴械了。这次暴动遂告失败。

# 杨虎城部南阳教导队情况*

蔡子伟

1930 年，我到上海找党组织，没接上关系。又回到南京，在赵和民处遇见岳仲仁（均陕西华县人，参加过渭华暴动），岳约我同去杨虎城在南阳办的教导队。

我被编进教导队第三队当学员。教导队里党员很多，每队都有党支部，大约 1/3 的人是共产党员。群众工作也搞得很活跃，红得很。杨虎城有戒心，所以教导队的学员一律不发武器。我记得教导队共分了 4 个队。二队队长赵莘任，三队队长王明，队附刘寻，四队队长张汉民。

当时谁要稳重些，与上层接触多些，别的同志就觉得他有问题。因此，就曾怀疑过张汉民、石仲伟等同志。

我刚到南阳教导队时，陈子坚任南阳县长。支部让我在万人大会上讲话反对陈子坚。下来后，孙蔚如亲自找三队长王明，查问我的情况，王明应付了过去。接着我又当了团委书记。

南阳县三十里屯农民搞暴动，县城里群众支持暴动游行时，县公安局长耿纯叫开枪镇压，打死了人。

杨部冯钦哉旅住在方城，手枪连长张焕民发动兵变，把副旅长打死了，把旅部也抢了，给士兵每人发 100 块银元。结果，士兵都想回家，控制不住部队了，张焕民把兵变队伍带到南阳赊旗镇以南王六庄时，被杨军一个小炮营包围，兵变失败，张被活捉，后被杀害于泌阳。

紧接着杨虎城以学业不好为理由，把教导队学生开除 12 名，我是名单中第一个，记得还有冯异僧、石仲伟、孙永康、曹鸣九、封建等。刘寻告诉我，其实就因为是共产党员而被开除。第二天，我们 12 人还出了一个反杨虎城的宣言就走了。

我们带着南阳特委书记郝久亭的介绍信，找到信阳特委（又称京汉特委），书记姓贾。他叫我当军委巡视员。当时吉鸿昌部队驻在信阳，徐向前部队在广水一带活动，我曾向鄂豫皖苏区领送去一些人，还组织过广水车站附近的暴动未成。从到信阳以后，我再未回过教导队。

注：①据石仲伟本人回忆，冯异僧、石仲伟不是教导队学生，也不曾被开除过。事实是舞阳兵变后，南阳当局将冯、石解送前方，冯、石中途逃脱。

# 在南阳教导队做党的工作

汪　平

我和董林哲相识是在1929年夏秋之间，那时，我在暂编二十一师（杨虎城）第八团十二连当排长，他，在团当政治指导员，孙作宾在九连当司务长。童对我、孙比较亲热，我和孙也很亲近他。第八团西进打淅川后，董即离开了第八团到了南阳（师部驻地）。是年10月左右，我和孙先后调到团部当附员。孙于十一二月由镇平（团部驻地）去南阳，我于1930年3月前后由团介绍到南阳十七师教导队学习。到教导队后，董即找我，并到三队队长王明处坐了一会儿，还向王介绍我的姓名。董当时谈话表示想叫我到教导队某中队当司务长，以后也再未谈此事。我估计可能是王明也不坚决要我。

3月下旬左右，曾楚川召集我、孙作宾、杜俊杰……成立党的小组。事前，在成立小组前，曾找我谈成立小组事，他还告诉我；董林哲介绍你参加共产党，最近我们即成立一个小组。过了几天，在一个晚上，曾召集我们开会，宣布成立小组。曾由上级指定担任小组组长。

杨虎城进驻南阳后，南阳地区政治空气很高。南阳有河南省立师范和五中，教导队成立后，政治活动显得特别高涨。教导队开学时，杨虎城亲自到会讲话，表示要走革命道路。

教导队举行了晚会，演出了阶级斗争形式的剧情。教导队学员还组成几个组到街头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主）。五一节，在南阳市军民开了一次大会。这次大会表现革命的气概。南阳有变红色的趋向。这时党的领导工作是强有力的。董在南阳，我个人印象，他是很积极的活跃的。那时，冯异僧主持《宛南日报》（或是《豫光日报》）。这个报，对革命鼓动很大。董与该报负责人冯异僧常在一起行动。我个人

估计，董、冯当时可能都是南阳地区党的领导中心人物？！董也常到教导队的第二、第三两队。队长赵莘任、王明，还有一位区队长孙永康均是共产党员。这是公开的秘密。王、赵、孙可能就是教导队党的领导中心。那时，“立三路线”在南阳地区是起着主导作用的，有准备在整个南阳地区实行总暴动的势态。

在南阳时，有个宪兵连，连长钟期恭，思想反动。王杰当时在宪兵连当班长，入陕后，成立宪兵营，先是杨虎城兼任营长，副营长纪子中，教育副官叫杨桂梁（渭南人）。成立宪兵营时，董林哲介绍我到宪兵营任上尉书记，常给士兵上政治课。这时士兵党员与军官党员不发生横的组织关系，军官组组长为霍士杰，党员有王世良（王曙）、杜俊杰和我 4 个人；士兵委员会书记是王杰，以后是魏志坚、杜俊杰[①]。我曾经利用纪念周宣传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以及联共等内容。我们也进行过反托派斗争，当时怀疑纪子中为托派。1932 年，金闽生任营长，我即离开宪兵营。

注：①据王杰回忆，当时叫营党委，书记是魏志坚，后为王杰。

# 回忆在南阳教导队和张汉民警卫团的工作情况*

王建三

1927 年我在原籍山东滕县界河火车站电报室学习英文及译电。1928 年 2 月，北伐军进到界河，我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蒋介石自兼总司令），在司令部当准尉译电员并随军北伐。5 月 3 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我军撤出济南退至徐州。7 月，军队改编，我编余回家。1929 年唐生智部在济南招募新兵，我报名入了伍。是年底，到河南驻马店唐的司令部待分配。新年前夜，杨虎城部（当时是新编十四师，后为陆军十七师）冯钦哉旅乘庆祝元旦之机，突然袭击唐的司令部，全部人员被俘。管理被俘人员的是旅部手枪队长张焕民（山西人）。不几天，被俘人员遣返回家，因我是尚未分配的新兵，张把我留下，在他的队部暂当司书。由此，我便进入了十七路军。

我当司书后，张焕民多次找我，了解我参军前的经_历和家庭状况，给我些进步书刊和左翼作家的小说让我阅读，谈些青年出路的问题，逐步提高我的思想觉悟。

1930 年 2 月，二七大罢工纪念前夕，张焕民给我一些传单和标语要我散发张贴。记得其中有一首仿“苏武牧羊调”的歌，歌词是：“当兵痛苦真可怜，吃不饱，穿不暖，终日受熬煎。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坐空帏，三更魂如梦，两地谁梦谁？”这些传单对以后举行兵变起了相当作用。我把传单在天亮前撒在操场上，上操时都被官兵拾去了。把标语贴在火车站及站内列车上，很好地完成了任务。经过这段时间的帮助教育和考验，2 月底的一个晚上，张焕民和封建 2 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 年 4 月，党组织派我到南阳师部军官教导队受训，被编入第四队，队长是张汉民，区队长董耀先（陕西乾县人）、孙建功（河南人）、陈应

宝（临潼人）。我到教导队后，先与曾楚川（化名楚云，湖北人）发生党的组织关系，后与张海慧、孙作宾发生组织关系。第四队学员就我一个人是党员，我常利用午睡和休息时间接近同学谈心，培养积极分子，先后发展翟松生、刘兴汉为中共党员。这时风闻张焕民率手枪队和工兵连的一部分，在舞阳发动兵变牺牲了。为此，班长刘福考（据说是冯玉祥的旧部）怀疑我有问题，禁止我和其他学员接近，并打了我一顿板子。

是年 11 月，十七路军进陕，教导队随军开往西安，驻在新城。1931 年春，教导队毕业，其他同学都分配到部队去了，第四队先扩编为卫士营，后扩编为陕西省政府警卫团，团长张汉民，副团长阎揆要，军需处主任王超北。警卫团下属 3 个队，第一队队长董耀先；第二队队长孙建功；第三队队长陈应宝，我为三队队副。是年秋，警卫团成立干部队，调我任上尉副队长（兼第一区队长），队长魏书林。区队长还有刘玉昆、李楠，学员都是基层干部和新招的学生。其中有十几位进步学员，现在能记起的有王占鳌、张湘寒、何志鸿、阎杰、冯光明等，其余名字记不清了……

在警卫团期间，党组织的联系人是常黎夫同志。有一天，陕西省政府总务科董林哲同志找我说，常黎夫同志要见我谈一谈。几天后，在省政府东院我第一次见到常黎夫同志，他向我谈了党组织的日后联系问题。不久，第二次见面后他告诉我，王均治（汪锋）是组织派来学习的，要我有事照顾他，同时告诉我陕北刘志丹那里缺乏干部，要我想法输送些去。于是我暗中鼓动王占鳌和另外两个学员（名字记不清了）首先去了陕北。当时王均治在学员中很活跃，他和冯光明比较密切，曾在西安军械库（或者火药库）开过会……

在警卫团期间，我知道的共产党员有阎揆要、王超北、史唯然等，都在团部工作，和他们没有发生任何组织关系（在军队地下党活动都是单线联系，不准发生横的关系）。我知道张汉民也是共产党员。

---

*本文据《丹心素裹》所载王建三《回忆南阳教导队》一文和王建三 1984 年 3 月所写历史材料整理。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回忆汉宸和绮云在十七路军的几件事

米暂沉

（一）

1930 年，军阀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中原大战爆发后，是年夏，皖北特委负责人南汉宸来到河南舞阳杨虎城军中，开始了杨和中共的第二次合作。

中原大战以蒋介石取胜而告终，杨虎城因为蒋效力而获得陕西省政府主席的职务，这对杨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变。年来时而隶属于这一个军阀管辖，时而又归另一个军阀指挥，转战于豫、皖、苏、鲁各省的局面。从此以后，他的这一个纯军事集团将转变为一个综管地方军政的机构，而且要回到自己家乡所在的地方。今后如何作法，关系他和整个部队的前途。

南汉宸的到来，使杨得以和他探讨十七路军前途与入陕以后政治措施等重大问题，使杨明确了以下问题：

（1）认识到蒋介石让他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其目的是以此为诱饵让杨继续为他卖力，捣毁冯玉祥的西北老巢并消灭冯在西北的残余势力，然后再以他的嫡系取杨而代之。十七路军的存在与发展，必将与蒋介石发生深刻的矛盾。中原大战的结果，证明蒋介石绝不是任何军阀所能斗倒的，今后在十七路军和蒋的斗争中，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唯一可靠的同盟。

（2）蒋介石的特点是对内独裁与对外屈辱，必须抓住蒋的这些弱点，制定自己的大政方针。

（3）决定了入陕后实施民主政治，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与学术自由，发展爱国主义教育，兴修水利等具体办法。

南汉宸作为以杨虎城为主席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具体执行了上述方针与政策。

（二）

我的身边保存了一张十分珍贵的照片，每当我看到它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幅照片，是宋绮云同志和我去慰问红军十五军团徐海东司令员时留下的，摄这张照片时，正是政治动乱的年代。

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当时，我任杨虎城总部军法处长，宋绮云是《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有一天，他到我的办公室，除了交换一些情况外，他告诉我：红军十五军团徐海东司令员带领部队已进驻咸阳西乡，为解决西安事变做后盾，建议我和他去看看徐海东司令员和红军，以表示慰问。当场我就同意了。于是，他打电话找来了他们报社的记者杨宾青，我带了一个警卫员，便乘车出发了。

汽车开得很快，到咸阳没停，继续往西开去。约莫过了 10 华里左右，我们就发现路边有三三两两的红军战士。我让司机停车问路。我说：“你们十五军团司令部在哪里？”

红军战士看看我们，然后摇摇头，没作回答。我又问：“徐海东司令员住在什么地方？”

红军战士们仍然摇头不作回答。

这时宋绮云低声地对我说：“我们询问的方法可能不对，应该把我们的身份告诉他。”

这时，我向红军战士说：“我们是代表杨虎城将军总部和《西北文化日报》，专程来慰问红军和徐海东司令员的。”

这么一说，立即引起红军战士的欢呼，一齐拍手欢迎。有的为我们引路，有的急忙跑去向徐司令员报告。

当我们来到一个普通农家的.门口时，徐海东司令员已经在那里等候我们。他把我们领进屋里后，就叫人去请军团政委程子华同志。我们坐下喝茶休息。

没过多久，程政委来了，握手之后，我们便交谈起来。徐海东司令和程子华政委分别向我们介绍了部队进驻此地的目的和意义，说明这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是对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义举的坚决支持。我和宋绮云向他们讲了西安和平谈判的一些情况。宋绮云还比较详细地向他们介绍了《西北文化日报》结合西安事变的发展连续发表社论和专文的情况。他们听了非常高兴。不知不觉时间就到了 11 点钟。我们向徐、程 2 位告辞，准备回西安。徐海东司令员怎么也不肯，一定要我们吃过午饭走。程子华政委说：饭已着人准备好了，吃过走也不晚。

在他们的再三挽留下，我们只好和他们一起进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使我们奇怪的是：吃饭时，端饭的炊事员和警卫员和我们一起平起平坐，共同用餐。他们在司令员和政委面前毫不拘束。而我们的警卫员和司机怎么叫他们来，他们都不来，只好另外招待了他们。当时宋绮云同志说：“这是延安和西安两种思想体系养成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说得大家都笑了。

饭后，程子华政委因有事先走了。我们又和徐海东司令员畅谈了一会，论述了西安事变发展的前途，都认为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会胜利实现的。

临走时，徐海东司令员把我们送到门外。在宋绮云的提议下，我们一起合影留念。这张照片，我一直保存到了今天。这是我和宋绮云同志共同战斗的唯一的纪念物，也是我和红军接触的纪念珍品。这张照片，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军事博物馆已复制保存。

---

*本文第（一）部分摘自米暂沉《杨虎城先生与中国共产党》一文，第（二）部分系《忆宋绮云烈士》一书所载米暂沉《我保存了一张珍贵的照片》一文。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杨虎城部参加中原大战前后*

连瑞琦

1929 年夏，我在杭州接到杨虎城来信，约我去山东莒县一谈。这时杨的部队已缩编为新编十四师，杨本人也由第十路总指挥兼第十军军长改任师长，当时正是蒋介石和冯玉祥酝酿中原大战初期，冯已令山东省主席孙良诚将部队西撤以对付蒋介石。杨虎城乘此机会，不服从冯的命令，未跟孙良诚将部队西撤，仍驻在宫县、诸城一带。杨同我见面时，他首先说：已同冯玉祥决裂了，没有服从他的命令西撤，估计他现时还不敢来打。但是我们要赶快同南京接头，找蒋介石。你同蒋的左右认识的人很多，请你来就是为了要很快地同蒋接上头，否则，咱们就成了野的，既脱离了冯，又不属于蒋。我说：这不是要我帮你投蒋吗？杨说：这是咱们在东京计划中的一条，你忘了吗？杨留我在莒县住了几天，委我为新编十四师上校参议，亲自把委任状送给我，并拿 500 元现洋与我作路费，要我启程。他再三告诉我，要设法使部队直属南京中央，归蒋介石第一集团军。

我从山东到了南京，首先同我岳父胡大猷商量。他是蒋介石的老师，蒋在日本留学时，他是代理留日学生监督，以后担任过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第七团团长。这时，陈仪任南京政府军政部次长代部长，胡任军政部总务厅长。我把杨要离冯归蒋的话向胡讲了以后，胡说：冯玉祥突然把在河南、山东的部队节节撤退，蒋已知道冯是要对付他，但又摸不清底细。今得杨虎城来归，他必然喜出望外，一定会同意。第二天，胡就同陈仪、柏文蔚、方策等浙江系军人研究。这些人都是蒋介石的重要幕僚，他们把杨的要求向蒋介石报告，蒋表示欢迎，答应了杨的要求。随后，杨部就由第二集团军新编十四师改属第一集团军。调驻河南南阳后，番号升为第七军。

我为了参加杨部工作，通过胡的关系，由军政部派我为陆军卫生材料厂厂长。这时蒋介石正对冯的部下用升官和金钱来引诱分化，拉拢鹿钟麟为军政部部长。鹿一上任就将我免职。我做了 3 个月材料厂长，卸任以后，即去南阳参加了杨部。杨虎城先派我为第七军交际处长，以后又兼军医处长。

1930 年 4 月至 11 月，蒋、冯、阎进行中原大战。各方代表都来南阳同杨虎城联络，内有蒋介石的代表何成浚、阎锡山的代表弓富魁、冯玉祥的代表南汉宸。当时我担任交际处长，各方来的代表都由交际处负责接待。杨交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同各方代表先谈。杨说：“你画格格，我填空。”意思是由我先把问题谈妥，他最后请客送行，在吃饭时，只说照连处长所说的办。在谈判中，南汉宸代表冯玉祥要杨反蒋，允许杨反蒋后做陕西省主席；阎锡山允杨做河南省主席；蒋介石允杨做陕西省主席兼西安绥靖主任，把西北军政大权都交给杨。蒋的条件符合杨要回西北的计划，因此杨拒绝了冯、阎的要求而决定附蒋。

南汉宸是共产党员，也是杨的老部下，他代表冯来与杨联络，表明西北党意在联冯倒蒋，而杨却决定联蒋倒冯。这与杨一向的联共主张不合，使杨很伤脑筋。杨最后决后，留南在十七路军工作，打败冯玉祥回到西北以后，政治方面交南负责。南也同意这个意见。但南是著名的共产党员，要留下工作必须做个过程。于是杨叫我把南“扣押”在交际处，然后杨同蒋的代表何成浚商量，请何电蒋，说冯玉祥的代表南汉宸已被杨虎城扣押，现南愿与杨合作反冯，起用南助杨反冯对于我军有益。蒋回电同意留南在十七路军工作。

这时蒋介石提升杨虎城为十七路军总指挥兼第七军军长，在河南驻扎的肖之楚、刘茂恩等部亦归杨指挥。杨虽已下令由南阳出发进攻冯玉祥，但对这次大战仍持审慎态度。他同我商量，要我再去南京、上海_地了解各方军事情况，把蒋的和反蒋的军事力量作一番详细调查，摸摸各方的“底”，然后再作最后决定。我首先到南京，以十七路军军医处长名义要求军政部

军医司拨给十七路军后方伤兵医院一所（后改为军政部驻陕十八陆军医院，我任院长）。军政部很快批准了，并拨给开办费 1 万元 a 这证明蒋方对杨的重视。

阎锡山一面联冯倒蒋，一面又与蒋介石秘密联络。阎为了讨好蒋介石，把冯骗到山西，扣在五合县建安村。冯玉祥觉察了阎的两面手法，命令他的高级将领先打阎锡山。因之，阎由北平赶回山西，与冯言和，并送冯金钱、武器，讨好冯玉祥。但他实际是另有意图。同时，蒋介石还引诱韩复榘、石友三倒冯，使冯玉祥陷于势孤力单之境。

我又到上海，碰见柏文蔚、常恒芳和冯、阎方面的代表，他们都要求杨虎城反蒋。他们将冯、阎内幕情况告诉了我，希望杨虎城做冯、阎之间的调解人。因为冯、阎貌合神离，阎实际上按兵不动，对冯存有戒心；而冯的内心也确是要先打蒋，后打阎。冯、阎的矛盾无法解决。当时唐生智反蒋虽然失败了，但他还是反对冯玉祥的；至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张发奎等，也都不愿与冯合作。这种情况，决定了冯玉祥一定要失败。

我由南京回到河南漯河。这时十七路军总指挥部已进到临汝镇，从漯河到临汝镇的交通已中断。我向办事处要了一架飞机回到临汝镇，向杨汇报了各方面的情形。杨说：你回来乘飞机，我就知道消息很好。这一次我们的生意做成功了。冯玉祥树敌过多，他一定会失败，我们一定能回到西北，革命军事基地的建立没有问题了。

杨虎城摸清了各方的“底”，遂决定助蒋打冯，即下令部队进攻龙门、洛阳、潼关，直指西安，这时杨的兵力共有 3 个旅和两个特务团，另有别动队配合作战。9 月 17 日，杨部攻克天险龙门，冯军全部向洛阳溃退。19 日，杨部占领洛阳西工。这两处作战，杨部伤亡在千名以上，冯部伤亡也有 2000 多人，洛阳是冯玉祥的一个后方军事基地，设有两个伤兵医院，收容有伤兵 2000 多，未来得及撤退即被杨部俘虏。缴获的武器辎重也非常之多„杨高兴地对我说：这比在驻马店俘获唐生智的人员、武器还多。

杨部打下洛阳之后，蒋介石几次来电嘉奖，并给每个士兵“双十节”

赏洋 5 元。我建议杨优待冯部俘虏，将医务人员一律编入十七路军，医院改为十七路军后方医院，对伤病员也照本部员兵待遇，每人发给节赏费 5 元。杨皆同意，并说优待俘虏是瓦解敌人的一个好方法。

杨到洛阳后，下令继续西进。10 月 10 日，克复天险函谷关。26 日占领潼关。这时杨到灵宝同我商议接收西安的计划，并派我跟随第二旅西进，以便在攻克西安之后，主持接收及筹备迎杨进城等事宜。

杨虎城和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以及各厅人员，于 11 月 15 日在西安就职。杨任省主席兼西安绥靖主任及陕西省国民党党部王任委员。杨虎城回西北的目的达到了。冯玉祥部队败退到了山西。

**注：**①疑为林蔚文。

②据 1930 年 11 月 2 日《新秦日报》报道：“省政府主席杨虎城氏定明（三）日在省政府举行正式就职典礼。”

*本文原载《丹心素裹》。

# 杨虎城十七师随营军官训练班建党概述

吕剑人　孙作宾　卢松轩

1930 年 11 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后，杨虎城乘胜率部入关，担任了陕西省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掌握了陕西军政大权。杨虎城计划以陕西为根据地，积极扩充其实力，逐步扫除西北各省冯玉祥的残余部队，以实现其大西北主义，雄踞西北。

1931 年初，杨虎城的主力部队第十七师驻防凤翔。师长孙蔚如按照杨虎城的扩军计划，为培养大批下级军官，遂组建了十七师随营军官训练班，编了两个中队，每个中队有 3 个分队，学员共 200 余人，学制 1 年，于斯年 3 月正式开学。学员大部分是从地方招收的青年学生，少部分是由部队选送的。

中共陕西省委为了开辟十七师的兵运工作，在训练班组建期间，即指派共产党员吕剑人、孙作宾、胡振家、刘敬业、张毓秀、王杰、张文华等同志利用招考和各种关系和方法打入该班。后又根据省委的决定，在训练班学员中成立了党的支部，由吕剑人任书记，刘敬业任组织，张毓秀任宣传，统管两个中队党的工作。支部编了若干小组。孙作宾、胡振家是军官，未编入学员支部，在工作配合上他们只同支书吕剑人发生关系。这个支部，在凤翔时，受十七师军委领导。移驻西安后，省委派曾楚川和李杰夫同支部联系。吕剑人和其他若干学员，提前两个月调出，分派到警三旅等部队工作，省委决定由刘敬业同志接任支部书记。

党支部成立后，根据陕西省委关于“在学员中发展党员，广交知心朋友，学习军事知识，掌握军事技术，借机宣传革命”的指示，结合训练班的具体情况，积极地开展了各种活动。

（1）积极开展日常活动。在两个中队成立了“学员自治委员会”和“伙食管理委员会”。委员均由学员选举产生。宣传学员自己管理自己，反对长官打骂侮辱学员人格；宣传经济公开，反对长官克扣薪饷和菜金。通过这些活动，培养了学员的民主精神，团结了广大学员，为发展党员、广交朋友，准备了条件。

（2）积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由孙作宾、胡振家利用分队长的公法身份，给学员教唱《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等进步歌曲，组织学员在课外时间开展各种有进步意义的游戏活动，以激励学员的革命热情和爱国主义精神。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组织同学书写张贴标语，宣传团结抗日，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反对不抵抗主义。还建议训练班领导组织学员参加西安各界人士和爱国学生的抗日集会和游行，大大激发了学员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精神。

（3）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在开展日常斗争、宣传教育和认真考察的基础上，我们先后发展毛云鹏、周铭德、薛毓英、卢松轩、杜润涛、杜德常、杜耘山、杜廷杰、刘廉君、刘维汉、刘益民、刘大森、李建新、李实夫、韩生祥等积极分子入党，使支部的党员人数达到 20 余人，壮大了党的力量。

（4）积极开展父朋友活动。通过这一活动，使官长马中峰、贾文运、翁益哉和学员张振华、刘祖光、刘志超、王诗讯、傅宜 4、潘润轩、刘琪、王文勃、孙步云、崇峻等人，提高了对革命的认识，成了党员的好朋友，党的同情者。在党的教育下，有的同志如刘祖光、刘志超等，后来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参加了共产党。

（5）借机开展学校学生的宣传鼓动工作。在凤翔期间，与凤翔师范学校相邻，我们就通过同该校师生打球、谈心交朋友等活动、向他们宣传中国的命运要由我们青年一代来掌握，激励学生的上进心和爱国心。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事情自己干，靠天靠人靠祖上，都不算好汉。”从而密切了部队同学生的关系，扩大了党的影响。

训练班的军官，大都是职业军人，对我党的政治活动并不敏感，给我

们的活动造成许多便利。但也有个别思想反动又想趁机向上爬的人，如分队长米鸿材，他就认为孙作宾给学员教唱的歌曲和在游戏时讲的话，都含有为共产党宣传之意，并认定孙是共产党，要给孙蔚如师长写信报告。但他自感文化低，写信词不达意，就找同乡卢松轩为他代笔（他不知卢是共产党员）。经卢多为解释，婉言谢绝。

训练班的共产党员，毕业后大都被分配到十七路军各部队中担任了连排长职务。分配前党支部向党员提出要求：“到了部队要体贴士兵的疾苦，和士兵生活打成一片，利用一切机会宣传革命和抗日道理，发展党员，和党组织保持党的关系，听从党的领导。”同志们到达部队后，在不同的环境中，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都积极地执行了党支部的指示，进行了许多革命工作。吕剑人等同志分配到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于 1932 年春，发动了两当兵变；孙作宾到甘肃同其他同志一起，于 1932 年夏，发动了靖远兵变；卢松轩与贺修之同志于 1933 年夏初，在彬县黄展云团策划兵变，谋泄夭折；刘祖光同志在淳化孙辅臣旅特务连策划兵变，事泄牺牲。这些兵变，虽然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都失败了，但在陕甘地区却震撼了敌人，传播了革命思想，教育了人民群众，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 整顿十七师中共地下组织及成立师军委的情况

李慕愚

1931 年初，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由孙作宾同志和我负责，对党在十七师的地下组织进行了整顿。当时，在十七师有许多共产党员，但来自四面八方，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彼此互不了解，甚至发生了共产党发展共产党入党的事。那时，有个李濂在十七师手枪连住闲，他主动积极地开展建党工作。他发现我和孙作宾、陈仁山等同志表现进步，就打算发展我们建立党的组织。一天要开会，约我们去参加。我和作宾同志为了试探真实情况便一起去参加。这次会是在凤翔城里王宝灵（十七师手枪连连长）家里开的。一进门，看见墙上贴了一张十六开大小的列宁像，还挂着一面党旗。参加的人有李濂、王宝灵、陈仁山、张鸿绪、孙作宾和我。李濂是主持人。他说：“今天开会和大家商量一下，我们计划成立一个共产党的组织，看怎么办好？”我们就故意问他：“成立共产党的组织是很好的，但由谁来领导？我们的上级党组织在哪里？”李濂说：“领导机关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干起来，党就会来领导我们的。当年马克思、列宁是怎样建党的，毛泽东、朱德是怎样搞革命的，我们就怎样建党搞革命。我看最要紧的是我们先组织起来干，用实际行动去找党组织，我相信上级党也会找我们的，不能坐着等。”他的一席话，顿使我们耳目一新，很受鼓舞。后来我们知道，李濂参加过井冈山武装斗争，是毛主席亲自任命的一个连长，在一次战斗中同部队失去联系，才辗转来到陕西。

十七师的共产党员，主要来自 4 个方面：

有一部分是 1930 年底随杨虎城的部队由河南回陕西的，如孙作宾、张鸿绪、朱友仁、舒国栋、杨树藩、李保康、刘英山、范歧山、李世云、姚

俊明等。

有一部分是由地方党组织指派打入十七师的，如胡振家、张继华、郭璧、贺修之、刘敬业、薛毓英等。

有一部分是杨虎城回陕后从西安监狱中释放出来的“政治犯”，如徐梦周，原是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到十七师任孙蔚如师长秘书兼师宣传队队长；程士诚、魏斌辉到十七师宣传队当宣传员；李建新到十七师随营军官训练班学习；吴焕然、杜松寿到了十七师《军声》报社当编辑、记者等。

还有一部分是1928年渭华暴动失败后，先打入马鸿宾的二十四军教导团，后又根据陕西省委指示打入十七师的。我就是通过十七师参谋长耿景惠的关系到了师宣传队；崔治堂、梁励生通过一〇一团团副程鹏九的关系到了十七师五十一旅一〇一团一营当文书、战士。

根据上述情况，为了加强党的统一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我们遵照陕西省委的指示，对十七师地下党的组织进行了整顿。在审查弄清每个党员的情况后，分别编入党的各个组织。在此基础上，千1931年2月，成立了十七师中共地下军委，成员有孙作宾、李慕愚、胡振家，由孙作宾任书记。

1931年，孙蔚如师长以陕南绥靖司令的名义率十七师师部及直属部队由凤翔开往汉中。我们为了使党的组织形式及时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前方和后方党的工作不致削弱，报经陕西省委同意，在原军委的基础上，又分别成立了前方军委和后方军委。前方军委由王宝灵、李濂和我组成，由我任书记，随十七师师部去汉中，随去的党员有：王宝灵、李濂、李慕愚、张继华、陈仁山、张鸿绪、朱友仁、舒国栋、魏斌辉、杨树藩，还有到汉中以后接上关系的党员刘英山、范歧山、崔治堂、梁励生、李世云及新发展的党员余海丰、张裕。部队到汉中后，我曾兼任陕南特委军委书记。1932年夏我离开陕南。

后方军委由孙作宾、胡振家、吕剑人组成，由作宾任书记，负责驻凤翔的十七师部队和随营军官训练班党的工作，领导的党员有：孙作宾、胡

振家、吕剑人、刘克俭、郭璧、贺修之、李建新、杜松寿、刘敬业、薛毓英。

# 成立新兵一连党小组

李　濂

1931 年，我在杨虎城的十七师新兵营第一连当连长。这时我已经没有组织关系，但仍以连长的威望，仿照井冈山的做法，宣传共产主义，吸收进步年轻的连排长和战士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党组织派孙作宾、李慕愚等同志来部队作党的工作，他们和我联系，我把一个有一二十人的名单交给作宾同志，记得其中有张鸿绪、扬发震、张子敬、高尧、王宝灵、陈闯基等。我们一起在马克思像前举行了入党宣誓。后因特务察觉，史唯然同志遂介绍我到汉中，改名任升，继续做地下工作。

# 崔廷儒与三十八军早期地下党的工作*

蒙定军

1932 年秋，孙蔚如升任三十八军军长，奉命调往陕南对红军作战。为了坚持在孙部的工作，崔廷儒同志要我们随孙到汉中。经朋友推荐，我到军部参谋处任司书，崔维峻（尽善）同志到军部参谋处任书记（文书工作）。根据廷儒同志指示，我们成立了党支部，维峻同志任支书，任务是搜集军事情报，在军部及所属部队中发展党的组织。1933 年的一天，廷儒同志突然来汉中告诉我们，杜衡等被捕叛变，叛徒带特务到处抓人，不少同志被捕杀、关押，与上级党组织联系中断，他不得不暂时离开西安。我们一起研究商定，由于汉中情况极为复杂，不少县党组织亦遭破坏，因此，再入孙部有困难，决定让他遂去勉县张汉民警卫团。该团党的组织力量强，党员多，便于工作。廷儒同志去后，即在该团共产党员李明轩连工作，以文书名义为掩护。为了了解陕南地下党情况，调查驻军布防、修筑碉堡情况，他深入南（郑）、褒城、勉（县）各地，我们也为他提供了有关的军事情报。

1933 年 5 月，杨虎城授权孙蔚如出面与红四方面军谈判停战。孙派军部少校参谋、共产党员武志平同志去川北与红军取得联系，红四方面军派徐以新同志为代表两次到汉中与孙直接谈判。1933 年 6 月 24 日双方达成互不侵犯、共同反蒋抗日协议，建立了有名的“川陕红色交通线”，使红四方面军减轻了陕南方面的威胁，能以主力对付川军。当时，崔维峻同志负责军事情报工作，向红军和特委提供了胡宗南占据陇南、进窥汉中、企图包围进犯川北阴谋的材料，以及陕南地区敌兵力部署、碉堡修筑等大量军事情况。廷儒同志对支部这段工作给予赞扬和鼓励，希望大力发展组织，加强情报工作，通过交通线与红军经常保持联系。

1935 年初，杨部和红四方面军的合作协议被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所破坏，使我党与杨虎城十七路军的统战关系，遭到严重挫折。武志平、孙作宾同志不得不离开汉中，崔维峻同志也因送情报时暴露而被杀。当时，我从国民党军委会铨叙厅所办的人事训练班结业，回到汉中，到西安与胡振家（时任西安绥署参谋）联系。我即以到终南山办理赵寿山五十一旅的公务为借口，离开部队到了西安。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孙蔚如的三十八军由陕南调到渭北，军部驻三原，所属部队布防于洛川、富县一线，与红军处于正面休战状态。此时，我奉廷儒同志指示，仍回到孙的军队参谋处人事科工作。不久廷儒同志来到三原，我汇报了三十八军情况和孙蔚如对红军的态度，以及东北军在陕北作战失利情况。当时，我提出希望去陕北参加红军，他说：“孙蔚如并未对你怀疑，形势将有大的变化。不论环境如何不利，一定要坚持下去。”

1936 年初，他又一次来到三原，向我们传达了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明确今后的任务是：反对内战，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军官同情革命，联合十七路军共同反蒋抗日。我向他提供了十七路军兵力驻地、武器 g 备情况，并送了一份陕北、关中、陇东军用地图。此后，廷儒同志多次来三原联系指示工作。

*本文节自《崔景岳》一书所载蒙定军《顽强不屈　视死如归》一文。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三十八军在汉中时军部
# 中共支部的活动情况

李扶汉

1932 年，我在西安东关德昌商店当学徒。1933 年 7 月，陕西省委杜衡叛党投敌，国民党在各地疯狂逮捕共产党人。我闻讯后，恐遭到追捕，遂逃到宝鸡，我打算到川边投奔红军去。我单身进山，约走了 10 天到了汉中，正巧碰到了我的同乡学文瑞（他当时是三十八军军法处少尉稽查）。他知我学校时是共青团员，由他介绍我认识了崔尽善同志。为时我知道崔是共产党员，不知道他是军部地下党支部书记。崔尽善通过唐文瑞知道我的上述情况后，向我当面表示：现在双方封锁很严，不易通过，你在这里为党工作，比你去当个红军战士的作用还要大些。劝我留下来。我听他讲的有道理，我就同意留在三十八军军部工作。随后经尽善引荐，由军参谋处长田鸣銮录用我成为参谋处准尉司书。从此，我与尽善同在参谋处工作，又同居一室，志同道合，经常谈到深夜，他对我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教育。

1934 年初，崔尽善同志找我谈话，他郑重地对我说：

由我介绍，党组织批准你入党了。当时我是非常兴奋的。这时，三十八军军部地下党的组织状况是：成立了党支部，书记是崔尽善（参谋处准尉司书，陕西旬邑人），与他有组织联系的党员有蒙定军（参谋处少尉书记，陕西旬邑人）、唐文瑞（军部军法处少尉稽查，陕西蒲城人）、汤志忠（汉中市人）和我。

1934 年底，我由西安绥署步训班毕业回到汉中时，军事政治形势发生了剧变。十七路军和红四方面军互不侵犯的协定已经破裂，两军战事频繁激烈。在宁强，红军处决了县长白诚斋。在新铺湾，红军打垮了四十九旅王劲哉的九十八团。红军又进攻五十旅耿志介的九十九团守备的褒城，但

未克。旋即挥师包围汉中。三十八军十七师连吃败仗，红军兵临城下。为了配合红军的作战，三十八军军部地下党组织在支部书记崔尽善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尽善任参谋处少尉书记，分管军事机密和监印工作。他利用这个便利条件.为红军搜集和传送了很多军事情报，其中重要的有：一份是三十八军的《兵力驻地表》，以连为单位，标明了驻地名称、部队番号、主官姓名、兵力员额、枪支种类等详细情况。对驻勉县一带的四十九旅的兵力部署情况写得更为详尽，因为该旅距红军驻地最近。第二份是为红军提供了本军口令。那时国党军队的口令是由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编发的全国各战区统一的口令，以军为单位一月一换，一般是两个字，特别的是 4 个字。第三份是三十八军防守汉中械和周围碉堡群储备军事物资情况。这是尽善指示我搞的。在汉中和长寨一带，碉堡很多，每碉堡驻兵一个班，储备一个月的米、柴、油、盐，还有足够的弹药。每个碉堡用水来源，是井水、引水、蓄水都有说明。三十八军为了阻止红军攻城，在汉中环城壕沟中都放进了水，并设置了许多用油浸过的竹签。这些情报，都是崔尽善指示我们搜集并由他亲自汇总后再派人送出去的。我当时在军部副官处是负责这项统计业务的。

那时，党支部曾利用过一个姓汤的小摊贩作交通，汤是汉中市人，在县铺街开个茶铺，这里也是我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接头点。汤去送了几次情报，我不清楚。最后一次，久去不归，下落不明。崔尽善估计可能被敌人发现杀害了。他女人叫赵兰芬，还有一个两岁的女儿和她的老母，生活无着。尽善和我商量决定，我俩每人每月拿出 5 元钱周济（当时我和尽善的工资每月都是 10 元），由我送去，以维持她们母女的生活。

军事斗争形势日益紧张。三十八军屡战失利，红 i 包围了汉中。因此，孙蔚如军长怀疑内部有共产党分子为红军传送军事情报，更惧里应外合，汉中被克。于是，一方面城门紧闭，严加防守；一方面着手清查内部。是时，孙蔚如暴躁发怒，惊恐不安，责令军法处将军部各处人员排队审查。军法处长李介人、主任史伯桥组织排队审查时，该处少尉稽查李维忱（蒲

城人）首先提出，他怀疑崔尽善是共产党。因此，在 1935 年初的一个晚上，军法处突然秘密地逮捕了崔尽善同志（此事李维忱一直隐瞒到 1956 年 8 月才作了交代），关押在军部看守所。在第二天拂晓，崔尽善的同事于寿亭、于景祺（军部参谋处中尉书记）发现尽善夜晚未归，有意人看守所门前路过探视时，尽善趁看守兵不备（门是有孔通风的木框门，站岗士兵平时不太过问军官接触在押人员的情况），授意于寿亭将他桌子抽屉中的有关东西销毁。于寿亭当即返回，把情报底稿、破坏碉堡计划的原资料及记录、信件等都烧掉了。为党做了一件重要的工作，确实是应该赞扬感谢的。党支部的其它机要文件，为预防万一，平时就保存在汤志忠同志家中（他是汉中市人）。所以，当军法处主任史伯桥带着人去搜查崔尽善的房间、抽屉时一无所获，只拿去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我和唐文瑞同志去西安绥署步训班学习时同尽善的合影。

第二天上午，军法处长李介人和参谋处长张之因提审崔尽善。这时我才知道尽善被捕了。我非常着急。如何营救尽善呢？我找到了同乡同学唐峻峰（现住蒲城大孔寨），他是看守兵，负责掌管牢门钥匙的。我对他恳切地说：“你知道尽善兄同我好，咱们要想尽办法营救哩！”唐峻峰对我说：“你不要惊慌，我一定想办法。你如果也被捕了，咱们就一块逃走，我也回家不干了。”又说：“现在的困难是城门很严出不去。过去的护照证件都不顶事了，军法处专门印了出城证，由史伯桥保管、签发。弄不到出城证，就是救出尽善也出不去。”他想了想又说：

“你不要着急，我设法偷几张出城证，咱们一块走。”我同意了，并把身上仅有的 50 元钱给了他，逃跑时作为路费。

我从唐峻峰口里知道，在第二天和第三天晚上，军法处的史伯桥一伙对崔尽善同志进行了两次严刑审讯。敌人拿着一张照片追问崔，唐文瑞和我哪儿去了？尽善说：他们去西安绥署步训班学习没有回来。实际情况是，唐文瑞回来后又回家探亲了；我回来了但史伯桥不认识我，所以也就再没有追问，又追问军部有哪些人是共产党分子，给红军送过什么情报，崔尽

善同志怒目仇视，闭口不言。在第二天晚上审讯中，那伙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分子，将崔尽善的棉衣脱掉，用皮鞭猛力抽打，把崔的脊背打成了血浆。但尽善同志受尽苦刑，宁死不屈，始终没有泄露党的一点机密，表现了革命者的英勇气节。

在第 4 天晚上，军法处一伙反革命分子就秘密地杀害了崔尽善同志。临刑前，尽善同志大义凛然，连声高呼：“共产党万岁！”刽子手们慌忙用湿毛巾将他的口塞住，押出军部后门，先用刺刀刺倒，后用匕有割断他的喉咙。崔尽善同志为了党的事业壮烈牺牲，年仅 25 岁。唐峻峰对我讲述尽善同志遇难经过时，表示非常难过惋惜，悔莫能助。当我提出收尸掩埋时，他恳切制止我说：千万不能去！敌人正在暗地监视，发现收尸者继续逮捕镇压，我们不能上当。我虽幸存，但未能救出尽善同志，憾恨终生。

崔尽善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曾是旬邑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后是三十八军军部第一个党支部的首任党支部书记。他对党忠诚，爱憎分明，工作认真，品德高尚，写画俱佳，在短暂的一生中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他那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和激励我们不断前进。

# 我任补充团党支部书记

胡振家

1933 年 10 月前后，杨虎城任命我为十七师补充团团附，就此事我同余海丰、孙作宾在孙家开会研究，分析了补充团的情况，认为在该团开展工作比较有利。一是该团党的力量较强，中下级军官中有不少党员。二是我们同孙蔚如有一定的关系，可以打入上层。三是该团系杂牌，有许多矛盾可以利用。四是该团驻在乾县，地理条件较好，进退方便。因此决定我去补充团开展工作，在时机成熟时，策动该团哗变。

11 月前后，我来到乾县补充团，该团团长黄展云，经.常住在西安贩大烟，团里工作实际由我负责。当时补充团的党员，有团部书记贺修之，军需梁明祥，骑兵连长杨嘉瑞，一营连长雷明彦，班长刘敬业等。为了便于工作，我们建立了支部，我任书记，委员有杨嘉瑞、贺修之等。崔廷儒曾多次来此视察指导工作，咎玉祥、小王也来过乾县。

年底的一天晚上 10 点钟，西安绥靖公署参谋处长王根僧来电话说：“共匪向我进犯，现已到麟游境内，命令补充团到麟游商宁镇进行截击。”当时适逢黄展云去西安，我立即召开支委会研究，崔廷儒也在这里，便决定

以截击为名，故意拖延时间，掩护红二十六军安全过境。我带一排人亲往监军镇指挥，让胆小怕打的三营长王伯谋去商宁。王因害怕，走到半路就装病，所以等他们赶到商宁时，红二十六军早已过境。

1930 年 3 月左右，杨虎城因黄展云带兵不利，将补充团由乾县调回西安，化整为零绔到其他部队，将我调到绥靖公署住参谋。

# 一 段 经 历*

杨嘉瑞

1933 年春，党组织为我在孙蔚如部队的补充第二团每动了一个骑兵连长的位子。当时，我们党在这个部队的力量比较强，记得在我们到达时，在全团就有 27 名党员，后来继续发展到约 50 多名党员，陕西临时省委军委胡振家还搞到了团附的身份，有些党员当上了书记官（贺修之）、军需官和文书等职务。

1934 年三四月间，这个团由乾县调到西安，到西安后，就以营为单位分编到其他部队去了。

*本文摘自原载《陕西地方志通信》1984 年第 1 期的杨嘉瑞《组织特工队开展地下武装斗争》一文。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十七师补充二团地下党组织活动情况*

贺修之

1930 年 11 月，杨虎城率十七路军进驻西安。中共陕西省委介绍我找冯异僧（中共党员）安排工作。冯先介绍我去镇安县找闵醒亚（原中共党员，此时已脱党）、张飞生的秘书安置工作，闵以人浮于事为由，不能安置，我又回到西安。1931 年 1 月，冯异僧又介绍我到凤翔找徐梦周（中共党员）、王璋峰（中共党员）。后在史唯然的帮助下，经刘味冬安置我在十七师军声报社当石印写字员。我的组织关系由组长杜松寿负责。记得我与杜松寿、曹建中、王丽（王汝昭的爱人）在凤翔东湖开过四五次小组会，均由杜主持。是年 6 月，王璋峰同志介绍我到了十七师九十九团任中尉书记（团长黄展云，团副李保蔚）。此时，我的组织关系转到该师军官队地下组织，与李建新、刘廉君一起过组织生活。

1932 年 2 月，我们到了兰州，由九十九团调到补充二团，我的公开身份仍然是中尉书记。黄展云也调到该团任团长。因补充二团是新编团队，又从师军官队调来了李建新、刘廉君、刘敬业等中共党员，使该团地下党的组织日益加强。李建新任书记，我和刘廉君任支委，仍由孙作宾领导。同年三四月，我协助郑维新同志策动反何冠五营长的斗争，在该团由兰州移驻定西时，行至巉口，将何捆绑，取道陇东，投入红二十六军。补充二团在定西驻防时，党的组织由 1 个支部发展到 5 个支部，改为总支，我任总支书记。

1933 年，红二十六军不断来往于兰州陇东之间，中共十七师军委（临委）嘱我担任与红二十六军来往交通安全工作，时经 1 年之久。除以武器弹药不断接济二十六军外，由于来往人员频繁，借支旅食费积欠 600 多元，被人报告后，团长黄展云将管库人张子林管押在定西县。我为掩护党的工

作安全，及时挺身出钱保张子林出狱。

1933 年底，补二团移驻彬县，距红二十六军较近。我通过刘敬业给红二十六军送去子弹多箱、手榴弹 10 多箱和长枪 10 多支。这个时期，敌人的反动宣传与活动日益嚣张，我党的组织也日益壮大，兵变频繁。在长武有刘廉君和丁执初营的兵变，军委派我去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请示工作。不久胡振家同志到补二团任团副。一度我和黄展云矛盾尖锐，经胡振家、梁明汉调解而缓和。

1935 年初，因兵变频繁，补二团调回西安被杨虎城遣散。我在连队分拨时，除向省委办理党员组织关系手续外，我将军用地图 11 捆、护照千余张（盖印的）和部分枪械弹药被服和其他用品，都交杨嘉瑞转送省委接收。

1935 年 3 月，我和陈鸿儒（中共党员）去汉中，在三十八军十七师四十九旅任书记。党内仍由中共十七师军委孙作宾领导。孙走后，我的组织关系转给军参谋处成子慎。在沔县作战时，成子慎让我给红四方面军送过作战情报。

1936 年初，我随十七师四十九旅由汉中开到三原一，带驻防。在此时，我担任过我军延安至西安交通工作，护送我党过往人员和物资的安全。西安事变后接待过各地去延安学习的爱国青年，我的组织关系由成子慎转交给陕西省委吕剑人、崔廷儒领导。

*本文摘自贺修之 1968 年 5 月 10 日所写历史材料。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回 忆 崾 口 起 义

卢济民　卢松轩

1932 年秋，第十七师五十旅补充二团一营，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在甘肃定西的口发动了武装起义，艰苦奋战 3 个多月，终因寡不敌众，归于失败。

1932 年补充二团驻防定西，该团有不少中共党员，成立了党支部，书记是贺修之。党员有：杨嘉瑞（骑兵连连长）、刘敬业（三营营副）、卢松轩（三营排长）、刘廉君（三营排长）、赵丕烈（即赵成璧，一营排长）、梁明汉（团部军需）、赵鸿福（三营排长）。五十旅旅部参谋陈毅安也是中共党员。当时，党的任务就是瓦解敌军，组织士兵暴动，大革命武装。

我们在定西驻防时，贺修之同志召集卢松轩、赵丕烈分析研究团长黄展云和一营营长何冠五矛盾问题。何自恃当过团长不买黄的账，黄嫌何傲慢自大，因而互不服气勾心斗角。经过研究，决定利用这个矛盾，分工赵丕烈利用他同何冠五的私人关系，用暗中同情支持何的方法：扩大何黄的矛盾，以寻找起义时机。同时，赵丕烈同志还对一些不满现状、思想进步的官兵宣传阶级压迫，进行组织串连，并把一连连长马济人、排长石庆德、营部医官卢济民等争取到党的周围，为发动起义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地下党组织利用与扩大何黄矛盾的工作果然奏效。团长黄展云同旅长商定，拟把一营调到兰州后，即撤掉何的营长职务，把部队拨散分编。不料此事被何冠五发觉。当一营由定西往兰州开拔到口时，何冠五把赵丕烈叫去说：“团长欺我太甚，我也给他没有好的回答。这次调咱营去兰州，是黄展云和旅长共同策划的一个阴谋，是先撤我的职，然后把队伍拨散。我决定不去兰州上钩。我要离队回家，把一营交给你去处理！”赵听何讲后，随即找一连连长马济人、排长石庆德商量办法，遂决定一营马上起义，

并提出了具体的行动方案。3 人同到营部向何冠五作了报告，何同意后，就以营长名义召集全营连长开会，迨各连连长到齐后，赵丕烈即指挥士兵把思想顽固、压榨士兵的二连连长张俊杰、三连连长左金秀和机枪连连长郭雨田一齐捆绑起来；用一、三连的基本力量，迅速地收缴了二连和机枪连的枪支；派部队封锁了定西至兰州的公路；掐断了各路电话，起义成功。斯时，何冠五着便衣离开了部队。

部队起义后，由赵丕烈、马济人、石庆德带领向靖远方向前进，计划同孙作宾在靖远起义的部队会合。部队行到郭城驿以南地区后，已脱离险境，天已放晓。在这里，赵丕烈讲了部队起义的意义和新的组织编制。他说：我们脱离反动军队，不是要去当土匪，而是要去干革命。我们要革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土豪劣绅的命，解除全国穷苦人民的痛苦。我们现在已成为一支革命的新军队了。为了适应革命的需要，把部队，为一个团，团长马济人，团副卢济民，下编两个营，一营营长石庆德、二营营长赵丕烈，每营编 4 个连。将 3 个反动的连长解绑释放。

部队经过整编动员之后，士气为之大振，继续向北进发。经过一夜行军，部队非常饥饿疲劳，打算走到距黄河不远的一个较大的回民村寨吃饭。但回民头领紧闭寨门，不准部队进入。赵丕烈为尊重少数民族风俗，叫队伍就地休息，他只身进寨交涉。但赵进寨后被缴枪扣押起来。部队闻知，怒不可遏，作势攻寨。回民头目恐部队攻寨，遂将赵丕烈从城头吊下。赵对大家说：这不是回民群众的过错，而是阿訇等少数头目干的。

部队只好在此分散就餐。不料，被附近山头各村地方武装发觉，纷纷鸣枪示威，领导上认为，此地反动势力很大，起义部队不宜久停，仍决定向北前进，同靖远兵变的部队会师，遂派人过黄河探听情况。回来报告，孙的起义部队已被敌人打垮，本人不知去向。同时发现定西和靖远两县的敌人正派兵向我合围而来，形势严重。赵丕烈、马济人、石庆德、卢济民召集连排长开会研究对策。赵丕烈同志首先发言，他说：“靖远兵变失败，我们北上已无师可会；本地反动势力很大，定西和靖远之敌又向我夹击而

来。因此，我们不能在此停留，也不能和敌人纠缠硬拼，而应绕道静宁和平凉之间，沿六盘山转向陕北方向同刘志丹的红军会师。”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赞成赵丕烈同志的分析和意见，于是又将起义的部队改名为“人民革命军”，由马济人同志任司令员，卢济民同志任副司令员，把一、二营改为一、二支队，由石庆德和赵不烈分任一、二支队长。

部队向南前进通过清江驿时，又有百多名地方团队阻我前进，被我击退。部队按既定路线向静宁以南地区开进。此时获悉，敌人通令陇东和陇南各县驻军和地方团队向我截击围剿。我们进入静宁以南地区行军中，沿途各主要山口，均有地方团队驻守，不断鸣枪阻我前进。我军为了避免同敌人接触纠缠，只好绕道翻山。因此，就在这个地区同敌人周旋了两个多月。一天，我们到了会宁东南义岗川地区。这里有一个反动的董家大地主，拥有强大武装，庄丁 1000 多人，各种枪支 1000 余支，是陇东有名的土皇上。他本是我们的革命对象，应予打击。但因敌我军力悬殊，又怕影响我进军陕北同红军会师的计划，部队就打出了起义前伪军的旗帜，佯装过路行军，敌人信以为真，乃顺利通过了危险区域。

起义部队到了静宁西南的威戎镇时，发现泰安和静宁两县刘卓如团的部队向我分进合击。我军当机立断，决定趁敌尚未完成钳形阵势之前，先给泰安之敌以迎头痛击，激战两小时，打死打伤敌 10 余名，俘虏 3 人，缴枪 5 支，我有 7 名战士受伤。敌人向来路西南方向撤退。我军趁静宁之敌尚未到达之时，改变路线，连夜南走清水。到达清水东北地区后，打算休息几天，再北出安口窑，从平凉泾川夹缝地带北进东折，先进入陕甘边界山岳地带。不料，青海的职业土匪背锅司令（匪头目绰号）率领匪骑 1000 余人跟踪追到，把我军包围在一个土岗上，战斗由中午一直打到太阳落西，战况十分激烈，敌人多次冲锋，均被我军击退。但部队伤亡惨重，弹药快完。入夜，决定突围，统计能够作战者不满百人。又经过几次冲锋格斗，只剩下五六十人。赵丕烈、马济民、石庆德同志均受重伤，只得指挥部队退守原阵地。迨至天明，敌人发起全面攻击，我军弹尽力竭，阵地被敌突

破，赵丕烈被两名奋不顾身的战士扶出阵地，马济人、石庆德同志下落不明，起义失败。

嗜口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的意义是很大的。起义部队同敌人大小战斗打了 3 个多月，活动范围涉及到定西、靖远、会宁、静宁、清水等 5 个县境，打破了陇东地区的革命沉寂，扩大了革命的政治影响。以后爆发的蒿店起义、静宁暴动和彬县暴动，都同项；口起义的影响分不开。这次起义的主要教训是，只搞单纯的军事行动，政治宣传工作没有跟上，特别是没有注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作战行军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使部队耳聋眼瞎、孤军奋斗。因此，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也就不可能把起义引向胜利。

# 三十八军教导队学生队党的活动

金 良 栋

1934 年秋末前后，三十八军孙蔚如军长为了改变军队的旧成分和素质，在西安招收了一批学生，在教导队中成立了一个学生队，队长王建勋，分队长刘汝和、马中峰。学生队有以李锐同志为首的党组织。据我回忆，李锐是孙作宾介绍来的。孙作宾被迫离开汉中后，李锐直接由军部的成子慎领导。由于白色恐怖的威胁党组织一再强调不发生横的关系，只采取单线联系。在李锐和上级党的领导下，在学生队发展了党员近 20 来人。我回忆起来的党员有：李锐（抗日时期阵亡）、丁俊峰（阵亡）、杨信（梁致和）、王化（王写剑）、刘汝和（已病故）、张西鼎（已病故）、张涛、金良栋、寇学文（已病故）、孙廷俊、常永明（已病故）、崔日尧、刘继先、李元凯、陈克勤（被敌特杀害）、汪慕裕（被敌特杀害）。这些同志在西安事变中经受了考验，在抗日战争中，坚决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坚持抗日，坚持革命，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说明学生队党组织的工作成绩是显著的。

# 三十八军地下党同敌人的斗争

毛云鹏

1933 年末或 1934 年初，三十八军军部驻防陕西汉中。那时，我在陕南民团干部考察所一大队二区队当队长，刘益民（地下党员）在三区队当队长。某天，我正和孙作宾、刘益民在汉中东门里一个京货铺内说闲话。突然，军部教导队排长曹胜权跑到这里，神情焦急地对孙作宾说：“有人将你告密了，孙子坤大队副叫人抓你。你要赶快离开汉中，以免遭意外之灾。”我们听后，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现在汉中白色恐怖严重，孙作宾同志已经暴露，必须马上逃走。于是，我们为孙筹集了 50 元路费，我和刘益民凑了 20 元，党的同情者吴蔚春慷慨解囊，给了 30 元，我们又在陕南民团干部考察所弄来一个路证。为了一路沿途的安全，我们又给留坝县驻扎的民团分队蒲队长和在凤县驻扎的民团团长（此 2 人均系我干部考察所毕业的学生）各写了一封信，交孙带上，在离开汉中的前夜，教导队学生张锡井（西鼎）专门为孙作宾送行。第二天清晨，我和刘益民送孙出东门，绕道石马坡，送到褒城县钟家营，我们才和孙作宾同志握手告别。

1934 年春，我仍在陕南民团考察所任区队长。某天，国民党特务突然以所谓“赤化分子”的罪名把我逮捕了，带 21 斤重的脚镣，被关进一个黑暗的牢房里。在这里被关的还有不满现实的蓝田人叫刘树庸。不多时，来了几个全副武装的军官和士兵把我押到军事法庭进行审问。法官问我：“你叫毛云鹏吗？”我说：“是的。”法官叫喊：“你要老实说是谁叫你贴标语来的？”我说：“没人叫我贴。”又叫：“那是谁贴的？”我说：“不知道。”法官又说：“有人见你来，你还敢不承认？”这时，一个十七八岁的勤务兵（名字忘了）走到法庭上作证，他说：“我半夜起来小便时见你贴标语来。”我反问：“你在那个厕所小便见我贴来？”这个家伙哆哆

嗦嗦说不出话来。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看到我，他是编造假话陷害我的。法官无奈只好将我押下。

第二次是在特别法庭审问我的。法官们眉开眼笑，好象得到了和氏璧一样。庭上又来了我们考察所二大队一区队长邢维新，心想来者不善，立刻引起我的警惕。法官问：“你这些日子考虑来没有？”我说：“考虑来，我没有做什么坏事。”法官高喊：“你真胆大，有证人在你跟前，你还不承认，请邢队长讲。”邢维新就开口说：“你给学生偷着教共产党的歌，我在后院听到了。”法官忙问我：“你唱过歌没有？”我说：“唱过。”又问你唱的什么歌？我说：“唱的是射击歌和野外歌。”邢维新抢着说：“不是的。”我说：“不是，就请你把是的给大家唱一唱。”法官叫他唱，他说：“我忘了，唱不来。”我趁势反击，对邢维新说：“你一句也没记下就来作证害我吗？我们一起上下操，我教唱共产党的歌，怎么别人没有听见就你听见了？”弄得邢维新面红耳赤，恼羞成怒，猛扑过来将我打倒，打得我鼻青脸肿，口破流血。邢是一个不识几个字的粗人，他听我唱歌是事实，但他没有记住歌词，若记下来我就有宣传赤化的杀头之罪。我教唱过的《士兵歌》词是：“士兵原来是工农，干嘛来当兵，原因都是穷。苛捐多杂税重，勤俭亦无用。经济总破产，农村穷又穷，无法生活入伍来当兵，要给自己干，不要抢地盘，为军阀去混战，真是糊涂蛋。工农好朋友，生活实可怜。监禁与屠杀每日在千万，同胞快快醒，打倒反动派，重建新中华。”邢维新的出证，又一次弄得法官狼狈不堪。只好喝令停打，将我送回牢房。两次审讯，敌人未捞到任何东西，却鼓舞了我的斗争意志。硬的不行，敌人又来软的。以悯惜口吻对我说：“你们年轻人幼稚，容易受共产党的欺骗，只要你说出叫你贴红色标语的人我们就立刻让你回去仍然当队长。”敌人的诡计亦被我严词驳斥否认。敌人无奈，最后只好宣告无罪释放。我出狱后获知，我被关期间，陕南民团考察所地下党领导人成子慎（公开身份是该所教育科长）和刘益民也采取转移视线的办法进行营救，他们安排葛寿荣同志逃走，然后大造议论说赤色标语是葛寿荣贴的，把毛

云鹏搞错了。就这样，在党组织的营救下，敌人无可奈何，只好将我无罪释放。这件往事，使我终生难忘。

1935 年初春，我红四方面军逼近汉中，城内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恰在这时，西安党组织派联络员王杰（渭南人，已病故）同志来到汉中，不知何故被特务发现，下令紧闭城门，逐巷搜查，情况万分紧急。此时，王杰同志想走不得出城，想藏无处容身。先藏到南郑县民团总部的枪库里待了几天，感到不安全。后来我们计划从东门送王杰出城。我暗暗去找看守东门的任继祖（地下党员）商量办法。任拿出一个通缉令说：“你看这个通缉令，已通知各城门捉拿王杰，不便从这里放走。”我听了心急地说：“难道我们睁着眼看同志遇难不救？”任沉思了一下说：“要想从东门出去，没有通行证谁也不行，请你们在军部弄个通行证来，我立即放王杰同志出城。”我说那就一言为定，我立刻到军部找到了参谋处机要科长、地下党员成子慎同志，向他汇报了情况，请他设法弄个通行证。成听了说：“我虽是科长但上边也不给发这东西，唯处长每人才有一个，我也不能向他们去借。现在看你胆量如何，胆量大还是有办法的。”我坚决地说：“现在情况紧急，你说咋办我就咋办，为了王杰同志安全脱险，我甘愿冒死以赴！”成看了看我又说：“王宗山（三十八军参议，民团督办处处长）处长有一个通行证，他经常外出但不使用，因为有几个护兵跟着他，人们又都认识他，所以外出不用通行证，就把这个东西放在靠南边窗户那个抽屉里，你去偷出来，用完后再放进去，不就解决问题了吗？”我同意他讲的办法，马上行动。我从成子慎那里出来，秘密监视王宗山的行踪。看到王带着几个护兵出了大门走了。我就趁这个空儿，假装给处长汇报工作的样子，站在门外，脱帽报告，揭帘而入，看室内无人，顺手拉开窗户南边那个抽屉，果真看到一个用黄绫丝绸做的四四方方的通行证，上盖血红大印。我随手装在衣袋内迅速离开。随后，我们又给王杰同志弄来长袍礼帽，带上通行证，伪装成王参议，洋洋得意地向东门走去。我带手枪护送至东门，一个卫兵向我问明来由后，即大声高喊：“报告营副，王参议要出城去。”

这时，我提心吊胆，异常紧张。那个王参议无人不晓，如若漏了破绽，便会惹下滔天大祸。我看到任继祖没下城来，只站在城上给卫兵招手示意，叫卫兵放行。卫兵取出一把 1 尺多长的钥匙开了城门，把王杰送出城去我才松了一口气。王杰同志安全回到西安。

1936 年炎夏，党中央、毛主席为了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给三十八军孙蔚如军长写了一封绝密信，并派孙作宾同志送来。那时我在三十八军十七师九十九团当副官，住在三原县南城西渠岸。某天晚上，孙作宾同志把这封信交我暂时保存，并嘱咐我说：“这是咱毛主席给老孙的绝密信件，千万要拿好，绝对不能丢失。”我接过信一看，左上角写着“绝密”2 字，右边写着“送陈”2 字，中间写着“孙军长亲启”5 个大字，左下方，又写着“内详”2 字，并用红漆封口。我随即把信揣在怀里，顿觉双肩压了千斤重担，时刻小心翼翼，生怕被人发觉。不久，作宾同志在军部找到了成子慎同志，才把这封信转陈给孙军长，完成了毛主席交付的重要任务。

# 三十八军地下党的一些情况*

成子慎

1929 年我在北平国立清华大学求学时，经裴毓华（丽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搞学运工作。

1931 年将关系转到西安，经南汉宸、王世英 2 同志介绍，加入第十七师孙蔚如部工作，与孙作宾发生关系，在十七师内进行军运及发展党员的组织工作。当时十七师驻防兰州。1933 年十七师由甘肃移防陕南汉中，作宾同志因在甘肃一条山策动警备旅王子元部起义，事败被邵力子（当时任甘肃省主席）扣押兰州，后经孙蔚如营救，于 1934 年释放。在汉中时曾与王鸿霜、老卫、梁鲁等同志先后发生关系，担任军队中联络、情报及反帝统一战线工作。1935 年春我第四方面军徐向前部为掩护党中央向西北挺进，对陕南进行佯攻。陕南组织因通讯不慎一度被破坏，并牺牲了崔尽善同志等 10 余人，惟组织方面诸负责人均已幸免。当时组织方面即将所有机密文件交我保管，没有暴露目标的几个同志，由我暂行设法安置（因我当时任孙部参谋处科长，尚可掩护）。其余作宾诸同志，由我设法开路证并介绍三十八军运输队由汉出山，暂避其锋。

1935 年秋，三十八军奉命移防渭北三原一带。至三原后，组织上派崔廷儒同志前来联系，我仍负责三十八军中军运、情报及发展党员的工作，并建立了三十八军党的支部，由我及贺修之诸同志负责，我任支书。当时发展党员的对象，以军师参谋处进步分子及军部教导大队学生为主，如现任本市（西安市）警备师参谋长之蒙定军同志，暨在卢氏由刘威诚同志率领起义之十七师（1945 年夏）内不少干部（当时均系三十八军教导队学生），均系在当时所发展者。

1936 年西安双一二事变后，三十八军部队改组，我留在军部任科长（十

七师由赵寿山带领），由三原移防西安，当时我的组织关系在陕西省委方面，仍与崔廷儒同志联系。

# 关于组建宪兵营党组织的情况

王　杰

约在1930年秋季，驻南阳的十七路军教导队，共有4个队，一队叫学员，二、三、四队叫学兵，还成立了一个宪兵连，连长叫钟期恭。我在教导队的教育长李保育和一队区队长金子毅的具体帮助下，考入宪兵连当兵。当时教导队共产党负责人是曾楚川（一队学员），他与我单独联系党的关系，那时连里只有我一个党员。以后，继续有我知道有党关系的人由陕西来宪兵连当兵。我曾请示过曾楚川同志怎么办，曾说，这些人的关系没有正式转来，仍保持我与他单独联系，以后再说。不久教导队开到陕西，组织要我们注意学兵思想情况。部队在农历年前开到西安，宪兵连住城隍庙西边，后进行毕业考试，并在民乐园举行毕业典礼。教导队学员和学兵毕业后，分配到各部队去当连、排长，宪兵连毕业的，只分配了一部分在各连当班长，因为当时要成立宪兵营。除教导队给宪兵营分来许多人外，宪兵连大部分留在宪兵营，编为第一连，我也是留下的一个。宪兵营营长由杨虎城兼任，副营长纪子中（山西人），营部军需〇〇，过去也是党员，副官不是党员，书记官汪纪宏[季衡]是教导队分来的党员。宪兵营下设4个连，一连连长钟期恭，过去几次参加过围剿红军，是长期当宪兵的反共反革命分子；二连连长〇〇；三连连长金子毅，在教导队时有党的关系；四连连长于〇〇，我知道他们也是党员，但具体情况不清楚。因为曾楚川同志曾对我谈过，宪兵营营部人员与各连长党员关系不要我管，因此，与汪纪宏[季衡]、金子毅我都没有直接联系，只联系党员排长2人、司务长2人。以后魏志坚到三连当排长，他给我讲中共陕西省委军委指示宪兵营建立共产党营委，各连为支部，魏志坚同志任书记，我是委员，其他人记不起来了。不久，魏要去骑兵团当连长，要我当宪兵营营党委书记，与省军

委李杰夫直接联系，后与曾楚川同志也联系过几次。营委委员是各连支书。一连支书我交给杜俊杰同志（陕北人），是教导队分来的党员排长，党员人数约四五人；二连支书上官克勤（乾县人，是学兵），党员约五六人；三连支书李炳文③（学兵），党员约 20 人；四连没有支部，只有杨建国同志，他是由一连分去当班长的，是单线联系。当时宪兵营大部分党员是由外面转来的，新发展的党员是少数。

以后由于我组织了一次“打副官”和全营各连算伙食账的斗争而暴露，党组织通知我要赶快离开宪兵营。我把党的营委工作交给一连杜俊杰同志负责后才离开。这是 1931 年夏季。

注：①二连连长刘峋。
②四连连长于克让。
③应为史炳文。

# 我在宪兵营的情况*

上官克勤

我在上高小时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 年 12 月经陈洁生介绍）……后因杨虎城进关，经组织把我和李世英介绍到陕西警备司令部机枪连作地下工作（连长是个党员），前后不到一月，因杨虎城宪兵营招考，经组织允许我就考到宪兵营里去。考了宪兵营后，组织西安士兵委员会地下党王志生任书记（现任商邱地委书记），李世英任组织，我任宣传。到第二竿（1931 年）五六月间，乾县魏景征（过去是党员和我发生关系）亦来宪兵营里当兵，与我常接近。有一天他给我说，叫我加入党，我当时因有党关系，而很奇怪，就告诉了党组织负责人魏志坚，魏志坚当时指示我加入，看内情到底是什么（若叫加入什么，就加入什么，把里面情况回来告诉我）。紧接的一个礼拜日，魏就把我介绍为（给）陕西警备司[师]军医处上尉书记杜勉之，接着给介绍说，世界革命形势，中国已经走入资本主义社会了，如农村都是用毛巾袜子，这都是资本主义支配了全中国，弁且还给了我一本书（很厚，用油印的）等情况。当时因我们党每礼拜上午开会，当天我加入那个组织，故把时间改为下午开会，回来后就把全部情况和那一厚本油印书交给了魏志坚，从此后党活约便改为下午（人家组织的会为早上）……

1931 年 10 月去商洛绥靖司令部（司令刘文伯）当中士班长（特务连）。

注：①王志生即王杰，曾任中共商洛地委书记而非商邱地委书记。

# 点 滴 回 忆

王亦哲

大革命时期，我在渭南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转为中共党员。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东北，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也使我产生了投笔从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思想。时逢杨虎城的宪兵营招考学兵，便由渭南团县委李智同志（地下党员）介绍，到宪兵营三连当了宪兵。那时我的名字叫王枕戈，想效法祖逖枕戈待旦，抵御外侮。到三连后，直接与我联系的是李豫章（那时叫李复亮）。一次，他拿来一包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传单，要我在宪兵营内散发，当晚，我便把那些传单撒到营部会议室、院子和士兵宿舍。第二天早晨，宪兵营内到处都是传单。这次活动，震动了全营。李豫章离开后，我接替了他的工作. 我直接联系的党员叫刘德炎，是三连一个排长。据说营部及二、四连都有地下党员或党的组织，如二连党的负责人叫张鸿飞，是渭南下卦城南人。

# 三 到 西 安

谢　华

我是湖南衡阳人，1895 年生。陕西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去西安先后有 3 次。

第一次是 1932 年秋，党中央派我去西安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党内是特派员。到西安后通过关系住在杨虎城部宪兵营，营长金闽生是个进步军官，云南人。他在共产党员副营长童陆生（大革命时期的党员）的影响下，对我多方关照和掩护。不久我介绍金闽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当时是以金、童的客人住在那里，没其他合法的公开身份。1932 年冬，我在西安只与杨部地下党员、《西北文化日报》负责人宋绮云有接触，通过金闽生认识了杨部进步人士王菊人。与地方党组织不发生关系。我在宪兵营先后发展了 30 多个党员，如当时的宪兵杜瑜华、杨文贤（长安人，后牺牲）。杨部绥靖公署参谋处长王根僧也是我介绍入党的。杨虎城将军当时的思想是进步的，对共产党的态度很好，杨夫人谢葆真是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是听别人说的）。谢在工作上与我来往多，但没有组织关系。杨虎城与我没有直接见过面。但他对我在宪兵营内发展党员、搞革命活动是知道的，也是支持的。金闽生告诉我：杨将军让他好好保护我。1933 年秋，我在宪兵营搞兵运工作整整一年，建立了党的支部，直接与上海中央局联系。书记由我担任，委员是金闽生、童陆生。党员 30 多名。

1933 年夏，陕西省委受到大的破坏，国民党省党部也被 CC 分子宋志先所掌握，专做破坏革命的勾当，形势紧张。有人向杨虎城和省党部密告说谢华是共产党，在宪兵营活动很厉害。杨的秘书进步人士周梵伯看到告密信，当即转呈杨虎城将军，杨看后当场烧掉。不几天，杨将军指示金闽生送我暂时离开西安，以免被 CC 特务所暗害。我由西安回上海，杨将军还送

给了路费。我离开西安时，将党支部的工作交金闽生负责。

第二次是 1934 年，上海中央局派我去宁夏花马池领导兵变。路过西安，《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宋绮云给我一个旅行记者的名义，安全抵达花马池。后因兵变不能举行，我仍返上海。

第三次是 1936 年 2 月间，在上海我接到西安地下党同志的来电，要我“赶快回家，主持家务”（隐语），并寄来路费 30 元。我当时在上海已得到党中央 1935 年 12 月瓦窑堡会议的文件，会议决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我正准备西上开展西北军的抗日统战工作，接到此电，立即乘火车到了西安。

当时在西安杨部作兵运工作的党员有徐彬如、李木庵、宋绮云、金闽生、童陆生、王根僧等。还有不少的同情者，都是愿为党效力工作的。

我到西安后，住在挂中医招牌的李正之家中。地址是二府街对面的一条小巷内。此人是我前不久在上海才认识的朋友，为人很热忱。我住在他家里，荀直和在自己家里一样，不仅得到他的掩护，而且在生活上照顾得很周到。另外金闽生和童陆生也常常派部队来保护我。

我到西安后，向王菊人转达了党的 12 月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他说：“杨先生的枪是不会真向内开的，请放心。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到全国范围去才不致孤掌难鸣。”我说：“抗日救国，是全国人民的要求，怎能说孤掌？”我们谈得很好，他愿意向杨虎城将军转达我的一些看法。从此他就作为杨将军的代表，经常和我共同研究在杨部如何开展统战工作。我提议要杨的部队在前方与红军建立关系，争取政治上的主大概是这年 5 月间，党中央派梁明德经过杨部的路线来到西安，党中央与陕西地下党的联系从此开始恢复，特务营设了一个秘密招待所。

我写了一个简单的工作报告，由梁明德带回中央，不久就接到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对我们在杨部进行的上层工作给予嘉奖，并要我建立

地下党组织。原陕西地下党的组织因杜衡叛变，在 1933—1934 年被破坏了。那时地方党与军队中的党组织是两个系统，互不发生联系，因此军运工作未受到牵连。中央要我把它重建起来，并指示今后要着重开展群众方面的抗日救国活动。于是，我们在宪兵营党支部的基础上便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简称西北特支），由我（任书记）、徐彬如、李木庵 3 人为核心。金闽生、宋绮云、王根僧、童陆生等虽不是特支委员，但实际上参加了领导工作。有要事，我们 3 人与他们几个一起商量研究决定分别去办。西北特支主管陕甘白军中党的组织和苏北、鲁南的地下党。因为共产党员郭子化在苏北、鲁南工作，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到西安通过宋绮云与我们接上关系，因此西北、鲁南工作也由西北特支领导。西北特支也管地方党的工作。西北特支成立后，即从学生工作着手，开始进行西北地区的群众救亡活动。西安高中的学生代表李连璧、曹冠群（女）和西安师范的学生代表宋〇〇（名字记不起来了）3 个青年，参加了我们的活动，先后成立了该两校的学生抗日救国会。不久，二中、女师、女中、一中和民立中学以及其他公立私立学校，都相继成立了抗日救国会。东北军家属成立了东北救亡总会。西安市外三原三中（校长冯一航是个进步人士，教员魏恩民是中共党员）和女中、汉中的某中学、甘肃兰州的某中学（校名忘记了）都组织起来了。为了统一行动，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成立了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

西安的学生很积极，他们在暑假期间都不愿回家，城市各界的活动几乎全靠他们，也有到郊外农村去做宣传工作的。此时我们忙得不可开交，整天都在同各界人士商谈如何组织的问题。大概在七八两个月间，组织起来的除上面所说的学生外，还有华丰面粉厂和大华纱厂（西安两个现代化的工厂、规模不大）的工人救国会，以《西北文化日报》社为主的印刷工人救国会，人力车工人救国会，回民也组织了回民救国会，近郊农民如於桥、灞桥，北到渭河边，南到王曲，都有了组织。他们都有自己的宣传队，分散在城乡各地做抗日救国的宣传。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和杨虎城领导的

西北军对这些群众活动从不曾有过什么干涉，而是暗中支持和加以保护的。杨虎城将军曾派过王菊人、米暂沉、金闽生代表他同我们谈判，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支持。因而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如中央宪兵团和伪公安局（局长马志超）的警察也不敢公开露面干涉。当时西安社会各界群众的抗日救国气氛是相当浓厚的，特别是 12 月 9 日那一天群众的示威大会，促张、杨下了事变的最大决心，给历史打开了光明的大门，我们不要忘记！

注：①据杜瑜华回忆：“我是在宪兵营认识谢华的。谢华给我们讲政治课.讲社会发展史。以后才知道他是上海党派来的.他介绍我和杨江（杨文贤）入了党。在宪兵营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和《“左”派幼稚病》等书椿”。

②据当事人周梵伯回忆.他#到告密信.当即转呈杨虎城.杨看后表示.一定要查清告密的人.随即指示金闽生派人送谢离开陕西。

*本文原载《丹心素裹》。本书编者有删节。

# 西 北 特 支 的 建 立

徐彬如

杨虎城身边有一个宪兵营，副营长金闽生（后为营长）和童陆生是讲武堂同学，大革命时期的老关系。经上海军委留沪办事处同意，童陆生根据金闽生的推荐，先到了宪兵营，并且很快得到杨虎城的赏识而当了宪兵营副营长。接着，他又约谢滋山（谢华）到西安，在宪兵营当教官。谢在那里给士兵讲“猴子变人”，做兵运工作，同士兵的关系搞得很好。这期间，谢滋山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其中包括金闽生。后来，中共陕西省委遭到严重破坏，省委书记杜衡叛变了革命，从而追问到杨虎城宪兵营里有一个姓谢的湖南人是共产党，谢滋山的安全因而受到威胁。杨虎城为了保护谢滋山，送了 300 元盘缠，派人把他送回了上海。

谢滋山写信给我们的时候，正是十九路军将领和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的时候（福建事变发生在 1933 年 11 月），也是杨虎城准备联络新疆、甘肃和察哈尔方面响应福建事变，实现“大西北计划”的时候。可是，当我和王根僧到达西安时，闽变已经失败，大西北计划不能实现了。这个变化，使我们两人遇到了困难。王根僧比我好一些，他当过黄埔教官，懂军事，杨虎城尚能接受；我就只好作为金闽生的客人，秘密住在宪兵营里。在那里，我接触的人很少，开始还有杨虎城的总参议杜斌丞和机要秘书王菊人，后来连王菊人也见不到了。有一天，杜斌丞先生来看我，他说：如果闽变成功，大西北计划实现，三分天下有其二，可惜现在情况变了，王根僧可以留下来当参谋处长，你留这里就不合适了。他又问我：西安还有熟人吗？我说：办公厅主任陈子坚是我的同乡同学。杜先生一听连说：“那好啊！你去找他，叫他跟杨主任讲讲。”第二天，我便搬出宪兵营，装作刚到西安的样子去找陈子坚。

说起陈子坚，我们不仅是同乡同学，而且还有一层特殊的关系，大革命时期他是共产党员，北伐中做过不少工作。他在叶挺独立团参加过南昌起义，潮汕失败后转到上海，政治上有些动摇，因生活艰苦牢骚满腹。大家以为他要叛变，都不同他见面。周恩来叫我去做他的工作，劝他离开上海（我那时正在上海沪中区做秘密工作）。我奉周恩来的指示，劝陈子坚或回老家，或去日本留学。他表示没有钱，我便到李明扬那里借了钱，给他做了一件丝棉袍子，又给了他一些路费，帮助他离开了上海。

陈子坚见到我很高兴，安排我住在西北饭店，给了我 100 元钱，还陪我到古玩商店逛逛，买了几个小铜人。他答应把我推荐给杨虎城。几天以后，陈子坚告诉我，杨主任不肯留我，但要他好好招待我并负责送到安全的地方。不久，陈子坚去南京陆军大学学习，安排我回上海。我们同行至南京分手时，他又给我 300 元钱，说是杨虎城送给我的生活费。

就这样，我第一次去西北军，没有站住脚。回到上海，我仍然和谢滋山在一起，在军委留沪办事处工作。

1935 年秋，忽接金闽生来信，欢迎我们回去。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杨虎城将军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越来越不满。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通过《救国时报》传到杨虎城手里，杨仔细研究了宣言之后，决心接受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西北形势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党组织决定派谢滋山和我重返西安。

决定作出之后，具体安排我们回西安的是上海武装自卫委员会（即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前身）的党团书记徐向午（在工部局做秘密工作）。他规定我们的任务是：同西北军中的共产党员取得联系，争取杨虎城的支持，广泛开展西北的抗日救亡运动，把红军引进西安。他对我们说：陕西的党组织自从杜衡叛变以后受到很大破坏，你们不要同地方党发生联系，可自成一个机构，叫西北特别支部。这是一个工作机构，不同于一级党委，

没有发展党员的任务，主要是搞群众救亡运动。徐向午还说：“上海自顾顺章叛变以后，斗争更加复杂了，党中央已在长征途中，你们的关系暂时归上海管，以后要把你们转交给党中央，待和中央联系好之后，会有人去找你们的。”

1935 年秋，根据党的决定，我和谢滋山二次去西北。临行时，谢滋山有事晚走，我们两人约好了联络暗号，互相给对方起了假名字，我替他改名谢华，他给我改名徐彬如（我原名徐文雅）。从此，我们两人一直都用这两个名字。

第二次到西安，情况要比第一次顺利得多。因火车只能到临潼，金闽生派人到临潼接我。安排住下后很快就开始工作。大 d 两个多月后，我打电报给谢华“赶快回家.主持家务”。与此同时，我还约南京的李木庵来。

李木庵，又名李清泉，清末秀才，当过李厚基的秘书，对法律造诣较深，特别擅长写文言文通电。我把他的情况向杨虎城将军做了介绍，杨很高兴，马上叫我请他到西安来，安排在宪兵营当秘书。李也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清党”时失掉了党的关系，一度在南京挂牌叫李振坤大律师。我在上海沪中区的时候，他到上海找党，要求恢复党的关系。我奉周恩来的指示接待过他，以后又在南京多次见面，所以熟悉。

坩华比李木庵晚到几天。大约在 1935 年 10 月谢华到西安。他来之后即宣布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立，谢任书记兼管组织，我和李木庵管宣传。我们 3 个人都在西安绥靖公署安排一个职务，每月有几十元钱薪金维持生活。我们的活动经费也是西北军给的。杨虎城有一笔宣传费在宋绮云（秘密共产党员）处，主要用于支持共产党的活动。

这样西北特支的成员主要有：谢华、徐彬如、李木庵、宋绮云、金闽生、童陆生和王根僧等秘密党员。

1936 年春，党中央派交通梁明德来找我们。在他回陕北的时候，谢华

给他带去一份报告，汇报了特支的工作和西北军的一些情况。从此，西北特支和苏区接上了关系直接归党中央领导。

注：①据李木庵回忆：“1935 年应西北军之宪兵营招收，担任营的政治教员，经徐彬如、谢华恢复关系同时参加持支，并与他们创设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双一二事变后.三十六师驻西安.派队搜围救国会.检去各种重要文件我被捕，和该师参谋长谈话认为这组织不合法.明令取消，即被释放。”

*本文节自《丹心素裹》所载徐彬如《西北特支始末》一文。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辛　文

1932 年 2 月，我考入宪兵营三连一班，当时才 I6 岁，因出身贫苦，是主考官破格录取的，被分在三连一班。连长叫甘庭桂，原为冯玉祥部下，贪污腐化；班长路云亭，是甘的忠实走狗，担任了我连士兵委员会经济股长。我因学练皆优，后来被指定为经济监督股长，这是连长和班长为了把我拉向他们一边才这样做的。我心里有数：绝不跟他们胡作非为。这时连里的党团员（后来才知道）和进步青年王其昌、张作良、李恒茂、赵景州、蒋志刚等非常关心我，常和我谈心，还私下教我细读《少年 0 泊者、《.呐喊》、《共产主义 ABC》、《十大怪杰》、《四大问题》、《铁流》、《毁灭》、高尔基的三部曲[①]、普列汉诺夫的《社会主义间题》等。这些书当时都用其他封面伪装，例如高尔基封面为《路》，《共产主义 ABC》封面为《阿拉伯字母》，鲁迅著作封面为《我》。

1932 年，西安发生“四•二六”事件[②]，一批进步学生来到宪兵营，记得刘振亚就是那时来的。金闽生对我印象较深，他利用周会大讲用人公开、经济公开、赏罚公开、言论公开“四大公开”。一次他讲“宪兵”的定义说：“宪者，悬法以施人也。宪兵者，执行军法之兵也。法者，公共之事也，维护公共之事者，宪兵也。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些，就是看我们能否维护公共之事。”他还结合讲总理遗嘱，给大家解释什么叫法西斯主义。他说，法西斯主义和地狱一样，是冤枉好人的。现在很多所谓总理信徒，却实行法西斯主义，岂不是自欺欺人！总理让我们“唤起民众”，民众被冤枉死了，他还能跟你走吗！谢华走了以后，叶奇讲课比较多，他公开系统地讲社会科学。我也是这时才知道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乌托邦。叶奇还在宪兵营组织了学术研究会。他

说，你们不是都学着“学”、“术”两科么，我们借这个名字来研究社会科学。

1934 年除夕，我回本县搞兵运工作，1936 年春节前后奔赴延安红大学习。

宪兵营先后去延安红大的有田世雄、马生羽、樊执中、常耀武等。

**注：**①指高尔基自传体小说《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②即西安学生反对戴季陶事件。

# 我在宪兵营的工作情况

王　力

1935 年冬，我到宪兵营三连当兵，由秋宏把我的党组织关系转交崔廷儒，直到西安事变，都是崔和我直接联系。

我记得我在三连发展的党员有刘振亚、卓明玉[①]、吕建勋，还有赵明远、王云武，组织了支部，我是支书，吕建勋、刘振亚是支部委员。

1936 年 1 月，宪兵营把各连零星接收的新兵组织了一个新兵排，在新城训练，排长是李省[醒]吾，副排长马生羽、刘俊德、田世雄等。我到新兵排就碰到李卡栏，和我一块，因我俩关系密切，刘庚就向我俩讲，你们要注意，不要太突出了，叫人家发现了就不好办。从此也就和刘庚来往，但没有发生党的关系，我仍在三连过党的生活。二三月间，新兵排训练结束。

1936 年秋，杨虎城把宪兵营改为特务营，是要把部队变为战斗部队，准备西安事变。改为特务营后，仍为 4 个连，每连有 100 多人，几挺机枪，还有个特务排，有六七十把短枪。营长为宋文梅，一连连长袁鉴吾，二连连长席珍儒，三连连长张希钦，四连连长李锦峰，营副是冯鼎三，副官是傅崑山，营部特务排排长王自忠[王子中]。政治教官原来是薛华亭、许冰，宋文梅当营长时，换成刘炳林[秉琳]、姜树德、郭西荫。

崔廷儒让我组织营总支时，军队正在改编，我因为在三连当兵，不容易出外活动，就设法给营副冯鼎三当了勤务兵，从而有更多机会到各连活动。当时我是总支书记，吕建勋为组织委员，下边 3 个连还有支部，一连党员有张学义、薛应乾，常志刚当时在那里记不清了，高绥夫在营部图书馆，刘俊德可能是党员，可能是崔廷儒给我交的刘俊德和高绥夫的关系。两个月时间，正在组织整顿联系，就西安事变了。

西安事变后，老崔通知我释放“政治犯”，我就到监狱去引回 80 多名“政治犯”，他们的罪名是“违害民国”。老崔讲，政治犯中，赵伯平他要调走，其他人可留在你们这里。我们经过审查，先解决了其中韩学理的党籍问题，出任营总支书记，我改任组织委员，吕建勋当宣传委员。经过继续审查，让赵宝森作第一连指导员，刘兰生作第二连指导员，第三连指导员的名字记不得了，第四连指导员是姓蒙的。还有个李登科，是红二十五军一个营长（未被发觉），就要他作我们的秘密营长。各连指导员同时是各连党支部书记，又是总支委员。当时环境也好，工作是很活跃的，各连指导员给战士公开上课，召集讲话，有的还公开批评连长。

1937 年初，特务营就被调到渭北三原县北东里堡。有一天听说东北军孙铭九旅派了个人找杨虎城，想说服杨虎城打仗，那人当时向杨虎城讲，你要不打，你的特务营马上就要哗变，杨问向哪里哗变，那人说向红军那里哗变。杨虎城就把一〇一团调去把东里堡包围了。第二天就把特务营开到鲁桥镇。我就到云阳镇给省委报告了事情发生经过。我给欧阳钦说，我在这个军队不能待了，还是离开好，欧让我自己想法合法离开。我就找营长宋文梅，要宋送我住红大，宋同意后，给我写了公函，开了护照，我回到省委，欧阳钦说，已经出来就在省委工作，不到红大去了。这样，我就在省军委当了干事，当时给我交了杨虎城的警一旅、三十八军教导队和教导团这几个单位的地下党工作。从此，我除了回省委学习和汇报工作，就常在这几个军队跑。

**注：**①卓明玉，现名阜博文，据本人自述，系 1932 年 7 月在户县加入中国共产党。

②应为薛应之。

③据原宪兵营二连茹夫一回忆，三连指导员为王振声，山东即墨人。

# 廷儒领导我搞兵运*

刘　庚

1935 年 10 月，临潼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我和省委特派员崔廷儒的联系也中断了。在伪县政府和家庭的双重迫害下，我在家实在待不下去了，流落到西安，在杨虎城宪兵营新兵排当兵。在这里，我常和一些同情革命的士兵谈心，做兵运工作。新兵排有一位姓赵的排长，对我的工作也暗中给予帮助和支持，但彼此未公开身份；孤军作战的我，苦于没有上级领导，万分焦急地盼望着尽快找到上级党组织。一天清晨，新兵排正在新城广场上早操，一个穿长衫的人匆匆走过队前。我仔细一看，是崔廷儒！我的心情霎时变得异常紧张，多么想跑上去和他谈谈！但又怕暴露了身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远。下完操，正往宿舍走，猛听得赵排长在背后叫我，回头一看，他身边还有一个人，正是崔廷儒！看到我不顾一切地跑近了，他低声说我以为你死了，原来你还在啊！

声音饱含着感慨和激动。望着他和赵排长，我的眼睛湿润了，这就是我日夜寻找的战友和组织！我不是孤立的，我又找到了党，找到了同志。这是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同时，我也明白了，廷儒一直通过赵排长在暗中考验我、支持我。从此，我就在廷儒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在士兵中开展革命工作了。

当时，西安有两个宪兵部队，一个是中央宪兵团，是蒋介石的嫡系，装备比较好；另一个是杨虎城的宪兵营，属于西北军的地方势力，装备比较差，这两个部队的矛盾很尖锐。而宪兵营里又有很多同情革命的青年学生，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分析了以上情况，廷儒指示我们，要利用地方势力和伪中央政府的矛盾，利用青年学生易于接受新思想的特点和广大士兵反对官长压迫、要求民主平等的心理，大力宣传抗日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

开展士兵运动。我所在的新兵排有个张排长，是兼管伙食的特务长，自己不会带兵，还常找士兵的岔子，体罚、打骂士兵（我的手就被他用皮带打肿过），又常克扣伙食，士兵们恨他、骂他。我们就决定从他开刀。为了上下配合，采取公开和秘密斗争相结合的方法，廷儒通过赵排长指示我向营部写了一封揭发特务长的匿名信，并告诫我们，打击面不要太宽，要集中力量打击特务长一人；要注意斗争策略，针对和士兵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进行鼓动，开展斗争。听了他的话，我们就抓住张特务长克扣伙食和虐待士兵的问题，向营部写了告发信。经过个别争取和广泛联络，我们把 3 个班长都争取了过来，使他们支持我们罢操，并召开士兵大会，宣布成立“经济委员会”，负责清算特务长的伙食账。我们事前准备好的经济委员会的章程和人选，也很顺利地在会上通过了。经济委员会成立后，经过认真清查，查出特务长贪污的 30 多元伙食费，勒令其退还，并禁止排长随便在灶上拿馍吃，打击了他的嚣张气焰。一次，一位士兵被虐待致死，我们立即发动新兵排集体罢操，召开追悼会，抗议官长的暴行，掀起一个反对虐待士兵的运动。这些运动得到了广大士兵的响应，结果使士兵的伙食有了改善，打骂士兵的现象也少了，广大士兵对我们更信任、更接近了。为了传播革命思想，我们还开办了图书馆，创办了墙报，组织士兵学习新文字（拼音字），并通过这些活动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不到一年，宪兵营的 4 个连，都发展有党员，在新兵排还成立了特别支部，领导全营的士兵工作。不少军官也转而同情革命，甚至那位姓张的特务长，也为我们开假路条，对我们的工作提供方便。宪兵营的党组织为革命培养出不少党员干部，他们在以后的西安事变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应有作用。

*本文节录自《崔景岳》一书所载刘庚《崔廷儒领导我们搞兵运》一文。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关于宪兵营党组织的有关情况

李锦峰

宋文梅接宪兵营后，即调我到宪兵营任教育连少校连长，此教育连长原由宪兵营中校副营长谢晋生兼。我到宪兵营后，谢即离开，到阎揆要团任副团长。宋文梅比我年龄轻，但长处比我多，首先长于活动，能打开局面，我差得很。宋文梅与我在察哈尔同盟军中并肩作战，一直到底，彼此很了解。后来宋把张希钦由南京叫来，任宪兵营第三连连长，把席珍儒叫来任第二连连长，第一连连长袁健[鉴]吾有意不动。姜树德是后来的，找张希钦来的，西安事变时，姜树德在宪兵营尚未任职。

我到宪兵营第四连首先由王汝昭介绍了李醒吾同志，主汝昭说李醒吾同志参加过 1928 年渭华暴动，后调中共陕西省委秘书处，1929 年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入狱，1930 年杨虎城将军率部进陕西，才由狱中逃出。李醒吾也曾到汉南张飞生部，后才到绥署训练班学习，又被分配到宪兵营教育连工作。王汝昭的情况与李醒吾一样，而且 1928 年渭华暴动时，王汝昭和我一起在中共陕西渭南县西南区委工作。1934 年秋我到杨部的炮兵团后不久，就与王汝昭见了面，我相信王汝昭革命也就相信李醒吾也革命，醒吾又给我介绍许乐善，这样我到宪兵营第四连后，就抓住两个主要干部，通过了解，他俩当时都给中共陕西省委担任某种保卫工作。我们连的班长邹功烈同志是党员，陕西柞水人，[其]余名字记不起了。

## 十七路军宪兵营组织成立

军息：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氏，以宪兵之设，于军风两纪，极有关

系，持委任纪子钟为本军宪兵营营长，以重军纪。纪氏已遵令组织就绪，在西大街旧党部设立营部，开始办公云。

（原载 1930 年 12 月 11 日《新秦日报》）

## 杨虎城对宪兵营官兵训词

我对宪兵营，还没有单独集合讲过话，因为宪兵营官长都是有学识的优秀分子，我相信对于教育训练是有相当办法，也不用我时常地来讲话，耽误了宝贵的学习时间。今天所讲的，就是要大家认识，成立宪兵营之目的及宪兵营所负的使命。第十七路军为求部队健全，为纠正军人行动计，故有成立宪兵营之必要。此次朱总长校阅后说：“宪兵营一切都好。”社会上一般人也评论宪兵营，比其他部队好。我以为不算什么好，因为宪兵是军队中的警察，是军人的模范，负有纠正军人一切言行之重大责任。并且你们质量与普通兵不同，你们都是高小及中学毕业，所受的军事教育又比昔通兵高；你们的干部，又是最近受了新的教育。当然官兵的成分和学术，应高于普通军人，一切动作也比他们好。但是拿全国宪兵来比较，你们便差得很远。因为你们受训练的时间过于迫促，所以你们要用十二分的精神，努力研究学术科，练习服务能力，不要因为人家赞美你们好，你们就趾高气扬地不求进取，这是最要紧的一点。现在新兵教育期已满，应派你们服务。我为使你们多受教育起见，暂不派你们服务。我对你们还有很深刻的希望，就是希望你们能受指导人的训练，造成一个健全的军人。将来服务的时候，就实施所学，一举一动，都为军人作模范。要一丝不苟，那才能完成你们所负的重大使命，才不至辜负十七路的财政万分困难时，成立宪兵营的苦心了。

（原载 1931 年 5 月 12 日《新秦日报》）

## 宪兵营经济委员会昨开成立大会

童陆生分两点报告开会意义选童陆生金闽生 6 人为委员宪兵营成立经

济委员会，谋全营经济公开，前经济委员会预备会各节业至前报，兹闻该营于昨日（23 日）下午 4 时，在该营会议厅，开营经委会成立大会，各连连长及宪兵代表、营部各处代表到会者共 40 余人，由营附童陆生主席报告开会之意义约分两点，一经委会成立后，全体官兵都能彻底明了，过去本营经济公开之状况。经委会成立后，一切用途格外适当，务使每一文钱，都用在官兵有益的事情上。报告后旋即照章选举，选举结果，童陆生、金闽生、钟期恭、刘峋、薛用之、高炎丞 6 人为委员。并推定钟期恭起草大会宣言、决议，各连亦应于最短期间，成立连经委会云。

（原载 1932 年 8 月 24 日《新秦日报》）

## 杜衡供词摘录

加紧政府军队中的活动，煽动兵变。特别注意到骑兵团、甘肃之中央第一师，西安之宪兵营。这些部队中，共党都有相当基础。

共党更巧妙地利用救国会名义，在西安召集代表会议，于 5 月 9 日国耻纪念日，在西安大学习巷回民反日救国会内开会，西安各校学生都派代表参加，共党还调动军队中的共党分子参加，以特务团、宪兵营为中心，而宪兵营之共党分子持枪保护会议。

（摘自杜衡叛变投敌后 1933 年 12 月 8 日写的《陕西共党沿革》，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高绥夫交待材料

高绥夫，化名金山，1917 年生于陕西乾县北大街一个贫农家庭。1934 年投考杨虎城的宪兵营，管理图书室，同年经刘俊德介绍认识崔钦如[②]，加入共产党，直接受当时西安党的负责人孙作宾领导。

（摘自高绥夫 1949 年写的交待材料。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注：①纪子钟，即纪子中。

②崔钦如，即崔廷儒。

# 王德修营地下党的情况*

李秉荣

1929 年，陕西全省大旱，灾民四起，全省形成反抗当局统治势力大潮流。王德修将他附近的乡邻、生活困苦的青壮年领着打豪绅。1930 年杨虎城返陕后，把陕西因灾而形成的地方势力全部收编，王德修部也是新编之。王德修部被收编为营后，由中共党员李特生、习仲勋、刘书林和我在长武县成立党小组。军队移驻彬县，党小组会议上决定刘书林去西安找省委汇报并请示指导工作。第二次会议上，党团员扩大，在各连调整如下：李特生、吕剑人在第一连，习仲勋、吴进才在第二连，许天洁、左文辉在第三连，机枪连是我和张俊（张克勤）。刘书林去西安接通关系后，省委派焦仲明、第五百昌指导工作。并派张俊帮助工作。军队移驻凤翔，省委派来周凯、李杰夫检查工作。军队移驻凤翔时，由于省委被破坏，李艮曾由西安到凤翔，临时任营部司书。李艮走后，军队又移到凤县，我从徽县给凤县运子弹，参加了小组会。会议上有人提出兵变，大家一致同意。并派人请示省委。会议完后，我回徽县（当时团部在徽县）。省委同意兵变，派来刘林圃全权代表领导兵变。军队又移往徽县，行至两当举行了兵变。因我住在徽县，没有赶上参加兵变，所以兵变情况我不知道。

# 回忆两当兵变*

李特生

1929 年冬，中共陕西省委派我到驻防陕西省长武县的骑兵旅二团二营做兵运工作，后来这个营被编为陕西警备第三旅第二团第一营。我的公开职务是二连文书。这里原有党员两人，即李秉荣和陈策。陈策于年底请假回家，再未回部队，李秉荣这时任少校团附。1930 年春，习仲勋同志来到该部任二连见习官。随即由李秉荣、习仲勋、李特生 3 人建立了党的领导小组，并在长武县西门外药王洞庙内，举行第一次小组会议，推定李秉荣为小组长；决定李秉荣同志辞去少校团附职务，改任三连副连长，以便掌握实权；决定以二连为中心，开展全营的兵运工作；同时稳步地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

1930 年 4 月，党领导小组派刘书林同志（时任营部文书）到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刘书林同志回来传达了省委有关批准建立党组织的决定。同年 5 月，省委又派特派员张克勤同志来陕西彬县一营防地，传达省委关于开展兵运工作的指示，接着在一、二、三连都建立了党支部，并建立了营委，选李秉荣为第一届营委书记。1930 年冬，李特生继任营委书记。1931 年夏部队开到凤翔，习仲勋继任营委书记。在此期间，省委派吕剑人同志来到该部，担任一连排长。李特生从彬县时起，改任一连特务长。习仲勋同志任二连特务长。1931 年冬，一营还驻防凤翔时，陕西省委曾派陈云樵同志来凤翔召集习仲勋、李秉荣、张觉等同志和我在凤翔东湖开过 1 次会，传达中央和省委指示。1932 年春，营委决定派刘书林同志到陕西省委汇报工作，省委决定要我们举行兵变，并指示在兵变后，将队伍拉到旬邑与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刘志丹同志会合。同时，派刘林圃同志前来领导兵变工作。

这次兵变以前，一营的党员分布情况为：一连吕剑人（排长）、张觉（排长）、李特生（特务长）。二连习仲勋（特务长）、高瑞岳（排长）。三连许天洁（排长）、左文辉（排长），各连班长如吴彦俊、魏明山等也是党员，战士中党员也不少，总计不下三四十人。

刘林圃同志到了凤县后，在凤县双石铺召开营委会议，决定执行省委决定。并决定在部队开往徽县、经过两当宿营时举行兵变。为了隐蔽起见，将刘林圃同志预先安置到双石铺北面小山上一个庙内主持道长处住宿。由他负责摸清兵变以后的行军路线。在部队移防行军开始时，提前派人通知刘林圃同志，由他在双石铺街道等候，在部队经过时，他即混入行列，以便进行具体领导。

部队到达两当以后，晚上八九点钟，在车马店内举行营委扩大会议。除营委外，各连骨干均来参加。会上，由刘林圃同志说明了举行兵变的重要意义，然后讨论举行兵变时间，一致决定在午夜 12 时举行。决定起义时，各连先将本连连长枪杀，然后将部队带到北门外集合。并推定许天洁同志为兵变总指挥。

1932 年春〇日午夜 12 时，一营一连起义战士，枪杀了连长。接着，二、三两连也即时动，连长也同时被杀。一连吕剑人带着部队去解决机枪连时一个排长也被打死。这时，营长王德修听见枪声，知道出了问题，随即带着老婆，翻墙逃走。因他住在一个老财家中，墙高门厚，等到起义战士赶到时，他已逃走。

起义队伍由各连负责人带到北门外集合，刘林圃同志简略地把举行兵变的意义向部队说明，战士们明白了这次举行兵变是前往与红军会合，参加革命，并宣布把队伍改名为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五支队，大家一致拥护。随即由事前找好的向导在前边带路，向太阳寺出发。走了一夜之后，到达太阳寺，已是次晨八、九点钟了，就在太阳寺休息、吃饭。下午黄昏以后，由向导带路继续向北前进，准备和刘志丹同志的大部队会合。

部队在终南山森林里大约走了一个星期时间。在到达渭河边时，渭河

的水还相当深，战士们手拉着手渡过渭河。渡河后已是黄昏。上了北山，继续向前走了几里路，到农民家中吃饭、宿营。据群众说：“已到了陕西陇县边界，前面是赤沙、香泉，驻有土匪保卫团，是必经之地。”第二天清晨，部队出发，走了 10 多华里，到了匪团土寨附近。匪团立即从寨内向我部队射击，我身旁一个战士牺牲。这时敌人的火力相当猛烈，为了避免损失，我们改从小溪边上到沟沿，绕道前进，再未接触。

又前进了 30 多里后，到了一个山村通洞峪，部队当晚在此宿营。这个山村四面都是密密梢林，等到天明集合出发时，发觉林内有敌人的埋伏。敌人从梢林里向我们包围射击，战斗异常激烈。我带着一排战士，到地埂边散开，顽强地进行抵抗。但因敌众我寡，不宜久战，我们决定向山林撤退，幸好许天洁带着三连反攻上来，经过和敌人激烈战斗之后，把敌人打退，又整顿好队伍，继续北进。

几天后，部队到了千阳、陇县之间的公路上，住在一个小镇里。群众说：前面是高崖镇，驻有保卫团的一个班。指挥部决定把它打掉。从各连抽出精锐 40 人，组成突击队，由许天洁带领提前出发，不料突击队到高崖时，敌人早已逃跑。大部队到达高崖时，已是上午 10 点钟左右，就在高崖休息，于昏时候，向东北方向出发。中午，灵台县国民党驻军某部一个连兵力，突然卡住山道，截住我军去路，攻击几次未打过去，天晚后就转道前进了。

为实现省委的决定，起义队伍决定改道前进。但因不了解沿途敌情和道路，到达岳御寺山村休息。这时刘志丹同志奉陕西省委的指示，已经把队伍带出来准备接应。但是就在上午 10 时左右，被盘踞在这一带的大土匪王结子的大部队突然包围。许天洁同志立即集合队伍，占领北面一个土岭阵地，随即各连散开卧倒，抗击敌人。这时敌人以压倒的优势兵力，向我逼进。激战数小时后，因伤亡过重，不得不后撤。由于部队连续昼夜行军，疲劳过度，失去战斗力，遂告失败。习仲勋同志随即回到陕北红军。吕剑人、许天洁同志在西安寻找陕西省委时，在街上被捕。吕被判徒刑 10 年，

于西安事变前被营救出狱；许天洁同志被押时间较长，于西安事变以后被释放。我和陈云樵同志由省委派往兰州工作。刘林圃同志于失败后，在西安被捕就义。

# 忆 两 当 兵 变

许天洁

两当兵变是1932年春天发动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个部队是杨虎城的警备第三旅二团，该团管两个营，团部和二营在甘肃徽县驻防。一营驻凤县、两当一带。一营具体布防情况是：营部和一、二连驻凤县及双石铺，三连和机枪连驻两当县。这个营已有地下党组织，党员大都是些排级干部。1932年春天，团长命令一营全部开往徽县，头一天住在两当县城，准备第二天去徽县。当天晚上，党内开会，……开会时我因有事没有参加，会罢我才去的。当时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掌握三连解决连长和营长，以外边枪响为号，枪响后解决得很顺利，但是营长跑掉了。接着就集中队伍，由刘林圃同志讲了几句话，就立即出发了。这时是吴进才的总指挥。出洞口峪张励之的民团挡住去路，被我击退。接着过了渭河，转到麟游以北，收了高崖镇民团的枪。往东北走，又遇到杨子恒的部队，打了一天，当晚甩掉了敌人。往前走，方向不大明白，赶天明走到岳御寺村准备休息、吃饭。计划晚上由彬县、永寿之间穿过泾河。在队伍未住好前，刘林圃和吕康若去乾县一带了解情况。这时掌握部队的只有吴进才、高瑞岳和我等几人，一方面安置部队休息吃饭，一方面了解周围的情况。据老百姓说，土匪王结子离这里不远。这个家伙我们早知道他很厉害，所以我们就研究了一下，给王结子写了一封信，大意说，敝军路过贵地休息一下即去，请不要发生误会。信刚写好，交一老百姓还未送出村，就听到北边哨上打了几枪，我即查问，说是哨对面来了几个穿便衣的，打了几枪就跑了。这就使我们麻痹大意，再没有注意，只是催促做饭。不大一会，哨上又打枪，我和吴进才就往哨上跑，到哨上就和敌人接火了，我们几支枪把敌人从正面阻住了。敌人大部队摔开正面，由两侧去包围村子，村里自己的部队没人指挥，闻

到枪声，起来乱跑，被敌人冲散。这时把我已逼到敌人后面了，看见自己的部队乱了，敌人向部队冲打。这时我就在敌人后面喊：不要打了，咱们商量，我们已经写信去联系了，请不要误会（这时我手中已没有枪了）。结果还是没有挽救局面，把一部分枪被敌人收了，三五成群的跑了一部分。以上是两当兵变开始及失败的大略过程。

注：①吕康若，即吕剑人。

*本文摘自许天洁 1969 年 4 月 2 日写的历史证明材料。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警三旅二团一营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与活动

刘书林

1929 年底或 1930 年初，中共三原渭北党的负责人田玉国（田光烈）同志指示我：王德修的部队现驻防长武，你可以利用同王的同学关系打进去开展党的兵运工作。还说，你先去，我以后也要去。我就遵照党的指示到了长武。那时，王德修是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司令。杨虎城入陕后，在 1931 年初，把王德修的二支队编为苏雨生的骑兵旅二团二营。不久，苏雨生叛杨逃走，王的二营在党的影响下没有跟去，遂被杨虎城编为陕西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王德修仍任营长，让我当了营部的军需文书。一营先后在长武、彬县、凤翔和凤县驻防。

一营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是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逐步发展起来的。有一部分党员是中共陕西省委派进去的，大部分党员是在该营先后发展的。早在 1930 年初，在长武县城北药王洞庙里召开过党的会议，参加的党员有李秉荣、李特生、习仲勋，成立了党小组，组长是李秉荣。第二次开会时我也参加了，讨论了发展组织的问题，并决定派我去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情况，请示工作。后来在彬县、凤翔时，省委又派来一些党员，同时又发展了一批新党员。许天洁就是由我介绍、经习仲勋批准入党的。到 1931 年夏进驻凤翔时，各连已成立了中共党支部，营成立了党委，党员达到三四十人。因党员不能发生横的关系，所以我对全面情况不了解。我所知道的党员：在一连的有吕剑人（排长）、张子敬（排长）、李特生（特务长）、吴彦俊（班长）、魏明山（班长）、肖颂才（班长）、张茂修（副班长）、李振杰（战士）；在二连的有高祥生（排长）、吴进才（排长）、习仲勋（特务长）；在三连的有王清栋（特务长）、许天洁（排长）、左文辉（排长）、刘书函（原机枪连班长）；在营部的有刘书林（军需文书）、郭立

三（营部副官）；在团部的有李秉荣（原任机枪连长，后任团部军械官）、张楫（张克勤，先在机枪连，后任团部军械上士）；刘世民、史宏志、石文杰也是党员.但记不得在那个连队了；还有一些党员，如孙烈[一君]、李艮（营部书记官）、陈策、郭凤鸣、刘明世（文书）、郭明孝等，都在该营工作过，但因各种原因，时间不长就离开了。总之，在该营不仅党员多，组织健全，而且有许多党员担任了排长、特务长和班长职务，掌握了一部分带兵权。

一营地下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是很活跃的。营党委和各连党支部，要求党员通过个别谈话、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等形式，对士兵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加深对党的了解。主要内容是宣传劳苦大众为什么穷，地主老财为什么富，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的，国民党是为地主老财的，从根本上启发士兵的阶级觉悟。我们还宣传长官如何压迫剥削士兵兄弟、喝兵血、扣军饷，吃空名字，打骂士兵，鼓动士兵对长官开展日常斗争，要求算伙食账，发放衣袜，改善士兵生活。因为士兵大都是陕西大旱中破产的农民，到部队后生活又极为困苦，所以对我们的宣传教育都能接受，效果很好。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我们就宣传抗日救亡，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大大激发了士兵群众的抗日爱国热情。有时也宣传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消息，扩大了红军的影响，也加深了士兵群众对红军的了解。我们散发的传单有《告士兵书》、《告全国同胞书》等，张贴的标语有“打倒军阀，打倒列强！”“反对围剿工农红军！”“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在党的教育鼓动下，广大士兵群众进步很快，斗争情绪高昂，这就为两当兵变打下了思想基础。

党员的另一个任务就是广交朋友。我们的故法，首先是从生活上、经济上关心士兵群众，培养私人感情，进而结为兄弟，成立“兄弟会”。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成为党的同情者，有的就发展入党了。习仲勋同志就很善于交结朋友。在凤县驻防时，通过别人介绍，一起

闲谈玩耍，同本城一个小学教师刘希贤结为朋友，并结为“金兰”。利用这个关系，党组织经常在九希贤家里以吃饭、打花花牌为名，召开党的会议，开展党的工作。我们进驻凤县后，团部以收编的部分土匪为基础组建了机枪连。习仲勋告诉我，母亲（党）说了，我们一定要在机枪连发展党员。开始可以先同他们交朋友，工作要逐步深入。于是，习仲勋和我，对机枪连的两个排长和一个司务长有意接近，表示很关心亲热。后来，习仲勋、我和刘希贤还和他们 3 人结为朋友，并照了“金兰”纪念照片，每人洗了一张，刘希贤一直保存到全国解放。李秉荣原是机枪连连长，也很重视交朋友的工作。他十分关心士兵的疾苦，谁有难处就慷慨解囊。自己又懂军事技术，在连队威信很高。他的表现引起了团长的注意，不久把机枪连解散了，把他调到团部任军械官。离开连队时，全连的士兵都难过地哭了。

我们也注意做当地群众的工作，搞好军民关系。那时，国民党的军队所到之处就是敲诈勒索，打骂群众，不是明里摊派，便是暗里抢劫，群众非常痛恨。我们一营在地下党的帮助和影响下，军纪比较严明，对群众没有打骂，也没有发生过抢劫群众的事情，有时还能帮助农民收庄稼，搞卫生，保护学校集会，维持地方秩序。特别注意尊重回民的习惯，对清真寺从不侵犯，所以同回民群众的关系也处得很好。

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主要是片面强调走士兵路线，忽视争取军官的工作。对连以上军官不做具体分析，不能区别对待。比如对一营的连、营长，平时一律采取反对的态度，兵变时一律采取处决的方针。二连连长唐福亭，是行伍出身，能打仗，不讲政治，本是可以争取的，兵变时也被打死了。

陕西省委对一营地下党的兵运工作十分重视，不仅有计划地打进去许多共产党员，而且经常派人来视察指导工作。1931 年下半年我们在凤翔驻防时，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就来视察过我们的工作。李杰夫问过我关于士兵群众的情绪，当地驻军的情况，我都对他讲了。他还提出要一

营发动兵变。营党委的同志考虑，我们地处平川，周围驻军很多，发动兵变后部队拉不出去，因而否决了他的意见。陕西省委还派第五百昌、陈冠英（陈云樵）、焦仲平、朱立凯、周凯等来过。第五百昌来过几次，他是旬邑人，大个子，一身道士打扮，来了有时住在庙里，有时住在店里。任务是传送文件，了解情况。每次来都和我见过面。省委派人视察，对我们的工作起了很大的督促帮助作用。

—营地下党的组织也经常派人向省委汇报情况，请示工作。派其他同志去的情况我不甚了解，光派我就先后去过 3 次。第一次是 1930 年在长武时由党小组派我去的。我到了西安大湘子庙街杜斌丞公馆找到了杜衡，他叫我去找杜鸿范（杜斌丞的儿子）。我在东大街青年会找到了杜鸿范，向他汇报了一营党组织的情况。他听了后说好，以后要多加强联系。并让我带了一些党内文件，回来后交给了李秉荣。第二次是 1931 年夏末在彬县时由李特生派我去的。我记得也是找到杜鸿范汇报的。第三次是 1932 年初在凤县时去的。当时营党委认为，一营驻防山区，周围驻军又少，是发动兵变的好时机。于是营委书记习仲勋派我去西安找陕西省委请示兵变的问题。我以买东西为名骑着马迅速到了西安，按着习仲勋的交代，我在东大街青年会找到了省委的两位同志（姓名忘记了），我把情况谈毕后，他们严肃地对我说：“你必须马上回去，叫党委加紧兵变准备工作。”省委讨论后马上派人去领导。揆着他们又叫老李同志（名字忘记了）把我带到西北旅社，交给我一些党内文件带回，其中有关于红军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消息等。当时我非常兴奋，当天就离开西安，一路上快马加鞭，第三天就回到凤县，当即向习仲勋同志作了汇报，说省委同意我们实行兵变，不久派人来领导。兵变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这时，郭立三同志叫我到宝鸡买枪油。这是兵变的必须品。我又骑马去宝鸡为部队买枪油。在去的路上，正巧碰到了张克勤（也是营党委派去省委请示兵变的）带着省委派来领导兵变的刘林圃同志。克勤对我说：省委决定马上发动兵变。你去宝鸡买上枪油后必须立即返回部队。我在宝鸡买上枪油就往回返。可是，当我赶回凤县时，部队

已经在两当起义了。当时，凤县城里非常恐慌。我住在一个王老汉家里。第二天下午，王德修营长带着一部分未参加兵变的人回到了凤县。营部郭立三也跟着回来了。王德修见我也没说什么，把我骑的马要去，到宝鸡后卖掉.还给了我 5 块现洋。第二天，他去了西安，我和郭立三回到三原。不久，我去西安找到了陕西省委军委的方清堂同志，给我分配了新的斗争任务。

# 在王德修营搞地下工作

张克勤

我是1931年夏天由省委杨三[①]派我到彬县驻军王德修营的第三连[②]（连长是李秉荣）入伍作兵运工作的。这时，这个营党的负责人是李特生、习仲勋。据特生、仲勋给我交待的党员同志是连长李秉荣、排长吕康若（吕剑人）、许天洁、高祥生、吴进才、左文辉、张觉民（张子敬）、营部文书刘书林，班长有魏明山、吴彦俊、赵敬忠等。

不久，把我们这个连解散了，分插到其他3个连去，于是我们的工作范围就扩大了，在士兵中的影响也大了。这时正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人们的爱国情绪也高涨起来，我们工作就更为顺利了。刘志丹在陕北的活动也影响到我们这部分人，我们的根基就一天比一天巩固起来。

在这个连被解散之后，连长李秉荣调到团部当军械官，我当了军械上士，组织上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借这个地位专搞士兵工作。所以我的行动是很活跃的，经常到各连驻地去搞工作。

这年秋天，队伍由彬县开到凤翔，冬天又由凤翔开到凤县，过了春节，又开到陇南去和川军作战，到农历的二月间攻占了两当、徽县。我随团部就住在徽县。这个营分驻在凤县、两当及这两个县中间的各集镇，我就在这个区域内各地工作，和各负责人研究工作进行情况和士兵的思想倾向问题，决定对士兵的宣传教育方法。在工作有了相当成就以后，我们也掌握了士兵的思想动态、他们的要求和意见。在我认为士兵可以由我们掌握进行起义的工作条件似乎成熟了，就和李特生、习仲勋去研究，与他们掌握的情况综合起来再分析一下，都认为是条件成熟了，就在凤县西门外召开了一次大会，这是第一次决定行动的大会，前面我写的那些人，除了李秉荣在徽县未参加外都参加了，会议分析研究了各人所掌握的情况后，认为

起义是可能的，就派我去西安向省委汇报。我到西安先与省军委王钧治见面，后经省委研究，同意了我们起义的意见。就派老刘同志（刘林圃）作代表负责领导，和我一同回到凤县见了李、习 2 人的面，传达了省委意图，我们就极力准备，先把刘林圃安排到双石铺河心的一个孤山上，名为养病，实为指挥安排工作。适值队伍有集中两当往别处调动的机会，我们到两当后，就由刘林圃和习仲勋、李特生召开了一次行动会议，布置了行动任务，到半夜一起行动，打死了 3 个连长，1 个县长，1 个营部副官，砸了税务局。打营长去没有成功。队伍就集合向北出发去与刘志丹会合。在半路上又开会研究了一下与刘志丹会合的办法和行动路线，并叫我到西安再和省委研究与刘志丹会合的办法，到八渡过了渭河，队伍向北开，我向东北走，经县功镇、凤翔走大路去西安。到省委我又见了王钧治，他对我说：特生才回来，队伍到永寿县地方被土匪王结子的部队打散了，实在可惜得很。我问明特生住的地方，就去见特生问明了情况。

过了几天我在盐店街碰见了王德修营长，他叫我到他那里去住，在太阳庙 26 号。我说取行李去就来。我即速把这件事给特生说了。他说不敢去，我也几乎招了这祸。26 号是团长（曹润华）的公馆，到那里去是不会出来的。天洁、康若和我也碰见过营长，他两个到那里去已被扣起来了。以后我又见了赵敬忠，也说天洁、康若被押起来，要我和他去看。我说，你看是可以的，我不能去。并借给他两块钱让他买东西去看。

以后我向省委说明回家，我在家住了些日子，又到西安去，住在亲戚家。大约是 1932 年阴历的五月间一天，我到北关去走在老关庙街，正走着有人打我一捶，回头一看，人家把刘林圃揪出去枪毙，他不断地喊着口号。我打算跟上去看，好报告省委收拾他的尸体。忽然，我看见营长的两个护兵（一个娃叫雷轰，另 2 个大人姓张）紧跟着走来。我马上回身就走，到郭签士巷看见告示，说张庆云（山东沂水人），与高祥生等煽动两当兵变，执行枪决。我就和李艮见面说了这件事，叫去收拾尸体。李说省委已安排人去了，并说他女人还身怀有孕，准备给些生活费，打发人送她回耀县

去……

注：①应为饧珊.又名杨山、杨荫川。
②应是机枪连。王钧治，即汪锋。
③县长逃跑.未被击毙。

*本文系张克勤 1969 年 4 月 1 日所写历史证明材料。标题为本书编音所加。

# 我入党的经过及两当兵变的情况

左文辉

我原在冯玉祥的国民联军驻陕总部作录事工作。当时是十几岁的青年，受到了革命的影响。1927 年国共两党分裂，总部撤销。大革命失败后，三原的王德修在地方上搞起了群众武装，后来就编成一个营。1930 年春，我由三原到长武王德修营当兵。当时，王营属于苏雨生骑兵旅的编制。1931 年苏雨生叛离杨虎城后，王营就被编为陕西警三旅二团一营，王德修仍任营长。我到长武当兵是通过我和王德修的同乡（都是三原人）、同学关系。习仲勋、李秉荣、刘书林等都是通过这个关系进入该营的。我到后，王让我在三连当了二排排长。我到长武时，中共党员李秉荣、李特生、习仲勋已到那里。我还见到了党员刘书林，他在营部搞军需供给工作。经过党组织一段时间对我的教育考察之后，1930 年 9 月，在彬县驻防时由习仲勋、李特生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地下党组织很秘密，党员都是单线联系。我入党比其他同志晚，在三连成立党支部的情况我不清楚。在我们三连，只知许天洁（一排排长）和我是党员，但我和他也无党的关系。刘书林给我看过党内的小册子，但他也不说他是党员。在三连，我和许天洁通过拉私人关系，宣传革命道理，交了许多朋友，使他们成了党的同情者。所以在我们发动兵变时才能把全连拉出来。

后来，我们营由彬县开到凤翔进行整训。约 1931 年冬，我们部队又奉命开到南山凤县。在两当打走川军后，我们三连就住在两当，营部和一、二连、机枪连驻防凤县。机枪连是在凤县刚成立起来的，该连没有党的组织，所以兵变时没有拉出来。

1932 年初春，营党委派刘书林以买东西为名去西安向省委汇报请示兵变问题。随后省委派刘林圃同志前来领导，一到凤县就开会讨论兵变问题。

决定在一营调防徽县路经两当时实行兵变。那天，部队从凤县出发，晚上就到达两当。又急急忙忙召开会议具体讨论了兵变的部署和时间问题，决定于午夜 12 时行动。记得兵变时营党委书记是习仲勋同志。交给我们排的任务是把守两当西南城楼。没有同敌人发生战斗。许天洁带的一排打死了三连连长张遇时。后去解决营长王德修时王越墙逃跑了。一、二连的连长也被打死了。天还没有亮时，兵变的部队拉到城外集合，由刘林圃讲话后，宣布成立了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决定北上同刘志丹的第六支队会合。兵变出来的部队，仍按原来的编制编了 3 个连，吕剑人是一连连长，高祥生是二连连长，许天洁是三连连长，我是三连副连长。同时又补充了几个排长。我们几个同志记褥推选了两个军事指挥员，一个是许天洁，一个是吴进才，最后定的是许天洁。吴进才这个人以后再没听说过。

兵变之后，部队连续行军，不断遭到地方民团的袭击，部队又饿又累，生活非常艰苦。有的负伤了（没有牺牲的）也得不到医疗，有的掉队了。我们三连在中途还跑了一个班，班长是个大个子，名字忘记了。最后，我们被王结子的土匪部队突然袭击，把部队打垮了。

# 王德修营中共地下组织情况及两当兵变的经过

张子敬

1931 年 5 月，我从西安到长武县找到了王德修。那时，他是陕西警三旅二团一营营长，因为我们是同乡同学，他就让我到一连当了一排排长。我们一营中共地下党的力量比较大，工作很活跃。在一、二、三连都有一些共产党员，后来成立了党支部和营党委。可以说，这个部队基本上控制在我党手里。

一连的中共党员，有李特生（特务长）、吕剑人（二排排长，在彬县驻防时由孙蔚如的军官训练班调来的）。我是一排长，还有张茂修（副班长）。

二连的中共党员，有习仲勋（特务长）、高瑞岳（长安人，一排排长）、吴进才（二排排长）。

三连的中共党员，有许天洁（一排排长）、左文辉（二排排长）、李秉荣（原机枪连连长，后调到团部任军械官）。

营部的书记官孙一君，军需官刘书林也都是中共党员。在班长，士兵中还有一些党员（名字记不起来了）。

营党委成立的时间不清楚，我知道李秉荣、李特生、习仲勋先后都任过营党委书记。

两当兵变的时间大约是 1932 年 4 月。我记得刘林圃同志还穿着长袍短褂，戴着礼帽，说明天气还冷。兵变是中共陕西省委决定的，并派来刘林圃同志领导。我是在凤县双石铺听到兵变通知的。决定部队开到两当县晚上住宿时暴动。命令是这样下的，午夜 12 点后，枪响为号，统一行动，对连长以上军官全部枪杀（包括营长王德修在内）。打响后，一、二、三连

开始行动。吕剑人带一排人去收拾机枪连。我带一排人去解决县政府，因为人家也没有抵抗，我们也没有危害他们。韩生信（一连连长）是由我连一个班长打死的，当时吕剑人和我都在场。二连长唐福亭、三连长张遇时也被打死了。营长王德修带着老婆逃跑了，也就算了。在天亮前，一、二、三连的部队都拉到城外，由刘林圃讲了话，宣布了纪律，不准抢老百姓的东西，不准奸淫妇女，违者枪毙。起义部队的政委是习仲勋。总指挥，开始选的是吴进才，后因作战不力，又推选许天洁担任。因为许参加过渭华暴动，行伍出身，会打仗，声威大，又不乱来。后来，我们的部队叫王结子的土匪部队打垮了。兵变失败后，吕剑人、许天洁到西安找省委时被唐嗣桐逮捕，坐了很长时间监狱。刘林圃在西安街上行走时，被我们连一个反动的副班长马腾云抱住抓去，不久被敌人枪杀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马腾云被查出逮捕（是我去周至辨认出来的），判刑 15 年。习仲勋先回到三原武字区，后到了红二十六军。

警三旅一团有个连长叫张振河，是中共党员，三原县人，后来一直当农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已逝世了。

注：①应为十七师随营步兵训练班。

# 两当兵变及之后情况

吴彦俊

1931 年春，甄寿珊的部认被杨虎城收编，我就到了陕西警三旅二团一营一连当兵。旅长是唐嗣桐，团长是曹润华，营长是王德修（三原人），连长李秉荣（中共党员）。我们连的党员编了一个小组，组长是谁记不得了，没有成立党支部。党员有：连长李秉荣，排长吕剑人、张觉民（张子敬），班长刘振武、张克勤、张俊和我。我们部队先驻彬县，九一八事变后移防凤翔。当时党的活动，一是传阅过一些油印的党内文件，内容主要是关于反对立三“左”倾路线的；二是宣传抗日救亡，广交朋友，教唱爱国的歌曲，目的是团结更多的士兵到抗日的行列中来。在凤翔时，我和李特生介绍魏明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2 年春，我们部队开到甘肃两当县时发动了兵变。离开凤翔时，李特生同志就布置我买手电筒、电池。兵变时，我们连的反动连长叫我们打死了。交给我的任务是带领我的班去抓两当县县长。打响后，我们去包围了县政府，搜查了县长的家，一摸被子还是热的，发现县长已经跑掉了。我们营有 4 个连，一、二、三连拉出来了，机枪连没有拉出来，但也没有敢动。兵变后部队迅速拉到城外，省委派来领导兵变的刘林圃讲了兵变的意义和纪律。他说：我们发动兵变是要抗日救国的，是要干革命的，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当土匪，我们要执行革命的纪律，不能抢老百姓的东西，不能调戏妇女。这时，李特生叫我负责搞给养工作。

兵变后我们向北前进，目的是到陕北同刘志丹同志的部队汇合。在一个地方碰上了国民党的地方武装，部队有点慌张。刘林圃站出来，把棉袍子往起一挽，一手拿着礼帽，高喊：谁是“牛牛娃”，跟我来！在他的鼓动带领下，战士们跟他一起冲上去了，很快把敌人打垮了^一路上打了许多

仗，昼夜行军，又吃不好，使部队非常疲劳。最后到了麟游一带，叫乾县的大土匪头子王结子的部队打垮了。从兵变到失败共 16 天。兵变虽然失败了，但参加兵变的广大官兵，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不惧流血牺牲、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的。

1932 年春，两当兵变失败后，我跟李特生、魏明山同志回到了家乡扶风，是年春播时节我们去西安，同中共陕西省委接上了关系。省委把我和魏明山集训了几天后，就分配我俩到杨虎城的四十二师去搞兵运工作。是刘林圃同志同我们谈的工作。他说：你们去后要坚持下去，没有党的指示不能擅自离开，若组织上找不到你们，要由你们个人负责。你们两个，由吴彦俊负责。你们的任务是广交朋友，团结的人越多越好。先了解情况，联络感情，宣传抗日，宣传党的主张。一个士兵怕共产党，通过工作他不怕了，就可以交成朋友，就是一个成绩。还告诉我们写密信的方法，给他写信可寄到西安东关鸡市拐一个茶铺。还给我们发了路费。

在四十二师干部训练班有魏明山的一个亲戚，我们计划通过这个关系到千训班去。找到魏的亲戚一了解，干训班已停办了。我俩商量后，又通过魏的亲戚的同学朱守理的关系，我们到四十二师补充团当了兵。1934 年我当了司务长之后调到另一个连队，同魏明山分开了。

我们根据刘林圃的指示，做了许多宣传工作，交了 20 多位朋友，表现突出的有李玉兰、刘金山、李文轩、赵宏义、郭明昭、徐龙章、范希仲等人。

西安事变后，冯钦哉被蒋介石委为二十七路军总命令，把他的四十二师分编为四十二师和一六九师两个师，实力并没有增加，蒋介石只给了他一个名义。从此，魏明山仍在四十二师，我到了一六九师。七七事变后，部队开往抗日前线，我们随部队参加了华北抗日战争。

# 参 加 两 当 兵 变

张茂修

1931 年 5 月，我到彬县找到了王德修。那时，他是陕西警三旅二团一营营长。因我们是同乡，又是熟人，见我们来了很高兴。就让我到一连七班当了副班长。我们一连原来的连长叫张万兴，是三原陂西人，新连长韩生信是团长曹润华派来的。在兵变时，张子敬是一排排长，吕剑人是二排排长。

1931 年秋末或冬初，我们由彬县开到凤翔，住在城里一个仓库里。这时，我由吕剑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我们连的党员，还有张子敬、李特生（特务长）、刘世杰（班长）、吴彦俊（班长）、魏明山（班长）、张彦芳（副班长）、肖颂才（班长）等。那时，党员是单线联系，个别活动，不清楚我们连成立过党的支部没有。

在打走川军之后，我们一连住在两当，1932 年春节后，三连和我们换防，三连住到两当，我们一连回到凤县。1932 年春，团里命令我们一营和驻甘肃徽县的二营换防，地下党决定，在调防路经两当时发动兵变。凤县距两当 90 华里，我们一天就走到了。当天晚上，吕剑人通知我说：今天夜里要动，叫我把班长的枪收了，让战士睡觉不要脱衣服，不要关灯，随时准备行动。午夜打响后，按照计划分头行动。一连连长韩生信，是在吕剑人、张子敬排长的指挥下，由党员刘世杰击毙的。三连连长张遇时和营部的张性初副官是由共产党员许天洁打死的。由吕剑人带着我们排去解决机枪连。连长回家去了，当时在的官，一排长姓程，二排长姓张。我们赶到东门口时，程排长问我们：你们干什么去？吕剑人说：有土匪，我们要上东城！程说：东城不要你们管，有我们哩！吕说：你们过来一个人，我给你们讲。那个张排长就过来了，叫我们一个战士打了一枪，发现未死，又

打了一枪才打死了。机枪连未解决，我们就拉到城外集合去了。部队起义后，又打仗，又行军，非常艰苦。走了许多地方，也记不清了。最后被王结子的土匪包围了。

# 回 忆 靖 远 兵 运*

王儒林

30 年代初，在党的领导下，我曾亲身参加了靖远兵暴与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活动。这些活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被反动派镇压下去，最终失败了，但是每当我回忆起这段革命活动的情景时，当年参与斗争而英勇牺牲了的烈士们的音容笑貌和他们崇高的革命精神，总浮现在我眼前，给我以鼓舞、以力量。而其他幸存下来的同志，在以后的长期革命斗争中，都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有些同志直到今天，虽已双鬓飞雪，仍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继续为实现四化忘我地工作。我已 70 多岁了，我深感有责任将那段革命斗争的史实如实记下来，或许有些用处，也了却了我心中的一件往事。

## （一）建军前的准备活动

1931 年冬，陕军孙蔚如入甘，讨伐雷中田。王子元部被改编为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王子元为旅长，张东皎为副旅长，孙蔚如派姚绍芳为参谋长，孙作宾同志为参谋主任（孙作宾同志是孙蔚如部队内我地下党的军委书记，负责兵运活动），李罕言同志为副官主任，窦子章为军需主任，我兼军法主任。

这个旅人并不多，编制成旅的主要目的是向孙蔚如要些武器装备，扩充势力。但在该旅军官士兵中却有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旅下辖 3 个团。一个直属骑兵营，一个特务连，一团团长毛仁义，其下一营营长吕振华，二营营长沈毅民，三营缺；二团团长牛化东，其下一营营长王儒林，二营营长王治邦；三团团长杨梓材，其下一营营长周维邦，二营长万继承，三营长王海珊，王本人未到职，只派一连人归万继承营，骑兵营长汪新民，

特务连长杜鸿范，同时还成立了教导队，队长是苏醒民，教导队也住在城隍庙内。在这个旅里有 3 个支部，一个是校官以上的军官支部，李罕言任支部书记；孙作宾为支部领导成员。另一个是士兵支部，石子健任支部书记。再一个是特别支部，张东皎任书记，苏醒民任副书记。3 个支部受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当时除沈毅民营、万继承营驻海源县外，其余部队驻靖远。

1932 年春节前后，谢子长到了靖远，同来的还有焦唯炽同志，张东皎同志找我，要我负责安排他们的食宿，并嘱咐；“要僻静”。我便将他们安排在李发荣家。随即由张东皎领我见了钳于长，张向我介绍时，说谢子长是张同志，焦唯炽是董同志。晚上他们开了会。参加会议的有张东皎、谢子长、焦唯炽、吕振华、苏醒民、张秀山、石子健等。会上子长同志传达了党让发动兵变的指示，会议决定在靖远发动兵变，除第三团因是地方民团组成，不拉去外，其余部队全部去陕北，以壮大陕北革命力量。会议还决定，我和张国威 2 人，虽是靖远本地人，但因都是党员，也同部队一起去陕北。

谢子长同志到靖远后，因没有去见王子元，事后引起王子元见疑，认为既然是老朋友原先又有言在先，为什么到靖远来只见东皎而不见他，反而背着他搞一些活动，因此大为恼火。王子元的原参谋长杜香亭给王说：“子长这次到靖远，见东皎不见你，你要小心，防止被张东皎把你吃掉”。经杜一挑，王子元更加恼火，一怒之下，立即翻了脸，随之扣押了张东皎，紧接着又扣押了我，并缴了我全营的枪、马和军法处执法队的枪支。事件发生后，我党在这个部队中的其他同志利用各种关系，发动各方面人员给王子元说情、疏通、营救，几经曲折，王答应以张东皎离开靖远为条件，将东皎同志实际驱逐出靖远。东皎离靖远后便上了兰州。但我仍被押在杨梓材团部，以后又软禁在杨梓材的商号里。孙作宾同志去商店找我。见面后，我们商量了我出走的办法，即由我送作宾同志出商号，到了商号大门，我趁机对店员说：“孙参谋主任叫我到旅部去。”未遭阻挡，我便离开了软禁处所，孙作宾同志护送我出了城。

当我和张东皎同志被扣押的第二天，因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吕振华同志感到形势紧急，仓促率全营提前起事出走。王子元随即派第三团周维邦营追到打拉池附近的郎山台子，将吕振华营击散。在吕之后，张秀山也带一连人起事出走。王子元派其侄儿王治邦（营长）追至崛蜈山打散，并将张秀山浮回。王子元未加害张秀山，主要是孙作宾同志利用张秀山同志曾救过王子元命的关系，对王子元苦苦相劝，晓以“义气”，最后让张秀山同志离开靖远了事。

这次吕、张 2 人率部出走，被王击散，打乱了原定的兵变计划，于是决定重新组建工农武装，脱离王子元的控制，独立自主单独干。

注：①孙作宾回忆为教导队特别支部。

②据张秀山回忆，谢于长、焦唯炽 4 月 28 日到的靖远。

*本文节录自《甘肃党史资料》第 3 辑所载王谞林《回忆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和西北抗日义勇军》一文。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王泰吉骑兵团的起义

赵伯平

1933 年春初，王泰吉奉命离开西安，开到三原。王部共有 4 个大连，团内也有党员，一个是王泰吉的侄子王振民（王英）；一个是王部卫生员秦仲民（河南人），我和他们也联系过，并指导过他们工作。除此还有一些受我党影响的人士。2 月初该骑兵团团部驻在三原，中心县委通过王振民了解王泰吉的动态并做他的工作。同年五月间，王部奉命调往耀县，进攻我照金根据地。王泰吉不愿执行这一命令，找到三原中心县委的常委周芝轩，向周说，他决心起义当红军。并说他在西安时曾请何寓础找过陕西省委。找中心县委的目的是：1、汇报起义计划，争取党的领导；2、请中心县委通知渭北游击队，不要进攻他的部队。我当时问周芝轩：“王的态度怎样？决心如何？”周说：“王泰吉的态度诚恳，为表示他的决心，还送给我一支驳壳枪。”我与之商定第二天清晨约见王泰吉。但不巧，第二天拂晓，王已动身到耀县去了，他的起义计划要周向我汇报。不几天，省委派杜衡、何寓础来三原，中心县委也派周芝轩、孙烈和他们一起去耀县，在政治上、军事上帮助王泰吉起义。不久，王泰吉部在耀西举行了起义，成立了西北抗日义勇军。

王泰吉起义后，派人和中心县委联系，要来三原武字区，说他们在三原驻防时，杨竹荪的一个营曾和他们约好一齐起义，因此要到三原来接应这一营部队，但是起义部队来三原的人员不多，杨部的这一个营也未能出城跟随起义。

起义部队在耀县小丘镇曾召开过一次军民联欢大会，起义部队党代表杨声在大会上讲话，我以武字区群众代表身份参加了这一大会。大会气氛

热烈，人心振奋。会后，我向杨声要求，给三原武字区、辛字区一些枪支弹药，杨和王均表同意，立即给了 10 支单串枪，还给了省委一些财物做活动经费，杜衡当时给了三原中心县委一些，其余委托红四团负责卖掉，将钱带回西安。

王部的起义，使杨虎城感到震动。他任命刘文伯为渭北“剿匪”总司令，司令部设在三原县城的第三中学，并派其嫡系赵玉亭[③]、孙友仁向王泰吉进攻。起义部队与进攻敌军在耀县辘轳把[④]与孙友仁部打了一个遭遇战，红四团积极配合战斗，在孙友仁部的东侧，牵制孙部使其不能倾全力向起义部队进攻。这一仗王部虽有损伤，但基本力量保持下来，可是当起义部队返回耀县时，原来随同起义的民团团总雷天一突然变卦，将耀县城门统统关闭，起义部队无奈，绕道城西，反复转战，进入照金根据地。后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三团，保存了一部分革命力量。

注：①三原武字区陵前镇。
②杨声，即刘映胜。
③赵玉亭应为赵雨晴，时任独立第一旅第一团团长。
④撵轳把属三原县箍。

# 关于王泰吉骑兵团起义*

何寓础

1933 年春，我在三原三中当教务主任，王泰吉带领骑兵团也驻在三原。我和王是中学时同班同学，这时都不是共产党员了，都感到苦闷。因此王常来我这里谈心，说他不愿打三原武字区；有次又说，他们捉住了我们的一个交通员，他未让送给政法人员，而由他审问，他放了。我说你这样做得对，我支持，以后就这样。恰巧，在 3 月 12 日，孙中山逝世纪念，学生集合打了国民党县党部。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认为我是鼓动学生的教员之一，还在我的家里进行搜查，我在三中待不住了，遂回家。王泰吉骑兵团这时也接令开驻耀县。

以后王回西安常来我家。王打算起义，指定我和省委接头。王还要送钱给我，我叫作为起义费用，未接，王用此钱给士兵买了油布伞。

因为在 1928 年我被党开除时，向党表示，离开党，也保守党的秘密，党有任务给我还去做。因此党还指定一个党员经常和我联系。王泰吉指定我和省委接头商讨起义的事之后，即找李树言（学生中党员）去省委叫派人来我家。余海丰来了（余当时任省委宣传部长），当时告知上述情况后，余很惊异，认为这样能壮大我们的武装力量。余代表省委，我代表王泰吉，同去耀县。由西安赴耀县途中，第一天休息在三原周芝轩家（周胡子），第二天到耀县。余王和我 3 个人正式在耀县北门外一个菜园里的水井旁，王打发开卫兵，开了一次会议。随后还开了两三次会，还订出了一个短短的起义计划，王泰吉把这个计划全写在他的本子上。计划中提出：起义后名称为“西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王是司令；计划在耀县行动 3 天，要切断电话，释放政治犯；召开群众大会，发通电和杀豪绅地主等；然后就向澄县、白水方向撤退；退时，对军官哪个愿来就跟着走，哪个不愿来发

给其路费让回去，重新在士兵中提拔新的军官；最后由澄县、白水向北与红军接近。同时王泰吉还叫我和余海丰参加了他们的军事会议，讲了时局形势。王还叫我做政治部主任，我提出这要省委另派。会后我回西安，省委派杨声去当政治部主任②。

**注：**①余海丰时在中共陕西省委发行部工作。
②据杨声（刘映胜）回忆，为政治处处长。

# 耀 县 起 义 回 忆*

刘映胜

1933 年 7 月中旬，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还在秦岭山区进行战斗，渭北游击队正在三原武字区一带活动的时候，一天，杜衡由西安来到武字区，对我说：杨虎城的骑兵团长王泰吉，通过三原教育局长周芝轩的关系找省委，要起义抗日，要求派人指导。省委前几天已派余海丰、何寓础（这时没有党组织关系）亲自去和王泰吉联系，大体商谈好起义计划。现在要派负责干部去，省委还决定把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又说：省委决定叫你去耀县见王泰吉，发动起义。他在武宇区改编渭北游击队，成立第四团，等骑兵团起义发动后，他去负责，换我回来仍在红四团当政委。

第二天，我带了省委介绍信，由武字区一个农民党员作交通，把我送到耀县。我先找到骑兵团里的党员王英（王泰吉的侄子，这时当班长），他领我去见王泰吉，就住在茎泰吉的团部里。王泰吉对我说了他起义的全部计划。我就和王泰吉进行准备工作。

1933 年 7 月 21 日清晨，骑兵团王泰吉宣布起义，树起“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旗帜，张贴布告，发通电，集合全团官兵讲抗日形势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任务。王泰吉自任总司令；下设 3 处，我当政治处长，三原县委遂即派来团员赵宝珊和欧天东（小罗）2 人，帮我在政治处工作。总司令部下辖支队，把原来的连、排、班编为支队、分队、小队，王英升为分队长。支队长都是原来的连长，第一支队长郑子明，还有一个张龙韬是支队长；其他的支队长、分队长，名字已回忆不起。王泰吉部原名骑兵团，但只有原来的通讯排有三四十匹马，起义后编为特务队，由谈国帆当队长。起义时，收缴了驻耀县城内的三原民团总指挥胡景铨的全部枪支，还有两门迫击炮，又收缴了耀县民团雷天一的枪支。由于雷天一的花言巧语，说

得王泰吉把枪支发还，把雷天一的民团收编为义勇军一个支队，由雷天一当队长。雷以到城外防守为名，开离耀县城；到义勇军从耀县离开时，雷夫一就没有跟随；后来仍在耀县当伪民团团长。

我到耀县和王泰吉准备起义期间，就和耀县党特支负责人张仲良联系上。耀县党员这时除张仲良外，有张邦英、陈学鼎、陈国栋等。我叫耀县党特支调查开出耀县城里的大豪绅地主名单，准备起义时由义勇军逮捕；并准备借抗日的机会，在乡村发动群众斗争。起义当天，义勇军就根据耀县党特支开的名单，逮捕了耀县城里的一些大豪绅地主，强迫拿出现款，供义勇军军费；并没收豪绅地主的粮食、衣物，散发给城市贫民。起义时，把新任耀县县长沈某扣押；因王泰吉的关系，把卸任的伪县长牛某，安置在政治处叫向商民作宣传，动员商人照常营业，安定市面：党式坳，斋#李进肩击雒式氙军六十耀县党特支在王泰吉起义后，工作重点放在了农村，发动农民群众向豪绅地主作斗争；又动员一批群众到县城慰问抗日义勇军。耀县党特支要组织游击队，通过我向王泰吉要枪支，王泰吉给了少量步枪。耀县党特支就组织起一支游击队，在农村发动群众，进行捕捉土豪的斗争。

王泰吉起义后，在耀县城里住了好几天，以后决定撤离耀县城，开到三原武字区，一则大张声势，争取别的部队响应；再则和红二十六军第四团联欢，以影响义勇军的官兵；然后再去攻打淳化，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开展活动。义勇军在县城住了 7 天，即全部开到三原武字区。晚上和红四团及当地群众举行联欢，官兵谈话，群众送来大量甜瓜慰问。第二天一早，即往淳化方向开动，走到三原辛字区辘轳把，正吃午饭，当地群众来报告，有大批白军从三原方向开来，正向耀县方向前进。王泰吉亲自部署指挥，战斗激烈，坚持了许久，左右两翼都抵制不住，且战且退，大部义勇军被冲散，敌军还是用机关枪扫射。王泰吉带少数人马向小丘撤退，黄昏到了小丘，留约一个支队的兵力阻击，我和王泰吉由当地群众领路，连夜晚往红二十六军后方游击队驻地——薛家寨退却。天明到薛家寨山下，收点余部，仅百多个人，只有特务长谈国帆、分队长王英等跟来，其他的支队长、

分队长都不见了。我和王泰吉一同上到寨子上，见到红二十六军后方游击队长李妙斋、地方党的负责人习仲勋。义勇军余部住在寨子下边山后居民家里，由谈国帆、王英负责整顿，并收留义勇军失败随后找来的零散人员。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退到薛家寨的第三四天，省委巡视员高岗突然由西安跑来，告诉我，他们几个人在饭馆开省委会，讨论义勇军问题，被敌特发现，袁岳栋（笑章）、杜衡被捕，他和贾拓夫跑脱，贾拓夫不知去向，他一人跑来找我和义勇军。我和李妙斋、习仲勋、高岗几个负责人商议，决定我回西安，高岗留薛家寨负责整顿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余部。我到三原武字区红四团驻地，见到黄子祥等。得知红四团配合义勇军在打孙辅臣特务团的战斗中.没有损失，还收留了好几名失散后带枪来归的义勇军士兵。次日到三原，见赵伯平，告诉我回西安的原因。因当时天下雨，渭河涨水，不能渡河，等了好几天，后经咸阳回到西安。

注：①据王英、张邦英回忆，起义时间是中午 12 时。
②小罗，即黄罗斌。
③当时编为大队、区队和小队。王英升为区队长。
④据史料记载，当时已建立中共耀县县委。
⑤沈某，指沈育成。
⑥起义后，把连改为大队，并未用支队名称。当时是留第一大队阻击敌人。

# 耀 县 起 义 经 过

谈 国 帆

我是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杨虎城进关第二年我在杨的骑兵团任二连连长，团长是王泰吉。就我了解，王泰吉在麟游就搞过兵变，还参加过渭华暴动，在渭华暴动时他是党员，以后失掉了关系，耀县起义时不是党员。现在能记得起的有刘清和、赵启明[民]、魏志坚、袁宏化、陈守印、王英。起义时王英还在骑兵团，其他党员有的牺牲了，有的已先后离开了部队。

骑兵团1931、1932年驻防西安，王泰吉任城防司令，二连守西门。当时刘志丹同志在陕北等地领导开展游击战，但装备非常困难。党给我们任务；一个是武装护送弹药和其它军用品（这些物质一部分是由骑兵团送给的，一部分是地下组织购买的），一个是接送党内来往行人。约在1932年后季，部队由三原开往耀县，这时王泰吉任渭北“剿匪”总司令。主要是针对我辛、武区，但在这方面王不积极，而且继续给我们很大帮助。1933年五六月王泰吉就准备起义。王和省委有联系，也得到了三原县委的支持，党领导了这次兵暴。

记得起义先一天晚，王泰吉召集连以上干部和积极分子在耀县教育局开会，杜衡代表省委在会上讲了话，对起义作了详细计划。第二天用电台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起义，收编了雷天一地方民团，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总指挥兼第三路指挥，政治部主任是杨声，骑兵团和民团共一千几百人。编了5个大队，第一大队郑子明任队长，第二大队任建民任队长，第三大队张龙韬（山西人，王泰吉的学生）任队长，第四大队周德民任队长[①]，特务大队由我担任队长，每个大队都有民团的一个中队，起义后在耀县停了7天，曾发动群众打豪绅，搜捕豪绅，分粮给贫苦市民，

搞了 100 多驮子物资。起义后还搞了很多枪和药品，很大一部分供给了耀县地下党张仲良、陈国栋等领导的游击队。

起义后原计划到三原搞掉杨竹荪团，因事前曾和该团武营长有联系，准备里应外合，然后到武字区和渭北游击队会合。但因天雨，起义部队没有到三原，由耀县开到陵前侯家堡②，召开了群众大会，准备过倬玉河到辛宇区。部队到鲁挢发现有敌人，又开到辘轳把和孙沧浪③部队遭遇，后部队分散，计划在小丘会合。我所带的特务大队被敌包围在西社④，没有赶上集中。据说他们在小丘集中后又决定分散活动。但分散开来以后再没集中起来，王泰吉只带了几个人到照金。我在王到照金的第二天带了 90 多人赶到照金。到照金的人留下不多，总共有 100 多人。政治部主任由高岗担任。

注：①第四大队先由董崇道任队长，后由周德民任队长。
②应为陵前镇。
③孙辅丞，即孙友仁。
④应为“阿姑社”。

# 耀 县 起 义
##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建立经过

王　英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南侵，敌焰方张，山河日蹙。全国各族人民对蒋介石集团投降卖国罪行，无不义愤填膺，各界进步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和领导下，掀起了持续的抗日救亡风暴。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前途，已面临最后关头，如何对待这个问题，成为每个政治集团和每个武装力量必须考虑的现实课题。

驻守在陕西耀县的西安绥靖公署所属的骑兵团，同样面临这个抉择：起义抗日，还是作人鹰犬继续与红军为敌。

骑兵团的团长是王泰吉。这个团成立于 1931 年，开始时叫“新兵训练处”，先驻在西安西关大操场，后来移到城内东北角，开始修建兵营、马厩。西安绥靖公署把甘军苏雨生骑兵团的几百匹马拨来以后，才改名为骑兵团。1932 年春，杨虎城派宪兵给南京伪中央政府送去了大部分马匹，留给骑兵团的不过百余匹。骑兵团除设军需、军医、副官、书记 4 处外，下辖 1 大连和 1 个直属通讯排，共约千余人。这支部队成分复杂，地域观念浓厚，进步与落后的矛盾相当突出。

骑兵团中相当一部分革命力量，深感民族危难，力图摆脱现状，为抗日救亡作出贡献。他们曾先后发动过两次起义。第一次是在 1932 年冬季，第一连连长魏志坚（中共党员）在商南领导全连起义，准备和红四方面军汇合。由于警惕性不高，部署不周和地形不熟，在起义后被本连反动班长蒲章成乘魏不备时枪杀，部队随之瓦解，仅有少部士兵被蒲带回骑兵团（蒲在解放后被我人民政府逮捕判刑），第二次是第二连连长刘清和准备起义，想把全连带往嵯峨山和红军游击队苗家祥会合，不幸事泄，刘只身逃往游

击队，任政治委员，后被叛徒出卖牺牲。

当时中共党员在骑兵团进行地下工作的团部副官袁宏化，排长赵启民，均因国民党发觉离开部队，仅有护士聂〇〇、秦重民、陈守印，以及一连四排班长王振民（即王英）留在部队秘密进行军运工作。聂、陈、秦 3 人在起义前亦先后离队。

当骑兵团移防三原后.我接受赵伯平（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习仲勋（中共三原中心县团委书记）等同志的指示，积极组织第四排起义。在准备工作上，采取了 4 项措施：（1）在政治上，对四排全体士兵晓以抗日大义，启发其阶级觉悟；在军事上，加紧练兵活动，谎报军情、多报消耗、多领子弹，以备起义；（2）成立“红军之友社”，秘密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和对俘虏的政策等；（3）调查部队装备、军官的思想情况和军情，随时向党派来的接头人报告；（4）把节余的子弹送给渭北游击队黄子祥部，由秦重民等人在城外接收，同时掩护地下党员携带文件出入三原县城。

当上述工作已取得一定效果，习仲勋同志已经把起义路线图交给我，骑兵团四排起义即将爆发的时候，中共三原县中心县委，鉴于甘肃“两当起义”一个营全部失败的教训，认为组织一个排的起义作用不大。习仲勋同志当即告诉我，教我继续潜伏该团工作，积储力量，以待时机。这为后来王泰吉起义及时取得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3 年 1 月 17 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这时日寇已陷热河，长城各口相继告警。同年 5 月，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成了“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日的军事形势为之一振。

骑兵团这时已移驻耀县。王泰吉得悉以上情况并听说同他熟识的杨晓初、张性初、师守命（以上均是共产党员）、杨可均（拥护我党抗日主张者）等都去张家口时，不禁热血沸腾，急于有所举动。他向他的老同学何寓础说：“人家都动起来了，我们还能坐着不动！”

王泰吉于1924年由中国共产党选送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并于同年入党。1927年任陕军第三师学兵营长。1928年率全营在陕西省麟游起义，成立红军游击队。同年5月16日参加渭华起义，成立西北工农红军革命军，王泰吉任参谋长，渭华起义失败，王泰吉失掉了党的关系，后被国民党建捕管押南京。敌人对他威胁利诱，毫不屈服。他在监狱留下豪言诗句：“南京被押己巳年，蚤虱围攻何足怜，翻身消灭尔丑类，革命精神炼愈坚”。后被杨虎城保释出狱。杨以泰吉骁勇善战，博学有才，任泰吉为十七师补充二旅副旅长。1930年调任新兵训练处处长，后改为骑兵团，泰吉任团长。

王泰吉毕竟受过党的教育，参加过多次革命斗争，他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可以救中国。他决心主动争取党的领导，依靠进步力量，举行全团起义.在西北开展新的抗日局面。呼应东北义勇军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为了取得党的领导，王泰吉找他的老同学何寓础（三原省立中学校教务主任），请他作为代表去找中共陕西省委。何找到了中共党员李树言，请他把情况转告省委。省委当时就派余海丰同何寓础接触，余听了何的汇报后，说：“这太好了。最近红军在秦岭失利，要是王泰吉的骑兵团真能起义，在政治上、军事上对革命都有利。我去报告省委，研究后就来告诉你。”过了几天，余来对何说：“省委欢迎泰吉起义，而且决定领导这一起义，但事先须和泰吉本人接头，具体研究，作好准备。你既然代表泰吉，那咱们俩就一块到耀县去一趟。”何余两人于6月中旬赴耀县，第一天到三原，夜宿周芝轩（中共党员）家，谈了些有关骑兵团内部的情况，第二天到了耀县，就住在团部（伪县府内），王泰吉同余海丰见了面，接上了关系。

一天下午王泰吉邀何、余两人去城外郊游，走到菜地的一个水井旁，3人在一个葡萄架底下坐了下来。王泰吉把骑兵团内部和耀县的军政情况作了介绍和说明，再度表达了他的起义决心。余海丰代表省委表示欢迎泰吉起义。并就全国和陕西的当前形势作了分析。经过3个人的讨论研究，作

出了起义的几项具体决定。

回到团部，王泰吉邀请何寓础、余海丰参加了一次骑兵团的军官会议，并都在会上讲了话，会后，何余两人返回西安。

骑兵团的起义确定之后，王泰吉就秘密召集比较进步的青年三四个人，和他们谈论抗日救国的道理，并征求他们的意见。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感到诧异，便着相好的进步青年试探底细。王泰吉和这些青年作过几次谈话后，要他们联络更多的青年，我便两次去见王泰吉，谈了一些东北抗日义勇军作战如何英勇，关内应该如何支援，以及本团青年都愿抗日救国等……我还借故闯进密室，看到了订制的义勇军红旗等，才相信王泰吉确在准备起义。于是第三次去见王泰吉，见面后便开门见山地说自己就是中共党员。王泰吉听了以后，非常高兴，笑着说：“我真没想到你会是共产党员！你隐蔽得真好，我都没有看出来。咱家又有人干革命了（泰吉和我系叔侄关系）！既然你是共产党员，我就先把计划给你简单地说一下。”随后他又说：“我不问你咱团有多少党员，只要他们愿意抗日，不也老少都行；青年人当然要更多联络些，抗日就是要靠这些青年人嘛！”于是我就广泛联系进步青年，继续在部队中宣传抗日救国道理，还了解、监视反动军官动态。王泰吉命令加紧在密室制作起义用的旗帜和印信、宣传品等。并派出侦察人员分两路去蒲城、白水、韩城、宜君、洛川等县侦察地形、敌情，又派人在耀县附近调查土豪劣绅的住址和恶迹。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进行中，不料发生了一起不愉快的事：6 月下旬，王泰吉亲自到西安见杨虎城，领到了一笔军饷和新的驳壳枪，并买回大量雨具（以备起义后用）。在他返回耀县途中，误被我“渭北游击队”在石桥伏击，损失战马两匹，手提机关枪两支。王泰吉幸以身免，石桥战斗发生后，中共陕西省委以为这一事件，王泰吉定会不满，于是犹豫不决，迟迟不派代表来骑兵团接洽。

王泰吉起义心切，知石桥事件确系误会，并不介意。他焦急地找我，商议如何尽快地取得党的领导和如何请红军配合的问题。我因为和他接头

的秦重民好久未来。骑兵团起义准备情况和要求也无法报告省委，便建议：“我知道三原县新武区有渭北游击队，我去联系一下，看是否接上关系。”王泰吉表示同意。我换上便服就前赴三原。到了陵前，碰到伪装割草的农民游击队员卞德荣（1936 年阵亡于富县道德塬）等 2 人，我对他们说，游击队里有我的亲戚，想去那里探望一下，卞德荣怀疑我是骑兵团的侦探，就假说他知道个大概的地方。我早看出他是游击队的便衣，于是便随他同行，我夹在他们 2 人中间，走到乾涝池村西头下了沟，经崎岖的羊肠小路，进到沟底一个被水冲刷出的黑洞中，在洞里，我看见有杜衡（后叛党）、杨声（刘映胜，渭北游击队政委）、黄子祥（渭北游击队队长）、杨玉亭（支队部经济员）、屈继君（少先队员）、李志伯（分队长）等。杜衡根据卞德荣等的报告，也怀疑我是密探，对我反复盘诘，并用枪威胁，令拉出几次，声言要枪毙。我不为所动。杨玉亭伪装从中劝阻，经过李志伯证明后，他们才消除了怀疑。当晚，杜衡派游击队员送我和省委代表杨声到了耀县，杨声会见了王泰吉，确定了起义的一切事宜。

王泰吉召开了连排长和有进步青年参加的两次机密会议，布置了收缴胡景铨民团等敌武装的问题，并划分了地区。规定起义时间为中午 12 时，只等吃饭号一吹，便统一行动。

1933 年 7 月 21 日，这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中午 12 时，骑兵团驻地号声嘹亮，红旗翻滚，王泰吉率领全团官兵在药王山下、石川河滨的古城耀县宣告起义了。

起义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收缴了全城所有的反动武装（胡景铨民团、雷天一保安团和公安局、县政府的枪支），并收编了他们的部队。骑兵团正式改称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并将起义情况通电全国，争取各地响应。改编后的义勇军分为 3 路，每路分 5 个大队（内有一个特务大队），每一大队下设 4 个中队，中队下设 4 个区队。王泰吉自任总司令兼第三路总指挥，委雷天一为第一路总指挥。第二路未编起来（原准备把特务大队扩大为第二路）。

起义以后我第二次去渭北苏区见了杜衡，并同他和取枪的赤卫队一起到了耀县。杜衡在耀县曹某家中，参加了由中共耀县县委书记张邦英主持的县委会议，讨论如何配合起义和建立耀县游击队等问题。以后杜衡会见了王泰吉。

义勇军司令部下令各级报告收缴武器数字，给耀县游击队补充长枪 19 支，给渭北苏区赤卫军补充长枪 21 支。动员所部招募士兵，扩大队伍。王泰吉召集全体官兵讲话，教育他们要忠实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并揭露蒋介石集团投降卖国的罪恶勾当。

义勇军成立了政治部（委任耀县卸任县长为政治部主任），省委派赵宝珊及龚逢春、欧天东、黄罗斌、秦重民同志去作政治工作，还吸收了几个文化界人士。杨声派我组成宣传队，把县政府的千余担粮食、财物分给了食苦人民；同时义勇军司令部召开了群众大会，镇压了几名罪大恶极的土劣；释放了监狱的全部犯人。

7 天以后，王泰吉率义勇军从耀县向三原进发，这时部队已达 2000 多人，骡马数百匹，电台 1 部，迫击炮两门。途经坡子堡时，王茂臣团匪曾在城上向义勇军射击，我军阵亡战士 1 名。王泰吉令第一大队包围该堡，大队继续前进。下午适值暴雨，部队行军困难，当晚便驻在三原武字苏区陵前一带，受到了苏区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第二天在陵前镇召开了军民联欢会，到会群众约 2000 多人，赵伯平书记、辛子区委书记韩学礼同志参加会议，他们给部队送来鸡蛋、瓜果等慰劳品。会上，王泰吉、杨声和群众代表都讲了话，大大鼓舞了抗日部队的革命士气。

第三天，晨起吹号集合。王泰吉怕“兵富不能作战”乃下令将官兵所带财物，统交司令部收集保管，官兵多发怨言。泰吉虽知，但不改变决定，仍命部队向三原城进发，约在上午 11 时，军行三原县桥头镇辘轳把村，突与杨虎城所辖之孙友仁特务团发生激战。当时王泰吉和杨声正在桥头镇东北里寨村小憩，被敌军两个连从右翼包围，幸得谈国帆所率之特务大队奋勇阻击，指挥机关及大行李才得突围而出。由于指挥失当，遂致溃败。王

泰吉下令部队向耀县小丘镇背进，第一大队作后卫掩护全军。当时士兵疲劳，情绪不高，且战且走，或逃或降（县长偷逃，第三大队队长张龙領率部投降胡景铨民团）。

骑兵团百余人行至淳化西塬，被杨部赵玉亭一个团击溃损失大部，第四大队长周德民率部和敌军作战中全叭大部覆没，周被俘经友人营救逃脱。黄昏时到达小丘镇。半小时后，敌又追至，第一大队四区队阻击片刻，力不能敌，部队遂向照金方向转移，去和习仲勋、李妙斋领导的游击队汇合，这支起义部队先后到达照金者约 300 人，当义勇军围攻张阁老崖寨子时，又遭孙友仁袭击，受到相当损失。

不久因三原、耀县一带敌情严重，黄子祥所率的红四团和张邦英、陈学鼎所率的耀县游击队，均先后到达照金一带和义勇军配合行动，中共陕甘边特委决定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陕甘边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指挥，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下设参谋处、政治部。王柏栋负责参谋处，政治部高岗兼主任，组织宣传两科由我和龚逢春分任科长。下属红四团、耀县游击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

注：①应为 7 月上旬。
②应为政治处，处长杨声。
③应为赵雨晴，时任十七路军独立第一团团长。

# 耀县起义和耀县游击队*

张邦英

1933 年 6 月间，耀县起义前 20 多天，杜衡来到耀县，参加了中共耀县县委在北街曹雯家里召开的秘密会议。我当时任县委书记，我主持的会议。会上，杜衡讲了王泰吉骑兵团要举行起义，要我们耀县县委准备配合，并提出要搞游击队。

起义一开始，杜衡又来到耀县与杨声（即刘映胜，代表省委做起义的具体工作）一同参加了第二次在曹雯家里召开的县委会议。这时，张仲良同志从西安回来了，我们在一起开了会。参加会议的有我、张仲良、曹雯、宋子歧、杜衡、杨声。会上对起义中要做的具体工作做了研究部署，并决定迅速搞好耀县游击队。

1933 年 7 月 21 日，王泰吉率领骑兵团以“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称号在耀县举行了起义。发了通电，张贴了布告、标语，收了胡景铨保安团和雷无一民团的枪支（收雷天一的枪支后，在雷的假抗日欺骗下，将全部枪支发还，他说去打王茂臣反动民团，一开出城，就不听调遣，同他上边的人勾结起来），释放了伪政府关押的犯人。

县委组织了事先已准备好的一部分市民代表成立了耀县临时革命委员会，协同部队人员逮捕了一部分豪绅地主和反革命，接着又发动农民和市民群众在西大操场召开群众大会，枪毙了杀害革命群众的南区反动区长张恒义没收分配了城内最大的雷、段两家地主的财产和官商堆积的粮食，群众非常高兴。

起义的当天，我和张仲良、陈学鼎、曹雯等同志，一面发动阿姑社村为主的党员群众成立耀县游击队，另一方面利用同北区民团团长赵连璧的同学等关系，和他商量（他当时在城里养病），让他写了一个条子，将他

的 40 几个人的民团委托给我党的陈学鼎来指挥。为了把这部分民团真正掌握在我党手里，在 2 天的傍晚，我们把游击队和民团集合在方巷口，这时我去以训话为名把大家集合起来，民团站在前排。我们一声号令，游击队员们有的抱人，有的夺枪，就把前排民团的枪夺过来了。我在那里还讲了话，随后打死了民团副团长朱瑞轩，把民团中比较好的吸收为游击队员。

游击队一成立，首先捉拿和处死了阿姑社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左善楚兄弟 3 人。把左家的粮食、财产分给了群众，在五六百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当场烧毁了左家的土地和债务契约好几匣子。接着由孙家原支部书记

蔡风凯引路，游击队在孙家原捕捉了作恶多端、企图破坏我地下支部的兵痞、流氓张廉明，为群众又除了一害。

耀县起义的第 7 天，王泰吉率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向三原进发。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我们耀县游击队，于 28 日转移到白家庄集合，一方面发动群众分了周家地主的粮，一方面对部队进行了整编，陈学鼎任队长，张ˆ良任副队长，我任党代表（政治指导员）。第二天，问西北方向前进，经过墓坳、高山槐附近，进入照金根据地，和当地的革命武装会合了。一两天以后，王泰吉的义勇军在鲁桥辘轳把失败退到了照金。不多天，由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四团也从三原辛、武地区来到照金根据地。这几支部队都会合在一起。

在陕甘边特委的领导下，成立了陕甘边红军临时户指挥部，总指挥王泰吉，政委高岗。耀县游击队被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耀县游击队第三支队”。耀县游击队同其他部队一起打了高山槐、让牛村、庙湾、柳林的雷 T 一、夏老幺等民团，转战陕甘边、陕北许多地区，打了许多仗，消灭了很多敌人，很快地壮大起来，成为恢复、发展红二十六军的一支重要力量。当耀县三支队、义勇军和一部分少先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三团（团长王世泰）时，耀县的指战员占了半数以上，有耀半团之称。这支武装在发展陕甘边革命武装，建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起了重要作用。

王泰吉耀县起义，正值红二团南下失败，对当时陕甘边的革命形势是

个很大的推动，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个重大打击，对抗日作了宣传，对恢复和发展红二十六军，对扩大苏区都起了很大作用。

**注：**①张恒义时为南三保保长。

# 骑兵团一连支部及终南山起义

赵启民

蒋、冯徐州会议后，冯玉祥在西北军中清党，我离开中山军事学校。1928 年到渭北雨金屯甄寿山教导营。王泰吉先在这里当学兵队队长，后来当了教导营营长。以后教导营改教导团，到了麟游，王泰吉领导了麟游起义。被打散后，我和王泰吉、刘清和，还有个姓高的党员（洋县人），脱离了部队。

我到西安找到党的关系，进了冯玉祥的自卫团学校，边学习边做工作。1929 年底至 1930 年离开冯部，回到家乡蓝田，和汪锋、杨珊一起搞群众工作，准备搞武装。

杨虎城到西安后，我被派往十七路军骑兵团，因为有团长玉泰吉和我在雨金的关系。他要我给他招兵，在副官处当服务员，后来到一连当排长，当时叫连附。一连 4 个排，我是第四排排长。在一连，魏志坚（连长）、高觉天（班长）和我，还有个姓高的战士是党员。大约在 1931 年初，我连成立了中共支部，书记是高觉天，我们准备组织部队拉出去打游击。

1932 年七八月间，骑兵团第一连归孙沧浪（友仁）的特务团指挥，到终南山区剿匪。这股土匪是由豫南窜到商洛一带抢掠，到处流窜。特务团和骑一连跟踪追剿，曾到过龙驹寨，转到山阳。骑一连驻地离开特务团宿营。某日下午，骑兵团军需主任郑子明突然来临，晚饭后，郑说西安国民党特务破坏了我党组织，发现魏志坚同志是中共党员，他来一连是换魏志坚同志回团部受审。在此情况下，支部立即开会研究（支部书记高觉天，魏和我是委员），决定当晚起义，将郑子明绑起来，使他好向上交代，另有两个排长比较反动，也被绑起来，处理他们以后，将一连拉出来，脱离特务团的控制，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起义后第一个问题是向哪里去。支部讨论时两种意见：魏志坚的意见是到洛南他的家乡，找关系办民团，先站住脚，尔后再作他图。高觉天的意见是向陕甘边区进军，同红二十六军陕甘游击队会合，最后通过了高觉天的意见。从而开始了长途行军。走到长安子午镇附近，一个班长打了魏志坚的黑枪，部队立即乱了阵脚。打黑枪的班长带了 10 多人跑了，其余部队收拢起来后，又被当地民团和红枪会包围。即派人向他们说明，声称“我军是捉逃兵途经该地，坏分子枪杀了连长乘机逃跑了。”叫他们不要误会，并要他们给我军搞饭吃，说饭后我军即回西安。我们这样做是想拖延时间，等天黑后再行动。黄昏后，为脱离民团的包围，我们佯装向西安方向走了一段路。高觉天乘机脱离了部队，我找高的过程，与王泰吉带的周德民那个连相遇，我看到此情，已无法挽救了，也乘夜色脱离了部队。一连即被接回西安，起义就此以失败告终。

# 回忆骑兵团党组织

刘静波

1926 年，我在渭南县渭阳中学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 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8 年我在五一县官路区南加家村以小学教师身份作掩护，担任团区委书记，建立党团组织，为渭华起义作准备。渭华起义失败后，失掉关系。

1930 年，我在宪兵营当兵，与史秉文接上党组织关系。1931 年我在骑兵团任副官，秘密进行兵运工作，由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汪锋与我直接联系。1932 年春，汪锋让我把一部分反蒋抗日内容的传单撒到西安绥靖公署办公楼附近，我顺利完成任务。后又让我和袁宏化以合法身份作掩护，把一部分标语贴在西安大街一带，我们巧妙地在深夜完成任务。

骑兵团团长为王泰吉，中校团附薛志超，少校团附程仰山，骑兵教官李啸苍，副官室主任魏志坚，军需室主任郑子明，医务室主任陈云程（湖南人），书记官阎立棠，第一连连长先后为杨鼎九、雷震寰、魏志坚，第二连连长先后为谈国帆、刘清和，第三连连长张龙韬，第四连连长先后为程仰山、董崇道。

我记得骑兵团的党员有，

魏志坚副官室主任，后任一连连长

谈国帆　二连连长

刘清和　二连连长

刘静波　副官

袁宏化　副官

赵启民　一连排长

陈正平　战士

石安邦　战士②

1936 年在宪兵营三连当兵，由该连史炳文介绍，接上党的组织关系。

我记得宪兵营的党员有汪季衡（书记官）、王时良（营部文书）、霍世杰（副官）、魏志坚（三连排长）、刘德炎（三连司务长）、杜俊杰（一连排长）、王杰（一连士兵）、张自强、赵景东、袁仰中、姚正时等。

1930 年军委向渭南要了 18 人打入宪兵营，多系渭华起义失败的党员。

注：①据汪锋回忆：“1931 年 8 月，我被调到陕西省委军委工作。……这时，党的组织关系交我的有：……骑兵团的党员有刘静波、魏志坚（连长）、赵伯经（连长）、刘清和、袁宏化（副官）。”

②据泰重民回忆：“1932 年我在骑兵闭医务所任护士，经地下党员魏志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参加过两次起义（商南、耀县）。1933 年耀县起义中，被叛军雷天一击伤头部。”

**附：**

## 绥署段振纲接充骑兵团团长

中央社，绥署以前十七路骑兵团团长王太吉[①]，已于上月 21 日在耀县防次叛变，所遗团长一缺，该署昨（2 日）委段振纲接充，闻委任状昨已发出云。

（原载 1933 年 8 月 3 日《新秦日报》）

## 蒋介石杀害王泰吉之密令

邵主席[②]力子兄：

敬[③]电悉，元[④]密王逆泰吉解省即予就地正法可也。

中正宥酉[⑤]秘赣

（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存件刊印，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国民党杀害王泰吉布告

查本部骑兵团长王泰吉，背叛党国，与赤匪刘子丹[⑥]勾结，率部哗变，糜烂地方，窜扰耀淳旬一带，状杀旬邑县长谢骞、承审员王维夏、党□□、吴忠厚等多人。迭经派队兜剿，均被免脱，曾经通缉有案。上月 18 日，该逆窜至淳化县通润镇，经该处保卫团区团长缉获，呈报到部，随经电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兹奉电令着即枪决，等因奉此，遵将该逆王泰吉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合亟布告，俾众周知，此布。计叛逆 1 名，王泰吉年 29 岁，临潼县人。

（原载 1934 年 3 月 4 日《新秦日报》。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注：**①王太吉，即王泰吉。

②邵主席，即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

③敬，韵目代日，指 24 日。

④元，韵目代日，指 13 日。
⑤有，韵目代日，指 26 日；酉，地支代时，指口至 18 时。
⑥刘子丹，即刘志丹。

# 在十七路军四十二师的一段经历*

高克林

1933 年 12 月，我到陕西朝邑县，找到了十七路军四十二师一旅三团王勤轩团长。王勤轩是王圣域的老同学。他出于对老同学的信任，先叫我在团部当副官，后在教导队当司务长。

1934 年冬，四十二师第三团派我到大荔县学无线电。我想，我的老同学乐以成等在大荔，乐曾参加过驱逐刘镇华的运动。我可到大荔通过乐找党组织，但这次也没找到。1935 年元月，我带了一部电台回部队，团长任命我当了通信排长。为了到西安找竞组织，我借机请求到西安学习无线电修理，团长答应了我的要求。

1935 年四五月，我从洛川来到西安，在杨虎城的绥靖公署学习无线电修理。过了几天，我终于见到了张秉仁同志。他和刘文伯当时办《工商日报》，张是总编，刘是社长。张秉仁约我到大雁塔去“游玩”。他问我：“你准备干什么？”我说：“还是干革命！”他又问：“怎么干法？”我说：“我现在失去了党的关系，一直找不到组织。”我向他谈了历尽千辛找组织的经过。他说：“你过几天到我家来。”几天后他对我说：“你的情况已向组织汇报，你天黑时到皇城西门外等候，会有人来找你。”

我按接头的方法见到了一个人，这人就是王超北同志。他是党中央派在陕西搞情报工作的，我向他谈了我的情况。他叫我做情报工作，我想，程卓民的电台可以利用，于是我答应了王超北同志分配给我的工作。

无线电队队长程卓民和我关系很好。我以听新闻为名想借电台。程卓民说：“现在特务监视很紧，不能利用。”我失掉了做情报工作的条件，请求组织派我搞地方工作。此后，王超北同志又介绍我和地下党员孙作宾

同志接头。

*本文摘自《高克林回忆录》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一次兵变的失败*

李豫章

我先在杨虎城的宪兵营当兵，1931 年秋，中共陕西省委调我任陕西省委军委常委，军委书记是汪锋，汪锋走后军委书记是杜鸿儒。军委还有史唯然。汪锋和我等 3 人住在疙瘩寺一个同志的家里。

1932 年 3 月间，省委军委派我去渭南的孝义镇，在冯钦哉的一个连搞兵变，并说已通知红二十六军接应。这个连的支部书记公开身份是连部文书，河南人，向省军委报告说兵变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所以军委派我同他一路去孝义。我们到孝义后，在镇外一个讨饭人的住处连夜开了会，七八个战士参加，宣布了行动计划，还写好了标语，打算一拉出来就张贴。那个文书再没露面，这个连的连长原是党员，参加过渭华起义，我以看朋友的名义住在连部。一天晚上，连长突然叫我到厕所，手里拿着匣子枪，问我做啥来了，我说看你这个朋友来了。他说：不对，听说今晚要兵变。他说：你老实说究竟做啥来了，人家把标语都写好了，行动计划也有了，你还参加了会议。我一听内部有人告密了，我应承了。我说：你过去是党员，党的纪律你知道，这是党的决议，对你没有危险，你得跟着走。谈毕后我回到房子里，连长也走了。天明后，连长对我说：大排长要枪毙你。我说：现在能不能离开？他说：不要紧，我送你走，他把我送出了街口。这次兵变就这样失败了。

*本文摘自《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9 年第 2 期所载李豫章《两次失败的兵暴》一文。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我在马青苑部的经历

杨松青[①]

我入陕后，先任警备师特务连长，此时连内无下层组织，我与机枪连连长武序、参谋燕廷标发生关系。7 月间调我为骑兵连连长，遂发展下层组织。1931 年夏季，李秀山、王世英、郑燕秋[青]等均被第一旅旅长陈养虚先后赶走。部队开入秦州，马青苑因不满意杨虎城，欲归中央指挥受邵力子鼓动〉，遂不听杨虎城调动，杨密令陈、韩 2 旅长威胁马师长回西安，马害怕，遂逼起陇南暴动（即天水事变）。我党对马、杨矛盾，事先没有很好的指示，就由下层利用军阀矛盾，参与暴动，及暴动事发，才由上海派来一个张吉珊指挥，及到成县一战，惨败而散。此时我在六团任团附，实则等于团长，全团都是回族士兵，部队被打散后，张吉珊回上海，马青苑奔南京（投蒋）。我在暴动时，含恨杀死陈养虚旅长（一方面因阶级仇恨，一方面有点私仇）。因此到处通缉我。我换了便衣逃到兰州，却遇王泰吉之弟泰诚（是同志），介绍我到张希孟处，一连住了 3 个月，后有仇人郭生华告密，于是兰州通缉日紧（当时段象武在兰州，段是杨虎城的旅长），不得已于 1932 年 1 月某日夜间逃走，3 月间潜入西安。

注：①据徐向前回忆：“杨松青同志又名杨得[德]魁，他可能是黄埔军校第五期或第六期学生，在广州没中业，迁到武汉继续学习。这时，我在武汉军校当队长，他是我们队的学生，当时他是共产党员，思想比较进步。我是由樊炳星和杨松青同志介绍入党的。杨松青同志在武汉工人纠察队干过，具体情况不详。后来，在延安时我见过他，他在杨虎城的部队里做党的工作。”

# 我在中共陕西省委军委的工作

朱　军

1931 年 3 月，经南汉宸同志介绍，由申伯纯带我谒见杨虎城，经面试，委我为陕西警官学校的队长（杨兼校长，申伯纯兼校务主任）。我有了这个社会职业作掩护，曾楚川正式通知我参加中共陕西省委军委领导工作。军委书记小高（高维翰），组织委员曾楚川，宣传委员朱大鹏。

我分工领导的党支部有：警官学校党支部，书记_朱大鹏，组织委员秦启英（学员，蓝田人），宣传委员秦启（合阳人）；公安局支部，书记是武警队一位姓张的分队长（陕西人）；宪兵营两个党支部，士兵支部负责人史班长，军官支部由三连张排长负责。警备司令部（即马青苑部）支部负责人张廷奎。

注：①据王世英回忆：警备师党员有李秀山、杨松青、郑燕青、吴胥、燕廷标等同志。另据阎揆要回忆，榆林中学学生营子斌也是警备师中的共产党员。另据王子伟回忆：焦启铠是黄埔三期学生，在校时即为交叉党员，因为他一切都奸，被选为当时的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执行委员。后蒋介石叛变革命，焦启铠受尽艰难，仍到处进行革命活动。

大约在 1931 年，他化名焦介人到陕西警备师当参谋，马青苑在天水事变时即以共产党之罪把焦杀害……

# 点 滴 回 忆

杜勉之

1930 年冬，十七路军入陕，马青苑是该军五十八师师长兼西安警备司令，我是部队到西安后参加，先在政治宣传队工作短时，1931 年初调到五十八师军医处任书记官，同年 8 月间部队开赴河南，我因病请假离职。五十八师改为陕西警备师大约就在开赴河南之际。

杨秀峰当时任五十八师特务连长，直到 1932 年秋所谓“天水事变”后他随马师长一同离开该部。郑燕青曾任特务连排长，他何时离开不知。李秀山曾任政治宣传队副队长，何时离开也不知。燕荫堂曾任师部参谋，后下部队任营长（团长王俊，蒲城人）。

本文据杜勉之 1988 年 8 月 16 日来信整理。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我 的 回 忆

李世英

1929 年 5 月，上官克勤、王敬之在好畤村开会，宣布我为中共党员。

1930 年，王敬之介绍我到张西昆部丁万林团当文书。1931 年 2 月，张西昆部被杨虎城收编。4 月间，经王敬之介绍，我和上官克勤在杨虎城部所属警备师机枪连当兵月间[①]，中共陕西省委派我到警备师四团二营四连当兵。不久，连长张明远和我参加了红三军。

注：①据上官克勤回忆：“杨虎城进关，经组织把我和李世英介绍到陕西警备司令部机抢连作地下工作（连长是个党员），前后不到 1 月，因杨虎城宪兵营招收，经组织允许，我就到宪兵营里去。

*本文原载《乾县党史资料(2)》。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中共陕南特委与安康起义的情况

刘顺元

1933 年 7 月，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和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叛党投敌，陕西省委和关中不少地方的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陕西省委被破坏后，陕南的地下党组织由上海中央局直接领导。同年 10 月，上海中央局派我以特派员的身份到陕南去工作，年底我和来中央反映陕西情况的陈子敬同志到了汉中。

我到汉中之前，汪锋同志任中共陕南特委书记。我到汉中后，陕南特委进行了改组，我任书记，汪锋同志改任特委军委，张德生、王克明、史唯然、吴鸿宾等同志为特委成员。

当时的中共陕南特委，在陕南不只领导现在汉中地区的各县地下党组织，也领导现在的安康地区地下党组织。在我到汉中之前，安康就有一个军特支，成员大都是安康绥靖军中的士兵和下级军官，主要是搞兵运工作。

大约在 1934 年的 1 月间，安康军特支给陕南特委写来报告，说他们准备在安康绥靖军中搞兵变，要求特委予以批准。特委分析了陕南特别是安康的形势和敌我力量，认为在安康搞武装起义的条件尚不成熟，指示安康军特支继续创造条件，暂时不要起义。没多久，安康军特支再次送来报告，表示不同意特委前次对他们的指示精神。正当特委再次起草给他们的指示信时，王辛德等同志在 2 月 22 日发动武装起义已经失败的消息传到了汉中。

安康起义前，陕南特委还派张明远去安康了解过情况。

安康起义虽然因条件不成熟遭致了失败，但它是在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陕西地区的革命斗争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发动的，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打击了敌人，是有重要意义的。同时，安康地区紧邻川陕革命根据地，这次起义对于配合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的斗争也是有一

定作用的。尤其需要提及的是安康起义的英烈们，特别是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王辛德同志被俘就义时，沿途高呼口号，并在刑场上向群众讲话，表现了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事业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文系刘顺元为《中共安康持委中共安康军特支及安康起义》一书所写序言。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在安康的工作

梁布鲁

我是1927年由马建山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1930年我从冯玉祥办的兰州第二军事政治学校毕业，到杨虎城部的交通处电台工作，驻在潼关。我的同学李士贵也在驻潼关的新编第二旅干事，通过李的关系，认识了在该旅当参谋主任的黎民觉。

杨虎城部回陕西后，我于1931年春随杨部的交通处无线电第七队去安康，我是报务员。在去安康之前，马建山同志指示我到安康后要开展工作。

我到安康后，就在张飞生的安康绥靖军中进行活动。我利用职务和工作上的方便，经常在晚间收听我党从瑞金发的电讯。这是很危险的事。无线电七队有几个反动家伙，我怕时间长了被他们发现惹出麻烦，索性公开地干，把收的瑞金的电讯抄送给张飞生，也送给韩子芳，一是为了争取“合法”，二是利用休息时间加班可得几个补贴费。

1932年春，中共陕西省委派李茂堂同志为特派员到安康开辟工作。李茂堂同志的社会身份是安康电报局局长。我过去不认识李茂堂同志，接头时他拿了一本小说《赵子曰》交给我。记得李茂堂同志初到时向我两次谈过关于成立安康特委的问题，因当时党员很少，没有建立起特委组织。接着陈子敬等同志先后到达安康。

那时安康的政治经济形势对我们搞工作有利。张飞生部队的费用、物资，主要靠搜逼当地人民。张的副官处到处向群众逼钱。张飞生使用的钱是用白布印的，或用红铜打的，没有什么价值。群众痛恨张的部队。张的部队士兵生活很苦，绝大多数不安心。

我在安康，打篮球、踢足球是有名的。我经常打球踢球，以此联系一些青年和官兵。黎民觉和袁作舟都是开封军校的学生，黎到安康后任张飞

生的安康绥靖军司令部副官长兼炮兵营营长，袁作舟也早到安康。黎民觉很喜欢跟青年人来往帮助青年人，袁作舟也爱打球，我到黎、袁那里去，也就是以组织打球踢球作为掩护的。

1932 年冬，红三军路过安康边界，我同李茂堂商量，派李玉田（时为我党党员，蓝田县人）伪装抢修被红军破坏的电线，去跟红军联系，虽没联系上，但我们配合红军过境进行了一些宣传工作。红三军过后，李茂堂同志被敌以共产党的嫌疑抓了起来，我便同黎民觉同志商量，由黎出面向张飞生“建议”，将李茂堂同志撤职，“驱逐”出境了事。张飞生同意了。李茂堂同志出狱后，即离开安康。

李茂堂同志离开安康后，安康地区党的工作由我负责。袁作舟军事上有一套，与手下人的关系也处得很好，我发展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 年 4 月间，中共陕南特委派的王建英[①]同志由汉中来安康，同行的有曹受祉、陈子敬、李茂堂、张季华。5 月初正式成立了中共安康军特支，属中共陕南特委领导。军特支书记是我，组织是王建英，军委是袁作舟，宣传由我兼（王泰诚入党后，接任宣传委员）。

王建英到安康后，在黎民觉处住了近一个月。我同黎商量，先把他安排在袁作舟连，帮助文书工作，但这不是长期干的事，也不敢给他弄个缺，怕出事后连累黎。后来，想了个办法，叫王找张飞生副官处的副官。有一个副官叫田彦之，先在张飞生的手枪连当连长，他不识字。王建英认识他后，主动帮他看信、写信，终于通过田彦之把王建英介绍给张飞生办的《民知时报》社当记者。报社的社长是闵醒亚，报社还有个人叫马致远（蒲城人，已故），他同王建英关系很好。

1933 年 9 月间，我被调去汉中。我离开安康时，安康共有党员 20 多人，不到 30 人。一个叫赵恩普，是王建英发展的，赵当时是高小学生，又是张飞生手枪连李连长的勤务兵。我发展的还有詹屏藩（渭南人），当时是张飞生部的一个排长；侯炳仁（褒城人），当时是军事训练班的学生；赵正璧（渭南人）、晁天申（礼泉人，已亡），当时是无线电第七队的练习生；

权子厚（蒲城人），当时在韩子芳跟前背枪；李克用，当时是炮兵营的书记官。袁作舟、王泰诚他们也发展了几个党员。我离开安康后，安康军特支的书记由王建英同志担任。电台上接我手的叫李汝骥，后来是党员。

我离开安康以前，王建英、袁作舟同志多次同我谈过搞兵变的事，我觉得条件不成熟没同意。王建英同志工作积极，但年轻，缺乏经验，袁作舟总想拉队伍起事。

我到汉中后，向汪锋、刘顺元同志汇报过安康的情况。安康起义军特支未同陕南特委详细研究过，也未经特委批准，只在起义前两天，王建英同志给陕南特委写过一个报告。因计划不周，没有同川陕红军取得联系，加之党的组织还薄弱，敌人的力量大，结果失败了。

安康起义失败，王建英同志被俘后，王建英同志的老师陈雨皋曾营救过，但无效。王建英同志就义后.是马致远收的尸，入棺后放在附近一座古庙里，王建英的一张照片，就是马致远带走保存下来的。起义后袁作舟没有下落。那时我从报纸上看到，镇巴降头山有一二百人，我曾怀疑是不是袁作舟领导的，但一直得不到证实。

汪锋同志由汉中去安康了解情况，整顿组织，走前还问了我知道的安康情况，并问我到安康找谁，我说可以找黎民觉，但又对他说黎不一定还在安康。汪锋同志说他准备找王肃斋，王是张飞生的参谋长，蓝田人，同汪锋同志是乡党。汪锋同志由安康返回汉中时我们又见了面，交谈过他去安康的情况。

**注**：①王建英，即王辛德。

*本文原载《中共安康特委中共安康军特支及安康起义》一书。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在 安 康 搞 兵 运

黎民觉

1931 年，经过南汉宸、赵博生的介绍，我到杨虎城部当参议。为时不久，我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当时有一些地下党员和我在一个狱中。在这期间我和陈子敬同志取得了联系。我们都经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和铁窗生活的考验，出狱后就在一起进行活动。因为我们都是在西安被捕的，当然在西安继续活动是困难的。陈说，地下党需要在安康地区发展组织，开辟工作，要我在西安方面找些社会关系到安康地区去掩护地下党的开辟工作，就是通过私人关系，在安康地区找到一个社会职业。

恰好这时安康绥靖军司令张飞生来到西安开会。张飞生和杨虎城都是奉蒋介石之命与冯玉祥作战的部队，战后张对盘踞安康受杨节制心实不满，张到西安开会，实则有扩大社会影响，物色军事参谋人才，充实实力的打算，与张飞生前后同学的李植园介绍我同张见面。张认为我是军官学校出身，又是西北军青年将校，邀我去安康参赞军事。我将这一情况向陈子敬同志谈了，陈向省委作了汇报，陈说省委决定让我们去安康，利用我的公开身份开展兵运活动。

1932 年春末，我和陈子敬同到安康，张飞生任命我为安绥军司令部副官长兼炮兵营长，虽然没有得到原先允诺的参谋长职务，却掌握了一部分军事实权，为开展兵运工作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我通过职务上的关系，开展各方面的中上层的社会联系工作。张飞生的 6 个团，除两个亲信团外，有 4 个和我党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联系。与我接近的沈玺亭团长曾一再表示：只要你们说话，我立即打出旗号，跟着共产党干。

炮兵营一连连长袁作舟，是我在军官学校的同学。在党的政治影响下，我和袁曾在西安、潼关等地搞过武装活动，也有过到安康、商洛地区活动

的打算，我在西安被捕后，袁就离开西安到安康了。袁见我来安康，格外亲切，我们重新结合在一起，经党组织研究，由我出面推荐袁作舟同志担任了炮兵营的营附。

1932 年冬，我红三军（贺龙同志部）来到安康东部地区，张飞生率领两个亲信团进驻旬阳等地，控制红军入川要道。陈子敬、梁布鲁将收集到的敌军行动等情报，派共产党员李玉田化装成电报局维修线路的工人，向红军送去。李茂堂亲自主持在安康城里散发传单，特别是利用晚间派人火烧敌人兵站，造成火警，制造紧张空气。一时，安康城内人心惶惶，敌人派兵巡逻，气氛十分紧张。睹此情况，张飞生仓皇撤回安康。

红军过后，特委书记李茂堂突然被捕，梁布鲁找我研究营救办法。我立刻去见张飞生，寒暄之后，提起为什么将电报局局长李茂堂逮捕。张说：“省里来电，说李是共产党嫌疑分子。”我一听，知道敌人并未掌握真实情况，便顺口说：“不见得吧，他是渭南大豪绅的少爷，如果他是共产党，那共产党就太多了，这里面是否还有其他文章，国民党省党部、县党部的人你是了解的，一天没事干，专会拨弄是非，谁会让一个共产党当电报局长？国民党军队已在我们身边安了一个电台（张这时还不是国民党员），心还不足，还想利用我们借刀杀人，不能不理。也不能遂他们的心愿去得罪一个关中大绅吧！我看还不如放他走，借此机会提拔一个我们的人去代理电报局长。”以后张飞生将李茂堂同志“驱逐出境”，派进去一个电报局长。

1933 年端午节前，陕南特委派王建英来安康，为了王建英有一个适当的职业掩护，我和梁布鲁、袁作舟商量了一个方法。张飞生有个亲信叫田彦之，在司令部担任副官。此人爱走街串巷，爱管闲事，尤其爱到汉江河堤坐茶馆。我们分析了这些特点，让王建英装成一个投亲不遇的穷学生，闷坐茶馆，埋头看书，有意引起田彦之的注意。田彦之果然注意到王建英，主动攀谈，颇为同情。田来找我谈起王建英的情况，说这个学生能写一手好字。离家几百里，举目无亲，请我帮忙。我有意先推辞，说他多管闲事。

田觉得没有讨到面子不光彩，就愈加恳求，我就提出由他作保才行，他满口答应，我才让把人带到营附袁作舟那里。在营部安排了个帮办司书。王建英和袁作舟密切配合，很快掌握了全营情况，以公开身份与士兵和下级军官多方接触，发展组织，争取同情革命的群众。以后王建英在炮营不方便，转到《民知时报》去了。

红军过境后，敌军内部上层的情况更加复杂起来。张飞生在反共的口号下极力铲除异己。我已引起了张飞生的怀疑。他借口炮营范围小，说要给我编一个团，委我当团长，将我调离炮营，派他的旧部潘玉斋（潘占奎，在陈树藩部当过旅长）接替了炮营营长。

形势突变怎么办？一天，王建英、袁作舟、王泰诚约我在安康城西南郊接头地点开会。会议分析了情况：张飞生对我们的行动是否有察觉？可能他还没有拿到真凭实据，所以还未对我们采取残酷手段，但必须高度警惕；炮营情况在不断变化，可能有个别不坚定分子要发生动摇，如稍有不慎，将有暴露组织的危险。在此情况下，积极发动起义已成当务之急，但条件尚不成熟，要再看一下敌内部矛盾的激化情况如何。会议决定，争取时间，作起义准备。

1933 年旧历腊月二十六日，虽近年关，但张飞生无意过年，率部去石泉巡防，我被迫随张前往。

1934 年旧历正月初八晚，安康起义的枪声打响了。此时，张飞生还在石泉，我被羁留在石泉，所以我没仔能参加上安康起义的革命斗争。

安康起义的枪声打响之后，我被软禁在张飞生的身边，收了我随身带的手枪，缴了我随从卫士的武装，住室之外也布满岗哨。当时几个亲信同志如屈善教等催我设法脱身，但外面岗哨林立插翅难飞。随张飞生回安康后的一天晚上，我化装逃出了安康。

---

*本文原载《中共安康特委中共安康军特支及安康起义》一书。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从陕南游击纵队到陕南抗日第一军

何振亚

何振亚是我参加革命后用的名字，原名继周，字子新，1913 年生于汉阴县北区龙王乡一个农民家庭。

1931 年 2 月，我从汉阴县立高小毕业后，因官府索捐勒款，加之地方混乱而又遭受土匪的抢劫，致使家庭破产，被迫和父亲四处逃避，中途父亲失散。这时升学既不可能，谋事也无门路，只好考入十七路军杨虎城将军办的军官训练班（后叫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训练班里共产党员很多，也能看到党的刊物，对我们影响很大，大部分同学都说共产党好。1931 年冬，由于杨虎城部队要进甘肃，将该期学员提前毕业，我和部分同学被派到安绥军张飞生部。我被拨到第一团，团长是沈玺亭。旧军队很腐朽，很多人吸大烟，虐待下级军官，克扣军饷。我们这些从步训班来的同学，都是青年人，有些革命的义气，和旧习气格格不入。他们以旧的关系，用旧的一套人马，我们受排斥，不信任，不重用。本来步训班的学生应当军官，可是只让我们当班长。

1932 年，沈玺亭在平利办随营军官训练班。我任班长 8 个月。当时兴安师范学生的政治活动很活跃，创办有《汉声报》，宣传进步思想，我们取得了联系。那时曾几次找地方党，未找上。由于没有党的领导，活动很困难，方针办法很少，只能从个人感情出发，以步训班同学为基础，团结一部分力量。于是我与一般有政治觉悟而又有勇气的同学，如沈启贤、赵宏勋、孟子明、苟树林、徐海山、孙启庆、刘炎德、吕耀明等 7 个连的一部分下级军官，进行了 1 年多的暗中策划及组织准备，拟在有利时机举行兵暴，先把队伍拉出来再找党，参加红军。我们在平利进行地下活动的时候，张惠民是知道的。那时我们的决心和计划很大，想把沈玺亭和他的团

全部一下拉出来，杨虎城是蒋介石的杂牌部队，沈玺亭又是杨虎城的杂牌部队。我们利用国民党和杂牌军之间以及杂牌军内部之间的矛盾，所以活动比较顺利。沈玺亭虽然知道我们的活动，但未加限制。1934 年以后，沈玺亭和杨虎城有了直接联系，觉得吃得开了，态度也变了。我们认为争取他的可能性很小，即放弃了这个计划。

1933 年 3 月，我任安绥军一团手枪连排长。1935 年 1 月，部队开往城固、洋县一带，又分配我到警二旅四团（即原安绥军一团）三营九连二排任排长、连附。

1935 年冬，杨虎城下令调时在长安县南乡引驾回驻防的警二旅四团，到西安大营房整训。当时我们看不行了，如果一进西安起义的机会就更少了。在红军和地方党的影响下，经过 1932 年到 1935 年的思想和组织准备，于 1935 年 11 月，我带领九连在引驾回起义。我当时是连附，搞掉了连长，以换岗为名，把全连带出去，冲出了敌人的包围，拉进秦岭山区。在我们暴动的前 3 天，四连 1 个排提前拉出去了。敌人 1 个营来追，他们又怕全营暴动，就未敢穷追。我们翻过秦岭，到了柞水。我们走后，敌人将苟树林（甘肃人）绑上要枪毙，幸而脱险，跑到我们这里来了。以后，敌人又将孟子明杀害。

起义的目的是参加红军。当时，我们以为红二十五军仍在陕南，起义后才知道红二十五军已打到陕北去了。我们在拉出来之前，没有找上党，认为拉出来之后，党会找我们。但拉出来后，仍然找不到党，党也找不到我们。这时部队的团结、巩固全靠感情来维系。当时，红七十四师只见番号不见人，因而只有自己编自己，自称为“陕南游击纵队”，我任指挥。对内实行会议制度及官兵平等（仅仅是生活上平等，未取消打骂制度），不准强奸妇女；对外采取抗粮抗捐，打民团杀差人（给官府要款的人）。起义不到一个星期，在宁陕县沙沟一带，我带张孝德（起义时班长）、洪九畴（起义时文书）到红七十四师去开会，商定我们为陕南游击队，至于大队、支队或纵队，由我们看发展情况而定。议定我们在镇安县以西活动，

他们在镇安县以东活动。因此我们即活动于汉阴、石泉、安康县北，镇安、柞水县西，与红七十四师配合行动。实行的政策与红七十四师一样。即打土豪、杀恶霸，给穷人分衣物、粮食，保护行商等。口号是“打倒国民党”。我们曾在宁陕泰山庙等地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

1935 年年底，庞炳勋部就对我们追击，后又派代表来要我们归编。

1936 年 1 月，李伯亭带 20 余人来参加我们部队，地点在镇安县的穆王坪一带。李参加后系陕南游击队纵队领导成员之一。主管宣传、民运工作，部队出布告、写标语、审讯土豪劣绅等都是他亲自动手，还带领部分部队出去打过保安队，单独执行任务。

我们在陕南初期的活动是很困难的，半年多没有党的领导。后来队伍扩大到了五六百人，但内部是很不稳定的。我们虽提出奋斗目标是要干革命，要当共产党，要打富济贫，但还要靠自己的威信和感情来团结干部、战士，巩固部队。

1936 年 3 月，国民党调来两个旅及两个团围剿我们，敌情严重。此时红七十四师去商洛东活动，与我们失掉了联络；我们内部一部分人又发生动摇，叛变了一个排。正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安康专员魏席儒派来汉阴的士绅陈继侯、张伯威与我们谈判。谈判的条件，他们是：给我们以“安康专区保安大队”的名义；给我们发枪支弹药；国民党部队停止对我们的封锁围剿。这时，我们考虑到部队很不巩固。就和他搞“缓兵计”。于是我们提出了 3 个条件：（1）接受他们的名义可以，但不能由他们整编；（2）他们不能派人到部队来；（3）部队的驻地，大的范围由他们指定，具体地点由我们选择。魏接受这 3 个条件。我们停止打土豪、分田地，停止打保安队。敌人企图将我们诱骗到一个适当地点一网打尽，我们则是争取时间，整顿内部，利用合法身份派人到陕南各县活动，策动保安队兵变和农民暴动，以及等待红七十四师或其他红军的到来。3 月或 4 月，谈妥之后，我们便开到安康县傅家河口进行整训，同时把魏席儒派来的两名代表监视起来，不准他们接近部队。我们派人到汉阴、安康、紫阳、岚皋、平利、镇巴一

带秘密活动，记得共派出 5 个组，重点是安康、汉阴、紫阳、平利等县。7 月，派杨子珍回平利组织保安队起义。

文考亭是我的同学，他参加部队仅有一两个月，我们派他到涧池一带去瓦解汉阴、安康恒口一带的保安队（即邹洁之、王杰三的保安队）。祝敏济是 3 月在傅家河一带或以前参加部队的，他是安康一个大资本家的外甥，4 月我们派他同王宇辉一路到汉阴、安康一带搞农民暴动及搞学生运动。他们走时，我和张孝德（分队长）、苟树林（分：队长）、徐海山（副大队长）、洪九畴（秘书或参谋处长）集体给他们谈话和交代任务。后来听说他们找到文孝亭不久被四十军庞炳勋部发现，同时被杀害。部队在傅家河口时，李伯亭提出要利用合法身份到安康第七中学找他的同学、同乡进行秘密活动，也在这个时候被安康专署发觉杀害了。我们向安康专署提出质问，魏席儒说是下面干的，发生了误会。因此我们又将驻地移到了离安康稍远的东镇。这样，一方面便于进山活动，另一方面可去找红军。此时我们的主力虽已停止对敌作战，但外围的小游击叭仍在袭击敌人。这些小游击队，多的有三四百人，少的有二三十人或五六十人。这时敌人的正规军以及民团、保安队对我们的封锁包围仍未停止，中间还进行过两次较大的战斗。红七十四师到了我们驻地附近，我们派人去联络。我们的意见立即恢复对敌游击活动，而红七十四师则要我们暂停一个时期，这样，一则可以利用合法身份搞地下工作，二则可以取得情报供给他们。

1936 年 4 月，西安中共特委派杨江（蓝田人）、沈敏、杜瑜华 3 人来到我们部队。这时我们住在东镇，他们了解情况之后，由杨江回西安汇报。杨江同志回来后传达了党的指示。他征求我们的意见，提出用红军的名义好还是用抗日军的名义好？我们说只要有党的领导，用什么名义都可以。考虑到用抗日军的名义号召力大，好活动，便给了我部“陕南抗日第一军”的番号，我任军长。至此，我们正式归党的领导。我们杀了魏席儒派来的两名代表。其中的一个目的是为了给李伯亭报仇。根据党的指示，当即打下了安康的王婆店，开了成立大会，授旗、宣誓。

这时部队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建立了政治机关，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少年先锋队是抗日军里面的一个支队，约 70 多人，都是十几岁的娃娃，相当于现在的文工团。我们对这个支队培养训练抓得很紧，也是培养基层干部的对象。对外实行打土豪、分田地。因当时我们力量小，分田地农民不敢要，故未进行，有的地方连分粮食也不敢要，只好在晚上送去。

沈启贤过去是我的同学，也是我们在沈玺亭部活动的主要人之一。1936 年他们打死连长，又从沈部起义拉出一个连，因事先没有和我们联系，四处寻找，结果被国民党军队及民团打垮，与我们会合时只剩下 16 余人。

1936 年 11 月，西安中共特委给我那里派来一批干部，共 26 人，连同回特委报告情况的杨江等被大刀会一个老师（后参加革命）误杀。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我们在陕南的活动，主要是以镇安、柞水、宁陕、石泉、安康、汉阴等县交界处的秦岭山区为根据地，也到佛坪、洋县的华阳、黄金峡、安康、旬阳、汉阴的南山、紫阳的部分地区去活动。在这样大的区域内和敌人周旋，军事行动很多。当时国民党在陕南拉兵要款十分厉害，白色恐怖更加残酷。劳动人民特别是山区人民的生活条件很差。广大劳苦人民受红军的影响很深，觉悟程度很高，革命意志很坚决，所以我们每到一处，就有很多贫农要求参加。有的不惜身家性命为我们跑路送信，对我们支援很大。

我们在陕南期间，牵制了不少敌人，也打了不少仗。庞炳勋的两个团从 1935 年起一直追击我们，后驻镇安、柞水一带；胡宗南的第一师也来打我们；四十九师李及兰部驻石泉；薛岳的五十一军两个团驻洋县、佛坪的北山地区；杨虎城的警一旅、警二旅驻户县一带。几路对我们进行围剿、追击。我们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我们在运动中消灭过地方团队，并打垮和消灭过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在石泉击溃四十九师的一个营，在佛坪迷峰岭击溃了五十一军一个连，后来受到敌人两个团的夹击，激战一天，晚上借人熟地熟撤退。部队在敌人的围攻中得以保存和发展，

我们由开始暴动的100多人，到离开陕南北上时扩大到了1200人。

双十二事变前，我们准备打汉阴。后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我们即开往西安方向，中途接到党的指示，命令我部为陕南讨蒋第一军（红七十四师为第二军），属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指挥，往商洛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我们又受命北上礼泉与红十五军团会合，这时部队有1100余人。以后编入一一五师，不久开赴抗日前线。

陕南抗日第一军是在陕南游击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支部队，当时有不少知识分子和优秀的工农同志参加，名数都是陕南人。在党的培养下，有很多人以后作了领导干部，据我所知道有沈启贤、沈敏、杜瑜华、张英勃、张孝德、刘挺民以及目前在云南和江苏的几个军分区的司令员。

1937年2月，部队随红十五军团进至陇东整编，我任十五军团警卫团团长，并与同年3月在庆阳驿马关由李雪三、王敬修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红军改编后，我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警卫营营长，当即东渡黄河，随军北上抗日。1938年3月升任本团参谋长。次年1月派任晋南游击支队司令，10月调延安抗大三分校工作。生3年抗战中，我部曾先后参加过正太路、道清路的破袭战，以及粉碎“九路围攻”的张店、町店战斗。

双十二事变后我们奉命离开陕南时，因走得突然，有100多伤病员留在陕南，北上途中又有100多人掉队，还有几支小游击队不知道消息。因此我们行至子午U时，决定叫沈继刚返回陕南，征求了沈的意见，他也乐意。告诉他，以后若归队困难，可以仍然用“陕南抗日第一军”的番号，并担任军长，组织伤病员和掉队战士，继续在原根据地坚持游击。我到陕北后，因国民党层层封锁，通讯联络不便，所以彼此失掉联系，他以后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沈继刚是汉阴人，和我自小是同学，以后又同在警二旅四团，他任五连连长。我在暴动前曾向他做过工作，他口头上表示同意，但行动上不果断，几次准备起义未成。后来他以请假探亲的名义，带了11人徒手参加抗W第一军。我同意了他的要求，将他留在军部。他的族祖父是沈玺亭。他来时无特殊表现，我们对他还不放心。后来经过考验才叫他

留下。

徐海山是汉阴县人，家_自耕农，1931 年与我在杨虎城办的军官训练班同学。毕业后，我们同被分配到安绥军一团（即后来的警二旅四团）三营，他到八连，我到九连，均为二排长，一排长为提升连长的对象。九连起义时，八连也准备同时行动，因工作不成熟未能成功。九连起义后，团长怀疑徐海山与起义有关，准备枪毙他，他知道后便带刘仁政和战士共六七人，徒手逃至陕南。1936 年三四月间找到了我们。成立抗日第一军后，徐任政治部主任，对外宣传，打土豪分田地，镇压豪绅恶霸和军内财务，均由他主持办理。他打仗勇敢，对敌斗争坚决。凡属镇反问题，都是以政治部主任名义出布告，因此他是出了一点名的，同敌人没有妥协的余地。我们编为红十五军团时，因徐不是共产党员，军团首长决定送他到延安学习。1937 年 2 月，徐带两个警卫员于去延安的途中，拆看了军团政治部的介绍信。信上写他政治觉悟高，自觉地参加革命，对敌斗争坚决，但有一点贪污嫌疑。他一见“贪污”2 字就害怕了，以为搞不好要杀头，于是未去延安，返回了陕南。徐返回陕南后找到沈继刚，将陕南抗日第一军未来得及带走的 300 余人收容起来又在原根据地开展游击活动，后来发展到八九百人。由于叛徒破坏，徐惨遭石泉县保安队的残杀，叛徒就是刘仁政和冯俊勋。刘仁政，石泉人，家庭小商人，原为警二旅四团四连文书，后为抗日一军军需。冯俊勋，也是石泉人，家庭小地主，和我及徐海山是杨虎城军官训练班同学，毕业后冯被分配在警二旅五团当排长，后来不干了退职回家。1936 年参加抗日第一军，任军部参谋。抗日第一军改编为十五军团警卫团及后来的三四四旅警卫营时，他俩均为副官。组织介绍他俩去抗大学习，他们怕苦怕死，偷跑回家，被石泉县保安队利用，当了一个什么官。刘、冯叛变后，打着向沈、徐归队的旗号，带保安队去安康王家坪。沈、徐对刘、冯信任不疑。结果两个叛徒从内部袭击，伪装投降的保安队从对面进攻，沈、冯所部全部被打垮，徐当场牺牲，沈逃出后也被抓住打死了。自那次事件后，叛徒刘仁政和冯俊勋成为石泉县有名的恶霸，干尽坏事，陕南解放后

被政府镇压了。

汤能金原系警二旅四团三营营长汤飞山的马夫、警卫员。1936 年 2 月，他回到汉阴县东五铺一带扩大了三四十人，到汉阴北山来参加我们部队。在与安康专署谈判时，我们派他去单独活动，并给拨了 30 余支步枪。后来我们在傅家河一带整训时，他们有两次战斗打得不错，一次是在原汉阴北山火链砭附近的东河口，他们利用有利地形，与胡宗南的第一师一个团打了一整天，打得很英勇。一次是在汉阴城附近，打垮了张亲民的保安队，只差一点将张活捉。我们离开陕南时，汤在安康大河口一带活动，未通知到，留在了陕南。

黄金荣、王老九、沈继林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

注：①“兴安”系安康之故称。

②应为“安康保安司令部持务大队”。后同。

③“西安中共特委”应为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时间应是 1936 年 6 月。

*本文原载《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一书。本书编者有删节。

# 营 盘 起 义 前 后*

王 展

1935 年我到了陕西警备第二旅四团四连当兵，连长杨云峰（石泉人），看我年龄小，叫我给他当勤务兵，侍候当官的，当时我不愿意干。后来当了几个月。有一次，来了一伙当官的，我们忘记喊“敬礼”，连长马上集合队伍，让我和其他几个人站出来，每人打了十几扁担，把我下到二排五班当兵。这时红二十五军已到陕南，我们队伍尾追红军，沿途看到了红军留下的标语、传单，听到了红军如何好，爱穷人，打土豪，除恶霸等传说，使我心中对红军有向往，想投红军，好报仇。队伍住在柞水县山沟里，正好班里有人向我活动。说狗口的连长坏，咱们打死他，投红军去。我又向别人活动，其中有宗成喜（湖北人，收留的红二十五军掉队战士）、罗少伟（汉阴县罗家沟人）、张子新（七班长，平利或汉阴人）等。

1935 年冬天已很冷，快要下雪的时候，部队向蓝田天开拔，四连是后卫，行至柞水县营盘梁宿营，当时计划把一个连都拉出来，规定 3 枪为号，听枪响往外面跑。

半夜，还不见动静。我就到岗哨上去，想摸一下情况，碰上杜玉德（洋县人）站岗。他年龄小，和我关系很好，又是副连长的侄子，我问他有什么动静，他说没得。我手中没枪，等不及了，就让他给我放哨，我返回去把五班长董茂新的枪及子弹袋摸到手了。我对杜玉德说：“我要走，你走不走？”他没表态。我又去找七班长张子新，问他有啥情况，他好象心事重重，没说啥话，正在这时，沈启贤走来（当时互不了解），我以为他来视察，赶紧躲到一口大缸背后，他好象看到我，但没吭声，转身走了，我听见他在叹气。紧接着碰到罗少伟，他和我最好，我说：“哪怕别人不走，我们两个也要走。”他说：“你先走，我们后面就来。”要走出警戒，还

要过几道岗哨，正走着碰着九班长王连荣等几个人，他们正在吃饭，我怕他们疑惑，就撒谎说：“部队要向后走了，我跟司务长去号房子，你们还不快吃饭。”我走到最后一道岗，是熟人，又撒谎说：“人家都吃完饭要走了，你还站岗！快回去吃饭。”就这样，我 1 个人 1 条枪拉出来了。我走了 2 里，怕后面追，就钻进刺架躲起来。过了一会，听到远处响了 3 枪，我心里踏实了，知道起义开始了。这时，听到路上有脚步声，我估计是起义的人，就问：“谁？”他们好象也听出我的声音.就打招呼.我从刺架出来，见张子新、罗少伟他们把排长绑起押着走。我们共 24 人，每人都有枪。天明后在一个小庙里，商量今后怎么办。我说：“大家出来，就是为了找红二十五军，他们就在商洛这一带，我们现在就去找。”并推选张子新领头，打出苏维埃旗号。什么叫苏维埃，当时不甚明了，只是听红军掉队战士宗志喜讲，红军建立苏维埃，领着穷人打土豪，分田地。我们这支起义部队，在宁陕、柞水一带大山里，活动了几天，没发现敌人追击，红军也没找着。

有一天，听说何继周把九连拉出来了。我们找不到红军，就找九连。经过观察，发现他们也是打土豪，为穷人，纪律严明，才相信了他们。于是两支起义部队就在宁陕县山区某地会合了，编为两个支队，亲热得很，在一起活动了几天。有天早上在宁陕县一个小村集合，何继周没讲几句话，就命令我们支队交枪。这个突然事件，使我认为何继周是沈玺亭派来整我们的。枪一响，我扛起枪就跑，他们后面追，边追边打枪，但都没打着人，当追的人看我摔倒了，爬起来没拿枪，才停止射击。从此，我们起义的 24 人，脱离何继周他们逃散了。我和胡贯清（宁陕县人）跑到一起，在他家住了几天，就回汉阴，先不敢进门，躲在县城东关亲戚家里，有个把月。一天，舅父赵维新拿个纸条给我，打开一看，是我那帮人罗少伟、王连荣他们写的，约我去和他们一起干。他们又参加了何继周部队，住在东镇（安康傅家河垴上）。我就找到东镇和他们见了面。经过了解，确认为何继周他们不是沈玺亭派来的，他们也是游击队名称，四处打游击，缴我们枪时，

又没有伤人，我们这才二次与何继周他们会合。这是1936年四五月的事。不久，沈敏、杨江、杜瑜华来到，接上党的关系，并把安康专员魏席儒派来的人杀掉，举行了第二次起义。

第二次起义后，打了安康五里铺。当时，听说敌人有一个连，发起进攻后，敌人躲了，我们把商人富户的盐、布匹等物分了一些给穷人。打太平寨时（汉阴、石泉两县结合部的一个寨子），我在前面，寨子里的土豪们死守，我们数攻不下，伤亡数人，大家打红了眼，破寨时，杀了不少人，记得押下来问情况时，只有几个老婆子、大姑娘。以后打涧池铺。那时，我搞宣传，散传单，贴标语，我们有架油印机。打进街，有个炮楼没打开，天亮就撤出来了。后又打石泉的池河，记得缴了团丁1条枪。在宁陕火链砭打过一仗，打得很苦，我在迷峰岭负伤，隐藏在大山里一户老乡家里养伤半月，返回部队。

我们这支队伍，在正式编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之前，除了打土豪，把衣物、粮食分给穷人以外，在宁陕四亩地还学红军杀了3个地主恶霸，搞分田地，办法是地里插上旗子，写上姓名，就算分给谁了。据了解，没人敢要，我们一走分田就不存在了。

我们专找民团和保安队打，对国民党正规军我们是突袭。打汉阴县城时，据说城内驻有敌人一个营，我们一切准备好了，计划打它个措手不及。我是汉阴县城里人，积极得很。行至离汉阴城七八里远时，突然命令撤退，大家不高兴，回头才知道，西安事变发生了，奉命往商州开。

---

*本文原载《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一书。本书编者有删节。

# 回忆警一旅三团中共党支部工作

崔一民

在十七路军所属的陕西警备第一旅工作的共产党员，绝大部分集中在第三团。在旅部和第二团工作的党员只有 3 人。第三团在划归警一旅建制之前就有一些党员和党的活动。因而要说明党在警一旅的组织与活动历史，势必着重从党在三团的活动情况说起。

陕西省政府主席刘郁芬（属冯玉祥部的高级将领）1929 年收编部分地方非法武装成立了陕西商洛游击司令部，司令张子厚（陕西省蓝田县人），辖两个旅，我在第二旅旅部任二等四级（少校）书记官。1930 年冬，杨虎城将军率部进陕，行至潼关即派刘文伯（在民国初年曾任靖国军第三路营长，杨虎城的老朋友，张子厚的老上司）到洛南与张子厚商谈部队收编问题，遂将陕西商洛游击司令部所属部队改编为十七路军补充团。以张子厚为团长。我在该团第二营营部任中尉书记。

刘文伯 1931 年任陕西省盐务局局长。盐务局有一缉私大队。大队长任耕三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参加过渭华暴动，是刘文伯、史可轩、许权中的老部下。唐建章是唐泽民的弟弟，唐泽民是老共产党员，同南汉宸一起随杨虎城入陕。南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唐任十七路军总指挥部军械处处长。以后唐泽民又将唐建章从安徽叫来陕西，安排到缉私大队任大队副，不久经任耕三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此外，在缉私大队还有一些年轻’的共产党员。

不久，杨虎城任命刘文伯为陕西商洛绥靖司令，辖两个团，一个特务营。将十七路军补充团改编为该部第一团，团长张子厚；将商县的大土匪唐靖部改编为该部第二团，团长古鼎新；把盐务局的缉私大队改编为特务营，营长任耕三，营副唐建章。为时不久，又把商洛绥靖司令部改编为凤

翔绥靖司令部，部队移驻凤翔。当时，刘文伯为了改造部队，需要培养一批青年军官，遂办了一个军官训练队，队长姓蒋（老保定军校毕业），队副唐建章、余庆松。我也在军官队学习，认识了在该队学习的共产党员王警钟、上官克勤、张赓良等，还有几位，但名字已经忘记了。

嗣后，十七路军总部决定撤销凤翔绥靖司令部，将张子厚团和任耕三的特务营合编为十七路军补充团，调赵雨晴（陕西省盐务局副局长、刘文伯的亲信）为团长，任耕三任三营营校。这样一整编，就把特务营的共产党员分布到补充团备营连去了。这对于发展扩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工作是很有利的。

十七路军于 1933 年又成立了独立第一旅，旅长刘文伯，辖两个团、一个特务连。把十七路军补充团改编为该旅第一团，团长赵雨晴；将原陕西警备师的杨竹荪团改编为该旅第二团；新组建了特务连。我在一团一营营部任书记官，王警钟、上官克勤在一团当连、排长。这时候，我们 3 人已经发展为亲密的朋友了。任耕三、唐建章在一团三营分别任营长、营附。

1935 年 2 月（农历正月初一），红四方面军进占陕西宁强县城，把独一旅二团守城的两个营全部消灭，杨竹荪团长被俘枪杀。孙蔚如（三十八军军长）派王劲哉率十七师四十九旅九十八团、九十七团和独一旅一团救援宁强，在勉县深山中的新铺湾与红军遭遇。激战几天几夜，终被红军击溃，损失严重。战后，独一旅被撤销，将残余部队缩编为一个团。部队番号遂改为陕西警备第一旅第三团，团长赵雨晴，营长有任耕三、刘致远、鲁瑞斋。调我任团部中尉书记。在该团工作的共产党员，有的在新铺湾战役中牺牲了；有的离开了部队；仍在该团工作的党员有任耕三、唐建章、王警钟、上官克勤、安子玉等（还有其他党员，已经忘记姓名）。同年 5 月，十七路军总部调刘威诚（共产党员）任三团团长。警一旅地下党的组织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我在第三团团部先后任中尉、上尉书记。

陕西警一旅旅长唐嗣桐率该旅一、二团于 1935 年 3 月在秦岭山区与红

二十五军作战失利，唐被红二十五军俘杀。三团进驻西安西营房整训。1936年西安事变前，我们三团驻防凤县、留坝县张良庙一带。西安事变时，杨虎城电令我们三团星夜返回西安，接守城防。

# 回忆警一旅党组织

王晓时

1933 年春，我经孙仲猷介绍进入十七路军补充团，当时的团长赵雨晴，他派我到三营当了书记官。我们三营的营长就是任耕三，他是中共党员，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我们建立了党的联系。后来，十七路军组建了独立一旅，我在二团三营当书记官。1935 年，十七路军又组建了陕西警备第一旅，我先在三团团部当书记，后任上尉副官。西安事变时，我们三团驻防留坝，后调西安，住一个时期后又换防宝鸡。我先调三营当营附，后在一营当连长。

1936 年西安事变前，在陕西警一旅就有不少中共党员，三团尤多些。我能回忆起来的同志有：刘威诚三团团长（1935 年 5 月到任）、任耕三三团三营营长（后任二团团长）、唐建章三团团附、张祜，住在三团团部，无职务，着便衣，陕西咸阳人。王晓时，三团团部书记官。在西安事变后，由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党的工作比较活跃。

# 寻找红二十五军*

解华亭

我是192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1931年冬同长安县地下党组织失掉了联系。1932年2月我由西安到了兰州第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军官训练班任副官。1932年秋，因进行党的宣传活动暴露政治身份，被迫同胡平博、王文勃一起越墙逃走。先到了定西三十八军补充二团，不敢久留，又到了秦安县三十八军补充一团，在六连任见习。1933年秋，因西安绥署突然下令通缉我，又离开了补充一团。

1934年12月，我到了汉中十七路军独立旅第一团三连任司务长。1935年5月独立旅第一团改编为陕西警备第一旅第三团，旅长唐嗣桐，团长刘威诚。我是第二营五连司务长，营长鲁瑞斋，连长孙毓祥。旅长、团长、营长都是新上任的。1935年6月上旬，杨虎城命令刘威诚率领第三团开赴引驾回，堵截红军。俟全团到达引驾回，红二十五军早已西去。我在连里士兵中秘密宣传活动，有些班长和士兵提高了觉悟，愿意参加红军。部队到引驾回的当天晚上，利用两个班长和4名士兵放哨之机，带了两支短枪、4支长枪，同我一道逃走，追寻参加红二十五军。天明到了子午镇，据群众讲：先一天红军将唐嗣桐枪毙在子午镇，把头割下来挂在城楼上。红军进了子午峪，又出沣峪西去。我们沿着红二十五军走的路线，尾随追赶，越追越问不到消息，一直赶到周至县以南的辛口子，红二十五军杳无踪影，不知去向。沿途国民党军队、民团如惊弓之鸟，盘查行人甚严。我们诈称是警三团先头侦察班，以蒙混过关。在追找红二十五军西去无踪之时，迫于无奈，把人和枪带到我家（长安县小新村），分散隐蔽起来。

*本文摘自解华亭1985年10月所写《我在十七路军的点滴回忆》一文。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我党在陕西省警卫团的组织与活动

汪　锋　阎揆要　雷展如

陕西省警卫团的前身是省政府卫士营。该营是由杨虎城在河南南阳创办的教导队第四队（队长张汉民，中共党员）和冯玉祥的手枪营之一部于1930年合并而成，营长张汉民。1931年，卫士营扩编为警卫团，张汉民任团长，阎揆要（中共党员）任团副。该团地下党受陕西省委直接领导。省委与张汉民的联系人，1931年春以前为李杰夫（高维汉），后为汪锋。

**（一）卫士营和警卫团地下党在西安期间的组织活动卫士营一成立，中共陕西省委即派史唯然到该部作党的联络工作。**

1931年2月（春节后），省委军委又派汪锋到卫士营干部训练队做党的工作。军委书记李杰夫写了介绍信，并向汪锋介绍了该营的情况。汪经过连长李明轩（中共党员）介绍干训队长魏书林（中共党员）。汪以学员身份作掩护，积极发展党员，开展党的工作。根据省委军委指示，在干训队成立了党的支部，汪锋为书记。到1931年四五月间，共发展党员六七十名。党的活动，一是抓经济斗争，成立了伙食委员会，使士兵每月都能分到一些用钱；二是抓政治斗争，反对打骂士兵，争取人身自由；三是抓士兵教育，学文化，讲故事，提高觉悟。

1931年底，汪锋通过史唯漂问张汉民、阎揆要进一步联系。

卫士营扩编为警卫团后，各地党组织利用各种关系向警卫团派遣党员。张汉民利用扩编机会任用一批共产党员担任各级军官，其中有阎揆要、王超北、崔启敬、白景琦、魏书林、史唯然、岳子涛，孟浩等。

1931年秋末，张汉民派阎揆要、马子敬去陕甘边三家原，给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送了一些子弹和情报。

1932年，张汉民为了同陕甘边红军进行联系，在时安和彬县成立了3

处联络站。警卫团地下党通过这些联络站，给红军送了一批武器弹药、医药器材、军用地图和望远镜；护送一批红军伤员到西安治疗；掩护上海中央局、陕西省委和红军之间来往的干部，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都到西安向省委汇报过工作。

1932 年 2 月，警卫团奉命配合彬县、旬邑、长武 3 县民团“围剿”红军陕甘游击队。张汉民即派三营七连连长李明轩向谢子长传递信息。谢根据张提供的情报，将游击队部署在有利地域待机歼敌。当警卫团先头部队进至游击队伏击地域附近时，战斗打响。李明轩按照张汉民的布置，转身回跑，边跑边喊：“红军来包围啦，快跑！”士兵不明真相，扔下武器争先后撤，红军游击队乘势追击，毙、俘警卫团和民团 500 余人，缴获武器 400 多件，战后，警卫团和游击队秘密达成协议：为了给游击队补充武器弹药，以后再战时，双方朝天放枪，警卫团佯败，将枪支给游击队丢下。

警卫团地下党设法营救同志。有一次，高岗（化名张〇〇）来西安，特务追捕了他，送到军法处，阎揆要得知后，向军法处说情，高得以释放。

1932 年 4 月，反共分子戴季陶到西安，向学生发动反共卖国演说，遭到爱国学生的强烈反对，他乘坐的汽车被学生烧毁。反动派下令镇压学生。张汉民率领警卫团人员暗中保护学生。

**（二）警卫团地下党同红四方面军的联系**

1932 年 10 月，当警卫团行军至周至时，张汉民获悉该县监狱里关押着共产党员雷展如，于是派三连连长白景琦（中共党员）到县政府把雷展如营救出来。部队到眉县祁家寨时，张汉民派人找到雷展如。张对雷说，陕西省委张秉仁（张性初）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我们派人去红四方面军联系，主要明确：今后陕西省委是同红四方面军联系，还是继续同党中央联系。这个任务交给你。雷接受任务后，化装走了 13 天，到了城固县上元观。

见到了四方面军领导（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雷展如说明前来的任务后，张国焘说：我们还准备入川，现在还没有根据地，陕西省委同红四方面军联系的问题，现在还不能定。张提出急需五万分之一的作战地

图。接着，陈昌浩单独同雷谈话，提出 3 天内解决地图的要求，雷说：3 天时间太紧，送不来。陈说：时间要抓紧。雷展如于 12 月 18 日到了汉中，见到张汉民，汇报了联系的情况。1933 年春节（1 月 26 日）后，张汉民对雷展如说：地图我已派张含辉（中共党员）给他们（红四方面军）送去了，张含辉此行还联系了警卫团拉出去同红四方面军一起干革命的问题，并且把行军路线都侦察好了。但是，红四方面军认为警卫团留在杨虎城部队里，从事秘密斗争对革命更有利，等以后实在站不住脚的时候再拉过去。之后，张汉民又派张含辉去与红四方面军联系，但第二次去后就不见回来了。

**（三）警卫团地下党在陕南时期的组织状况**

1933 年，陕南特委为加强党对警卫团的领导，决定调整领导人员，健全党组织。

张汉民根据陕南特委的指示精神，把不可靠的一、三营营长董耀先、樊亮臣改任他职，调中共党员崔启敬和阎揆要分任一、三营营长。阎揆要原任团附一职，由中共党员魏书林接任。这样，3 个营的兵权都掌握在中共党员和我党同情分子手中。

警卫团中的党组织，根据党在白区工作的规定，军官党员和士兵党员是分别编组的。全团军官党员编为 1 个支部。雷展如任书记，翟松生任组织委员兼保卫委员，李明轩任宣传委员，支部分为 5 个党小组。领导干部党小组组长雷展如，党员有张汉民、阎揆要。第 1 小组（团直和直属连队）组长刘子仪；第 2 小组（一营）组长石玉杰；第三小组（二营）组长姜汉儒；第四小组（三营）组长李明轩，党员有：王超北、史唯然、魏书林、张守祥、雷荣、苏以伟、李香亭、曹子若、阎凯、秋宏、张克、刘宗汉、崔启敬、白景琦、张玉、王静山、阎协东、石继才、岳子涛、姜旭初、赵瑶峰、张明远、贾存信、王勃生、王秉璋、冯子云、李金铎、袁致亮。军官党支部在陕南特委领导下进行工作。

士兵党员，总的负责人程天鹏。各连成立了党支部。三营七连连支部，马学文任书记，王建基（即王国）任组织委员，蒙道生任宣传委员。党员

有：张培贞、雷振汉、王进宝、崔生华、赵省三。其他单位的士兵党员有：曹克昌、李长青、龚关娃、彭定安、李恒发、王瑟琴、杨新章、魏益三、何秉德、李文芳、程家箴、张伯忍、袁士歧、黄贡垣、李在仁、王振江、张志忠、赵维栋、廖凯、金成义、靳玉林、宋伯超、李进、吴彦彪、张新德、陈金龙、亢永奎、白永元、朱之如、张子厚、李福贵、王维之、张文兴。

截止 1934 年，全团共有党员 200 多名。

**（四）警卫团地下党组织积极支援地方党和游击队**

1933 年，陕西省委杜衡叛变后，汪锋受临时省委委派，以特派员身份兼任陕南特委书记，住在勉县警卫闭团部；领导陕南的革命斗争。随后，上海中央局委派的特派员刘顺元（陕南特委书记）到后，有一段时间也住在警卫团团部进行革命活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失败后，该部共产党员周益三等 20 多人，经上海中央局介绍，由汪锋通过张汉民将他们安排在警卫团工作，经张汉民、阎揆要、王超北和武志平安排，通过了封锁线。王超北还搞到一份杨虎城、孙蔚如、蒋介石互通电报的密码，交潘自力带给红四方面军。

1933 年春，警卫团驻防城固县天明寺一带时，张汉民率部收缴了地主豪绅反动武装的枪支。驻防二里坝时，鼓楼坝的反动区长收买土匪张正万发动马儿岩事件，杀害了红二十九军领导人李艮、陈浅沦、杜滋润、孟芳洲等。事件发生后，张汉民带队将反动区长扣捕镇压，为死难烈士报了仇。

1934 年初，张汉民为了加强地方工农游击队力量，把散布在秦岭和巴山的游击三大队和游击十一大队的队员数十人集中起来，在勉县马超庙训练 20 多天，编了 3 个中队，6 个小队，配发长枪 60 支，命名为勉县垦荒游击队，由傅剑寒、王卓玉、卢黄珍等率领，开往黎坪，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积极设法同川陕苏区联络。当游击队行至元墩子时，反动民团团长王化治根据其潜伏在游击队内部的外甥的告密，事先设置了埋伏，并伪装进步，亲自出面迎接。正当游击队用饭时，民团伏兵四起，游击队除 13 人被

扣押外，大部分被害。张汉民闻讯，立即带领部队前往元墩于，以三十八军名义要回被押人员，把他们“解押”到警卫团秘密释放。同时消灭了民团，处决了王化治，为民除了害，为同志雪了恨。

陕南特委派刘明达到警卫团向张汉民传达特委要求给北山游击队解决武器弹药问题，张汉民即在洋县组织一个排进行武装演习。演习结束后，全排徒手回营房，将 30 支枪、3000 发子弹留在演习现场。让游击队将枪弹全部带走，装备了自己。警卫团的医务所常有游击队的伤病员前来医治。

**（五）警卫团地下党同红二十五军的联系**

张汉民派中共党员张明远等 2 人去红二十五军联络，双方商定了互不侵犯，并规定了联络口号：“瞄不准不打”。红二十五军提出要警卫团帮助解决电台、军用地图和医药。张汉民根据红二十五军的要求，曾写信给三营营长阎揆要，叫阎把地图交给张明远等 2 同志送给红二十五军，并派王超北去上海、西安购买电台和药物。随后，阎揆要曾两次派人给红二十五军送药，均因红二十五军驻地不定，未能送到。同年 9 月，阎揆要派汽车将电台和药物送给了陕北红军。

*本文原载《丹心素裹》本书编者有删节，并对其中个别人名作了更正。

# 回忆张汉民同志

王超北

1930 年至 1935 年张汉民任杨虎城部警卫团长，我是军需主任。我与张汉民在山西新绛（绛州）中学是同学，1921 年我转入陕西省立二中，他们在绛州上学，毕业后考入杨虎城在安边办的教导队。1930 年张汉民在南阳杨虎城部办的教导队任四队队长，杨部入陕后他任卫士营长，后改编为警卫团任团长，1935 年初升为警三旅旅长。

张汉民是中共上海中央局军委的秘密党员和陕甘特派员，化名田慎颐，搜集国民党中央军和陕军“围剿”陕甘游击队的情报以及陕西地方军阀内部矛盾的情报。警卫团和陕甘游击队在西安竹笆市同聚军衣庄、骡马市街擀毡作坊和彬县水帘洞附近建立交通联络站，运送上级党组织和警卫团给陕甘游击队的武器、医药器材、望远镜和军用地图等①。安排红军游击队伤病员在西安医疗，护送来往干部。如 1935 年初，护送上海中央局派往西北工作的张庆浮，是我派人送的。陕甘游击队的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都曾在张汉民的掩护下，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请示工作。

1932 年 4 月，国民党中央委员、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窜到西安作反共演说，学生坚决反对，反动当局下令镇压学生，张汉民利用职权派人保护学生和地下党负责人。

1935 年二三月份，张汉民在陕南派党员与红二十五军联络，红二十五军要求提供电台和医药器材。张汉民给我打电报要我去上海采购这些东西。我当时是警卫团西安留守处主任。无线电器材从上海买回来后，张汉民在陕南九间房战斗中被红二十五军俘虏，不久错当反革命误杀。买好的无线电器材后用汽车运到陕北交给了红二十五军。

注：①据李金铎回忆：“1931 年 6 月卫士营改为省政府警卫团。为了发展势力，暗地里接济刘志丹部。是年七八月间，张汉民派军需主任王超北到上海购买一批通讯器材和手枪，后在警卫团增编了一个通讯排。还有一部分枪支、通讯器材大约于农历九月间由史唯然、王丙午、好虎护送，李金平开车路经蒲城、北潼关（即铜川）入山送到旬邑刘志丹部，共送两次。”

②据阎揆要回忆送给了陕北红军。

# 苗家祥在警卫团*

牛锡群等

1928年农历三月，泾阳“交农”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当局四处搜捕起义领导人。富志学、苗家祥、姚绍方、吴世昌（均系中共党员、起义领导人）等先后被迫离开泾阳。姚绍方逃到汶南，到孙蔚如师纠察队当队长。随后姚把苗叫到汉南当了船户，隐蔽身份半年，以后苗又到吴新田部队，吴军瓦解后，于1931年苗又到张汉民警卫团当了一名副官。

1931年，苗家祥能到杨虎城部下张汉民团任副官，一是通过张汉民与苗家祥的个人关系（张是地下党员，戚在三原驻防，任炮兵营长，在云阳地区农民暴动时和苗在一起）；再就是通过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张性初介绍苗到张部队任职的。

苗到警卫团张汉民手下当副官，他的职务是上下压车。他在部队中秘密活动，串联组织人员，准备哗变。

1931年秋有一天，阎揆要、史守命、苗家祥、冯润章在一起打牌，苗说他想回泾阳开展游击活动，大家即表同意并鼓励他回泾阳开展游击队活动。实际上，是组织上（泾阳党组织）派王子常往西安动员苗率队哗变，拉队回泾阳西北塬开展游击活动的。苗在部队中串联组织人员准备哗变，不慎泄密失败。他带王福茂和侯振西（均系警卫团士兵）带了3支短枪回到西苗村。后来又来了袁宏化、刘清和、赵启民、吴世昌、符彦岭几人，建立了泾阳游击队，打击民团。

泾阳游击队时常到西兰公路上打汽车，打得汽车不敢通行。杨虎城派警卫团中校团副阎揆要带兵追打，打仗如同儿戏，双方进进退退，阎揆要同志顺便就给留下些枪枝弹药。

---

*本文据时与苗家祥同志一起战斗过的牛锡群、李平、崔怀道、苗瑛、王福茂、冯润章、商堉田等人回忆整理，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我所知道的十七路军警卫团中党的活动情况*

余洪远

1935 年打宁强，攻汉中，在军事上是声东击西，调动敌人兵力。当时没有打南郑，如果打很快就会打开的，不打的原因有两个：一个要打就和张汉民的军队打，他那里我们的党员很多，实际上是自己打自己……

那时我在川陕省委工作，并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亲眼看到陕南党和人民英勇斗争的情景。特别是杨虎城的警卫团，建有党支部和小组，团长张汉民和一批下级军官与士兵是我党地下党员，对支援根据地，做了很大努力，工作发展得相当活跃。1933 年该团奉命调往川陕交界的南郑等县驻防，利用靠近川北的有利地形，与红四方面军建立了直接联系；由警卫团负责，通过地下交通线帮红军转运物资、护送人员、供给情报。据我所知，他们经常有六七匹牲口驮运物资到镇巴的核桃树和通江两河口，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派人去接，有几次我们无牲口，他们直接送到主浴镇。

*本文据宁强县委党史办 1983 年 9 月访问记录和余洪远《永恒的怀念》一文整理。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我任陕南特委军委时与张汉民等人的来往*

刘明达

1932 年 12 月，我受陕西党团省委的派遣去陕南工作，当时红四方面军已入陕。

当时杨虎城已感到蒋介石用他的部队抗拒红四方面军的毒计（以毒攻毒）。他为了保存实力，想和四方面军建立互不侵犯的关系。张汉民当时任陕西省政府警卫团团长。该团驻防巴山前线，[张]系共产党地下党员，对相识的老共产党员还交往密切。当时有一位张含辉（过去在陕西省是有名的共产党员）住张汉民部为宾客，常为张汉民办理机要事件。张汉民拿出杨虎城的密令，派他向四方面军说明建立互不侵犯的心意，含辉即向陕南特委传达。在行进过程中，张汉民命对来往四川、陕西边界有关革命人士负责保护，货物进出边界不加阻挡，这对川陕苏维埃边区的巩固是起了相当作用的。

陕西党团省委为加强汉南工作的开展和领导，先后抽调去的干部据我所知的有：孟芳洲（化名老侯）、杨珊（绰号山羊）、李艮、老马（陕北人，闻本姓杜）、杨淮三（杨大个子）、王榜、杨有智、李楷、老吕[①]（河南人）、小张（河北人）、张明远（张黑子）等。

对张汉民的关系表面是采取外交关系，实际上为组织关系。我是作为红四方面军代表与他作为杨虎城的代表的关系互相来往。保持每月总有一二次的联系。这时张汉民部由南郑牟家坝一带移住洋县，曾由他派副官雷茂于夜间送出步枪 20 支、子弹 2000 发，每月还送给党的经费 50 至 100 元。不久张汉民部移住南郑十八里铺时，又赠送手枪 4 支、子弹 500 发，经费

还是经常送的。以后由老吕代替我与张汉民来往。

注：①老吕，即吕雪影，继刘明达任陕南特委军委书记。

*本文摘自刘明达 1959 年所写《回忆陕南军事情况》一文。标题为丰书编者所加。

# 陕 南 工 作 见 闻

陈子敬

1933 年春，张含辉住在南郑县，韩兆鹗当县长，含辉与韩关系好。我在南郑见过含辉，他说他曾去川北与红四方面军进行联络，化装成四川商人，送棉花、药品 12 个担子。同年夏牺牲。

张汉民当时任杨虎城部警卫团长，先后驻南郑、汉中、勉县等地，阎揆要、魏书林先后任团副，魏书林是西安市人，省立三中学生，与张含辉是同班同学。刘光智任副官处主任，后任新兵营长，是共产党员。王超北是军需处主任，雷展如是副官，史唯然是军械官，张性初在汉民部办报，崔启敬是连长，后为营长，以上同志均系党员。

1933 年进入冬季，中央派刘顺元同志和我一同来陕西。转到了勉县武侯祠张汉民处，与史唯然、魏书林、阎搂要、刘光智、雷茂等人见面，刘顺元派我为宁强、勉县两县的游队政治指导员，负责搞武装，与史唯然接头。

# 我在警卫团的工作

侯书铭

我是1932年10月前后在张汉民团医务所当护士（看护员）的，从1932年11月跟随警卫团从西安出发，一直到1935年2月扩编为警备三旅时，我留在第九团（阎揆要任团长）担任司药工作。

1933年警卫团在勉县诸葛庙时，张汉民同志为了活跃部队文化生活和提高士兵文化水平，除办了“通讯小报”外，还购置了大量进步文艺小说和文化书籍，成立了图书馆，供全团同志借阅。我自己就在勉县驻防时期借阅过《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雷峰塔的倒塌》（即大众哲学）和《西部前线平静无事》等书，使我沉默的思想得到了雨露的滋润，精神上有了营养和寄托。

当时在警卫团除唱《国际歌》、《士兵歌》外，还唱《士兵平变歌》。

我记得1933年警卫团在勉县驻防时，团部住在诸葛庙，医务所住在勉县城内。当时雷展如是通讯排长，介绍我和通讯排李永芳同志在一起搞兵运工作。之后又随阎揆要三营，崔启敬、白景琦一营和孟浩（孟慎言）补充二连在宁强驻防一年多，又和王国（王育华）、杨信（刘家驹）、田子玉等同志在一起，那时我们就歌唱这些革命歌曲。

1934年冬蒋介石迫杨剿共，杨为保存实力，采取了应付的方针。同年杨虎城到汉中视察部队，杨回西安时指定张汉民的警卫团担任保卫。该团为中共地下党所掌握的部队，团、营、连长不少人都是共产党员。大约12月初，该团由汉中上元观出发随杨虎城途经洋县、宁陕、镇安、山阳等地到了商县。不久之后，即1935年春节期间，该团路过蓝田牧护关时，红二十五军由湖北又进入陕南，此时改由教导营接杨回西安。警卫团到了镇安县休整期间，杨虎城来电通知扩编警卫团为“陕西警备第三旅”，张汉民

同志任旅长，所辖七、八、九 3 个团，七团团长曹伯真，八团在西安尚未归属建制，原警卫团改为第九团，阎揆要同志任团长（原系三营营长），魏书林同志任副团长。团医务所主任何秦洲代理，军医温建新（后被红二十五军俘虏杀害），我任司药，魏含英同志担任护士班长。

警卫团在镇安改变为旅不久，奉命追随红二十五军，但张汉民同志率七、九两个团，采取了“和平尾随”的方针，红二十五军前进一步，该旅跟上前进一步，红二十五军驻在甲地，该旅就驻在乙地。为了协调警三旅与红二十五军的关系，张汉民同志派岳之涛等同志和红二十五军联系，订立了“互不侵犯”协议。我记得是 1935 年 3 月 19 日（新历是 4 月 20 日前后）[①]，红二十五军由柞水县之曹家坪进驻葛牌镇。张汉民同志认为已和红二十五军有了联系[②]，就率警三旅于 19 日早照常由曹家坪向九间房推进。行军序列是九团在前，旅部在中，七团在后。天还下着雨，道路泥泞，行程仅 40 华里，整整走了 1 天。大约傍晚四五点钟左右，先头部队已到达目的地——九间房，大部队还未出山，两面山上，阴云密布，万万没想到不幸的事件发生了。原来红二十五军违约，在九间房山上设伏向警三旅发起攻势，枪声四起，两面夹击。警三旅根本没有同红二十五军打仗的打算，大约两小时就结束了战斗，所以该旅伤亡被俘过半，旅长张汉民同志亦被俘。由于“左倾”路线的危害，红二十五军不承认张汉民同志是共产党员，更不承认警三旅有党的地下组织，是党所掌握的部队，所以叫所有共产党员都站出来，凡是站出来的共产党员统统被杀害，至少 100 多人。

“九间房事件”未发生前，张汉民、阎揆要、张明远等领导同志，为了有计划有目的地补充和接济红二十五军，曾几次派岳之涛、张明远等同志前往红二十五军联系协商有关问题，红二十五军提出要电台、药品、军用地图等，当时杨虎城的参谋长韩威西是个坏蛋，专门派了一个电台到警三旅监视行动，并由西安经常来电催问为什么不打红二十五军？就这样张汉民同志仍采取只是尾随，不愿打仗的方针。谁知红二十五军对此不谅解，错杀了张汉民、魏书林等同志约 100 多位共产党员，令人万分痛心。

九间房的损失，张汉民等的被残害，完全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所致，我当时在警三旅第九团（阎揆要）担任司药，因负责药品运输，在部队后边跟着，所以才幸免。

注：①确切时间是 1935 年 4 月 9 日。

②据魏含英回忆，派去与红二十五军联络的是马志远（蓝田人），被红二十五军扣杀。张明远是战斗结束后去红二十五军的，也被扣杀。崔启敬、白景琦两人是在战场上负重伤后牺牲的。

# 张汉民营救交通员*

尹芳垣

1933 年初，红四方面军入川后，我负川汉通讯联络站责任，地点仍在城固县二里观音庵。

1934 年 5 月端阳节发生了一次不测事故。其原因是由陕南特委派来一同志去牟家坝，逢集，该同志未到观音庵学校却去赶集，走到土地庙被一民团哨兵挡住，将身上所带的介绍信检查出来，连人带信送给团长段明元。这天深夜，段明元一面派人到观音庵捕人，一面在二里坝学校捉人，检查东西。我得到王子勤的信逃走了。当下逮去校长刘锐铎、教员冯聘三，另有周洪元、袁列清。王子勤一面假装派人到观音庵捉我们的同志，一方面又随即派人到牟家坝给张汉民报告情况。张得信后即亲自到汉中找孙蔚如，袁、刘 2 人被放回。自这次事故发生后，交通联络站的工作中断。

*本文摘自尹芳垣《20 年前参加并产党地下组织经过及活动情况的回忆》一文。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警卫团支援游击队*

杜耀亭　佘定周　刘天祥

1933 年春，张汉民驻防洋县，给我游击队补充长枪 10 支，先埋在洋县河坝，后由李含秀、赵冠群同志取回。

1933 年四五月间，我第三游击大队队长杨维三、小李由北山毕家河到洋县谢孙桥西头某同志家中，夜间从河坝沙子滩拿出来十几支长枪，经过我们擦洗后便出发。走到山间就天明了.不能再走，在山沟里一家茅屋里等到天黑才动身运到北山去。5 月，十七路军警卫团团长张汉民给陕南军委 30 多支枪，每支枪 50 多发子弹、手榴弹二三十[颗]，由警卫团地下党支部雷茂（展如）交给省委派汉中陕南特委的特派员刘明达同志，转交给陕南特委，随后这批枪支弹药在洋县谢树镇直接交给第三游击大队。

1933 年上半年，我第三游击大队领导同志在文庙里开会，我和老黄、老何、老汤（汤占奎）在外守卫。会后，杨维三分配刘天祥和老黄、老何、老徐到西门外柏乡街西头店里住下，说是接受警卫团给我们的枪，第三天杨维三等人从勉县警卫团把枪由汉江南运送汉中来，有长枪 3 条、马枪 2 条。当晚，我同杨维三、老何、老徐、老黄等人把枪从郑家营运到张宅，沿兆山到天台的朱沙沟、黄洞垭。

1933 年 6 月，张汉民驻防勉县长林镇，经特委交涉，该团又给我们补充长枪 5 支，由杨维三、刘天祥取回。

是月，杨维三和张申同志又从警卫团张汉民处取回长枪 14 支，送天台山交给三大队。

1933 年冬，我游击第三大队由北山撤出，在勉县进行整军，张汉民又给补充长枪 20 支。

---

*本文据汉中地委党史办对佘定周、刘天祥的访问记录和杜耀亭 1989 午 8 月 25 日所写《中井陕南特委建军情况》一文整理。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忆在警卫团的几件事

石　林

1933 年张汉民警卫团在勉县时，张团长派补充二连连长孟审言（关中人）一连人驻黄沙西来寺（今黄沙中学）。警卫团的雷茂、张刚（军械官）、汪锋（副官）经常来此活动。雷排长还协助黄沙地下党枪杀魏占之于黄沙西中河滩坝，并给长枪 18 支，支援第十游击队。

1933 年冬月 27 日，第三游击大队在元墩子战役失败后，张汉民派了 1 个营的人住喇家宅，以援助民团为名，向王化治（元墩子民团团长）、魏占海、（阜川民团）要人，令其交出俘虏 20 余人，带回团部管押；本县人释放回家，外籍人安排在武侯祠士兵澡堂服务。

我是 1934 年 2 月参加警卫团，在一营二连三排九班当兵，1935 年离开警卫团。

1934 年春，张汉民团长邀请勉县伪县长宁静远，张带精干士兵 10 多人，身穿便服，腰藏武器，潜于喇家宅附近，以县长传见团总为名，将民团团长王化治抓获，又以王明守团防，暗为土匪的罪名，将其处死。

那时团内还设有图书馆，由张刚负责。馆内进步刊物不少，有唯物史观、唯物论、白话书信、少年漂泊者、北方快览等。书籍由馆员李文芳（共产党员）管理，专供给我们青年党员阅读。

# 我所知道的警卫团中党团组织情况

张毅生

1933 年底，我从南（郑）城（固）洋（县）边区红二十九军转移下来，经汉中特委介绍到警卫团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该团地下党建立的有一个支部，下面有党的小组和团的小组，是按连划分的，究竟有若干小组我不知道，当时关系很严密，坚决不能发生横的关系，否则以纪律论处。

当时地下党的领导人有张汉民（晋南稷县人，团长）、阎揆要（三营营长，陕北佳县人）、张刚（在该团没有公开的职务）、雷茂（陕西朝邑人，通讯排长）、张明远（公开的职务回忆不起来了），此外，还有张炳仁和魏书林（张解放后在陕西省人委会办公厅工作）。在各连、排的士兵当中，党团员很多。当时该团公开的建立有学习小组，以排或者以班为单位，不定期的召开生活会议，在地下党的支持下，士兵们办的有生活日报，党利用这些公开的组织形式对士兵进行思想教育，并物色觉悟高、进步快而政治条件好的士兵来壮大自己的组织。

当时极端反动的胡宗南中央第一师，对该团监视得很厉害，因此，该团在一个时期确有举行起义而拉入巴山建立红色根据地的计划，但因条件还不够成熟，又搁着下来。在 1934 年的下半年，该团奉命调防城固上元观开展冬季大练兵；这时，从地理上来看，从客观情况上说，整个处于其他反动军队的包围之中，便失去了兵变的机会。

*本文据汉中地委党史办访问记录整理。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办墙报、开民主会、杀恶霸

王　涛

我是1934年2月在宁强参加十七路军警卫团的，在三营补充三连。

驻防褒城县新集镇时，三连上士文书郭寿昌要我办墙报，每周出一期，一大张有光纸，我负责编写一篇文章外，还发动连里的士兵们写。内容有时事报道、士兵生活，还从团部办的油印小报《团内通讯》上转抄一部分。另外，我也利用国民党的报纸上的新闻，把它颠倒过来，他说红军打了败仗，捏造若干伤亡数字，我就写他们的军队打了败仗，伤亡了若干数字；它说红军被击溃逃窜，我就写安全转移，等等。总之，把它的假话反过来，常常能报导出真实新闻。墙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团部的油印小报办得很好，在反映民主生活方面反映很好。如有一期，刊登了步兵连连长吴伯畅打了他的勤务兵的文章，各连都在团部的油印小报上写文事批评，我们连长翟锋生也写过一篇批评文章，题目叫《再轰吴伯畅一炮》。

有一次营部召开经济会议，要各连派代表参加，连长要我去。会是在营长的办公室开，由阎挨要营长亲自主持，他首先发言，说营里的商业运输赚了钱，怎样处理请大家来决定，各连代表相继发言，中心意思都是说战士们生活很苦，应该发给战士们。最后，营长做结论说：我原来的意见是想集中搞点福利，现在大家都同意发给士兵，那就按大家意见分给士兵。这会开得简短明确，充分发扬了民主，我是第一次参加，感到很愉快。

新集镇有个恶霸大地主叫丁扬武，曾杀害过数名地下党员，平时欺压群众，称霸一方，霸占良田，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从来没人敢惹他。营里了解这些情况后，发动群众到营里告他，遂捉起来，一审讯，供认不讳，判处死刑。丁家要出大量的钱、烟土挽他一条狗命，营里不同意，丁家又

去汉中警备部告状。营里当即召开民众大会，经受害群众诉苦揭发后，即杀民示众，民众拍手快，大张了革命气势。先斩后奏，等到汉中警备司令部来文要人时，头已落地，也无可奈何。

# 回忆黎坪垦荒游击队

曾继全

1934 年旧历四月，警卫团在勉县招了 60 多人，编了 3 个班，组织了游击队；当时还有宁强黎光昌领导的约 50 多个人，合编为 1 个中队，2 个分队，6 个班。黎光昌为中队长，郭恩泽为副队长，在武侯祠警卫团驻地以东的马超庙训练了 1 个月，每人都配有 1 条枪。我们这个游击队到黎坪没有开荒，总下雨。警卫团派来的有个连副刘〇〇，排长张占鳌（系地下党员）对我们说：“名义上我们是来开荒、开磺矿，实际上我们是来与四川红军搞联系，迎接红军的。”

另外在黎坪还开了个合作社，其他也没有什么活动，等到农历九十月间，红军没来，又调到宁强城内等红军，还是没来，冬月又调到城固的上元观，与警卫团编了 1 个新兵连，郭恩泽、黎光昌为连长。当时部队里的党组织，仍派原来的地下党员回原地进行地下工作，其余的人随张汉民警卫团走了。

# 警卫团中的“红军之友社”

王维之　余晴初等

汉中地区的“红军之友社”（简称红友社），是中共陕南特委为了发动和组织群众，宣传红军、迎接红军、支援红军、打击敌人而建立的党的一个秘密的外围组织。

1933 年下半年，设立陕南红友社总社。

张汉民任团长的警卫团党支部动员兵士中的红友社社员支援红军游击队枪支弹药。

警卫团在陕北驻防时，就和刘志丹有关系，当时省政府叫他团去剿打刘志丹的游击队时，他们事先就给送消息，临阵双方都是朝天放枪，结果该团佯败，将枪支丢给游击队，回去另给补充。他们自称为刘志丹的运输队。该团在陕南驻防时，三十八军将他们放在宁强、略阳、勉县一带与川北红四方面军接界，作为陕南防共的前哨。但该团为时受陕南特委军委直接领导，又作了联共拥共的堡垒。当时陕南大部分进步青年在社会上站不住脚的，都到该团去当兵作掩护，从事军运工作。在该团的工作可说是半公开的，各连派进去的都有人。当时在里面工作的是组织经济委员会，改善士兵至活和给一般战士教文化，教进步歌，如《国际歌》、《士兵歌》。启发了他们的无产阶级觉悟和宣传红军的好处。那里的士兵们也不把红军当敌人，并经常说他们在陕北给刘志丹当运输队的故事。该团团部我党地下工作的负责人是通讯排长雷茂（雷展如），当时派进该丙工作的据现在知道的有李文芳、王国纯、张文兴、阎崇信、袁士奇、王萱、曹克昌（子若）等人。各连都有党小组；该团的大部分营连排长也都是党员同志，它给我党地下工作不少便利和协助，如第三游击队成立时，由杨维三从该团运去 10 余支枪。至观音山又由该团运至洋县谢村镇 10 支枪，在何家崖成

立西北抗日义勇军时，帮助了 20 支枪。第十游击队在黄沙成立时也给了 20 支枪，并派雷茂等同志去协助处理叛徒魏占之。1933 年冬，元墩子战役失败后将肢俘的人员（游击队员）要到该团以关押为名，先后将王国纯等同志秘密释放。以后又将民团头子借故处决。1934 年特委席中瑶、王克明等同志在该团防区内勉县菜园子等地住机关，并由特委老关（即特委书记张德生）同志在勉县黄沙小学菜园子办了几期党员训练班，为我党培训了大批干部，充实了党的力量。

*本文据汉中地委党史办访问记录整理。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谈九间房事件*

程子华

九间房战斗是吴焕先（红二十五军政委）同志指挥的，我在此之前负重伤，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和我都坐着担架。

杀害张汉民是错误的，红二十五军战史中作了自我批评。七大时已追认张汉民同志为烈士，张汉民同志的事迹应该宣传，为他恢复名誉。当时误杀了许多党员，问一下阎揆要同志，调查清楚，应落实政策，恢复名誉，他们有后代应给予照顾。

有一个叫燕廷标的同志是山西洪洞县人，在太原国民师范比我早半年，1925 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入党早，后去杨虎城部作兵运工作，结果也被杀了，我也不知道。抗日时期在延安，王世英说，怎么搞的把燕廷标杀了？我说我不知道。当时很“左”，误杀了不少共产党员。这是沉痛的教训。

*本文系 1984 年 4 月 11 日访问程子华记录。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关于九间房事件

戴季英

1934 年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军长吴焕先，政委戴季英、副军长徐海东。是年秋，上海中央局派程子华到红二十五军任军长，并传达中央指示：部队转移，吴焕先改任政委，徐海东仍为副军长，戴季英改任政治部主任，郑位三为政治部副主任。1934 年冬，程子华在豫陕交界处的一次战斗中负伤，鄂豫皖省委决定戴季英任参谋长代行军长事。郑位三接任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五军入陕后，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省委书记徐宝珊，常务委员有程子华、吴焕先、戴季英，委员徐海东、郑位三等。1935 年春，红二十五军与杨虎城部警三旅在九间房打仗是吴焕先和戴季英指挥的。当时旅长张汉民率两个团追我们追得太紧，我们在九间房设伏，全歼张旅，张汉民被俘，1 个多月后处决，具体审问由政治部政务科（又称保卫部门）科长朱仰辛负责。处决张汉民是经省委讨论决定的。

鄂豫陕省委对张汉民部不信任。张汉民追红二十五军追得厉害，俘虏了张汉民后，程子华、戴季英、吴焕先和政务科长朱仰辛都审问过张汉民。张说大革命时他与陕西省委党组织负责人魏野畴同志有关系。九间房战斗打得厉害，我们伤亡不大。对俘虏的张汉民部军官杀了 17 个，是省委在九间房战斗后决定的。张汉民是比较反动的，我们审问六七天后才把一批俘虏的军官处决。处决这批人是由军部保卫部门具体负责，省委讨论决定的，没有给中央报告。张汉民处决晚，当时是分批分期处决的。

张汉民部事先没有派人与红二十五军联系，也没有送过子弹、地图和医疗品，更没有订立什么联络信号互不侵犯条约。

汪锋到红二十五军所在地杨家斜是党的关系，省委书记徐宝珊同汪谈话后说汪是侦探，张汉民是反动分子，把汪扣留起来，张汉民部派 2 人来

找汪锋也没让回去。

消灭张汉民大部后，徐海东带 1 个排参战，张汉民指挥说打打，没打中。徐海东上去把张汉民抓到，打了几个耳光。问你是什么人？张汉民说我是旅长。徐海东让士兵把他捆起来。

在九间房张汉民率 2 个团与红二十五军打仗，打得很厉害，红二十五军攻到张汉民的旅部，张汉民拿着手提机关枪还打，旅部被攻下来后，张汉民被俘，捆起来

后才说是张汉民。省委书记徐宝珊、军长程子华找张汉民谈话，徐宝珊提出张汉民反动要枪毙，后由保卫部部长（又称政务科长）朱仰辛监督用刀杀掉。

当时听汪锋说张汉民部有党组织，张汉民是党员。红二十五军负责人和省委书记徐宝珊同汪锋谈话后，把汪扣起来，说张汉民部党组织是假的，张汉民是叛徒。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出的通讯（不定期）对处决张汉民有报道，说张汉民是叛徒、军阀。朱仰辛负责调查和审问，而后向省委汇报，直接领导的是徐宝珊，省委开会讨论处决的。

延安整风后，张闻天、王首道说红二十五军在陕南杀张汉民是“左”倾。

*本文系 1981 年 8 月、1983 年 5 月访问戴季英记录。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张汉民同志是被误杀的*

郭述申

1935年春九间房啤斗前后，我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副主任，后是鄂豫陕省委委员，在处理张汉民的问题上我是局外人。我听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同志说：张汉民是杨虎城部警三旅旅长，是共产党员，曾派人与红二十五军联系，送过地图和情报；并说为应付杨虎城的命令，不得不追击红二十五军，只好你们走一段我们追一段。最后张汉民旅追我们时，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人认为张汉民是法西斯，决定在九间房设伏，消灭张部。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军长程子华（负伤）、副军长徐海东（负伤）、参谋长戴季英、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九间房战斗是吴焕先、戴季英指挥的。张汉民部有作战能力，打得很坚决。我们认为张汉民很反动，张汉民等人被俘后怎么审问的我不清楚。听说抓到很多俘虏，是共产党员站出来，党员不少，站出来的党员都被杀掉了，站出来多少党员我不知道。把张汉民捆起来和审问的内容我也不知道，戴季英、吴焕先等人参加审问了。

汪锋去红二十五军我知道，郑位三同志当时是担任军政治部主任，但实际负责陕南特委的工作。我虽是政治部副主任，但政务科长朱仰辛不听我指挥，而听参谋长戴季英的指挥。他把汪锋也扣起来，在政务科保卫队管押。我没审问过汪锋，也不知道他是上海中央局派回陕西工作的党员干部。

红二十五家在九间房战斗前作过动员，说张汉民是法西斯、是军阀。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办的小报，登过战斗消息，全国解放后，我和程子华、徐海东、戴季英谈过杀张汉民是不对的，不应杀俘虏，何况张汉民是共产党员。

*本文系1982年8月访问郭述申记录。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沉 痛 的 教 训

郑位三

红二十五军在陕南和地方党有过联系，我们收到的中央12月会议文件和《八一宣言》，就是陕南地下党搞来的。红二十五军在陕南也有一些教训。那时地下党除有中央介绍者外，对地下党的帮助差一些，有时只是谈一下，应付一下。有两件事是搞错了。一件是张汉民和20多名党员被杀掉，这是个错误。当时我没有在军队，后来听到事情发生的经过。张汉民的警备旅和我们接近时，听说张是共产党员，部队里也有很多共产党员，但我们对他们不太信任，有怀疑，这是出于警惕、是对的。因此，我们就给他们出难题，如向他们要机枪零件、情报、作战地图，并要求他们的部队和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要的东西有些没送来，这就更怀疑，再加上我们指挥他的军事行动没做到，逼我们紧了一些，这样我们就在九间房下决心打，因为他采取了使我们为难的态度。张汉民还是徐海东同志捉住的。战斗结束，张碰见徐海东说：你是徐海东同志？我是张汉民。这样被捉住的。张汉民为了证明他是共产党员，叫出20多名被俘的党员来。我们认为他是冒充共产党员，结果杀掉了。后汪锋同志一再解释，我们对汪也怀疑，一直把他带到陕北，才搞清楚。

*本文节自《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与发展》一书所载郑位三《红军在陕南》一文。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忆九间房事件

彭　辉

我原名彭定安，陕南人，1933 年 1 月入党。我当时是警卫团的战士，在通讯排当传令兵，排长雷茂兼团部副官。只知道张汉民团长、阎揆要（三营营长）是共产党员，当时党组织在官兵中分别活动，在士兵当中通过交朋友发展党员。

张汉民被提升为旅长后，曹伯珍团党组织传达张汉民脚踏两只船，升了官要防止他叛变革命。张明远、马志远（蓝田人）常与红二十五军联络，两年没打过仗，张汉民当时信任红二十五军，支持红军，派人送子弹和其他东西。红军开始相信张汉民，后来发生怀疑，因追得太紧。在镇安驻防时，马志远来往联络红军。党组织告诉我，如果同红军打仗，“枪朝天，打坏蛋”。到葛牌镇红军设伏，张汉民麻痹大意，还把马让给一位掉队的红军女战士（安徽人）骑，边说边笑，部队吊儿郎当。到九间房架枪搞饭吃，忽然四面八方打起来，前边的部队未打，后边的部队打了两个多小时，枪朝天，打坏蛋，警三旅大败，阎揆要部大部被歼，张汉民被俘。我排党员张明远、马志远、张龙光、阎凯、官娃（给雷茂当通讯员，只有十几岁）、曹子约（洋县人）、王必琴（小学生）、刘长顺等过到红二十五军去。谁料到红二十五军一审问他们，他们说是共产党员，后均被杀害，不是用刀杀就是活埋了。党外士兵被俘后每人发 3 元路费可回家。张汉民、崔启敬、魏书林、白景琦也被红二十五军杀害了。汪锋去与红二十五军交涉也被扣起来。红二十五军对我们地下党根本不信任。

# 国民党蓝田县长郝兆先
# 给邵力子的报告

1935 年 4 月 12 日

主座钧鉴。谨禀者，咋禀计达，兹将匪势增大情形如录次：

一、 据曹团贾军需来云：“9 日上午 9 时，在九间房山沟，冒雨搜索前进。张旅长带一团在前，曹团在后。忽然后方遭匪抄击，全部向山上乱冲，未及半山，上面手榴弹乱掷，大呼缴械发钱。全军两千余人，逃脱者不及十分之一，所有扣枪，迫炮完全为匪所得。张旅长被俘，曹团长带伤失踪，一营长阵亡，二营长被俘，三营长逃脱，杨团副阵亡。”并谓：“匪有 6000 余人。”（按：必系胁从民众，主力不过 2000。）即曹团逃来之三营营副张景汉、九连连长罗寿山，所说大致相同。无线电台虽未证实损失，然据我宋副总团长云：“绥署 9 日以后，未接张旅电报。”又据我邓家岭团队报告：“匪方放出被俘士兵已有四五百人，由焦岱进省。”

二、 据探报：匪将我长房、永山沟一带粮食猪牛掳去，有向山阳、商县窜扰之势。但大本营仍在葛牌镇一带工作，究竟其势力扩充、编制就绪之后企图如何？尚难判断。我县惟有修城筑碉以防堵耳。

谨肃禀闻。恭叩

崇　安

职 郝兆先 谨上

4.12.夜

*本文据陕西省档案馆原件刊印。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再：被俘士兵系汰弱留强，机枪、迫炮手仍留利用。

1935 年 4 月 13 日

主座钧鉴。谨禀者，前、昨两函计达。连日山内出来伤兵、徒手兵络绎不绝。以葛牌镇，九间房一带山岭重叠，易守难攻，我军奋勇有余、顾虑不足，以致损失太大。顷据探报：匪竟以葛牌镇为根据地，分派便衣游击队三四百名，携带短枪，向外发展，掠粮练兵。今日县城已到大批匪探，现已拿获 9 名，正在研（严）讯中。惟民众不能镇静，富有之家迁眷晋省。职抱定城亡与亡决心，正在设法劝阻。以有驻军两营，各团队仍守邓家岭一带（赤盘岭后沟道多已放弃）、辋川、阎上、武家山等处，如匪大部来攻，再退城区。似此情形，恐匪知我省垣军叭有限，北窜以示恐怖，亦未可知。驻军官长夜均不寐。已不许大批溃兵进城矣。职常上城监修工程，尚可保守；所虑者，器械悬殊耳。为速剿计，恐非用机投弹轰炸、不易攻动匪巢。职非故为张大之词，以其实力，有各种新式枪械（此次所得在内）4000 以上也。蓝田人晋省渐多。溃兵到省亦多，想谣言或不能免。谨禀恭叩。

崇安

职郝兆先谨上

4.13.午

又，据探报：匪骑此次伏击之马 30 余匹；向窄峪各处放哨，印沟口一带有匪出没。宋副总团长已拟令将团队防线缩短。

1935 年 4 月 14 日

主座钧鉴。谨禀者，昨今两日，伤兵到县，约 60 余名，今早已运走丨2 轿车，尚有 20 余名无车运省。已电准，绥署来汽车两辆，以天雨尚未到达.伤兵饮食，已设法供给。因彼等极力宣传匪方如何优待，而且每名发洋 3 元，此种动摇军心策略，详电绥署特别注意矣。今日曾与伤溃各兵作长时间之谈话，得到详情如左：

（一）8 日午间，张旅长冒雨向九间房进剿，土人均系匪探，诱我深入，谓匪在葛牌镇。下午 1 时到山窝时，后面打枪，包围而来。张旅长下令向前猛冲，上至半山，榴弹齐下，自动枪、机关枪扫来，我方士兵有脱衣裸

体与之死拼者，匪亦死伤 200 以上。我军除阵亡负伤不能作战外，余均弹尽缴枪。张旅长以无弹不足自杀，就缚后即自称旅长，押到葛牌镇，凡部下士兵前往探望者均被押。现向张索 5 架无线电饶命。曹团长系受伤后自戕，戕其护兵云，到省后再设法运尸。杨团副及一、二两营长均阵亡。西安自造自动枪多打炸，不堪用。

（二）匪得枪计 1800 余枝，机枪、自动枪、手提式、匣子枪共两三百架，并将所得电话于 9、10 两日以葛牌镇为军部，架至九间房、秦岭口各处通话。无线电虽有汽油，机件不完，尚难架用以收我方密码。凡电话兵、无线电员、军医人员均不放回，士兵同化愿干者仅 20 余人，余均机枪兵，留为彼用（内多轻机枪，外国自动枪，均系东边所得，云为张学良部所有物）。

（三）匪之实力，有老红军干部千余人，少年先锋队千余名，妇女百名不到，专司看护伤兵侦探等事。另有裁缝多名，有机器作衣，服装甚杂；帽为八角列宁式，此与官兵之区别。另有乌合新红军两三千人，我方伤溃各兵最恨新红军，因老红军只要彼等身上之擦枪油、手枪电，而新红军则必作两次搜查，钱须交出，否则要命。缴械后由沩二十五军正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集合讲话，大意为：拼命是你们穷弟兄，升官发财的是旅、团、营长，我们[的]敌人，一是邵，二是杨虎城，三是冯钦哉，四是孙蔚如，五是张汉民。职问，邵非军官，何以为敌？谓系政治关系。另呼打倒种种口号 2 小时。次日掠猪四五十头，犒食大众，每日 3 餐。对伤兵早晚均讲话，彼等住有 3 天，共听讲七八次云。

（四）南山多松林，进攻不易，加以雨雾，最易中计。彼等谓非用飞机轰炸侦察，甚难制胜。若专猛攻，徒自损失而增敌之实力。职以为仍须以大部队包围封锁，徐图剿灭，勿轻攻轻追为是。昨获侦探 9 名，取供甚难，决不轻释。攻城不怕，但怕奸细入内作应，故特别防止土共暴动。

（五）职县团队，现均精诚团结，一致御匪。郑效仁日内进城与王延年见面和好，差堪告慰。谨禀恭叩。

崇安。

职郝兆先谨上

4.14.

据探报：匪有伤兵100余，以草坪山村小学为医院，其军部帆布架担计80余，且有随军学校。

# 回忆周恩来的一次重要谈话*

汪　锋　阎揆要

1936 年 9 月，党中央调派汪锋赴西北军（即十七路军）做党的秘密工作。行前，周恩来就如何在十七路军进行党的秘密工作同汪锋谈了一次话。谈话时，李克农在座。汪锋抵达西安后，立即将周恩来的谈话向有关同志作了传达。这个书面材料，是根据江绛和当时听过传达的阎揆要、杨信、王写钊、王国等同志于 1985 年 4 月 8 日共同回忆的情况整理而成的。

党中央决定派你去西安地区，开展十七路军中党的工作，同时也要把地方党中没有问题的党员的组织关系恢复起来。由于杜衡叛变，关中地方党破坏严重，但在十七路军工作的秘密党员没有暴露，一直保存了下来。这是一些非常宝贵的老党员。如何在十七路军以及在具有爱国思想的国民党军队中进行工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应该把我们党过去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工作，好好总结一下，以利于今后在国民党领导的几百万军队中开展工作。我们过去在敌军工作中总是认为士兵出身苦，受压迫，最革命，强调军官生活富裕，容易动摇，因而一直重视在士兵中开展工作而轻视做军官的工作。往往有了几个党员，就搞瓦解，发动起义，结果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了。今后绝不能这样搞了。要注意保存现有秘密党的力量，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搞起义。就是说在国民党的非嫡系军队里，只有到了国民党蒋介石要消灭这个部队，使这个部队无立锥之地的时候，才有起义的条件。十七路军的阎揆要团，如果有一天被迫打起红旗起义了，就把这个部队编成一个军，阎揆要任司令员，你任政委。这是党中央决定、认可的，到时可以不必再向中央请示了。必须注意，如果阎团起义了，活动地区要尽可能地靠近苏区，这样便于同红军配合行动。

抗日要联合多数。凡是同我党素有来往的国民党部队，我们就不在其

中搞起义、搞兵变、搞分裂、搞瓦解，而要做好团结的工作。工作重点要放在上层，做官长的工作。从全国范围来总结党在国民党军队中工作的经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哪个部队的高级带兵官有党员，那个部队的下级军官、士兵中秘密党员就站得住脚，就能存在下来，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否则就站不住，甚至会遭受破坏。阎揆要团，如果没有他这个团长，我们在这个团的秘密党员能不能保存到现在呢？我们党的干部在这个团作军官、文书、教员，如果没有阎揆要的掩护，能不能保持到现在呢？答案是很明显的。过去，我们对在国民党领导的部队中如何进行党的秘密工作，如何保存和发展党的组织，缺乏具体分析，总是一味组织士兵搞兵变，这是“左”的错误的作法，其结果是建立不起党的组织的。现在，必须把这种“左”的错误的作法彻底改变过来。必须按照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办事，要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包括高级将领，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坚决改变那种一有党员就搞兵变的错误作法；还要改变对军官，特别是对高级军官不信任、动辄就鼓动士兵起来斗争的错误作法。必须大力进行艰苦细致的重新教育党员的工作。这是我们党对国民党军队工作的一次极大的转变，不管有多大困难，也必须转变过来。

要广交朋友，放手做官兵的工作。对一些思想落后的人，不能叫人家“反动派”。有些人由于对我们党不了解，反对共产党，但他们中绝大多数还是爱国抗日的，仍然是可以争取的。

要广泛发展。只掌握一个团不行，要以阎揆要团为中心，派党员到友邻部队当兵、当官长，开展工作，把党组织建立起来。对杨虎城的部队，只能搞团结，不能搞分裂，更不能拉出队伍合到阎团来，我们绝不背着杨虎城把他的队伍拉出来扩大红军。我们共产党人吃国民党的饭，拿国民党的钱，办共产党的事，有什么不好？我们要学得聪明点。你们也不要自恃清高，太艰苦了。古人说：“千里做官，为了吃穿”。我们革命工作也需要活动经费，该拿的钱还是要拿，拿来作为革命的活动经费，有什么不好呢？绝不能因过分清廉引起怀疑而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

要举办军事学校、训练班，不断提高官兵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把西北军巩固起来。

对马家，包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的部队，我们也要做工作。过去我们的作法不对，不懂得交朋友，不会做工作。尽管马家是地主封建势力，只要我们做好工作，他们当中也会有人变的。当然我们还要做好东北军的工作，不能使他们感到无家可归走投无路。

关于解决失掉党的组织关系的人的问题，只要没有叛变，凡是有过联系的同志，都应当恢复他们的党的组织关系，过党的组织生活。

*本文原载《丹心素裹》。文首按语为原书编者所加。

# 往 事 略 忆*

张一平

1935 年，陕西蓝田县的“九间房事件”中，杨虎城将军部的张汉民旅被缴械后，张汉民同志和一部分官兵同志不幸遭难牺牲了。所幸杨虎城将军又把张汉民旅剩余的官兵组织成立了十七路军的特务二团，让共产党员阎揆要同志任团长，周益三、孟慎言、李明轩 3 同志分别担任该团的第一、二、三营营长，此外还有雷茂（雷展如）、袁致亮、杜俊杰、秋含章（秋宏）、王博生等任连排长。团部各处和通讯排都有党的同志。

特务二团的士兵除部分老兵外，大部分都是新补充的。在士兵中的建党工作是由崔廷儒同志通过程天鹏同志进行的。军官工作是由孙作宾同志进行的。

我于 1936 年暑假期间，由孙、崔 2 同志共同决定派去特务二团。士兵中工作我和程天鹏联系，军官中党的工作我与杜俊杰联系，我在团中的公开身份是文化教官。

同年八九月，崔廷儒同志和汪锋同志各骑一辆自行车由西安来到白水县城特务二团团部驻地，汪锋同志把他的介绍信（有手掌大一片很薄的白纸写的）交给我看了。并交给我一本油印的季米特洛夫著的工人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油印本，让我们组织党员阅读。通知我们今后所有党员未经党同意，一律不准自由离团到陕北去。并决定成立领导全团党的工作委员会，汪、崔决定由张一平任团党委书记。党委委员有：一连排长秋含章（即秋宏）、团通讯排长高兴中（即王写剑）、三营文书刘家驹（即杨信）、三营班长王建基（即王国），共 5 人组成。由陕北来的报务员刘克东同志，被安排到通讯排任准尉报务员。成立团党委时，王建基因有病没有参加，其余 4 人都参加了。开会地址是袁致亮同志选定的，在白水县城北街一个

居民家中，开会时的警卫工作由袁致亮同志连里的一个班长贾树丛担任。团党委建立后的第 2 天早晨，汪锋和崔廷儒同志就骑自行车由白水县去西安了。以后我到西安去又替汪锋同志找了一个名叫李婉霞的女同志和他以假夫妇关系作掩护在西安祖房住机关，以保证安全。

特二团党委建立后，作了下列各项工作：

（一）为了提高全团官兵政治思想认识与文化知识水平，特二团成立了文化教育组。以上尉军官的工资待遇聘请了 3 位有大学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陈静之、苏致中和我给全团官兵上文化政治课，课程内容有：语文、历史、自然、时事等。每周由营长带全营官兵上课 1 次，由连长带全连士兵上课 1 次，每晚由文化教官到各连去为士兵解答提问，阎揆要团长也参加上课。

（二）党委决定全团各营连经济一律公开，全团各营连都由士兵选举出代表检查经费开支，团部军需处每月经费开支，由全团选出的代表检查盖章。各营由各连代表检查盖章，各连由本连代表检查盖章。这样才算经济公开，光明正大，没有问题。这样一来，团连营的经费都有了节余。如周益三同志为二连的儿童兵购置针织机器，给士兵织手套和袜子，买了压面机给士兵压面。又成立了文工团。购置用的衣服和化妆品等都是用节余的经费开支的。其它各连亦然。

（三）要求各营连军官，对士兵都要实行民主管理，说服教育，不许打骂士兵，对严重违法者，呈报上级批准，有处以死刑枪决的，有开除军籍的。

（四）党委要求全体官兵都要认真遵守群众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要公买公卖，借东西一定要归还，驻扎在群众家中，一定要代群众搞好卫生，为群众服务。特别是离开群众家中，一定要把住过的房间打扫干净。

（五）建立全团流动图书馆。购置大量进步图书，供全团官兵阅读。这个图书馆一直带到抗日前线忻县等地方。为了收听每日新闻团党委还花了许多钱购置一架大型静电收音机，以便收听每日抗战新闻。

（六）党委要求各连排士兵，爱护群众，关心时事，喜爱阅读图书与杂志，学习书写大字，有的士兵还学习当时的新文字，即现在的拉丁字母拼音字。

1936 年 12 月 12 日发生双十二事变，特二团奉命连夜由渭北开到渭南赤水镇驻防，在此期间许权中同志（即陕西渭华暴动的军总顾问兼骑兵分队长，我在北京反省院狱中认识了他，当时他也在反省院关押），被杨虎城将军任命为十七路军独立旅的旅长。特务二团被编为该旅的一〇五七团，我和方干才同志（即方仲儒）陪同许权中旅长乘没收来的小卧车去商县接收韩子芳团为独立旅的一〇五八团，团长仍为韩子芳。这时汪锋同志在党内的秘密身份是独立旅党的特派员，公开身份是十七路独立旅少校参谋，随军一同由蓝田开赴耀县驻防。部队到耀县的次日清晨，许权中同志安排计划将反动保安团团长雷天一枪决，将其部队缴械了，此后汪锋同志领导全旅各团党的工作，我管一〇五七团中党的工作，每月我收的党费都交由汪锋同志处理。此后，1937 年，欧阳钦（和我联系的名字是杨青，我对他的名字是陈青）同志常来独立旅叫汪锋和我一起向他汇报党的工作，他又向我们讲当前形势与任务。我回忆讲过统一战线工作问题，记得讲过作好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以便于开展下层工作，作好下层统一战线工作，以便巩固上层统一战线等语。还指示我们要巩固独立旅部队，不许拉哗变，不许开小差，以保持和十七路友军的统战关系。

# 特二团中共地下组织的建立和活动*

王　国

（一）特二团创建时期

特二团是1935年5月在西安西营房成立的。按营、连，排编制组成，共有官兵千余人。经西安绥靖公署批准为西安绥靖公署特务第二团，并任命阎揆要为团长。它的前身是西安绥靖公署警卫团。警卫团早期，就有党的组织和党员秘密活动。我是1933年到警卫团三营当兵的，同年10月由七连马学文、岳之涛介绍入党[①]。

特二团成立后，我在西安西营房见到营长李明轩和崔廷儒（均是中共党员），于是又回到新建的三营七连当班长，以后七连建立了党支部，崔廷儒任书记。崔走后我任支部书记，和团里秋含章（秋宏）、程天鹏发生党的组织关系。

特二团成立后经过月余的整训操练，即开始担负西安城防任务。我们三营先后在东门、北门、西门和钟楼等地驻防，后来全团奉命开往礼泉、乾县、彬县、淳化一带，团部驻淳化县城，三营驻通润镇，七连驻地更靠近陕北苏区。这时程天鹏传达上级党组织决定：不准搞哗变把部队拉到苏区去，要团结抗日，加强官兵团结和军民团结，还研究过组建团党委的意见，并介绍我和九连支部刘家驹（杨信），戚玉平、范书奇等同志相识。

（二）中共特二团党委会的建立

在团党委成立之前，官兵组织生活是严格分开的，营、连支部单独活动。大都采用：（1）单线领导，个别活动，不发生横的联系，定期汇报或口头传达党的指示精神。（2）个别发展，一般不开支部大会，不举行宣誓仪式，不填表，但对培养对象的了解、培养、考察，是认真的、慎重的，严防泄密和叛徒破坏，不暴露身份，严守党的纪律。（3）先由各连队建立

党的小组和支部，为成立团党委准备条件。

1936 年春，特二团奉命移驻白水县。是年 9 月，汪锋同志代表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宣布了中共特二团党委会（以下简称团党委）由 5 人组成：书记——王建基（王国）。

委员——秋含章（秋宏）分管军官支部工作；刘家驹（杨信）分管组织；高兴中（王写剑）分管宣传；张一平主要负责和上级的联络工作。

团党委建立后，各营、连、排的支部和小组的工作有了统一的领导。全团党的组织比较健全。党员近 300 名，来自 3 个方面：一是原警卫团、警三旅九团的党员，这是骨干和基础；二是新发展入党的，这是多数；三是党组织从全国各地介绍来的。如奚纯三（后为太岳区党委秘书长）、沈兴中是 1936 年从山西闻喜县介绍来的。郑义、刘锐是广东介绍来的。在团、营、连、排长中，多数都是共产党员。

团党委是在陕西省委军委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程天鹏、崔廷儒、孙作宾、汪锋、杨青（欧阳钦）等同志经常来团具体指导帮助工作。

（三）西安事变前后的活动

1、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抗日救国，反对投降卖国。

特二团驻防白水县时，1936 年春，陕西省委军委派孙作宾向我传达指示：要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注意加强同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团结，继续埋伏，以待时机，不要随便“打红旗”、搞“哗变”以及跑到苏区去。

1936 年 9 月，汪锋来团传达了党中央和周恩来副主席指示：抗日要联合多数，凡是同我党有来往的国民党军队，我们就不在其中搞起义、搞兵变、搞分裂、搞瓦解，而要做好团结的工作，团结一切爱国的力量，包括高级将领，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坚决改变那种一有党员就搞兵变的错误作法。这些极为重要的方针、政策。使特二团党的工作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团党委和广大党员遵照以上精神，主动地、灵活地利用在国民党军队里的合法身份，在官兵中秘密地、半公开地宣传团结救国，逼蒋抗日的主张。主要内容是：工农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打土豪、分田地，是为穷人

打天下，反对打骂、虐待士兵和“喝兵血”的行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政府，反对卖国条约；反对进攻红军和苏区，打回东北去，为父老兄弟姐妹报仇；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替蒋介石和军阀卖命。

通过宣传教育，给官兵思想上灌输对国家、对红军、对苏区、对人民、对革命的正确认识。

党员同志们都模范地执行党的指示，军官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团长阎揆要以身作则，言行一致，爱国家、爱人民、爱士兵，经济公开。在他的要求和影响下，全团没有吃士兵空额和“喝兵血”的现象，各营、连都有经济委员会、读书会，他还专门从各地请来教官，给全团官兵上课，进行时事、政治、文化、军事教育，并实行考试、发奖，鼓励进步，提高广大官兵的思想觉悟。当时一些反动分子散布特二团“赤化”了、〇〇〇是共产党等流言，并上告杨虎城将军。但特二团的党组织始终未遭破坏。

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很重视特二团党的工作，经常派人来团指导帮助，把进步刊物、书籍放到资料室、图书馆，供大家阅读，还组织声讨卖国贼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大会，团党委还积极开展“拥红爱红”、“反蒋恨奸”的活动。

2、加强党的交通联络工作。

早在警卫团时期，阎揆要的家就是我党的个极秘密的交通站，贺芝红[宏志]（阎搂要爱人）大姐是20年代的中共党员，是我党的老交通员、联络员，刘志丹、高岗、阎红彦、史唯然、王超北等同志，常来她家吃住和联系工作，1933年杜衡叛变，亲自带领特务到阎揆要家搜捕共产党员，被她以“营长太太”的身份机智巧妙地对付过去。

特二团驻西安办事处，实为我党一个重要交通站。党中央和红军到达陕北后，我们根据陕西省委军委指示，从全团党支部书记、支委中挑选10人，由徐副官带到特二团驻西安办事处，执行党中央的机密任务，向陕北运送枪弹、文件、军用品。每次3至5人，穿军衣，坐汽车，带手枪送给

洛川、甘泉、黄陵等地的红军接收人员。这 10 个人，现在能记起的有：彭定安、李国秀、张培贞、魏含英、李士学、陈家珍、席增发、郭子龙等同志。他们都积极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3、积极配合西安事变。

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为了抗日，发动西安事变。南京国民党政府军，在所谓“救蒋”的名义下重兵境，西安周围形势突趋紧张，事变当天上午，特二团奉命从白水县向南开进执行任务。当时阎揆要团长有事去西安未归，团党委不明真相，一面派张一平到西安了解情况，一面组织部队准备出发。阎揆要团长于 12 月 12 日上午返回团中，至蒲城中学。即与团部电话联系，得知发生西安事变，部队已接到开往渭南县赤水的命令。阎团长立即命令全团奔至蒲城县东门外集合（从白水至渭南必须经过），简短动员后，大家知道捉住了蒋介石，群情激奋，在阎团长率领下，星夜急行军到渭南赤水镇阻敌。我们三营七连的任务是坚守赤水桥。特二团在赤水、渭南原一线的英勇阻击，为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争取了时间。

特二团在赤水镇、渭南原一线完成阻击任务后，又奉命到蓝田配合红军阻击中央军进攻西安。我们到蓝田许[家]庙时，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亦到，团党委派张一平去与联系，还召开了群众大会和两军联欢会。

在许家庙时，成立了西安绥靖公署独立旅（旅长许权中是中共党员）。特二团编为独立旅第一团，团内建制番号均如旧，三营驻南山口，我仍在七连当班长，营长李明轩叫我和穆志贤（中共党员）组织商洛地区的当地武装周维华、郭子龙、张俊杰等部共同抗击中央军部队西进，当时省委派王柏栋等同志组织地下武装，也开展了游击活动。

西安事变发生后，特二团党委主要是贯彻党中央方针，促使事变和平解决，积极做好党员、官兵的思想转弯工作，服从抗日大局。当时部队恨蒋、反蒋情绪极高，在渭南或蓝田阻击蒋军，虽然冰天雪地，激烈战斗都

毫无怨言。然而一听说要放蒋介石，就想不通，认为是放虎归山，加之国民党中央军又节节进逼西安，以致酿成全团官兵要与敌人在临潼灞挢（从蓝田撤向渭北途经此地）决战之势。团党委做了艰苦耐心的思想工作，中共陕西省委也派汪锋等同志对部队说服教育、解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使共产党员首先懂得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必要性和现实性，要求带动广大官兵转变思想，拥护党的和平解决方针，从而才顺利地离开灞挢，开往耀县整训。

1937 年 4 月在耀县时，独立旅改为五二九旅（只改番号，人员、建制不动），属新成立的一七七师建制。我们特二团又改为五二九旅一〇五七团，团驻地与红军相连接，互相间往来更频繁。团党委进一步深入开展向红军学习的活动。并为开赴抗日前线从思想上、物质上进行积极的准备工作。

注：①据周益三回忆，岳之涛是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在北京东郊失败后回陕，于 1934 年 1 月 4 日由西安乘汽车至宝鸡，步行去诸葛庙警卫团的。岳之涛到警卫团后即被派任阎揆要营七连某排长。

# 特二团党委主要工作

王写剑

（一）内战时期

我于 1936 年二三月间，由三十八军教导大队之学兵队到陕西省绥靖公署特务第二团。程天鹏劝我到该团第一营第三连开展党的工作。程天鹏同志介绍我认识了秋含章（秋宏同志），秋又找来二连连副（大排长）袁致亮同志，3 个商议后，袁致亮同志把我安排到三连二班当兵。我因为刚从教导队的学兵队来（以培养三十八军下级军官为目的），所以出来操课，制式教练与术科劈刀、刺刀、打拳都是一学就会。这样一来班长全班都很高兴。我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观察了解连队的情况，以便开展党的工作。我到这个团的时间没有多久，只有十来天光景，全团奉命到白水驻防，这时，我已发展了几个党员，如张殿甫副班长等。还有个别的发展对象正在做工作^不久，阎杰连长把我叫去说，团长让你去团部，他派了一个马夫把我送到团部。后来我同程天鹏同志商量为了工作，安排我到团部通讯排当文书上士，实际上程天鹏要我同李洁生同志一起负责团部第一营部和机炮连党的工作。不久，程天鹏去了陕北。到了 1936 年 8 月 20 日，我记得是孙作宾同志陪同汪锋同志来到了白水县。现根据张一平同志回忆说是崔廷儒同志来的，我回忆也许错了。但是，程天鹏走后，领导这个团的是孙作宾和崔廷儒同志。如果孙崔不来，汪锋同志对该团很熟悉，但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是无法接头交待关系的。我记得孙作宾同志是穿了一身白色的学生装来的，好像记得是怎样走的。不几天，就再也没有看见。有一天下午，忘记了谁通知我去（也许是张一平同志）白水县东关一个老百姓家见汪锋同志，我进门前，好像还看见阎揆要团长带着马弁曾风歧和史忠义同志刚从汪锋同志那里出来，汪锋同志很年轻，当时只有 20 多岁，精明、能干，身上穿

着一件白底蓝条子衬衣（这种衣服在当时落后的西北来说是很洋气的，一看就象由上海来的）。他说这次从陕北下来的同行还有叶剑英同志，叶到西安住在张学良的公馆内，他是做东北军工作的。我是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代表中共中央军委领导西北军党的工作（注意：这个西北军是指十七路军而说的）；并说，今后孙、崔就不再领导你们了。我听了很高兴。因为汪锋同志亲自领导，而且代表了中央军委。第一，我记得汪锋同志讲了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特别讲了党的方针，由瓦解敌军转变为团结、发展巩固，立即争取一致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此次在汪锋同志未来之前，我们看过中共中央《八一宣言》（1935 年 8 月 1 日），但对中央的方针、政策理解不深，至此，汪锋同志来后才把党中央和军委的方针与政策彻底扭转过来，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第二，我们这个团的领导，虽说过去有党的负责人，但没有统一的、集中的组织形式。至此在汪锋同志的领导下成立了团（党）委会。团（党）委书记由王建基（王国）同志担任；宣传、组织委员由刘家驹（杨信）、高兴中（我当时的化名）负责；秋含章同志负责军官支部工作；张一平（公开职务是文化教官）同志是团的特派员，他的任务是参加团党委会工作，又同阎揆要同志联系团党委与团长之间的配合、协作，以及相互支援等工作。全团工作分工由王建基和刘家驹同志负责二、三营党的工作；高兴中、王写剑同志负责团部、团直（指重机枪连和迫击炮连）和第一营党的工作。因为当时士兵与军官对立情绪还较大，为了保持秘密工作关系，军官党员成立一个单独的军官支部，下分若干小组，由秋含章同志负责（秋公开职务是排长，大约有二三十个军官党员，有此条件）。至于我记得刘家驹同志担任宣传，是当时竞内近乎宣传委员、比组织委员稍高一点。我记得我好像还向汪锋同志提过吸收李洁生（长青）同志参加团党委的意见。我的出发点是李洁生是很有活动能力的同志，又是团部、团直和第一营的建党中有着比较大功劳的同志，好像汪锋同志解释说，他在瓦窑堡时听过程天鹏同志汇报和征求过他的意见，主要是洁生同郑义关系太密切，而郑义这个人我们尚不了解，

为了党的工作，所以洁生暂不参加团党委为宜，因此对于李洁生同志的问题只好暂时作罢。汪锋同志最后要我负责刘克东同志的安全和掩护他在通讯排的工作，刘克东同志任副排长。我们团自此之后，在汪锋同志和阎揆要同志的领导下，做了不少工作。主要是：

1、大规模地发展了党的组织。本来，该团的党组织是这时才开始的，因为早在 1936 年左右就积聚了一些党的力量。（1）那时是瓦解敌军军队的方针，随时准备哗变起义，瓦解部队的。（2）那时军官党员多，士兵党员少，团也有党的总负责人。这次在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汪锋同志亲自领导下，方针、政策正确了。团又组织一个比较强而有力的领导机构和统一的指导。因此，党的发展就更大了，更多地吸引了许多官兵中的革命者参加了组织。怎样吸收党员呢？我们根据情况确定了在军队中工作，必须要遵循秘密工作的原则。就是先交朋友，在交朋友的过程中发展对象，使发展的对象个人保证不出卖朋友，才能进行说服教育，使之参加组织。如果遇见个别的人，不愿参加党组织，也不致于出卖组织和自己。交朋友时，利用旧社会允许的一切形式，如认同乡、同学、邻居、亲朋结拜兄弟参加帮会，利用帮会形式写金兰谱等。一般结交的朋友都是经过一定时期考验和认为有条件的，再进行说服。有的人则说我们都是穷小子，要革命但到哪里去找党呢？于是乎说咱们分头去找，找到后冉互相告知。入党的仪式绝大多数是不能举行的，可也不排除个别有条件的情况下举行。入党后，秘密的地下党组织形式是：单线纵的联系，就是一个党员知道一个领导他的人，一个党的小组和支部都不能在一起开会。如果一个小组内有 3 个党员，那么党小组长分别同这 3 个党员发生单个（单线）联系，而 3 个党员之间是没有横向联系的。如果说有一个党员暴露了，在最坏的条件下，他只能知道组长，不知道另外两个党员；如果有一个党组织暴露了，他只知道同他发生关系的党支部书记和组织委员，而其余的党小组是不知道的。这种单线的纵向组织关系形式，对于秘密工作，使党的损失减小到最小的限度；但其缺点也很严重，如长期不能过组织生活，以个人传达为主要形

式，因此党内的有关知识、锻炼、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生活等都是很不够的。但是在敌军内工作，首先保存党员是主要的，能达到这项要求也就不错了；要想一件事做得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

团部有一个党支部，每个连都有一个党支部，每个党支部有七八个党员或十几个党员，有时甚至二三十个党员，这些支部都是士兵党员支部，而军官上面谈了，全团有一个军官支部，也有十几个到二三十个党员。

2、全团学习文化，变文盲的官兵（特别的士兵）为能看书读报写信的有文化的官兵，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当然这是阎揆要同志的倡导下的，当时团（党）委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大力支持拥护与配合。先是阎揆要团长聘请了几个文化教员，如张一平、陈静之、苏执中等。接着在全团掀起了一个学习文化、扫除文盲的运动。上语文、地理、历史、常识、自然、社会发展史，还有拉丁新文字，有的课是上大课，有的是分区上课，这样变全团为一个有文化的学校这种形式深受官兵欢迎和拥护，是求之不得的学习生活，外人亦无从置疑。在学习了一个月后，原来一些文盲士兵，居然能给他的父母和家人写信，特别拉丁化新文字可以作为学文化的初步工具，动力甚大，许多人都学会了新文字拉丁化，并能写东西。当时采取了燕京大学提出的方案，同时也逐步认识了中国文字，不仅团内，而且各营、连都订了许多进步的抗日书刊。当时全国的大报，如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甚至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和陕西省的各种报刊，以及生活周刊等等，都有订的。有的连成立了读书会，还办了墙报。团部办了图书馆、阅报室，这种文化学习的好处：（1）深受官兵欢迎，特别受士兵欢迎。旧社会出来当兵，绝大多数人是贫穷的人，根本无力上学，现在因为组织学习，教员不要出钱，书报纸张不要自己买，何乐而不为？（2）官兵的文化提高，也促进了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因此抗日情绪十分高涨，都反对蒋介石那种对曰本帝国主义屈辱投降的做法。（3）学习文化，因为有些文盲居然能给家里写信，影响所及，不仅他家里人高兴，就连原来回家而因故不来的士兵也相继回来了，这就大大地巩固了部队，这在旧军队中是不可想象的事

情，真可认为是奇迹！

3、在阎揆要同志提倡下，在团党委的同意与配合下，建立了生活检讨会。开始执行后，一般军官有些反感，但实行既久，也就自然正常了。一般地说，生活检讨会有 3 点内容：（1）反对军官虐待与打骂士兵，即反对军阀主义的行为；（2）反对对老百姓不好的态度和调戏妇女、打骂等等；（3）对待连队伙食生活方面提出意见。经济委员会在各连伙食单位都有选举的官兵司务长参加，每月公布账目监督连队伙食和经济开支，不准贪污和吃空名字。据说全团也有一个经济委员会，监督全团的经济开支。生活检讨会可以说是政治公开，经济委员会可以说是经济公开，官兵都欢迎。另外有的连队还成立了“抗日会”，“抗日会”的宗旨是凡愿意抵抗日本侵略和不愿做亡国奴的人，都可以参加，这是一种范围十分广泛的民主性的组织形式。

4、情报工作。我们在阎揆要同志为团长的这个团工作，总的说来是十分安全的，但我们仍不十分放心。因此，我们建立了情报工作。我们把团长、营长、连长，各主管军官周围和身边都安排了党员，一方面我们的党员来保卫这些领导同志，我们也比较放心；另一方面，这些首长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也能及时知道，如一营的王保山警卫员、司号长黄贡坦，二营的司号长陈克仁等等，各连连长身边也安排了一些党员。这在秘密工作条件下，是必要的，党的耳目是比较灵通的。

5、对敌斗争。在 1935 年到 1936 年这一时期及以前时期，蒋介石利用把西北军（原十七路军）的军官轮训时，曾吸收和发展了一些军官参加了“蓝衣社”，他们结业回部队后，纠集力量拥护“蒋委员长”为领袖，像法西斯分子拥护希特勒那样，反对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但这些军官的活动，我们党在群众掩护下，侦察得一清二楚，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我们党和群众所监视，因此，这些人只有我们党能予以对抗，我们党组织狠狠地打击这些混蛋。如阎揆要团长整阎杰（第三连连长）是采取了行政与党配合的形式。阎团长恨贪污，也不准他的部下军官吃空名字，整阎杰连长

那次是把全团各连在白水县靠南门附近的大操场上集合点名，另外一面派人到各连查值勤、站岗、放哨人数，一查果然三连有几个空名，便把阎杰扣押送到西安关起来。听说不久阎杰便死在监狱之中。还有一次，把军医杨德庆（河南省南阳一带人）扣压起来，据说扣压了几个月后释放，回家也没再回部队。我们这种反对“蓝衣社”分子，是同蒋介石瓦解杂牌军的办法针锋相对。杨虎城将军实际上是支持默许我们的做法，这种打击敌人也是巩固发展团结，主要是符合我们利用了中央蒋介石与地方杨虎城将军的矛盾。

6、军民关系。在旧社会，军民关系一般说是不好的。我们团有强大的党的力量，军民关系是好的。我们对老百姓的态度上：（1）提倡对人民态度要好、和气、不打骂老百姓。（2）对市面上的要求公买公卖，买东西要按价付钱；（3）对妇女不调戏、不侮辱；（4）借东西要还损失了要赔偿，这些都是闫揆要团长要求提倡下，党利用党员和发动群众自觉地遵守和互相监督。因此，我们军队每到一地，开始老百姓还有些害怕，但稍住几天，老百姓便没有不说部队好的。我们的认识是单有上级的要求，即便是很严格的要求，军队士兵中没有党的自觉和监督，以及互相批评教育也是达不到目的的。

7、支援了根据地和地方工作。1936 年 9 月，我们抽调了李晓初、李国秀、彭定安（彭辉）、张培贞等一个班，带上枪支弹药，在西安成立了警卫押运班，押送过物资送往陕北苏区。地方上一些同军队党有关系的党员，在地方上不好站脚。便通过种种关系到部队来躲避一时，以后又陆续回到地方上做党的工作。有些人要去陕北党中央学习，也通过团的关系去了陕北；有的是外省的，不是陕西省地区的，也在部队躲避一时。有的同志去了陕北苏区，我们暂时留下工作，既加强了党的工作，又躲避了敌人的破坏搜捕。

8、培养了一大批干部。我们为党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干部，很多同志都为党的抗日、为人民革命做了许多工作。如：李国秀原任过湖北省军区

副政委；汪应中，辽宁省军区副司令员；彭辉（彭定安），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李晓初（李伯林），中国科学院农林学院党委副书记；吴伯畅，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雷荣（雷钦若），陕西省政协秘书长；王炳辉，西安某剧团总经理；姚寅武，西安解放饭店总经理；陈如意，空十一军副军长；张殿秀，大连工学院院务部部长等等。有一些非党员的官兵也因为受了这个团的政治影响，后来都在抗战时期做了大量工作，他们表现都很进步，至于原先军阀习气很重，而后来改造成为党员的还成为我党的高级干部。如吴伯畅同志就是其一。

（二）西安事变时期

1936 年 12 月 12 日，阎揆要同志被杨虎城将军召赴西安。阎团长从西安打回电话说要部队开赴蒲城，他在东门外等。当时团党委为此做了研究，认为太奇怪了，分析了情况，不管出了什么事，首先不要上当，认为敌人如果要消灭这个团，恐怕要在白水到蒲城的路上，特别是在蒲城附近形成包围。因此，为了安全起见，决定派刘家驹同志带几个可靠的党员先骑自行车到蒲城附近一面侦察了解动静，一面见阎团长。如发生什么问题赶快回来报告，以便部队准备打仗，如果回不来，团的部队也就不走。在部队没有走多远的路上，刘家驹同志回来说他已见到了阎揆要团长。阎团长说，张学良、杨主任（杨虎城）2 将军把蒋介石抓住了，要部队在渭南阻击中央军的进攻。我们听了非常高兴，立即向全团作了传达。当时，部队军官非常兴奋，到了蒲城东门外（大概我记不清了），阎团长还向部队讲了话，于是全团奔向渭南。

# 特二团党的活动

周益三

1936 年 4 月左右，从淳化下来在泾阳住了几天，到白水时张一平来到这个团，任团党委书记，给我二连（我任连长）编了 140 多个小孩子（12～18 岁），张亲自给编书讲课，讲革命道理。二连张一平、王写剑、王国组织支部。

一营住在尧禾，后又调回县城，在南北街路东住的，二、三营住在什么地方记不清了。

汪锋 1936 年 8 月来白水，传达周总理的指示说：这个部队的秘密党员，一切不要暴露，绝不轻易提出口号，万一蒋介石要消灭这支部队，当部队的生存受到威胁时，才可打起红旗，并指定了打起红旗的负责人。

住在白水，到后半年阎揆要做了一件大事：他下决心清理了团内特务分子，该送走的不伤情面送走了，有些夜间收拾了。团内基本可以称清一色了，有些借故开除了。12 月 12 日拂晓接绥署电，张、杨扣了蒋介石，令我团星夜赶赴渭南赤水镇阻击西进之敌，200 多里路程，走了一天一夜，13 日晨到达目的地，立即占领了渭河南岸，南至赤水原，构筑工事。

根据我回忆没有与地方联系。

# 党派我到十七路军特二团建立秘密电台

刘克东

我于1936年前在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中央红军工作。9月初我随同叶剑英、汪锋等8位同志化装成国民党南京政府谈判代表团，由富县张村驿出发经洛川到达西安，一路上说是回南京去的。

到西安后又化装成便衣，叶剑英到张学良那儿去了，我同汪锋到杨虎城的特务二团住了几天，于10月初以给部队送棉衣为名义到达白水，同阎揆要接洽，他把我放到通讯排任排长。部队同地方没有关系。我利用他的电台与保安联系。我们有准备地在部队搞兵运工作，开始准备起义。同我们直接联系的人是周恩来同志，记得西安事变前周副主席曾来电指示：“我们部队不到蒋介石逼得生存不下去的时候，不要打红旗”。

到1936年12月11日，我收到杨虎城一封电报，电报要求限即刻到，透露了西安事变的消息，晚上团部传达，明早即刻出发（指12月12日），当晚我与保安联系，告诉了西安事变的消息，中央当即知道，后来张、杨发电报，中央才派周恩来副主席等来解决的。

西安事变时，我们从白水下来经蒲城到渭南赤水塬集结，任务是抵抗从潼关来的敌人，当时周恩来指示让汪锋当二团的政委，同时指示我们：“你们要坚持2周，保证谈判顺利进行”。

当时我从电台上得到南京政府的发言：让我们在24小时内，把蒋介石平安送到南京，要不，要把西安炸平。

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我们才转移到蓝田和红军联合。

# 回忆在特务营做党的工作

韩学理

双一二事变后，张、杨两将军的“八项主张”得到实现，其中一项是决定释放政治犯。大约是 12 月 20 日左右，王力来监狱，宣布释放“政治犯”，我们七八十名“政治犯”，先被带到特务营营部，愿留下工作的可以留下，愿回家的，发给路费。这样我和赵宝森、刘兰生、蒙日新，还有红二十五军的李登科等，就留在特务营。隔了一两天，有的同志提出监狱里还有几名“政治犯”，我和王力商量，由特务营写了公函，把他们要了出来，其中有许夭洁，还有耀县一个同志，其他人记不起了。

当时特务营有党的一个特支，书记是王力，公开职务是副营长$的勤务兵。我开始在第四连当兵，并担任特支书记，王力改任特支委员。特务营有个政治处[室]，由郭西茵负责，不久我和王力都被调到政治处[室]。当时在士兵中组织抗日救国会，宣传联合抗日。我记得连指导员有赵宝森、刘兰生，常志刚可能是特支委员。锜委来特务营联系或巡视的先后有孙作宾、崔廷儒等。我们特支曾研究决定，如果与中央军打起来，就让原红二十五军的李登科当营长。

特务营移防东里堡时，东北军有人来给杨虎城做工作，想让杨与中央军打，杨当时赞成联合抗日，那人说，你不愿意打，你的特务营都站到红军那边去了。杨当时把共产党和有嫌疑的人都软禁起来，政治处被软禁的就我一个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满不在乎地在软禁我的屋子里睡觉了。据说，此时杨虎城派了个视察组，到各连巡视了一番，发现没有哗变迹象，就把被软禁的都放了。我睡到半夜，忽听王力和郭西茵来叫我回去，我们边走边谈上述事件发生的经过。接着，特务营被调到鲁挢。当时我认为杨对特务营有了戒心。

在鲁桥时，有一天宋文梅忽然叫我到他办公室去，要介绍我到延安住红大去，当即给我写了去红大的介绍信。我当天就带着介绍信回到云阳（中共陕西省委所在地），见到了省委组织部长张德生，向他汇报了情况。他说，你回特务营把特支手续交代一下，就回省委，不到红大去了。我回营交代手续时，又碰见宋文梅，他叫我把特务营的党员名单给他写出来。我说，这不能写，若写出来，就等于出卖了党组织。宋说，你再考虑考虑。我就回到政治处。不多时，郭西茵来说，宋文梅给他说，叫他转告我，让把特务营的党员名单开出来。我想，我在监狱里都没有叛党，我才出狱怎么能干叛党的事，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写。他说，你不写就不能走。他让政治处的勤务兵把我看守住，又叫勤务兵给大门口站岗的交代不

让我出大门，然后他盖被子睡了。在他未睡之前，让勤务兵把刘兰生（白水县人，和我一块出狱）也叫到政治处了。郭西茵睡后，我和刘兰生也在炕上睡了，当郭睡熟后，我立刻起来不辞而别了。因为勤务兵和我关系好，根本就不听郭的话，大门口站岗的，恰巧是我的乡党和小时候的同学，我俩彼此打了个招呼，我就出门走了，当时什么行李也没带。在鲁桥街上，我碰见和我一块出狱的难友、在特务营当兵的蒙日新，他给我两块现洋，我就回省委了。这是 1937 年 3 月。直到现在，我不明白当时向我要党员名单是何目的，况且郭西茵当时也没有党组织关系。

此后有些党员陆续离开特务营，不久营的建制也被取消。

我和王力在特务营时，曾先后由组织介绍营附冯鼎三、连指导员赵宝森（化名赵寒、包森）去延安红大学习。

注：①应为营附的勤务兵。

# 五十年前搞兵运工作的回忆

刘天才

我1934年到西安杨虎城宪兵营当兵，1936年，经刘向青（湘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六七月间，组织命我和刘子义、张凤祥、卓明玉、苏育涵去边区，我们走到韩城，因韩城的联络站被敌人破坏，我们和组织失去联系，刘子义又带领我们来到铁佛寺保安分队。到铁佛寺后，我们几个人下到班里，和其他战士一起，站岗放哨。同时我们还帮助地方同志学习文化，做群众工作，宣传革命道理。约1个月后，我和夏飞、苏育涵、卓明玉、张凤祥离开了铁佛寺，回到西安。

注：①据苏育涵回忆：1936年春，我在西安杨虎城宪兵营当兵，当时宪兵营就有地下党的组织。我和刘子义同志奉组织命令到宪兵营新兵排后.刘于义任党支部书记.我是党支部组织委员.夏飞（李卡兰）为宣传委员。1936年8月，上级党组织指示，要我们离开宪兵营新兵排。脱离部队后分为两路，一部分人潜往特务二团，另一部分人由刘子义带领我和卓明玉、张凤祥及另外一个同志（陕西人，姓名已记不起来）赴陕北苏区。到韩城后发现党的交通站被破坏，便由刘带领我们几个人去乾州铁佛寺民团做士兵工作。在此期间，刘庚同志也到了铁佛寺民团，到那里1个月后，刘子义见民团领导同志态度有变化，党员也较集中，为防万一，确定我和夏飞、卓明玉、张凤祥等几个人离开铁佛寺，到临潼一个开裁缝店的人家里等待。组织会派人来接关系，走时还给了每人5块钱的路费。我们到了临潼不久，卓明玉等3人，因见没人去接关系，就回家去了。只剩下我和夏飞同志仍在等待。又过了一段时间，刘庚、程天鹏同志到了临逋，接上了组织关系，由程将我同夏飞带到特务二团去了。

# 西安事变前的一些经历

谢晋生

（一）

西安事变前后，我担任西安绥靖公署宪兵营副营长，此后又担任特务营副营长。杨虎城掩护西北特支人员是通过我具体执行的。

宪兵多是学生，具有强烈的抗日反蒋思想，其中有不少官兵是我党地下党员，直接由西北特支领导。这些同志常注意掩护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

杨虎城将军为掩护西北特支李木庵、谢华、徐彬如等同志，在宪兵营给这些同志都安排了职务，李木庵任上尉书记官，谢华任上尉教官，徐彬如为咨议，以便于工作。这些同志一面做些联络上层人士的工作，一面做各校教职工和学生的组织发动工作。徐彬如同志常住我家。对红军代表张文彬同志，杨虎城将军嘱咐我要严密保护。他来时带有一部电台，还有报务员和交通员等共计 5 人，是从申伯纯的交际处接到我家的。我抽调了一个宪兵排住在我家的第一进房，白天设单岗，晚上设双岗。我和家眷住第二进房内，张文彬等住第三进房。

（二）

1936 年 8 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六傍晚，“西北剿总”的职员宋黎与马绍周，由某地回到西安，住在西北饭店里。陕西省党部派出便衣特务，到西北饭店进行“围捕”（实际是“绑架”）。马绍周适外出洗澡，特务们便将宋黎绑架而去。行经东大街时，适遇西安绥靖公署宪兵营的巡查队，便将他们一起押到宪兵营营部。我正在营部，便对他们进行讯问，才知道这些便衣特务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调查室（即“中统”）的人员。他们对我说，他们逮捕的以及另一个在逃的青年，都是共产党,,我又问那被绑架的青

年，知道他叫宋黎，是“西北剿总”的职员。

我当时便以省党部这次捕人，既无公文证件，事先又未按照手续会同我部共同办理为词，要那几个便衣特务回去补办手续，将宋黎留在营部。我急用电话向杨虎城将军报告，这时他已经休息，侍从副官不敢惊动他。我.以情况严重，立刻又用电话向绥靖公署交际处申伯纯处长请示。申处长接到电话后，即驱车来营部，了解情况后，就用电话报告张学良将军。张将军即派他的卫队营长孙铭九来将宋黎接走了。

马绍周洗澡完毕回到西北饭店，又被便衣特务逮去省党部，张学良将军得知，立即派随员关沛苍去调查。关沛苍一到西北饭店，又被便衣特务一并捉去。张学良将军获悉这一情况，更为气愤，立电当时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邵力子，请他到“西北剿总’要他立即释放马、关 2 人。邵对张说，逮捕宋黎一案，是奉“委座”的命令办理的，坚持不能释放。张将军对邵说：“我是中央委员，你不能释放，我有的是办法。”张随即命令孙铭九派卫队营的一批士兵，开赴省党部营救马、关 2 人。卫队营的战士们到达省党部时已是深夜，看到特务们正在残酷拷打“犯人”，无不愤怒已极，当即对这些特务饱（报）以老拳，救出了马、关 2 人。

注：①应为陕西省主席邵力子。

*本文第一部分系《丹心素裹》所载谢晋生《杨虎城掩护西北持支人员和红军代表》一文，第（二）部分摘自《西安事变亲历记》所载谢晋生《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一些经历》一文。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我在特务营的情况*

姜树德

1936年夏季，我在南京江险要塞曾先后接到刘炳[秉]琳、张希钦两同志来信，邀我速到西安。我接信后于5月初到西安，经他们介绍与宋文梅相识。宋当时任特务营营长，他推荐我任特务营军事教官。不久，张文彬同志与杨虎城谈妥，在西安设秘密电台，以便与陕北联络。我接受这一任务后，即积极着手筹备，持用西安绥靖公署办公厅介绍信（因当时电台均由蒋特控制，私人不能购买），到西安电料行买了一部15瓦收发报机及一部15瓦手摇式发电机，先拉到绥靖公署大院内转了一圈，又秘密转移到特务营院内我的宿舍设置起来，使用张文彬同志转来的秘密联络呼、波及预备呼、波，每天在约定时间开机联络。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同志向杨虎城建议把这部电台送往陕南红七十四师。12月20日，我由李涛同志陪同，乘坐一辆绥署牌号的大卡车，带着电台和备件（事变时我缴获敌特电台的），去陕南红七十四师。到师部后，李涛同志向该师领导陈先瑞、郑位三等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协同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抗击中央军向西安的进攻。我这部电台除与陕北联络外，又建立起与红二十五军的联络。

1937年2月初，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我在红七十四师电台的工作任务，转交李岩同志接替，我仍返回特务营，任第二连连长，随杨虎城移驻三原东里堡。不久，有人告密，说我反对释放蒋介石，要兵谏杨虎城。杨在盛怒之下，把我叫去询问，经我申辩述说之后，杨说：那好吧，调查调查再说。遂即把我送端履门军法处监管起来。不久，因查无实据，加上刘炳[秉]琳等同志积极活动，解除了对我的监管，调到整编后的一七七师任通信连长。

特务营党员多是单线联系，我的关系在刘炳[秉]琳同志那里，在特务营我与任何人都不发生组织关系。那时在宋文梅营长领导下，军官们对“反蒋抗日”的认识都是一致的，就是在士兵中提到“反蒋抗日”，积极性也是很高的，说明共产党在营内各个连队中的工作是很活跃的。

*本文据姜树德 1989 年 12 月 6 日来信整理。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扣押国民党大员*

宋文梅

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张、杨两将军，在东北军进驻西北之初，虽然有过一些猜疑和误会，但很快就产生了团结合作的感情。特别是自十七路军特务营从国民党特务手中抢救了宋黎和东北军因宋黎事件而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后，这种感情在两军的各级干部中有了进一步的增长。当时，我是杨虎城将军的特务营营长，参加西安的治安工作。经过这一事件，使我和张学良将军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时相过从，两营的干部，也有些交往。

同年 12 月 8 日下午，我们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安的地下工作人员和救国会联合准备在第二天发动全市的大、中、小学学生纪念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一周年，并拟举行游行示威，请愿抗日。为了保护这些学生，我们奉杨虎城将军之命，决定从特务营派出一些部队，由张希钦连长率领参加，名是维持秩序，实是保护学生，使之免遭国民党宪、警、特务的殴打和逮捕。

12 月 9 日，由于一位游行的小学生被国民党警察开枪打伤，更激起了游行群众的义愤。

12 月 10 日下午 3 时，杨虎城将军与张学良将军进行会商，对“扣蒋”事作了最后决定，杨虎城将军把我找去说：“我已和张副司令下了最后决心，本拟今夜发动，因时间太紧迫，决定明日晚上行动。”又说，他和张学良将军已商定，届时由我负责带领部队去临潼扣押蒋介石，并着我回去着手准备，于明日下午 5 时前完成准备工作，听候命令。我回到营部后，即在营中选拔一些政治可靠而又精悍的兵士 250 多人来担负这一任务，并命令他们于明日下午 5 时前在营部集中。

11 日下午 5 时，我按原定计划，将事先选好的人员集合以后，即到新

城杨虎城将军公馆等候命令。到了晚上 11 时许，见到张学良将军偕同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王以哲、刘多荃、董英斌等 10 多人来到新城。同时，杨部的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也相继来到。这时大楼内的气氛立刻显得严肃和紧张起来。

经过张、杨两将军对扣蒋计划进一步审慎研讨后，关于分工问题，略有变动。因为临潼附近驻防的都是东北军，如果十七路军担负扣蒋任务，恐怕会引起附近不了解情况的东北军的误会，容易发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决定，改派东北军卫队营营长孙铭九负责去临潼扣蒋，而我则担任扣押在西安的所有国民党军政要员的任务。此外.关于解除陕西省保安司令部和省政府的武装的任务，原已决定孔从洲旅长负责，这时，杨虎城将军又命许权中予以协助。

12 月 12 日凌晨，当孙铭九营长奉命前往临潼后，张、杨两将军立即命我回到营部，在电话机旁等候命令。突然，接到张希钦连长电话说，有一队警察约七八百人，全副武装，已经由市警察局涌出向东行进，问我应如何处理。恰巧开始行动的命令也已下达，席珍儒、何永安等几位连长，立刻进行解除国民党宪兵和市警察武装的工作。我也立即和李锦峰连长、特务排王子中排长等，带领部队，前往西京招待所执行扣押国民党在西安的军政要员的任务。

包围西京招待所后，天已快亮。我命李锦峰在外面严密监视，不准任何人出招待所。然后挑选 10 多个战士，带着他们冲进招待所内。当我进去后，又有 30 多个战士跟着冲进来，迅速解除了那些军政要员及其卫士的武装^除一些女眷可以留在自己的房间外，我们将招待所中所有的人都集中在大餐厅内，并立即进行查点。当时查到的有：陈调元、卫立煌、蒋鼎文、蒋作宾、朱绍良、蒋锄欧（国民党政府铁甲车司令）、蒋伯诚（国民党中央委员）、陈继承、蒋百里、萨镇冰、张冲。此外，还有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军统局的几个高级干部。

当住在西京招待所的所有蒋帮军政要员全都被扣押后，我命令他们仍

庄原处，并派李锦峰负责看守。

此外，在东大街花园饭店扣押了郭寄峤，他是卫立煌的“智囊”，也送到招待所看管。至于其他随从人员，则一律集中在新城以北公舍，由席珍儒看管。当时，席珍儒已经解除了中央宪兵团的武装。张希钦在解除警察大队的武装后，即迅速分派部队保护在西安所有银行的安全，并到监狱释放了所有政治犯。

我负责的任务完成后，就到新城向张、杨两将军汇报完成情况。

12 月 12 日凌晨 8 时 30 分，我奉张、杨命令，在新城大楼负责看管蒋介石。

*本文摘自《西安事变亲历记》一书所载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一文。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我在十七路军教导营做党的工作

杨永昶

1936 年 3 月上旬，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派我去十七路军教导营工作。我执陈云樵给营长李振西的引荐信，到教导营后，被分在三连（连长张希文）一排（排长薛蔚）三班当学兵，后当了机枪手。在这前后，陕南一些党的地下工作同志，因为红得在当地站不住了，经临时省委同意，也来教导营当兵，先后来的有巩克中（洋县人）、翟程九（洋县人），还有应招来当学兵的巩克原等。后经临时省委同意，建立了中共教导营党委，指定我为书记，翟程九为组织，巩克中为宣传。我们分工在各连物色对象，培养积极分子。夏天，我们借在皇城西南城下挖防空洞的休息时间，与士兵三三两两在一起交谈平时上政治课的内容，以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爱国爱民、保护人民大众利益等问题，提高士兵政治觉悟。我们按照临时省委领导人孙作宾、崔廷儒的指示，采取慎重、认真负责的态度进行党的建设工作。到 12 月初，在三连和四连都建立起党的支部，巩克中、翟程九分别兼任支部书记。在一连，我发展的党员有王芝田等，直接与我联系。全营陆续发展新党员 20 多名，连同原有党员，共 30 多名。他们处处起到骨干作用。

1936 年 12 月上旬，我们教导营——驻守皇城的唯一部队，开始加强戒严。这时我任上士班长，经常带班值勤巡逻，检查皇城内外特别是“黄楼”附近的岗哨。

12 月 8 日夜间，我刚查完皇城东、北门和“黄楼”附近岗哨，返 N 连部督促换岗时，薛蔚排长要我立即挑选一些可靠、精干的战士，全副武装，紧急集合，跑步到装甲车队。我和八九名战士及时到达装甲车队，张希文连长已在那里，薛排长命令“上车”，急驶临潼方向（平时下午“打野外”，最远到灞桥为止）。将要抵达华清池，才发现我们是第二梯队前面有张学

良将军的卫士营等部队，已包围了华清池。

12 月 12 日捉蒋之后，部队进入战斗姿态，分兵组成小分队，我三连登上皇城西面和南面城墙，布开警戒线，并受命在这天夜晚有目标无口令可以射击。不久，枪声此起彼伏，实为“乱放一通”，以振声威，防御敌人之遭遇袭击。战斗气氛延续到天亮时分。清晨，营部挑选各连精干，组成有一连兵力的战斗小分队，我和多数党员、战士都参加了战斗小分队，立即开赴皇城北门外（在此之前北门是不开的）之七贤庄附近，包围袭击了国民党“别动队”，全部干净地消灭了这一帮害人虫，群众拍手称快。

西安事变第二天，照例出早操，操毕，全营在皇城大操场集合，李振西营长宣布：奉杨将军命令，从今日起，教导营编为教导团。我团一大批官兵，有不少将要提升，荣任重大，一切为着联合抗日，实现张、杨将军抗日主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这是我军人为国效劳的天职，愿我团官兵团结一致，切勿违延命令！此后，我被调到第四连，仍任班长。

1937 年 2 月，崔廷儒通知我，省委决定调我去十七路军黄龙山屯垦大队工作。离开教导团之前，因时间紧迫，又找不到省委崔廷儒，我请准外出假，到宪兵营找到刘湘卿（王力），因为崔廷儒在 1936 年 5 月告诉我，如果见不到他，可找刘湘卿联系，我便把教导团党组织关系交给了刘湘卿，请他代我向省委崔廷儒转交。第三天，我即离开教导团。

# 加入教导营地下党组织

王芝田

双一二事变前，我在教导营当兵，奉杨虎城的指示，在新城脚下挖防空洞。因为杨正人[①]和我很好，关系密切，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他介绍我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不长时间，就发生了双一二事变。事变后，我当了中士班长。一天，杨正人写了介绍信，叫我到云阳去见杨清[②]。我到云阳后，见了一位红军的士兵，接了我的介绍信，叫我在外边等一下，他进屋于拿了几份苏维埃共和国十五年印刷的宣传品，另外给了 1 元钱，说，你是哪里人就回那里作宣传工作再无别言。我回蒲城，县上正成立保安大队，我就参加了。七七事变发生后，省上把保安队和招收的一部分在乡军人送到上海前线抗日，从此我和组织失掉关系。

注：①杨正人，即杨永昶。
②杨清，即欧阳钦。

# 回忆在步训班做党的工作*

李启明

1933 年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失败以后，我们西行到西安考入十七路军步兵学校入伍生队。我同张文舟、胡一廷等几个相互知道底细的人商议成立了党的支部进行活动。当时没有明确谁任书记，后来由我负责支部工作。利用比较公开的环境，研究国ˆ的政治形势，搞些宣传活动。不久，姜旭来了解情况以后，介绍给红二十六军西安联络员涂国琏。对姜旭这个人，我是在冯玉祥办的军官学校认识的，他当时为逃避国民党的追捕隐藏在学校，以后又回到地方上工作。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他在十八师我们又见过面。我们同涂国琏取得联系以后，于 1934 年由他派人送我、张文舟、赵启民、王柏栋等一起从淳化进入苏区，胡一廷等继续留在入伍生队活动。

*本文系李启明 1992 年 1 月 27 日来信。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在步训班三个月

张文舟

1934 年秋，我和李启明等几个参加过抗日同盟军的同志，经河北省委介绍去红四方面军。过西安时，遇到阴雨，路费不足，就落脚到西安，参加了杨虎城的步兵训练班。杨部中有进步力量，其中有些人过去曾参加革命和党组织的（如宋文梅），党在杨部的活动就是利用这部分进步力量作掩护。蒋介石所派去的法西斯分子韩威西，则是杨部中反动势力的代表。其他为中间分子，这些人参加部队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是为了个人混饭吃和做官。步兵训练班为杨虎城直接控制。党派同志去杨虎城的步兵训练班，主要是想作青年军官的工作，争取青年军官。

这个训练班的党员自动组织了一个支部，并与西安市委接上了关系，开展了党的活动。支部中有李启明、张涛和我等。我们根据党的指示，向训练班学员宣传党中央关于与一切敌对军队停战抗日的“三个条件”，宣传“反帝、反日、反对国民党”的口号。方法是组织可以公开活动的“读书会”，组织学员讨论时事问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问题，以及十七路军的前途问题等。我和李启明等同志在该训练班住了约 3 个月，因斗争韩威西派去的班长史俊（把他打了一顿），站不住了，经西安市委介绍，由涂国琏同志送进陕甘宁苏区，参加了红军军事干部学校的工作。

# 从步训班到教导队

张　涛

（一）

我 1932 年在冯玉祥部办的山西汾阳军校（又名第二教导团）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参加冯与共产党合作组织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不久，抗日同盟军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夹击下失败，我和李启明、霍绍汉（张文舟）等几位党员于 1934 年秋来到西安。

当时的国内形势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对我华北等地不断侵略，国内要求抗日的呼声不断高涨，而蒋介石政府却推行了一套“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以此来镇压群众的抗日爱国行动。陕西是杨虎城将军所领导的部队的发源地，我党和这支部队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党组织和党员在其中的活动从未间断过。为了争取抗日武装力量，我和李启明、张文舟利用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第四期在西安招收学生的机会，考入该班学生队。

杨虎城部虽为国民党军队建制，但非蒋介石的嫡系，是所谓“杂牌军”。蒋只是想利用这支部队剿共，从而达到既削弱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又削弱地方武装势力的目的。所以，杨部一贯受蒋介石的歧视，装备上不予补充，数量上不让扩编。杨虎城对蒋的这种企图是十分清楚的，所以想办一所自己的军官学校，培养自己的干部，以免这支部队在众多的武装势力中被吃掉，并伺机扩展。但蒋是不许地方军队办军校的。所以，杨虎城就搞了这个步兵训练班，名义是训练在职的连排级军官，而实际也招收一些青年学生，为自己改造和扩展部队作干部上的准备。他亲自兼任训练班主任，并为训练班题写了“使本军能永远的追随着时代的车轮；使光荣的历史更发

扬而光大之”的题词。

步训班设有步兵队、机关枪队、迫击炮队、骑兵队和学生队。学生队的队员多为中学毕业生，大部分有较高的爱国热情，为学成报国而来，也有少数是因在社会上生活无着来此寻找出路。但这两部分人对如何抗日均不甚了解，更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宣传，有人甚至认为“攘外必先安内”似乎也有几分道理，有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蒋介石身上的幻想。我入学生队后，和李启明、张文舟一起成立了党支部，由李启明负责。党支部和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的孙作宾取得了联系。

白区地下党的纪律是很严的，党员之间不发生横的联系，党支部的活动也很谨慎，有事开会时，也是利用下操的休息时间，装作闲聊的样子，三言两语地传达指示，布置工作。尽管我们能感觉到在学生和教员中有一些人言谈举止与众不同，很有政治头脑，但不知底细不能贸然接近与联系，更不能打听对方的政治身份。如有的教员在上政治课时谈到：“现在的社会，把一部分人逼得没饭吃，这些人就起来反抗，当局就说这些是匪”。谈到抗日问题，便说：“有些人要求抗日，中央（指国民党中央）却说他们是匪。”这类话，在我们党员听来，自然是十分清楚的，这显然是指国民党把要求抗H的共产党和红军称为“共匪”。还有一次，学员反映训练班副主任金闽生“吃空名字”。事情传到金的耳朵里，金并不为自己辩护，而是意味深长地说：“这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这样的回答使我感到金不是一般的旧式军官，而是一个颇有政治头脑的人。而知道金闽生当时就是我党党员并在杨虎城部队中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却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在步训班的学员中，还有许多党员同志在秘密为党工作，如和我们同期而不在一个区队的常黎夫、杜陕山等。我们当时互相没有联系，只是后来才相互了解了对方的身份。

时间长了，逐渐和本区队的学员熟悉起来，我们便以闲谈的方式进行党的抗日宣传工作，以打内战害国害民的事实，来说明要抗日就不能有内

战，打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若内战不停止，将对中国人民造成莫大的灾难。从而使学员逐渐了解“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实质，以及“和平未到绝望，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的提法，实际是为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辩护，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投降。同时，我们还宣传我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使学员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的抗日力量。宣传使更多的人在认识上得到提高，在学员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恨在心里说在嘴上，一见谁是同民党员，就视如仇敌。一次，上面给我们派来一个新的班长，名叫史俊，他管理方法生硬，好骂人，引起大家反感，后又听说此人是个法西斯蒂分子，大家更是义愤填膺，一见到他眼中就冒火，决心揍他一顿。我们暗中串通好，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全班人聚在一起擦枪时，我突然将灯熄灭，张文舟大喊一声“打”！大家默不作声，一起出手，劈头盖脸地痛打了史俊一顿，解了心头之恨。此事发生后，一些有政治头脑的官兵对我们产生了另外的看法。如执行官张志正看到我们不认真操练，便气忿地说：“你们不要捣蛋，有颗炸弹尚未向你们爆发”。学兵郭士毅主动在一个星期天，约我到西安的户县会馆去玩，开门见山地对我说，他是失掉党组织关系的人，问我能不能帮他找到党的关系。后经考察，恢复了郭的关系，他直接与我发生组织关系。但打史俊事件之后，部分学员好似不敢接近我们了。我们分析，打史俊时虽说是熄了灯不出声打的，但张文舟平时嗓音嘶哑，一个“打”字，在熟悉的人听来也是容易辨别的。在一个夜晚，张文舟同我睡在一个被窝内，悄悄说，那天张志正说咱们有颗炸弹尚未爆发可能指的是打史俊的事情，我们可能已经暴露。遂决定离开步训班另寻出路。正在这时，我原在山西汾阳军校的同班同学常清平（党员）从汉中来信说他在汉中三十八军教导队当学兵，按约定的暗语，说他已和那里的党组织接上关系，叫我们去汉中，乘机还可去红四方面军。我们商定，先由我去汉中了解情况，李启明、张文舟后去。于是，我于 1934 年冬，偷偷地离开步训班，到汉中三十八军教导大队去。李启明、张文舟后因情况变化去了陕

北苏区。正好这时三十八军教导队队长王建勋来西安招收学生。他原是我们汾阳军官学校的队长，我们认识。我就利用这个关系，于 1934 年冬天，在一个星期日，以请假外出为名偷偷地离开了步训班，随王到了汉中三十八军教导队。

（二）

三十八军教导大队，大队长由军长孙蔚如兼任，大队副是孙子坤，下属 1 个中队，3 个分队，军官学兵共约 100 多人。住在汉中城内军部院里。

我到教导队后，共产党员常清平把教导队的地下党员李锐介绍给我。1934 年冬天，我们 3 人在汉中西城墙上开了个会，成立了党支部，李锐任支书，常清平负责组织，我负责宣传。当时的党员，我记得有：杨信、毕言昌、吴云智、王化（王写剑）、寇学文、丁俊峰。张西鼎、马洪武、刘汝和是发展对象，我离开教导队时给李锐作了介绍，后来也发展入党了。

教导队党支部不仅发展了一批党员，而且开展了许多活动。第二次在西城墙上开支委会时决定，红军进攻汉中，我们就打开城门接应。红军没有攻城，此计划也未实施。特别突出的，是我们发动学兵群众开展了反对贪污、要求改善伙食的经济斗争。队里司务长有贪污，我们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常清平写了小字传单，晚上利用去厕所的机会撒在院里，揭露司务长的贪污罪行，激起群众公愤。后来把事情闹大了，队里抓了两三名头面人物（都不是党员）。思想反动的王璋如向队长告密，说张柱石（我的化名）是共产党。引起队长对我的注意。在出操时，队长有意让学员们看一些无名尸体，对我们进行恫吓，意思是你们搞革命也是如此下场。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我感到待不住了，于是同李锐商议，还是离开汉中较好，同志们给我们凑了几十元钱，决定由我带了杨信、毕言昌、吴云智、常清平及非党群众王立天、张忠义，于 1935 年夏季逃到西安。根据党的指示，我们接受了新的斗争任务。从此，我离开了三十八军教导队。

# 回忆绥署步训班骑兵队
# 党支部活动情况

刘侠僧

1933 年，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原任省委书记）和陕西团省委书记小章叛变不久，白色恐怖严重，党的组织受到巨大损失。我一时找不到党的组织，国民党特务又到处捕人，在无处可去的情况下，和宁志俊商量决定，到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教导队去当学兵，一则可以掩护自己；二则可以学些军事知识，为以后抓武装斗争作点准备。

1933 年 11 月上旬，师兄宁志俊带我去教导队报名，见了第二连一排长芮忠林说明我要当兵，芮说：“这里又严又苦，你能吃下这苦吗？”我说：“刀山火海都不怕，我最爱当兵，我还会打拳。”芮排长笑了，认为我态度坚决，立即答应，把我分到二班报到。班长张德胜对我还可以，慢慢时间长了，他不认识的生字，我常给教并给讲解，所以有时晚上站岗，他常爱带我的岗，叫给他讲穷人斗恶霸地主的故事。在教导队主要学的是步兵基础知识，每天安排的很紧张，除早操跑步及上午制式教练外，还有刺枪、劈刀、打拳。下午多是野外战斗演习，内容主要是班、排、连的战斗技术，军事生活非常紧张。

王志仁是我在高中的同学，并在一个党支部过生活。有一次出操看见他在三连，当时很难接近。一天饭后，我看他上厕所，我很快跑去，刚和他点一下头，还没来及说话，就听到三连集合哨音响了，他迅速跑去。过了两天我去厕所，他跑来和我站在一起，他问；你没有发生问题吗？我回答：没有。我又问他，你怎么样？是如何来的？他说：“大破坏后，不少人都叛变了，我跑了许多地方，特务抓捕得很紧，最后孙作宾和我商量送到教导队当学兵，已来一个月了。我现在和他发生关系”。我说：只要找

到组织就好了，我从陕南特委回来，跑了两个多月了，特务到处追捕，因在部队掩蔽，终于幸免。以后打听不到组织的消息，我师兄宁志俊才把我介绍到二连当兵，已来 20 多天了。他说：那好，以后你就和我发生关系。教导队纪律很严，今后要注意隐蔽，不能暴露，多交朋友，一定要和班、排长把关系搞好，以免找麻烦。从此以后每个礼拜都要设法联系两次，互通情况。

1934 年元月，步兵训练班奉命组建骑兵队。学生来源是从教导队的一、二、三连和机枪连的学兵中招考，经考试共录取了 54 人，成立了骑兵队。王志仁同志和我都被录取到骑兵队（骑兵队属军官队的建制，它分一、二队、机枪队、步枪队、通讯队、骑兵队）。队长李日新、队附关志超，区队长有杨廷贞、高鹏举、陈钊。当时李日新和陈钊思想反动，表现不好。其他几位比较好些。执行的是鞭策教育，有时还打戒尺，比教导队要稍好些。

组建党支部。经王志仁和崔廷儒同志联系，并把骑兵队学员中的陈涛、田凤岗、张明轩 3 人的关系介绍过来，就让骑兵队成立党支部。当时老崔（廷儒）决定由王志仁同志担任支部书记；我担任组织委员；陈涛担任宣传委员。田凤岗有正式关系，一切会议均可参加，张明轩虽无正式关系，但他对党很忠实，表现勇敢（过去参加过渭华暴动），但自由主义严重，有时表现冒失：爱唱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歌，招人注意。

支部成立后，有了党组织的核心领导，首先决定做好两件事：（1）学好军事动作和基础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在队领导和广大同学中树立起威信，以便更好的开展工作，为今后带兵打下坚固的基础。（2）首先要在灰色隐蔽好的情况下，要广交朋友，越多越好，每个党员最少要交 5 个可靠的知心人，作为尔后的发展对象，方法采取自己报名，不要互相冲突，再经支部研究，最后决定，各负其责，完成任务。

根据学员中各有爱好的特点，结合党员的特长自动组合，如有爱好运动的象球类、武术、体操、劈刺等，就由我主动接近，还可给大家作点辅

导。爱好文艺的，由陈涛去接近他们，陈涛本身就很滑稽，诙谐，把这类同学团结得很好。王志仁平易近人，见人先笑，非常诚恳，

在同学中威信很高，都愿和他接近。他负责一段墙报工作，只出了四五期就停办了。田凤岗和张明轩都有分工。我们和全队同学团结得很好，除个别外绝大多数都能听党员的话，时间不长我们基本上掌握了大家的思想和动态，为以后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除了经常进行谈心教育外，党支部还开展了以下活动：

（一）要从政治斗争转向经济斗争，使群众在斗争中得到切身利益。这是崔廷儒同志向支部提出的战斗口号。当时骑兵队伙食不好，没有油水，很少见到肉，学员经常喊吃不饱、肚子饿，意见很大，常骂事务长、队长喝兵血。另一方面：马的草料不足，瘦了，马园训练和打野外时，有些马跑不多时就出大汗，有些马跑不动，跟不上队伍，大家议论参马长有问题，要清算他的账。支部研究认定这是从政治斗争转到经济斗争的好时机（当时有的队已经成立了伙食委员会），我们支部研究后组织了几个会算账的同学为代表，向值星官先提出来，值星区队长不敢负责，表示同意，叫代表找队长去。代表田凤岗、孙宗岳等 3 人去找李日新队长（当时大家都认为他有贪污）。李日新不敢随便拒绝大家的意见，还假腥喔地把参马长叫来，当着代表的面大骂一顿，并命令回去把账算清。参马长走时很生气，表示不服。看到里面有问题，支部根据情况，研究决定先作参马长的工作，把问题弄清然后再说。派了两个和他关系较好的同学，买了 2 斤腊肉、几斤酒，天黑去参马长房子谈心。他是个见酒醉，又喝不够的家伙，所以喝了几杯之后，把心里话慢慢说出来：“马料全是李日新吃了，每月按数把钱给他送去，还教我如何倒鬼，怎样搞假账等”真实情况都向两个代表倾吐出来。情况弄清了，知道的同学很气愤，对这喝兵血，吃马肉的坏家伙到处议论。当时队附关志超和其他区队长也支持同学。但是队长李日新不会承认他的所作所为，还向几位代表发脾气。

在此情况下，王志仁同志在支部会上提出，我们向杨主任（即杨虎城）

告状，我和陈涛都同意。王志仁亲自起草了报告，把队长和队上存在的不合理的问题揭发出来，叫孙宗岳同学亲自送去（孙是杨的勤务兵），杨主任看了报告后，即派人把李日新叫去，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从此以后队长的气焰刹下去了，大家的伙食改善了，马的毛色逐渐光润了，党员的威信提高了，同学们的情绪更高了。

（二）向高鹏举区队长开展教育斗争

高鹏举是个为人较差的区队长，无论军事教练和口令动作以及战斗演习等都很差，还不如老练的同学动作好。但他官架子还不小，经常爱训斥人，甚至发展到打同学。这样一来大家都很厌恶他，总想和他开个玩笑，总想和他来一个过不去.丢他的脸，扫扫他的威风。

有一个礼拜天，其他队长都不在，高一个人值星在队上，是个很好的时机。叫陈涛给张明轩说：傻哥！你去质问高鹏举，为什么前几天打你的戒尺？他生气后定会打你的，借今天其他队长都不在，你设法把他引出来，围绕宿舍转圈跑，大家不拦木挡都在门前窗口看笑话。张明轩本来对高很有意见，所以就很高兴的去了。到高鹏举的房子去质问他，没说两句话就吵起来了，高拿起板子准备打张，张明轩转身就跑，高在后边赶，张在前边跑，跑了几圈，距离越来越远了，张还回过头来，用手招他说：你来！你来吧！把大家弄得大笑起来。这样高越生气，但他越追越远，他也知道他赶不上，所以坐在宿舍的墙角大喊大叫：“张明轩我要报告队长开除你，你真不是人，没见过你这样的学生。”大家看时间不短了，从房里走出几个同学用圆场的口气说，区队长算了，不要追他了，傻哥跑起来我们都追不上，不要和他一般见识。于是把高劝回他的房子去休息。这个玩笑开的好，用这样不正常的方法，真的把高鹏举这类人教育了！从此以后高的态度转变了，他感到自己很孤立，再不随便训斥同学了。

过了几天，我们向张明轩同志提出，叫他主动去给高鹏举检讨几句，认个错误。张明轩到了高的房子后说：“高队长我错了，向你请罪”，并向高深深作了一个揖，这样把高逗笑了，以后他们两个人的关系还不错。

张明轩同志年龄较大，平常大家称他“傻哥”，和同学们的关系都较好。通过他这次的表演，使高鹏举改正了自己的缺点，大家对张明轩同志更接近了。

（三）支部召开庆祝玉泰吉耀县起义会议

支部平常开会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储藏室的窑洞；一个是厕所外边的角落。王泰吉耀县起义的消息经崔廷儒同志传达，并叫支部召开党的会议表示庆祝。王志仁同志即通知了支委和党员先做好班长和有关人的工作，争取明天早操时都到储藏室开会。

第二天起床号吹了以后，洗毕脸，王志仁、陈涛、田凤岗、张明轩和我都把班里的工作做好，手拿扫帚和抹布向储藏室走去，王志仁看大家都到了说：“咱们召开个支部会传达骑兵团的耀县起义的事。这次王泰吉带领全团庄严起义，这对统治阶级是个沉重的打击，对陕西的革命群众将是很大的推动和鼓舞；对陕北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将起到极大的作用。我们支部召开这个会一方面是表示庆祝和支持，另一方面是要秘密地灵活地在同学中进行宣传，以扩大对红军和骑兵团的政治影响”。他讲完后，大家表示同意他提出的意见和作法。会完后，动手整理内务，打扫卫生，小声唱着国际歌。陈涛这时还幽默地提出，傻哥！你和司务长好，去动员他今天给大家买些肉吃。张明轩笑了，他说试试看。田凤岗说：我自告奋勇和傻哥一块去管保没问题。

骑兵团的义举，在骑兵队已成了半公开的故事了。通过这次扩大宣传和谈心活动，使不少同学同情革命，热爱红军，愿意和党交朋友。

党在步兵训练班的活动较多，有的队组织起支部，有的队采取单线联系。我记得在 1934 年初常黎夫同志还到骑兵队停了很短时间，还和王志仁及我发生过关系，以后就到入伍生队去了。到了 1934 年 11 月骑兵毕业时，那时军事动作要求较高，我们 54 名学员，除个别人外，其他同学的成绩都是好的。不管是操场的制式动作，还是马术教练（马跳障碍及卧倒、各种队形）等，以及野外战斗教练和指挥都合格，各种军事教程、政治课程全

是优等。

我们毕业后，以排级、见习、班级分配到各部队去工作。大部分到骑兵团当干部，王志仁也到骑兵团当排长，并负责骑兵团党的工作。从此骑兵队的支部告终了。骑兵队不少同学到部队后入了党，如张海潮、邵子风、朱政斌、王吉昌、吴智宽、王度等。双十二事变后，有一半同学都去了延安，经过学习后，随我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不少人为国捐躯。

# 回忆西安绥署步训班

何永安

步训班在1932年筹办时，杨虎城的意见是以1925年在陕西耀县以共产党人魏野畴为政治部主任的三民军官学校的模式筹办。训练的对象，先期以部队中在职的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思想进步的连排长（含幕僚）分期分批轮训。在步训班组织人事上，以黄埔军校毕业的思想进步学生任队长或教官，聘用在国外留学回国的思想进步人士担任政治教官。

步训班的编制：

班 主 任：杨虎城兼

副班主任：第一期　　姚国俊（黄埔六期）

第二期　　邹桂五（中共党员）

第三、四期　金闽生（中共党员）

第五期　　韩成西

教育主任：孟庆鹏（黄埔六期）、第五期申及智（黄埔高教班）、教育副官陈云樵（中共党员）、陈毅如（黄埔九期）。

军需主任：王维旭，军需陶夫秩。

总务副官：许慨然

人事书记：汪西山

医务主任：郝延令

步训班初办时，设军官3个队，其中步兵2个队，重机枪1个队。

第一步兵队长：赵国珍（黄埔四期）

第二步兵队长：谢济民（黄埔四期）

重机关枪队长：黄宗佑（黄埔六期）

军官队编为3个区队，每区队编为3个班，每个班学员15人，全队学

员共 135 人。

战术教官：刘　磊（黄埔四期）

赵　斌（黄埔六期）

贾振中（中共党员）

王求恒（黄埔六期）

筑城教官：王振华（黄埔四期）

地形教官：徐鸿文

通讯教官：王佑民

体操教官：高福堂

体育教官：尹子平

政治教官：苏资琛、原政庭、郭则沉、樊玉龙

步训班筹建时，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从节约出发，就以绥署驻地新城东西两侧原有营房，加以整修，因陋就简，作为步训班校舍，划分两侧营房为军官队，后来军士教导队成立时，以东侧营房为队舍，以新城大礼堂为集会堂兼教室。把大楼附近房屋改作教室课堂，新城广场为操场。郊区大雁塔、曲江池、北池头、红庙坡、大白杨等处为野外战斗演习场地。

步训班成立后，军官队、步兵队、重机枪队学员佩戴红色布质黑字印有“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军官队学员”字样胸章。

步训班军官队 6 个月为一期，军事课程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基本战术、应用战术。政治课程：三民主义理论、国内外时事、战争与和平、民主与军纪等。

1933 年军官队第二期学员临届毕业时，杨主任考虑到步兵训练班仅对军官训练是不够的，为储备下级军官人才，决定成立一个军士教导队。全队共计 135 人：

第一连连长　殷义胜

第二连连长　刘卓云（中共党员）

第三连连长　焦义秩（中共党员）

机枪连连长　宁安云（黄埔九期）后张天礼（黄埔八期）

军士教导队成立时，由军官队第二期毕业的思想进步学员中挑选一批任分队长，记得有薛蔚（中共党员）、白昆（中共党员）、尤继贤、师永和、王立志、姚永清（中共党员）等。

为了加速部队军官的训练步伐，以适应新的军事政治形势的发展，除更新部队装备外，在筹办第四期时，除原有步兵一、二两队、重机枪队，又抽调部队中特种兵军官（通讯兵、炮兵、骑兵）编为通讯一队（军用电话）、迫击炮一队（八二型）、骑兵一队。在骑兵队成立时，鉴于部队中骑兵军官缺少，为了增强骑兵骨干力量，由军士教导队中，采取考试方式，择优录取了刘侠僧（中共党员）等 70 余名编为骑兵队学员。同时根据步训班军官队在训练过程中的考验，感到军队中的军官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不适应未来军事技术日益发展的需要，为改变军队素质，决定在西安地区及外县招收一批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进步青年学生百余人，其中有：常黎夫、李启明、杜陕山等人，编为一个学生队（亦称入伍生队），以期训练成为军队中坚强干部。编制扩大后的各兵种队长：

通 讯队 长　李子鉴（黄埔八期）

迫击炮队长　张希钦（中共党员、黄埔八期）

骑 兵队 长　李日新（黄埔骑兵科）

学 生队 长　宋文梅（中共党员、黄埔八期）

为了适应新的情况，对队干部作了调整，挑选军官队第三期毕业的学员王汝昭（中共党员）、张志政、李醒吾（中共党员）为步兵第一队区队长，何永安、程冲霄、何树屏为步兵第二队区队长，李慕愚（中共党员）、王思信为重机枪队区队长。杜毓华（中共党员）、彭述曾（中共党员）为迫击炮队区队长。白宗璧、尤继贤为学生队区队长。军官队扩编后，为了统一训练，调班部教育主任孟庆鹏为总队长，以教育副官陈云樵（中共党员）负责教育处工作。1934 年秋，步训班干部和绥署军官一律佩戴铅质盾形黄色蓝字新生活纪念章。

步训班在蒋介石日益明显的排挤下，杨将军经再三考虑，从部队的前途和未来抗日的需要出发，避免与蒋矛盾激化，委曲求全地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但又考虑到军队的军官训练任务尚未完成，还不能完全撤销或停止，为完成训练任务，故决定在第四期学员毕业后，筹办第五期，将原来的 7 个队缩编为步兵一、二、三队，一个学生队，并将主要人事作了调整。调十七师副旅长申及智（黄埔高教班）为步训班教育主任。调学生队长宋文梅（中共党员）为步兵第三队长，调军士教导队长张天礼为学生队长。宋文梅的调职，据说因在任学生队长时办《石鼓》刊物，被国民党陕西省肃反头子宋志先以共产党嫌疑捕押。此时杨主任在陕南视察军事，知道后，打电报给国民党省党部要回后，调任步兵第三队长。缩编军官队的同时，撤销已届毕业的军士教导队，原抽调的部队受训的班长回部队工作。在西安招考的学生和队干部并编到西安绥靖公署李振西教导营做骨干。

# 西安绥署步训班教育情况

于景琪

1933 年 9 月，我和蒙定军（共产党员）同志，由汉中原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军部参谋处去西安绥署“步兵训练班”受训（那时把学习叫受训），1934 年 5 月毕。仍回原部队工作，正式学习时间为 6 个月。

我们这一年学习，是“步兵训练班”军官队第三期。步兵训练班的教育内容。军官队 6 个月为一期，所学（一）术科：包括基本教练和战斗教练，即操场上训练和野外演习等。（二）学科：有所谓四大教程，包括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和四小教程，包括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内务规则。另外还有些其他学科即战斗纲要、交通学、陆军礼节、陆军惩罚令等。（三）政治课：主要是三民主义、国内外时事、精神讲话等。

我记得有一次，杨虎城用了 3 天的时间给第三期学员讲话，其内容为“我的自述”，其内容概略为（一）我的家史。（二）组织“中秋会”，反对清廷和贪官豪绅。（三）反对北洋军建立靖国军。（四）坚守西安，声援北伐战争。（五）东出潼关，参加北伐。最后末尾他讲：回望十七路军来之不易，你们不要忘记这个历史。你们都是部队的军官，要发扬十七路军艰苦奋斗的精神。十七路军过去在长期战争中，无暇训练，今天办步兵训练班，就是为了提高你们的军事技术和政治水平。有人指责说，我办训练班，是什么野心，搞什么大西北主义等等。我对大家说，我是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宗旨，以保卫国家、抵御外侮，尽军人太职为目的，别无他图！你们要体会这一点。希望你们到部队后，要发挥学到的军事技术，还要有政治远见，为国家民族贡献力量。

# 绮云在西北新闻战线

曹绥社

我在 1932 年 1 月到 1937 年 8 月这一期间，两度在《西北文化日报》社担任编辑。1932 年冬到 1935 年春，曾离开报社约两年，因此这一段时间的报社情况了解不多。现就个人记忆所及，把当时宋绮云在《西北文化日报》、《边闻通讯社》、《西北画报》、《救亡周刊》的一些片断情况简述如下：

《西北文化日报》与宋绮云《西北文化日报》（以下简称《文化日报》）创刊于 1931 年上半年。1930 年 10 月末，杨虎城将军率十七路军入陕，赶走了冯系陕西省政府主席刘郁芬后，蒋介石成立了潼关行营，以顾祝同为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文化日报》作为潼关行营的机关报在西安创刊了。当时负责筹备《文化日报》的是杨虎城的秘书陈必贶。不久，潼关行营撤销，成立了以杨虎城为主任的西安绥靖公署，《文化日报》也随之改组，成为西安绥靖公署的机关报。报社社长由十七路军宣传处处长陈子坚兼任，实际负责的是宣传处宣传科长宋绮云，宋以总编辑名义代行社长职务直到 1937 年。西安事变结束，杨虎城被迫离陕出国前，拨出一部分钱作为《文化日报》的基金，报纸由官办改为民办，并组成董事会，韩望尘任董事长，李子健为社长，社址由五味什子安徽会馆迁至北大街路西（现人民剧院偏南斜对门）。

《文化日报》创刊初期，发行数仅有 2000 多份，以后扩大发行到十七路军各连队。份数增至 5000 多，西安事变期间，骤增至 18000 多份。

报社组织分编辑、营业（包括工务）两部，编辑部由宋绮云负责，担任编辑的先后有张从仁、曹冷泉、和非玄、卢养纯、马书展、曹绥祉、刘明深、陈斡伯等，分负拟写社论、编辑新闻副刊之责。外勤记者先后有杨

宾青、马子静、崔志学、张益斋、曹洁天、苏信梓等。校对先后有邵幼和、边西贡、吕献俊、党国斌、李森等。译电员是徐志成。营业部在1932年上半年以前由王璋峰（尚德）负责，王离社后宋绮云兼管。营业部下设机器、排字、石印、广告、发行、会计等组，工作人员有郭子刚：何连三、康永信、吕启明等。

国内外新闻主要是每日收抄国民党通讯社播发的电稿，并选登国内外其他通讯社的通讯稿；省市新闻由报社记者采访和外地特约通讯员供稿，经济新闻靠陕西省银行供给。

《文化日报》的经费，本由西安绥靖公署每月拨付5000元，在1932年前后，因经费不能按月领取，职工工资不能按月发给，情况一度极为困难。后来报社采取扩大报纸发行，招登商业广告，代印书刊等办法，借以增加收入维持出版。就在这时报社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叛徒马子静联络卢养纯、马书展煽起反对宋绮云的风波。他们污蔑宋绮云贪污经费、养活闲人、扣发工资，想把宋赶走取而代之，实际情况是西安绥靖公署这一期间因财政困难欠发报社经费，职工工资有所拖欠，并不是宋有贪污。至于所谓养活闲人，是指当时徐州地区与宋绮云有关的地下党员，因躲避白色恐怖来到西安找宋，宋为解决这些同志的生活问题，在报社西边开了洗衣房，以后又集股在莲湖公园开了一个“莲湖食堂”，先后安排了这些同志，宋并未动用过报社的经费。报社职工对此都很了解，所以马、卢等人的煽动没有成功。后来马子静、卢养纯灰溜溜地离开报社，到国民党省党部公开做爪牙去了。

另一件事是报社代印进步书刊，被敌人查出的风波。1932年夏，西安高中地下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派宋树贞同学见我，要求由“西美书店”翻印瞿秋白著《中国向何处去？》和云峰编的《中国革命根本问题》这两本书。我答应了这个要求，并在取得了宋绮云的同意后委托报社代印。同年冬天，在书印成时，由于有人告密（解放后据何连三说，是桑钰民告密的，桑系国民党特务，伪装进步经常到报社来），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宋志先带着

武装士兵和特务，要找兼《文化日报》社社长的陈子坚一同到报社搜查。结果在营业部郭子刚的床下搜出这两本书的印本，还搜出赵文杰交印的《飞跃》和西北商专抗日救国会张秀清交印的《告西北民众书》等进步书刊。宋志先认为证据确凿，质问宋绮云为什么要印这些书刊？宋说：“这是营业员承印的，我不知道。”宋志先又问郭子刚，郭说这两本书是曹绶祉给“西美书店”印的，宋志先即派特务押着郭子刚先后到“西美书店”和我的家里，但都没有抓到我，于是就把郭子刚逮捕扣押了起来。事情发生后，地下党负责人王超北同志认为我已不适宜待在西安，遂派我到汉中、安康、北平等地去工作，我即离开了《文化日报》社。

1935 年春，我由汉中又回到西安。这时宋志先已离开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到国民党陇海路特别党部当书记长去了。宋绮云不怕担风险，让我回报社仍做编辑工作。1937 年《文化日报》改为民办，由李子健任社长，不久，我即辞去报社职务，经宋绮云介绍到《救亡周刊》搞发行工作，同时兼办《新华日报》分销处业务。从此便与报社脱离了关系。

《文化日报》同反动派的斗争《文化日报》在宋绮云负责期间，在党的指导下，以他公开的身份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各种合法的斗争。当时报社有不少地下党员、进步人士和进步青年。宋绮云对教育工人相当重视，派党国斌教工人唱革命歌曲，举办学习班。我经常看见地下省委程建文（即陈建中，后叛变）到工人中去和工人交谈。1932 年我和徐志成、何连三在地下省委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小组，负责革命互济会工作。限于当时环境，我与报社其他党员没有发生横的关系，但大家心照不宣、互相默契。当时我认为，党在《文化日报》的领导核心是宋绮云、邵幼和、边西贡等同志。宋绮云经常和徐彬如、谢华等同志来往，解放后才知道徐、谢、宋都是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成员。《文化日报》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坚决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支持群众和青年学生的爱国救亡活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社会黑暗面，以及国民党人的罪恶行径，它同反共反人民的《西京日报》的宣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在广大读者中有良好

影响。尤其在西安事变期间对党的统战政策和张、杨八项主张的宣传，更是起到了人民群众的喉舌作用。事变结束后，国民党新闻检查处恢复，规定凡是《社论》及重要新闻连同报纸大样必须先后送审，他们对《文化日报》送审的稿件处处刁难，一篇稿件往往送几次都通不过，不是不让发表就是横加删削。为了对付这种情况，报社在被删削的地方留下一块空白（即“开天窗”），以示抵抗。有时国民党省党部交来反动稿件强令刊登，我们则采取拖延时间和分段连载的办法来搪塞，弄得他们无可奈何。

《文化日报》由于不断揭发贪官污吏，也招来过不少麻烦。我记得 1932 年，报纸因刊登泾（阳）、原（三原）、高（陵）、富（平）、临（潼）5 县绅民联合控告泾惠渠水利工程处贪污的案件，因揭发了伪县长赵宝珍的贪污罪行，反被告到法院，打了一场官司，结果遭到勒令停刊数日的处分。

《文化日报》在重重压力下，为什么能在 1937 年前继办下去呢？主要是地下党的关怀和支持，以及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宋绮云领导下团结战斗的结果。同时，也是由于得到了群众的爱护，以及它和西安绥靖公署的关系，国民党要封闭《文化日报》是有所顾忌的。当时杨虎城与蒋介石的矛盾和斗争已尖锐，蒋不敢因《文化曰报》的问题同杨虎城发生正面冲突，所以迟迟没有下手，及至《文化日报》改为民办，杨虎城出国后不久，即遭到反动派的强行接收，沦为他们反共反人民的工具。

**注：**①宋绮云实际参加了西北特支领导工作，但不是该特支成员。

# 宋绮云与《西北文化日报》

曹冷泉

40 年前的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共同发动的，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杨虎城将军于 1949 年 9 月 6 日午夜 12 时半惨遭蒋介石杀害于重庆松林坡，同时同地被杀害的还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老一代革命新闻工作者宋绮云。杨、宋两人都是“生也千古，死也千古”的英雄人物，有功于国家民族，他们将永远为全国人民所怀念。

由于杨、宋两人长期共事，8 载同狱，很多人把宋绮云当成杨虎城的秘书。其实，绮云从 1930 年起，即在杨虎城部作新闻宣传工作，他没有担任过杨的秘书。

我因参加营救齐国庆失败和参加太和、刘集暴动失败，受到反动派的通缉，江南已无立足之地，乞讨流亡到西安，遂由绮云介绍我到《西北文化日报》担任副刊编辑。

《西北文化日报》是解放前在陕西地区存在较久的值得纪念的一个报刊（以下简称《文化日报》），在它将近 20 年的历史中，不仅反映了蒋介石政府的黑始势力在陕西的嚣张，同时也表现了陕西人民反对蒋政府和争取抗日救国斗争的某些过程。《文化日报》虽然创办于反动派之手，最后的一个阶段又为反动派劫夺，但在中间阶段，有六七年之久，却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为革命事业出了很大的力。有许多同志为办《文化日报》受到蒋介石长期的监牢折磨，尤其是宋绮云同志为了党的新闻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中国新闻史上永远留着光辉的一页。

杨虎城将军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后，接收《文化日报》，派陈子坚为报社社长，宋绮云同志为副社长兼总编辑。实际上陈子坚未曾过问，报社

业务始终由宋绮云同志主持。

由于绮云社会工作忙，有时外出，则让我代理社长及总编辑职务。因宋绮云同志甚得杨虎城将军的信任，所以《文化日报》有条件为革命事业做出一定的贡献。

采绮云同志于 1931 年 7 月到报社任职，1937 年 4 月辞去职务，历时将近 6 载，这是《文化日报》的主要阶段。在这一阶段，报社虽有杨虎城将军予以实力支持，但彼时陕西国民党省党部和特务机关都是极其猖獗的；因此，《文化日报》面临重重困难，所进行的斗争是极其艰苦而复杂的。

在这期间，前后担任编辑工作的还有曹绶祉（已故）、张从仁（已故）、边西贡（已故）、刘森、陈斡伯、周明达、邵幼和（已故）诸人。担任采访工作的有杨宾青、张益斋、曹杰天诸人。担任事务工作的有吕启明、何连三、郭小刚、李森、徐志成诸人。这些人员在宋绮云同志领导之下，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报社做了工作。

在这期间，《文化日报》所以能在文化宣传和革命宣传上取得一定的成绩，是与党的领导分不开的。绮云同志到报社后，就竭力争取党员同志参加报社工作。报社中有党员宋缚云、曹绶祉、何连三、李森、徐志成、周明达、周西林、邵幼和，初期还有刘永言等。其余的工作同志，在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很多与党发生了联系或倾向于革命，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在编辑室中大家见到红军胜利的消息，无不为之欢欣鼓舞。1935 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根据地，绮云同志约了部分工作同志，开了庆祝会。《文化日报》所以形成这样纯洁的团体，也是经过斗争的。1931 年冬，反动分子马子静、马书展、卢养纯等曾一度混入《文化日报》进行捣乱，指责绮云同志在报社养了许多“闲人”（实是南北过往的同志在报社寄宿）。绮云同志和报社同志费了很大力量才把马子静等清除。此后，报社中就没有一个国民党员。为了避免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猜疑，绮云同志指示张益斋参加了国民党，以便为报社作掩护工作。

在西安事变的前几年，《文化日报》虽有杨虎城将军的支持，但那时

陕西的国民党省党部肃反委员会，视《文化日报》为眼中钉，特务头子宋志先（山东人）、彭震寰（江西人）对《文化日报》的压迫从未放松。1931年周明达被捕，1934年秋郭子刚被捕，并追捕曹绶祉。同年秋，曹冷泉被捕，囚禁数月。1936年李森被捕，至今下落不明。李森同志是陕西南郑人，到《文化日报》工作时年仅20岁。宋绮云同志更为了《文化日报》遭受反动派的嫉恨，于1941年被捕，最后惨遭杀害。

在那种艰苦黑暗的岁月里，稿件被扣留，报纸开天窗，人员被传讯，是经常发生的事。但绮云同志并没有被他们的反动气焰所吓倒。1935年10月，蒋介石来西安视察，各大报都按反动当局的规定，以头版头条特大标题报道了这一要闻，唯独《西北文化日报》则用2号字头版二条报道了这一消息。在排版中又把蒋介石的蒋字去掉了草字头，结果这条新闻就变成了“将”委员长飞抵西安……有人怕事情闹大招来祸端，建议暂不发行。绮云同志坚定地说：“快发，如果有人追问就当不知道。”等有关当局前来追问时，报纸已经发出去800多份。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派政府科员徐〇〇报社说：邵主席传见宋社长说话。当时报社的同志都为绮云同志捏一把汗，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宋绮云态度自若，一点也不惊慌。邵力子对宋绮云大加训斥，说这是一种政治性错误，指令他查出原因。宋绮云只是说这是工作的疏忽，下次一定注意。邵力子还警告说：你们报纸对政府的政策从没表示过拥护的态度，还经常散布消极言论，这是政府不能允许的。当绮云回到报社，大家围拢来关切地询问时，绮云同志只是笑咪咪地回答说：收获很大，收获很大。

在这时期，《文化日报》不但在版面上与反动派作了极其复杂曲折的斗争，同时对于社会上的各项革命活动，也尽了很多努力。1936年，绮云同志不但自d参加了救国活动，同时还派曹绶祉、李森等人协助谢华、郑伯奇等同志办《救亡周刊》。那时西安各种进步刊物多由《文化日报》代为印刷。《文化日报》前后还印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瞿秋白同志著）、《中国革命根本问题》（云峰著）、《辩证法浅解》（宋绮云同志

编、署名月溪）及延安所发来的各项文件。所有这些书刊，绮云同志都每于百忙之中亲自校正，印成后交曹绶祉设法销售散发，或交何连三同志随《文化日报》邮寄边远县份（当时连三同志任发行主任）。

1934 年秋，国民党特务头子宋志先侦察出《文化日报》印发革命宣传刊物，亲自带武装特务到报社查抄，当即查出上述各种刊物及赵文杰同志新编的《飞跃月刊》时，立即要捕社长宋绮云同志。陈子坚来报社调停，说：“这些刊物是营业人员为谋利起见私自印刷的，绮云确实不知此事。”因此营业员郭子刚被捕，特务们百般逼迫郭子刚供出报社革命活动情况及《飞跃月刊》的编辑。郭子刚平日受绮云的教诲，任凭敌人严刑威逼，他只承认因生活所迫，为了赚钱，而不愿牵连绮云和报社其他同志。敌人将郭子刚关了一个礼拜，毫无所获，即放出。因我是报社负责人之一，随即就把我抓去了。特务恶狠狠地审问我：“《西北文化日报》印了许多共产党的文件，进行了许多反国民党的宣传，都是谁指使的？”还说，他们知道我是共产党。又逼我承认我和绮云 1927 年都参加过徐州暴动，是一同逃来西安的。实际上，1927 年我和绮云均不在徐州，我分析出他们并未掌握过我的底细，其讹诈的企图，不过是想通过我的口供出绮云等人共产党员的身份，以便逮捕绮云，从而压垮《西北文化日报》。我看穿了特务们的鬼魅伎俩，坚决否认。后来，由于绮云同志等多方设法，杨虎城将军出面保释，才使我幸免于难。

《文化日报》的经费虽困难，但绮云同志总是设法拨出一些经费救济革命同志，并以《文化日报》社为据点，掩护接待来往的革命同志。如郭子化同志在苏鲁豫皖进行革命活动，绮云多次予以经济上支援，他每次到西安或去延安经过西安都吃住在绮云同志家，由林侠同志招待，走时还为他缝制衣服、棉被；宋日昌同志赴日本时，《文化日报》曾寄去旅费；丁毅忱、王鲤泉、周西林、孟清鉴、苏鸿鉴等同志来西安都由绮云同志安排公开职务作掩护，有的则长期住在《文化日报》社。周西林同志赴延安后，绮云同志仍设法予以接济；毛泽民、钱希钧（钱君陶）去新疆路经西安，

也是由绮云同志派何连三同志专门照顾安全及生活，并以旅行记者身份，通过敌区到达新疆的。潘自力从国外回来急于和党中央取得联系，也由绮云同志以记者身份护送至川陕苏区。1934 年谢华同志经西安去宁夏进行革命活动，就是绮云同志给安排为《文化日报》旅行记者的身份，才得以胜利往返通过国民党统治区；1935 年华侨青年陈豪、朱棠 2 人来西安，绮云同志立即予以救济，并设法送他们到延安。陈豪到延安后即入中央党校，后派往东北工作，于抗日战争初期壮烈牺牲。朱棠同志现在广西工作，曾来信云：“我每次读《红岩》看到绮云烈士惨遭反动派杀害，即不禁热泪横流，今后当更好地工作，以报答先烈在天之灵。”绮云同志在报社内，善于团结同志，发现人才，特别是对受到敌人追捕通缉的同志都根据其特长安置适当职务，既便于掩护又便于开展工作。当时报社内的同志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许多人受过大革命的洗礼，有较高的革命觉悟。绮云把年长的当兄长.年轻的当弟弟，从工作到生活都关怀备至。例如杨宾青家有丧事，经济困难，他就帮助办理；曹绶祉受敌人追捕，被迫离开报社，一时找不到安身之处，他让报社秘密地继续发给工资；青年徐志成、李森结不起婚，他发动大家出资互助。当时，我们都把报社当成自己温暖的家庭，把绮云当成自己的当家人，特别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在我被捕期间，他特请杨虎城出面说情，千方百计设法营救，为我送吃送穿，照顾我的家庭。我出狱不久，又因副刊上的一篇文章，触怒了国民党省党部，又要传讯我。绮云分析了情况，决定让张熙嘏代我应讯。绮云风趣地说：“熙嘏快去理个发。”张熙嘏问：“理发作啥？”绮云讲：“准备坐牢！冷泉兄去应讯对工作不利……”熙嘏勇敢地说：“坐牢我也去！”熙嘏本来协助编辑副刊，平时不太为人注意，特务那边还未挂上号，绮云认为由熙嘏出面，有利于斗争。正如绮云所料，熙嘏和绮云去后，在敌人面前把这件事情搪塞过去了。

1935 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谢华、徐彬如、李木庵等同志相继来西安，根据中央指示，着重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

动，绮云通过《文化日报》坚决贯彻了中央的指示。

为了推动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绮云同志充分利用报纸这个阵地宣传抗日，反对内战。他先后写了《今年国庆所感》、《国民军之奋斗与今日之国难》、《纪念总理与解救国难》、《募捐援绥运动》、《亟需组织起来作长期抗战》、《德日、意日两协定宣告成立后我国之外交出路》。在这些文章中，绮云大声疾呼：现在举国痛恨于内战，内战之训不足取。古人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足见凡是中国人，决不愿作亡国奴，某方对我们压迫越甚，我们反抗力量愈强，这是极自然的！”

东北军有亡乡离家之惨痛，对抗日大为热情。绮云在九一八 5 周年之际，亲撰社论指出：九一八者，非可以认为历史之名词，实乃民族之血的教训，国家之巨创深痛。此种教训，此种创痛，在今日尤斑斓鲜姿，溃伤未复，如钉在脑，拔之未果，隐痛正剧；如刺在心，按之犹在，酸楚非常。我国人如认为九一八已成过去，则诚为天地间最麻木不仁之动物。如认为无可奈何忍受无异，则成为世界上最没出息之人类……国人在此大敌当前，宜有相忍为国之大觉大悟，共同对外。

10 月 19 日，革命文豪鲁迅先生逝世了。西安各界在革命公园举行追悼会，反动当局派出大批军警阻挠开会。《文化日报》第二天即将国民党阻挠开会的丑态揭露报道之。最后在绮云的努力下，终于成功地召开了追悼大会。绮云亲自主持了这次大会，并为此写了社论。

10 月下旬蒋介石亲自到西安逼迫张、杨 2 将军继续“剿共”，并大肆散布“攘外必先安内”之谬论，因此激起人民的愤怒。《文化日报》为此又发表《谁能了解》、《救亡图存最低限度之条件》。列举了日军之野心与得寸进尺，呼吁四万万同胞“我人痛感国族之危亡，为奴为婢之耻辱，不得不呼吁全国上下，一致作自己领土主权之争，不但自己而已，而且须收复失地，还我金瓯，洗刷腥膻，复我独立自主完整之国格。”

12 月 11 日夜半，新城大楼（杨将军办公处）来电叫绮云立刻到新城去，接着李兴中参谋长派车来接。到早晨天将明时，西安市上空突然响起了阵

阵枪声。当时正忙于工作的《文化日报》编辑部，大家都紧张起来，因为西安连日政治空气紧张，大家都能判断这枪声发作的原因。天亮时，绮云从新城大楼回来，他带回张、杨 2 将军对时局的 8 项主张及有关文件。当时编辑部顿时欢腾起来，比过新年还高兴。12 日这一天，全市各报都停刊，唯《文化日报》连发二期号外，用通栏标题登载了张、杨 2 将军对时局的 8 大主张的全文，发表事变的真相。同进，也登载了张、杨 2 将军给全国各地的通电，尤其使人称快的消息是：蒋介石在临潼被捉获。号外印好后，绮云又动员全报社职工上街向市民免费散发。当人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之后，无不拍手称快。

此后数日，西安市一片欢腾，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文化日报》更是一马当先，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报社的同志们在绮云同志的领导下投入到火热的群众性革命斗争中去了。

《文化日报》在事变前，由于特殊的环境和地位，为争取合法地存在，平时极少发表社论，大多以作者署名发表专文，以对重大问题表示态度和立场。事变的爆发，以前的做法显然不合新形势的要求，绮云根据西北特支的意见，加强了报社评论工作，以推动事态向前发展。应各界宣传工作的需要，新辟“救国言论”专栏，专门发表群众抗日言论。绮云同志本来就才华横溢，在这梦寐以求的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更不负众望，在这一时期，几乎每日都有社论和专论，或者以他个人署名的文章，发表在《文化日报》上。有的文章一反过去欲言又止的含蓄态度，公开赞扬中国共产党“实为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大多数劳动群众的利益”，公开指出“剿共”是 10 年来错误之国策。

13 日《文化日报》发表社论《昨日张、杨兵谏与八项救国主张》以及绮云的《何处是中国的生路？》的评论，详细报道了“事变”的起因，评价了“兵谏”的意义和影响，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出：“当此寇深国危之日，不积极出兵北上援绥，反调 260 个团以上之

大军及飞机数百架集结于西北，西北各将领及数 10 万士兵忍无可忍……实行兵谏促其省悟”。并强调革命事变往往是反革命派极端压迫的结果。绮云还断然指出：不抗日中国无出路，不反帝中国无生路，南京政府到处扑灭抗日运动，屠杀爱国青年，认国人为仇者，视敌人为父。在中国这种情势下，谁能领导抗日，谁便是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谁便是人民的领袖。

在此期间，绮云根据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写了《一二•一二兵谏的伟大意义》宣传大纲，连续在《文化日报》上刊登，以指导抗日救亡运动。绮云针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在西北还有市场的情况，又写了《辟安内攘外之谬论》、《辟蒋介石之准备论》等文章，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卖国投降政策，这对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阶级觉悟和爱国思想，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所以，蒋介石和国民党特务对宋绮云同志都恨之入骨。

16 日，按照立即释放被捕之爱国领袖之规定，打开了国民党陕西省监狱，营救出被关押的革命同志，其中有中共党员、红军战士，也有思想进步的革命群众。时值隆冬，这些同志在监狱长期受摧残，出狱时还穿着不蔽体的单衣。为给阶级兄弟解决御寒的服装，绮云除亲自走访各救国会外，还派杨宾青、邵幼和、何连三和我向广大市民募捐。报社同志每人也捐了 10 元或 20 元的救济金为受难革命同志、红军战士购买寒衣 180 余件，由绮云代表各界群众慰问这些被害的同志。当时出狱的同志穿着簇新的棉衣与代表见面时，无不热泪盈眶。《文化日报》社还派记者采访了他们，并以《女政治犯访问记》、《奔腾在大海里——政治犯速写》为题，进行了报道。

25 日，蒋介石在离陕赴洛阳之前，在临上飞机之前的顷刻，向杨主任表示 6 点具体意见：“（一）明令中央入关之部队于 12 月 25 日起调出潼关……；（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之国家；（五）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

张、杨两将军负责。”对此事件解决，能否顺利实现，绮云在披露蒋之 6 点谎言后指出：“我们并不是不信任蒋委员长之慷慨诺言，而是敬告大众不能放弃自己的主要任务……；（一）继续发展群众运动；（二）加紧各党各派合作；（三）积极建立西北军、东北军、红军间之密切关系……则救国之大计或不至于流产。”

蒋介石回到南京之后，背信弃义地扣留了张学良将军.一方面派大军进逼陕西，另方面又向西安上空投了一些反动报纸，再加上西安潜伏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形势步步逆转，西安军民感到彷徨。幸赖中共代表团在这艰险时刻，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周恩来副主席的直接指示下，绮云同志不顾疲劳通宵达旦地工作，他根据事态发展的需要，连续发表了《剿共工作之停止与抗日联军之成立》、《民众与张、杨的救国斗争》、《张、杨的兵谏与八项救国主张》、《南京飞机政策的错误》、《还想挑动内战吗？》、《组织民众武装到自力抗战》等文章。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由内战到抗战的历史转变。绮云同志在这期间，面对复杂而又紧张的局面，主持《西北文化日报》，在宣传战线上投入战斗。仅他亲笔撰写的文章，就有五六十篇之多，对推动运动向前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西北文化日报》报道正确、及时，市民争订，所以它的发行量在事变期间从原来的五六千份一跃达 18000 多份。周副主席曾勉励绮云同志：“西北军在西安事变之后，更需要做好部队的团结工作，任务更加艰巨了，要坚守阵地。”

周副主席在离开西安之前，还交给绮云一件任务，要他设法搞到一套印刷设备。原打算将《文化日报》机器运走的，后来考虑到这机器是杨虎城将军的。绮云便召集邵幼和、杨宾青和我 4 人共同商议，决定将我们私人集资买的《西北画报》全套设备及全部器材（包括对开机、铅字、铜模、照相设备等）运送延安。并由《西北文化日报》选派觉悟高，技术好的工人武志善、郑天柱、姜尽如、李广元、胡明伯、唐永谦、党应孝等赴延安工作。铅印、装订、排字等人才完全具备，使延安的印刷事业增加了很大

的力量。《新华日报》也由石印改为铅印了。后来，在绮云同志卸去《文化日报》社职务时，有些接收的人员不知此中的情况，到处叫骂，说《文化日报》社的机器被宋绮云等人盗卖了。当时，我们只好置之不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西安市并不和平，特务又猖獗起来了。《文化日报》仍然不屈不挠，坚持抗日救国的主张，因此，更为反动派所不容。1937 年 3 月 28 日黎明时，报社突然起了火，火势凶猛，印刷室、总务室立刻被焚。在西安事变时，绮云同志曾向绥靖公署请领一批枪枝弹药，在烈火中爆炸起来，因此，引起反动派的一场虚惊，派来军警镇压，禁止报社人员抢救东西。事后查明，那火是特务们放的。那天黎明时，特务们装扮成送菜的小贩，混进报社，见报社人员多已休息，特务们遂乘机放火。在火势凶猛时，反动派所办的《西京日报》的特务们，在众目睽睽之下拍手叫好。于此，可见反动派对《文化日报》仇恨之深。绮云同志当时见此情况，非常气愤，曾激励同志们说：“不管反动派怎样猖獗，我们《文化日报》必须办下去，并且今天必须把报印出去！”当天我们全体人员在灰烬中整理机器，收拾东西，同时，请十七路军的印刷所把报印出去。第二天机器整理就绪，报纸照常出版。

西安事变之后，杨虎城将军以为只要蒋介石能接受抗日主张，一切都可让步。当他被撤去军职后，又令其出国“考察”。绮云同志平日即为反动派所+容，尤其是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活动，态度鲜明，不能再继续在《文化日报》社任职，杨虎城将军建议绮云同志出国学习，并为其提供出国经费，后因抗战爆发未能成行，遂派李于健同志继续任《文化日报》社长职务。1937 年 4 月，我与绮云同志同时离开了报社，绮云和我心情沉重地告别了报社的同志们。但是，我们并不懊悔。绮云说：“在西安经历了 7 年惊心动魄的斗争，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毕竟实现了。”

# 回忆在十七路军总部无线电台做党的秘密工作

程卓民等

1931 年秋，十七路军总部无线电二台给西安各报社抄译新闻供给各报社电稿。双方协定每月给电台津贴 300 银元。但台长时毓林竟把全部津贴 1000 余元独占肥私，引起了电台全体职工极为不满。经李玉庭（中共党员）与焦维炽（陕西省委委员）商定，因势利导，组织群众进行合法的经济斗争。由李玉庭同志主持，经群众选出代表，直接与台长说理谈判。台长怕激起群众公开斗争，把事情扩大在报上公布宣扬到社会上去，对自己不利，被迫签名将全部津贴还交群众。在斗争即将胜利之际，总部交通处长李百朋闻悉后，依仗权势亲自插手到电台处理此事。他利用行政手段以台长违犯纪律为名，撤掉了时毓林的职务，由他兼代台长，并勒令时退出全部津贴费，转入交通处会计账内，借口上缴，欺骗职工，实则独吞。与此同时，李百朋察觉到电台职工敢于抓住时毓林独吞津贴费之事进行群众斗争，必有政治背景。而时毓林对李玉庭、程卓民（中共党员）也怀恨在心，不肯甘心丢官。因此，李百朋、时毓林暗中勾结，狼狈为奸，欲借机除去其心腹之患，于 1932 年初，趁十七师调往兰州之机，将李玉庭调到无线电第三台任报务主任。不久，又将程卓民调任无线电第五分队长。因此，这场群众性的经济斗争的胜利果实竟被李百朋窃取了。

公开电台，秘密地利用。在 30 年代初，程卓民是杨虎城部队电台[队]的一个报务员兼队长。他用公开、合法的军人身份和他善于广交朋友的社会关系，不顾个人安危，在西安设法掩护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的工作和人身安全。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程卓民同志还未入党时，就在他的电台和家里

掩护王曙、焦维炽同志，生活上照顾，经济上资助。

1931 年春，当焦维炽的工作住地被敌人察觉时，他不避危难，积极地掩护机关安全，由西安市开元寺迁到圪塔寺。同年秋，焦维炽和李相九交给程卓民和李玉庭一份英文电报，经程发往上海（内容记不清了）。

在白色恐怖环境中，我们交了许多朋友，其中同情革命、支持我们的人有：马乘元，他是非党员，但他在白色恐怖下，不畏艰险，接受了王曙的委托，在西安至善巷他姐姐家中让出一间房子，由王曙、伍立三（同情革命者）住宿，秘密地掩护了处于危险境地的焦维炽夫妇和贾拓夫同志，使他们脱离险境，转移到安全地区。

樊子兴利用他在西安孤儿院的社会关系，1933 年 7 月间，在杜衡叛变后，在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保护了王曙和洪杰。

1933 年秋，王曙同志由西安专程到渭南程卓民电台与程取得了组织联系。在这里，他认识了进步青年雷振岐。翌年 3 月，王曙患病，又由程卓民资助到北平治疗。洪杰到电台后，电台领导人一直不让他上机工作，受到排斥，因此，洪杰由樊中黎、傅锡升同志（均中共党员）介绍，离西安到张汉民团当了电话兵。

1934 年底至 1936 年初，无线电第五分队驻在西安期间，正是红二十五军入陕后在商洛一带反“围剿”战争节节取得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之时，当时在杨虎城总部交通处直属单位工作的地下党员程卓民、高克林、王曙等同志利用他们的军官身份，常到程卓民同志处聚会，进行革命活动。1935 年夏，西安地下党组织张秉仁、王超北派遣高克林作情报工作。为此，高除在电台抄收“野报”（非本系统电台联络对象发的电报）外，还曾设想利用此电台与陕北红军电台建立秘密通报联系。

1935 年夏的一个傍晚，高克林同志在西安易俗社门口被两个特务分子无理盘查。他们要高克林跟他们到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去一趟。高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十七路军总部的军官，要去必须先到新城总部，经我们长官批准。特务听后不敢表态，接着高又留了自己的地址，单位，并约定时间叫

特务到新城内来说，从而摆脱了特务的纠缠。高回来后将此事告知程卓民和王曙，并准备好对付特务的办法。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在上述事件发生后不久，我们又觉察到，原由交通处派到第五分队任司务长的李树德对高、王、程等同志的活动在进行监视。为此，经程卓民、王曙、高克林等商议，决定设法尽快利用有利时机，把这个坏家伙驱逐出电台。

事实的经过是这样的：

1935 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李树德起床后外出，架设兵张春元在李树德床上，发现在两个枕头之间放有一个小册子。张匆匆看了一下即去告诉雷振岐（不论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或是以后，雷振岐同志与程卓民、王曙、高克林之间的工作联系都是密切的）。雷当即跑到李树德的宿舍，从枕头底下拿出来一看，原来是一个蓝衣社的证件，即去报告程卓民。程看后即带着证件去同玉 BW、高克林商议，决定由程卓民以电台队长的身份质问李树德，趁此机会将其除掉。

当天傍晚，李树德由外面回到电台后，发现他的蓝衣社证件不见了，即暴跳如雷，追查是谁把他的证件偷走了，并且嚣张地叫道：“如不交还，就要枪毙”。他十分猖狂，还手持利斧，企图向张春元行凶。程卓民闻讯

后即赶来现场予以制止并严肃指出，不许李蛮横无理。程说：“东西在我这里，这是士兵在地上拾到的，他们不知道是谁的，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才上交给我。”随后，拿出证件问李是不是这个东西，李肴到蓝衣社证件后知道自己的特务身份已经暴露，更加恼羞成怒，气势汹汹地冲向程卓民，质问程为什么拿走他的证件。程说这是士兵在地上拾到的。李叫道：“不会拾到！我在枕头底下放着，怎么会掉在地下！”这时我们在场的几个人都共同证实是在地上拾到的。李叫嚷“那为什么不交给我！”我们回答：“不知道这个组织是什么性质的，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是你的，当然要交给队长！”这时程卓民愤然指出：“这个组织在我们电台是非法的；是不允许的！”李这时表面上还是有恃无恐的样子，而实际上是

色厉内荏，他奸笑道：“这是蒋委员长亲自领导的，还有什么合法不合法？！”程说：“我们只信仰三民主义，而不知道什么是蓝衣社，而且西安绥靖公署杨主任并不承认这个组织，也没有通知我们说他是合法的，怎能在我们这里存在。同时你这样做也是违反军纪的，应以军法论处！”当时，程即命令雷振岐、张春元、王新友等士兵把蓝衣社分子李树德驱逐出电台的大门。

第二天一早，程卓民即向交通处长黄念堂报告了李树德事件发生的经过，要求将李除名。但黄说：“你（指程）不要得罪青年人”，不仅不予批准，反而把李树德调出第五分队，包庇下来，真是令人费解。

李被撵走后，扬言要以暗杀来报复。为了自卫，程卓民曾将此事专案呈报杨虎城主任，并提出“如有暴徒诅击，保留自卫权”。程还请杨的高级参议张韬安当面向杨主任陈明原委。张韬安表示同情和支持，并给了程卓民一支手枪，做为与敌特斗争的自卫武器。

黄念堂对王曙采取不信任的态度，调离王曙在电台工作，到交通处管理通讯器材。黄还约王曙到他的住地用突袭的手段质问：“王时良，你是共产党员！”王答：“不是，如有人说那就纯属栽赃！”反驳了他。

西安事变时，我们都在十七路军总部和所属部队电台工作，听到兵谏捉住蒋介石的消息，无不兴高采烈，欢欣鼓舞，积极地投入了这个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行列。坚决拥护国共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但王曙同志共产党人的身份早已引起敌人注目，不宜继续在那里工作。经组织决定，1937 年初王曙同志回到延安。随后，王曙曾函告程卓民等同志仍留原地“就地疗养”，继续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扩大党在十七路军的革命影响。

---

*本文节自程卓民、王曙、郭伯诚、洪杰、雷振岐合写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三十年代在原十七路军无线电台活动史料》一文。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回忆在川陕地区的统战工作

武志平

## （一）

蒋介石对杨虎城将军的第十七路军历来是采取既利用而又排斥的政策。

1930 年十七路军入陕后，杨虎城任陕西省主席兼十七路军总指挥。蒋介石又在潼关设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以顾祝同为主任，带 3 个师分驻豫陕边境监视杨虎城。后因石友三及两广势力反蒋介石，蒋才将顾祝同部调走，以杨虎城任潼关行营主任，意在拉拢。

杨虎城欲在西北建立自己的势力，但蒋介石绝不允许杨这样做。1932 年 4 月，蒋以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免去十七路军十七师师长孙蔚如兼任的甘肃宣慰使职；同年 9 月，蒋又诱惑驻天水的陕西警备师师长马青苑叛杨。又以追剿红军为借口，派其嫡系胡宗南之第一师进驻陇南，利用饥民扩充军队。这对杨虎城是很大的打击和威胁。

1932 年 12 月，红四方军从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到川陕边的大巴山区。蒋介石命令四川的刘湘、田颂尧等部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联合进攻川陕苏区，并以胡宗南部监视川陕杂牌部队对红四方面军进行合围。蒋介石的企图显然是利用杂牌部队打头阵，与红军互相攻杀，以达到两败俱伤，消灭异己的目的。蒋的这种险恶用心，路人皆知，杨虎城更深悉蒋之排除异己的毒辣手段。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热潮推动下，民族正义感使杨对蒋采取了两面方针。对红军佯攻而实守。

1932 年 9 月我奉命去酒泉与马仲英部联络，嗣得悉红四方面军抵达陕境时，即返回平凉三十八军孙蔚如军部。不久三十八军军部移驻天水。1933 年 2 月 6 日，杨虎城电令十七路军所有在陕南部队归孙蔚如军长统一指挥。

2 月下旬，杨命高级参议杜斌丞先生从西安来天水向孙蔚如传达机要。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对进至川陕边的红军和进至陕甘的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应采取什么态度，以及与胡宗南部的换防问题（驻汉中的胡部调天水，驻天水的孙部调汉中）。21 日，我去马跑泉迎接杜斌丞。在回天水的途中，杜先生对我说，红军西进后，战斗力很强。胡部虽系蒋介石嫡系，武器精良，粮饷充足，犹被红军冲为几段，首尾不能相顾，其他更不足论。杜还说：以我的看法，如果红军西进，我们应当有意识地放过去；如果红军要在川陕边留下来，我们最好不打。杜在谈话中虽不无含蓄，但在我头脑中已初步有了底。杜斌丞在天水留住的几天内，我们又密谈了几次。有一次徐梦周同志也参加一起研究了具体作法。我和杜商谈，由他建议杨虎城就停战议和问题与红军谈判。但兹事体大，必须容杨多方考虑。即使杨一时下不了决心，还要争取好的结果，问题是要认杨本身的利害关系提出。这就需要有较成熟的时机和条件。

1933 年 2 月 24 日，孙蔚如、杜斌丞等率卫队一营自天水赴西安，我奉命随同前往。

1933 年 3 月，党在西安的地下组织负责同志王右民、宋绮云向我传达党的“特科”指示：

1、利用我在十七路军的公开职务（当时我在三十八军任少校参谋）和社会关系，为党搜集情报，如作战计划，各种信号、口令、电报密码、军用地图、敌军的兵种、兵力，指挥官的姓名、简历、信仰、嗜好、政治态度以及与蒋介石和友邻部队之间的关系等等。

2、利用十七路军部队在陕南与红四方面军形成直接敌对的形势，通过可靠的关系，建议杨不要和红军正面冲突，为蒋介石打天下，并设法创造机会秘密建立川陕苏区对外交通线，及时将军事情报直送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并将红军所急需的物资输送到川陕苏区，以解决红军缺乏物资的困难。再则掩护进出根据地的工作人员。

3、利用白军内部的各种矛盾，争取杂牌部队守中立或在对红军作战时

采取消极态度，并利用各种关系，采取各种方式抓好兵运工作，鼓动白军暴动、哗变，携带武器向红军投诚。

党指出：红四方面军到达川陕苏区还不久，在敌人的特务组织还没有在苏区周围形成有组织的包围之前，以我在陕军的公开职务进行这些（主要是前两项）工作，条件是极为有利的。王右民还对我说，工作任务艰巨重大，必须主动、灵活、积极，并谓我由他单线领导，约定了接头的暗号和秘密联系的方法等。

在党的领导和具体帮助下，我草拟了一个进行工作的简要计划，立即得到组织的批准。

杨虎城和蒋介石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杨与红军建立互不侵犯的关系或达成共同抗日协定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也考虑到杨虎城以往只是和共产党员个人接触，对个别党员的活动曾采取放任态度，但对共产党的组织和工农红军还没有建立联系，问题在于要有适当的人去向杨说。于是我们决定通过杜斌丞先生来进行这项工作。因为杜在陕西知识分子中有群众基础，和杨友谊较深，杨对杜待如上宾，他们谈话很少顾忌。同时杜的思想我们已有了底，和我的关系也相当密切，谈问题比较方便。

## （二）

1933 年 4 月 2 日，我随孙军长由西安出发赴汉中。5 月上旬，我接到杜斌丞先生一封密信，暗示说，杨已确定和红军进行友好的联络，并拟由我进行这项工作。与此同时，在孙左右协助工作的参议王宗山从西安来到汉中，带来杨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要我佐劭孙军长努力工作，这就说明了，对红军联络事已委托孙军长命令我去做（我对信中“佐劭”二字曾几经揣摩领会杨之意图），这完全符合党对我的指示和要求。在这之前，我利用某些进步关系做了一些配合工作，在孙军长左右也进行了一系列活动，创造了一些条件。

孙蔚如军长对蒋曾有幻想，企图通过关系得任甘肃省主席作一员封疆

大吏，所以他知道杨对红军打算进行联系愿意守中立后，他自己还是迟疑不决。但当王宗山到南京去为孙活动当甘肃省主席遭到蒋的拒绝之后，孙对蒋的幻想破灭了。我认为争取早日实现进入川陕苏区的计划时机到来了。1933 年 5 月 11 日，在汉中孙的三十八军司令部和孙作了一次比较长时间的谈话。我故作什么情况都不了解的样子，我们先谈到十七路军正面临着与红四方面军正面接触的形势，如果正式打起来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如不愿打又计将安出。我和孙的谈话是遵照党的指示进行的，但在表面上须以维护杨、孙的利害关系来谈。孙对我所提的问题很感兴趣。我们从军事、政治形势上作了分析。结论是：除了和红军采取友好的联络，避免正面冲突以保存实力之外，再也找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其实孙已得到杨的密信，因而就使我和他的谈话易于接近。第二天，又经过两度谈话之后，就题定由我到川北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进行联系，当即找来王宗山共同商议给红军写信怎么措辞的问题。我表面上是代表杨虎城（孙蔚如）和红军谈互不侵犯的问题，实质上是遵照党的决定做党的工作。在杨、孙方面看来，这是一个危险的行动，所以孙说：“老弟！这件事关系重大，它关系到十七路军的命运，工作中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必须绝对严守秘密。你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如果在路上不能通过，也不要勉强，就依：听回来，千万别使你冒险。”我窥察孙的内心是急切地想把这个关系打通，对我的关切语，也是他平素对属下的一贯作风。我表示执行长官的命令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当下决定事不宜迟，翌日便绝早起程。

孙蔚如把亲笔写在绫子上的信交给了我。我化装为红十字会的人员，把绫书缝在衣服里面，19S3 年 5 月 13 日从南郑起身。

我途经川陕地区原来的游击区西河口时，看到胡宗南部已将全街烧毁，一片荒凉。红军已收紧阵地，大部集中在通江东北部老林 E 空山坝地带。这里又为反动武装团匪占据。在西河口，我想起杜斌丞来信嘱我设法打听不久前进入苏区的张含辉的下落。对此，当时估计有两个可能。一是据说张国焘对外边去的地下党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均抱排斥态度，有杀

掉或拘禁的可能；另一个可能，是在路途上通过匪区时被土匪劫杀。通过一些关系调查结果，张含辉是完成任务以后，欲通过匪区宁家桥、磨盘寨去上元观张汉民团，被徐耀明匪团小叭长李华元所劫，惨杀于西河口、广家店之间的南叉以东之吴家坡树林内。这一情况也给了我以警惕。我穿过巴山绵亘的森林，中途被一个川陕交界的股匪头袁刚劫掳到黑风洞匪巢里，几遭杀害。幸我持有红十字会的证件和红十字徽章，又懂得一些“红帮”暗语和仪注。我双手被反剪着，弓着左腿，向他行了个江湖上的礼节，说出洪门中的四梁（山、堂、香、水）、四柱（恩、承、保、引），和几句江湖术语。如“燕山愚子过川来，久闻此地出贤才，礼貌荒疏休见怪，我与拜兄送宝来”。我信口胡诌，居然生效。袁匪乃为我亲自松绑，喝令喽啰们将我携带的包袱行李（主要是用油纸包裹的地图等物）收拢起来归还给我。并杀鸡煮腊肉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还有包谷酒相款待。袁用尖刀切下雄鸡头挑着送到我的嘴边，我即坦然张口承接下来。土匪毕竟是土匪，对我携带的军用地图，几组作战联络信号、口令、密电码等并未追问。强留我住了两夜，才让我离开。我虽心急如焚，但也乘机了解到川、陕交界山林里土匪民团的情况。在我被掳的头一天，行至八海坪地方，昏夜迷了路，就在一抹巨树上过夜。经过一些艰苦曲折，终于 5 月 21 日到达了川北两河口，见到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当即将携带的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和其他秘密情报交付给政治部。两天以后，在长坪见到总政治部副主任张琴秋，在苦草坪见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财经委员会负责人郑义斋、总后方医院院长苏井观等同志。那时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是张国焘，我和张共谈了三次。我和曾中生、郑义斋接触次数最多。我详细汇报了工作情况，领导同意白区党组织对我的工作指示，接受杨虎城、杜斌丞、孙蔚如提出的主张。我在总部停留的几天，曾中生和我及参谋陈明义住在一间屋里，在和他们交谈中，使我受到从未有过的教育和启发。

我当时的工作情况是复杂的。我到川陕苏区去并没有组织的介绍信和

其他证明。虽然王右民曾告诉我，说我的工作受中央政治保卫局领导，但仅凭那样说是难于取信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用工作实践证明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革命的战士。这就需要积极、主动，在任何困难复杂的情况下也肯于牺牲个人一切来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我向总部提出保证：我将及时地从陕西方面向红军提供各方面可靠的军事情报，并建议在川陕苏区北线接近陕南的地区，只需配备少量部队就可以保证安全，尽量将主力部队集中使用于粉碎主要敌人方面去。总部还提出需要无线电器材、医药医疗器械以及其他的供给问题。我保证一定完成这些任务。

总部极为重视对十七路军的联络工作，决定派川陕军委参谋主任徐以新到汉中和孙蔚如军长谈停战议和、共同抗日的问题。在行前，我和有关同志对十七路军的一般情况作了研究：十七路军有很浓厚的地方色彩，绝大部分官兵为西北人。比较高级的军官，大部分在家乡有土地，在城市有房产，有的开设商店，既是资本家，又是地主，和土豪劣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士兵大部分为破产农民和部分流氓无产者，部队纪律参差不齐。杨虎城总指挥本人出身穷苦，有民族观念、爱国思想，有创新精神，对进步事物颇敏感，但部下跟不上他思想的占多数，蒋介石的特务分子渗透到他的军队内部，时时在挖他的墙角，这种情况以邵力子当了甘肃省主席，胡宗南进军陇南而更加剧了。在当前的形势下，不能期望杨有更鲜明的表示，否则就会脱离实际。如果杨公开反对蒋介石，他的部下就会公开反对他。所以杨对本身如何图存乃是一件煞费苦心的事。他的决策必须切合他部下官兵的状况。目前杨毅然主动和红军联络，可能是从十七路军本身如何图存方面考虑为多，但事物在不断变化，应珍视这种开端。

我和徐以新于 5 月 27 日由苦草坝出发，31 日到达汉中。在我进入川陕苏区之前，红四方面军于四五月间以布告形式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1 月 17 日发表的宣言。我首先向孙蔚如报告了红四方面军派来代表的情况，并把 1 月 17 日的宣言送给孙看，孙很高

兴。约定 6 月 1 日在王宗山住所和徐以新举行会谈，参加会谈的还有王宗山和我。会谈的气氛是诚挚的。孙谈，西北军十七路军是有革命传统的，

个人对共产党人是抱友好态度的。徐谈到红军的三大任务和在国难当头之际对待国民党军队的态度，阐述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1933 年 1 月宣言的精神。对双方关系，孙提出以下 5 点意见：（1）希望红军不要在陕南、川北地区发展下去，应向甘肃地区发展。（2）如果那样做，十七路军愿给红军在后方作掩护，并接济适量的军械弹药。（3）如果红军仍在川北停留，十七路军决不向红军作真面目的进攻，至于前哨小的冲突，应视为正常的情况。（4）以当前的形势所限，只能是秘密来往，建立秘密互不侵犯、共同反苒的协定。（5）十七路军派武志平和红军保持联系，随时传达双方的意见。徐以新允将上述意见向领导汇报后再作答复。

## （三）

徐在汉中的 4 天中和孙谈了两次，和孙的心腹王宗山非正式地谈了三四次，王和孙的意见是一致的。孙蔚如对于谈判持保守态度，王宗山对他起到消极作用。王在政治上是投靠 CC 门下的反动分子，但他在杨、孙那里是相当受信任的。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不得不跟他作一番周旋，以免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虽然我们应该争取十七路军靠拢红军，共同抗日，但也考虑到上述情况，如果孙等能作到停止进攻红军，电是一个不小的收获了。因为他们守中立，就意味着东起镇巴、西到宁强蜿蜒五六百里的战线，可以避免大的战斗，红军就能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还可以利用这种关系建立根据地对外的交通线，从而打破蒋介石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我在去川陕苏区之前，为了表示诚意，孙曾允许给红军一部分陇南军用地图和药物，但到此时，孙却只允许给部分地图和价值 1700 元的药物，还有无线电机上男的火花塞、活塞圈&两个，并声明只此一回，下不为例。这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至于我第一次去川陕苏区带去的川、

陕、甘全部军用地图以及其他，当然孙是无从知道的。

6 月 5 日，我和徐以新利用由汉中回苏区的机会，除了由孙公开赠给的地图和药物之外，又自行购置了相当数量的西药和其他（如擦枪油等等）物资，计 20 余担，公开地运出了陕军步哨线进入苏区。我和徐以新在路上边走边总结这次谈判的结果。认为和十七路军建立这样的互不侵犯关系，应尽量严守秘密。杨、孙的部队中成份复杂，如泄漏出去，蒋介石必然要对杨、孙等人施加压力或另派嫡系部队到陕南地区，到那时即暗守中立这一点也难以做到了。真正和十七路军建立互不侵犯协定以后，就能够使川陕地区的红军由处于内线作战的情况下，收到对敌人各个击破的效果，对于巩固、扩大苏区是有利的。决不能因为杨、孙存在以上情况而表示冷淡，而应该与之信使往返以示诚意，还可以从政治上影响他们的内部。徐以新返回总部汇报工作，我则在巴山羊圈关川陕交界碑以南住下，了解当地情况，准备在那里建立联络点，以加强对苏区的联系，并等候徐以新汇报后返回。在这里，我将工作情况写信向西安地下党王右民、宋绮云以及杜斌丞作了详细汇报。

6 月 24 日，我和徐以新再度到汉中，继续和孙蔚如商谈，仍在原地址，仍是原来的人，双方同意了如第一次所谈的几项内容。协议于 1933 年 6 月 24 日圆满达成了。双方对于国内国际形势取得一致看法。具体商定，只要红军保证不进军陕西，孙保证不打苏区，并提出，如红军去打胡宗南部，十七路军愿给红四方面军补充一些武器弹药。这一互不侵犯协定对后来团结抗日和“西安事变”都起了相当作用。我将这次谈判情况函报在西安的杜斌丞，他复信对我表示慰勉。我还几次去信请杜来汉中一次，当面畅叙，交换意见。

杨、孙为了使这项联络工作秘密进行，便交由我个人负责。这为我后来的工作创造了较有利的条件，但我知道，在具体工作中，又须保持高度警惕。在当时的工作中，也碰到不少问题、困难。我的公开职务是杨、孙的使者，任务是和红军谈判互不侵犯协定的问题，而实际上我又是党的工

作者，在秘密地为党工作。这样在工作中就必须很好地处理各种关系，必须随机应变。在白区，职务是公开的，工作是秘密的，如果表面活动超过了白区所许可的程度，便立刻会给工作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在苏区，工作是公开的，行动则是秘密的。我直接发生工作关系的是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而我的免组织关系联系人则远在西安，并且是单线领导，遇事请示报告都有困难，往往缓不济急。因之，遇事要独立思考，既要坚持党的原则，又要灵活机动地面对发生的具体情况，工作的开展是多方面客观因素促成的。

7 月 1 日，我和徐以新第二次从汉中携带一批物资到川陕苏区去。这时正是红军粉碎了四川军阀田颂尧部以后，苏区有了很大的发展，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移驻通江以北的辛场坝。蒋介石焦急地一次又一次地给杨虎城和川军刘湘打电报，催促火速合围川陕红军。我向总部报告了陕西方面的军事情况。此外，因为那时人们都在盛传红军将要向西北地区发展，以便于打通国际交通路线，我就将西北地区（包括青海、宁夏、甘肃河西走廊）各个地方势力的头目和他们的武装力量、社会情况、军事地理等等尽我所知写了一份书面报告。

为了和苏区便于联系，及时递送情报和输送必要的物资，还要与汉中保持接触，便于搜集情报，同时又便于和白区地下党组织联系.经过反复调查和研究，除了从汉中经牟家坝、青石关、回军坝、天池寺（此处为小天池寺，以东为大天池寺）、羊圈关、西河口以达碑坝外，另在分岭老林地带开辟了一个秘密路线。选定了位于苏区与白区之间天池寺以南壑底沟中间的凉水井作为工作据点，并自己动手盖了两间茅屋。不久，便有重点地和附近的群众建立了较好的关系。这里既便于向各方联络，又不易遭受土匪民团的袭击。由于我的双重身份，既不能由红军派武装帮助，也不能依靠白军作掩护，只能依靠群众进行工作。我们就在两间茅屋里经常把情报和物资以及全国各地的报刊输送到苏区的首脑机关，把物资直接送给红四方面军总后勤部负责人郑义斋。

我和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建立了工作关系以后，得到总部领导的鼓励和支持。虽然和西安王右民的联系中断了，我还是为实际工作比较顺利地开展而感到无比高兴。这时期西安的宋绮云满足了我的要求，他把和全国各地交换来的报刊\源源寄到汉中，我再通过交通员送往总部。在汉中我和徐梦周联系很密切，徐还介绍属于十七路军的陕西省政府警卫团团长张汉民（地下党员）和我几次会面。张当时和中共陕南特委有联系，特委曾通过他派地下党员张含辉去红四方面军总部联系。这一时期，我还护送过地下党员张光远去川陕苏区联系，并接他回来。这一时期驻碑坝的红七十三师政委张广才给了我很大支持。

1933 年 10 月初，杜斌丞到达汉中，偕行的有常应黎（常黎夫）。杜谈到，杨虎城对于和红军取得联络一事被泄漏出去，疑我有意为之，要逼杨上梁山，杨对我表示不满。并说他已向杨作了解释，嘱我以后应多加小心。我表示这种怀疑乃属常识问题，杨部队及其左右人员，成分复杂，其中有不少亲蒋的人，根本无从保密。另外，从西北当前形势，从我党统一战线政策来讲，要求杨鲜明地举起红旗，乃是不可想象的。我如果那样做，显然是错误的，而且违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当时称双方关系人杜表示谅解。这时，常粲夫给我介绍了当时陕南特委的负责人张德生（代名张仲房），以后便建立了经常联系。常、张对我的工作均冶听支持和指示。我在与张德生取得联系后，可以就近战时得到党的帮助。张住在南城根禹王宫胡同 2 号，距我住地伞铺街 7 号不过百十步远，往来很方便。

这次谈话中，杜斌丞还表示：（1）由他建议杨虎城把与红四方面军订立的“互不侵犯，共同反蒋”协定，继续巩固下去，不要受蒋的威胁利诱，改变初衷。（2）对于党和十七路军的统战关系要注意保密，免为敌人抓住把柄，致使双方关系受到障碍。（3）对红军需要的物资，尽可能地予以帮助。（4）对杨虎城的主要将领以及王宗山之流，要做些工作，以免他们从中破坏。对于孙蔚如左右极为明显的坏分子（如宋树藩之类）要劝孙清除出去。杜所说的这一切和张德生、常黎夫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杜还说，十七路军和红军这一“互不侵犯，共同反蒋”协定之建立，打乱了蒋介石在陕南对红军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计划，川陕苏区北线沿大巴山东西向五六百里的漫长战线没有战事，红军并可以从这个地区取得某些急需物资和生活用品和对外交通的便利，以利于红军的扩大、巩固，集中优势兵力，对付四川军阀。

## （四）

根据各方面的情报获悉，蒋方已约略知道了杨和红四方面军有秘密联系的事，于是就对杨、孙开始施展恐吓拉拢的手段。胡宗南利用和孙部紧邻的关系，派他的亲信特务头子胡抱一住在汉中。表面上是联络员，实际是在侦察孙和红军的关系。胡经常成为孙的座上客，胡和王宗山等在一起狂嫖滥赌，使原来对杨和红军取友好联系政策持保守态度的人们，受到不少的坏影响。孙是和红军代表直接谈判的人，我也必须服从孙的命令。我深恐孙突然改变态度，对红军北线进行突袭。我于 1934 年 1 月到通江，向红四方面军总部报告了以上情况。总部决定继续派黄超赴汉中见孙，以消除对方的动摇心理，执行互不侵犯的诺言。黄超于 1 月 14 日到达汉中，和孙谈话两次，基本上达到了上述目的。同时为了使杨了解孙和红四方面军订立互不侵犯协定的真实情况，我又给杜写了一封长信。列举了种种事实，指出蒋介石对杨一贯耍的阴谋手段以及吞噬其他非嫡系部队的情况，请杜向杨建议，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和红军的友好关系。对孙也谈到对蒋介石的阴谋手段不能忘记，说到过去孙冒严寒率兵入甘平定叛乱，底定之后仅得一宣慰使的头衔，反而派邵力子去当甘肃主席，并且拉拢马青苑师叛杨投蒋；在汉中，胡宗南又鼓动王志远旅叛孙投胡。这些事实说明蒋是要排挤或吃掉地方势力的，对之不能不预先防范。

在这以前，还发生过一些事情。我所住的凉水井南边的羊圈关，是汉中去通江的必经之路，也是比较便捷的；另一条路是经过西乡县的钟家沟、大河坝通往楼坊坪川陕苏区后方的，但比较远。这两条路都不是畅通无阻

的。徐耀明的民团经常骚扰羊圈关、西河口一带，也就是我们认为最便捷的交通线；袁刚部正阻碍着钟家沟、大河坝的这条准备路线。袁刚在名义上是徐耀明团的第二营营长，但他们是由两股不同派系势力拼凑在一起的，存在着很深的矛盾。徐耀明部对我们的危害最大，多次企图劫掠我们输往苏区的物资，我们劝他约束部下不要阻碍交通时，他又佯作不知，仍不时进行骚扰。有一次，他的部下李孟春匪部预伏在羊圈关口外树林中，企图劫掠我们的重要物资，被一位靠近我们的农民苟正云发现了，他冒着危险火速通知给我们，我们的部队才将匪徒驱逐，保证人和物资安全进入苏区。这次事件以后，我们便下决心要消灭徐耀明匪部，期使交通线安全畅通，为广大劳苦群众除害，并为张含辉同志报仇。

前面谈过，我第一次进苏区时，曾被袁刚掳到黑风洞，和袁交下了“朋友”，并为他活动当上西乡县民团团总。我住在凉水井时和袁有过书信往来。从各方面了解到，袁、徐之间存在着很深的矛盾。

1933 年 10 月 13 日（农历八月二十四日）是徐耀明的生日。事先调袁刚部到徐耀明老巢石神坝以东的袁家沟驻扎，名为检阅袁的部队，实则为给徐大办生日显威风。袁刚派人接我去袁家沟会面，我即只身前往。袁向我表示对徐耀明不满，我即乘机说袁，让他剪除徐耀明。我用讲故事的方式给袁讲了一段《水浒》中林冲火并王伦的情节（“红帮”把梁山义气作为信条）。袁刚终于在徐耀明生日那天，出其不意地击杀了徐耀明，有几个趋炎附势的地主和帮闲客也同时被杀。袁刚吞并了徐匪的大部，只有一个叫王杰的排长带着二三十人投奔川军去了。从此以后，这条交通线就畅通无阻了。以后由于袁刚和他的部下透露出我主张杀徐耀明的消息，过了不久，徐匪的残部就勾引驻广元的敌军便衣武装特务到凉水井来狙击我，适巧我工作外出，交通员也不在家，匪徒扑了空，悻悻而去。事后邻近的张老婆婆告诉我，她看到几个匪徒衣襟底下藏着短枪，假装到屋里找火吸烟，探询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了，并在屋前屋后寻找了片时，又走出羊圈关往西去了。此后，我们便时常换地方居住，加强了戒备。袁刚以为杀了徐

耀明是对我有功，对我有所需求，我尽可能地不使他失望。

1933 年 10 月间，为了运输物资的方便，我和马桑坝开店营业的肖成善老大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她家距汉中城 60 里，从汉中运出物资到这里是第一站，到这里再改装通过老林，秘密运过天池寺或通过大、小坝越过分水岭，再由红军便衣武装运进苏区。肖老大娘和我们休戚相关，对工作帮助不少。羊圈关、西河口一带不少群众昼夜不停地为我们带路送信、通报匪情。我们虽然也给予一些报酬，但同他们所起的作用来比较，报酬是微小的。我们从汉中城经过马桑坝、回军坝、羊圈关等地都建立了交通点，秘密往来的工作人员都有食宿之所。这些关系，即在以后黑暗年代里都没有受害，只有一个在西河口的川北流浪汉张占五曾因给我们送过信，被坏人借别的事杀害了。在汉中的部队机关里，有几位地下党员如徐梦周、崔尽善等，都曾为我搜集情报，但都是心照不宣的工作关系。还有地方和部队里的人员，如袁作波、余晴初等被孙蔚如兼领的十七师国民党特别党部逮捕，经我向孙保释，都先后获得自由，袁作波是以保外就医乘机逃走的。

1934 年初，我们获得情报，川军以刘湘为首，在蒋介石催促下拼凑了上百个团的兵力，企图将红四方面军压迫到万源、城口一带，同时电令十七路军以及进到安康地区的杂牌部队向红军合围。我们认为敌人的企图虽不能实现，但川陕苏区西北部分地区如碑坝、坝溪、朱家坝、陈家项一带可能受到影响，由天池寺、西河口、南马山通往苏区的交通线很可能受阻。因此必须在接近万源方面的镇巴县开辟一条交通线。在黄超来汉中与孙蔚如会谈后返回苏区途中，我们商妥，第一次接头地点为镇巴城南 90 华里的渔渡坝。黄超回川陕苏区后，我在汉中派人准备了一部分物资，于 1934 年 2 月 1 日起程去镇巴。镇巴是三十八军五十一旅旅长、陕南绥靖司令赵寿山的防地。为了熟悉情况，并起向导作用，我途经城固时见到赵寿山，请他派了一个叫高华峰的副官同我前往。我们 6 日到达镇巴县城，7 日继续前行 3 百多华里到达毛垭塘白军前哨线南面的高脚洞。在这深山峡谷中有一座观音庙，我们就住在这庙里。这一带是土匪刘立培、马八元经常出没的地方，

我们只有两支短枪，安全毫无保障，高平峰副官勉强住了一夜，便带着一名勤务兵回镇巴城去了，这样更便于我的活动。8 日，我写信派人送给滚龙坡红军部趴，转送红四方面军总部。同时，我一个人前往渔渡坝了解情况，这一天是冷场，街上只有三五个人在闲逛。当晚我就回高脚洞。2 月 13 日是农历除夕，我和庙祝董大师及另外两名闲汉在一起度岁。过了几天，直到 2 月 16 日才接到总部来信，派柯大祥到渔渡坝和我接头，我将一捆敌区报刊和部分物资交付给他。我和柯大祥认为，渔渡坝距红军驻地滚龙坡太远，安全没有保障，另选力坝南边 15 华里的关门娅为交通站，那里是红三十四团驻地，交接物资在力坝街上。力坝东面 15 华里是川陕边界要隘降头山，那里是白军驻防的前哨，长岭驻有白军营部。决定之后，我从高脚洞折回毛垭塘，向西经长岭，到达降头山西面的力坝。在这里，我将一部分物资交付给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陈友盛。我在力坝南面关门垭乡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黎正刚家，介绍陈友盛和五十一旅副官高华峰见面，讲明请高副官给采购一般物资，委托黎正刚的爱人王三珍同志做些小型的运送任务。我一共去力坝三次，把白区的关系向陈友盛介绍清楚之后，再没有去过。我为了递送情报和掩护干部往来方便起见，仍然住在羊圈关之凉水井。

蒋介石委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刘委派他的参谋长刘从云为前敌总指挥。刘从云原是一个江湖术士，以占课测字取得刘湘的涪任。他登台拜将之后，迷信地按照各指挥官的生肖（如属龙属虎之类）配备进攻红军的方位，用“天干”、“地支”的说法制定旗帜的颜色。最后这个绰号“刘神仙”的进攻阵势，被红四方面军彻底粉碎了。在川军进攻红军时（这一战役停停打打历时数月），陕军也在陕南方面发动规模不大的攻势，而在战报上则大肆吹嘘。

在这个时期里，不知孙听信了什么人的挑动和来自何方的原因，曾密令驻牟家坝的团长黄亚藩派人于中途拦截我所携带的数担物品到他的团部，经详细检查后又放行了。这些物品是属于油墨纸张之类。还有一次，西河口附近的农民李明孝等 17 名赴牟家坝赶场，被诬指为红军侦探，押在黄的

团部，讯问我在西河口的活动情况。经我多方活动才将这些农民保释出来，我替他们支付了被押期间的伙食和其他费用。这些预兆，使我产生了隐忧。

1934 年夏末，孙对互不侵犯协定有了倦怠之意，已不敢或不愿和红四方面军联络了。虽然经过争取、解释，终不能祛除他对蒋介石的畏惧心理，使我所执行的任务受到阻碍，但我对工作还没有失掉信心。

同年 7 月，孙给我看一份电报，是蒋介石打给杨又转给孙的。内容大意是说：“据密报有伍志平（后又更正为武志平）其人，自称系三十八军参谋，住在西河口附近。经常给‘共匪’输运军火、汽油等物，仰就近查办。”我看过之后对孙说，蒋介石公开向我们提出警告，等于说，你们的秘密我已知道，现在公开告诉你们，看你们怎样表示态度吧。我建议依然和红军维持友好关系，在方式上更秘密一些，尽可能使红军不再派人来汉中，我也找一个隐蔽地方与之保持接触，不在汉中露面；如必欲与红军断绝往来，亦必须通知对方说明自己的苦衷，不得不在表面上冷淡一下，以便留有余地。孙均表示不妥。坚持要我离开部队，去内地另觅栖身之所。这时我深深感到独立工作的困难，碰到大的问题多么需要领导。经过反复考虑，我决定去西安找宋绮云，通过宋再向上级汇报并请示以后的工作。行前，我将有关情况和自己的打算向红四方面军总部写了书面汇报，将过去的工作和社会关系都作了安排。

## （五）

1934 年 8 月初，我来到西安，首先见到宋绮云。他告我王右民早已离开西安，言下对王之离开四安颇有微词，我亦决心去找上级领导以定今后之行止。我向宋绮云汇报了这一年的工作情况，他同意我去上海找王右民。

同时我在西安见到了常黎夫和杜斌丞。杜再次告我，杨曾怀疑红军有意识地将他和红军的友好关系宣扬出去，逼他上梁山。我说，事实情况正与此相反，孙的高级幕僚人员中就有特务分子，今后还需要注意防范，免遭他们破坏。我在西安碰到十七路军的熟人，大都知道蒋介石曾经有令查

办我。因为十七路军总部曾将蒋的电令通令所属部队一体通缉我，这显然是为了辟谣以掩人耳目，但人们却戏呼我为“奉旨严拿的要犯”。处此情况之下，大家都同意我离开西安。

宋绮云告诉我到上海找王右民的地址，我却没有找到。无奈又到北平找靖任秋。靖虽没有讲过他和上海中央地下组织领导机关有直接联系，但我们过去相处的一段时间里，我已经有所领悟。我向靖说明来意，靖慨然应允同去上海找中央组织。大约是 8 月底或 9 月初，我们到了上海，见到了王世英。这时我才知道王右民是由王世英直接领导的。我向他汇报了从 1933 年 3 月到 1934 年 7 月这一时期的工作情况（靖任秋、刘秉琳两同志在座）。王世英对这项工作很重视，并问到一些情况。除了同意我的报告，还诚挚地鼓励我排除困难继续战斗下去。并给了我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等指示。组织上指示我回汉中继续工作，并指出，目前党和十七路军的联系虽然遭到了破坏，但利用我在杨、孙部队内旧的关系，还可以进行情报和交通工作。因为红四方面军还在川陕地区，日益壮大。临别时，还约定了秘密通信方法和地址。刘秉琳给我的通讯地址中一个是宝隆医院。靖任秋告诉我，回到汉中要多和徐梦周联系，他会对我有所帮助。

当时我回到汉中是相当危险的，而且无枝可栖，特务活动日益猖獗，汉中地方很小，无法隐蔽自己。遂决定先见孙，说明我回来的理由（当时这样做，毫无把握，并且有几分冒险），我说：在内地无法停留下去，因为十七路军的熟人几乎都知道我是蒋介石指名要过的“犯人”，如果我落在特务手里，对于杨主任、孙军长都是不利的，我只有仍回到十七路军的防区内待下去。这时，孙虽顾虑重重，词严色厉，似亦无可奈何，只好允我在汉中住下去。王宗山对我提出约法三章：不能给我以任何职务；不准作任何政治活动，不准和熟人接触，否则不能负责安全；生活上自行设法。我表示这些都不成问题。就这样，我又秘密地恢复了对苏区的交通线。惟不能运输物资。

在我离开汉中期间，陕军不断向苏区骚扰；并未通知对方，便单方面

断绝了往来，自食诺言；在镇巴县的力坝地方，纵容地方团队杀害了红军的采购人员陈友盛和一名战士。这个地区原来是允许红军在这里赶场采购的，驻镇巴之十七师张骏京团长是知道这些情况的。

## （六）

我是 1934 年 10 月再次回到汉中的，虽然被撤掉了官阶，但改变不了我的思想，只是使我的工作更加警惕和秘密。我首先和徐梦周等取得联系。起初我的行虽然受到监视，但许多群众是同情我的。我坚持执行党的任务，将军事情报及时地送到红四方面军部。所苦恼的是我从上海带回来的 10 多个方、圆电池和几个小的电台零件无法送到总部内。因为这些东西如被发现，会招致意外的麻烦，不能轻易交人携带。这时的革命形势因为中央红军已开始长征，有些人对于革命表示悲观失望，敌人正大肆宣传他们的“胜利”。

1934年12月下旬，上海党组织派王超北持王世英的介绍信来和我联系。他的公开身份是张汉民团部的军需主任。我向他汇报了这一时期的工作，他传达了党组织给我的新指示，并介绍曹绶祉和我联系。同时给我一项任务，命我迅速将潘自力安全地送到川陕苏区。我留潘自力住在我家，给他准备化装衣物和证件，介绍交通线的情况和途中应注意事项。并让他过了 1935 年的新年，我亲自送了他一程，他按我给他绘制的路线图，终于安全地到达了川陕苏区。

1935 年 2 月 3 日（农历除夕），红四方面军十二师之一部一举攻下陕西宁强县城，全歼陕军杨竹荪团，生俘杨竹荪。红九军之一部乘胜向南郑进军，在勉县击溃了孙军十七师四十九旅王毅武（又名王劲哉，绰号王老虎）部。孙军集中于南郑、城固、褒城 3 个城垣内。杨、孙向蒋介石连电告急。蒋即派由原十九路军改编的四十九师伍成仁部、六十师陈沛部、六十一师杨步飞部和嫡系的一个补充旅王耀武部（后扩编为五十一师）到达陕南地区，胡宗南之一部到达陕西的西南边境地带，近洵宁强。王耀武部

系由西安子午谷小路到汉中的，因为秦岭山峻路险，初级军官和士兵沿途均有逃亡，骡马摔死不少。

红军进抵汉中城外，内外交通断绝，我因情报送不出去，相当焦急。2月17日（农历正月十四），孙蔚如委托王宗山到我住处找我，让我出城去见红军这一方面的高级指挥员，说明双方原订有互不侵犯之协定，应避免兵戎相见。我同意冒险出城。王宗山送来一张通行证。我出汉中北门时，虽有通行证亦须检查行李，我正在为难，守城门的排长原在镇巴毛垭塘见过两次，他还认识我，即令士兵放行。我将电池等物全部带出。在汉中城西30里长寨镇见到红九军政委陈海松，向他汇报了当时的敌情之后，继续到勉县见到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政治部主任周纯全，向他们汇报了敌情之后，他们派一班人护送我到川北旺苍坝见总政委陈昌浩、参谋长李特。我将所了解到的情况写成书面报告。在旺苍坝总部住了20余天，3月29日由那里起程回汉中。李特和黄超曾再三对我说，如果能在汉中住下去，可设法和留在巴山老林洮园寺一带的红军游击队领导同志赵明恩取得联系。我曾派可靠的关系多次去找，一直没有联系上。

自从伍成仁、陈沛、杨步飞、王耀武等部到汉中地区后，孙部在这里已反主为客，失掉了干涉行政的权力。孙对此虽感到不满亦无可奈何，至少在表面上对蒋介石只有惟命是从了。不久之后，蒋命令孙的三十八军调离陕南富庶之区到渭北驻扎。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西征，原川陕苏区的广大劳苦群众陷入了痛苦的深渊，遭到血腥的镇压。随着蒋的中央军到达陕南，特务活动也日益加剧。张德生已去川陕苏区。我和徐梦周经过商讨，亦忍痛离开了心力交瘁建立起来的交通线，于1935年6月到达西安。和宋绮云商讨的结果，认为我在陕西的环境不好，应离开陕西另到新的地区去工作。考虑华北地区在日军威迫下搞特殊化，蒋的特务组织比较薄弱，我到那里活动很适宜。于是，我遵从党的指示，另一征途，在新的环境里开始了新的工作。

注：①杨虎城保荐孙蔚如任甘肃省主席.是杨西北大联合的计划之一。杨向蒋提出将十七路军全部移防甘肃将陕西军政大权让出，自己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和陕西省主席，让邵力子调任陕西省主席，使孙蔚如接替甘肃省主席，如蒋不同意上述计划，则于十七路军在汉中部队与红四方面军直接接触时，即派军使去川陕苏区和红军协商互不侵犯、共同反蒋的问题。

# 党派我与杨虎城谈判*

王世英

1935 年 9 月初，我到了天津。后来党派我化装成商人到了西安。到西安后住在我的一个兄弟家里，后来和王菊人联系上。王菊人从前是党员，这时是杨虎城的秘书。还和崔孟博也联系上了，他也在杨那里做事。通过王，我和杨虎城见两次面。第一次见面，杨说汪锋是我们的人，我说是的。杨虎城知道我的身份。1927 年在皖北时，我在他下边工作过。杨的夫人谢葆真当时是党员，谢同杨结婚是经过组织批准的。那时，杨虎城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本来是冯玉祥的部叭，因为杨部在前线作战伤亡很大，冯不接济他，就同冯决裂了。杨由于环境困难，所以对我们态度很好。我原在高桂滋部队工作，因为杨虎城那里好搞工作，也需要人，党就把我调到杨部工作。我这次去西安，也是杨虎城的处境很困难的时候，蒋介石采取各种办法压迫他，他和张学良的关系也未搞好。我第二次和杨虎城见面是正式谈判。杨同我谈话害怕暴露，因为他部下有一个师长叫冯钦哉，同蒋介石有勾结。因此，杨要王菊人把我引进一间大厅侧面的房子里把门锁上，不让旁人知道。杨假装要休息，到大厅的另一房间脱衣睡觉。他等身边的卫兵、马弁都出去了，才穿好衣服找我单独谈话。杨主要谈了要我们不要公开派人和他谈判，要我们不打他，他也不会打我们。另外还送给我 500 块钱。当时，汪锋是毛泽东主席派来和杨谈判的。王超北等人的党员身份是秘密的。阎揆要是杨虎城部的团长。我和杨谈判以后，杨派人把我送到阎揆要那里，由阎送我进陕北苏区。杨虎城给我 500 块钱，我问汪锋苏区缺什么东西，汪说缺文具。于是我们就买了一大批派克笔和金星笔、墨水等文具带往陕北。

到陕北后，我向中央谈了杨虎城的情况，中央决定叫我再同杨谈。我

从陕北出来到了韩城，同杨第三次见面。我向杨说明了中央基本上同意他的意见，我们不公开派代表，也不建立电台，但要有人秘密取得联系，如建立交通线。这点杨也同意了。我们就派申伯纯和杨联系，关系就这样打通了。

*本文原载《丹心素裹》。

# 西安事变前后我在西安
# 绥靖公署军法处的工作情况*

申伯纯

1935 年 11 月，我奉南汉宸之命从天津去南京见杨虎城（那时杨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运动当中央委员）。我首先向杨介绍了我党《八一宣言》的内容，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主张。杨听了甚为动容。其次，向杨提议与红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的协定。那时中央红军已抵陕北，东北军“剿共”军队连遭惨败。杨当时与张学良之间互相猜疑很深，正是最苦闷的时候，所以想当选中央委员，离开陕西。杨听了我的谈话，认为有了新的希望，当时便表示可以接受这个提议。他嘱我暂留南京帮他搞选举。在五全大会开完以后，杨命我返天津向南汉宸要具体办法。1935 年 12 月，我返天津，南汉宸提出 6 条具体办法，交我带去西安，并由王世英与杨虎城联系后又去陕北与中央联系。从此，杨与陕北中央建立了正式关系。

*本文原载《丹心素裹》。

# 西安事变前后我在西安
# 绥靖公署军法处的工作情况*

庞志杰

## （一）

我是1933年10月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向北京之昌平、顺义地区进军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不久，抗日同盟军在昌平、顺义境内，被国民党军和日军四面包围，弹尽粮绝，伤亡惨重，被迫与国民党军达成和平解决协议。抗日同盟军中吉鸿昌以下共产党员，在详尽安排好组织关系后，分散离开战地；其余非党员官兵，编为一个团，归国民党军张耀明部收编。我是被安排回西安的，与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后进行工作。

1934年初，我由北京回到西安，在与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后，会见了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长张依中。因我在上北京大学时是由杨虎城将军供给的学费，张依中处长便向杨将军请示，给我在军法处安排了一个少校军法官的名义，穿上军衣作掩护，进行党的工作。张依中命我不管军法处的任何行政事务，而专管西安绥署和十七路军与国民党省党部发生的纠纷事件。

在我未回到西安之前，西安绥署与国民党省党部共同组织了一个特务机构，名叫肃反委员会，目的是专门迫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由国民党特务宋志先任主任，军法处长张依中任副主任，军法处稽查科长张绍先任审判员。我到军法处后，发现宋志先、张依中等虽共在一个特务机构里，却是同床异梦，各为其主。张依中、张绍先2人专门为十七路军和西安绥署办事，凡是遇到国民党提出对十七路军和西安绥署不利的人和事，他们均力行反对，说十七路军和西安绥署的人均是抗日的，没有一个共产党人。

为此常与国特宋志先争吵，维护十七路军的利益。

我到军法处后，张依中和张绍先知道我与共产党有联系，所以他们一得到国特对十七路军和西安地下党不利的消息，就告诉我，我即向上海党组织汇报，并通知西安市地下党员王超北同志，加以预防和注意。我平时也常送他 2 人一些进步刊物看，有意地影响他们。这样一直到西安事变前夕，使我党减少不少损失。同时，我把中共党员史选山安置为稽查，利用稽查名义，不时向陕北运送药品、口用品等物资。

军法处特意将我派到西安邮政局邮件检查所工作。

这个检查所是早在 1932 年由陕西省政府、西安绥靖公署、国民党省党部肃反委员会 3 方联合组成。我和省政府南汉宸秘书长派来的曹志仁常在一起商议，共同抵制国民党省党部派来的特务徐玉柱。在工作中，查出国民党特务向南京 100 号信箱经常密报十七路军和西安绥署的兵力部署、经费筹措和武器弹药生产情况，以及我党的活动情况。我把国特的密报经由张依中处长向杨虎城将军汇报后，杨对此很生气，也很重视。

1935 年 7 月，杨虎城指示张依中，要他成立一个组织，专门调查蒋帮对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迫害以及东北军内部的情况，供他参考。张依中将此任务交给了我。我即同张商议，提出在张绍先的稽查科内，成立一个特别稽查组，用稽查科的名义作掩护，进行这项调查工作。经张依中同意，我把我党党员王润九、王昭贤、许尚志、史选山等，都安排到特别稽查组内工作。同时我又联系杨晓初（在上海）、崔孟博、崔仲远、杨明轩（与东北军车向忱关系密切）、杨可均（在西安）、马文彦（在南京）等人，从各方面搜集材料，我将搜集到的情况随时加以整理，交给张依中向杨将军汇报。此工作从 1935 年 7 月，一直进行到 1936 年 6 月，杨将军认为情况皆已明了，才嘱我们停止。这个工作对杨虎城将军与张学良将军共同合作，发动西安事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进行这一工作时，宋志先曾逮捕了军法处内的中共地下党员王润九，张依中即持枪找到宋志先，将人要回，使我党未受任何损害。

1935 年 12 月间，汪锋持毛泽东主席给杨虎城、杜斌丞等的亲笔信，来到西安，同杨将军谈判联合抗日问题。军法处受杨将军指示，负责接待汪锋同志，并保证他的安全。在汪锋到达西安后，杨虎城将军起初主意还不十分肯定，派崔孟博去天津找南汉宸商议，南汉宸不能亲自来西安而商，便派王世英代表他和北方局来西安，协助杨虎城办理接受我党提出的联合抗日事宜。王世英到西安后，杨将军将王交给崔仲远安排住处。当时西安的特务活动非常猖獗，崔就把王世英交给我，要我给他找一个安全住处。我当即同张绍先商议，将王世英安排在身为国民党省党部肃反委员会审判员、西安绥署军法处稽查科长的张绍先家里，并给王世英戴了一枚西安绥署的圆形证章，以资掩护。对王世英的安全，我们亦如对汪锋一样，作了严密保护。

双十二事变发生时，张依中正在上海养病。听到消息后，连夜赶回西安。由于陇海路自陕县到潼关一段由国民党军队控制，张不能通行，便从陕县过黄河到山丙，由大庆关过黄河到合阳，住武士敏旅行海亭团长（外号行长眉）处，随即返回西安。到西安后，他听说冯钦哉叛变了，投靠 r 蒋介石，很愤恨，即想返回合阳，去说服行海亭，将该部拉回来，共同反蒋抗日。他没有向杨虎城将军报告，即自行去合阳。知道他要去的人都劝他不要去，但他反蒋抗日心切，恨冯钦哉叛变，不听劝告，即行前往。到了合阳，不意行海亭将他出卖，把他绑送给冯钦哉，竟被冯钦哉活埋了。张依中的死，完全是为抗日救国而死的。他是西安事变中十七路军第一个牺牲的高级干部，是一个同情、帮助我党的爱国民主人士。

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军法处的执法队，因张依中处长尚未回来，处内无人负责，便由我指挥，搜捕了国民党在西安市内的特务，当天就抓获了 20 余名，镇压了特务们的反革命活动。第二天，杨虎城将军和西安市公安局长赵寿山委派我去西安军警联合督察处任副处长，配合东北军派出的孙铭九处长，进一步搜捕国民党特务，维护了事变期间西安的社会治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米暂沉继任军法处长期间，将这批关押的特务全

部教育释放，每个特务都写了悔过书。

当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和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在西安事变中发动广大群众示威游行，拥护张、杨的八大主张时，我派军法处执法队在游行群众两旁排列成队，名为维持秩序，实为保护游行队伍正常行进，以防国民党特务捣乱。这两个群众组织是由徐彬如、杨明轩和车向忱他们组织领导的。

## （二）

1935 年 12 月中旬，原中共陕西省委军委负责人、红二十六军代政委汪锋，持毛泽东主席分别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 3 封亲笔信来到西安。汪的任务是代表

红军同西北军（即十七路军）谈判，推动杨虎城接受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争取他们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

汪锋到达西安后，杨虎城将军在新城绥靖公署接见了汪。杨看了毛主席的亲笔信以后，当即令十七路军的军法处长张依中负责接待。为了保密，他们让汪住在西华门军法处招待所。杨先生每次约见都由张依中同车陪同前往。杨指定由他的机要政务秘书王菊人继续和汪锋会谈。汪锋在西安期间，共会见杨虎城将军 3 次，还多次到大湘子庙街与杜斌丞恳谈。当时，邓宝珊不在西安，汪锋未能与邓见面。

汪锋在西安住了将近 2 个月。对于汪锋在西安的安全问题，杨虎城将军非常重视，曾对张依中作过 3 条指示：1、汪锋在西安期间绝对不能让国民党特务抓去；2、万一抓去了必须抢回来；3、万一抢不回来时，宁可交死人，不交活人。张依中将汪锋安排在军法处内居住，命令我负责执行。我当时作了周密部署，每逢汪锋外出，派专人暗中保护。张依中处长给我下达这 3 项指令，要我执行，我当时已是一个共产党党员，总感到不是味，是非常紧张的。我偷偷将这个指令告诉了汪锋，意思是让他知道，提高警惕，尽量少外出，以免发生不测。汪当时明确表示：感谢他（杨将军）对

汪某的高度关怀；感谢他对革命事业.特别是对十七路军全体官兵的生命财产的负责精神，我非常高兴。听了汪的这个表示，我才放下了心。

汪锋完成任务离开西安返回陕甘苏区时，由我一人护送，坐军法处骡子拉的轿车。同行的还有王世英同志。一路经长安、泾阳、三原和云阳、口头镇，到达淳化，亲自交给阎揆要（当时是杨虎城特务二团团长，秘密共产党员）。汪锋经淳化转回陕甘边苏区。我完成任务后返回西安。

*本文第（一）部分系《丹心素裹》所载《西安事变前后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对我党的帮助》一文；第（二）部分系《丹心素衷》所载《汪锋同杨虎城谈判的一点情况》一文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 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

王菊人

西安事变前后，本人在十七路军总指挥部任杨虎城将军的机要秘书，下列记载或属经历，或属见闻，惟所知者只是点滴。事远易忘，记忆难免纰漏。

（一）从1933年至1936年间，杨虎城同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曾有过联系，这种联系开始是通过南汉宸进行的。

红四方面军进入陕西时，蒋介石以其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师尾随红军，胡宗南到了天水，便按兵不动，这是蒋系兵力深入占领西北的开始。当时据十七路军所了解的情况，胡宗南驻在天水，一是防堵红四方面军向新疆前进，一是对十七路军进行监视。此后，十七路军和蒋介石的矛盾便逐渐尖锐了。这时，蒋介石在对红军作战方面的企图，是让十七路军在陕南给他当炮灰，使同红军两败俱伤，他坐收渔人之利，这严重地影响到了十七路军的生存。

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后，蒋介石命令十七路军的十七师孙蔚如部从甘肃集结于陕南汉中地区。杨曾派杜斌丞到汉中见孙蔚如，暗中商妥派参谋武志平到川北与红四方面军协商互不侵犯的办法，取得一定的效果。1935年1月间，红二十五军进入秦岭地区，蒋介石电令十七路军阻击红二十五军，陕西警备第一旅旅长唐嗣桐很反动，在奉命出发时，对杨说：“我是委员长的学生，我要为三民主义牺牲。”说罢还哭了一阵。结果唐兵败被杀。警三旅旅长张汉民（共产党员）由于太逼近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不知道张汉民的党员身份，也兵败被杀。安康绥靖区司令张鸿远本是个反动军人，兵败仅以身免。因杨屡遭失败，蒋介石电令中带了许多讥讽和训斥的言词，杨当时的心情是很苦闷的。

1935 年 12 月间，汪锋奉毛泽东的命令到西安见杨，并带来了毛泽东给杨虎城的信，提出了联合抗日的主张，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杨有许多勉励和希望之词。杨同汪锋面谈关于抗日救国问题，十七路军与红军如何合作等问题，谈得较多。

杨与汪谈过后，曾和某几个人商量过。

他对汪的来历不敢相信，毛泽东的信会不会是蒋介石方面为了侦察杨的态度的候信？为此，他通知在天津的南汉宸，请他派一个中共党员到陕北问一下汪锋的真实情况。南汉宸商请王世英、梁明德去红区。去红区前，由崔孟博陪他们先到西安，这是 1936 年 2 月间的事。王世英等到陕后，杨向他表明了愿同红军合作抗日的愿望，请王问明汪锋的来历，约王回来后再次见面。汪锋和王世英一起被护送着从阎揆要团驻地淳化进了红区。

王世英自红区回到西安后，再次和杨见了面。经过几次商量，共同的意见是：十七路军为了同红军合作抗日，要训练骨干力量；双方维持原防，互不侵犯；给予红军在十七路军防区内人员来往、物资运输以便利；红军应多方面对各杂牌军（当时指的是陕北绥德的八十四师和榆林的八十六师）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等等。王世英证明了汪锋的身份。

自汪锋、王世英相继到西安后，前线已无形停战。接着红军派张文彬为代表，常驻西安。张文彬被委任为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当时，因电台未建立，养于蒋介石重要的军事部署，便口头告诉中共代表。为保持双方的来往，杨虎城密令设立了交通站，在西安的有 3 处：西安城内甜水井，以特务第二团（阎揆要团）留守处名义，派副官原润泉负责，专为一般外来的或自红区出去的共产党人设置的。宋文梅的特务营营部和特务营营副谢晋生的家，是专为重要共产党人设置的秘密住所。这两个地方，保护极为周密，与杨直接接触的共产党人，住在这里。为保密起见，这里住的人，不与其他一般共产党人往来，如张文彬即住在谢晋生家中。在前线也有 3 处交通站：一为驻淳化之阎揆要团，由阎揆要负责；一为洛川、延安间的四十九旅和程鹏九团，由旅长王劲哉、团长程鹏九负责；一

为宜川的四十二师武士敏旅，由旅长武士敏负责，武去南京陆大受训后，此一交通线取消。关于电讯器材，电台地址，杨派特务营长宋文梅负责，地址预定在特务营营部（新城外西北角）内。由于种种原因，此项工作迄未进行。另外，由杨交付王世英带去的干电池、墨水、笔尖、笔扦、报纸本等物资，经由前线给红军运过一次。

（二）在 1935 年张学良到西安以前，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之下，受到了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从本身利害关系考虑，已下定决心，不和红军再打仗，并且开始觅取停止内战增强抗日力量的办法。杨当时曾说：“抗日，国家有出路，大家都有出路；打内战，大家同归于尽。要抗日，先要停止内战。在抗日这一点上，我们与共产党有共同的基础。”为解决这个问题，杨曾分别与蒲子政、王炳南商量过，并派崔孟博到天津和南汉宸商量过。他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也进行过反复研究。杨曾设想过两个停止内战的办法：一是与红军合作反蒋，以停止内战；二是注意国内各地方实力派的反蒋动向（当时注意联络华北的韩复榘、宋哲元，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设法联合反蒋，先打破蒋的武力统一企图，推翻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国策，以停止内战。杨当时着重于实现第二个办法。

（三）1936 年四五月前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对所部官兵进行了抗日教育。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安城南王区镇成立了长安军官训练团，团长为张学良，副团长杨虎城。训练对象为团长以下连长以上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现任军官。课程分军事、政治两门，以宣传抗日为主。东北军还成立了学兵队，在西安东城门楼内，秘密进行抗日教育。这些学兵，大部都是北平的进步学生，因遭蒋迫害逃来西安的。东北军还秘密成立了抗日同志会，十七路军很早就成立了步兵训练班，轮训班长以上连长以下的军官和士兵。

但当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绝大部分官兵，都被蒋介石驱使到陕北前线，担任包围红军的任务（十七路军的十七师、四十二师、大部分直属旅、

团和东北军的六十七军、五十七军、骑兵军等部，都推进到宜川、洛川、延安、淳化、旬邑之线），对这些驻在前方的官兵进行抗日教育，更为重要。为解决这个问题，在 1936 年 9 月间，由东北军方面的高崇民、刘澜波、孙大胜用化名写了几篇讲抗日、联共以及批评蒋介石、阎锡山阻挠红军东征抗日的文章，合成小册子，名为《活路》，在前线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官兵中散发，以鼓舞抗日情绪。

文章写出来了，却发生了印刷的困难。我们和几家有经常生意来往的印书馆商量，都不敢承印。他们说省党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有命令：凡是印抗日文学作品的，都是共产党，谁承印，谁就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犯”。如果有人来交印的，把稿子扣下，立即报省党部，隐匿不报，或暗为印刷的加重治罪。因此，他们都婉言谢绝了。

如果在外边商号印，即使勉强办到，也容易被蒋系特务侦知。当时十七路军军需处有一部铅印机，有印刷工人，经常开工，有时还做点外活，地址在新城十七路军总部军需处内，有数道岗哨，可以秘密印刷装订。十七路军军需处处长王惟之是个同情抗日的人，杨便叫他去办，并再三叮咛，要严守秘密。

王惟之决定自己监督印订，叫该处负责印刷的科长高自振挑选了一些技术好、并且可靠的工人，于晚间代印《新春日报》后，加班突击印刷，天明停止，第二天晚上续印。在排版、印刷、装订的时候，王、高 2 人轮流监视，按实印册数所需发给纸张。印坏的立即烧毁。散工出门时，对印工搜身，以防偷带。印了几夜，印成了 8000 本，先用王的小汽车运到西仓门王惟之家中，隔了一天，在傍晚的时候，又用申伯纯（十七路军交际处长）的小汽车秘密运到甜水井高崇民家，交高转发给东北军前线部队。杨派崔孟博带了 2000 本送到宜川交孙蔚如发给十七路军在陕北前线的部队。

事前，我们估计到这本小册子一发到前线兵手中，蒋系特务就会知道，那时就谈不到什么保密了。杨说：“这本小册子发到前线官兵手里，作用很大，秘密保不住的时候，特务无非拿枪杆吓人，咱也有枪杆对付。有勇

气抗日，不怕特务，特务来软的，我们软对付；来硬的，便和他们硬干。”不过当时我们认为，印刷是极为秘密的，特务是不会知道的，张、杨的密切合作，可以把事情掩护过去。

没过几天，岔子出来了。蒋介石派来监视张、杨的高级幕僚、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约杨去总部。晏先谈了一些陕北军事情况，接着说：“何敬之（何应钦）在江西‘剿共’时，何的随从人员中有共产党，把军事计划偷送到红军方面，结果何吃了大亏。你对你左右的人要常注意。”杨估计，晏对他的话不是无因的，可能是印《活路》这件事被特务发现了，便下令密查。正在这个时候，南京政府经济委员会西北专员郭增恺被特务秘密捕送南京，郭当时是十七路军的参议，他的被捕，估计与《活路》事件有关。杨便下令军需处、军法处秘密彻查。

军需处在进行侦查时，首先侦知军需处有两个印刷工人曾在新城城墙上偷看过《活路》。根据这个_线索，对全部工人的简历进行了审查，发现有两个历史较复杂的工人，一个叫连栋臣，另一个的姓名已忘记，这两个人都在西安警察局侦缉队干过事，他俩常在一起，关系密切。经有关人员邱树荣核对这两个人的照片，证实他们正是城墙上偷看《活路》的人，又侦知，这 2 人在续印《活路》的夜里，先照原纸（白报纸）大小带一份光纸进去，偷换了一份印的《活路》，因而按纸数，没有查出来。

军法处在调查中，发现有两个军需处的工人，下午经常到新城南门外西边木匠铺后院的蒋系特务机关中去。又侦悉：特务机关给了偷《活路》的人 60 元赏钱。由此证实这两人是偷《活路》的特务无疑，随即把这两个特务捕押军法处，双十二事变结束，十七路总部撤销，这两个人也被释放。

（四）对于捕蒋的计划、行动的时间、任务分配等事，于 12 月 11 日在玄风桥金家巷张的官邸，商量了两次。在下午 2 时左右，确定了 3 件事：（1）决定于 12 日上午 6 时在西安、临潼两处同时行动。（2）为了侦察蒋的行动，凡蒋与南京和西安方面的通话，必须通过张官邸的总机接线，注意蒋与各方面的通话内容和其他方面向蒋的电话报告。在我们行动时间以

前，如果发现蒋有察觉，或有移动，或有特务和其他方面向蒋告密等情况，随时准备以两个加强连立即由西安驰往临潼逮捕蒋，如果由西安方面派兵来不及，即命令驻临潼县内之刘多荃部，火速执行逮捕的命令。（3）如果情况无变化，12 日凌晨在临潼捕蒋的任务，交由十七路军派可靠军官和得力部队担任。当时张对杨说：他有几个作战有经验的老军官，只是在捉蒋的这件事上，他觉得没把握；青年军官可靠的有几个，但没有作战经验，所以请杨派人到临潼捉蒋。杨说：“这事我有把握。”杨回到新城十七路军总部后，即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1）着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立即组成一个加强连，每人配备手电筒一个，随时准备出动。派定大卡车 4 辆，随时准备载兵往临潼捕蒋。到了傍晚，杨恐怕宋文梅在指挥军队的经验上不如许权中，又把许接到新城，让他秘密地住在电务科科长原政庭房中，等候命令。（2）命令陕西警备第二旅孔从洲，着所部（包括郑培元、沈玺亭、唐得楹 3 个团及归孔指挥的一个炮兵营）官兵，均不得擅离营房，准备内务检查（因为在行动以前，未明白告诉军官捕蒋的行动）。（3）又研究了一次原定的在西安的军事部署：①特务营宋文梅率兵一连，担任临潼捕蒋的任务，归许权中指挥；②特务营（缺一个连）由该营营副张希钦指挥，担任逮捕住在西京招待所和花园饭店内的蒋系高级军政人员，并担任解除中央宪兵第二团（当时在西安的除担任陕省府警卫、临潼华清池蒋的警卫的以外，下余不足一个营的兵力）武装的任务；③警备第二旅孔从洲担任占领公安局、飞机场、中正门外火车站、西安军警联合督察处、保安处并解除各该处蒋系武装的任务；④教导营担任新城守护和解除别动队及蒋系部队各留守处、办事处官兵武装的任务；炮兵营（归孔从洲指挥）担任占领省政府，解除驻在省政府宪兵团一连的任务；⑤卫士队白志钧部有两个队，以一个队准备担任住在新城大楼的蒋介石的中层警戒（当时计划，蒋被捕后，押在新城大楼东房杨的办公室内，警备部队分 3 层，室内、房屋上边和台阶下边的四周）；以一个队担任新城临时指挥部（即新城内西边杨的住宅）的守护；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晏道刚，在陕西特务头目如

陕西省会公声局局长马志超、西安军警联合督察处处长江雄风、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曾扩情、陕西保安处处长张坤生、宪兵第二团团长杨镇亚以及专员张笃伦和省党部的特务等，务必设法逮捕。其任务，临时分配；⑦准备以电话下达命令，着冯钦哉派精锐兵力，迅速由大荔经三河口袭击潼关，确实占领该地；⑧准备以电报令陕北前线西路一带的第十七师、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及十七路总指挥部直属各部队，不分星夜.轻装前进，分别集合于渭南、西安等地区，策应对潼关方面之防御作战。令警备第三旅以隐秘行动，迅速占领咸阳，解除蒋军第十三师万耀煌部两个团之武装，巩固后方；⑨西安金家巷张学良官邸和城内东南区的保卫工作以及肃清该区内特务的任务，由张的卫队第二营担任；⑩东北军卫队第一营王营长，除担任包围华清池与十七路军派往捕蒋的部队密切配合行动外，并担任逮捕蒋的侍从室人员，解除其武装的任务；⑪西安和临潼的统一行动时间为 1936 年 12 月 12 日上午 6 时。这时，军事行动，任务分配全确定下来了。

12 月 11 日这一天，杨去张处的次数较多。上述任务分配，张也赞成，决定由杨下口头命令。午后，张叫在临潼华清池担任外围警卫的东北军卫队第一营王营长来西安，准备告诉他，叫他在十七路军捕蒋部队到达后，把该部队接应进去。张以此事先同杨商量。杨说，王营长固然是可靠的，但这种事先告诉王的作法有泄露机密的危险，不可不防。王营长既来了，甚好，可以临时给他命令，让王营长随捉蒋部队一同回临潼。张也赞成这个慎重作法。杨回新城后，给宋文梅下了到华清池捉蒋的命令，并叮咛他说：“你和许权中都对蒋介石有仇恨，这一回是为了国家大事，对他不应从个人仇恨出发，你必须给我捉回活的蒋介石，不要死的蒋介石，如果打死了蒋介石即要你偿命，谁打死了他，都以军法从事。”又说：“尽可能避免开枪，要迅速逮捕。还叮嘱宋要服从许权中的命令，先不要告诉许，等临出发时我亲自告诉他。”这时已是傍晚的时候了。杨反复考虑，总感到这方面的部队安排不够妥当，双方军官平日都不相识，共同执行这个任

务指挥上不方便，如果发生误会必致贻误大事，还是叫孙铭九去为好。杨又拿这办法同张商量。张说：孙铭九没经验，我加派几个得力人去。于是又变更了去临潼捉蒋的部队，其他仍照原定计划执行。

捉蒋的事情安排定了，张约定 12 月 11 日晚 12 时到新城与杨共同指挥军事。张来后，十七路军各部队才能照预定计划开始行动。

11 日晚 10 时左右，杨和孔从洲、宋文梅对过了表，杨在新城官邸东边客厅内等候张来。当时，对于事情的发展，把蒋捉来后，一些事情的估计和安排，都详细商量过。例如：①改组南京政府事，主张成立抗日联合政府（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在内），行政院院长不主张蒋兼任，主张以宋子文为院长；改组方式，采取救国会议通过，而不能像过去由国民党一个党决定。对于救国会议的组成，拟照孙中山提出的国民会议之精神办理。②为打破蒋介石一手把持的局面，各省行政拟采用分权制，各省成立省救国会议，行使相当于议会的职权，产生省行政机构，推定人选。③西北成立军事联合指挥机构，暂负责党、政、军的统一领导，将来移归联合政府。④陕北行政人员，在红军区域内部，先撤销原来邵力子委派的亲蒋的县长以上的人员，更换为亲共至少是不反共的人员，职权暂时不变；俟人心安定后，除八十四师高桂滋、八十六师高双成防区外，其他地区概由共产党派人接充县长，但仍受陕西省政府的节制，对共产党和红军要以友党友军看待。⑤将来红军的指挥关系。⑥民众训练，由全国救国会、西北救国会、东北救国会办理，候共产党代表到西安后商定。⑦估计蒋介石被捉后，南京政府对西安方面必然采取经济封锁的办法，首先是军费停发。准备由中、中、交、农 4 行之陕西省分行提取现金，作为准备金，由陕西省银行发行纸币（自法币停止兑现后，陕 4 行存有一批硬币），以济军用。⑧东路交通断绝后，民生日用品的来源将断绝，准备与阎锡山商量，由华北采购，经山西运陕，阎利税收，不会拒绝。⑨当时也想到冯钦哉会不会跟上来，本来想立即派车去大荔接他来西安（当晚 11 时由西安派车，12 日中午一定能来西安），由于想到数小时后即下令给冯袭占潼关，旅长武士

敏在南京，非冯亲自指挥不行，遂又作罢。

将到夜 12 时了，张学良还没有来，杨很着急，也有许多疑虑：他怀疑张学良会不会向蒋出卖他？东北军内部会不会走漏消息？孙铭九能不能担任起把蒋捉来的任务？张会不会又变卦？蒋是一个久于军事的极其狡猾的人，上次在临潼和张发生争执，以后又同他自己谈了话，蒋会不会起疑心，秘密逃向潼关？十七路军内部也有些特务，9 日晚间的军事行动，会不会向蒋报告，使蒋事先逃脱？孙铭九等年轻军人，有一股反蒋感情，会不会忘记大局，把蒋打死？……杨说：有 3 条路要作准备：（1）蒋如果跑了，孙铭九扑了个空，那时怎么办？（2）万一蒋被打死，那时怎么办？（3）捉来个活蒋介石，必然还得放个活蒋介石，既捉又放，该怎么办？杨又说：我们为了抗日，先得停止内战，除捉他逼他，没有别的停止内战的办法。只要把蒋捉来，他预定的一切军事部署都会落空，内战自然就停止了。不抗 R，蒋介石没路走。我们除抗日外，也没路走。那时候，谁不抗日，百姓更会反对谁，举国一致抗日的局面，自然会形成。杨谈到这里，心情极为乐观。杨又说；张汉卿突然举起抗日大旗，是很难见信于国人的蒋被捉到后，要立即作援绥行动，带上蒋介石一道援绥何尝不好。我们离帝国主义远，谁也给我们戴不上勾结帝国主义的帽子（这是有感于两广事变而言），顶多只能造谣说我们勾结苏联，真能勾结上苏联也娃好事。杨又说：这回事情，政治上是成功的（他指主张抗日），军事上可能失败（指十七路军这个部队），我们的抗日主张会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只是在军事上，我们却处于蒋介石部队的东西钳制中，我们的部队，一时集中不起来，一旦要打仗，对我们是不利的。蒋跑了，或者把蒋打死，立刻会有战事。他叫拿地图来。详细问了蒋系部队和东北军的位置。杨认真地思考了如果战事爆发应该作的军事部署，以防万一。同时，他看着地图，问了国内各地方实力派的兵力，分析了他们对蒋的真实态度，他说：如果蒋真要死了，国内各地方实力派都会起来的，那时，南京方面会自顾不暇，对我们就无兵可用了。后来杨想了想说：万一蒋死了，开始打一下免不了，头一仗一定

要打胜。那时我们的士气是高涨的，对方的士气是低落的。又说，头一仗一定能打胜，也必须打胜，打胜才能稳定局面，促进南京内部和国内各方面的变化。可请李兴中参谋长准备 3 个方案，一是同东北军、红军联合作战的方案，二是同东北军联合作战的方案.二是我们单独应战的方案。3 个方案都要在咸阳、渭南阻击东西进犯之敌，以坚守西安为目的。主力放在东路，并以强有力之一部（最好由红军担任）进入商洛地区，以确保我右翼的安全。杨又慨然地说：“我进陕西后，没有像在山东时那样训练军队，步兵训练班的政治训练也做得迟了。十七路军这个团体，已是将骄兵惰。一些中上级官佐，置地买房，娶小老挝，开商号，做生意，发财的发财，享乐的享乐，到了拼命的时候，谁跟上我来呢？也好，借此机会，整顿一番，抗日的来，不抗日的走。这个团体当初还不是几根破枪干成的吗？整顿一下，走新路，会成功的。即使失败，为了救国，把这个摊子摔个响亮，也值得。”这时候，杨谈得很兴奋，他的精神，紧张而严肃。接着，间了东北军高射炮队的情形，叫早把位置安排妥当。又叫把十七路军的自造高射机枪（把重机枪架在三角架上，可以转动仰射）分配在新城四周城墙上。他笑着说：“咱的那些有钱人，最害怕飞机炸弹，把他们也保护保护吧！”在这时，曾有人问：“把蒋捉了，其他实力派不响应，怎么办？”杨说：“实力派不响应，我们照样单独干。我们干的是百姓愿意干的事，百姓一定会响应我们，老百姓的力量比任何实力派的力量都大得多。”

张学良和他的高级将领及亲信幕僚，于夜晚 12 时，一齐坐了几辆小轿车，到了新城杨的寓所。张见了杨，笑着说：把我们都交给你了，看你怎么办？孙蔚如在旁笑着说：我们向来是不出卖朋友的。这时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也陆续来了。杨将张请到西边客厅，将他在上半夜想到的八项事（如前所记，只将冯钦哉的事未提）告诉了张。张说：这些办法，都是对的。

张到新城后，知道去临潼捉蒋部队立即出发，杨即命令孔从洲、宋文梅隐密布置，准备行动。到了 12 日上午时，孔从洲电话问杨：“现在是几点钟？”杨说：“时间到了。”孔从洲的司令部便放了信号枪。西安城内，

和临潼华清池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开始行动了。

天大亮了。刘多荃由临潼来电话报告说：华清池已完全占领了，只是蒋介石还寻不见，他的被子尚温，估计跑不远，正在搜查中。张接了电话后，放下听筒不语。大家也相对愕然。

因为这次事件，时间决定紧迫，布置不够周密，行动又很仓卒，所以发生了漏洞。东北军捉蒋的部队，对华清池周围的地形不清楚。张在事先带白凤翔、刘桂五去见了一次蒋介石，只是认清了蒋介石住的房子，旁的地形是不清楚的。蒋的住房，南窗甚大，可以开关。跳出窗子，向西是华清池的房屋，跑不出去，向南是陡山，上不去，只有向东沿房后山边是空地，可以上山、下坡向东跑。因为事先无法观察地形，包围圈不周密，漏掉了这个地方。所以当时估计：蒋可能向东跑上山，或者再向东跑向公路寻他的专车上的武装，也可能由东南逃向山区。那时还担心蒋介石急急忙忙绊倒在石崖下被摔死。当时我们判断，蒋没有事先跑了，而是临时逃走，按体力说他跑不动，按时间计算（距开枪时间不到 1 小时）他跑不远，按地形说他只能在丽山附近。张随即命令临潼部队，立即加派部队扩大包围范围，并以一部迅速截断临潼后山一切大小路，特别注意山沟、窑洞、岩间隙洞、山石四周、民房寺院，严密搜查。约 8 时左右，刘多荃来电话说，蒋介石已捉到了。这时，大家拍手称快，张命令孙铭九等立即把蒋押送西安新城。

蒋介石被押送到新城时，从前门十七路军总部交际处门口下车，步行走向大楼。看来，蒋介石这时又冷又怕，脸色灰白，头上还沾了一些黄土，走路也不稳。白凤翔去搀他，他还故作姿态不叫扶他；白一放手，他又左右摇摆走不动；后来还是两个人把他扶到新城大楼去的。

张、杨相继见蒋以后，蒋写了个条子，叫邵力子去谈。这时邵力子已被拘在新城。蒋见邵时，因为宋文梅奉令在旁监视，蒋以目向邵示意后，即向邵大讲总理（孙中山）蒙难时，他是如何“忠贞”地“拥护”总理，“使免于难”等，以自欺欺人。邵力子当时只说了一句话：“我和委员长

一样了。”蒋默然，邵即退出。

蒋介石被捕后，需要立即由《西北文化日报》（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机关报）出号外，通告市民；还应立即向全国发通电，说明事件真相和政治主张。这时，设计委员会（事变后成立的政治咨询机构）尚未成立，一些人便立即商量这件事。

（1）对这个事件应怎样称呼？有人主张叫“一二•一二革命运动”，有人主张叫“双十二抗日革命运动”，名称定不下来。号外、通电无法拟稿，时间又刻不容缓，后来有人主张用“兵谏”2 字，大家觉得合适。所以在号外第一号中这样说：张副司令、杨主任暨西北各将领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

①停止内战。已将委员长妥为保护，促其省悟；②通电全国并要求政府立即召集救国会议；③请南京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④此后国是完全决诸民意，容纳各党派人才，共负救国责任。

（2）关于 8 项救国主张的商讨。这在两广发动反蒋军事行动时，杨曾派他的秘书蒲子政去见韩复榘和宋哲元，当时经过商量提出了 3 方一致同意的 6 项主张：①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②停止一切内战；③释放一切政治犯；④开放民主爱国运动；⑤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⑥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准备在反对蒋介石武力进攻两广，并赞同两广的抗日主张的通电中列入的，当时因为张学良滞留上海，通电未及发出，两广事变已被蒋介石镇压下去了。这天早晨，十七路军方面，便将这 6 条提出商量。大家对这 6 条无异议。后来觉得这是一个爱国运动，对于沈钧儒等人须积极营救，便作为第三条列了进去。对于后来公布的 8 项主张的第七条大家商量较多。因为估计到南京政府一定要给我们戴个“赤化”帽子，以此在国内各实力派中孤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同时国内各实力派也必然注意到我们同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就加了“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一条，以表明这是国民党范围内的事，以防止_京政府的造谣，也有利于争取国内各实力派的同情。在号外第二号中就提出了 8 项

救国主张，在通电中也列入了它。

（五）在西安事变中期，杨深感到在+七路军中如不成立一个进步组织，将无法执行政治任务，因此就成立了一个十七路军抗日同志会。在西安止园开了一次成立会议，杨为会长，孙蔚如为副会长，南汉宸（中共党员）为秘书长，崔仲远、江隆基（均为共产党员）为科长。崔、江分任组织和宣传。另一科长为谁，记不起了。一切具体工作，交由南汉宸负责。

当时曾由江隆基起草会章，政治纲领大体与全国救国会的政治主张相似，其他均记不起了。

这个组织，以团或独立营为单位设分会，分会设会长，有的以团长担任，如特务第二团团长阎揆要（共产党员）、警备第一旅的团长刘威诚（共产党员）都是分会长；有的以政治指导员担任（西安事变起，十七路军成立政治处，以申伯纯为处长，各团均设立政治指导员）。这个组织，系由上而下组织的，发展得很快，十七路军总指挥部直属旅、团、营和十七师中的一部分，很快都成立了。这个组织，对内对外，都是保密的。凡属分会负责人，均由南汉宸个别谈话决定。这个组织的成员，就其下层负责人看，在政治上是较为进步的。

杨出国前，曾命保存这个组织。孙蔚如的三十八军到中条山抗日时，在这个部队中还保留着这个组织，后来就逐渐地在无形中解散了。

# 中国共产党在十七路军中的已知地下组织

## （1927年——1936年）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一、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政治处的中共支部（1927年初成立）

书　记　曹力如

二、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三原留守部队中的中共第四军支（1927年10月—1928年春，隶属中共陕西省委，后改属中共三原县委领导）

干事会书记　张汉民

第四军支补充团支分部书记　刘威诚

第四军支炮兵营支分部书记　张汉民（兼）

三、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中的中共特别委员会（1927年11月—1928年4月，隶属中共河南省委）

书　记　南汉宸（后为魏野畴、宋树勋）

委　员　魏野畴（负责组织）

蒋听松（负责宣传）

（一）第十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中的中共总支委员会

书　记　南汉宸（后为王汉秋、吴岱峰）

（二）第十军第一师中的中共总支委员会书记胡英初

委　员　王世英　张庆孚

（三）第十军直属机关部队中的中共支部书记陈云樵

委　员　曹力如（负责组织）

杜宗美（负责宣传）

四、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四师中的中共军事委员会（1929年秋—1930

年，隶属上海党中央）

书　记　杜理程

委　员　董林哲（负责宣传）

田静沉（负责组织）

1930 年 2 月新增加的委员有：孙永康、冯异僧、张焕民

（一）新编第十四师第三旅中的中共支部（隶属十四师中共军委）

书　记　曾楚川

委　员　（不详）

（二）新编第十四师南阳教导队中的中共军事委员会（隶属十四师中共军委）

书　记　赵莘仁

委　员　孙永康

董林哲

曾楚川

王　明

1.南阳教导队第一中队中的中共支部

书　记　曾楚川

委　员　杜俊杰　孙作宾　岳玉彩

2.南阳教导队第二中队中的中共支部

书　记　孙永康

委　员　阎维良　张海慧

（编者注：第三、四中队中的中共支委会成员不详）

五、第十七师中的中共兵变前敌委员会（1930 年 7 月成立）

书　记　孙永康

委　员　张焕民　王老汉

刘煊姚　丹　村

（以下为第十七路军返陕后各部队中的中共组织 1930 年 11 月—1936

年 12 月）

六、陕西省政府卫士营干部训练队中的中共支部（1931 年成立，隶属中共陕西省委）

书　记　汪锋

委　员　冯世光　李光明

七、第十七路军总部宪兵营中的中共营委员会（1931 年成立，隶属中共陕西省委）

书　记　魏志坚（后为王杰、杜俊杰）

委　员　王杰

杜俊杰　李炳文　李世英　上官克勤

营党委下属 3 个连的党支部

（一）宪兵营第一连中的党支部

书　记　杜俊杰

（二）宪兵营第二连中的党支部

书　记　上官克勤

（三）宪兵营第三连中的党支部

书　记　李炳文

八、第十七师中的中共军事委员会（1931 年初成立，隶属中共陕西省委）

书　记　孙作宾

委　员　李慕愚　胡振家

九、第十七师中的中共前方军事委员会（同时也是中共陕南特委军委）（1931 年初成立，时驻汉中，隶属中共陕西省委）

书　记　李慕愚

委　员　李　濂　王宝灵

十、第十七师中的中共后方军事委员会（1931 年初成立，时驻凤翔，隶属中共陕西省委）

书　记　孙作宾

委　员　吕剑人　胡振家

十一、第十七师随营军官训练班中的中共支部（1931 年初成立，隶属十七师中共军事委员会）

书　记　吕剑人

委　员　刘敬业　张毓秀

十二、陕西警备第三旅第二团第一营中的中井营委员会（1931 年—1932 年 4 月，隶属中共陕西省委）

书　记　李秉荣（后为李特生、习仲勋）

委　员　李特生　习仲勋

（编者注：营党委下属一、二、三连和机枪连党支部，但支委会成员不详）

十三、陕西警备师中的中共支部（1931 年秋成立，隶属中共陕西省委军委）

书　记　阎维良

委　员　张廷奎　王志远

十四、甘肃省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中的中共组织（1932 年成立，隶属中共陕西省委）

（一）警备第三旅中的中共校官支部

书　记　李罕言

委　员　孙作宾

（二）警备第三旅中的中共士兵（含尉官）支部

书　记　石子健

（三）警备第三旅教导队中的中共特别支部

书　记　张东皎

副书记　苏醒民

（四）警备第三旅第二团中的中共团委员会

书　记　张东皎

副书记　牛化东

1932 年 4 月，第二团中共团党委进行了改组：

书　记　焦维炽

委　员　张秀山　石子健

　　苏醒民　高尊德

十五、第十七师五十旅补充二团中的中共支部（1932 年成立）

书　记　贺修之

十六、第十七路军总部第一骑兵团一连中的中共支部支委会由魏志坚（连长）、赵启明（排长）等组成。

十七、中共安康军事特别支部（1933 年 5 月—1934 年 2 月，隶属中共陕南特别委员会）

书　记　梁布鲁（后为王辛德）

委　员　王辛德　袁作舟　王泰诚

十八、陕西省政府警卫团中的中共组织（1933 年夏成立，隶属中共陕南特别委员会）

（一）警卫团中的中共军官支部书记雷展如委员翟松生李明轩

支部的党员编为 5 个小组：

领导干部党小组　组长　雷展如（兼）

团部和直属部队小组　组长　刘子义

第一营党小组　组长　刘　珍

第二营党小组　组长　姜汉儒

第三营党小组　组长　李明轩

（二）警卫团中的中共士兵支部负责人　马学文

十九、第十七路军总部宪兵营中的中共支部（1933 年秋成立，隶属中共上海中央局）

书　记　谢华（后由金闽生负责）

委　员　金闽生　童陆生

二十、第十七师补充团中的中共支部（1933 年底成立，隶属中共陕西临时省委）

书　记　胡振家

委　员　杨嘉瑞　贺修之

二十一、陕西省政府警卫团中的中共士兵运动委员会（1934 年成立，隶属中共陕南特别委员会）

负责人　崔廷儒

（士兵运动委员会下属团直和各连竞支部，年底时党员增至 200 多名，但各支部支委会成员不详）

二十二、第三十八军军部中的中共支部（1934 年初成立，隶属中共陕南特别委员会）

书　记　崔尽善

二十三、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中的中共组织

（一）步训班第四期骑兵队中的中共支部（1934 年 1 月—11 月，隶属中共陕西临时省委）

书　记　王志仁

委　员　刘侠僧　陈　涛

（二）步训班第四期学生队中的中共临时支部（1934 年秋成立，隶属中共陕西临时省委）

负责人　李启明

委　员　张　涛　张文舟

（另有一支部，书记程天鹏。何单位不详）

二十四、第三十八军教导大队中的中共支部（1934 年冬成立，隶属中共陕南特别委员会）

书　记　李　锐

委　员　常清平　张　涛

二十五、西安绥靖公署宪兵营三连中的中共支部（1935 年冬成立，隶属中共陕西临时省委）

书　记　刘湘卿（王力）

委　员　吕建勋　刘振雅

二十六、西安绥靖公署宪兵营新兵训练排中的中共支部（1936 年 1 月成立，存在时间不长）

书　记　刘子义

委　员　李兰卡（夏飞）

苏育涵

二十七、西安绥靖公署教导营中的中共营委员会（1936 年 3 月成立，隶属中共陕西临时省委）

书　记　杨正人（杨永昶）

委　员　翟程九　巩克中

下属两个连支部：

（一）第三连中的中共支部书记　巩克中

（二）第四连中的中共支部书记　翟程九

二十八、中共西北特别支部（1936 年 5 月成立，隶属中共上海中央局）

书　记　谢　华

委　员　徐彬如　李木庵

（金闽生、童陆生、王根僧、宋绮云也参加了特支的实际领导工作）

二十九、西安绥靖公署特务第二团中的中共团委员会（1936 年 9 月—1937 年 1 月，隶属中共陕西临时省委）

书　记　王建基（王国）（一说书记张一平）

委　员　张一平

高兴中（王写剑）

刘家驹（杨信）

秋含章（秋宏）

（特二团的党员发展到200多名，在团直和各连都成立了党的支部，但支委会成员不详）

三十、十七路军总部特务营中的中共总支委员会（1936年秋一12月，隶属中共陕西临时省委）

书　记　刘湘卿（王力）

委　员　吕建勋

（营总支下属3个连的党支部，但支委会成员不详）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营总支委员会成员进行了调整：

书　记　韩学礼

委　员　刘湘卿　吕建勋

下属4个连的党支部

（一）第一连中的中共支部书记　赵宝森

（二）第二连中的中共支部书记　刘兰生

（三）第三连中的中共支部书记　（不详）

（四）第四连中的中共支部书记　蒙〇〇

（4个连的支部书记行政上都是连的指导员，党内也是营总支委员）

（执笔：王宇明）